

河北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

河北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 (2022)

本报告从系统概述、研究热点、活动管理、发展成绩和特点等方面，阐释、梳理和盘点2021年度河北社会科学发 展情况，并对新征程下河北社会科学发 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河北社会科学系统概述

(一) 社会科学机构团体

1. 社会科学机构

按照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研究机构、军事院校五大系统划分，截至2021年底，河北社会科学机构总数约为1250个。

高等院校。高校系统在社科人才、项目、经费、成果、获奖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2021年教育部公布数据，河北高等院校共12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23所，成人高等学校6所。普通高等学校中，依照办学层次划分，本科61所、专科62所；从办学性质区分，公立88所、民办35所；按照所在地，石家庄43所、保定15所、唐山12所、廊坊12所、沧州8所、邯郸7所、秦皇岛7所、承德6所、邢台5所、张家口5所、衡水2所、天津1所(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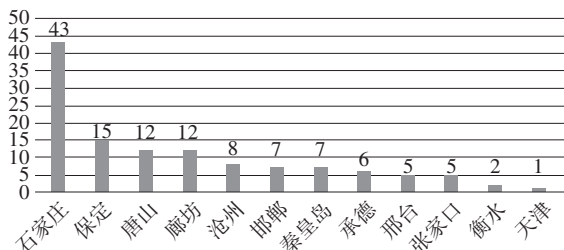


图1 河北普通高等学校区域分布图

2021年，经教育部批复，整合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办学资源为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整合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办学资源为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整合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办学资源为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更名为河北正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泊头职业学院更名为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建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民办)。办学资源的有效整合，进一步提升了相关高校的办学效益和规模水平，推动了区域高等教育和社科事业优质均衡发展。

从全国层面来看，2021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12所(普通高等学校2756所、成人高等学校256所)，河北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数量在全国总数中占比分别为4.5%、2.3%。从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来看，排名前10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广东、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辽宁。河北位列全国第8位，与2020年排名相同(表1)。

表1 202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排名前10省份

位次排名	省份	办学层次		办学性质		总数
		本科	专科	公立	民办	
1	江苏	78	89	121	46	167
2	广东	67	93	109	51	160
3	河南	57	99	111	45	156
4	山东	70	83	111	42	153

续表

位次 排名	省份	办学层次		办学性质		总数
		本科	专科	公立	民办	
5	四川	53	81	82	52	134
6	湖北	68	62	86	44	130
7	湖南	52	76	98	30	128
8	河北	61	62	88	35	123
9	安徽	46	75	89	32	121
10	辽宁	63	51	83	31	114

从发展水平看，河北建设有省属重点骨干大学 13 所，分别是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地质大学和河北中医学院。截至 2021 年底，河北仅有河北工业大学纳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教育部自 2019 年起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河北高校积极申报，一批本科专业入选国家或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例如，河北大学的哲学等 16 个人文社科类专业、河北经贸大学的财政学专业等 9 个人文社科类专业入选了 2020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般指社科院系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级层面的综合性社科研究机构，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河北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文件中确立的“河北中心智库”。2021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第一期三年建设任务圆满收官，科研组织运行模式实现创新、国家社科基金等高端项目立项取得突破、新型特色智库建设成果丰硕、各级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蓬勃开展，为河北社科系统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此外，还有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石家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石家庄市委讲师团），保定市社会发展研究院（保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保定市委讲师团）以及张家口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党校（行政学院）。包括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党委讲师团，共计 210 家。

省级层面有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河北中华文化学院）。市级层面，各设区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基本实现了职能整合，实行一个机构、三块牌子。另有中共定州市委党校、中共辛集市委党校、中共雄安新区工委党校、中共河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校（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省直机关分校）、中共河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党校（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省委教育工委分校）和中共华北石油管理局党校。县级层面现有 165 个，其中石家庄 21 个、承德 11 个、张家口 16 个、秦皇岛 7 个、唐山 14 个、廊坊 10 个、保定 20 个、沧州 16 个、衡水 11 个、邢台 18 个、邯郸 18 个，雄安新区 3 个。

河北党委讲师团系统设有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11 个设区市委讲师团以及部分县（市、区）委讲师团，并在全省 32 个县（市、区）、21 个乡镇（街道）、19 个村（社区）设立了省级理论宣讲工作站（联系点）。2021 年，省委讲师团发挥系统优势，除持续组织好重大主题专题集中宣讲外，还不断加强五级网络视频宣讲平台建设，积极推进新媒体宣讲活动，受众层次广泛，宣讲效果明显。

党政部门研究机构。主要包括省、设区市、县（市、区）各级党政机关所属研究机构，全省约有 900 余家。省级层面主要是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以及宣传、组织、公检法司等系统的内部研究机构。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作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新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负责制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专项计划，督促有关工作落实；负责开展省级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协调推动全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负责管理省社科基金，组织项目评审和成果转化等。河北省直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河北省财政政策信息服务中心、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所等。

军事院校。经合并调整，目前本部在河北的军事院校 1 所：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分校区 4 所：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原解放军

军械工程学院)、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原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这些军事院校的社会科学学科主要有军事学、管理学、哲学、经济学等。

2. 社会科学团体

社会科学团体是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社科类社会组织。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党委政府联系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桥梁纽带。河北社科联系统可分为省、市、县三级,省级1个、市级11个、县级113个。2021年,省社科联继续深化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群团组织改革的部署,修订完善《河北省社科联委员履职评价办法》,组织召开省社科联五届三次全委会,通过了部分省社科联委员调整补充事项。

社科类社会组织。河北社科类社会组织包括学会、研究会、民办研究机构、协会等,学科类别涵盖社会科学多个门类。截至2021年底,经注册登记的省级和市级社科类社会组织达1000余个,其中省级社团300余个,在社科研究、社会治理、科普宣传、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社会科学基地(中心)和媒体

1. 社会科学基地(中心)

河北社会科学基地(中心)主要有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以及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北目前有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分别是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为进一步加强河北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提升高校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河北省教育厅在全省设立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1年第二批新增研究基地21个,加上原有35个,现共计56个。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自2009年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相继与省内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建设了一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现共计25个。2021年各社科研究基地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家级媒体发表理论文章

25篇,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文章240余篇,出版社科著作78部,调研报告获省市领导批示46项,充分发挥了理论创新、咨政建言、社会服务等作用。

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自2015年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按照“好中选优、注重分类、分布合理”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内分批建立省级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现已达到55个。此外,各设区市社科联也加快组建起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社科普及基地,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全省社科普及基地网络体系。202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以省市县三级联动方式,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主题主线,组织开展了270余项活动,辐射受众50万人(次)。

此外,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省智库办)在省级层面培育建成一批新型智库(中心)(9个)。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自2015年起,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建设起一批专业智库研究中心(12个)。这些智库(中心)充分发挥专业研究能力突出、科研人才资源密集等优势,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河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成为全省新型智库体系的核心载体和主体平台。

2. 社会科学媒体

社会科学媒体在宣传推介社科学术成果、引领社会价值导向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作用。

社科类学术期刊。河北现有社会科学期刊约78种,总体数量与2020年持平,2021年省内各社科期刊共刊发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等1.2万余篇。2021年河北社科期刊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的只有《河北学刊》1家刊物。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5家刊物,包括《河北学刊》《河北法学》《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20年版)》7家刊物,包括《河北学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

报》《河北法学》《河北经贸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发布“2020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河北学刊》在全国人文社科综合性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转载量位居第6位，综合指数位列第8名。

社科类报纸和图书出版物。《河北日报》和各设区市日报的理论版等传统纸质媒体，全年策划刊登社科类理论文章、学术信息450余篇。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图书机构2021年出版社科类图书3000余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撰出版的《河北蓝皮书（2020—2021）》九卷本纳入全国皮书出版系列，内容涵盖河北经济、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产业、人才、法治、传媒、旅游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等。在第二十二次全国皮书年会上，《河北蓝皮书》分卷报告获评“优秀皮书报告奖”二等奖、三等奖。

社科类网站和各类新媒体。河北现有社科类网站约50个，包括河北文明网、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网、省内主要高等院校网站、党校（行政学院）网站等。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一些社会科学机构和学术刊物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短视频号等各类新媒体，积极发布社会科学动态、推介重要科研成果、传播社科普及知识，有效扩大了社会科学影响力。

（三）社会科学学科发展

根据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哲学社会科学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9个学科门类、38个一级学科。河北社会科学体系现已覆盖上述所有学科。

根据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河北动态调整的学位授权点名单，河北增列1个社科类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即河北工业大学的工商管理，至此河北社科类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总数达23个（表2）。新增社科类硕士专业授权点11个，分别是河北大学的税务、审计专业，河北地质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河北工业大学的法律专业，河北工程大学的翻译专业，河北科技

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石家庄铁道大学的翻译、艺术专业，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艺术专业，北华航天工业学院的会计专业，河北经贸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专业。

表2 河北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一览表

序号	高校	学科
1	河北大学 (10个)	哲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中国史、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艺术学理论
2	河北师范大学 (5个)	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中国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育学
3	燕山大学 (3个)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4	河北工业大学 (3个)	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工商管理
5	河北农业大学 (1个)	农业经济管理
6	石家庄铁道大学 (1个)	管理科学与工程

（四）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1. 社会科学队伍

截至2021年底，河北专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人员总数约为20040人。按职称划分，高级职称7410人，约占总量的37%；中级职称9220人，约占总量的46%；初级职称3410人，约占总量的17%（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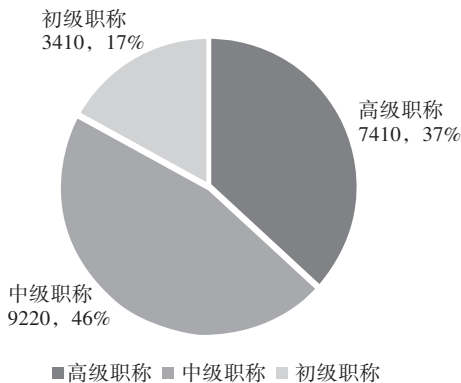


图2 河北社会科学从业人员职称分布图

2. 社会科学专家

截至2021年底，在社会科学领域，河北拥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组部“万人计划”人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省管优秀专家、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约 1890 人(次)。2021 年,新增入选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 人、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 10 人、河北省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 20 人。

3. 年度比较活跃的专家学者

在政治与社会研究领域,河北社科界比较活跃的专家有(排名不分先后,下同)宫敬才、康振海、黄云明、李维意、王彦坤、郭强、王伟、乔治忠、刘岩、魏四海、王聚芹、李素霞、赵学琳、杨文华、何启刚、孟庆瑜、周坚、张治江、申文杰、张彦、吕洁、张春玲、王金营、卢灿、杜家骥、伊士国、刘娟、张永辉等。

在哲学与文史研究领域,河北社科界比较活跃的专家有李洪卫、李振纲、赵贤、张燕京、张艳、崔红芬、韩来平、王颖斌、戴建兵、衣长春、董丛林、陈玉强、王志亮、姜文振、邢建昌、郭英德、李申曦、李金善、马燕鑫、孙欣欣、刘振英、李浩、黄云生、郑恩兵、张志勇、刘相美、张慧、张莉萍、孙继民、郑立柱、肖红松、吴国萍等。

在经济与管理研究领域,河北社科界比较活跃的专家有杨胜利、尹成远、王雅洁、刘文超、刘文勇、李恩极、周爱军、屈秋实、郭峰、刘宾、吴敬茹、王韶华、张亚明、许永兵、王淑云、朱云飞、刁心薇、王晓洁、孙颖鹿、康书生、宁金辉、刘洁、孙云霞、刘兵、李杰、王凤飞、李媛媛、张瑞锋等。

在教育与文化研究领域,河北社科界比较活跃的专家有李姝雯、范明丽、王胜本、李春林、彭青、王文利、刘维尚、金胜勇、王欣、陈则谦、陈兰杰、支凤稳、和曼、王旭、金强、治丹丹、樊拥军、张巨才、韩立新、苏妍嫒、张金凤、田建平、魏海岩、季彦霞、任文京等。

在河北改革发展的应用与对策研究方面,河北社科界比较活跃的专家有彭建强、颜廷标、高智、李岚、刘邦凡、陈璐、田学斌、张旭、韩景旺、李克桥、赵培红、孙英臣、武义青、张岭泉、田翠琴、张波、李会霞、王春蕊、王平乐、李利军、李国柱等。

(五) 社会科学项目

2021 年,河北社科界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强抓项目申报,夯实优长学科,加强团队协作,在社会科学项目立项及经费获取方面实现新突破。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级项目,其立项数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方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2021 年,河北斩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27 项,立项数量再创新高(图 3)。其中,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6 项,一般项目 98 项(含后期资助一般项目 21 项),青年项目 12 项,冷门绝学、抗日战争研究、思政课研究等专项 10 项。

根据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立项数量排名前 5 位的社科机构分别是河北大学(34 项)、河北师范大学(27 项)、燕山大学(12 项)、河北经贸大学(8 项)、河北省社会科学院(7 项)、河北农业大学(7 项)(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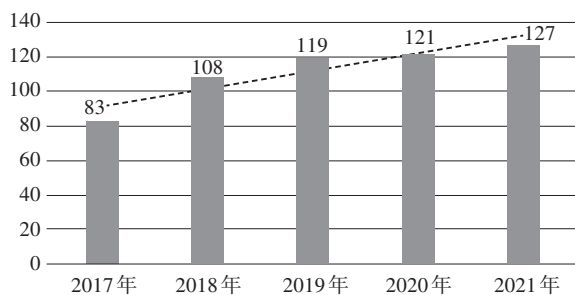


图 3 2017—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立项数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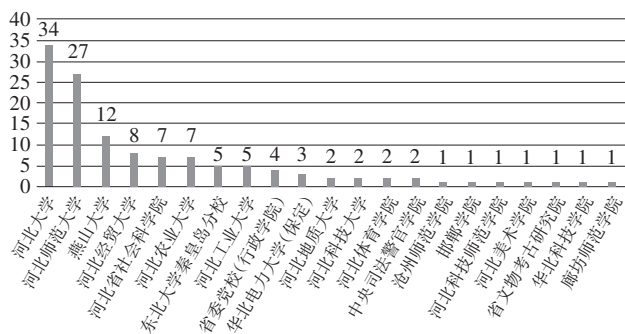


图 4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立项机构分布图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河北立项 96 项,包括高校系统 85 项,省社科院 7 项,省委党校(行政学院) 3 项,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1 项。其中重大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6 项(表 3),一般项目 77 项,青年项目 12 项。从各学科立项

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一级学科全覆盖,马列·科社、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管理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依然排名靠前(图5)。

表3 2021年度河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立项情况表

	项目名称	学科类别	工作单位	负责人
重大项目	增强综合实力的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重大项目	河北大学	王金营
	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研究	马列·科社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杨海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白洋淀流域生态安全法治保障研究	法学	河北大学	孟庆瑜
	家庭养育成本及其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	人口学	河北大学	贾志科
	《释名》笺疏	语言学	河北大学	刘青松
	清代近海海事法制资料整理与研究	中国历史	河北师范大学	王宏斌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交互模式对价值共创的影响研究	管理学	河北经贸大学	杨志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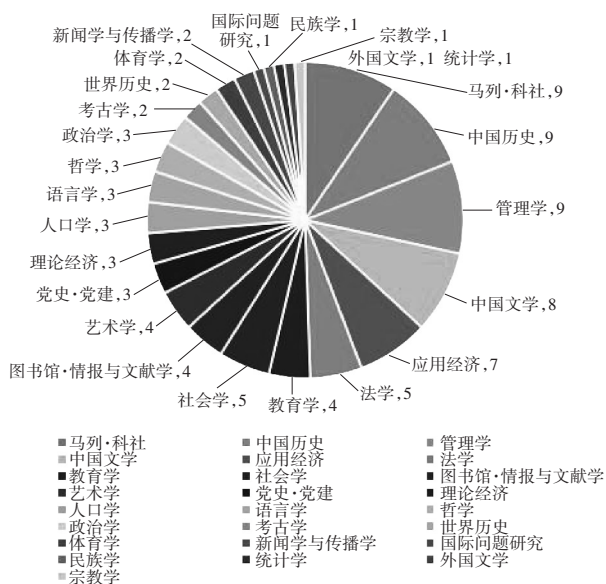


图5 2021年度河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学科分布图

本年度河北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项,均为一般项目(河北师范大学6项、河

北大学5项、河北工业大学2项、河北经贸大学2项、中央司法警官学院2项、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1项、河北美术学院1项、河北体育学院1项、省委党校1项)。思政课研究专项5项,均为一般项目(河北大学2项,燕山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北科技学院各1项)。冷门绝学研究专项3项,其中个人项目1项(河北大学),团队项目2项(河北大学、邯郸学院各1项)。中华学术外译一般项目1项(河北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1项(河北师范大学)。

2. 省部级及省直有关部门项目

2021年,河北获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及省直有关部门项目立项总数约为2315余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本年度获立项48项,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规划基金项目11项,青年基金项目22项,教育部青年项目1项,后期资助一般项目3项,高校辅导员研究项目6项,“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1项。承担单位中立项数量排名前3的分别是燕山大学(7项)、河北师范大学(6项)、河北大学(4项)。

2021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493项,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发展研究课题立项755项,省编委办课题立项116项,省人社厅课题立项903项。

(六) 社会科学成果

1. 社会科学成果概述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河北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总数约为13950项。其中,公开发表论文约10210篇,占比约为73%;出版著作约840部,占比约为6%;各类研究报告2900篇,占比约为21%。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在2021年河北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收录在CSSCI来源期刊(以下简称“C刊”)的论文共计538篇,分布于22个学科,比2020年少44篇。从收录数量来看,排名前5位的学科分别是经济学93篇,管理学51篇,历史学44篇,政治学42篇,艺术学40篇,这5个学科收录的论文共计270篇,占到全部收录论文的50%,从一定程度上说明

本年度河北重要学科的发展情况。与2020年相比,发文数量增幅最大的前3个学科是艺术学(增加17篇)、政治学(增加12篇)、统计学(增加5篇),减幅最大的3个学科是教育学(减少26篇)、管理学(减少10篇)、历史学(减少8篇)。另外从近3年C刊发文数量来看,有逐渐递减态势,值得引起省内社科界高度重视(见表4和图6)。

表4 2020年、2021年度河北被C刊收录论文学科和数量表

序号	学科	2020年 篇数	2021年 篇数	两年 相较
1	经济学	93	93	0
2	管理学	61	51	-10
3	历史学	52	44	-8
4	政治学	30	42	12
5	艺术学	23	40	17
6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44	38	-6
7	中国文学	38	36	-2
8	教育学	58	32	-26
9	新闻学与传播学	29	28	-1
10	哲学	24	19	-5
11	社会学	12	16	4
12	法学	18	13	-5
13	语言学	17	13	-4
14	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	18	13	-5
15	考古学	8	12	4
16	民族学与文化学	11	10	-1
17	外国文学	7	8	1
18	体育学	9	8	-1
19	心理学	12	8	-4
20	统计学	1	6	5
21	马克思主义理论	10	4	-6
22	人文经济地理	5	4	-1
23	宗教学	2	0	-2
	总计	582	538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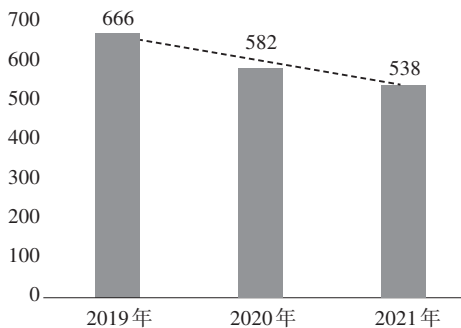


图6 2019—2021年河北C刊发文数量图

2021年,河北被C刊收录论文按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由多到少排列,前6位的分别是河北大学(162篇)、河北师范大学(80篇)、燕山大学(62篇)、河北工业大学(39篇)、河北经贸大学(26篇)、河北农业大学(17篇)。其中,河北大学被收录论文最多的3个学科是历史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文学;河北师范大学为历史学、中国文学、艺术学;燕山大学为经济学、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 社会科学成果影响

2021年河北社科学者在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理论文章约60余篇,其中在《光明日报》发表13篇,在《人民日报》发表9篇,在《经济日报》发表5篇。在2021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获《新华文摘》转载转摘13篇,获《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转摘11篇,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转摘5篇。

在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比中,河北有2项成果获奖:河北医科大学翟海魂《规律与镜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问题史》(二等奖)、河北大学宋耀武《有意遗忘与高效率学习》(三等奖)。

3. 社会科学成果应用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内完成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中,获省级领导或市级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约1160余项,被实际工作部门吸收采纳的约580余项,二者之和约占本年度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60%。省社科院聚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通过《智库成果专报》上报省委省政府研究成果和调研报告75项,获肯定性批示62项;上报的舆情分析报告获中宣部、中办采纳或获肯定性批示130余篇。省委政策研究室聚焦中央重大政策和省委关注领域,研究形成我省氢能产业发展情况、农村土地承包延包、社区居

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发展情况、县域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城中村改造等调研报告,得到省领导多次批示。省政府研究室围绕河北科技创新体系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研究、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等12项重点课题深入调研,全年形成研究报告68篇,多篇获省领导批示。省社科工作办组织省级新型智库提交决策咨询报告百余篇,37项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5项获省主要领导批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编印报送《决策参考》17篇,获省领导批示5次。一批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应用研究与决策咨询成果走进党委、政府决策视野,被采用转化为亮点举措,有效发挥了社会科学在服务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中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作用。

二、河北社会科学研究热点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一年,河北社科界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用理论阐释实践,用实践升华理论,产出了一系列高品质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 政治与社会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学者在以往的研究领域继续精耕细作,在深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回答时代之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专著和论文数量显著增加,成果质量明显上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特别活跃繁华的气象:有黄云明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多角度的研究成果展示;有宫敬才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进一步的深度开拓,以及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性描述;还有李维意对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的探讨等。关于马克思的国家与法的理论研究,郭强探讨了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乔治忠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探析。李秀玲基于英文文献,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城市问题。关于马克思的自然观研究,王伟探讨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形成过程、双重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刘岩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范式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时代研究,柴艳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思想问题。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成果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且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呈以下特征: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问题进行深度解读。学术界从多维视角继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度解读,不断拓展深化研究内容。如,魏四海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王聚芹等著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究》,以及康振海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汤惠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与类型学》、李维意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逻辑》、李素霞的《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福忠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论文,从多维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问题进行深度解读,研究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拓展。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及时作出理论回应。如赵学琳的《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及其超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我国时间坐标的多维判断及思想立场》,康振海的《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杨文华等的《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张骥等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文章,其研究内容较往年相比,既是学术前沿问题,又是创新性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三是聚焦社会热点,注重实践应用。张秋山的《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田海舰等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四维向度研究》等文章,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3. 精神文明与思想政治研究

精神文明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均与上年基本持平,在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在精神文明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燕赵精神、网络意识形态与网络文化建设实践、红色文化建设实践、乡村文明建设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廉政文化建设实践等方

面。何启刚提出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需要在思想认知、实践体验、对外传播三方面用力。康振海认为李大钊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精神、董存瑞精神、冉庄地道战精神、一二九师精神、白求恩精神、晋察冀精神、西柏坡精神、唐山抗震精神、李保国精神和塞罕坝精神等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河北乐章。戴建兵围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弘扬西柏坡精神进行探讨。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内容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工作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研究、课程思政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教育研究等方面。代表作有孟庆瑜的《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周坚的《运用思政课讲好伟大建党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此外,凌达的《从志愿讲解中感悟伟大的精神力量》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新方式。杨倩如不仅介绍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还为读者展现了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出现的多个类似“狼牙山五壮士”一般的英雄群体。

4. 党史党建研究

学者主要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执政能力建设、“互联网+党建”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成果数量比往年明显增加,高端精品学术成果进一步突破。呈以下特征:一是围绕“建党100周年”主题进行探讨。研究成果既有对过往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有对走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的河北使命任务作出理论回应。如,张治江对1921—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反帝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刘新圣探讨了过渡时期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成就和经验;申文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道德建设途径的基本经验;柴艳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道德的革命性。二是深度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论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康振海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梁瑞英认为,要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张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宝贵经验。李鉴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杨文华等探讨了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王永芹提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不断体悟初心使命。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学

术界就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领域展开了讨论。关于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孟庆云认为,要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关于党的制度建设,任广浩等以党内法规为线索,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制度治党的探索轨迹、时代发展与经验启示。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张继良等认为,构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尤其需要基层党委政府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履行主体责任。

5. 社会学研究

研究成果丰硕,特别在社会治理、人口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等方面凸显了创新性和深入性。

社会治理方面,学者们从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彦等著的《中国组织工作环境研究: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吕洁的《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等。此外,李智等探究了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的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叶璐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进行了总结。人口社会学方面,王金营等出版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一书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关系、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关系等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和拓展。吕红平、贾志科、杨胜利、王朋岗等对生育意愿、生育行为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生育政策调整放宽后生育数量不增反减的原因。环境社会学方面,卢灿等对新常态下中国碳排放峰值预测及减排对策进行了探讨。

6. 政治学研究

政治学研究较上年有较大突破,特别是河北政治史研究成果突出。其中,关于清代直隶总督的研究,在《光明日报》刊发3篇文章,分别是杜家骥的《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掌及其作用》、衣长春的《清代直隶总督与辖区治理》、董丛林的《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此外,杨豪探讨了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廖军等围绕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胥士元对中国古代治道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又探讨了荀子的治国思想;戴木茅以君主对臣属的心理震慑为核心,论述了《韩非子》中“怵惧”的逻辑展开与异化。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谷更有研究了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与社会秩序,姜锡东分析了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的出现与发展,廖寅围绕宋代乡村组织、乡村治理如何走向细化以及细化进程的必然趋势进行了研究,又对宋代的公吏与“公吏世界”说进行了探讨。

关于治理理论,韩兆柱对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及其应用进行了系统研究,杨光从区域层面的公共治理着手,探讨了如何推进公共治理现代化,王春城分析了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问题。关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研究等方面,李新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文化困境和对策;杨福忠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探讨;李琦对全球治理视角下网络恐怖主义的现状、发展及应对进行了分析。

7. 法学研究

法学理论研究。2021年河北法学界因时而进,总结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法治经验,研究涉及红色法治理论的多个领域。如,张永刚等以阜平县为中心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基层公安建设问题。同时,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也走向深入,力争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化表达。如,伊士国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价值。在国家治理法治化研究方面,苏永生等研究了“法德合治”的法治取向。此外,在法制史研究方面也有涉猎。

部门法学研究。种类较为齐整,基础性理论研究有所充实,数量和质量继续保持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民法典专题、刑法分则各具体犯罪、环境法治、社会治理等板块是最为集中且热度最高的研究领域。出版学术专著6部,CSSCI期刊论文17篇。其中,在宪法及宪法性法律方面,伊士国对宪法全面实施的学理内涵及实践逻辑展开了研究。在行政法研究方面,邴道远等对高速铁路安全立法问题展开研究。在民法研究方面,刘娟等对《民法典》中的一般人格权条款进行探究;田韶华就身份行为能力展开探讨;张永辉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就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展开研究;刘东涛就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法律理论与

实务问题展开分析。在刑法研究方面,苏永生分析了德国刑法合法性原理的双重视角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牛忠志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就当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了法教义学层面的解析;李鑫就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前置法的功能不足及补强问题进行研究,又就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进行了教义学思考。在经济法研究方面,孟庆瑜等探讨了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的构建问题,又研究了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法律调适问题。在司法及相关制度研究方面,梁平研究了我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规范与技术进路;徐昀等围绕审判中心论,就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层逻辑展开研究;孟祥林研究了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博弈、受益权边界与居民冲突治理;窦竹君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组织机制、运作机制和保障机制进行研究;王利军等研究了涉诉信访的法治化问题;郭雪慧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挑战与应对问题。在国际法研究方面,马雁等就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序展开研究;宋阳对国际商事惯例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

(二) 哲学与文史研究

1. 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史研究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老一辈的领军学者仍有多篇重要研究成果问世。比如,李洪卫对王阳明身心哲学的研究,李振纲对孔子责任伦理的开创性研究等。新生代展示了研究实力,比如王开元对孟子思想的别具一格的研究思路等。关于西方哲学研究,赵贤的文章《弗雷格的“否定”思想——基于句子图式的视角》较为突出。

关于逻辑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逻辑哲学、逻辑应用。陈晶晶对克里普克预设思想进行了探析;张燕京所著《达米特与戴维森意义理论比较研究》一书,开启了国内当代意义理论的比较研究视域。伦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伦理学基本理论、应用伦理两方面,张艳等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有声阅读伦理失范问题的现象、成因及解决路径。美学研究涉及中国美学、文艺美学等内容。关于宗教学研究,崔红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英藏西夏文《佛顶心观音经》的定名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张开媛探讨了《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社会

的流行及相关问题。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韩来平等分析了贝尔纳、萨洛蒙、戴维·狄克逊、古斯顿等人关于科学和政治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了科学政治学的语境形成、巩固与扩张；王颖斌对海德格尔关于探究意向性及其内含的生命意蕴进行了分析；王一雪从米洛斯基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谈起，探讨了经济语境中开放科学的价值基础；魏占杰等则探讨了水利工程学家陈士骅的科学和艺术世界。

2. 文学研究

(1) 文艺理论研究

成果在数量、质量上较上年持平，研究内容涉及文艺美学、基础文艺理论、后理论及相关问题、西方文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等方面。关于文艺美学方面，陈玉强认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以“赏”为核心范畴建构的文艺接受理论，是西方接受美学的有益补充。关于基础文艺理论，王志亮以泰瑞·史密斯关于全球当代艺术图景的理论探讨为切入点，讨论了艺术的当代性问题；姜文振围绕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后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基础层面的思考和对知识层面的追溯与探源，如邢建昌的《后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关于文学批评，牛军对钱穆与乔治·布莱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高永对哈罗德·布鲁姆诗学中国旅行进行了研究。

(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该领域研究继往开来，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论文、论著等方面都各有创获，越来越多的河北古代文学典籍得以整理点校。成果以先秦散文研究、唐诗研究成果最为集中，小说、戏曲、晚清诗文等也有收获，特别是郭英德的《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论文）《明清戏曲序跋纂笺》（著作），增加了本年度研究成果的分量和厚度。

古代诗歌研究。先秦诗歌中《诗经》研究仍得到学者的关注。李申曦跳出了以往对后妃嫁与未嫁的拘泥性框架，从更广的维度考察了《周南·葛覃》一诗的意旨；李金善围绕黄文焕《楚辞听直》选篇的“意”“法”以及“意法同原”之得失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关于秦汉诗歌，许春华等关注《毛诗序》的思想主旨，并同

《论语》以“兴”论“诗”之思想相比较，探讨汉代儒家诗学思想与早期儒家思想旨趣的差异。唐诗领域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较为丰富，代表作有马燕鑫的《唐诗证选》，孙欣欣的《明代唐诗选本与诗歌批评》。明清诗歌研究内容涉及诗人生平研究、诗歌接受史、中外文学交流、诗文集整理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唐元的《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于广杰的《叙异斋集 李刚己集》、陈玉强的《轨范与心源：明代诗学的中古接受研究》、刘青松辑校的《新辑泊居剩稿》等。

对古代散文的研究主要有诸子散文的史料研究、思想研究和历史散文的史料研究等。例如，刘振英对朱熹语体学和文章学成就做了总结，黄云生探讨了《岛夷志》与《岛夷志略》的关系，张志勇《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一书为方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词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谱的整理以及词韵词调的研究方面。小说传记方面，明清小说仍然是研究重点，同时也不乏一些学者在唐五代小说研究上做出探索，代表著作如：韩田鹿的《成为更伟大的自己〈西游记〉启示录》。戏曲与说唱文学方面，马兰编纂出版了《燕赵濒危剧种手抄本传统剧目整理丛书——丝弦卷》《燕赵濒危剧种手抄本传统剧目整理丛书——晋剧卷》；王树平对云南唱本《唐王游地府》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3)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在保持鲁迅研究、小说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等传统研究特色基础上，在网络文学研究、戏剧诗歌研究等以往相对薄弱的领域，则有所突破。在文学思潮与现象研究方面，杪楞探讨了网络文学中乡村题材创作所展现出的新的叙事特质。刘相美认为新媒体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读者”的文学走向“人民”的文学。魏建亮则明确提出“保卫读者”的文学立场，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脱陷的一条进路。张清芳以美国学者宋明炜研究为中心，探讨了海外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研究及其诗学建构问题。小说研究中，关于土改叙事和红色经典的相关研究成绩斐然，而对当代小说创作进行的研究多以文学批评为主。关于鲁迅研究，刘玉凯从解读鲁迅小说《故乡》本文出发，阐释小说的叙事背后的思想意义与相关的艺术设计。宋宇对新世纪中国话剧民族化的

审美基调与创作态势进行了探讨。在河北文学研究方面,王力平等对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艺术特质进行解析。

3. 艺术学研究

艺术学研究与往年相比数量与质量基本持平,无论从艺术创作本身还是从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理论深入,对艺术的表达方式和审美水平都有所提升,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方向广泛多元,内容涉及美术理论、设计理论、书法理论、音乐理论。代表作品有:张慧等的《基于雨水花园的乡村庭院景观设计探究——以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村为例》、刘宗超的《侯马盟书风格体系刍议》、齐易的《冀中“音乐会”的当代传承》、项阳的《区域民间音调与“准曲牌”现象——兼议〈东方红〉中区域音调的应用》等。

4. 语言学研究

成果数量和质量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内容涉及汉语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外语教学以及翻译等多方面。

关于汉语语言学研究,学者主要围绕汉字、汉语语言、汉语词汇学、音韵、方言等进行了探讨。如,顾俊娟和石金富对词边界与汉字位置加工关系进行深入考察。李姝雯和李曼丽对儿童书面言语的因果表达及逻辑思维特征进行了研究。袁世旭等提出亟须加强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又穷尽统计并对比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第6版中释义提示词的使用和修订。田玉琪对入声韵部及文学声情在唐宋词调的历史发展演进情况作了探讨。郑莉、傅林分别围绕衡水桃城区方言、献县方言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他研究成果还有冯军伟的《现代汉语心理动词构式的认识情态研究》、刘振英《〈朱子语类〉文章学研究》等。

在外国语言学领域,研究成果包括元话语、话语分析等方面。马晓娜采用人工智能算法对英语阅读文本进行定点跟踪。郭书彩基于语料库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的动名词搭配进行了细致研究。

外语教学研究,学者重点关注语言迁移、二语习得、外语教育与教学模式等方面。张素敏对运动事件中的概念性迁移方向与迁移域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续论中的多轮续写任务对英语学习者语言和情感发展的影响。卞少辉和赵玉荣探究

了高校混合式教学环境下的学习分析应用策略。高霄等针对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在线外语教学形态进行了调查研究。此外,基于不同教材、学情,学者探究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和策略,且注重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如赵英俊《E 英语视听说教程 2》,李树学《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与实践探索研究》,李哲和张黎广《实用商务俄语教程》,韩红梅《通用学术英语教程》,张小倩《大学英语思政阅读 1》,杜伟华《大学英语思政阅读 2》等。

关于翻译研究,张素敏等从对比语言学角度分析“续译”在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中的作用。李正栓等针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译者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柴冰针对乾隆年间多语种《楞严经》的译制与流传进行考略。张娟围绕中外文化差异与英语翻译进行了系统研究。

5. 历史学研究

(1) 中国古代史研究

成果颇丰,出版专著 21 部,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19 篇,主要集中在综合研究、先秦史秦汉史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和宋元明清研究几个方面。

在中国古代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 2 部河北地方史研究著作,分别是张志勇的《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张莉萍等学者编纂的《保定通史》古代卷。此外,学者还对一些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先秦秦汉史研究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先秦秦汉历史史实与历史事件、历史文献、以及先秦秦汉思想史方面。张翠莲对先秦时期自然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张怀通将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进行参校对读。胥仕元对荀子的治国思想进行了探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多年来持续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沈长云从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角度,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出版专著 9 部,专著数量有较大增长,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邢铁以家学的传承为核心,探讨了学问家族兴衰过程中所显示的规律。朱安祥探讨了魏晋南北朝货币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顾乃武对唐代关中畿甸政区地缘建构进行了研究。梁春胜《六朝石刻丛考》一书,为学界研究这一时

期的石刻提供参考。张开媛对《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

在宋元明清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出版专著4部、译著1部、古籍整理1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贾文龙通过对宋代地方“司法结构”的构建与解析,展示了宋朝地方法律的运行全景。郭志安对北宋时期的黄河水灾防治和水利资源开发给予更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孙继民等著《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一书,为研究明代黄册的发展演变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批珍贵新资料。王晓龙围绕宋代理学传播以及与宋代地方治理进行了探讨。刘云军对南宋诗人韩淲的《涧泉集》和《涧泉日记》进行点校整理。

(2)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河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继续平稳进展,研究更为细化,更加注重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范式的变化,内容涉及人物、抗日战争史与解放战争、共和国史、近代社会经济史、社会、教育、思想史等方面。

政治人物研究是近现代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学者主要围绕张之洞、严复、李大钊等人物进行了探讨。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郑立柱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对抗战时期各边区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还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杨豪对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进行探讨。在近代社会经济史方面,学者主要围绕区域经济史、货币金融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肖红松等对清代张家口“港口”功能与草原腹地市场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李敏对清末学制改革与“中国文学”的演生进行了考察。孙文阁对柳诒徵史学进行了梳理与研讨。

(3) 世界史研究

世界史研究稳中有进,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区域国别史三个学科方向均有相关成果发表,其中古典史、区域国别史领域的推进较为明显,特别是日本史的研究成果涌现,部分填补了省内学科研究的空白。代表作品有吴国萍的专著《基于古希腊神话的英雄史诗研究》、刘向阳的《环境史视野下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

“滞涨危机”新解——兼论环境史的经济转向及其创新》(论文)、张如意的《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张敏翻译的日本近世史和性别史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横山百合子的专著《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等。

6.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

2021年度河北考古工作以主动性科研考古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为主。全年主要考古项目41项,其中主动性科研考古项目22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9项。考古工作者全力推进“人类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等中国考古重大工程项目;助力雄安新区建设,继续做好雄安新区考古工作;推进燕、中山国和城市考古工作;做好配合基本建设等考古项目。课题研究稳步推进,出版了《邢窑》《磁州窑冶子窑址》《赞皇西高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地——2009—2010年北区发掘报告》等著作;发表了多篇论文、考古简报,如:《河北行唐县故郡遗址东周墓M2的发掘》(齐瑞普)、《河北黄骅市大左庄隋唐时期制盐遗址发掘简报》(雷建红)、《河北蔚县三关辽代家族墓地M3发掘简报》(岳改荣)、《河北邯郸西小屯一号墓及周边墓葬发掘报告》(陈伟)等。博物馆学方面,学者主要围绕博物馆事业发展和博物馆藏品保护与活化利用进行了探讨。

(三) 经济与管理研究

1. 经济理论研究

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就业养老、创新驱动、金融风险防范、低碳经济、环境治理、国际贸易和三农等领域,通过紧贴现实和注重问题研究的多样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于养老问题,杨胜利等以京津冀为例,围绕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测度进行了思考;尹成远等通过数据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关于科技创新研究,王雅洁等通过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异质性视角下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效应进行了探讨。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方面,屈秋实等探讨了中国有色金属产业链碳排放及碳减排潜力

省际差异；陈凯等围绕能源、水资源和建设用地经济治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王树强等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区际协调方法进行了探讨。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代表作品主要为刘文超的《20世纪真实世界的微观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发展90年回顾》。世界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国际贸易问题、“一带一路”两方面展开，如刘文勇等基于行业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影响。在三农问题方面，王冬等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和检验了改革影响农民消费的中介效应。

2. 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

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数量上呈稳步上涨趋势；方法上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研究视阈呈现多元化特征，一些研究选题具有新意和时代性，深刻探讨数字经济、碳排放等当前学术热点问题。

区域经济研究。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与碳排放、物流行业、交通情况等因素的耦合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区域经济差异、相关行业发展等对河北省区域经济的整体影响等方面。关于区域竞争力，李恩极等考察了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周爱军探讨了雄安新区人才生态环境评价及涵养路径。关于城市经济，郭峰等基于互联网与环境质量的机理分析，选用城市层面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方法验证互联网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关于县域经济，屈秋实等通过数据模型分析了大渭河次区域农业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刘宾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吴敬茹等对京津冀城市群先进制造产业的集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索了其影响因素；刘海云探讨了实现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促进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部门经济研究。关于工业经济，王韶华等就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进行了探讨；崔和瑞等分析了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关于产业集

群，韩克勇等探讨了包容性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张亚明剖析了科技创新驱动各省份产业升级差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多元路径；王金营等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检验区域城市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不同匹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王雅洁等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金浩等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农业经济，高浚力分析了河北滦平的区位优势和发展路径；张春玲等提出了以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举措；李茂等围绕金融创新如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衔接进行了探讨。关于商贸经济，学术界就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电商与物流企业的发展、区域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等课题进行了探讨。许永兵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消费将发挥基础作用；王淑云通过构建数据模型，对供应商应具有价格控制力的供应链合作双赢模式进行了研究；尹士等基于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研究新冠疫情期间如何保障生鲜农产品的供应；吴婧等运用直觉模糊集研究了“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李美羽等总结归纳了数字经济时代生鲜供应链的变革需求和创新机理与路径。

3. 财政与金融研究

(1) 财政学研究

学者主要从现代财政理论创新、财税政策，以及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财政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现代财税理论，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财政的属性、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公共财政理论、公共经济体制的建设、财政职能的内涵等方面。朱云飞等就河北省财政运行风险及防范对策进行了探讨，还通过对“十三五”期间河北省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分析，提出了加强河北省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贺佳就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探讨。刁心薇等分析了在碳税和碳交易政策并行的情况下，两产品供应链的决策和协同问题。王晓洁等对雄安新区的税收政策的创新进行专题研究，还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财政税收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李晓鹏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两个方面围绕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俞会新等基于政府监督视角，就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孙颖鹿的《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研究》一书，为地方财政改进扶贫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2) 金融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成果在数量、质量上均较上年有所提升，出版专著4部，CSSCI期刊（含扩展版）论文24篇。研究内容涉及普惠金融、家庭金融、绿色金融、金融市场效率、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等多个方面。关于普惠金融，学者就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在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及影响进行了研究。康书生等基于调查数据，围绕客户非财务特征的金融排斥结构对家庭财产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宁金辉等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又利用“2016年绿色债券市场启动”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债券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乔敏健对国有企业境外上市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进行了研究。范庆祝等通过分析CHARLS数据包含的经验证据，评估了保险代理人和被保险人的议价能力及其差异。李桂萍依据中国股利税减税、差异化及调整三次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数据，探讨了股利税改革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李志萍对我国风险投资的空间特性以及相应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张永礼、张瑞锋、李妍、郭丽楠等在金融风险管理方面进行了研究。叶莉等讨论了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竞争共同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李媛媛等实证分析了在不同阶段科技金融网络对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机制、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发展等方面。

4. 管理科学研究

研究成果丰富，其中外文期刊发表数量与往年相比显著增加。管理科学研究更具多样性，主要分为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题研究两个主题，重点集中在一般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与方法、评价理论与方法、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数量经济分析理论与技术、预测理论与技术、复杂性研究、知识与创新管理、

运筹与运营管理、工业工程、金融工程、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平台企业研究等领域；而管理思想史、组织理论等研究相对较少。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注重实证分析。多数成果采用相关模型对通过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小组访谈、案例研究、二手数据等方式对获取的实践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了有意义的研究结论，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张敬伟等以过程取向的效果逻辑理论为视角，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在创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李慢等从顾客信任的视角，构建非递归模型揭示网络服务场景对顾客契合的作用机制。赵萌等提出了基于三维信任网络的联合风险投资多属性群决策模型，还通过考虑决策者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提出了一种交互式共识模型。二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刘晓静等分析了我国托幼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还对深度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适老辅具技术、应用、适配评估与发展进行了探讨研究。

5. 工商管理研究

研究成果与往年相比，外文期刊发文数量、学术专著数量都有所增加，出版专著5部，CSSCI期刊发表文章29篇。内容涉及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等方面；同时，呈现出团队研究、高校间（跨省）合作研究的特征。有的学者对国企战略变革，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数据资产与科技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供应链管理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直播电商退换服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基于知识结构的顾客知识共享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知识产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围绕上级监督对企业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我国养老服务劳动力供给的宏观影响因素，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体验价值视角下红色旅游游客公民行为影响机制，中国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代表作有李杰的《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消费者认知与行为研究》、王凤飞的《中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研究》、石晓飞等的《河北上市公

司治理研究报告(2021)》、刘兵等的《上级监督对企业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研究》。

6. 公共管理研究

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领域的研究涉猎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国家治理、公共管理模式与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公共政策研究,行政领导与政府人才政策研究,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研究等方面。刘洁就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探讨。孙云霞等研究了我国城市治理体系的创新之路。周峰等构建了基于网络舆情信息综合研判的社会安全事件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董香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分析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话语变迁与制度逻辑。

(四) 教育与文化研究

1. 教育学研究

教育学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上年基本持平,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出版学术专著4部。段爱峰基于扎根理论与共词分析的视角,对新世纪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结构进行了分析。李姝雯等探讨了儿童书面言语的因果表达及逻辑思维特征。范明丽基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视角,探讨了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与制度设计。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较上年质量略有下滑,表现在发表在CSSCI期刊或出版的专著数量减少。王胜本等探讨了新时代高校服务育人的重要价值、优化图景、推进路向,又围绕新时代高校本科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李春林分析了一流学科生成与治理的宏观政策与微观机理。彭青分析了“新财经”教育建设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交叉重合现象。刘奉越等研究了UNESCO参与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治理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张栋科系统研究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与行动路径。教育史研究,在往年研究的基础上,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在中外教育的比较研究方面,王文利等对日本国立大学间多所大学同一法人的制度构想与实践进行了探索。荣艳红等对德国社团主义传统及其对职业教育立法影响进行了研究。教育技术在近几年持续的“新冠”疫情影响下,不但成为特殊情

况下教育活动的必备举措,也成为传统教育手段的重要补充,变得不可或缺。徐莉等从复杂系统科学的视角,对人工智能+教育融合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研究。

2. 课程与教学研究

成果较上年相比,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呈以下特征:一是许多成果都是在各级教学改革和科研基金项目支持下的专业建设成果,其中新工科课程建设和培养模式变革研究成果突出;二是高校课程思政化实践与研究全面开展,成果较多;三是受疫情影响,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方法和信息化变革研究凸显。此外,以创新创业、产教融合为目标的课程研究也得到学者的关注。如,刘维尚等以燕山大学为例,提出学校自觉担负起使命与责任,扎实开展产教融合教育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总体上,研究成果仍以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实践应用成果居多,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缺乏对学术前沿的深厚研究。

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较上年有较大进展,出版专著6部、CSSCI期刊论文12篇。研究呈现出由点及面、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金胜勇等探讨了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数据化趋势。王欣等对孟连生先生数字图书馆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思考。郭志安研究了宋代为防止出现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泄密加强保密制度建设的问题。图情档案事业建设研究仍是河北图情档学科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发展战略研究、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等方面。陈则谦等探讨了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现状、主要问题与优化建议。信息资源管理方面,学者主要围绕信息组织、信息传播和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展开研究。赵琨探讨了基于RDA的图书馆音像电子资源编目工作。张艳欣探讨了我国档案生态安全应急管理机制,陈兰杰对应急管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郭海玲、李颖分别就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服务、档案公共服务进行了研究。图情档技术应用研究,主要围绕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图情档相关系统的开发与利用展开。

4. 新闻传播学研究

在新闻传播实务研究方面,主要围绕如何顺

应业界生产的新现象、新特征和新趋进行了探讨。和曼等人分析了“四全媒体”背景下，网络新闻编辑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的意义、新指向及优化路径。治丹丹等人引入区块链技术架构，不仅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构建科技期刊开放发展机制与启示，还剖析了 Orvium 平台特色服务运营模式。孙会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出的近百个抗灾类公益广告为例，对其审美价值、建构方法和传播特性等内容进行了解读。彭翠等人分析了百集大型红色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的传播特色与时代价值。樊拥军等探讨了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集成服务运维取向与发展进路。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方面，杨秀国等人以《人民日报》2012—2020 年扶贫报道为例，分析了新闻框架视域下主流媒体对扶贫议题的建构与呈现。张巨才围绕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进行了探讨。张艳等人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有声阅读中的伦理失范成因及规制。苏妍娜等人围绕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网络群体集聚舆情传播治理进行了研究。艾岚等探讨了技术逻辑下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论中的“人本主义”建构问题。在新闻传播史研究方面，韩立新对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出版思想和河北新闻教育史的研究，以及张金凤、田建平关于晋察冀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极具河北特色。魏海岩等对宋代邸报定本模式演变的过程及原因方面的研究，颇引人注目。

5. 体育学研究

2021 年河北体育学研究，研究领域较往年增加了体育法学内容，其中对体育法律结构和足协改革管理应对办法的探讨达到了新的深度和高度。体育产业研究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为张家口、河北省带来发展契机，学者关注更多的是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冰雪产业发展等顺应奥运时代的话题。在体育人文方面，主要围绕传统体育中的武术、摔跤，以及关于体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农村体育及青少年体育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学校体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实施和体育训练的方法与技巧等方面。季彦霞对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快乐体操创新发展进行了探讨。

(五) 河北专题研究

1. 河北经济建设研究

学者围绕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高质量发展研究，学界从高质量发展动力和路径、经济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张旭等以石家庄市为例，就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析。关于产业和行业发展研究，学者围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对河北省产业和行业发展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颜廷标对河北省的区域角色定位方向、维度与实现机理进行了研究，王华彪等对京津冀高校协同培养人才的路径进行了分析。韩景旺等对河北省农村金融创新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李克桥等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区域财政治理现代化问题。关于科技与经济发展研究，学者多从提升科技研发能力、强化创新人才保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型企业发展等方面展开分析。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学者重点围绕河北自贸区建设和对外经贸合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赵培红等认为，河北省应利用各港口城市临海优势，构建港产城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成果共享的协调发展机制。

2. 河北政治建设研究

学者在以往领域继续深入探讨，成果数量相较上年明显增多，质量明显提高，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17 篇，出版专著 1 部。关于党的建设研究，学者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高校党建、弘扬塞罕坝精神等方面开展研究。河北法治建设研究紧扣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件大事展开，如于文轩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法制的实现路径》。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学者主要围绕营商环境建设、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放管服”改革、编制和机构改革、效能改革进行了探讨。于晴晴等就建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机制进行了研究。孙英臣、武义青围绕雄安新区建设进行了探讨。乡村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水资源、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乡贤作用发挥、乡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乡镇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等方面，如，高浚力的《在办实事中推动基层善治》、王建文的《创新治理解难题谋发展》等。

3. 河北文化建设研究

成果较上年小幅增长,同时继续面临向质优厚重、指导现实的方向转变的迫切需求。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热点问题得到持续关注。河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燕赵文化研究》杂志,进一步开阔了对燕赵文化的讨论。康振海以吴桥杂技薪火相传、革故鼎新的发展精神为例,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与时俱进,发挥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作用。张楠楠立足于跨文化传播视角和理论,对河北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探讨。郑恩兵分析了张家口红色文艺之城的歷史基础。傅金才等对明清时期石家庄文化进行了探讨。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既有基于当前整体形势、致力于破除关键障碍的成果,也涵容了对文化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等传统问题向深度、广度推进的研究。如,肖晔等基于事实数据,分析了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项琳总结了国家文化惠民工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成就、贡献与经验。刘洪彩、崔雨萌通过考察河北定州与邳城地区北朝伎乐天边饰背屏式佛教造像,认为佛教造像演变与历史文化演变存在紧密联系。苏艳英进行了燕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研究。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新兴科技与文化保护的“跨界联姻”也成为学者探究文化保护的新渠道。

4. 河北社会建设研究

成果数量较往年略高,质量有所提升,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4 篇,公开出版著作 5 部。社会现实问题,民生领域研究热度不减,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人口与人才领域研究有所增加。研究广度有所扩展,主要涉及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城乡发展、人口与人才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代表作品有:张岭泉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田翠琴等的《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以河北省为例》、陈亮等的《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研究》。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偏重于实证调查研究,对于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仍不多,创新研究视角和创新观点不多,在研究方法创新上仍存在短板。

5.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2021 年,学界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引,紧紧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聚焦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等重点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广度不断拓展,研究质量有较大提升。学者主要从生态建设、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生态安全等多维度对生态环境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两个方面。关于绿色低碳发展,学界基于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两个视角,从绿色动能培育、稳妥有序推进“双碳”以及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安全格局协同构建、生态系统协同建设、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生态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代表作有张云等著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康振海的《弘扬塞罕坝精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王平乐的《建立和完善河北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李利军等的《排污权制度探索与实践:以河北省为例》、李国柱的《京津冀能源—经济—环境—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三、河北社会科学活动与管理

(一) 社会科学研究交流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 年省内各单位组织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活跃度有所下降,但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组织召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调研活动、研讨会议及对外学术交流活 动近 300 场(次)。

1. 社会科学调研活动

河北学界、政界年度有规模组织的大型调研活动有所减少,调研的方式有所转变。在学界,团省委、省社科院、省青联、省学联联合组织开展的 2021 年河北省大学生“调研河北”社会调查活动,省内高校大学生组成近百支调查团队,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乡村振兴行动”等内容开展社会调查,完成调研报告近百篇。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开展了并陘于家村历史文化调研活动,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助力旅游发展规划。在政界,省人大各专业委员会结合各自职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调研,其中财经委的“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全面促进消费”

专题调研，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的民族宗教工作综合调研规模较大。省发改委制定了2021年重点课题调研工作方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问题开展了深入调研。

2. 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

主要有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专业委员会、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背景下逻辑教育和研究——2021年全国形式逻辑学术研讨会”；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主持传播论坛（2021）”；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2021年学术年会”；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2021年年会暨‘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研讨会”；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河北省会计学会与会计学术联盟联合举办的“会计学术联盟第十八期 Seminar 暨‘新财经’背景下首届燕赵会计论坛”；河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人的发展研究会2021年年会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承办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暨第十四届会计学院院长（主任）论坛”；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行政思想史体系与方法”高峰论坛；燕山大学承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2021学术年会”；河北工程大学承办的“第二十六届中国民居建筑学术年会暨民居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主办的“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暨党建工作学术论坛”等。

3. 跨区域学术研讨会议

主要有河北经贸大学与民建石家庄市委、民建北京海淀区委共同主办的“2021（第五届）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省金融学会主办，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河北经贸大学金融与企业创新研究中心、京津冀县域金融研究中心承办，京津冀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协办的第五届“京津冀经济与金融创新发展论坛”；省法学会主办，河北大学法

学院承办的“第五届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区域法治创新论坛”；河北金融学院、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证券期货业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雄安新区投融资发展论坛”；河北金融学院主办，河北省高校智慧金融应用技术研发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承办的“第六届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论坛”；河北金融学院主办的“第六届京津冀无形资产与科技创新智库联盟高峰论坛”。比较有特色的有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主办，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商学院、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省社科院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2021年秋季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高峰论坛”；省社科院与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高峰论坛”；河北经贸大学举办的“合作社发展与乡村振兴——正定论坛”；省社科院举办的“河北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河北建设学术研讨会”；省社科院、河北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暨《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学术研讨会”；省社科院与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使命学术研讨会”；河北师范大学举办的“俄语国家国别区域研究高端论坛”“第四届‘国际视域下的张家口’学术研讨会”“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等。

4. 全省性学术研讨会议

主要有省社科院、省社科联主办的2021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创新论坛，分两个主题“‘十四五’开新局、育新机的新思路与新举措”和“把握学术前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召开，同年举办了第十六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别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新时代‘赶考’精神的熔铸与弘扬”“新时代河北财政改革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题召开；河北学刊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与学术期刊的责任和使命暨《河北学刊》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等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理论研讨会；河北省立法研究会主办的“河北省地方立法专题研讨会”等。

5.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2021年，克服新冠疫情影响，省内各学术机构多采取线上交流的方式，开展了数十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主要有燕山大学举办的第九届公共政策智库论坛暨乡村振兴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2021年第四届河北省设计学智库及研究生教育国际论坛，第25届东亚日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学会年会；河北大学承办的第十届中拉学术高层论坛暨“面向未来的新发展议程与中拉合作”研讨会，河北省与荷兰王国南荷兰省气候适应网络研讨会，第九届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省社科院同日本岩手县立大学举办了中日“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服务体系研究”线上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举办的维和（警察）国际研讨会等。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应邀参加俄罗斯总统府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召开的“哈巴罗夫斯克进程：历史教训和当代挑战”国际学术会议；河北师范大学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举行线上视频会，与巴西圣玛丽亚联邦大学合作课程举行结课仪式，与西班牙穆尔西亚圣安东尼奥天主教大学举行线上视频会议；河北大学与马来西亚吉隆坡建设大学召开线上合作视频对接会，与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孔子学院召开了2021年视频理事会，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召开联合办学视频对接会；河北经贸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康考迪亚大学在线上召开战略会议，与意大利乌迪内美术学院举行线上视频会议；燕山大学与非洲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正式建立校际合作关系，与非洲博茨瓦纳国际科技大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托列多大学召开视频工作会，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召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第四届年会；省社科院邀请美国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前校长迈克·沃泰尔作线上报告等。

6. 社科研究交流的特点综述

综合看，虽然受到了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社会科学研究交流活动热度并没有明显衰减，这得益于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许多活动转变为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依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有一些学界广泛关注的会议，

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同步开展，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有所提升。线下社会科学调研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因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从活动的规模和层次看，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主要由省内重点高校的优势学科举办或承办，这充分体现了河北学科建设的特色和优势，但也可以看到优势学科的数量以及影响力有限，需要更开放的姿态来建设。跨区域的学术研讨会议活动热点依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研讨内容为区域经济、金融、河北特色历史文化等。全省性的学术研讨会议，主要由省社科院、省社科联和省级学会牵头主办，特别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拓宽了学术研讨的内容，增加了会议频次，活跃了省内学术氛围，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维持了常年的频度，省内重点高校的国际合作交流部门克服新冠疫情影响，结合国家战略与国际学者围绕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学术交流，搭建合作框架，在构建中国学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二）社会科学普及传播

1.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是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组织的全省性、综合性、大规模的年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2021年，该活动继续以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方式举办，以“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为主题，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重四创五优化”“宪法和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宣传”五大专题展开，省、各市社科联和社会科学组织共安排277项活动，其中，组织党史进校园专题活动49项。300多个单位的5000余名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参加活动，辐射受众超过50万人。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司法厅、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2021年全省“宪法宣传周”工作方案》，在全省开展了影响广泛而深入的宪法宣传活动。其他社科工作机构、学术团体也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主要有：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录制“西柏坡精神”系列微课在人民网、长城网、河青教育、四川红星视频录

制播出，其中安巧珍教授主讲的微课在人民网云讲堂播出，并被人民网主页头条推送；河北师范大学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文艺作品“红色血脉永志不忘”在中国IPTV（河北）专题上线展播，包括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西柏坡》、话剧《一次与郭隆真的精神对话》、师大版《岁月征程》MV、《清澈的爱只为中国》MV，歌剧《真理之歌》等。河北大学积极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普法宣传，组织开展了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举办了以“生命至上 终结艾滋 健康平等”为主题的系列宣教活动；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刘宗超教授《一日一书》15讲系列专题节目在书画频道播出。省社科院、省委讲师团“红色社区大讲堂”省、市、区联合宣讲活动在石家庄市国际城社区、槐东社区等举办了专题宣讲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红色旅游协会开展“百年辉煌 红动河北”百集红色故事展播活动。燕山大学“文化自信中国人”出版大讲堂邀著名专家向中外师生讲述长城文化等。

2. 社会科学普及机制建设

《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定》出台后，省社科联作为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职能部门，在推动科普机制建设上做了不少工作。一是扩大联动规模，使社科普及集中示范行动模式更趋完善。全省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活动内容，拓展了时限，增强了社科宣传普及的连续性、持续性。二是进一步强化普及主体责任，把社科普及月重点活动内容在长城网等省内媒体刊发，明确主办方责任义务，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吸引广大群众参与，扩大社会影响。三是完善基层普及平台，通过项目资助、平台联动等方式，充分调动各社会团体、普及基地和基层平台作用，使社科普及活动有效拓展与延伸。四是充分发挥高校和中小学校作用。面向广大师生和群众，组织开展“党史进校园”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省社科联持续加强社科普及基地的建设与管理，2021年启动第二、三批普及基地复评和第四批基地申报评审工作，取消了部分基地资格，新增了石家庄中山国王陵陈列馆、承德博物馆、沧州市博物馆、邢台董振堂纪念馆、邢台吕

玉兰纪念馆5家河北省社科普及基地，并推动所属科普基地开展了大量特色活动。同时，许多职能部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社科普及机制。省司法厅发布了年度《河北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牵头开展全年的普法工作，在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以案释法”制度、加强媒体公益普法、全面启动“八五”普法、加强普法工作队伍建设、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理论研究等方面形成一整套机制做法，形成了良好的普法效果和社会氛围。河北省银行业积极开展了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各高校、省属社科类社会组织也有各具特色的社科普及活动品牌。同时，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许多以商业利润为目的，适合商业市场的社科普及机制正在形成，社科普及自媒体大量涌现，传播社科知识的范围和内容都极为广泛。

3. 社会科学普及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社科普及人才队伍建设是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关键，具有非常紧迫的时代意义。社科普及规定将社科普及事业定性为公益事业，为专兼职相结合的社科普及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立法支撑，也直接促进了社科普及志愿服务事业的有序发展。省社科联推动建设了省社科普及人才库，对全省社科普及人才做了系统的梳理，各市社科联也建立了市社科普及人才库，形成了有总体规划、有制度安排的建设体系。在实际工作中，社科普及主要由社科理论工作者或某一领域专业人才兼职从事。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有一大批新媒体从业人员开始专门从事社科普及工作，但是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存在社科理论素养欠缺、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科普作品质量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为满足社科普及事业发展和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的需要，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需要从社科普及人才选拔培养、社科普及队伍组织管理、社科普及人才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查找不足，逐渐建立起健全科学规范的社科普及人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4. 社会科学普及的新形势

进入新时代，社科普及面临的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而新媒体的崛起，自媒体的飞速发展成为社科普及面临的最显著的变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至2020年一季度末，全国互联网新闻资讯媒体用户规模达

7.3 亿人,手机互联网新闻资讯媒体用户规模达 7.26 亿,使用率达到了 81%,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和比例。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给新时代的社科普及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首先,传统社科普及方式难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一是由于社科普及对象广泛,他们的阅历、文化水平、知识需求差异较大,讲座、科普读物等只能针对特定群众,难以扩大社科普及的覆盖面;二是传统社科普及活动通常选择固定时间、特定地点开展,受时空限制较大,也影响了社科普及的覆盖面;三是许多社会科学理论枯燥高深,传统社科普及方式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难以将高深的理论通俗化,不容易为群众接受;四是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如果缺少权威的社科普及信息的引领,那么伪科学、谣言、消极文化等网络不良信息就会更加泛滥。其次,新媒体的应用和自媒体的发展打破了社科传播主体的单一性。人人都可借助社会化媒体自主发声,一些随性的表达影响了社科普及的科学性、权威性、严谨性,传统媒体的“信息把关人”角色在网络中弱化。一些网络意见领袖粉丝众多,其观点却与主流价值观不相吻合,他们发表的见解容易误导粉丝,对粉丝的舆情态度甚至社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从客观上冲击主流的声音,消解传统管理者、专家、学者等权威的影响力。公众容易通过社会化媒体接触到大量不良信息、有害软件和非科学、伪科学内容。最后,新媒体的应用为社科普及带来了更大的机遇。一是新媒体的技术为社科普及及资源的共建共享搭建了技术平台,我们可以更便捷地提供丰富的社会科学资源,提高社科普及效果,降低社科普及的社会成本,扩大社科普及及覆盖面。二是社科普及活动要保持其吸引力,不仅要在内容上与时俱进,还要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可以充分运用微信、微博,开展微宣讲、微咨询、微展览、微动漫、微电影等活动,将社科内容轻松化,占领网上舆论阵地。三是社科普及及职能部门需要主动拥抱新媒体,紧跟时代潮流,把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社科普及作品,推广到互联网上,与自媒体形成竞争态势,才能有效提升社科普及的效果。

(三) 社会科学管理

1. 社会科学科研管理

2021 年,省内高校、社科院、党校(行政

学院)等系统继续推进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以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更大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 号文),河北省财政厅也研究制定了《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的若干措施》。省内各社科研究机构也纷纷出台或修订了有关科研管理办法。总体看,有几点特点:提高间接费用比例,间接费用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使用,提升了科研经费使用的灵活度,更加符合科研规律;重视了科研中人才智力的因素,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最高可达到 70%左右;对科研预算编制进行了简化,大大减少了科研人员做预算报账的负担。其目的是赋予了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和项目调整权,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充分释放创新创业活力。随着更多资源、资金投入科研领域,如何提升科研绩效水平日益受到各界重视。除了完善经费管理措施外,省内高校、各科研机构也通过召开科研管理研讨会、组织科研管理干部培训等方式对改进科研管理服务进行了探索。省社科院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持续在科研管理方式上大胆改革,完善绩效管理,给予科研团队更大自主权,提升了科研活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2. 社会科学项目和成果管理

科研项目(课题)是一种重要的科研组织形式。目前,对科研项目的管理主要从纵向上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厅级及院校项目。国家、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在社科领域起着引领方向、培养人才、推动创新的重要作用。2021 年,财政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河北修订了《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体现了最新的政策要求和改革方向。此外,《河北省省级软科学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也于近年来进行了修订完善。

成果管理主要包含已产出科研成果的认定、评价、奖励和应用转化等方面。河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作为唯一的省级奖励，在历届评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成果评审的标准、方法，按照成果形式分类设计评审指标，既包含成果的选题价值、创新程度、完备程度、研究难度等内容指标，又包含成果发表应用转化层次、社会反响等客观指标；坚持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初评采用打分定量评价，会评侧重集中评议定性评价，进一步提高评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要发挥社会科学成果的学术、社会价值，必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河北社会科学机构与党政决策部门在科研成果的连接渠道上，主要有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河北智库报告》，省社科院的《智库成果专报》，燕山大学在2020年开通了《燕大智库成果专报》，省委、省政府、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等党政研究机构的《调研内参》《专报》等直报件，采用批示率较高，是社会科学成果应用转化的重要渠道。各设区市社科联、市委、市政府研究室，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与特点，通过《决策参阅》《社科成果专报》等将社科成果上报各市委、市政府参阅，也是社科成果应用转化的重要途径。

3. 社会科学人才管理

2021年，河北继续加强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为社会科学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一是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加强对社科专家学者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如，省社科联实行主席联系服务社科专家制度，加强与专家学者的联系。二是围绕学科建设培养人才。教育部为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河北省教育厅也跟进印发了《河北省教育厅关于申报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在全省启动新文科建设项目。省内各高校以项目为抓手，聚焦人才培养，在充分研讨和制定改革办法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机制。三是改进人才评价。职称评审经过一轮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分类评价标准，凸显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促进了职称评审与人才培养

使用紧密结合，评价科学、机制完善、放管适度、责任明确、服务便捷的职称评聘制度逐步建立，但评审社会化机制不健全、职称评审指标体系依然不够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四是在人才体系建设上，国家层面主要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等，省级层面2020年河北对省级人才计划进行了优化整合，主要有省管优秀专家、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专门针对青年人才培养的有省社科联组织的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省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评选等。2021年石家庄市印发《关于高质量建设人才强市的实施意见》，通过升级人才绿卡、加强金融支持和住房、项目落地支持等一系列措施，吸引人才。相较南方发达省份、京津地区，河北的人才政策、待遇仍有很大差距，对吸引、留住和培养人才有很大影响。

四、开启河北社会科学发展新征程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关键之年。河北社会科学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河北特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扎实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积极推进社科人才队伍建设、汇集壮大社科力量，继续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应有的智力贡献。

（一）2021年河北社会发展成绩与亮点

社会越发展，文明越进步，对于理论的需求就越迫切。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新征程。在此背景下，河北社会科学面临社会科学内在学术规律与外部研究热点相结合的新机遇，取得了显著成绩。

1.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021

年,河北社科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是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平台建设。全省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体系。2021年获得国家级、省级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150余项,举办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30余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交流。二是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究》《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等40多部专著,发表《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及其超越》《略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基本经验》《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百余篇核心期刊论文与理论文章,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宣传阐释不断深化。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河北改革开放史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河北汇集全省社科力量,深入进行经验总结、理性思考和学理梳理,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推动河北改革发展的强大引擎。四是积极开展建党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等专题研究。全省社科工作者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多角度,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成果、历史经验,撰写理论文章,组织理论研讨会、座谈会等学术活动,并积极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选派专家到各地开展党史专题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

2. 服务科学决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是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元化智库研究网络。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省社科院(“河北中心智库”)、党政部门、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的多层次、多元化新型智库体系,为充分发挥河北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

务等功能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决策能力得到提升。社科研究机构主动把握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需求,把国家重大战略在河北落地见效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作为科研工作的出发点。省社科工作办、省社科联不断完善省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发展研究课题等重大课题选题机制,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筹办北京冬奥会等重大项目实施深度研究,努力实现课题立项与服务全局的精准有效对接。

三是推出一批智库成果,咨政建言成效突出。社科研究机构推出的《河北智库报告》《智库成果专报》《调研内参》《专报》等稿件质量和选题、编辑水平不断提升,咨政建言更具有现实导向性和可操作性。2021年,通过相关内刊上报了《关于构建雄安创新体系引领支撑雄安质量的建议》《加快推进我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省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面临的不足及政策建议》《完善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途径》等300余期智库成果,200余期得到省领导肯定批示并转相关职能部门采纳。

四是社科专家直接参与重大决策咨询、论证。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等诸多规划纲要密集出台之年,全省社科专家积极参加相关规划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省社科院、河北经贸大学等单位十多名社科专家加入省“十四五”规划起草专家组,参与规划起草工作,充分发挥了理论指导与参谋作用。一批社科专家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活跃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脱贫攻坚等重大决策研究一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3. 挖掘河北文化、传播河北声音能力日益增强

一是开展河北历史文化研究。持续加强对泥河湾考古文化、中华远祖文化、燕赵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太行山文化等河北历史文化的基础理论、基本问题研究,不断增强学术创新力和学理支撑。2021年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史学月刊》等发表论文《雄安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述略》《赵国考古学文化北进的轨迹》等,出版《燕赵学术思想史》《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保定通史》《燕赵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机制研究》等学术著作，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力。

二是开展红色文化研究。围绕挖掘红色文化精髓，开展河北红色文化经典整理挖掘，深入开展李大钊、敌后抗战根据地、西柏坡精神等系列研究。发表论文《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西柏坡时期中共以“两个务必”思想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考察》《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基层公安队伍建设论析》《中国共产党领导道德建设途径的基本经验》《做好新时代赶考路上的答卷人》等，对传承红色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开展河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研究。围绕提炼河北文化符号、打造具有河北标识的学术精品，推出了《燕赵文化的编年史叙事——河北博物院》《冀中村落里的燕赵遗韵：耿村民间故事传承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大河之北是我故乡》等一批重要成果。

4. 河北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日益完善

学术体系是社会科学中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学术人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社会影响、学术风气的集合，是社会科学界学术能力、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河北通过加强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全省社科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是加强国家级项目申报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具有导向性、权威性、示范性，历来为国内社科界高度重视。全省社科战线不断加强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孵化培育，2021年获得立项127项（含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立项数量创新高，体现了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进展。

二是持续深化学术研究组织体系改革。2021年，全省社科机构继续优化科研项目管理，探索建立以重大课题为纽带的虚拟研究中心，吸纳省内外重大高端人才，开展集群式研究，形成互补、合成、高效的研究态势。继续优化科研组织管理手段，充分运用不同层次的课题立项、评审，专家评选、成果评奖等资源，落实科研全过程动态管理，努力实现科研效益的最大化。继续抓好管理制度创新，制定和完善科研课题管理、成果管理、成果奖励等制度，形成公平、规范、

富于效能的管理运行机制。

三是持续加强学风建设。全省社科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始终把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科研工作的首位，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进一步弘扬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学风，推动学术自律与监督管理有效结合，形成推进科研诚信建设的强大合力。

5. 研究手段与方法呈现融合创新趋势

研究方法是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包括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当代社科研究领域不断交叉融合，已逐渐抛弃了以往“单兵作战”的模式，在我省重大前沿问题研究中，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日益丰富。社科研究在摆事实、讲道理做好定性研究的同时，开始注重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采用系统分析法、模型分析法等创新性研究方法。2021年涌现出了《基于终点损害型 LCIA 方法的环境成本评价研究》《文化多样一体的法哲学》《中国人口回旋空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和作用》《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分析》《工业环境下的人机交互状态数据仿真研究》等一批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相关成果注重做好基础数据的长期采集与整理，为推进基础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河北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1. 河北社会科学发展新形势

2022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河北社会科学带来新的形势和任务。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因素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

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还存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因此，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党和政府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历史赋予社科工作者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从河北看，当前河北发展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依然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河北实现跨越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河北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科学深入分析当前形势，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十个方面的任务举措，这必将激励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河北社科工作者也将围绕全省中心工作，进一步加强思想理论引导，继续深化河北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问题研究，为改革发展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2. 河北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河北社会科学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在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仍需努力。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有学术缺思想、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有“高原”缺“高峰”等情况仍然存在，在全国层面具有原创性、思想穿透力的标志性成果不多，在全国学术界影响力有待提升。在河北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中，河北标识性概念提炼不足，引导国际学术界研究、讨论的能力水平不高，依然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二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有待加强。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尽管党中央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仍然存在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或口头上重视、行动上落实不够等问题。

三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建设一流的社会科学，关键在于拥有一批优秀的社科人才。目前，“40后”“50后”一批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老一辈学者相继退出研究岗位，而具有影响力的中青年社科人才成长较慢，社科学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普遍存在不足。特别是近年一些省市“抢人大战”的人才优惠政策出台，社科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尽管各科研单位在如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上面想了不少办法，采取了不少举措，但受制于各种客观原因，高层次社科人才队伍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是社科研究经费投入不足。虽然全省科技经费投入（R&D）逐年有所增长，但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投入仍不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社科研究经费在全省科技经费投入（R&D）统计中未单独统计，据大体估算全年直接经费投入不足20亿元，占全省研发（R&D）经费投入不到3%。社科研究项目、奖励等经费与自然科学相比差距较大，例如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4万元至100万元，而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1万元至5万元，省科学技术奖奖金10万元至30万元，而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奖金4000元至2万元。

（三）奋力开创河北社会科学发展新局面

当前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正处在千载难逢的伟大社会变革之中，迫切需要廓清迷雾、明确方向、武装头脑、推动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以及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现实需求，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话语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立潮头、不辱使命，拿出具有中国特色、河北风格的精品力作。

1. 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视和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是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得以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一是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地位

和重要作用的认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等举措,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营造尊重学术、尊重人才、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强服务管理。各级社科管理部门要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把关定向,完善学科发展规划,谋划学科未来发展思路、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科学确定学科方向,选拔好学科带头人,组建好学科梯队。加强各级社科联建设,充分发挥社科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对学会、研究会等社科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完善政府重大决策咨询制度。建立健全政府对智力成果的发布、使用机制,吸收更多社科专家参加重大决策的咨询论证,为专家建言献策提供便捷渠道,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创造条件。

2. 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一是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提高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水平。重点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丰富内容、精神实质和独创性贡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经验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赶考”命题等专题。二是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宣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章党规和国家宪法法律等的宣传宣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坚定“四个自信”。

3. 加强河北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选好题、破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

理论创新”。全省社科学者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重点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国家战略,开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重大问题研究,开展区域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前沿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开展先进制造业和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研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在河北落地。二是深入开展河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系列研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贯彻落实,紧跟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长期发展形势,开展省域宏观政策与公共政策相关问题研究、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河北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河北创新驱动发展问题研究、河北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保障问题研究、河北地方法治研究等系列研究,组织协同攻关,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4.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的

一是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加强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和协调作用,实施好“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加强省社科联联系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高校、党校、社科院等科研单位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不断消除制约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进一步完善社科研究组织形式。以学科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互动,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结合,建设性、务实性研究为主的科研格局。构建注重精品成果的研究态势,聚焦学科理论前沿、地域特色,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建立基础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分析研判机制和协同攻关机制,组织跨团队跨学科开展前沿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研究。三是进一步完善科研绩效评价机制。切实破除“四唯”不良导向,以实际贡献和质量水平为主导,注重实践检验,激励科研人员提升科研水

平,多出学术精品。畅通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渠道,完善地方政府决策咨询服务购买机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政府决策部门的沟通反馈机制。

5. 大幅增加哲学社会科学经费投入

一是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经费持续增长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财政有效支持,确保财政预算稳定增长,加大在省级特色学科、课题评审、成果评奖、人才评优中的经费投入力度。在全省科技研发经费统计中单列社科研究经费统计项目,适当平衡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投入比例。加强统筹协调,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继续深化社科研究经费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关于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实施意见》等改革精神,充分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使社科研究人员知识创新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激发广大社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深入推进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简化科研经费报销流程,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三是不断完善多渠道投入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科研究,建立社科成果多渠道转化机制。

6. 大力加强高层次社科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贯彻落实河北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展规划,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学术精湛、学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认真落实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制度,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探索建立我省智库“旋转门”制度,实现高层次

社科研究人员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有序流动。二是用好用足中央及我省各项人才引进、培养、资助政策,加强学科带头人、中青年拔尖人才、学术领军人才培养力度,在出国访学、挂职锻炼、科研项目等方面给予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重点支持。完善高层次“专家库”,通过顾问指导、兼职引进、退休特聘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层次、多方位、高水平的“专家库”。坚持引智借脑,健全柔性引才模式,设立“人才飞地”。三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充分发挥高端人才传帮带作用,推动人才、项目、平台有效整合,大力提升吸纳集聚能力,汇聚更多高层次人才。整合专家人才力量,以项目为载体,通过与省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带动人才队伍快速发展。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河北社会科学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全省社科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畏艰辛、不辱使命,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绚丽篇章。

说明:本报告是课题组完成的第十二篇年度《河北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报告》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省社科联第一副主席康振海,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彭建强的支持和指导下,由陈秀平统筹组织编写。第一部分由刘丽莎执笔,第二部分由金红勤执笔,第三部分由李向晖执笔,第四部分由汪洋执笔,马瑞清负责统稿、编校和联系服务。文稿经课题组多次集体讨论,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审改定稿。

年度学科综述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郭强

一、2021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较往年略有下降,但成果水平有所上升,专著数量和CSSCI期刊论文的数量均有增加,且研究领域较往年更为广泛,既有从具体领域诸如经济哲学、劳动哲学、国家与法理论、自然观、正义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探究与理论内涵的深度分析,又有紧贴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时代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一,深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2021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主题,如经济哲学、劳动哲学、国家理论、空间哲学、自然观、正义理论、社会理论等,均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学者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耕,展开深度的文本解读,从新的视角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的内涵。比如,宫敬才教授通过

《论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的思想资源问题》《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文章,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及其思想资源。黄云明教授通过《论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律起源论》《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下的道德起源论》一系列关于劳动哲学的文章,主要从道德与法治的视角阐明作为马克思原生态哲学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从全国来看,黄教授的这一研究,走在了劳动哲学领域的研究前沿。

第二,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对时代之问做出了理论回应。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科学地解答时代的问卷,以指出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对“时代之问”的解答中诞生的。从2021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多是在回答基于“两个大局”的“新时代之问”中研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哲学理论、国家理论、正义理论、社会理论、自然观等,以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进行理论概括,并进行学理支撑。比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建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窦星

辰、黄云明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问题，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核心话语体系。

二、马克思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广泛兴起于东西方的哲学界，并在我国理论界引起高度的重视。马克思堪称是经济哲学研究的典范，当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继承马克思所开创的优良传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系统地研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的思想资源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巴黎手稿》的理论缺陷及其弥补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展开了探讨。

从理论架构看，宫敬才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1]认为，我国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已有20多年的历史，成就斐然但瓶颈性问题凸显。在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意义上，什么是马克思经济哲学？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何谓？提出和回答上述问题是推动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发展的有效举措。马克思经济哲学是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哲学的一种，以多种表现形式存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生变量。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如果研究角度不同，那么呈现出来的内容就有别。多角度有机统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整体性内容就会显现出来。这样的角度有五个：自成体系、元哲学、微观、话题和历史。得到如上内容有赖于特定方法即“回到原生态”，具体要求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时，要顾及社会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宏观与微观语境、政治诉求和当下理论需要等五个方面的情况。

从文本研究看，宫敬才探讨了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的思想资源问题。^[2]认为，马克思《巴黎手稿》自1932年正式发表到现在始终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核心是如何理解其中的人道主义和异化劳动理论，研究者以为这就是《巴黎手稿》的主题思想。这是纯哲学语境理解的结果，不符合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实际。《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有机统一的经

济哲学语境，主题思想是质疑和批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这种主题思想的铸就与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时依凭的思想资源有直接关系，较有代表性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巴黎手稿》研究的历史明证可鉴，研究者们或是忽略部分思想资源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作用，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或是对部分思想资源的影响作用做出扭曲性判断，如对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判断。两种做法的共同作用使然，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语境和主题思想皆被误解。关注和研究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时依凭的思想资源问题，发现和揭示出二者之间细微且复杂的内在联系，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进入马克思当时的心智世界，进而准确全面地理解《巴黎手稿》的经济哲学语境和主题思想。

此外，宫敬才还与安立伟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巴黎手稿》的理论缺陷及其弥补问题。^[3]认为，纯哲学语境的理解方式使近百年来来的研究者多认为《巴黎手稿》的主题思想是人道主义及异化劳动理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研究者在对《巴黎手稿》的评价中形成了成熟论和不成熟论两种代表性观点，皆与《巴黎手稿》原生态思想不一致。《巴黎手稿》原生态语境是经济哲学，“经济”内容无法绕开，主题思想是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巴黎手稿》中存在诸多理论缺陷，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的问题：费尔巴哈哲学的改造问题、人化自然辩证法问题、私有财产资本化的内在机制问题、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异化劳动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论证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问题。理论缺陷的存在促使马克思继续在思想上进行探索，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文献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也是弥补《巴黎手稿》理论缺陷的标志性文献。

三、马克思的劳动哲学

劳动现象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永恒话题。始自《圣经》的无名作者和亚里士多德，中经洛克和黑格尔，到当代社会生活的言说者，人们从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出发，从不同的层面和角

度探讨劳动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只能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语来形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占有他人所无法替代的地位。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律起源和道德起源、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价值论和社会道德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从劳动哲学与法哲学的关系看,黄云明探讨了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4]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有一个伴随其整体哲学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1835—1844年的前劳动哲学时期,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批判黑格尔的过程。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法学批判封建法学和法律制度,进而认识到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法学不能真正解释社会法律问题,初步认识到社会物质利益是法律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1845—1847年,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找到了破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的金钥匙,认识到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建构了由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和劳动历史观构成的劳动哲学体系,开始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去把握法律问题。1848—1870年,马克思运用劳动哲学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1871—1883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进行了科学预测,晚年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用劳动哲学阐释了法律起源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等重要的法哲学问题。同时,他探讨了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律起源问题。^[5]认为,国内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法律起源论的质疑和诘难,主要原因在于对西方法学理论的盲目追随,而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和价值立场的理解不足。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所以也是认识法律起源问题的理论基点。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对法律的需要,创造了协调原始关系的风俗习惯、原始禁忌和行为规范,奠定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劳动分工特别是脑力劳动的分工是法律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物

质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是法律制度和系统化文化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之前的法律起源理论不能从物质生产劳动出发认识社会问题,不理解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所以既不能准确描述法律形成的客观过程、说明法律形成的主客观条件,也不能准确说明法律的正当性。此外,黄云明还探讨了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发展观。^[6]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认为法律是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律不是像资产阶级法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理性的反映,是恒定不变的社会法则,法律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变化与法律自身内在逻辑相互作用决定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的特点是由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劳动方式决定的。法律发展演化的具体轨迹是法律自身内在逻辑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合力作用的结果。黄云明探讨了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价值论。^[7]认为,马克思以劳动哲学为基础的法哲学主张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把握法律事实与法律价值的辩证关系,法律价值既要适应法律事实,同时又要超越法律事实,引导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改造。马克思既反对资产阶级自然法学和理性法学的法律价值绝对主义,也反对实证主义分析法学的法律价值相对主义。马克思认为对正义、自由、平等等主要的法律价值观念的理解都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它们都是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物质生产劳动发展不断变化。法律价值观念的具体价值取向取决于物质生产劳动发展的水平。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念是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本质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捍卫资本的利益所得。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观念是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其本质是维护与劳动创造等比例的利益所得。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那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从劳动哲学与道德论的关系看,黄云明探讨了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下的道德起源论。^[8]认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通过对人类早期社会和古代社会劳动发展史的分析,揭示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物质生产劳动分工、剩余劳动产品产生、物质财富私有观念出现以及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形成在社会道德现象产生过

程中的作用,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道德起源的社会原因,在道德起源论上超越了以往哲学家对道德起源的认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从伦理学学术的视角阐发道德起源问题,这导致我国伦理学研究中关于马克思道德起源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争论各方都阐发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和社会分工在道德起源中作用的思想,但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带来的剩余劳动产品的产生、私有观念的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以及私有制的形成在道德起源中的根本作用等思想,忽视了马克思对道德起源根本社会原因的揭示。而实际上,私有观念为道德起源准备了精神基础,私有财产为道德起源提供了物质基础,私有制为道德起源提供了制度基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为道德起源提供了职业的伦理学家和道德建设者。同时,黄云明还与吴桐探讨了马克思劳动哲学中的社会道德关系理论。^[9]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将自然和社会都纳入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去把握,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社会道德关系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结成的可以进行善恶评价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社会道德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社会的道德关系中,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组织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物质生产劳动进步带来的劳动解放和劳动自由是社会道德关系矛盾解决的根本力量,伴随劳动解放和劳动自由的发展,社会道德关系中各种矛盾的统一性将取代对抗性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

在文本研究领域,胡士杰论析了《资本论》手稿中关于“春蚕吐丝”的比喻。^[10]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春蚕吐丝”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较喻”形式的比喻;比喻的喻体源自歌德的戏剧《托尔夸托·塔索》,直接借自西斯蒙第的比喻用法;比喻的“喻解”主要体现为非功利性和能动性两个方面;设喻的目的,一是为了揭示弥尔顿的创作不是“生产劳动”而是“非生产劳动”,二是为了揭露那些故意混淆两种劳动的本质区别以掩盖剥削真相的庸俗经济学家。这个比喻为理解“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本质区别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赋予了“春蚕吐丝”新的

内涵。

四、马克思的国家与法的理论

国家与法的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黄云明通过专著系统研究了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11]该书采用“回归原生态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打破了以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拘泥于受苏联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传统,在将马克思哲学阐发为由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和劳动人道主义价值观构成的劳动哲学体系的前提下,对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既还原了马克思的法律本体论、法学方法论和法律价值论等法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同时又系统阐发了马克思的法律正当性思想、法律正义观、法律平等观和法律自由观等法律伦理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

该书从哲学高度,特别是劳动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系统探索。作者注意到,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界,特别是伦理学界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的道德哲学、经济伦理、政治伦理乃至环境伦理,但对马克思的法律伦理关注不够,对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的研究尚显薄弱且系统研究的专著更是寥若晨星。与此同时,在中国法学领域研究中,学界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实证性、客观性和工具性,而普遍缺乏对法的本体性和价值性的关注。由此,作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的视角,从马克思“法的本体论思想”“法学方法论”“法律价值论”“法律正当性”以及“法律正义观”等方面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作出了新的诠释,并提出应从劳动哲学出发认识马克思的法律伦理。作者认为,一方面,以往学界将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概念,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这直接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对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的理解,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对其法律哲学和法律伦理思想理解的偏差。为此,作者主张将劳动本体论贯彻到马克思的法律哲学研究中,强调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法的现

象。体现在法学研究中，应坚持在法律与社会生活的互动中把握法律，特别是在法律和社会物质生活的对立统一中把握法律。可以说，作者选取的劳动哲学视阈将马克思思想作为一个全面系统的逻辑体系，不仅在研究内容上是以往学者不曾全面关注的，而且这一独特的视角在伦理学研究领域也具有开拓意义，也可以引领人们回归原生态的马克思法律哲学。

该书将马克思劳动哲学的方法论运用到阐释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的研究中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者认为，方法论是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本真思想的灵魂。在该书中，作者对以往关于马克思法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考察，并指出以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忽略了物质本体论不能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的结论。而且受这种结论的影响，马克思法学思想的研究者对马克思法学方法论的理解也产生了诸多偏差。在作者看来，以上两种解释范式的出现源于对马克思哲学最根本的方法——辩证法，尤其是劳动辩证法的忽视，从而严重影响了对马克思思想本意的阐发。在该书中，作者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以马克思劳动辩证法思想理解其法律哲学思想，旨在从社会实践出发、从劳动出发，即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社会法律现象，强调法律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才是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法律哲学的真正进路。对此，作者提出，对马克思法律伦理的研究：一方面，必须遵循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对立统一，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统一；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对以往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肯定与批判。可以说，作者的以上见解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也体现着一名学者严谨求真的学术态度与学术品格。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彰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践价值。作者在该著作中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基于这种思路，作者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人民“走进马克思”，全面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法理学理

论；另一方面，要求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法律伦理价值观中国化。作为上述设想与方法的具体贯彻和体现，作者以当前分配领域出现的贫富差距为实例，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劳动主义或劳动人道主义，充分尊重劳动者、劳动神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价值追求。

郭强通过专著系统研究了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想。^[12]该书围绕“现代国家”这一主题，分两个逻辑层次分别阐述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即政治国家：现代国家成长的现代性维度；资产阶级国家：现代国家批判的资本性维度；社会共和国：现代国家超越的理想性维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则是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

作者认为，从现代国家建构的现代性维度看，现代国家是政治国家。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政治国家”作为“宗教国家”（以“基督教国家”为典型）的对立面，是表征“现代国家”的主要范畴。这里通过研究马克思早期关于“政治国家”的论述，系统探讨市民社会、人权、人民主权、宪法、代议民主、普选权、权力分开、政党、民族等的现代国家要素及其形成的国家理念和制度结构，以揭示现代国家的现代意义；取消等级、依附和特权而奉行“自由、平等、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促成了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分离，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促进了人的政治解放和公民权的确立；人民主权取代君主主权，成为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它以人民的整体标识——“民族”性作为前提，民主与法治则是这一价值原则的两大基石，使社会成员成为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公民；从政权组织形式上看，马克思明确现代国家应选择共和政体，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核心领域的代议民主共和制度。

作者认为，从现代国家批判的资本性维度看，现代国家又是资产阶级国家。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因而，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国家”便成了

“资产阶级国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同义语。这里通过研究马克思关于 1848 年欧洲革命后英、法、德等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实践的分析,深入剖析在资本统治社会的逻辑下,现代国家的人民主权理念和代议民主等制度安排遭到“歪曲”和“虚化”的根源。具体说来,现代国家本质上是资本统治的国家,其权力被资产阶级所垄断,国家机构和法律只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职能在根本上也是在于维护资本统治并奴役劳动的社会秩序;从运行机制上讲,以普选权、分权制衡、政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创设初衷是通过一系列制衡机制,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但是,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已初衷的反面:为防止无产阶级利用代议民主制度“和平夺权”,资产阶级不惜废除普选权,割裂人民与国家间的制度性联系,放任行政权力超常发展,使国家权力结构呈现出行政权支配立法权的态势,竞争性政党制度本质上是以资本的政治化实现其资本对劳动的专政,从而使现代国家也逃脱不了与社会异化的历史宿命。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继续沿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向,深入到“市民社会”的核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资本逻辑为基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本质则有了完整的认识和把握,揭示了现代社会同资本的内在同构关系,进而找到了现代国家资本逻辑的物质根源。

作者还认为,从现代国家超越的理想性维度看,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社会共和国。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无法完成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历史任务。于是,马克思提出要在理想性维度上实现对现代国家的超越。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伟大尝试,也是马克思所见证的唯一一次无产阶级国家专政建设实践。因而,他是巴黎公社革命实践为蓝本论证现代国家超越问题的。这里通过研究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和对拉萨尔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系统阐释社会共和国在颠覆资本统治社会逻辑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形式。具体来说,“社会共和国”作为从现代国家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态,颠覆了现代国家的资本逻辑,它是人民

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实行“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真正民主制”,并以真正普选基础上的民选机关支配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加以保障。

在作者看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如果说前部分是立足文本,系统研究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想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部分则以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想审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阐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建构原则。具体说来,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思想虽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为背景,但“现代国家”源于西方,不等于专属于西方。东方民族也要走出专制传统,结合自己特点,回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逻辑中来。像中国这样摆脱专制制度时间不长、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东方大国,走向国家消亡的历史远没有马克思设想的那样短暂,其历史任务不在打碎国家机器,而在按照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健全国家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实现国家政权本身现代化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目标定位。这一目标定位,体现了现代国家建设逻辑与社会主义建设逻辑的辩证统一。

五、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富创新性最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部分。2021 年,河北省学者就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和城市问题等论题展开了探讨。

乔治忠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探讨。^[13]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揭示,乃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实际上,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研究的成果,许多重要的著作,本就是二人共同撰写,当然正如恩格斯的多次申明,一切都是以马克思为主导。事实上,恩格斯本人也具有突出的

贡献，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致力于马克思在理论建设上的未竟事业，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体系进一步系统化，并且作出精辟的表述。

李维意探讨了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14]认为，共同体是马克思类哲学关注和思考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从劳动本体论出发，赋予类概念全新的现实性内涵，探讨了基于类哲学的人类理想共同体的历史建构。类概念从现实的人出发，诠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否定性统一”和人与人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性统一”。类思维是一种超越“物种思维”和“直观思维”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类思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本质内涵。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劳动是共同体建构的基石。建构人类理想的共同体必须摆脱抽象社会力量的统治，始终坚持劳动社会化的主导地位，合理调节和有效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揭示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类哲学基础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方向、思维方式和理论支撑，进而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李秀玲基于英文文献，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城市问题。^[15]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与资本主义之间发展关系的探讨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自治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交融并展开辩论，对激进地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城市政治生态学成为一个高度异质化的新领域，研究者从阶级化、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视角展示了人类身体与环境退化的关系。21世纪以来，后殖民理论中的城市研究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而是通过方法论的更新来阐释第三世界问题。如今，全球城市化和定居者殖民主义成为城市研究的前沿，相关理论重新引起人们对原住民解放问题的重视，成为反殖民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又一交汇点。

六、马克思的自然观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国内外学者纷纷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力求挖掘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探究马克思的自然观。2021年，河北省

学者就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形成过程、双重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和马克思人化自然概念的内在生态逻辑展开了探讨。

王伟探讨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形成过程、双重内涵及其辩证关系。^[16]认为，作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双重内涵，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都是与人相关的，这是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概念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是马克思的自在自然区别于抽象自然概念的重要方面。人化自然作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核心，既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也透着对人的约束和限制，这是马克思自然概念区别于其他自然概念的关键之处。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完整内涵，并积极促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现。

王伟还探讨了马克思人化自然概念的内在生态逻辑。^[17]认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包含着生态意蕴，这是从其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它首先表现在人化自然概念的客观性上，这是在其提出之初首先被赋予的特征；其次表现在人化自然概念的双向性上，人化自然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再次体现于人化自然概念的实践性上，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是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的内在统一，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解决的内在动力；最后体现于人化自然概念的理论走向上，作为“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人化自然概念扬弃了私有制下自然界的纯粹有用性，而呈现出自然界本质的丰富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从而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图景。这些内容共同孕育着马克思人化自然概念的生态意蕴，使其能够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彰显出时代感和现实感。

七、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

社会正义是人类文明的尺度，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2021年，河北省学者就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范式、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等论题展开了探讨。

刘岩通过专著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范式问题。^[18]认为,自由主义正义范式充斥着自由与平等、权利与功利、道德与政治、先验与经验、道义与目的、利益与理性、假设与现实、逻辑与推理的争论和证明。借布莱恩·巴利对“正义诸理论”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对自由主义正义范式作“要素”式分析,即主体、环境、制度、标准这四个要素包括了自由主义正义的主要部分。

作者认为,“主体”中对人性的利己和理性两条路径的冲突和交杂,使权利和善的优先性成为自由主义正义的焦点,不论如何论证,各方都不可能摧毁“正义优先性”的政治哲学命题;“环境”是人性存在的条件,资源的匮乏成为正义的重要前提,没有资源的匮乏就不会有利益的争夺,也不会有理性的合作。但是资源环境是由充足到匮乏还是一开始就匮乏,是与不同理论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分不开的。由此就可以把与人性有关的社会分类为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以便由不同的环境开端处理不同的人的关系。“制度”是对人自身和其利用的环境的限制,也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它使人性和环境不至于因自由的无限性而产生不正义。但是制度是保护个人权利的还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不同的自由主义范式有不同的回答。所以要对个人权利和人与人的合作方式作界定。依据社会契约制定国家制度,或者由其直接先验规定的国家制度保证正义。“标准”是界定正义与不正义界限。自由和平等是正义的主题,也是评价正义的主要标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把“适度性”作为正当的标准,实际上,适度性就是对两个极端的限制,使平等成为正义核心部分。由此以后的正义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在寻找正义的第一原则时,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作为起始因,而成为自由主义正义的内容。自由主义正义要素具有历史性。也就是各要素因历史不同展现出不同的理论趋向。从自然神到个体人,再到群体正义,正义主体的人性基础使正义理论体系建构成为可能。平等自由成为了自由主义正义的主题以及为其提供框架的内容。从神到人,从上帝到人性都使正义由外在的规定性回归到人自身,自由成为人性的要求,也成为论证人的第一原则。所以,自由主义的诞生是正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道义论、目

的论、先验论、经验论在正义研究中的作用也是随着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功利主义,再到新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自由平等问题的解决而得到不同理论体系应用的。

在作者看来,正义的要素的历史性规定了自由主义发展必然划分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经典的理论范式。如果从自由主义发展逻辑界定,我们就可以在对自由主义分类的基础上,评述自由主义正义范式的四个范式。这四个范式对自由主义正义范式研究具有意义,特别是对解读马克思正义范式具有方向性意义。四类范式是财产权利正义范式、否定性正义范式、互利性正义范式、作为公平正义范式。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而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不同的时候表明了这种思想。洛克的自然权利之后的权力与哈耶克的内部规则之下的法律有着相同的路径,只是他们在政府组成形式上随时代发展有所不同。康德对古典自由主义是个反叛,他为新自由主义正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新自由主义代表罗尔斯认为理性为自由尽义务,但是他的道义论是经验性的,它是在自然法的约束下行使理性自由,在道义论方法下,他在理念、正义环境、原则、稳定性、社会结构等方面作出了与康德相反的设计。但罗尔斯所针对的是功利主义范式,功利主义范式在吸收古典自由主义范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理论之后产生出来,功利主义有两个原则一是效用均等原则一是效用最大化,这两个原则不是并行的,这两个原则都是为寻求最大的社会效果即是正义的标准这一原则。所以从这一点上,它与公平正义分开了,它注重的是结果,公平正义注重的是程序。马克思虽然没有过多论证正义,但是他并不反对正义。对其深入分析会发现,他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完成自身正义事业的建构。首先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正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是在自由平等的框架基础上完成的。资本主义正义与自由主义正义有相关性,它使自由由形式转向实质,并切入现实的平等问题。而对正义的概念“析分”中,可以认定人性、物、制度、标准是其四个组成要素,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自由主义正义的轮廓,也成为资本主义正义的结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中包括的不自由、不平等因素作了批

判,认为资本主义对正义的修正和完善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实质性正义的建构,进而指出了废除私有制度在实现实质性正义中的必然性。其次是对马克思的正义观进行分析,通过特征分析,与自由主义正义范式的比较以及对之进行要素认证,确认马克思社会批判正义范式结构,以及与自由主义正义范式的不同。

冯燕芳和郑文正基于对马克思中学作文、大学诗歌和博士论文的考察,探讨了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19]认为,马克思的中学作文虽然带有明显的宗教底色,但富含对现实生活意义的探寻,其正义因素表现在对历史回溯、现在和未来思考之中。马克思在大学期间的诗歌和博士论文逐渐扬弃了宗教底色,开始了对宗教的批判,正义思想的视角从上帝转向了现世政治,作为理论科学的哲学形式也从黑格尔式的正义思想转向人本质的自由和类的平等。研究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有助于完整把握马克思的正义思想。

八、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

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没有哪种思想能如马克思主义这般对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和变革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当今世界的科学指南。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当今时代,分析和解决当代实际问题。2021,河北省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若干基础理论的当代价值,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等。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探讨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五大批判。

窦星辰、黄云明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问题。^[20]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核心话语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语言进行过深刻的论述,形成了关于语言的实践属性、阶级属性、话语功能的比较系统的语言观,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南、价值引领和方法论指导。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建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张骥、耿直探讨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问题。^[21]认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其基本内涵阐明人类解放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力量、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想归宿的历史实践活动。同样关怀人类社会前途命运,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逻辑一致性,主要表现为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理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世界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共建共享”及“绿色低碳”进行探析,探究其建构路径,可为破解当今世界发展困局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

柴艳玲通过专著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问题。^[22]该书从研究生态与文明的关系出发,揭示生态问题和环境危机的实质。在全面阐述马克思循环经济伦理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生产条件节约理论及其关于循环经济实现条件的论述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合理性进行了论述。指出循环经济具有营利性、节约性、高效性等经济合理性;具有低污染性、安全性、环保性等生态合理性;具有公正性、可持续性、人文关怀性等道德合理性;具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等多重价值统一性;符合经济规律、生态规律、人自身发展规律等多重规律。在总结中外循环经济实践模式和经验启示的基础上,凝练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基本架构,勾勒出了循环经济的中国方案,并提出了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议、措施。

冯燕芳和贺永康探讨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五大批判。^[23]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出现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是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自由观、人权观、民主观、正义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还分别建构了与改良生态相适应的价值观。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于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促进人类

与自然的良好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2021年,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应该看到,放眼全国,目前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有不小的差距。第一,研究成果总体偏少,根据CNKI检索可知,2021年全国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发文量近1800余篇,而河北省发表的文章则只有近20篇;第二,高端精品成果的作者单位过度集中,研究成果数量分布不平衡。比如,2021年河北省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一半以上来自河北大学。

(郭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宫敬才.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4).
- [2] 宫敬才.论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的思想资源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3] 宫敬才,安立伟.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巴黎手稿》的理论缺陷及其弥补[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4).
- [4] 黄云明.论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5] 黄云明.论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律起源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6] 黄云明.论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发展观[J].云梦学刊,2021(3).
- [7] 黄云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中的法律价值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8] 黄云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下的道德起源论[J].湖北

-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9] 黄云明,吴桐.马克思劳动哲学中的社会道德关系理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10] 胡士杰.《资本论》手稿中关于“春蚕吐丝”的比喻论析[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3).
- [11] 黄云明.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研究[M].人民出版社,2021.
- [12] 郭强.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
- [13] 乔治忠.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J].史学理论研究,2021(4).
- [14] 李维意.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21(11).
- [15] 李秀玲.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城市问题:英文文献导读[J].国外理论动态,2021(3).
- [16] 王伟.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形成过程、双重内涵及其辩证关系[J].河北学刊,2021(3).
- [17] 王伟.马克思人化自然概念的内在生态逻辑[J].观察与思考,2021(1).
- [18] 刘岩.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范式[M].北京:辽宁大学出版社,2021.
- [19] 冯燕芳,郑文正.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基于对马克思中学作文、大学诗歌和博士论文的考察[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20] 窦星辰,黄云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J].学习与实践,2021(5).
- [21] 张骥,耿直.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J].理论导刊,2021(11).
- [22] 柴艳玲.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3] 冯燕芳,贺永康.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五大批判[J].保定学院学报,20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杨春娟

2021年,河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且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深度解读,也注重关照现实和时代诉求的前沿问题分析;既有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整体把握,也注重新时代新思想的专题研究;既注重研究问题的多维视角,也凸显当前热点问题的理论回应。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

如下特点: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问题进行深度解读。河北学术界从多维视角继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度解读,不断拓展深化研究内容。如魏四海、祁刚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王聚芹、饶一鸣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探究》，张云、赵一强、柴艳萍合著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李维意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逻辑》，代洪宝、杨扬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等著作和论文，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拓展了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及时作出理论回应。河北学术界对新时代新思想等问题保持高度的敏锐性，能够把握学术前沿及时作出理论回应。如赵学琳的《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及其超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我国时间坐标的多维判断及思想立场》，杨文华、李鹏昊的《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张骥、耿直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文章，其研究内容较往年相比，既是学术前沿问题，又是创新性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第三，聚焦社会热点，注重实践应用。河北学术界不仅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也注重理论指导实践。这一研究趋势表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科研导向不断强化，及时回应现实关切。如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当前热点问题，引起河北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张秋山、熊龙的《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田海舰、冯艳彬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四维向度研究》等文章，阐明了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的应对之策，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引起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河北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新时代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魏四海、祁刚利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途径，包括在西学东渐中夹带马克思主义，日本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俄国革命引起中国人向往。二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群

体，包括资产阶级代表、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和留学生群体。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内容，包括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走进大学讲坛、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组织研究团体和讲演团、创办理论报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传播内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大致概述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等三项内容，重点关注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主要是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性质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1]。

魏四海、祁刚利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主要表现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和对党的建设初步探索^[2]。

朱文通还探讨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李大钊在中国最早全面、系统、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可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三是李大钊通过知行合一等多条途径，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魏四海认为，其开端应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备了核心主体；正是在这个核心主体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才与中国人民进一步结合，形成改造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伟力^[4]。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魏四海、祁刚利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划分为七个阶段：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二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中发展；四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五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六是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拓展；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5]。周振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则和经验总结。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起点,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6]。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魏四海、祁刚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一是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立足中国实际实践马克思主义;三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把世界性、时代性的内容与民族性、大众性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主题^[7]。

张勇还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二是必须坚持以党的建设实践为基础,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导向;三是必须坚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价值取向;四是必须坚持依靠党和人民共同奋斗,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智慧之源;五是必须坚持与时代发展同步步伐,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生命活力;六是必须坚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民族特色^[8]。

(三) 新时代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周振国认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一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二要坚持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结合,三要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四要坚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纳世界文明积极成果相结合,五要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相统一^[9]。杨春娟认为,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应对内外危机,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历史难题,直面外部挑战;二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10]。李鉴修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终身必修课,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之问,三是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11]。祝大勇认为,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李素霞、曹凤珍认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增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日益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13]。

文晶晶认为,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继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提高大众的理论学习能力,坚持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坚持培养专业的理论人才队伍^[14]。

(四)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任亮认为,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重在从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四重向度,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把握其逻辑必然。一是革命向度:马克思主义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历史进程最优选择;二是建设向度: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契合国情的建设道路,是社会主义建设统领;三是改革向度:马克思主义经得起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检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四是发展向度:马克思主义被新时代中国历史进程所证明,是创新发展伟大旗帜^[15]。祝大勇认为,马

克思主义行, 在于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在于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16]。

二、意识形态建设

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 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和前沿阵地。河北学术界围绕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相关研究和探讨。

(一)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

关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及实现路径, 张秋山、熊龙认为,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以把握“两个巩固”为根本任务, 以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为基本原则, 以正面舆论宣传为重要方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导向。其价值意蕴在于, 有助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抵制西方外来思想渗透, 推进网络信息化强国建设。其实现路径: 一是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正确方向, 二是加深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认识, 三是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传播平台, 四是注重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打造, 五是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安全有序^[17]。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四维向度, 田海舰、冯艳彬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从“主体—制度—传播—技术”四个维度系统构建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具体表现为: 一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主体维度, 包括国家层面的党和政府、社会层面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广大网民。二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维度, 包括系统建立网络监管体系、强化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预警与应急处理机制。三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传播维度, 包括坚持和巩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意识形态内容建设、创新和改革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四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技术维度, 包括强化网络安全的全面防护、加快网络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培养与陪护。^[18]

(二)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关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李明超、申文杰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经历了恢复与重建、探索与发展、调整与改革、深化与革新、成熟与完善五个阶段。五个阶段始终紧扣时代主题,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使命, 不断追求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化。其启示在于: 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深化意识形态教育; 二是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 强化意识形态教育; 三是注重教学与生活衔接, 渗透意识形态教育; 四是健全体制机制, 促进意识形态教育。^[19]

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应对之策, 郭岩峰、张春艳认为, 新时代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对策: 高校要不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要严格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20]李黎认为, 高校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对策: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 二是强化思想教育, 三是持续传导压力, 四是树立战斗意识, 五是筑牢舆论阵地, 六是加强典型引导, 七是强化话语运用。^[21]

关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及提升路径, 宋博、马玉曼认为,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可以归纳为: 话语主体(主要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互联网为信息传播载体和舆论宣传工具, 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和认知行为特点, 遵循一定的网络话语生成规律, 运用适当的网络话语表达方式, 构建完善的网络话语体系, 传播理论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 产生并发挥强有力的话语效果, 牢牢掌握网上话语(或称之为“发声”)权力, 以期达到提高社会主流思想引导能力和增强主流思想舆论把控能力的效果, 从而实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最终目标。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途径: 一是举旗定向, 强基固本, 夯实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二是与时俱进, 多措并举, 完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即要不断丰富话语内容、不断创新话语方式、不断优化话语环境。^[22]

梁岩妍、王千石还对“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构建进行了探讨, 认为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建设; 二是加强后疫情时代网络舆论监管、正确引领网络舆论导向; 三是采取教育方式

增强高校师生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3]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问题

2021年,河北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共同富裕、文化建设等相关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多方面研究和探讨。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逻辑

李维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逻辑,既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文明为参照,又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从文明论视角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旨趣和意义在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价值追求、正确激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牢牢掌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形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制度设计的践履,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制度创新,它选择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追求基于人类社会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建构是一个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超越过程,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劳动解放的“新世界”取代了资本统治的“旧世界”,为人类文明的长足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24]

(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

花永兰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是指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理论观点和科学知识体系而产生的话语形式和表达系统。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作出了突出的原创性贡献,形成了更加成熟、日趋定型的话语框架和话语范畴,它主要包括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基本话语”,在社会问题总体层面和具体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跨越产生的“共轭话语”,以及主题日益得到深化的“延伸话语”等几个层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25]

(三) 共同富裕

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周振国认为,从共同富裕的主体看,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在实

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从共同富裕的内容看,是包括人自身全面发展在内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而不单纯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发展和享有现代化生活。从共同富裕的过程看,是一个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渐进过程,要分阶段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从推进共同富裕的动力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持续奋斗是共同富裕的动力之源,要充分激发每一个人勤劳创新致富的积极性。^[26]

周振国认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一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二是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积极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三是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7]

(四) 文化建设

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关键所在。柴冰、辛凤鸣认为,一要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根基作用;二要从教育上下功夫;三要以立法的方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四应秉承丝路精神,通过文化交流与世界其他文明互学互鉴。^[28]

康振海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一是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提高文化服务力;二是着力传承发展,永葆文化生命力;三是推进产业发展,增强文化生产力;四是大步走向世界,提升文化影响力。^[29]

胡伟认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延伸:一是以党内权力监督推动廉洁从政;二是以党内奖惩制度夯实党员价值理念;三是以初心使命丰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内容;四是以制度优势增强党内政治文化自信。^[30]

李苗苗认为,新时代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融通:一是客观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二是科学辨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利弊;三是正确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负影响;四是清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方向;五是坚持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31]

另外,田海舰、李慧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强调的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自信和价值认同。^[32]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持续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河北学术界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与作用、培育与践行、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等问题展开探讨。

(一) 基本功能与作用

田海舰、李阎认为,表达社会理想、宣誓立国原则、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确立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他还指出,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发挥着多维作用,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激励和鞭策作用、唤醒和激活作用、辨识和警示作用、团结和凝聚作用。^[33]

(二) 培育与践行

何启刚认为,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需要在思想认知、实践体验、对外传播三个方面用力。一是思想认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首要前提,要加强宣传引导,深化理论研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二是实践体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关键环节,要依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是对外传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重要支撑,既要增强对内凝聚力,又要提升对外影响力,即建立覆盖全球的对外传播体系,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和方式,做好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工作。^[34]

杨福忠认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一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形式,即转化、践行、维护;二是发挥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三是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四是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传播和国际交流。^[35]

(三) 高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张蓓蓓认为,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一是尊重学生个体特征,实施分层分类的教育引导;二是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落细落小落实;三是构建“三位一体”长效机

制,形成协同联动的教育合力^[36]。翟承宇、张正认为,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优化路径:一是优化主体,提升“微”媒介素养;二是优化课程,开拓“微”课程平台;三是优化方式,转变“微”话语体系;四是优化文化,打造“微”网络文化;五是优化服务,完善“微”管理机制。^[37]何新生、王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大学生意识形态共识的有效路径,既要引导大学生正确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供给侧”出发,改进方式方法,即营造舆论氛围、创新思政理论课、利用好网络平台、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满足大学生的期盼和需要。^[38]

祝大勇、贾立平认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培育路径:一是完善制度政策设计,使大学生坚定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自信;二是甄别各种社会思潮,引导大学生准确认知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三是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四是规约技术嵌入生活的路径,使技术变革服务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39]

关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构建路径,李浩源认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价值践行,这三重路径是三个层次,即认知层次、认同层次和践行层次。解决这三个层次的构建问题,必须循序渐进达致科学:认知是前提,认同是深化,践行是目标,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并在行动中修正。在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体现核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相统一、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相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统一、价值观的民族性与全球性相统一,才有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构建。^[40]

张蓓蓓还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构建路径进行了探讨,认为要进一步传承创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理念,丰富拓展话语内容,转换融合表达方式,优化完善载体平台。^[41]

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本质、原创性贡献以及如何学懂弄通做实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建构特质

王鸿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具有建构主体的理论自觉性、建构内容的要素完备性、建构方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性、建构视野的民族之治与全球之治的和谐性、建构技术的高势位性等建构特质，显现出了我们党积极的建构意识、先进的建构理念、高超的建构能力和卓越的建构成果。^[42]

（二）原创性贡献

魏四海、祁刚利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发展和丰富作出原创性贡献：一是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而这种新境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站在大历史观的视角，明确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二是该思想不是别的国家、别的地区、别的民族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结合了中国元素，为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而产生的思想。^[43]

王秀华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一是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的重大时代课题；二是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鲜明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彰显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44]

（三）如何学懂弄通做实

王立涛认为，要从“四个维度”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一是从中华文明承继这一维度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文化基因；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一维度深刻感悟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三是从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维度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根本立场；四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维度深刻掌握这一思想的工作方法。^[45]

王健认为，提升大学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知度的方法路径：一是明确提升理论认知度的目标导向；二是从“需求侧”出发，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兴趣和需求；三是从教学

“供给侧”改革入手，增强思想理论的吸引力。^[46]

张新桥认为，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要深刻理解这一思想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二要深刻领悟这一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实践品格；三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四梁八柱”，下功夫学懂弄通做实，努力做忠实信仰者、坚决捍卫者和坚定实践者。^[47]

常满荣、何洪澜认为，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要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发挥好思政课主渠道作用；锤炼和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素质，发挥好教师“引路人”的作用；以思政课教学改革为突破点，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构建“大思政”体系，推进各部门协同育人；发挥好新媒体的作用，拓宽“三进”工作的渠道。^[48]

张剑英、付秀芬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应遵循以下原则：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其路径是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实现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引领，以增强“原理”课的实效性。^[49]

六、新阶段新征程新思想专题研究

2021 年，新阶段、新征程、新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有关思想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河北学术界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从多维视角和不同层面不断拓展新的内容，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

（一）新阶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论断，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赵学琳认为，深入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及其超越，要认识到：一是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有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阶段；二是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更高阶

段；三是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四是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后进一步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五是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并实现伟大复兴的阶段；六是新发展阶段是在确立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阶段；七是新发展阶段是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础上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阶段。^[50]

我国处于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时期。赵学琳认为，中国共产党从多个方面和维度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时间坐标：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时间坐标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达到新的境界；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间坐标来看，我国发展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是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时间坐标来看，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百年大党；四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坐标来看，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五是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间坐标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六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坐标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历史交汇期；七是从世界格局演进的时间坐标来看，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51]

（二）新征程

魏先法认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一要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路径：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优势和根本保证；二是海内外力量的广泛团结、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力量支撑；三是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把创新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四是必须加强系统观念和方法，遵循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谋划好规划落实。^[52]

覃志红提出，要以系统辩证思维把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目标和方向，一是要兼顾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二是统筹全面发展与总体安全；三是协调团结与新的伟大斗争。^[53]

（三）新发展理念

刘晓辉认为，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把握“三个维度”，一是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着力做好“三个统筹”，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54]康振海认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55]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于历史含义与时代特征，魏四海、祁刚利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坚持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当前国内外发展大势所得出的一个重大科学论断。概括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时代“大变局”的时代特征：一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前所未有；二是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从一个常量成为最大的变量前所未有；三是西方内部的四分五裂前所未有；四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较量前所未有；五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推动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形前所未有。^[56]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渊源。李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是“大同社会”的构想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传统“大同社会”的现代超越，也是马克思世界理论视域下解决问题的对策。这一构想基于全人类整体利益，提出建立人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人们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与社会发展的时代使命和当代治理方略结合起来；倡导建立突破民族、国家的狭隘界限，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命运共同体”。^[57]

生成逻辑。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生成逻辑，王聚芹、饶一鸣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正是延续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全球治理的当代中国理论形态。从理论源

起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承接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这一经典理论逻辑;从文化根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治理逻辑;从解放的角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承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逻辑;从现实的角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承接的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富强的伟大实践,这四重逻辑汇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的当代诞生。^[58]

思想意蕴。王聚芹、饶一鸣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在全球治理的新担当、新站位、新视角、新战略、新路径、新布局、新目标设定等方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根本超越,具体体现为:一是全球治理新担当——推动全球治理当代转型;二是全球治理新站位——自觉树立人的“类意识”大域境;三是全球治理新视角——构建“世界大人民性”支点;四是全球治理新战略——创制全新国际话语体系;五是全球治理新路径——探索“改革创新”方式;六是全球治理新布局——擘画“五维一体”方略;七是全球治理新目标——构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59]

时代价值。李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南。^[60]王聚芹、饶一鸣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对于当代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实践意义在于超越“暴力”视域全球治理范式,有助于实现中国梦。^[61]

建构路径。张骥、耿直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现实路径:一是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原则,推动世界共同繁荣;二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方式,提供全球治理新模式;三是以“交流互鉴”为主要途径,营造开放包容的多样文化;四是以“共建共享”为主要形式,建设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五是以“绿色低碳”为主要准则,建立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62]

另外,李新还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文化困境及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文化困境,主要有文化异

构导致人类共同价值认同的长期性、文化优越性和文明冲突论等带来的国际文化交流的障碍性,以及国际社会各文化主体低程度的参与性困境。破解此文化困境应实行以下策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有序高效的交流机制;依托“一带一路”,扩大文化认同辐射范围;直面文化差异焦点,精准实施文化策略;拓展文化交流渠道,构建多层次全方位交流平台。^[63]

(六)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

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建构的三重逻辑,代洪宝、杨扬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历程是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统一,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百年理论探究的历程表现为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与传统“自然共同体”文化的统一,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百年历史探求的历程反映为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演变逻辑。百年实践探索的历程展现出特有的实践逻辑,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保障,价值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基础,交融整合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64]

杨福忠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抓好民族团结之本;激发共同奋斗之志;夯实均衡发展之基。^[65]

于春洋、马瑞琪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6年是过渡时期中国民族国家的基础布局阶段,1956—1978年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曲折前行阶段,1978—2012年是改革开放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全面推进阶段,2012年至今是民族复兴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族整合阶段。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一套中国方案。^[66]

(七) 新时代人民幸福与时代新人

关于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内在特征与实践路径,曹凤珍认为,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包含人民的需要满足,愉悦的生活体验和辛勤的劳动创造;其内在特征体现为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实践路径:

奠定人民幸福的物质基础，完善人民幸福的保障制度，培养人民幸福的主体能力。^[67]

关于“时代新人”的基本内涵与培育路径，田海舰认为，“时代新人”必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要有理想、有担当、有道德、有力量。其中，有理想是灵魂，有本领是基础，有担当是关键，有道德是前提，有力量是保障。在当代中国，只有做到坚定信仰、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崇德扬善、勇于开拓，才能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68]

（八）初心和使命思想

思想来源和形成基础。沙占华认为，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思想来源有三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初心和使命的思想，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初心和使命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初心和使命思想。^[69]李兰、付臻认为，初心和使命思想的形成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初心使命的思想源头是《共产党宣言》，它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学说是初心使命的理论基础，它阐明了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具体所指。二是文化底蕴：蕴含着丰厚的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三是现实需要：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社会主题。^[70]

丰富意蕴。李兰、付臻认为，初心和使命思想的丰富意蕴：一是不忘来路，始终做到坚守初心；二是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加强党的建设；三是初心使命之根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四是正视自身问题，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五是初心使命之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六是继承光荣传统，继续发扬斗争精神。^[71]沙占华认为，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丰富意蕴，表现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勇于自我革命，要加强真抓实干的作风建设，要以加强学习和开展深入调研来全面增强执政本领。^[72]

时代价值。沙占华认为，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一是实现了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二是为推进“四个伟大”提供了根本动力；三

是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全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73]

祁刚利还对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经验进行了探讨，认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要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基，要牢记为民宗旨，要高扬奋斗精神，要弘扬优良传统。^[74]

（九）习近平思想文化建设理论

基本结构。马庆栋、王学增认为，习近平思想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结构包括六大板块：一是鲜明主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二是核心引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基础工程，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四是主导环节，“三管齐下”培育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五是载体和渠道，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精神食粮，同时把握好其意识形态属性；六是鲜明特色，高度重视互联网内容建设和传播规律，与时俱进，勇于创新。^[75]

内在逻辑。马庆栋、王学增认为，习近平思想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内在逻辑，在学术上可进一步提炼为“虚”与“实”、“政”与“经”、“深”与“浅”等三大命题，同时该理论体系中还蕴含“知”与“行”、“守正”与“创新”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和建构逻辑。^[76]

（十）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杨文华、李鹏昊认为，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主要从理论内涵与逻辑建构两方面确证了历史优先原则：一是在理论内涵上突出强调历史优先，即“四史”重要论述坚持唯物的观点，主张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辩证的观点，主张把握历史规律；坚持实践的观点，主张加强历史学习。二是在逻辑建构上遵循历史优先原则，即“四史”在逻辑上是一部大历史；“四史”从三个侧面诠释了大历史的总特征；“四史”之间有机联系，彼此之间互为佐证；“四史”重要论述尽管突出强调历史优先，但同时又是以逻辑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这一逻辑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77]

杨文华、李鹏昊认为，新时代历史优先原则的践行路径：一是以历史优先原则开展意识形态

批判,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二是以历史优先原则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即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叙述,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三是以历史优先原则指导意识形态实践,即在历史优先原则指导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应重视历史经验,应审视当下,应强化历史导向,寻求历史性突破。^[78]

(十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论述

起源与实践探索。马庆栋、祁文辉认为,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对市场经济的长期思考和理论总结,汇成了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鲜明特色和脉络走向。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实践探索表现为:一是注重实践研究的“当前性”,强调理论发展的“原创性”;二是注重整体思考,坚持将经济与政治有机融合;三是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影响因素。^[79]

基本命题和研究框架。马庆栋、祁文辉认为,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市场经济观的基本命题和研究框架:其市场经济观基本涵盖三大命题,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包括政府的角色、职能、市场的范围、作用等。二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包括如何对待农村集体经济,如何推进国企改革,如何看待个体私营经济等。三是经济运行观,包括发展农村市场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部门“大合唱”、发挥文化和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等。其研究框架应涵盖以下内容: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对市场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关于生产分工与发展农村副业的举措、关于政府与市场角色分工的思考、关于集体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关系的思考、对于经济运行的思考、习近平早期市场经济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联系与比较等六个方面。^[80]

(十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历史路标。张云、赵一强、柴艳萍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路标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最初就生态论生态的思考,到对人与生态关系的思考,认识到当前的生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

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2002—2004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准备和孕育阶段;2005—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初步形成阶段;2012—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系统化、完整化和理论化阶段;2018年至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论证与综合研究阶段。^[81]

核心要义。张云、赵一强、柴艳萍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明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目标、原则和路径,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八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树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82]

回答三个问题。张云、赵一强、柴艳萍认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角度,可以将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理解为对三个基础性问题的回答:一是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即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担当,以“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大国担当;二是究竟应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即“绿树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经济观,深厚的生态文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三是如何建设这样的生态文明?即探寻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新路,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83]

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张云、赵一强、柴艳萍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解决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84]王小玲认为,扎实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见效的路径:一要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二要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坚决筑牢首都生态安全屏障;三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四要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修复。^[85]

另外,杨文华、王竹还对“两山”理论进行了生态诠释,认为“两山”理论包含的生态内涵:一是阐释了两种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和经济价值取向)的关系;二是确立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建设美丽中国);三是规划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战略(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两山”理论蕴含的生态价值:“两山”理论坚持历史的观点,深刻总结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准确把握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此外,它还坚持辩证的观点,主张在实践基础上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有机统一。在理论上,它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它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两山”理论揭示的生态路径:一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两山”理论为指南;二是培育新型主体,变“经济人”为“生态人”;三是发展绿色生产力,走生态根治之路;四是打破民族、国家、文化、宗教的藩篱,在全国范围内,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生态共同体。^[86]

(十三) 习近平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习近平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申文杰、赵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重要论述的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培育奋斗精神;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弘扬劳动精神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方式重要论述的话语体系主要包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推出更多高水平教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格局;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到个人;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育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87]

(十四)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饶立昌、孙英臣认为,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考察分析党史的一种范本,他坚持注重运用“两点论”,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党史;注重运用“重点论”,坚持抓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88]

(十五) 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李新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超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有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文化基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大同社会”提出的中国方案。^[89]

李新认为,治国理政理念的实践路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表现为“义利相兼”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德法相济”是政治治理的重要方式,“兼容并包”是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礼用和贵”是社会建设的思想理念,“天人合一”是生态建设的内在要求。治国理政理念的整体目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0]

(十六) 习近平民生思想

马庆栋认为,习近平民生思想的形成轨迹表现为,在深厚的为民情怀中萌芽、在扎实的基层调研中生根、在勤奋的学习思考中成长,其中始终贯穿着真情为民的拳拳初心。建立党员干部永怀初心的长效机制,完善干部下基层的常态化制度性安排,努力学习以强国,勤而善政以安民,是习近平民生思想的逻辑延伸和光芒指向。^[91]

2021年,河北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但也应看到还存在一定不足,突出表现为:从发表类型看,专著占比近3%,核心期刊类文章占比近23%,报纸类文章占比近20%,普通刊物文章占比近50%,研究成果质量有待提升;从研究内容看,尽管对学术前沿问题有所探讨,但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再加上对党的创新理论解释多、创新少,导致高水平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对经济社会有重

大影响的创新成果明显不足。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学术前沿问题的研究视域,力争多视角多维度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不断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发表质量,助力推动河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杨春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魏四海,祁刚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2]魏四海,祁刚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3]朱文通.“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N].北京日报,2021-08-02.
- [4]魏四海,祁刚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5]魏四海,祁刚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6]周振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N].河北社会科学,2021-06-28.
- [7]魏四海,祁刚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8]张勇.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宝贵经验[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1(2).
- [9]周振国.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N].河北日报,2021-03-17.
- [10]杨春娟.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行[N].河北社会科学,2021-08-11.
- [11]李鉴修.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N].河北日报,2021-09-10.
- [12]祝大勇.在新的伟大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共产党员,2021(15).
- [13]李素霞,曹凤珍.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N].经济日报,2021-07-26.
- [14]文晶晶.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共产党员,2021(19).
- [15]任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J].共产党员,2021(15).
- [16]祝大勇.在新的伟大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共产党员,2021(15).
- [17]张秋山,熊龙.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3).
- [18]田海舰,冯艳彬.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四维向度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 [19]李明超,申文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发展历程及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4).
- [20]郭岩峰,张春艳.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4).
- [21]李黎.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对策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4).
- [22]宋博,马玉曼.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提升策略[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23]梁岩妍,王千石.论“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构建[J].新闻前哨,2021(6).
- [24]李维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逻辑[J].理论与改革,2021(6).
- [25]花永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话语体系原创性贡献[J].现代商贸工业,2021(20).
- [26]周振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N].河北日报,2021-10-22.
- [27]周振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N].河北日报,2021-10-22.
- [28]柴冰,辛凤鸣.思政课“国家文化安全”主题讲授的理路与使命[J].继续教育研究,2021(4).
- [29]康振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N].光明日报,2021-04-06.
- [30]胡伟.建党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演化[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28).
- [31]李苗苗.新时代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融通[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3).
- [32]田海舰,李慧娟.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33]田海舰,李阎.论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作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8).
- [34]何启刚.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J].人民论坛,2021(Z1).
- [35]杨福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N].河北日报,2021-09-24.
- [36]张蓓蓓.新时代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37]翟承宇,张正.新媒体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J].文化产业,2021(11).
- [38]何新生,王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大学生意识形态共识的思考[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39]祝大勇,贾立平.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及其现实启示[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2).
- [40]李浩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构建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5).
- [41]张蓓蓓.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构建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4).
- [42]王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建构特质[J].武警学院学报,2021(9).
- [43]魏四海,祁刚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44]王秀华.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N].河北日报,2021-12-01.
- [45]王立涛.从“四个维度”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N].河北党校报,2021-01-05.
- [46]王健.提升大学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知度的路径研究[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4).
- [47]张新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河北党校报,2021-03-20.
- [48]常满荣,何洪澜.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路径探析[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1).
- [49]张剑英,付秀芬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50]赵学琳.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及其超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
- [51]赵学琳.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我国时间坐标的多维判断及思想立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2).
- [52]魏先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J].共产党员,2021(1).
- [53]覃志红.以系统辩证思维把握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的目标和方向[N].河北社会科学,2021-08-11.
- [54]刘晓辉.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把握“三个维度”[J].共产党员,2021(5).
- [55]康振海.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N].河北日报,2021-02-03.
- [56]魏四海,祁刚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57]李新.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58]王聚芹,饶一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1.
- [59]王聚芹,饶一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1.
- [60]李新.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61]王聚芹,饶一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1.
- [62]张骥,耿直.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J].理论导刊,2021(11).
- [63]李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文化困境及应对策略[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4).
- [64]代洪宝,杨扬.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65]杨福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光明日报,2021-08-30.
- [66]于春洋,马瑞琪.分期与进展: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线索梳理[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4).
- [67]曹凤珍.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及实践路径探析[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68]田海舰.“时代新人”的基本内涵与培育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1(1).
- [69]沙占华.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探微[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1).
- [70]李兰,付臻.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思想探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71]李兰,付臻.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思想探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72]沙占华.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探微[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1).
- [73]沙占华.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探微[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1).
- [74]祁刚利.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经验[N].河北党校报,2021-06-05.
- [75]马庆栋,王学增.习近平思想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与内在逻辑[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5).
- [76]马庆栋,王学增.习近平思想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与内在逻辑[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5).
- [77]杨文华,李鹏昊.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J].江西社会科学,2021(3).
- [78]杨文华,李鹏昊.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J].江西社会科学,2021(3).
- [79]马庆栋,祁文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论述的起源、发展与研究框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10).
- [80]马庆栋,祁文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论述的起源、发展与研究框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10).
- [81]张云,赵一强,柴艳萍.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
- [82]张云,赵一强,柴艳萍.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
- [83]张云,赵一强,柴艳萍.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
- [84]张云,赵一强,柴艳萍.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
- [85]王小玲.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N].河北党校报,2021-09-05.
- [86]杨文华,王竹.“两山”理论的生态诠释[J].学习论坛,2021(3).
- [87]申文杰,赵晗.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的话语体系探究[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4).
- [88]饶立昌,孙英臣.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4).
- [89]李新.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90]李新.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91]马庆栋.初心萌芽与习近平民生思想的形成轨迹[J].邢台学院学报,2021(2).

精神文明实践研究

郑英霞 鲍志伦

2021年,精神文明研究领域的成果丰硕。河北社科专家学者围绕学科发展,对精神文明这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并结合当年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学术规范、价值准则、创新意识和实践学习的范本。尤其是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研究水平较深,这些领域显示了河北社会科学工作者较强的科研能力和优势,为我们学习实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

一、精神文明理论研究

(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决定法治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最深层因素。杨福忠认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内在地包含着行为准则性的要求,对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指引和评价作用。国家根据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社会秩序有效维护的需要,把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并要求人们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予以践行。人们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各环节中,围绕核心价值观如何弘扬、践行和维护等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动策略,是一种法治文化现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对于厚植法治文化的思想根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具有重要意义。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形式,一是转化,二是践行,三是维护。^[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用来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重要的意识形态内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成功,与时俱进的要件之一即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认知、认同,也能践行。李浩源认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价

值践行,这三重路径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知层次,为基本层次,即解决大学生价值认知上的混乱,使其知晓社会的主导价值,形成稳定与和谐的自我价值观体系;第二个层次是认同层次,为上升层次,即解决大学生对主导价值观认识上的“口是心非”矛盾,也使大学生所认同的主导价值观得到社会其他人群所认同;第三个层次是践行层次,为理想层次,即解决大学生中针对核心价值观“知行不一”的问题,使其在现实中得以关注和培养、在不断的自我扬弃中升华和构建核心价值观。同时,通过大学生价值观的社会融入,带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构建,辩证统一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全过程。在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体现核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相统一、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相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统一、价值观的民族性与全球性相统一等,才有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构建。^[2]

岳志荣、梁颖杰和王海军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丰富内容和鲜明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二者同属于中国文化范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者的内在契合之处主要表现为四点:第一,思想根源的同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刻的精神诉求;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医等思想,不论是内化于心的道德品质,还是外化于行的体育行为,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内容体系的相融

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逻辑辩证关系，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道德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脊梁；而中华传统体育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契合，无不体现着二者的同根同源。第三，“以人为本”的先进性。“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先进的思想内涵与独特的锻炼形式，特别是其以人为本的先进性价值理念。第四，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都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需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特有的实践作为指导，二者的契合点也体现在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共同构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支撑、共同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动力与源泉。^[3]

何新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引导和凝聚作用，凝聚大学生意识形态共识有利于增强国家精神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而形成的意识形态，遵循了历史规律、反映了时代要求、承载着民族伟大梦想。以其为基础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等意识形态进行引领，让大学生的意识形态能够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统一，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其团结奋斗精神能够得到有效传递。凝聚大学生意识形态共识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方面，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另一方面，大学生是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生力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意识共行进行引导和凝聚，能够让大学生明白我国先进文化，对其前进方向进行充分了解，从而将我国中华文化进行弘扬发展，对其进行优化、创新，让我国传统文化能够实现改革目标，创造出良好的精神家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凝聚大学生意识形态共识有助于培育合格的新时代所需人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准概括了我国社会国家发展的方向，也讲明了新

时代公民的要求，是实现复兴梦的价值引领，让大学生能更加明确了作为合格的时代新人所要承担的责任、肩负的使命和奋斗的方向，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共识进行引领，让其成为全方位人才，让学生能够明白自身责任，成为民族复兴大任实践者。^[4]

（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郑恩兵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具有永不褪色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作用，使之成为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的不竭动力；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格局下，全面研究梳理河北省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重要地位、独特风貌、时代价值，既要有“总台账”，也要有挖掘、阐发的“路线图”“效果图”。^[5]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忠孝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探讨。王书芹、申志宏和贾晓敏认为，忠孝思想已经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和普遍的伦理道德观念，传统忠孝伦理道德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我国现在正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外部国际环境，我们必须激发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的人民武装；在内政上，欲求社会和谐稳定，则需要每个家庭都和谐，敬老孝亲，自立而刚毅，需要全体人民群众忠于事业，积极进取，恪尽职守，戴仁而行，抱德而处，需要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不宝金玉、不贪不淫、清廉勤勉。这些道德、操守蕴含在中华民族传统忠孝一体的“家国情怀”和“君子人格”中。挖掘先儒忠孝文化的现代价值，利用“家国天下”“家国一体”的伦理道德，对增强国人的家国情怀，勇于保家卫国，敢于应对外部威胁和挑衅具有重要意义；开拓新“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伦理道德，构建和谐社会，唤起君子人格，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精神与道德规范具有现实

意义。^[6]

刁若菲、杜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结晶,它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古代中国的文明史,到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再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素材是中国精神、中国制度、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力,带来了凝聚力,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主要来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在许多层面和不同领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不仅对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处理国际社会冲突方面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7]

李苗苗认为,新时代坚持做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把握以下着力点。第一,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从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妥善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建设文化强国的高度来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继承、科学扬弃,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三,面对中华传统文化,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既不复古泥古,又不简单否定,而是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要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8]

秦宁波认为,纵观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变发展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动态演变发展的,它伴随着时代主题的切换、党的自身建设、社会矛盾发展、思想潮流演化以及国际形势变化而发生变化,认识论实现了从局部到系统的发展演变,方法论实现了从简易到科学的发展嬗递,价值论实现了从抽

象到具体的发展蜕变。^[9]

(三) 关于燕赵精神

田苗、宋土顺和王燕敏等认为,燕赵精神指引着燕赵大地的发展方向,是人们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结合燕赵历史文化背景,归纳燕赵精神主要有和乐精神、革新精神、包容精神、求是精神、忧患精神和创新精神,体现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载体上。方言的具体化、诙谐化特征彰显了燕赵和乐精神,部分谚语体现了燕赵忧患精神、求实精神和包容精神,文学艺术作品透着革新精神和创新精神,舞蹈、音乐、体育等多方面诠释了燕赵精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域孕育一种精神力量,燕赵文化彰显了“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文化特征,精神的传承和传播将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10]

二、精神文明实践研究

(一)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与网络文化建设实践

李治勇、王建波认为,应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新风险新挑战的策略有四个方面。一是守正创新:唱响主旋律,巩固壮大网络主流思想舆论。面对新风险新挑战,高校要驰而不息地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网络阵地,用力抓好主题主线,生动鲜活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用情弘扬伟大精神,一丝不苟育好爱党爱国情怀,让爱党爱国的精神旗帜在互联网这个大阵地上高高飘扬;用心展示光明前景,精益求精抓好网上正能量宣传。二是综合治理:打好主动仗,着力提升网络风险防控能力。应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风险新挑战,必须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下好先手棋,不断提升风险防范力、控制力、处置力。三是立破并举:增强斗争性,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前沿阵地。应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新风险新挑战,必须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增强斗争意识、强化斗争精神、讲究斗争策略、增强斗争本领,及时批驳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坚决粉碎敌对势力的险恶图谋。四是守土尽责:落实责任制,筑牢守稳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贯彻好、落实好网络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是应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新风险新挑战的关键抓手。^[11]

田海舰、冯艳彬认为,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传播维度来讲,一要坚持和巩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新闻舆论工作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力抓手,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引领社会风尚。坚持和巩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要坚持“三步走”。首先,坚持一个根本性原则即党性原则;其次,打通新闻媒体主体引导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与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再次,科学划分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二要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意识形态内容建设。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理念创新与内容创新,需理念寓于内容之中,传播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表达,要切实保障传播的内容发挥积极有效作用,内容成为最终获得发展优势的关键所在,深刻影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效果与发展。三要创新和变革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需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发展规律。^[12]

袁菲认为,网络文化包含在互联网空间中生成的文化以及依托互联网传播的传统社会文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能够在互联网空间中展现出创新性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网络文化所面临的信息传播渠道、信息传播生态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相对于传统信息传播环境下的文化传播而言,网络文化传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从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来看,相对于依托传统大众媒介所传播的社会文化而言,网络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传播范围更广以及传播速度更快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网络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展现出了强互动的特点,因此,网络文化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这也促使人际传播成为网络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方式。另外,网络文化传播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可控性,无论是传播的虚拟性还是自我性,都导致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道德伦理难以有效作用于互联网平台中的信息传播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净化网络文化传播环境、规范网络文化传播行为,是提升网络文化传播成效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网络文化传播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也让网络文化传播工作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如呈现出传播渠道多元化与分众化的特征。由此可见,网络文化传播主体有必要对传

播策略、传播方案等开展创新与改革,从而更好地适应全媒体时代。^[13]

(二) 关于红色文化建设实践

红色革命文化包含着革命历史、蕴藏着革命精神、体现着革命情怀,是激励广大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田海舰、李慧娟认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河北红色革命文化,需整合多方力量,利用地域优势,从多维视角构建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一是从传播主体维度来看,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创新。传播主体在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是决定传播什么、向谁传播、怎样传播的关键方面。作为传播主体的政府部门、学校、社会组织要相互配合、协同创新。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在传播红色革命文化中的领导作用和管理职能;学校要充分发挥在传播红色革命文化中的教育和实践作用;社会组织要在传播红色革命文化中发挥促进和推动作用。二是从传播内容维度来看,要系统整合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精神,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三是从传播路径方法来看,推动红色革命文化传播,要坚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行信”合一,将学校教育、理论宣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14]

辛文卿认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情报人员及中共情报工作形成了具有中共情报工作特色的红色文化,丰富了当前红色文化的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情报机构遗址、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使用过的情报工具文物等形成了实体的红色物质文化;中共情报工作方针政策和情报英烈传记、情报人员事迹、中共情报工作经验等形成了红色记忆文化;情报人员长期默默无闻地从事着隐蔽战线工作和不畏牺牲、爱国奉献的情报精神等形成了红色精神文化。发掘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情报工作红色文化价值的时代意义,能够有效帮助当代青少年和情报人员自觉抵御国内外各种不良意识形态的侵袭,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增强其对于国家的认可与热爱。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情报人员的情报事迹及情报精神,是当代青少年和情报人员宝贵的精神食粮,是加强爱国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情报教育的重要资源。^[15]

高校构建红色文化育人体系是涵养大学生精

神品格的重要渠道,是坚定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王小丽、李瑞杰和勾正刚认为,河北省高校已从学科建设、课程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及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积极探索出一套红色文化育人体系。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推动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马克思理论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为培养红色文化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课程教学在红色文化育人中发挥着主阵地作用。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主体,以红色专题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课程思政”为两翼的红色文化课程教学体系,筑牢了红色文化课程教学主阵地,增强了红色文化育人的系统性。三是以红色文化浸润校园,深入挖掘校史文化育人价值、注重发挥网络媒介宣传作用、开展红色文化相关主题,营造浓郁的文化育人环境。四是高度重视社会实践活动,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了红色文化育人“知行合一”与“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提升了红色文化育人的实效性。五是组建高端研究平台,打造研究重镇,夯实红色文化学术研究根基,通过科研与教学相辅相长,为红色文化育人提供坚实支撑。^[16]

河北太行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革命圣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祁刚利、李鹏和曹海霞认为,进一步巩固好、利用好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让该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深入人心,促进红色旅游发展。一要构建“四位一体”治理体系,促进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融合开发。要从顶层设计出发,依靠制度支撑,加强治理体系建设,特别是构建“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即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二要加强区域间合作,实现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整体性开发。在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加强区域间的联系,要有整体历史观,建立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区,形成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长廊,还应将该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重组。三要在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效益。这就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不能过度开发,造成资源浪费,特别是对红色文化资源中自然景区的开发利用要充分考虑其承载力;在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歪曲、戏说红

色文化,使得红色文化庸俗化,造成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不匹配,要引领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高质量发展。^[17]

马瑞贤、张楠楠和杨国藏认为,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红色文化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其对外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树立国家形象方面。处于当前的国际环境,要促进世界客观、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体制,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就要推动红色文化走出去,通过对外讲好红色故事,将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积极、向上、奋斗、奉献等核心内涵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改变部分国外群体对我国的刻板印象与盲目负面认识,引导其形成对我国的理性评价和正面态度。二是建构国际话语权方面。立足当前严峻的形势,应着力做好能够全面展现我国的政治面貌、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其国际影响力,赢得世界人民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对不同社会文明、政治体制、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与认可,进而推动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三是保障文化安全方面。要避免我国的文化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威胁,防止外来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的侵蚀、破坏和同化,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升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和竞争力,使其能够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相抗衡,确保本土文化的安全和稳定。^[18]

红色文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共和国的国家根本和源头活水。宇小兵、曹宇认为,把学生教育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将红色文化渗透和融入高校思政课中,贯彻到所有的教学过程,帮助学生找寻精神家园,永葆红色本色。第一,传播红色文化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与有力抓手。学习、领会、传播和弘扬红色文化对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不仅很必要,而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二,改进创新教学模式与手段是实现红色文化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和纵深化。在当今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面对当前学生特有的心理特征和时代要求,让红色文化走进课堂,走进思政课实践教学,必须采用符合学生心理需要和教育教学规律,自然而然地进入学生的视野,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第三,多措并举齐心协力加强校园文化中的红色文化建设。首先,营造良好氛围,开展

多种红色文化活动。其次,拓宽隐性教育,提升参与度,培育家国情怀。第四,发挥多元网络传播途径来打造无处不在的红色文化。准确融合红色文化资源的时代元素,将红色文化融入现代智能成果之中,通过更加生动形象又互动沟通的表达方式,增强红色文化的穿透力和时代魅力。第五,红色文化与当地红色元素有机组合。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增强历史认同感和使命感,是提高思政课实效性的不可替代的环节。〔19〕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红色文化资源对于革命老区农村的发展作用日益凸显。刘艳冬认为,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能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也能激活乡村经济发展,可通过招商引资,生产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高水平的红色文化服务,能激活老区乡村文化市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可解决地方财政困境,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农家红色民宿、“忆苦思甜”餐饮等方式,既可传承、保护红色文化资源,又能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从而盘活地方经济。〔20〕

田静、魏榛和乔宁认为,西柏坡红色文化对思政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化意识形态功能。西柏坡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基础上烙下的红色印记,是我国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反映着时代精神风貌,具有非常强的德育功能。将西柏坡红色文化有效渗透到思政教育中,既有利于强化思政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又有利于红色传统的发挥与红色基因的传承。第二,提升思政教育实效。西柏坡红色文化资源能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兼具说服力、生动性的现实素材,有助于将热爱祖国、艰苦奋斗、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等高尚情怀传递给学生。可借助西柏坡红色文化对学生进行教育,尽可能避免不良文化侵蚀学生思想,使学生的政治信念更为坚定,促进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第三,指引思政教育方向。西柏坡红色文化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其丰富的内涵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正确的、科学的价值导向。〔21〕

牛余庆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

积累的先进文化。体现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精神风貌等层面,融注于物质遗存、机制行为和文化艺术形态当中。红色文化集中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和为民情怀。在新时代,要把保护、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作为战略工程、铸魂工程来抓,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功绩感召人,用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人。同时,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不断为革命传统教育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切实把红色文化弘扬好、传承好。〔22〕

(三) 关于乡村文明建设实践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对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繁荣乡村的精神文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冯荣珍、商金芳认为,农村社区教育能够充分发挥知识、人才、文化和制度的作用,更有效地提升农民各方面的能力,从而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是乡风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农村社区教育可以从区域文化、乡土文化着手,深挖乡土文化资源的内涵,进行提高乡土文化意识,认清乡土文化的真正价值,从行动上延承文化根脉,实现乡风文明,是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动力;农村社区教育可以通过社区制度,构建“清洁的村容村貌,蓝天白云下的绿水青山”,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23〕

高玉敏、王欢和纪芬叶认为,河北省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大力发展乡村教育,烛照乡风文明的传承。要大力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优化乡村教师队伍,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让教师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安心教书育人;以传承乡土文明为旨归,调整乡村学校办学理念,倡导乡村学校引导学生认知、了解家乡的自然、历史、社会,正确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感受家乡变化和发展,激发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感;以“新课改”为契机,尝试构建体现地方特色的乡土教育课程。二是切实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强化“文明乡风”观念,加大宣传力度,切实让村民了解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创新方式,积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担负着提升

农民精神风貌、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步的重要使命，对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有重要作用。^[24]

张瑞静认为，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他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千百年留下的文化，是艺术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用各个领域中和能力和才华的结晶。它反映着乡村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是今天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尚未消失的历史真实。保护不是让它们进入博物馆，也不是让农村生活再倒退，而是要把这些传统文化积淀变成我们未来文化创造的源泉。所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未雨绸缪，防止本已脆弱的乡土文化断裂。对乡土文化最有效的保护是积极的全方位的延承。所谓“积极的延承”指的是：既要继承乡土文化传统的东西，也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所谓“全方位的延承”指的是：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文脉”，也要有选择地沿承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人脉”，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即“形似”），也要注意延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即“神似”）。^[25]

（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杨文华、王竹认为，“两山”理论是一种生态价值观，它在理论维度上明确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取向；“两山”理论又是一种生态方法论，它在实践维度上指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第一，新时代生态实践应以“两山”理论为指导。“两山”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理论品格，同时也秉持生态正义的伦理原则。它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指导，也将在实践领域开创中国特色绿色发展道路。第二，改造“经济人”，培育“生态人”。“两山”理论的生态主体，是“生态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首要的是主体建设，“两山”理论要求培育新型主体，变“经济人”为“生态人”，创造真正的生态文明。这种“生态人”，应将生态意识根植于心，当“生态人”在全社会范围彻底取代了“经济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才可能得以建成。第三，深化绿色发展，发展绿色生产力。“两山”理论深化

了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了生态根治之路，就是以根治生态问题为宗旨，发展绿色生产力，发展新型生态经济，就是要转变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消除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第四，构建生态共同体。“两山”理论的生态目标，是打破民族、国家、文化、宗教的藩篱，突破时间与地理空间界限，在全国范围内，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生态共同体，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体现了大国责任担当和深远的人类情怀。因此，它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如此，绿水青山才会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26]

人的生态化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马军红、刘会娟认为，人是文明演进的主体，对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生文明形态，其生成与发展需要生态化的主体进行引领和担当。这就要求作为生态文明主体承担者的人，觉醒生态本性，回归生态本性，求真、向善、审美，具有明确的生态追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与担当。人是自然的有机存在物，是自然整体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人的自然其本身就失去了灵魂。文明是人化自然的具体体现，人化自然就是人类以自身发展为基础对自然的改造与实践。生态文明是作为自然万物之灵的人类对其占有自然、践踏自然深刻反思和痛彻醒悟的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创新发展。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需要人以及人类社会合理地、生态化的发展。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就要关注人的生态化发展，使人从生态资源的消费者转变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及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突破文明发展瓶颈，化解人与自然矛盾，这是生态文明对其主体承担者的本质要求，同时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的支撑。^[27]

（五）关于廉政文化建设实践

郭超认为，公安院校廉政文化是在公安院校的特定环境中开展的，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为内核，为培养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廉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开展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相关文化活动。公安院校廉政文化的核心，既包含了“廉”字文化，也包含了“警”字文化，“廉”字文化

是公安院校廉政文化的基础,“警”字文化是公安院校廉政文化的特色体现,同时也是公安院校师生的价值认同和精神纽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重要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廉政文化是增强正能量的有力支撑。通过激发廉政文化蕴含的强大内生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思想的滋生和渗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基层建设提供组织保障。第二,廉政文化是提高党性修养的重要阵地。公安院校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群体的文化,成为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传承红色基因、筑牢思想防线、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和向腐朽思想作斗争的前沿阵地。第三,廉政文化是促进校园和谐的基本因素。廉政文化所蕴含的导向性和约束性作用,以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抓手,为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28]

王胜国认为,家训是中国古代家庭(族)长辈为教育晚辈如何为人处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是一家(族)的“行为之纲”,有引领、影响家风(门风)的形成,以及陶冶家庭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行为作风的功能。其中有关勤俭、淡泊、廉洁等内容,具有廉政教育的性质与作用,为古代清官廉吏的早期成长打下了“廉洁自律”的思想烙印和道德底色。古代家训就是最好的家庭廉政教育、品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教科书,认真借鉴、遵循和弘扬家训中廉政教育的思想精华,对晚辈的健康成长、较早形成拒腐反贪的思想意识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与作用。研究、挖掘古代家训的廉政教育功能对当今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29]

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研究

(一) 关于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韩立红认为,坚定理想信念,一是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中国改革成功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二是表现为对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是支撑我们党历经磨难、愈挫愈勇、不懈奋斗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党取得各种胜利、享受胜利的喜悦而不骄不躁、继续前行的精神动力。三是表现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信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生动、最具体的可触摸的理想,体现了我们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更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信心。四是一种思想境界,也是一种实践行动。理想信念需要精神上的坚守,更需要实践中的落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100年也是为实现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实践的100年,其中充满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30]

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核,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征程的经验总结,也是新征程上铸就新辉煌的强大精神力量。杨东广认为,一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高举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竖起心中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二要坚守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支柱。三要共筑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对党忠诚中坚守理想信念,在强化理论武装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传承理想信念,在伟大斗争中砥砺理想信念。^[31]

(二) 关于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

阎妍认为,爱国主义情怀的本质要义单从字面意思理解,爱国主义情怀是由爱国主义和情怀组成的。具体来讲,克己奉公,用自己的劳动获取相应报酬,养护自己和家人,不靠吃救济拖国家后腿;看到被别人压迫的国人,就有挥动武器跑上去的冲动;看到贫苦同胞,就会有节衣缩食而帮助之的心动;看到祖国各项技术赶超发达国家,就会有振奋和感动;看到站起来和倒下去的英雄,会有忍不住泪洒衣襟的颤动。这种个人对祖国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情绪,是一种心理感

怀,是维护与热爱的共情力,也是一种担当胸怀。这就是爱国主义情怀。^[32]

戴建兵认为,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就必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3]

新时代,深入推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涵养学生家国情怀上下功夫。曹婷婷认为,这是因为家国情怀既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核心与价值逻辑,又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需要,更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所在。新时代,涵养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立足关键课程,充分挖掘教材的家国情怀教育因素,有目的、有计划地涵养学生家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二是应注重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传播中华经典文化,赓续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认同,弘扬正能量;三是开发乡土课程,尤其是开发蕴含革命文化的乡土课程,促使学生感受家乡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帮助学生将对家乡的情感和对革命英烈的崇敬转化为继承革命遗志、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四是必须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关注国家大事,关心社会热点,把个人前途与祖国发展命运紧密相连,立志奉献祖国。^[34]

宋秋英认为,家国情怀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价值意蕴。家国情怀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民族乃至国家的深情厚爱和真切关怀,主要包括对家庭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认同、维护和坚守,并为了达到家兴人旺、国泰民安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人生境界。而中华民族“家”

文化与家国情怀在文化认同观、族群归属感、集体责任心等精神实质上具有诸多共通、融贯之处。一方面,中华民族“家”文化充分体现着“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的基本内涵,在培育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家国情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家国情怀引导和规范着中华民族“家”文化的演进方向,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家”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已成为新时代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35]

(三) 关于建党精神

许金哲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土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追求着理想、增强着修养、把握着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人为本、崇尚和合、求同存异等文化传统和优秀美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涵容着中国人古往今来博大、淳朴、深沉的精神价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是秉承着这份宽宏、温良、厚重的优秀文化传统,并把这一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真理有机结合,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思想”就秉承着博大、温良的人文精神,譬如孟子所说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就体现了一种仁者爱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作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负人民”的传统文化来源;再如《中庸》中所谈道:“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也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勇气”也是通行古今天下的美德。这种勇气并非是不守规矩的盲目蛮干,而是拥有“新时代四有军人之品格”:有灵魂、有品德、有血性、有本事,这才是真正的勇气的体现。这种“勇气”体现在伟大建党精神中,那就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36]

侯贵星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育人价值,自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引导和激励新时代大学生赓续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锤

炼品德修养、提升素质能力,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重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强化思想引导,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融入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培养,引导大学生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认同上,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二是创新课堂教学,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融入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思政课政治性与学理性、价值性与知识性的统一。三是传承红色基因,将“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使大学生不断融入其中,把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四是厚植家国情怀,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融入创新创业实践,引导大学生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书写青春华章。^[37]

(四) 关于西柏坡精神

戴建兵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至上精神”“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也可以概括为“两个敢于、两个一切、两个善于、两个务必”。其表现的时代价值:一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三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强大武器。四是实现中国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保障。^[38]

姚志军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精神坐标、接力赶考的重要精神指南。新时代党员干部传承弘扬西柏坡精神,必须用“两个务必”精神筑牢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党本色;必须用“两个一切”精神指引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追求和人民立场;必须用“两个善于”精神拓展践行初心使命的执政方略;必须用“两个敢于”精神指导投身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39]

让西柏坡精神在新的征程上绽放时代光芒,陈秀梅认为,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居安思危、迎接挑战的“赶考”精神。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历史,就是一部“赶考”史。新的征程上,“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就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迎接新挑战和善始善终。第二,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新的征程上,“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两个务必”的政治本色永远不能丢。继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品质和节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第三,必须始终锻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新的征程上,“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需要继承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要坚定敢于斗争的信念,保持敢于胜利的勇气,具备攻坚克难的高超本领,才能在攻坚克难的道路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40]

(五) 关于抗疫精神

抗疫精神对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价值。魏勃、唐军栋认为,抗疫精神的“生命至上”与医学生誓言中“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弘扬抗疫精神的“举国同心”应与医学生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有机结合;抗疫精神的“舍生忘死”集中体现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应在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力弘扬;抗疫精神的“尊重科学”与培养医学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专业素质相结合;抗疫精神的“命运与共”与培养医学生树立“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意识相结合。这些应得到思政课教师的充分重视。将抗疫精神融入医学生“形势与政策”课,能提高医学生对思政理论课的学习兴趣,并增强医学生的专业学习动力。高校应进一步挖掘思政课和医学生兴趣的有效结合点,充分发挥抗疫精神对医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建立抗疫精神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41]

王朝朝、牛立蕊和朱思慧等认为,抗疫精神作为思政教育的鲜活素材,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与思政教育关注社会、贴近实际的要求相耦合。抗疫精神的弘扬与高校思政课教学目标有同样的方向,在具体知识点的结合上更是丰富多样。讲好抗疫故事,用抗疫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奋斗精神、担当精神和涌现出来的英雄

人物、事迹作为思政课的优质资源,及时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在正确舆论的引导下,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辨别事物的能力,进而树立正确的三观;将抗疫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至上的仁爱精神、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心怀天下的担当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中,用真实感人的事件去教育他们、感染他们,培养他们的优良品德,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注入动力,增强防范和抵制消极思潮和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筑牢防护网,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42]

(六) 关于塞罕坝精神

康振海认为,塞罕坝精神,在创造从茫茫荒漠到“绿色屏障”的生态修复奇迹中孕育形成,在不懈奋斗中铸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精神动力,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塞罕坝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造了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美好现实,不仅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也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样本、贡献了中国经验;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的嘱托,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懈奋斗。^[43]

刘书越认为,塞罕坝人种下的不仅是树,更是一种精神;造就的不仅是“美丽高岭”,更是“精神高地”。塞罕坝的成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的支撑,靠的就是这种精神的引领;塞罕坝精神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的密码,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们的崇高品格,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我们要大力弘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在美丽中国长卷上谱写绿意盎然的河北篇章。^[44]

(七) 关于三牛精神

王菲认为,大力发扬孺子牛精神,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鞠躬尽瘁、无私奉献,

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大力发扬拓荒牛精神,在新征程上,要大力发扬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大力发扬老黄牛精神,在新征程上,我们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努力戒除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杜绝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埋头苦干,奋发进取、事争一流。^[45]

综上所述,虽然河北社科理论专家学者在精神文明研究的纵向与横向领域较深,但2021年的研究力度略显不够,在精神文明实践研究和伟大建党精神研究方面略显不足。社科理论工作者要积极拓展研究领域,紧抓热点、重点问题,展开有效地探索研究与思考。

(郑英霞、鲍志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 [1]杨福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N].河北日报,2021-09-24.
- [2]李浩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的构建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5).
- [3]岳志荣,梁颖杰,王海军,赵晓红.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J].当代体育科技,2021(30).
- [4]何新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大学生意识形态共识的思[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5]郑恩兵.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N].河北日报,2021-09-15.
- [6]王书芹,申志宏,贾晓敏.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思想[J].邯郸学院学报,2021(3).
- [7]刁若非,杜磊.全媒体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性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8]李苗苗.新时代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融通[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1).
- [9]秦宁波.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年审视[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10]田苗,宋土顺,王燕敏,黄晓丽,田壮.燕赵精神在文化载体中的体现[J].新闻研究导刊,2021(14).
- [11]李治勇,王建波.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及其应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6).
- [12]田海舰,冯艳彬.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四维向度研究

- [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9-28.
- [13]袁菲.全媒体时代网络文化传播策略[J].采写编,2021(5).
- [14]田海舰,李慧娟.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15]辛文卿.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情报工作与红色文化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2021(5).
- [16]王小丽,李瑞杰,勾正刚.河北省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及经验探讨[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21(5).
- [17]祁刚利,李鹏,曹海霞.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治理整合与旅游开发研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3).
- [18]马瑞贤,张楠楠,杨国藏.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对策研究[J].科技传播,2021(4上).
- [19]宇小兵,曹宇.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探索与思考[J].文化产业,2021(5).
- [20]刘艳冬.红色文化助推河北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措施[J].乡村科技,2021(1中).
- [21]田静,魏榛,乔宁.论西柏坡红色文化的传承及其价值[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10).
- [22]牛余庆.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N].河北日报,2021-04-07.
- [23]冯荣珍,商金芳.农村社区教育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6).
- [24]高玉敏,王欢,纪芬叶.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北方经济,2021(4).
- [25]张瑞静.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探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3).
- [26]杨文华,王竹.“两山”理论的生态诠释——兼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J].学习论坛,2021(3).
- [27]马军红,刘会娟.基于生态文明视域的人的生态化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2021(2).
- [28]郭超.关于新时期公安院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J].武警学院学报,2021(11).
- [29]王胜国.家训、家风的廉政建设价值——中国古代家训廉政教育功能探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21(2).
- [30]韩立红.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J].共产党员,2021(10上).
- [31]杨东广.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N].河北日报,2021-10-13.
- [32]阎妍.爱国主义情怀:本质要义·核心内容·价值品性[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4).
- [33]戴建兵.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J].红旗文稿,2021(21).
- [34]曹婷婷.涵养学生家国情怀的理性之思与践行之路[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5).
- [35]宋秋英.家国情怀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实质[J].今古文创,2021年(29).
- [36]许金哲.伟大建党精神的来源和深刻内涵[J].党史博采,2021(10).
- [37]侯贵星.自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N].河北日报,2021-11-05.
- [38]戴建兵.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J].人民教育,2021(10).
- [39]姚志军.西柏坡精神是新时代“赶考”强大动力[N].中国教育报,2021-05-27.
- [40]陈秀梅.让西柏坡精神在新的征程上绽放时代光芒[N].天津日报,2021-08-30.
- [41]魏勃,唐军栋.抗疫精神对医学生思政教育的独特价值及应用[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42]王朝朝,牛立蕊,朱思慧,茹鹏浩,刘玮琦.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途径及作用[J].现代商贸工业,2021(22).
- [43]康振海.弘扬塞罕坝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N].河北日报,2021-09-01.
- [44]刘书越.弘扬塞罕坝精神加快建设美丽河北[N].河北日报,2021-06-09.
- [45]王菲.大力发扬“三牛”精神[N].河北日报,2021-02-24.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田海舰

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继续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政课与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伟大建党精神等领域和维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价值。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工作研究

田海舰提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要从培育“时代新人”入手。“时代新人”必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要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有道德、有力量。其中，有理想是灵魂，有本领是基础，有担当是关键，有道德是前提，有力量是保障。在当代中国，只有做到坚定信仰、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崇德扬善、勇于开拓，才能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

魏榛认为，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逐步应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了很大改变，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信息化、可视化、灵活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着话语信息主导地位弱化、话语内容价值面临挑战、话语方式不被接受的困境。因此，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就要提升教育主体话语数据信息处理能力，在话语内容中融入可视化数据话语，改变单向灌输话语方式，建立话语反馈机制。^[2]

申文杰、赵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立足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重要论述的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培育奋斗精神；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弘扬劳动精神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方式重要论述的话语体系主要包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推出更多高水平教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格局；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到个人；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育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3]

张勇等主张，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党性修养、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知识、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目前，高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够；教师工作方法陈旧、延展性不强；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落实不到位。因此，要构建两者协同育人环境，

完善工作机制，塑造高素质师资队伍，丰富教育教学形式的途径，促进二者的有效融合，满足培育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需要。^[4]

谢俊霞等提出，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任务，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生命线，能够起到对大学生引导、服务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人才培养深度融合，能够以积极舆论引导思想行为，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提升法治素养，塑造品格与行为；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开发潜能。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人才培养深度融合需要保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让大学生形成优秀道德品质；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培养民族精神；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全面展开意识形态教育；具备前瞻意识，构建良好的育人体系；及时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提高学生心理素质，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品质人才。^[5]

马春燕等认为，高校辅导员肩负着教育、指导、管理和服务学生的重要职责。辅导员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具体来说，就是采用多样化的情感沟通方法，建立良好的沟通，掌握学生心理动态，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提升辅导员工作温度；通过主题班会传递给学生正确的教育内容，以理服人；培养学生法治思维，制定班级管理规章制度，公平公正公开服务好学生。通过“情”“理”“法”三轮驱动，提高新时代辅导员工作质量。^[6]

张乃芳、潘婷认为，新工科建设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而信息化时代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运用新信息技术手段和平台的可能。高校工科班主任要紧扣新工科建设的要求，通过新信息技术平台与学生进行充分互动要兼顾“点线面”结合三个维度。点线面的结合工作设计思路在“点”的维度：结合学生兴趣点，推进思考深度；“线”的维度：设计系列问题，引导关注方向；“面”的维度：服务学生成长，安排互动布局。点线面结合的工作成效在“点”的维度：关注个体的成长特殊性，有效激发学生的内在信心；“线”的维度：保持长线追踪，助力学生的过程性成长；“面”的维度：通过师生和生生间的多重互动，增强了集体

归属感。点线面结合的工作给予高校班主任的启示是，“点”的维度：从小处着手，以点带面；“线”的维度：主动求变，过程引导；“面”的维度：大处着眼，整体布局。^[7]

马京伟提出，在高校学生工作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十分必要，且二者所拥有的共性为融合提供了可行性。当前融合工作面临着来源于学生、教师、管理者以及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困境。两者的有效融合需要树立学生本位观，提升服务意识，加强人文关怀；注重规章制度的完善，保证融合的规范性；积极开展校园活动，促进二者融合；注重教师能力的增长，营造良好融合环境；利用新媒体环境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8]

温玲子、许新国认为，“互联网+思政育人”是提升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实效的重要途径。目前，高职院校“互联网+思政育人”面临着许多机遇与挑战，存在着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思政教育队伍结构不合理以及育人平台吸引力不强的问题。因此，高职院校“互联网+思政育人”工作要顺应时代发展，筑牢“互联网+思政育人”阵地；构建育人机制，搭建“互联网+思政育人”平台；培养专业队伍，实现“互联网+思政育人”目标；创建精品课程，塑造“互联网+思政育人”品牌；营造校园文化，打造“互联网+思政育人”空间。^[9]

李光伟认为，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使用互联网以及配套科技所体现的优势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可以实现双向互动、宣传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得到丰富、保障教育实践性等方面。因此，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应积极借助互联网平台，探索使用网络技术的合理路径，通过整合各项资源，改善校园网络、提升其思想引领能力，建设文明绿色的互联网生态等方式改进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党建工作不能缺位。而高校教师在使用相关技术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问题，为此，需要强化个人综合职业素养，提升自身对先进技术的接纳程度，努力成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优秀高校思政教师。^[10]

龚继峰提出，素质教育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立德树人教育背景和以人为本原则，积极探索符合教学现状和学生发

展要求的人文化教育模式，已经成为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开展的内在要求。在高校思政教学中，存在着忽视大学生主体地位、思政教育知行失衡、思政教育脱离生活实际等问题。基于此，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人文化教育应基于科学理论指导，转变思政教育观念；建立以人为本的思政教育范式；积极创新思政教育教学方法；创新学生思政教育的服务体系；优化高校学生的实践管理。^[11]

蔡元元、马铮认为，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举措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快速发展与不确定性兼具的经济环境、长期稳定与个别隐患共生的政治环境以及主基调鲜明与异曲杂陈的文化思想环境。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应顺应环境之变，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手段四方面进一步探索可行之路。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遍性、意识形态性、主体自觉、教育职能四个维度上，与基层党建、思政引领、制度保障、工会管理高度契合，对于产业工人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2]

周立军主张，新时代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面临新要求、新任务和新使命，教育方法现代化是形成教育合力和应对新变化的需要。新时代公安院校的思想教育承担着为党为国家培养政治过硬、道德高尚的忠诚卫士的重任。从实际出发，构建和设计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实现这一重任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新时代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要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需要强化理论武装，实施理论灌输法；构建实践平台，实施实践锤炼法；注重以文化人，实施文化熏陶法；借助网络力量，实施网络教育法；发挥榜样力量，实施典型示范法；注重人文关怀，实施心理疏导法。^[13]

龙春霞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其依存环境之间关系及结构的总和，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包含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及其效果有影响的所有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总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具有教育环体、介体、主体、客体的特殊性。从生态学视角诊疗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现存在着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个别主体和客体生态位失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动态失衡

且缺乏交互、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演替迟缓、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生态体验空间狭窄的问题,需要树立大生态系统教育理念、创建协同教育机制、创造多维镶嵌的生态环境、关注种群的适应性和多样性、关注群落的边缘性和演替、拓展每个子系统的体验空间,建构新时代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14]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研究

张剑英等认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是推动现阶段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战略任务,是推动高校思政课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培育大学生正确“三观”的现实需要,是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应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通过融入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教研和科研的路径,实现“原理”课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增强教学的实效性。^[15]

李艺潇等认为,思政课教学实践运用“对分课堂”已经是大势所趋。新时代的青年学生群体对于思政课堂教学有着新的要求,要在把握青年学生身心特点、心智模式和学习偏好的基础上对思政课“对分课堂”运行模式进行阐述,对教学效果进行评析,对课堂讲授、内化、讨论等环节给出推进路径。思政课实践运用“对分课堂”,不但可以让学生全身心参与其中,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还能通过挖掘“师生共同体”的力量,激发出学生更强烈的学习动机,提升其学习自觉性。^[16]

闵杰认为,高校音乐美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传统的思政教育方法已经不适用于现代教学的发展,通过调查当代大学生的休闲方式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听音乐和看影视作品有着很大的兴趣,所以将音乐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是十分必要的。音乐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有利于大学生接受思政教育,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要在思政课堂上巧用音乐,用音乐形式演绎思政课程,充分挖掘红色音乐的思政育人功能。^[17]

杨芷郁认为,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应以价值引领为使命担当,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模式,课前要开展学生情况调研、了解学生思想状况;课中关注学生课堂表现和教学效果;课后根据学生情况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最真实的时事、最鲜活的案例;通过设计科学合理有效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法和体系,努力构建思政课师生沟通平台,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时效性。在实践中,需要精心设计教学目标,认知认同上拓展广度深度;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理论阐释上把握时代脉搏;灵活多样教学方法,实践运行上形成协同效应;合情合理考核方式,制度推进上建立长效机制。^[18]

闫晓静等认为,高校要依托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将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通过联系党史理论要素,讲好思政课程中的教学内容;挖掘党史学习实践要素,开展红色主题的特色活动,充分利用社会实践教育教学基地,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引导广大学生自我教育,将党史知识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优化思政课教学效果体系,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19]

宇小兵、张晓星认为,实践教学已经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既是思政课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思政课教学目标的实现桥梁和途径所在。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导致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不理想,特别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考验和挑战,实践教学环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和凸显,探索适合本课程特点的实践教学路径已成为提高“思政课”实效性的重要策略。因此,要真抓实干加强学校顶层设计,切实做好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围绕思政课实践教学总目标和总要求,加强校内教育教学资源整合和调配,探索实践教学的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着力解决实践教学连贯性差、系统性强、交叉重复、随意性强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实践教学上高校应立足自身特色,充分利用所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学生家乡的红色资源优势,探索多种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方案,有效连接理论内容和社会实践的统—性。^[20]

孟祥林、常新悦认为,讨论型课堂可以活跃课堂氛围,将社会热点问题切入课堂,在教师的

引导下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了提升课堂质量,教师要在讨论型思政课堂的讨论形式设计、论题选取、测评指标、过程控制、预期收益评价等方面进行合理把控,使得课堂按照教学计划进行。但讨论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师不但要有坚实的理论功底,而且要能够及时把控课堂状态,并在讨论课堂的结尾进行精彩点评。同时,教师需要在发言成绩的评定制度上做到公正和科学,以提升学生的参与热情和教师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无论是诱导性课堂还是辩论型课堂,为了保证课堂讨论的效果,教师要在课前做好充分准备,确定合适的讨论选题、科学的评分标准、控制好讨论的方向和进程,不断锻炼捕捉社会热点和依托理论对学生发言中点出的问题进行阐释的能力。^[21]

贺桂欣、吴向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在思政课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故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属双赢之选。在“中国故事”进课堂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西方故事过多,忽略中国元素;讲述维度单一,忽略故事的全面立体形象;就事论事,忽视思想挖掘;平铺直叙,感染力不足;教师讲解多,师生互动少。对此,教师应在故事选择、讲述方式、增强说服力方面不断创新,实现知信行的统一。^[22]

刘容箏提出,教育理念的转变是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关键,OBE理念是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是驱动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新引擎。基于OBE理念的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需要设定课程预期教学目标,包括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反向设置教学内容,教学内容要强调政治引领、着眼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体现实践要求;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学生为中心”,在充分了解学生年龄特点、学习需求、职业需要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构建多元考核评价方式,针对教学内容、教学组织等采取多元化考核评价,对学习过程和考核每个环节的学习成果进行监控,最后在学习结束时达成综合性评价,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质量以及学习能力和素质的提升。^[23]

三、课程思政研究

刘晓晨认为,河北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

思政文化,可从成语典故、红色太行、民间艺术三个方面,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需求,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使高校大学生深刻理解历史文化魅力,进而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实现远大理想而积极努力。近年来,各高校对“大思政”格局下专业课的思政教育非常重视,可以从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历史文化“仪式感”;借力文化产业发展,树立职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开展课程思政翻转课堂,发挥经典著作和新媒体合力等方面去积极推进河北历史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24]

王钟杰、王晓亚认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力量是教师,高校教师既要有师德素养,又要有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需要思想自觉,做到提师能、立师品、强师知、重师爱。需要行动科学,做到聚焦立德树人,提升思政资源开发能力实现与思想的契合;立足专业课程,增强思政内容组织能力实现与教材的耦合;坚持润物无声,培养课程思政实践能力实现与教学的融合。需要制度激励,做到在“课程思政”实施前建立培训机制,实践中运行激励机制,推行后启动评价机制。^[25]

孙青辉等认为,课程思政以立德树人为教育之本,体现了“以德为先”的课程价值趋向,构建了“立德”与“求知”协同的课程观,“立德树人”与“课程思政”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和逻辑契合性。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公安院校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融合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合理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形成育人合力。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要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和水平、打造课程思政建设资源平台、健全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和督导考核机制。^[26]

闫晓静等认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开展以来,针对课程思政中出现的“教师课程思政能力不高”“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课堂教学效果不强”“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科学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四大体系”,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构建课程思政队伍体系;加强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构建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加强课堂教学建设,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加

强激励评价机制建设,构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以切实增强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效性。^[27]

梅瑞斌等认为,课堂教学作为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主渠道是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课程思政建设体系构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考核激励为实施原动力,教学驱动为建设主干道,效果评价为检验成效。通过课程思政的价值典范设计和课程思政价值典范和元素的挖掘,将更多案例融入课程思政中,同时强化教学主体,丰富教学资源,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教学中。^[28]

陈海菊等认为,现阶段高等教育需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广度和深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以思政课为课堂教学主渠道的背景下,课程思政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此,以就业类课程思政教育为视角,要正视目前课程思政中存在的问题,从强化“三观”教育、创设思政校园环境,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运行体制机制,打造优质师资队伍、重视课程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29]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教育研究

田海舰、李阎提出,新时代“人民英雄观”是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英雄观。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激励和鞭策作用、唤醒和激活作用、辨识和警示作用、团结和凝聚作用。为了发挥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最大效应,在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的宣传和教育中,要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先进性,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的人民性,鉴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正确性,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效性。^[30]

张蓓蓓认为,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在于认知认同,贵在坚持知行合一。通过对河北省8所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实证调研发现,目前河北省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上总体向好,但存在着认知的完整性和深度不够、情感认同的稳定性不足、边缘化认同和功利化行为、知行不一等问题。基于影响因素的分析,应尊重学生个性特征,实施分层

分类的教育引导;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落细落小落实;构建“三位一体”长效机制,形成协同联动的教育合力,切实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31]

田海舰、李慧娟主张,建党百年,加快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有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推动河北红色革命文化得到切实有效传播,必须加快构建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从传播主体维度看,政府、学校、社会要相互配合、协同创新;从传播内容维度看,要系统整合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理直气壮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从传播路径方法看,实现学校教育、理论宣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从传播载体维度看,推动传统媒体传播与新媒体传播相互融合;从传播方式维度看,推动红色革命文化公益化宣传与产业化传播协调发展,致力于形成受众广泛、立体化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格局,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32]

宇小兵、曹宇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品格,红色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是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追求所在。传播红色文化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力抓手,改进创新教学模式与手段是实现红色文化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和纵深化,要通过多措并举齐心协力加强校园文化中的红色文化建设,发挥多元网络传播途径来打造无处不在的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与当地红色元素有机结合使红色文化融合进思政课的实践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合格接班人,肩负起铸魂育人的光荣使命。^[33]

马春燕等认为,要发挥红色文化人才培养、精神塑造、思政激励作用,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文化的路径包括: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建立红色文化的新媒体宣传阵地;将“红色元素”融入校园文化中,塑造大学生的作风;将红色文化恰当地转化到思政文化,通过授课推进红色文化教育。^[34]

侯贵星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育人价值,自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引导和激励新时代大学生赓续

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锤炼品德修养、提升素质能力、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重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强化思想引导,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融入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培养;创新课堂教学,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融入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传承红色基因,将“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厚植家国情怀,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融入创新创业实践。^[35]

王朝朝等认为,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实现高校立德树人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抗疫精神是在我国与病毒作斗争实践中凝聚的,将抗疫精神与“党的领导”“以人为本”“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结合,彰显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充分发挥其加强爱国教育、提升民族自信,增进舆论引导、树立正确“三观”,培养优良品德、促进健康成长的作用。^[36]

综上所述,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更加聚焦热点与难点问题,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但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方面仍然比较薄弱,无论在研究方法和层次维度上,还是在研究质量和水平上,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田海舰: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田海舰.“时代新人”的基本内涵与培育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1(1).
- [2]魏榛.论提升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23).
- [3]申文杰,赵晗.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的话语体系探究[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4).
- [4]张勇,郭亚玲,李琳.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模式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5]谢俊霞,张丽娟,白清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机遇与挑战[J].黑河学院学报,2021(4).
- [6]马春燕,芦志超,吴玉婷.“情理法”三轮驱动探析高校辅导员思政育人工作路径[J].公关世界,2021(14).
- [7]张乃芳,潘婷.信息化时代工科班主任思政教育工作新探——基于点线面结合的工作实例分析[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1(4).
- [8]马京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学生工作的有效途径[J].才智,2021(11).
- [9]温玲子,许新国.高职院校“互联网+思政育人”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21(4).
- [10]李光伟.互联网助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J].党史博采(下),2021(2).
- [11]龚继峰.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化模式探析[J].文化学刊,2021(7).
- [12]蔡元元,马铮.新时代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境遇与应对之策[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5).
- [13]周立军.新时代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路径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2021(7).
- [14]龙春霞.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建构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9).
- [15]张剑英,付秀芬,李肖峰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16]李艺潇,张志超,冯泽冉.构建思政课“对分课堂”的几个问题[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23).
- [17]闵杰.高校音乐美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探究[J].决策探索(中),2021(2).
- [18]杨芷郁.“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研究[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19]闫晓静,孟梯清,贾耀忠.高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J].决策探索(中),2021(9).
- [20]宇小兵,张晓星.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探索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1(6).
- [21]孟祥林,常新悦.讨论型思政课堂的教学设计、过程控制与收益评价[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
- [22]贺桂欣,吴向宇.思政课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路创新[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1(1).
- [23]刘容箐.基于OBE理念的公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9).
- [24]刘晓晨.河北历史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8).
- [25]王钟杰,王晓亚.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1(10).
- [26]孙青辉,侯晓娜,董艳磊等.基于“立德树人”理念的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6).
- [27]闫晓静,张连春,孟梯清等.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1(9).

- [28]梅瑞斌,包立,王晓强等.“课程思政”建设体系与价值典范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29]陈海菊,侍朋宝,高欣等.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以就业类课程为视角[J].教育观察,2021(1).
- [30]田海舰,李阎.论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作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8).
- [31]张蓓蓓.新时代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以河北省高校为例[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32]田海舰,李慧娟.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33]宇小兵,曹宇.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探索与思考[J].文化产业,2021(15).
- [34]马春燕,李人杰,赵依洁.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文化研究[J].青春岁月,2021(12).
- [35]侯贵星.自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N].河北日报,2021-11-5(007).
- [36]王朝朝,牛立蕊,朱思慧等.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途径及作用[J].现代商贸工业,2021(22).

哲 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中外哲学研究

郝晏荣

总体概况

2021年度河北省哲学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研究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老一辈的领军学者仍有多篇重要研究成果问世,比如李振纲教授对老子思想的总结性研究、对孔子责任伦理的开创性研究等;比如程志华教授对王船山思想的深度拓展性研究等。本年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还展示了新生代的研究实力,比如王开元对孟子思想的别具一格的研究思路,以及对马一浮哲学的细致解析等。本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特别活跃繁华的气象:有黄云明教授对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多角度的研究成果展示。黄云明对马克思的劳动哲学研究多年,今年的研究成果格外显著;有宫敬才教授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进一步的深度开拓,以及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性描述。西方哲学研究中,张燕京、冯燕芳等专家的成果为相关领域增添了显耀的光色。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代砚春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解析这一现实问题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性、历史性的思维

方式。人们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消解资本主义制造的这种两极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将之作为人类当前所能达到的相对性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命运共同体”理论蕴含的思维方式必将呈现出一种无止境的历史指向性,一种辩证的历史活动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命运共同体”理念连接着马克思提出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向往,同时也连接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的愿景。“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规划。在以往的理解中,人们认识到制度建设是理性的产物,它具有强制性、普遍性、客观性等一系列基本属性,特别是在国家制度层面,它往往代表着一种强大的规范性和最高的确定性。“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辩证性、历史性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思想的继承和新时代表达;它保持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生态情怀,通过构筑社会实践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旨趣,塑造生态社会制度与人性之美。^[1]

代砚春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一种历史性思维、辩证性思维。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一种顺序性的、审美性的价值追求。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之上,通过重新确定现代人的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重塑了人们生

活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追求生态正义绝不能玩弄“辩证法”。例如，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设想，自然物会像奴隶受到压迫起来造反一样，突破自然的辩证法发展到极致对人类社会造成致命的威胁。自然不再作为被人类主体所征服和支配的客体，而是凌驾于主体之上，试图消灭主体。这就是说，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绝不是简单地将人与自然的传统地位进行粗陋的颠倒，以现代社会的价值崩溃来引起人们对自然的重新敬畏。同样，有的存在主义的思想家认为，人类想要突破当前的资本逻辑支配的生存困境的最好的方法是回到原始的交换社会中，过一种诗意的浪漫的复古式生活。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反对这种“倒退式”的价值设定和人本主义的方案。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是在反思和批判资本逻辑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事实前提下提出的，他注意到，危机同样是契机这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从生态视角出发，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的变革，生态问题由此上升为政治哲学问题。因此，它就必须落实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落实为一种以生态逻辑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2]

李维意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最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它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的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其中，马克思把第四个异化归结为交往异化。自社会形态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们的交往方式、目的、主体和中介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确实使人的交往范围扩大，内容充实，由简单交往变成了复杂交往。但人们不再是出于交往的需要而交往，而是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人的交往不再是平等自由的，而是受到了财产、阶级等外在因素的限制。于是，交往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深刻探究交往的异化，使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对人的交往及人的本身的压迫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作为马克思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异化交往理论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交往活动的压迫，还为我们审视现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现象把握异化交往的本质，消除人类交往的障碍，争取早

日实现人的自由平等的交往。^[3]

李维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发展和治理的罕见奇迹，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多个维度给予诠释，更需要从文明发展高度作出总体性、肯定性的回答。从文明论视角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旨趣和意义在于，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价值追求、正确激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牢牢掌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形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制度设计的践履，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制度创新，它选择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追求基于人类社会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建构是一个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超越过程，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劳动解放的“新世界”取代了资本统治的“旧世界”，为人类文明的长足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4]

李维意指出，太平洋是连接亚洲、美洲、大洋洲、南极洲的纽带。太平洋时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地域交往转化为全球交往的必然结果，是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结构的重新架构。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世界历史时空和世界市场体系的考察，预见太平洋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见太平洋将发挥“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开辟世界贸易新方向。对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解读，需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理论方法包括预测太平洋时代的阶级分析方法、研判太平洋时代的“人体解剖”方法、把握太平洋时代的世界历史方法、诊断太平洋时代的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价值意蕴表现为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化发展、世界历史的积极成果、世界经济贸易中心的转移、无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当代启示在于，必须理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利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必须顺应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大趋势，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必须打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必须抢抓太平洋时代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5]

李维意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是立足“整体人类”的价值主体立场、秉承“平等互重”的交往实践立场、恪守“多方参与”的多边主义立场、坚持“问题导向”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是维护“整体安全”的世界发展理念、反对“强权政治”的国际权力理念、突出“空间正义”的全球生态理念、追求“共建共享”的新型文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略是培育“共同价值”的化识成智方略、践行“商量着办”的协同解决方略、谋求“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赢方略、实现“制度公正”的行为规约方略。作为一种世界共同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价值立场、治理理念和构建方略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尊重世界各国的发展权利、道路选择,又积极寻求世界各国的共商共建、共赢共享,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中国方案。^[6]

李维意认为,唯物史观揭示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世界历史是人类类思维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类本质展现的社会空间。马克思类哲学首次把“真正的共同体”理解为人的类存在方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共同体问题是马克思类哲学关注和思考的核心论题之一,马克思从劳动本体论出发,赋予类概念全新的现实性内涵,探讨了基于类哲学的人类理想共同体的历史建构。类概念从现实的人出发,诠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否定性统一”和人与人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性统一”。类思维是一种超越“物种思维”和“直观思维”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类思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本质内涵。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劳动是共同体建构的基石。建构人类理想的共同体必须摆脱抽象社会力量的统治,始终坚持劳动社会化的主导地位,合理调节和有效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揭示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类哲学基础,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方向、思维方式和

理论支撑,进而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7]

黄云明认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出发分析、认识法律的发展史,为纷繁复杂的法律发展史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准确地阐发了法律不同类型的历史交替。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法律发展的根本动力,法律是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伴随着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不断变换其存在样式、价值取向。法律历史演化的轨迹是法律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物质生产劳动、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产品的丰富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时,产品的私人占有就变得没有意义,以维护物质财产关系为根本使命的法律也必然随之消亡。当然,法律的消失并不等于社会规则的消失,而只是社会规则失去了阶级性,社会规则不再需要国家这样的政治机构通过强力贯彻执行。^[8]

黄云明指出,马克思以劳动哲学为基础的法哲学,主张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把握法律事实与法律价值的辩证关系,法律价值既要适应法律事实,同时又要超越法律事实,引导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改造。马克思既反对资产阶级自然法学和理性法学的法律价值绝对主义,也反对实证主义分析法学的法律价值相对主义。马克思认为对正义、自由、平等等主要的法律价值观念的理解都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它们都是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物质生产劳动发展不断变化。法律价值观念的具体价值取向取决于物质生产劳动发展的水平。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念是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本质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捍卫资本的利益所得。社会主义法律价值观念是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其本质是维护与劳动创造等比例的利益所得。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那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进入历史博物馆了。^[9]

黄云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核心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载体。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语言进行过深刻的论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诸多文献中,都讲到语言表达

和语言思想,形成了包括语言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语言功能在内的比较系统的语言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语言方法论思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国际话语立体化的体系框架初步建立。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对外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愿景的重要前提。新时代提高国际话语权,建构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平等的对话权、世界公认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要抓住“黑天鹅”和“灰犀牛”频繁出现的契机,积极参与,主动发声,提升话语能力;要警惕西方的话语陷阱,坚持中国特色的价值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全球人类正义、和平和繁荣为终极目的,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10]

黄云明指出,道德起源论不仅是对社会道德现象产生过程的认识,而且是对人类为什么会创造道德文化的反思,甚至是对确立道德依据的追问。自古至今,哲学家对此给出了多种答案,包括道德的自然起源论、超自然起源论、天赋起源论、理性起源论、感性经验起源论等,但它们都未能揭示道德起源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通过对人类早期社会和古代社会劳动发展史的分析,揭示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物质生产劳动分工、剩余劳动产品产生、物质财富私有观念出现以及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形成在社会道德现象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道德起源的社会原因,在道德起源论上超越了以往哲学家对道德起源的认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从伦理学学术的视角阐发道德起源问题,这导致我国伦理学研究中关于马克思道德起源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争论各方都阐发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和社会分工在道德起源中作用的思想,但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带来的剩余劳动产品的产生、私有观念的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以及私有制的形成在道德起源中的根本作用等思想,忽视了马克思对道德起源根本社会原因的揭示。实际上,私有观念为道德起源准备了精神基础,私有财产为道德起源提供了物质基础,私有制为道德起源提供了制度基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为道

德起源提供了职业的伦理学家和道德建设者。^[11]

黄云明认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认识人类社会,认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都是实践的。社会道德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的关系决定人们的道德关系,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要在一定的客观物质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人们用于进行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劳动工具也是客观的,人们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不仅决定生产者本身也决定生产者之间的道德关系,甚至于人的自然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形式也是由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婚姻家庭的形式伴随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变化不断改变。社会道德关系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的客观基础。人们的道德思想观念既是对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反映,也是对社会道德关系的反映。社会道德关系是道德观念的基础,社会道德关系的特点决定道德观念的特点,社会道德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道德观念的发展变化。个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取决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决定的。^[12]

黄云明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有一个伴随其整体哲学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1835—1844年的前劳动哲学时期,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批判黑格尔的过程。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法学批判封建法学和法律制度,进而认识到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法学不能真正解释社会法律问题,初步认识到社会物质利益是法律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1845—1847年,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找到了破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的金钥匙,认识到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建构了由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和劳动历史观构成的劳动哲学体系,开始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去把握法律问题。1848—1870年,马克思运用劳动哲学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解剖,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1871—1883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进行了科学预测,晚年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用劳

动哲学阐释了法律起源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等重要的法哲学问题。^[13]

田海舰认为,意识形态与制度建设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固然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精良的装备作为重要物质基础,但同时也需要各种体制机制作为其制度保障。新时代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从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治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保障体系等层面入手,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完善网络资格审查制度和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加强互联网法律治理、行政治理、技术治理,完善互联网空间监测体系、舆情研判机制、应急预案机制、应对处置或危机处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健全社会赏罚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加强资金投入保障机制。^[14]

王贺认为,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物质交往伴随精神交往,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革命导致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发生了革命,虽然,资本主义实现了世界性的交往,并且使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当中。但是,资本主义文明带有侵略性、强制性和毁灭性,它迫使其他文明从属于自己的文明,使之成为世界文明的主导。马克思把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作为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文化交往的伦理旨趣建立在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基础上,使全球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彼此相互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由于地域性的差异,世界各民族呈现出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文化。随着人类交往的纵深发展,在越来越频繁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应当遵循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平等原则,不应强行推行资产阶级文化意欲取而代之,而应充分发扬所有文化的优点。^[15]

邹健指出,关于异化劳动的克服,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了一条科学的路径,即对私有财产也就是人的自我异化进行积极扬弃。这是人向自身,也就是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复归,是“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出路”。在马克思的逻辑体系中,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应是统一的整体,但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使得资本家为

了获得更多的私有财产而不断压迫和剥削劳动者,使得财富分配不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换言之,在私有制的影响下,不可能存在体现劳动者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真正的劳动。另外,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及,私有制使得某一对象只有被我们使用、被我们拥有时,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劳动者丧失了除人的本能之外的一切能力,尤其是丧失了实现人的类本质、证明人是作为人而存在的能力。异化劳动作为私有制的产物,从根源上扼杀了劳动者多彩的属性、丰富的能力,相应地留给劳动者单一的“动物性”、简单的能力。^[16]

冯燕芳认为,当马克思早期对人生和人类幸福作出思考的时候,他已经把正义思想作为他朴素的思考因素之一。马克思不满足现实的“合理”生活,他追求个人的生命意义是为了探求更为合理、正义的现世生活方式。从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来看,如果要探寻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最初源头,就不能忽视马克思中学作文中彰显出来的正义思想萌芽。中学作文是马克思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保存下来的有三篇,包括一篇宗教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至第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一篇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篇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这三篇作文都表达出要为人类整体谋取福利的思想。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萌芽就蕴藏在对世人幸福以及对世人不幸原因的追寻过程之中。^[17]

宫敬才认为,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事实观的批判相当成功且成果丰硕,具有多重意义。第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始终对经济事实秉持所谓客观中立的立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成为显学和主流后又试图给人造成印象,经济学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卢卡奇直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核即经济事实观,批判过程中揭示出其虚假的一面,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卢卡奇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事实观过程中不忘记批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事实观,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生态气质和“正统”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重新回到正确的出发点。第三,卢

卡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事实观过程中主要依据和引证的文献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为人们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哲学内容发挥了独特的启发和提示作用。第四，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事实观批判最直接的理论意义是为物化理论的提出和展开廓清场地，提供理论前提，使物化理论的指称对象即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以真实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18]

宫敬才认为，卢卡奇基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提出物化理论，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理解史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解史中被遮蔽的经济哲学内容出现在世人面前，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理解史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解史的根本性转向。卢卡奇主要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构建社会存在本体论，开拓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全新领域。晚年卢卡奇在经济哲学探索中犯有不少理论错误，此为理论悲剧。概览卢卡奇一生马克思经济哲学探索的结论如下：其一，卢卡奇哲学思想具有经济哲学性质，客观事实明证可鉴；其二，卢卡奇马克思经济哲学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意义的革命，发挥了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发现、恢复和展示于人的作用；其三，卢卡奇经济哲学思想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大理论事件，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阵营由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两强争雄变成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19]

宫敬才指出，在理解和评价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过程中，有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就是思想发育程度的界定问题。该问题以争论“《手稿》思想成熟与否”的形式出现，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细究之，成熟与不成熟之别的二分法是有些简单化之嫌，在纯哲学语境之中展开，难以反映《手稿》思想的真实状况及其与后继思想的真实关系。纯哲学语境的理解方式，使近百年来来的研究者多认为《巴黎手稿》的主题思想是人道主义及异化劳动理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研究者在对《巴黎手稿》的评价中形成了成熟论和不成熟论两种代表性观点，皆与《巴黎手稿》原生态思想不一致。《巴黎手稿》原生态语境是经济哲学，“经济”内容无法绕开，主题思想是质疑和

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巴黎手稿》中存在诸多理论缺陷，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的问题：费尔巴哈哲学的改造问题、人化自然辩证法问题、私有财产资本化的内在机制问题、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异化劳动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论证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问题。理论缺陷的存在促使马克思继续在思想上进行探索，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文献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也是弥补《巴黎手稿》理论缺陷的标志性文献。^[20]

宫敬才认为，从1999年俞吾金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提法算起，我国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专著相继问世，但瓶颈性问题凸显出来。作为边缘性交叉性学科的马克思经济哲学，自身的问题亟待厘清和研究。这样的问题有三个：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定义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厘清的前提是在自觉意识层面进行研究。与此直接相关，处于同样重要地位且亟待研究的是如下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和马克思经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和说明白，作为边缘性交叉性学科的马克思经济哲学，其相对独立性就无法显现出来。从历史角度看待马克思经济哲学，就能得到如下内容：第一，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的起源；第二，马克思经济哲学形成史；第三，马克思经济哲学发展史；第四，马克思经济哲学文献史；第五，马克思经济哲学理解史。就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研究现状说，人们并没有在自觉意识层面关注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的历史，研究成果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样的研究状况亟待改变。^[21]

宫敬才指出，从1923年卢卡奇批评恩格斯哲学到现在已有近百年历史，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讨论的话题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主导性判断是二者之间确有重大区别。卢卡奇批评率先触及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证明了事实的客观存在。在哲学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并非像后者表白的那样是“意见完全一致”，而是有不小区别。这样的事实表明一般性问题的客观存在：整体意

义的恩格斯哲学何谓?此为以往讨论忽略的问题。恩格斯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且成体系,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和思想来源三者皆可证。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如下几点:第一,设定哲学本体为物质,指称对象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第二,研究本体的哲学分析框架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第三,人对本体的反映是外在经验,理论表现形式为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第四,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哲学性抽象是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二者皆具辩证性质;第五,对外在经验的提炼概括是内在经验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此为基于实证科学而来的哲学,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哲学为多余。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存在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这是完善恩格斯哲学体系的必由之路。^[22]

宫敬才认为,我们的教科书冠以马克思之名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其中作为立论前提的哲学分析框架是由恩格斯提出和论证的,马克思哲学分析框架没有得到表示存在的机会。马克思有不同于恩格斯的哲学分析框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经典表述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容易理解的提法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语境中,这一关系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认知、实践和评价,而非像恩格斯哲学分析框架那样只涉及认知一个层面的内容。两种哲学分析框架具有各不相同的哲学性质。马克思哲学分析框架是一般意义的哲学分析框架,具有一般意义的哲学性质;恩格斯哲学分析框架具有特殊哲学性质,是特殊意义的哲学分析框架。两种哲学分析框架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分立并列关系,而是不同逻辑层面之间的主从关系。前者包括后者,后者存在于、从属于和服务于前者。^[23]

宫敬才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命题:“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命题内含经济哲学内容,概括性表述是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在马克思文献中,该逻辑存在于四种语境之中,即原生态语境、一般性理论语境、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和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不同语境中表现出来的逻辑样态各异,后人理解成百家争鸣之势,但其

中有的内容被忽略,如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的外力论;有的内容被主观性解读,如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农业公社命运的例外论。这种理论情势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问题: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东方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的外力论与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是什么关系?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语境中的例外论是马克思基本立场吗?如果是,该立场与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相冲突如何解释?为了维护一般性理论语境中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的纯正性,语境问题成为必须在自觉意识层面被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研究不同语境中马克思原生态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思想,是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任务。^[24]

宫敬才认为,马克思《巴黎手稿》自1932年正式发表到现在始终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核心是如何理解其中的人道主义和异化劳动理论,研究者以为这就是《巴黎手稿》的主题思想。这是纯哲学语境理解的结果,不符合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实际。《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有机统一的经济哲学语境,主题思想是质疑和批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这种主题思想的铸就与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时依凭的思想资源有直接关系,较有代表性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巴黎手稿》研究的历史明证可鉴,研究者们或是忽略部分思想资源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作用,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或是对部分思想资源的影响作用作出扭曲性判断,如对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判断。两种做法的共同作用使然,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语境和主题思想皆被误解。关注和研究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时依凭的思想资源问题,发现和揭示出二者之间细微且复杂的内在联系,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进入马克思当时的心智世界,进而准确全面地理解《巴黎手稿》的经济哲学语境和主题思想。^[25]

二、中国哲学

王开元指出,孟子人性思想之所以在后世获得广泛的讨论与阐释,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的解释空间,更重要的是作为孟子人性思想核心的性

善理念已经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这种超越性价值不在于设想了一个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幻象，而是根植于孟子对于人自身之独特能力的肯定。然而，如何理解孟子思想中人性的独特之处与崇高所在，在后世却有诸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孟子对人性的理解是从人禽之别的意义上来界定的，而孟子对人禽之别的判定在于为善的能力存在与否。因此，人性在孟子思想中绝不仅仅是一个本来如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够如何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可能的问题，即可以说在为善这一问题视域下，人性中有哪些先天属性与能力可以为其提供支撑。尽管孟子本人不曾有意在自然层面来区别人和禽兽，但是孟子在论述人性善时的一些预设，则可以为我们审视自然意义上的人禽之别提供有益的帮助。^[26]

王开元认为，自识是西方哲学所着重关注的一个课题，在中国哲学中，关于自身的认识同样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而考察孔子自识思想的价值即在于理解传统哲学是如何实现对自身认知的建构的。劳思光对孔子思想的评价是准确的，孔子也并未明确对自识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建构，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也缺乏一种对于建构路径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思想中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今天重思孔子的自识思想，即是寻求一种现代性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孔子对自身的理解，这一方面是为了揭示出孔子思想中有关自身认识的理念，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孔子思想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借此来展现孔子是如何对道德主体进行建构的。首先，对孔子自识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加以阐释，明确孔子对于自身的认知倾向；其次，借由对人身自身认识能力的分析来阐明孔子是如何对自身进行理解与建构的；最后，对孔子有关自身理解的问题进行总结，并试图挖掘这一理解的意义所在。孔子的自识思想启示我们要更为积极地去面对道德问题。对自身的认知建构，与对外部世界的建构不同，前者所涉及的是一种自身关系，即自身与自身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自身对自身主体有所自觉，也需要对自身的主观能力有足够的关注，只有这种对自身的真切关注，才能尊重自身与他人，也才能使我们在面对自我困境时有所自觉与担当。^[27]

王开元指出，在对《周易》中《咸》《恒》

二卦的解释上，历来学者以感释咸、以久释恒，对处下经之首的《咸》《恒》两卦具有较为一致的解释，而马一浮则另辟蹊径。他采用以卦象来阐释卦义的解释方式，其以《咸》卦统言、以《恒》卦统行，从而使《咸》《恒》两卦统言行、明人事，以与上经之旨相对应。马一浮的这种解释，与其观象达意的易学诠释思想相一致，亦能由此展开其六艺之教原统于《易》的理念。明白此意，方能对马一浮自身的哲学思想有真切的理解。历来对《咸》《恒》二卦的解释虽多能以相感与恒久训释，但对于相感之理与恒久之道的具体原则却有着并不一致的看法，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相同的主旨解释视为对卦义的还原性阐释，而把一些不同的解释视为创发性阐释。但是，考察马一浮对《咸》《恒》二卦的阐释，却能从中得见两种阐释方式的交融。^[28]

王开元指出，“思”字在《孟子》一书中总共出现44次，除作为人名与引《诗》之词外，亦出现了20次。王夫之在评论孟子“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时言：“孟子说此一‘思’字，是千古未发之藏”。孟子在论述自己性善观念时，即把“思”当作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为四端之心的扩充提供理论支撑。关于“思”这一概念，前人学者多有“思考、反思或反省”之解，但它所蕴含的多重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思”在孟子建构其人性论体系中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在认识论层面，“思”是一种对自身道德意识的回忆性反思，这种反思以当下情境为前提；在工夫论层面，“思”是自身善端得以呈现过程中的推想与想象，并为推恩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道德动机；而在建构道德主体上，“思”则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维度：实践意义上的道德主体与本体层面的道德主体。上述三重含义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即个体获得内在的善是何以可能的。因此，“思”依靠其自身的作用与价值成为人禽之别的关键点，也有力彰显了人的内在价值。^[29]

许卉认为，《洪范明义》一书集中体现了黄道周对政治秩序与君权合法性的思考。纵观黄道周的《洪范明义》，其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从三个方面论证并回应：首先，通过论证《洪范》作为统治大法的合法性，来加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根基；其次，通过阐释“皇极”

来说明统治中统治主体的权力以及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再次，通过论证“赐福天下”来证明统治中政治目的的合法性。通过层层论证，黄道周从理论上论证了儒家所设立的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秩序和王权的合法性。黄道周作《洪范明义》一方面论证统治原则的天道性、超越性，以儒家思想规训现实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在尊王的前提下，以天道来约束皇权，实现儒家政治理念和诉求。他对《洪范》政治哲学理论进行阐发，不仅为晚明帝国的政治秩序和统治合法性提供了经典支撑，且试图从儒家经典中找到解决当时政治危机与社会转型下产生的问题的办法。立足于此，即可看出他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反思和寻找解决途径的努力。^[30]

冯月季认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专属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实质上就是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过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将群体凝聚在一起，也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保留，人类社会才获得了稳定的发展。集体记忆并非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是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从时间范畴来说，集体记忆贯穿于过去、现在与未来，即过去的民族文化在当下被抽象成文化符号，获得了意义解释，最终指向未来的文化延续和身份认同。实际上，这关涉的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三个关键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当下我们是谁，未来朝向哪里。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黄河文化就一直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沃土和源泉。即便在当下，黄河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仁政爱民、包容进取、修身崇德等理念依然能为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黄河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主体和根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符号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31]

冯月季认为，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使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根脉，能够形成民族向心力；文化符号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能够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符号还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反思，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创造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文化符号入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文化根基；通过“元符号性”升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赋予现代价值内涵，从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维度；在互联网兴起的全球传播时代，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进国家与民族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符号的形成及其意义体系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根基，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32]

李振纲认为，孔子的思想宗旨是强调人道之爱和社会伦理责任。圣人之教，千言万语，所讲的都是一个根本道理，即把人教化成具有爱的情感、恪守礼仪、孝悌忠信、崇德好学、知命乐天、达到道德理性自觉的人。《论语》就是这样一部阐扬人道理想教化的书。孔子援“礼”入“仁”，解决了伦理学上个体意志自由与社会整体原则如何统一起来的问题。在道德实践中，个体行为表面上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而其本质则受到普遍的社会伦理原则的制约。由是观之，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道观带有整体主义倾向。孝，特指子女对父母的血缘亲情与感恩之心；悌，狭义上指弟对兄的礼敬，广义上又可以泛指晚辈的敬长之心。这里隐含着两层义理：一是在儒家仁学系统中，道德实践优先于一般的知识传授；二是“孝悌”比“谨信”“爱众”之伦理规范更具有道德的本源性。孔子重视孝悌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最朴素、最本初的血缘亲情是整个宗法政治伦理的心理情感基础。易言之，孝是仁的心理情感基础。孔子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即“成仁”。“成仁”既易亦难。说其易，是说能否成仁完全取决于自己。^[33]

李振纲认为，老子是中国也是世界影响最为久远的哲学家。老子首创的道家哲学及其所崇尚的道生德畜、自然无为、谦退慈柔、利物不争、敬畏生命、道宁天下的价值理想，源远流长，惠及古今。要弘扬这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离不开当代学人的自觉反省、理论创新与躬行实践。老子哲学的传承与创新，要充分了解老子哲学、老学史及道家文化的研究状况，对老学史源流演变及民国以来以至改革开放新时期老学研究的突出成绩、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及其理论得失，作出总结、分析和澄清。这样才能在扬弃前

人的基础上, 聚焦时代精神, 追踪学术前沿, 转换问题意识, 创新理论范式、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 把老子哲学及道家文化研究推向新的境界。^[34]

程志华指出, 对宋明儒学进行反思是王船山哲学的出发点, 故他对本体问题亦多有探讨。然而, 与其他许多儒者不同的是, 王船山提出了多个本体概念, 给后人理解其思想增加了困难, 也引发了诠释的歧义。例如, 冯友兰和冯契两先生均认为, 王船山继承张载的“气一元论”, 以“气”为本体, 并由此推展为唯物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亦多持此观点。陈来先生则认为, 尽管“太极”“太虚”“太和”等概念有关联, 但“太和”或“絪縕”乃王船山的本体。“太和是本源, 万物是后于太和而为太和所派生的。……太和絪縕是万物产生的初始本源。”贺麟先生则以王船山“天者理也”为依据, 认为“天”“天道”即为王船山的历史本体。他还以“天”“天道”具有“理性目的”为依据, 将其比之于黑格尔“理性的机巧”。此外, 还有学者认为, 王船山之“太和”即是“道”, 即是“太极”, 三者均为“最根源”“最整体”的东西, 而“以太极为解释基础”。很显然, 面对这样一种“仁智互现”的情形, 厘清相关概念之关系进而确定究竟何为其真正本体已显得非常必要。本文探讨了三个问题: 首先, 分别疏解其多个本体概念之内涵; 其次, 厘清这些本体概念间的关系, 确定真正本体; 再次, 疏解真正本体的性质。^[35]

程志华指出, 德克·卜德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研究的奠基人, 对美国汉学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卜德研究中国文化涉及面很广, 但核心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 中国神话不像西方文化具有完整的“神话体系”, 而是以“零星碎片”“历史化”为存在状态。其二, 中国人虽不以逻辑思维见长, 但却具有明显的“分类思维”。其三, 汉语言文字的重要特征是表意文字, 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四, 中国文化的“主导观念”体现在对“超自然世界”“自然世界”“人的世界”的看法中。四个方面虽然相对独立, 但均以“和谐宇宙观”为基础, 而“和谐宇宙观”可对人类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可贵的

是, 卜德研究中国文化以多元文化观为前提。因此, 他不仅看到中国文化的不足, 亦能认识到其优长之处。^[36]

武占江认为, 义庄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家族建立, 并得到国家认可和支持的一种宗族慈善组织。它所从事的赡助、济贫、养老、助学、恤病等一系列活动, 传递了社会关爱, 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促进了人心向善, 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因而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北宋时期, 范仲淹所创立的范氏义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义庄。之后, 各世家大族纷纷效仿, 义庄在各地不断涌现。明清之际, 义庄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义庄有利于社会救助、社会稳定及封建统治, 因此朝廷对义庄是持肯定、支持态度的。清代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要求宗族“立家庙以荐烝尝, 设家塾以课子弟, 置义庄以赡贫乏, 修族谱以联疏远”。直到清末民初,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变, 义庄逐渐走向衰落。^[37]

李洪卫指出, 学界历来对古代知识分子在王朝兴替中的作用多有争论。刘泽华认为, 中国古代先贤都是在一种“阴阳组合结构”中思维, 有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圣人与圣王、民本与君本等, 但这是一个偏正组合以王为主导的结构。我们从这个思维和制度结构尤其是道与王的关系的早期演变来看, 它是由孔孟到荀董之间的转变形成的。孔子关于君臣关系之道包含着“相互性”的要求, 既各安其分, 同时又在人格层面相互尊重。孟子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能实现这种状态, 反面的“相互性”即对等的平衡对待就会发生, 双方从相互友好到相互敌对。荀子开始有了较大变化, 他虽然提出“从道不从君”, 但是他将师与后王结合, 开启了以君为师并认肯于现实政治的新的儒家之道, 赋予君主诛杀言论的权力。董仲舒虽然预设了天道的最高权威, 但是具有虚拟性, 同时他大大提高了君主的权威, 这是原始儒家到秦汉之际道、王关系的内在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理势之争构成早期道、王之辨的延续, 但是, 由于传统王朝政权更迭通常被儒家所确认, 因此这种理势之争已经只具有有限的意义了。^[38]

李洪卫指出: 在历代儒家之中, 王阳明是文武兼备、道德与事功俱达致巅峰的一个特例。像王阳明这样大开生门、学子遍及天下、影响累及

后世的绝无仅有，能做到这一点是与王阳明依据自己的心学体会建立良知学的教化方法分不开的。儒家的成圣或成贤之道有一个过程性环节，即“变化气质”，张载提出人的气质有刚柔、攻守等不同类型。朱子从性、气二元立论，而王阳明则是从性、气一元立论，他的方法是追寻自己的良知，依循良知行动即可。这里的核心是性与气、心与气的一体而不是二元，对照朱子的性气论，可以看出二者的巨大差异。阳明在教育方式上是让儿童身心条茂畅达，歌、乐之欢畅，以乐为上；音乐要从心中发出，做到精神宣畅，心气和平；具体到个体是各随分限，相机教化，愚者可教，贤者可成。朱子强调理气对立，因此，除德性修养还有刑罚并重，以圣人规定为则；阳明则着重前者，道即性即命而肯定《中庸》，认为修养过程不需要圣人“于中为之品节”。^[39]

三、西方哲学

冯立刚认为，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对理论保持敏感，采用不断比较和理论抽样的方法，灵活运用相关文献，然后对建构的理论进行评估。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将此方法奉为圭臬，在众多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这种方法因其相对于定量研究的优势获得人们的认同，但其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范式，而实证研究有其局限性。因此，在肯定扎根理论优势的同时，对这一方法本身的限制和运用范围保持清醒的认识，对其进行适度批判，厘清其前提与适用界限，无疑对有效运用这一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批判当然需要批判的武器，在 20 世纪的哲学方法论中，现象学方法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哲学方法之一。以现象学方法论对扎根理论基本思路中的关键点进行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跳出扎根理论的窠臼，进而达到对扎根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认知，并让该研究方法的效能得到更好的发挥。^[40]

赵贤指出，句子图式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分析的方式。基于句子图式可构造否定句子图式，并以此分析弗雷格关于否定的思想。弗雷格认为否定句是由否定词和子句组合而成的。弗雷格认为，思想结构一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思想，一是联结思想的不饱和的部分，即语句连接词的含义。弗雷格在《思想结构》中探

讨了六种不同的思想结构，弗雷格指出：“我们的六种思想结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整体；……因为这六种思想结构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作基础，由此借助否定就可以推导其他思想结构。”这样，弗雷格进一步说明了否定在构造命题逻辑公理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将否定作为初始符号进行定义，这也表明了否定在现代逻辑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41]

张燕京认为，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于 1879 年发表《概念文字》，构造了第一个谓词演算系统，标志着现代逻辑的诞生。同时，弗雷格也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开创者，他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哲学分析，提出了意义理论，开创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但是，学界一般关注弗雷格所构造的逻辑系统本身，对于弗雷格之所以能构造出现代逻辑系统的关键方法和理论前提关注不够；学界也一般都认识到逻辑分析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方法，但对于逻辑分析的理论基点和具体内涵缺乏较为深入的论述。本文基于弗雷格本人的原始文献，通过对弗雷格函数——自变元理论的全面而系统的阐释，一方面论证了函数——自变元理论是弗雷格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理论前提，揭示出该理论对于构造现代逻辑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论证了函数——自变元理论是弗雷格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点，阐释了逻辑分析方法的具体内涵。^[42]

冯燕芳指出，面对工人运动的低落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拉克劳和墨菲寄希望于通过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接合，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社会运动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新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比工人运动更“激进”。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工人是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必须把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他们的新社会主义策略。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复杂化和多元化，传统解放话语面临危机，因而必须建构新的解放话语，这种新的解放话语诉诸全面解放，克服了解放话语自身的矛盾性，但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43]

冯燕芳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提出的。

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并且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有机哲学思想融入自身的理论建构中。有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批判,是因为资本主义构建了一种以财富的创造和增值为目标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所有的一切都被置于资本的度量之中,因而出现了人的价值观被市场价值所替代、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等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影响,因此在建构自身理论时,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进行了深刻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于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促进人类与自然的良好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44]

冯燕芳认为,帝国主义是围绕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资本机制而不断演变的复杂时代景观,对其本质的历史追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长盛不衰的核心话题,也是当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无可回避的历史命题。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采取了新的内外政策,从而形成了新的国家战略。哈维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当前的帝国主义形态命名为“资本帝国主义”,并把“这一特殊的标签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的矛盾混合”。“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是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过程。帝国主义在该过程中通过控制和利用资本来取得领先地位。“双重逻辑”就是帝国主义在领土和资本两个领域的行为逻辑。通过对新帝国主义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辩证关系与时空修复理论的分析,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动态发展。^[45]

(郝晏荣:河北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代昶春.经济人假设批判与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的构建[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2]代昶春.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双重内蕴[J].社会科学论坛,2021(5).
- [3]李维意.马克思异化思想视域下人的交往[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20(5).
- [4]李维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逻辑[J].理论与改革,2021(6).

- [5]李维意.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当代审思[J].太平洋学报,2020(12).
- [6]李维意.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治理理念和构建方略[J].广西社会科学,2020(4).
- [7]李维意.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21(11).
- [8]黄云明.论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发展观[J].云梦学刊,2021(3).
- [9]黄云明.论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价值理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10]黄云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J].学习与实践,2021(5).
- [11]黄云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下的道德起源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12]黄云明.马克思劳动哲学中的社会道德关系理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13]黄云明.论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14]田海舰.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
- [15]王贺.马克思交往伦理思想的三维向度阐释[J].理论导刊,2020(8).
- [16]邹健.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内在理路[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
- [17]冯燕芳.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基于对马克思中学作文、大学诗歌和博士论文的考察[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18]宫敬才.卢卡奇的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及其悲剧性结局(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
- [19]宫敬才.卢卡奇的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及其悲剧性结局(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6).
- [20]宫敬才.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巴黎手稿》的理论缺陷及其弥补[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4).
- [21]宫敬才.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4).
- [22]宫敬才.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论纲[J].现代哲学,2020(1).
- [23]宫敬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分析框架之比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5).
- [24]宫敬才.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线性演化逻辑及其语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 [25]宫敬才.论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的思想资源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26]王开元.从心之能到人之善:一项有关孟子人性论的分析[J].管子学刊,2021(4).
- [27]王开元.道德主体的建构:孔子自识思想的阐释[J].保定学院学报,2021(5).
- [28]王开元.马一浮《咸》《恒》卦义解[J].衡水学院学报,2020(5).

- [29]王开元.面向善的存在:孟子哲学中的“思”[J].哲学研究,2021(5).
- [30]许卉.黄道周《洪范明义》对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思考[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6).
- [31]冯月季.黄河文化符号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探析[J].人文天下,2021(6).
- [32]冯月季.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J].思想战线,2021年(5).
- [33]李振纲.孔子仁学五题——儒家的人道价值关怀[J].河北学刊,2021(4).
- [34]李振纲.老学研究的回顾、反省与理论创新[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35]程志华.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关于究竟何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之辨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3).
- [36]程志华.中国文化的特质、基础及可有贡献——德克·卜德关于汉学的基本认识[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37]武占江.中国古代义庄的道德价值探析[J].齐鲁学刊,2021(5).
- [38]李洪卫.早期儒家思想之道、王关系的变迁——从传统政治文化的“阴阳结构”论起[J].齐鲁学刊,2021(2).
- [39]李洪卫.阳明论变化气质及其教化论——兼及阳明与朱子教化方式的比较[J].国际儒学,2021(3).
- [40]冯立刚.对扎根理论的现象学方法批判[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3).
- [41]赵贤.弗雷格的“否定”思想——基于句子图式的视角[J].学术研究,2021(6).
- [42]张燕京.弗雷格的函数——自变元理论及其对现代逻辑和语言哲学的影响[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43]冯燕芳.西方新社会运动与新的解放话语——拉克劳和墨菲为什么对新社会运动寄予厚望[J].教学与研究,2020(12).
- [44]冯燕芳.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五大批判[J].保定学院学报,2021(2).
- [45]冯燕芳.“双重逻辑”的辩证关系与时空修复理论——基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理论研究[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逻辑学、伦理学等哲学问题研究

张燕京 王琪 王丽珍

2021年,河北省学者在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哲学分支领域取得进展,在省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逻辑学研究

(一) 逻辑哲学

张燕京所著《达米特与戴维森意义理论比较研究》一书,入选人民出版社“国家社科基金丛书”,系国内第一本关于达米特与戴维森意义理论比较研究的专著,提出了关于当代语言哲学的新观点,开启了国内当代意义理论的比较研究视域。该书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理论来源、原则条件、真理观、理论形式以及形而上学等不同层面,全面、系统地展开了达米特意义理论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比较研究,全方位地展现了当代意义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观点和发展趋势。其二,对达米特和戴维森的真理观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揭示了达米特与戴维森真理观的特征。其中涉及达米特和戴维森关于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分歧,对弗雷格关

于真的思想的评论,二者关于真的思想的比较等,内容广博,论述深入,展现了当代真之理论研究的复杂和丰富的境况。其三,探讨了达米特和戴维森有关意义理论形式的观点,深入地论述了达米特对戴维森真之理论的批评,从而揭示出达米特和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特征。这种探讨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意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其四,就达米特和戴维森意义理论对当代形而上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凸显了意义理论对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作用,表征了当代形而上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该书概括提炼出当代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提出关于当代语言哲学的新思想新观点。该书认为,真、意义和实在是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真与意义的关系、真与实在的关系、意义与实在的关系,构成了当代语言哲学的主要问题。具体而言,真概念是意义概念的基础,意义理论借助真概念得以说明,基于实在论的真概念可以构建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基于反实在论的真概念,则可以构建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真理观决定意义理论。而对实在概念的

探讨又依赖于意义概念的探讨，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实在论与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之间的论争，表面上是形而上学的论争，其实质是有关意义理论的论争，根本上是关于真理观的论争。达米特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比较研究，对于当代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1]

赵贤、张燕京认为，“否定”是弗雷格逻辑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否定”的思想在弗雷格逻辑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句子的结构，可以构造否定句的句子图式。句子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是逻辑分析的基本单元。否定句句子图式是在弗雷格图式、王路图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基于句子图式构造否定句句子图式，分析弗雷格关于否定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区分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句子的含义和意谓、不同句子部分的意谓，有助于我们探讨句子的真值与句子部分的意谓的关系，探讨思想与真的关系，进而更好地解释弗雷格的思想。从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这两个层面，对“否定”进行考察。根据句子图式，一个句子可以由一个名字和一个概念词组成。它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一是语言层面的东西，包括句子、专名、概念词；二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包括句子的含义、句子的意谓。句子的含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即真和假。弗雷格认为否定句是由否定词和子句组合而成的。语言层面的“否定”在含义和意谓层面一定有其相对应的东西。含义层面的“否定”的作用是从一个思想过渡到其对立面，它不涉及真假。意谓层面的“否定”是一个真值函数，它是不完整的，需要用真值作补充。意谓层面“否定”的考察不能离开对含义层面“否定”的认识。弗雷格从否定句的语言形式出发，基于其对含义与意谓的区分，使用函数与自变元思想，深入地刻画了否定句的逻辑形式和逻辑性质。弗雷格对否定的界定和分析对语言哲学和现代逻辑具有重要的意义。弗雷格对于否定的这种刻画是具有创造性的。一是弗雷格对否定的界说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函数和自变元”的思想，这一点是对传统认识的突破。二是弗雷格对于思想的否定的探讨是其分析思想结构的基础，而思想结构是我们把

握复合思想的真之方式。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将否定作为初始符号进行定义，这表明否定在其现代逻辑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

陈晶晶认为，克里普克对预设以及投射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利于推动分析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实现用逻辑手段分析语言的目的。克里普克在莱文森和索姆斯对预设触发语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能孤立地考察预设触发语，如果忽略它们在触发预设时所体现的回指照应特性，会导致语句分析不符合日常思维的直觉。某些词类和句法结构可以触发预设，它们触发预设的行为与代词回指类似，因而可尝试采用代词回指消解的机制来分析预设问题。克里普克这种预设回指的思想，不仅突破了以往学者研究预设触发语的范式，也为分析复合表达式中子句预设的投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形式语义学中，话语表现理论是处理代词回指照应问题的最佳理论。范德森特和克拉默利用话语表现理论分析代词回指消解的方法讨论预设的投射问题。克里普克赞同他们的这种方法，但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思路存在的问题，即无论子句的预设被全局接纳，抑或被局部接纳，都存在被接纳的预设与语句中断定部分无法区分开来的问题。同时，接纳操作将预设信息从它引入的结构中移出，这种牵涉到移位的操作在回归语言表层结构方面也存在問題。后继研究者科伦米娜、格尤茨、奴提雅等在逻辑语义学框架下对克里普克预设回指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构造部分语句系统或形式语义框架，将包含预设的自然语言形式化为机器上可操作、可计算的数据语言。克里普克不仅将语言学视角研究预设触发语与逻辑学视角研究预设投射问题结合起来，更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逻辑语义学框架下研究自然语言语义的良好契机。克里普克对预设以及投射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推动分析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而且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推动了预设研究。^[3]

（二）逻辑应用

孙雯认为，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诸多学科间的高墙得以打破，产生了实质性推进多学科发展的趋向。其中，逻辑学与认知科学及其框架下的认知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和脑神经科学等学科间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形成了认知逻辑、语言逻辑、心理逻辑、人工智能逻辑、

神经系统逻辑等新的研究领域。认知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为逻辑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与更加广阔的空间,开启了当代逻辑发展的新时代。语言逻辑是逻辑回归自然语言的结果。语言逻辑不仅在自然语言的结构、指称和意义方面,而且在语言使用者和使用环境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是逻辑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中的应用。心理逻辑是架设在认知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心理逻辑是对人类心智的探索,将心理因素引入逻辑思维的研究中,使学者们更关注人自身的逻辑和对人脑中“逻辑”的研究,同时也促使逻辑学从对形式语言转向对自然语言的探索。人工智能逻辑就是用逻辑的方法研究智能主体如何进行常识推理及信息处理的学科。相对于经典逻辑,人工智能逻辑具有更丰富的语言表达力,在创造性较强的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神经系统逻辑是神经科学与逻辑学结合的新兴研究领域。认知是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活动与过程。脑和神经系统是极为复杂的认知系统,是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逻辑学和认知科学之间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认知科学作为21世纪的重要新兴交叉学科,为众多相关学科找到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逻辑学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解释和理解认知。逻辑学与认知科学有着独特而内在的联系,正在以许多有趣的方式双向交织并相互阐释。^[4]

二、伦理学研究

(一) 伦理学基本理论

黄云明、吴桐认为,马克思劳动哲学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说明了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诠释了社会道德关系矛盾解决的决定性方案。首先,马克思劳动哲学揭示了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一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社会道德关系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是一切历史的前提,需首先生产人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由于人受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必须以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二是道德关系是基于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利益关系。物质生产产生了剩余劳动产品、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进而导致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出现,为协调利益关系,需制

定道德规范。三是社会道德关系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社会道德关系是实践的产物,伴随实践发展变化,具有客观社会基础,又不完全脱离主体。其次,马克思劳动哲学中的社会道德关系呈现了三种历史形态。社会道德关系是由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决定的社会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主要呈现出三种不同形态:一是人与人相依赖时期的道德关系。每个人都依附于共同体生存,几乎平等的无差别生存是此时社会道德关系的根本特点。二是基于对物的依赖的人的独立存在时期的道德关系。在此阶段,人对物的依赖不断加强,对物的占有是个体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同时人也获得了原子式的独立存在。三是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时期的道德关系。此时平等不再具有实质的社会意义,每个人都获得了充分展示个性自由的空间并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最后,马克思的社会道德关系演化具有规律性。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社会道德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形成的利益关系,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形成的与物质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是影响社会道德关系演化的核心因素。^[5]

黄云明认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通过对诸多相关因素的分析科学地阐明了道德起源的社会原因。其中,既要重视研究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和社会分工在道德起源中作用的思想,又不宜忽略其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带来的剩余劳动产品的产生、私有观念的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以及私有制的形成在道德起源中的根本作用的思想,以及马克思对道德起源根本社会原因的揭示。首先,马克思提出基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道德起源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科学地揭示了道德起源的过程,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创造了道德主体;物质生产劳动分工增进了道德形成的必要性;私有财产为道德起源提供了物质基础;私有制为道德起源奠定了制度基础。其次,马克思对以往道德起源论的继承与超越。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提出了道德的自然起源论、超自然起源论、天赋起源论、理性起源论、感性经验起源论等多种道德起源学说,但是他们的理论都没有揭示出道德起源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统一中把握社会现象,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超越了以往哲学家对道德起源的认识。我国伦理学界关于马克思道德起源问题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分歧:一是道德是与人共生的社会现象还是人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二是道德是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还是主体人的需要的产物。总之,马克思的道德起源论不仅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第一次准确地描绘了道德起源过程、科学地揭示了道德起源的原因,而且对于揭示道德的本质、社会作用以及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都有重要意义。^[6]

(二) 应用伦理

黄云明在《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法律哲学是有关法律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法律伦理是法律哲学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法律价值观。法律哲学是社会法治建设的灵魂,法律伦理是社会法治建设的理想图景,马克思主义的法律伦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蓝图的主色调。该书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的法律伦理思想。首先,阐述了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过程,以及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法律伦理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就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条件进行了说明,并从马克思的家庭及其求学生涯开始介绍了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的形成过程。而后分别对古代西方、基督教、古典自然法理论、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伦理思想进行分析,阐述了马克思对以上诸种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其次,还原了马克思本人法哲学思想的原初面貌,包括马克思的法本体论、法学方法论和法律价值论等内容。认识马克思法本体论的应然维度是从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出发,而非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理解马克思法学方法论的应然视角是从马克思劳动辩证法出发,而非基于客观辩证法;把握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的应然路径是基于劳动价值论,而非基于物质本体论。最后,系统诠释了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包括马克思的法律正义观、法律自由观和法律平等观。阐述了马克思对西方法律正义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未来理想社会超越法律正义;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法律自由观的差异,以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律自由观的超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律平等观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法律的劳动平等观

念。该书从劳动哲学出发研究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选取劳动哲学视阈的新视角,富有新意。^[7]

柴艳萍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研究》一书中认为,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文明发展的基础,生态与文明共生共荣。深入研究循环经济伦理,对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的研究。其一,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及其伦理价值。阐述了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的提出背景、基本内容及伦理价值,马克思对清洁生产以及废弃物再利用的认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节约理论,以及循环经济的实现条件。其二,论证了循环经济所具有的多重伦理特质。循环经济按照生态学原理设计产业体系,既环保、高效,又有利于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建立在生态道德、经济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有机整合之上,是对整个自然界的关切和尊重,也是对资源、环境在代内、代际、种际间分配正义的实现。其三,阐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循环经济具有营利性、节约性、高效性等经济合理性,具有低污染性、安全性、环保性等生态合理性,具有公正性、可持续性、人文关怀性等道德合理性,具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等多重价值统一性,符合经济规律、生态规律、人自身发展规律等多重规律。其四,论证了循环经济所产生的新观念与新实践。循环经济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将由经济、社会、环境的三维分裂变革为三维整合,由此催生了诸多新观念和新实践,如绿色经济、绿色行动、生态设计、生态产业、生态观念等。其五,提出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国方案。在总结中外循环经济实践模式和经验启示的基础上,凝练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基本架构,勾勒出了循环经济的中国方案。^[8]

李冰认为,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乡村变迁不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应研究乡村伦理在乡村社会变迁中“变”与“不变”的本质特征。首先,乡村社会是乡村伦理的根基。乡村社会是乡村伦理存在最基本的根据,乡村伦理是乡村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的乡村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其次,伦

理转型是乡村变迁的伦理回应。伦理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伦理转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社会变迁是伦理转型发生的根本原因。伦理转型既是一个价值冲突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最后，在乡村变迁的“变”与“不变”中建构新时期乡村伦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表现在人口、生产方式、乡村结构和村庄边界的变化。在乡村变迁中也包含四点“不变”的因素。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乡村生产最基本的产品是粮食，土地等自然资源还是现代农业的劳动对象，这是农业生产的灵魂所在。二是村落共同体仍然存在。三是村落共同体的存在是乡村社会特征形成的地域基础。只要乡村共同体存在，乡村社会关系的特质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四是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文化变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传统乡村文化并不会因为乡村社会物质生产的变化而消失，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总之，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而是乡村在历史的发展中呈现出变化，乡村的现实存在必然体现着乡村的本质。理解新时期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决定乡村伦理特征的因素中的“变”与“不变”，从而构建起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伦理。^[9]

张艳、陈瑶认为，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迭代升级，有声阅读行业正在历经生产结构性的变革与产业链条的重塑，总体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在火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侵犯用户隐私、内容低俗化、数据造假等失范现象。应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分析有声阅读伦理失范问题的现象、成因及解决路径。首先，有声阅读中的伦理失范现状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 AI 语音技术异化引发媒介伦理失范。依托于迁移学习和深度学习的 AI 语音技术可以轻易从不同场景中提取数据并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语音性能，但其中存在许多技术异化风险。二是声音私人订制中用户的隐私权让渡。个性化算法推荐成为有声阅读平台实现声音私人订制的主要手段，但却往往是以剥夺用户的隐私权为前提。三是有声阅读作品的内容低俗化倾向加剧。四是有声阅读行业的排行榜数据造假及盗版行为。其次，结合考夫卡的行为场论和布尔迪厄的社会场论，场域理论视

角下有声阅读中的伦理失范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新媒介场。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有声阅读失范提供行为环境。新媒介的匿名性、难追踪、开放性为内容的生产和分发提供了暗箱操作空间以及较为松散的监管环境。二是经济场。“短视逐利”思维导致内容流俗及用户隐私泄露。三是政治场。法律法规不完善及相关规范标准缺位。四是文化场。后现代主义文化塑造狂欢化的声音景观。后者致使“伪解放”性质的阅读掩盖了人的真实个性和现实自由，严重制约着个体对外界事物和环境的理性认知。最后，场域重构过程中有声阅读伦理失范问题的多元规制路径主要有：区块链技术赋能媒介监管，塑造良好的媒介环境；多方联动延伸内容价值链，提供多元化内容适配服务；强化相关法律制度保障，聚焦版权和隐私权保护；重塑有声经典文化，培育有声阅读伦理素养。^[10]

三、美学研究

(一) 中国美学

刘桂荣、王肖南认为，“平远”观念由北宋画家兼理论家郭熙提出并得到当时文人的接受和倡扬，“平远”图式及其美学意涵契合审美主体的生命旨趣，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艺术创作和审美观念。宋元山水画“平远”图式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平远之图式结构。“平远”图式呈现为视觉图式。“平远”图式亦呈现为虚实图式。宋元时期，平远之虚实图式表现为平展开合式、平远小景式和一河两岸式。“平远”图式亦呈现为时空图式。“平远”图式看似着眼空间，但实则时间自在其中，从而形成时空图式。其次，“平远”之观照与妙悟。平远图式结构的独特性可谓是对观者的一种邀请，使读者生发更浓厚的兴趣观之、赏之、品之、悟之，从而形成了读者独特的观照方式和妙悟体验。此观照方式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静观”。“静观”不是“观”，亦非强调“观”的状态，而是生命真我呈现的契机和方式。二是“游观”。“平远”图式的“游观”是远之意境生成的重要途径，“游观”包含画中游和画外游两个层面，其中画外游，即“远游”，“平远”山水的意外之意、味外之味、旨外之旨的境界层深均在此“远游”中生成。三是“妙悟”。欣赏

宋元“平远”山水的过程即是妙悟的过程，从而呈现大清明的生命境界。最后，“意外之趣”“平淡之境”。“平远”图式的特征建构了平远山水的“意外之趣”和“平淡之境”。“平远”图式突破有限空间追求无限的旨趣源于文人阶层审美趣味的改变，是文人“写意”观与“意外趣”在绘画上的落实。“平远”山水之“意外趣”是“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而其境界生成便是“平淡”之境。“平远”之“意外趣”和“平淡之境”彰显着中国古代文人和艺术家所特有的超越之思，它不仅是由山水之形向山水之灵的超越，更是由世俗之有限性向理想之无限性的超越，是生命精神自由清明的追求，体现出中国艺术“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大生命精神。^[11]

陈玉强认为，中国接受美学元范畴“赏”是以魏晋玄学为其理论根基，在主客交融、人文一体、道艺辉映的逻辑链条中建构起其理论内涵。“赏”的形成逻辑及理论根基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探源。其一，从赐赉到心解：“赏”之含义演变。“赏”的本义是赐予，赏赐是基于认可，表达的是称赞之情，所以“赏”字又有称颂、赞扬之义。正是基于推崇、赞赏之义，“赏”在中古时期发展出玩赏、欣赏之义，从而与审美相联系。此后“赏”由赐予义而发展出欣赏义。从东晋到南朝，“赏”之欣赏义使用普遍，用于赏景、赏人、赏言、赏文、赏乐等各种场合，从而成为重要的文艺美学范畴。其二，赏景与赏心：主客交融中的“赏”。魏晋以来士人对山水之“赏”，既包括主体对客体之“尚”，也包括客体对主体的反馈（即“江山之助”），是主客体交融的审美活动。由赏景走向赏心的趋势突出了山水欣赏中主体的地位，实质是对内心的关注，改变了汉代以来以山水比德的传统，标志着一种新的审美理念的出现。其三，赏人与赏文：人文一体中的“赏”。晋代以来，“赏”字常用于赏景也常用于赏人，而与赏其人相伴随的则是赏其言、赏其文。“赏”用于文学鉴赏，是其成为审美范畴的重要标志。“赏”范畴诞生于魏晋“人的觉醒”及“文学自觉”的双重语境下，其在东晋至南朝的流行，是时人以审美眼光看待自然、人生与文学的结果，是当时“文学鉴赏自觉”的表征。其四，玄赏与妙赏：道艺

辉映中的“赏”。魏晋画论“玄赏”及乐论“妙赏”的出现，重在品鉴形外之神与言外之意，表明“赏”的欣赏义与玄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总之，“赏”范畴浸润于魏晋历史文化语境，艺术品鉴之“赏”突出了艺术鉴赏玄妙通道的特点，具有追求言外之意、形外之神的倾向，召唤文艺“依希其旨”的审美性和朦胧美，构筑了时人的阅读期待视野，对于文艺创作及品鉴产生了深远影响。^[12]

刘宗超认为，书法大众审美中的“大众”是与以书法为主攻的专业群体相对而言的，主要指生活中欣赏书法的广大群众。书法大众审美与专业群体审美往往有很大不同，它是书法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基础，是专业创作、专业教育的基础和最终服务对象，也往往是书法创作的根本动力。当代书法的大众审美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当代书法大众审美的娱乐化。当代书法大众审美呈现出娱乐化特征，好看、好玩、易懂是大众审美的自发要求。艺术审美中的大众审美与专业审美的区别往往是悬殊的，曲高和寡的现象自古而然，它们的分歧在网络时代尤其凸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书法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面对文化总体变迁，这一变化出现了三个“三级跳”：一是工具之变，从毛笔到硬笔再到键盘；二是文字之变，从繁体字再到简体字再到拼音；三是语言之变，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网络语言。三个“文化三级跳”的出现，书法和生活渐渐脱离，大众和传统书法的距离日益拉大，书法大众审美和专业审美的距离也日益拉大。其次，当代书法专业群体的审美分歧。大众审美具有趋同性，容易被媒体和专业团体的审美舆论所引导，当代书法大众审美的乱象和迷惑最终还是来自专业团体的审美分歧。审美和艺术创作是个性化的行为，情况往往是各不相同。从理念、模式的角度而言，当前专业团体的创作可以归纳为展览模式、风格完善模式、丑书模式、现代书法、俗书模式以及表演模式。专业团体审美的分歧，已经深深影响到当代大众审美。现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大众书法模式，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相应的专业模式。最后，书法大众审美需要专业团体的大力关注与引导。提高大众书法审美的整体水平，关键在于专业团体的自身建设和整体审

美水平的提高。因此,专业团体要放弃狭隘的功利主义和清高,真正深入书法艺术的传统经典,让书法回归现代生活,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作品,同时俯下身子做好普及工作,书法大众审美的提高才会落到实处。^[13]

(二) 文艺美学

邢建昌认为,文艺美学,与其说是一个学科,不如说是人的一种生命在场的方式。世界是怎样的,不取决于世界的本然面貌,人的“视为”起了积极的作用。守望审美的视界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守望精神家园。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学科的倡导与审美文论的崛起交相辉映、互为动力,共同推动了文学艺术春天的到来。然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初创意义绝不限于此,它还从本体论承诺出发肯定文学艺术的感性特质与人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文艺美学视艺术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灵魂栖息的方式,通过对存在问题的不懈追问,还原被常识、经验所遮蔽的生活世界。其二,超越学科化知识偏见。文艺美学学科的国家建制虽得以完成,但围绕文艺美学学科是否存在,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文艺美学与哲学、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艺术学的关系的讨论,构成了争论的焦点。对待文艺美学的学科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文艺美学的智慧在于发现文学艺术文本之中非逻辑、非符号、非概念的真理蕴含。文艺美学学科意义重大,不应该是折中调和的,更不应该是日常生活大众感性沉沦的附庸,而应是一种观念、思想的生产,一种质疑、反思的力量,有能力揭穿现实的虚假和不合理性,抵达澄明之境。其三,关注形式特殊性。文艺美学作为视角、方法、论域的性质,是与审美这一人类独有的生命方式的独特功能相联系的。审美标示一种独特的反思性话语。审美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是理性内含于感性,是理性积淀于感性。文艺美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唯有从这种“在之中”方可得到解释。借助审美的视界,理论家、批评家可以发现隐蔽在文本缝隙中的生命表情,在此意义上,审美判断承担着检测那些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批评是否有效的任务。审美的这种洞见真相、揭示生存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文学形式特殊性的关注。“形

式”之于文艺美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14]

薛媛认为,欧阳予倩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之一,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戏剧创作与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丰富厚重、自成体系的戏剧理论成果。欧阳予倩戏剧思想不断丰富、深化和升华,蕴含着其对戏剧艺术创作规律的独特认知与体悟。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的美学特质与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自觉的受众意识。受众对文艺作品的解读是一个能动的审美创造过程,文艺作品价值与意义的实现离不开受众的这种创造性解读。欧阳予倩对戏剧受众的审美心理与戏剧作品的艺术品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着明晰认知,在戏剧创作中始终坚持受众意识。其次,五四语境下的现实关切。20世纪初,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由西方传入中国,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剧作家的创作理念、审美取向以及艺术技法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人本主义精神在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和创作实践中体现鲜明,他的作品充满现实关切,具有启蒙性与先导性,大都引人深思。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与社会现实、时代风潮、民族命运、国家大义紧密相连,充满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回归人本、爱国民主等进步思想。再次,“美刺”手法的生动运用。“美刺”手法在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中较为常见。“美刺”手法在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中的生动运用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美”主要表现为对抗击外族入侵的英雄人物的颂赞和对时代先行者反封建意识觉醒的褒扬。二是对“刺”的运用与传统文化注重“刺”之曲折隐晦有别,显得犀利明快,颇具剧作家的个人风格。三是“美”与“刺”也出现在同一部作品里,既颂赞主人公的进步思想和斗争精神,又讽刺和批判反动势力的虚伪与丑恶。最后,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欧阳予倩在戏剧创作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富于自主意识的新女性形象。他的戏剧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动荡复杂的时代里深受封建专制束缚和反动势力迫害的悲情女子;另一类是自主意识已觉醒的新女性。综上所述,欧阳予倩戏剧思想不仅是其个人戏剧创作经验的记录与总结,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历程的珍贵史料。^[15]

四、宗教学研究

(一) 宗教社会学

兰俊丽、刘利民认为,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佛教界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我国佛教界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和实践体系,其生态文化内涵与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具有一致性。佛教文化中包含着独特而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其一,缘起性空。世间一切皆由因缘和合而成,宇宙的一切并非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彼此间都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其二,众生平等观念。众生平等强调世间万物生命权的平等,认为每种生命都要尊重。其三,和谐共生。中国佛教认为世界万物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存在,各种生命体之间、生命体与大自然之间应和谐共生。其四,慈悲护生。中国佛教强调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强调慈悲护生。其五,佛国净土。佛教对净土的理解,在追求外在环境的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相似性。其六,心灵环保。佛教阐明了人的贪欲、无明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特别强调人的精神的清净高洁对建设净土的重要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佛教界在身体力行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中国佛教界一方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与佛教教义教规相结合,推动佛教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和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实践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吸收和借鉴佛教的生态伦理智慧和环保实践方式,发挥其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传统优势和独特价值,既是佛教在新时代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路径。^[16]

(二) 宗教人类学

吴银玲认为,葛兰言(Marcel Granet)是中国学现代派的开创者,他的《中国人的宗教》是以宗教角度切入早期中国文明进程的著作。在书中,葛兰言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演化历程进行剖析。一般解读葛兰言,可以从弗里德曼确立的两种视角入手,即“城乡对立”以及“自下而上”,具体而言,葛兰言中国研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对立与互补;其呈现出的中国上古的宗教信仰有一个从乡村向城

市“自下而上”发展的过程。但分析葛兰言著作会发现,仅遵循“城乡对立”与“自下而上”,会错误地简化葛兰言所呈现出的中国宗教信仰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葛兰言就强调上古中国乡村与城市是同时产生的,很难说有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反而是并行发展或者对立的模式。《中国人的宗教》这本书中的核心概念是“圣地”,它的形制和内涵随着宗教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上古中国存在乡村与城市两种类别的圣地,而且上古中国的乡村与城市是同时存在的。随着历史的演进,两种圣地经过象征化的过程不断向外扩张。从圣地的扩张来看,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断挤占世俗生活,但是这种扩张以仪式为核心,直到世俗生活完全充斥于宗教当中,最终中国形成一个礼制社会。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葛兰言讨论了农民宗教时代朝向封建宗教时代的转变。在都城建立之前,上古中国处于农民宗教时代,人生活在男女两性平等的场景之中。这是一种对称式的社会组织模式。在封建宗教阶段,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社会交换当中都是中心式的结构,在社会层面上处于中心的总是男性,在观念上处于中心的则是对天的崇拜。总之,弗里德曼对葛兰言的解读存在着偏向。在轴心时代之前,葛兰言强调上古中国农村生活;但是在有文字记载开始,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是城乡并立的情形,葛兰言转而强调城市的生活。^[17]

(三) 佛教典籍

崔红芬认为,虽然学者们对英藏西夏文《佛顶心观音经》释读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需要详细确定之处。首先,英藏西夏文《佛顶心观音经》的定名需要进行补充。刊布者虽将Or. 12380-2102RV (K. K. II. 0243. e) 残叶定名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但较为笼统、不准确,应定名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经》上卷(存结尾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治病催生法经》中卷(存开头文字)。Or. 12380-3025 (K. K. II. 0234. b) 残经,根据录文译释,可确定其为《佛顶心大陀罗尼经》中卷(结尾)和《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前往难救经》卷下(标题)。西夏文 Or. 12380-3493 (K. K. II. 0282. ccc) 残叶,根据录文译释,可确定其为《佛顶心大陀罗尼经》卷下结尾处的相应内容。另外通过残

页对比,可确定 Or. 12380-3025 (K. K. II. 0234. b) 和 Or. 12380-3493 (K. K. II. 0282. ccc) 残叶为同一版式佛经,但二者之间不能连接。西夏文 Or. 12380-3185 (K. K. II. 0265. d) 残叶,根据录文译释,可确定此残叶为《佛顶心大陀罗尼经》卷中内容,与 Or. 12380-3025 (K. K. II. 0234. b) 有一定重合,属于不同版本。西夏文 Or. 12380-3875 (K. K.) 残叶,刊布者定名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典》(上卷)。但刊布者定名是不准确的,残经还包括中卷和下卷。其次,从《佛顶心观音经》的西夏文可以看出,西夏文本并不是严格对照汉文本逐字逐句进行翻译,而是在理解汉文的基础上,在表述和用词上有所变化。西夏文本更加符合党项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充分展示了西夏文化的继承延续性和本土化特色。再次,《佛顶心观音经》既与正经关系密切,主要吸收借鉴了《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经》的相应内容,又融入汉地、西夏本地习俗特色。最后,根据俄藏西夏文《佛顶心观音经》尾题可知,西夏文《佛顶心观音经》是由僧人释法律翻译完成的,翻译时间应在仁孝天盛十七年(1165)、十八年(1166)之前或更早。^[18]

崔红芬、文志勇认为,《圆觉经》作为僧界研习佛法的重要经典之一,其科文、注疏和道场礼忏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圆觉经》及其科判、略疏传入西夏后,被翻译成西夏文,它们在黑水城文献中得以保存。通过对西夏文残经录文翻译后可以得出,在刊布的英藏西夏文文献中,有六个编号的残叶是宗密禅师《圆觉经》科判。将西夏文与汉文本《圆觉经》的略疏注与科判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两者略疏注虽然在用词表示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所表示的意义相同。这一情况在诸多西夏文佛经的翻译中都有存在,反映了西夏人在依据汉文本翻译成西夏文时糅合进一些民族因素或他们对于佛教的理解。其二,残存西夏文《圆觉经》科判属于正宗分内容,包括文殊师利菩萨章、普眼菩萨章、弥勒菩萨章和金刚藏菩萨章等内容,与宋版《圆觉经》科判基本一致,这说明西夏人是依据宋汉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其三,《圆觉经》传入西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结合西夏六

次请赐佛经的年代和秉常、乾顺皇帝时期大规模译经的情况,大致可确定《圆觉经》科疏应在秉常或乾顺时被翻译成西夏文。其四,西夏僧人还结合境内流传的《圆觉经》及其科判和注疏等,并参照其他忏仪等,辑录了《圆觉经道场礼口》,用于佛事活动。其五,将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圆觉经道场礼口》与唐、宋著述比较后发现,《圆觉道场礼口》是西夏人继承唐代圆觉经道场仪式,并据其广本,结合实际需要辑录出便于诵读或操作的简略本,对后世忏仪产生了一定影响。^[19]

张开媛在《〈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一书中指出,《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意在传递大乘空宗的思想精华,并服务于以三论宗为代表的空宗一派的义理传播。在唐代,罗什本《金刚经》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流行势头,受到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重视。该书探讨了《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社会的流行及相关问题。首先,在罗什译本的传世本中,其敦煌写本数量超出其他译者《金刚经》译本很多。敦煌本《金刚经》的写本呈现“前附加文+经文+后附加文”格式,这种书写格式具有固定性,这当为民间写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写经结构特点。^[20]其次,《金刚经》的译著具有主体选择性。从唐代具有影响力的五本《金刚经》译本情况可以看出,《金刚经》的经义通过不同译者之手发生变化,与罗什本强调空宗思想不同,其他诸本在经义方面向有宗转向。再次,唐人对《金刚经》的注疏十分重视,多种注疏中大部分是对罗什译本的注疏,说明了罗什译本在唐代社会受重视的程度。但是唐人《金刚经》的注疏在义理方面的走向发生了变化,基于佛性为“有”的基础之上加以阐发,体现出对空宗思想的转向性变革。另外,作为禅宗立门经典的《六祖坛经》既从《金刚经》获取思想资源,又改进了罗什的空观学说,从心性生发,观照中道思想。慧能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思想,将中国式修身养性、回归心性本净的观点揉入《金刚经》,为其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最后,唐代《金刚经》灵验记、讲经文与变相中表达了民间信仰的流行,可以看出《金刚经》在唐代社会的影响。唐代知识阶层的佛学思想及唐朝各个时期的佛教政策都为灵验记的写作提供了潜

移默化的意识导向,使灵验记中涉及《金刚经》的文本内容逐渐趋于世俗化和功利化。该书通过对罗什之后诸译本内容的分析和唐人注疏中体现的思想倾向分析,得出《金刚经》的传播得益于其有宗化转向和民间信仰的推动。^[20]

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一) 科学与文化

韩来平、王焯认为,当今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面临着完善自身、指导实践、化解危机的重任。如何通过政治调控使科学技术趋利避害,备受人们关注,科学政治学成为时代的呼唤。韦伯作为先驱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科学和政治关系的研究,明确地阐述了学术与政治的区别。其后,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科学家贝尔纳,他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及方法对科学技术的历史进行社会系统分析,强调科学与政治的联系,主张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和调控。虽然贝尔纳强调政治对科学的调控,但并没有忽视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他强调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张力,倡导实施科学的内外民主策略,以形成求实高效的自组织科学状态。继贝尔纳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萨洛蒙、戴维·狄克逊和古斯顿。他们以社会建制化科学的“三角结构”理论为分析基础,从科学为民造福的价值观出发,坚持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宏观可调控性、公众参与民主调控的研究纲领,运用历史主义的社会系统分析方法,进一步对科学和政治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巩固并扩张了科学政治学的语境,形成了各自的研究特色,丰富了科学政治学的研究内容。纵观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环顾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实践,科学政治学范式与研究纲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其语境得到了不断的巩固与扩张,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科学政治学不断唤起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科技政策制定和选择模式发生了转变,推动了科技决策模型的不断完善。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实践不断探索前行的过程中,我国实践亦不断为科学政治学语境巩固和扩张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21]

王颖斌认为,意向性是海德格尔现象学思想的中心主题,也是通达存在问题的重要路径。海德格尔重点探究了意向性的三个方面,并诠释了

其内含的生命意蕴。其一,意向性在本性上是实践,表现为此在操劳着的生命活动。意向性本质上不是意识的一种性质,而是一种行为。意向性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其本身就内含着意向性即“是被指向”的关系。这种意向行为不是某种心理的东西,不属于主体性的人或自我意识,而是属于生存着的此在,处于此在先行具有的“把自己指向……”的结构中。海德格尔特别谈到了制作性行为及其所体现的意向性的实践本性。由此,事物从实践方面展现为对此在而言可用的东西。其二,意向性的根基是超越性,是从此在的在世引申出来的,呈现出生命之投身于世界的原初状态。海德格尔反对从意识与存在的区别出发去理解意向性,主张从此在的在世存在引申出意向性。意向性在存在论上以作为此在的人的基本构成为基础,此在的超越性才是意向性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基,是意向性的存在论根据。其三,意向性的渊源是时间性,时间性的绽出境域为意向性之何所指提供了源泉,也决定了生命的绽出境域。通过时间性,海德格尔抨击和消解了具有确定性的主体和客体,使得存在者作为一个整体并根据它们的不同领域从遮蔽中原初地展现出来,使得作为实际生命的此在生存的“此”即价值和意义得以绽露,意向性就指向这些价值和意义。这一思想迸射出生命的灵性之光,是对僵固的科学理论和学院哲学的批判,对人们关注实际的生命经验、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具有重要作用。^[22]

(二) 科技与社会

王一雪认为,米洛斯基对开放科学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方面的研究处于科学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他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超越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的文化现象,将开放科学与该现象关联起来,探讨了经济语境中开放科学的价值基础。米洛斯基将开放科学的基本假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张开放科学是新自由主义科学体制的产物和工具,其重新配置了科学制度和知识本质,以便更好地符合市场需求。米洛斯基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他联合了政治、经济这些与科学共同体的实验室生活相对较疏离的外部要素,分析其对科学知识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延伸到科学内容、社会建制、知识价值和科学家伦理领域。开放科学价值基础的论析场域包括弱

资本逻辑和知识商品性,科学建制的动态发展,数字时代的网络生态。在米洛斯基的观点中,科学家成为知识生产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节点,导致个体主体性消失。数字网络生态和科学家线下实践恰好为共同体实现主体间性提供良好契机。科学家通过互联网可实现对科学数据的充分交流和分享,形成“行动者网络”。消失了机械性的个体主体性,得到发展的是“生活世界”中的科学家。结合知识与经济活动的显性、隐性关系和开放观念的共时性双重逻辑,开放科学价值基础包括合理知识的价值判定依据,科学家活动中和处理知识公共性、私有化矛盾时呈现的价值理念。总之,在将开放科学与特定政治经济立场联系起来后可发现,开放科学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与传统科学建制具有关联的新型科学交往关系和科学实践方式尚在发展之中,它在建立、管理等实践方面需要一种澄清后的价值基础进行理论支撑,这既关系到科学价值和目标的设定或重构,又涉及一种难以避免的、愈加开放的科学建制在政治经济活动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23]

(三) 科技人物

魏占杰、彭秀良认为,陈士骅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学家,推动了中国传统水利科学向现代的转型。他不仅在自身的学术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和出色的艺术才华。但学界对陈士骅学术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应该以陈士骅的生平与学术志业为线索,探讨陈士骅深邃而又丰富多彩的科学和艺术世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士骅出生在直隶安州一个书香世家。陈士骅的家学渊源深厚,作为安州望族的后代,陈士骅秉承了先辈的优良家风,不仅在求学之路上锐意进取,而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陈士骅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初涉教坛的他开出了水利学、水工学、河港工程、桥梁工程、农田水利、土壤改良等一系列课程,这些课程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陈士骅不但学问做得好,也很注重事功,可以说是学问事功相得益彰。注重保持政治正确,是陈士骅与时俱进品格的流露,也是他学问与事功并重的一个集中表现。陈士骅不光是一位学问家、教育家以及高校行政领导者,更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艺术家。陈士骅的书法和作画水平很高,其画作偏重于山水写

意。陈士骅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咏水利建设和古今水利工程的诗词,这些诗词不仅可以反映出陈士骅的水利工程思想,而且是与他的学术事业密切相关的。要深入揭示陈士骅的水利工程思想,熟读并仔细解析其写水利建设和古今水利工程的诗词,必定大有裨益。^[24]

(张燕京:河北大学教授;
王琪:河北大学博士生;
王丽珍:河北大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 [1]张燕京. 达米特与戴维森意义理论比较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赵贤,张燕京. 弗雷格的“否定”思想——基于句子图式的视角[J]. 学术研究, 2021(6).
- [3]陈晶晶. 克里普克预设思想初探[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3).
- [4]孙雯. 认知科学与逻辑学携手共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5-11.
- [5]黄云明,吴桐. 马克思劳动哲学中的社会道德关系理论[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 [6]黄云明. 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下的道德起源论[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
- [7]黄云明. 马克思法律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8]柴艳萍.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9]李冰. 乡村变迁: 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J]. 齐鲁学刊, 2021(1).
- [10]张艳,陈瑶. 场域理论视角下有声阅读中的伦理失范成因及规制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 2021(11).
- [11]刘桂荣,王肖南. 宋元山水画“平远”图式的美学意蕴[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
- [12]陈玉强. 中国接受美学元范畴“赏”的形成逻辑及理论根基[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7).
- [13]刘宗超. 当代书法的大众审美[J]. 大学书法, 2021(6).
- [14]邢建昌. 守望审美的视界[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8-23.
- [15]薛媛. 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的美学特质与文化意蕴[J]. 四川戏剧, 2021(1).
- [16]兰俊丽,刘利民. 中国佛教助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议[J]. 中国宗教, 2021(11).
- [17]吴银玲. 葛兰言论中国宗教——以其《中国人的宗教》为例[J]. 南方文物, 2021(1).
- [18]崔红芬. 英藏黑水城《佛顶心观音经》相关问题考论[J]. 敦煌研究, 2021(3).
- [19]崔红芬,文志勇. 西夏遗存《圆觉经》科判、略疏及其相

关问题考[J].西夏学,2021(2).

[20]张开媛.《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21]韩来平,王焯.科学政治学何以可能——从贝尔纳、萨洛蒙、狄克逊到古斯顿看其语境形成、巩固与扩张[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8).

[22]王颖斌.海德格尔论意向性及其生命意蕴[J].自然辩证

法通讯,2021(4).

[23]王一雪.经济语境中开放科学价值基础的框架构建研究——从米洛斯基的观点谈起[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2).

[24]魏占杰,彭秀良.水利工程学家陈士骅的科学和艺术世界[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10).

经 济 学

经济理论研究

田学斌 张胤

2021年,河北省理论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就业养老、创新驱动、金融风险防范、低碳经济、环境治理、国际贸易和三农等重要领域,通过紧贴现实和注重问题研究的多样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西方经济学

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在就业问题、养老问题、创新理论以及金融政策等四大领域进行了集中研究。

(一) 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吕荣杰、徐梦瑶、杨蕾基于我国2010—2017年28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2SLS与系统GMM探究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数量与就业工资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制造业工资的促进作用更强。^[1]杨胜利和姚健采用2014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认为受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失业保险、流动原因、人际关系等特征的变动,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而耕地、宅基地、流动模式、暂住证等特征的变动会增加流动人口失业风险。^[2]杨胜利和邵盼盼通过分析疫情下的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发现疫情的传播性和破坏性会使农民工面临失业,而人力资本、流动特征、社会保障能够有效抑制失业风险。^[3]杨胜利和高向东基于2020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调查数据,运用

固定效应模型等探究了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失业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受到社会支持的制约,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存在替代互补效应。^[4]

(二) 养老问题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杨胜利和姚健构建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研究发现,在全市范围口径下各市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要大于市辖区范围口径下的均等化程度,全市范围内各市公共服务供给增速加快有助于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5]魏强和吕静认为要构建多元化智慧养老模式,引导和鼓励智慧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研发和推广老年智能产品,推进老年环境适老化、智能化,拓展和深化智慧养老服务领域,加强和提高智慧养老队伍素质建设等有助于满足老年多样化需求、推进积极老龄化。^[6]针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综合影响问题,高彦、赵君彦、曹园从多视角构建精算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劳动者在62.33岁退休个人总效用会实现最大化,最优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经济增长速度、入职年龄正相关,劳动者在66岁退休时个人账户净收益最高。^[7]尹成远和仲伟东应用DEA-Malmquist和Tobit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估与分析,并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实施差异化的效率提升策略和完善运营监管制度等

政策建议。^[8]

(三) 创新理论

科技创新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引擎,张亚明、宋雯婕、武晓涵等以 31 个省份为案例,基于组态视角,运用 fsQCA 方法探究科技创新要素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剖析影响各省份产业升级差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多元路径,丰富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领域的学术研究,而且为各省份制定操作性强的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9]代冬芳和俞会新选取 2013—2019 年各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哈肯模型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动力的序参量为市场导向动力,科学技术推动力、政府支持动力以及国际合作动力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快变量。^[10]齐晓丽、郭沛珍、梁艳阳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政府支持方式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影响路径以及影响特征,结果表明,政府战略引领的作用通过战略带动人才集聚和投资集聚得到加强,财政科技支出的作用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和财政分权程度,创新环境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建设两方面。^[11]卞晨、初钊鹏、孙正林通过构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发现渐进提高环境税征收和创新专项补贴政策效果更优,在政府必要监管强度下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想演化稳定均衡更容易实现,且存在“帕累托改进”政策效果。^[12]王智新、赵沙俊一、朱磊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我国企业数据,分析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我国应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13]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邢会、王飞、郭辉丽等基于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 DID 和 PSM 等方法研究税收优惠与创新激励政策之间的关系,发现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提高创新要素贡献率、提供风险补偿保障和创新倾向转变三种作用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区域异质性创新效果呈现出东、中、西部递减的状态。^[14]王雅洁和韩孟亚利用 2005—2018 年中国内地 30 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

方程模型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在创新两阶段均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地区交互作用则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强。^[15]

(四) 金融政策

为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叶莉、王苗、许文立构建了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 DSGE 模型,研究发现: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利于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能够有效增加社会福利。^[16]李国柱和李晓壮构建了新金融业态风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结合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偏态 t 分布估计,发现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显著,市场风险则为负向影响。宽松(收紧)的新金融决策虽然在短期内促进(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对中长期的影响效应不足。^[17]魏学辉和段小雪基于 2006—2016 年我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在 SDM 基础上构建空间调节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当地政府支持能正向调节本地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本地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实现。^[18]康书生和袁薇使用我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发现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提出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的建议。^[19]

二、政治经济学

王勃、白翠芳、李莹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强化身份认同、促进信息流动、证明社会信用的功能和优势。^[20]刘斐和夏显力基于 2004—2018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异质性预期、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收益预期、社会资本指数对农村产业融合中的农户有效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预期、成本预期对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21]李峰和朱钰通过研究社会经济特征对人力资本进行

多维度的异质性,认为复合邻近性下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同时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区域积累与效应发挥均出现了明显的“舍近求远”特征。^[22]

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针对低碳经济、资源经济、能源经济以及大气环境经济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京津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治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 低碳经济

城市对资源的需求和碳覆盖领域的扩张严重影响其继续发展,孙正林、卞晨、初钊鹏等构建了碳交易和碳税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当碳交易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作用有限时,政府必须提高直接可控的碳税征收税率并配合以合适强度的监管才能保证政策协同,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当政府对创新企业实行减税政策时,碳交易政策效果可以得到强化。^[23]郑林昌、李泽阳、付加锋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市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构建城市低碳环保发展评价模型和协调度模型,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低碳指数、环保指数与发展指数具有一定差异,但协调性不断提高,呈现城市规模越大指数协调性越好的特点。^[24]

有色金属工业作为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部门,低碳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屈秋实、王礼茂、王博等以有色金属产业链内各环节为研究重点,用CO₂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EA模型,通过量化评估有色金属不同生产环节和不同区域的碳减排潜力,为有色金属产业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25]在对我国生猪养殖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邵红岭、崔玉姝、杨晴等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国内外猪肉价格对中国生猪养殖业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生猪养殖业碳排放量与国内猪肉价格以及与猪肉进口价格均存在长期正向均衡关系,猪肉价格波动通过对生猪生产者行为的影响实现了对生猪养殖业碳排放量的正向影响。^[26]

(二) 资源经济

在水资源长期供需不平衡的背景下,刘晓东、彭晓彤、白丽等基于作物需水量和实际用水

量测度,利用LMDI模型解析河北省农业用水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提出应重点强化农业节水技术、节水管理和结构调整,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进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各地区种植结构,提升水资源和种植结构的匹配度。^[27]陈凯、陈钰、郭峰基于中西方稀缺资源利用治理理论,结合能源、水资源和建设用地资源利用现状及双控市场化概况,对比性分析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对能源、水资源消耗和建设用地区总量与强度的调控效果,创立测度资源利用秩序及经济异质性的新方法。^[28]

(三) 能源经济

产业转移对能耗总量和GDP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张伟、于思凡、王韶华以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构建测算产业转移中各地能源消耗量变化的模型。研究发现,该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且单纯依靠选择转移和承接的产业难以实现各地利益的协调产业转移对能源强度的作用有限,且该作用不会随转移产业的不同发生较大改变,区域经济联动使得产业转移对能耗总量、GDP、能源强度的影响随时间推移均有弱化趋势。^[29]王韶华、何美璇、张伟等利用2000—2017年的京津冀面板数据,发现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具有负空间溢出效应,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与劳动生产率、能源结构、科技创新强度和规制强度呈负相关,与投资强度呈正相关,科技创新强度与规制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河北省实现高质量降耗是京津冀协同降耗的关键。^[30]

(四) 环境问题

落实大气污染跨区域联防联控政策的关键是科学划分区际减排责任,王树强、刘赫、徐娜等基于非合作博弈理论,构建同时满足收益约束和生态约束的区际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型。研究发现,工业化初期,成员区域最优分配量取决于各自无管制排污量;工业化中前期,中心区率先工业化,其最优分配量由生态约束极值决定,外围区域的最优分配量同时满足了两约束极值,且由无管制排污量决定;工业化中后期,成员区域的最优分配量均由生态约束极值决定。^[31]李从欣和王晓元基于全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比较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前后空气中SO₂浓度的变化。研究表明,

政策实施使空气中的 SO_2 浓度升高, 但政策“失灵”仅为暂时现象, 其积极效应在后续逐步显现。^[32]

(五) 京津冀生态环境

王韶华、何美璇、刘晔等综合运用专家赋权法和粗糙集理论计算权重, 对 2003—2018 年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发现, 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受环境质量的影响最大, 工业废水治理占工业环境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比重、工业环境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降低率和工业绿色产业比重等为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障碍因素。^[33] 李国柱和黄琪骏基于天津、河北的面板数据,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能源、经济、环境和科技四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 结果表明, 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大体呈上升态势, 京津冀四元系统耦合度较好, 大部分达 0.8 以上, 京津冀耦合协调度由轻微不协调调整到温和协调。^[34] 王韶华、刘晔、张伟等综合运用粗糙集理论与未确知模型对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多指标综合测度, 研究发现, 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应分别聚焦工业环境治理、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精准施策, 同时必须重视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35]

四、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

为促进集权制的发展和满足商品市场的需要, 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制度。朱安祥以秦汉货币制度为研究主题, 认为中央集中控制货币铸造发行权是保障集权体制正常运行的经济基础。通过反思秦汉有严法却无法遏制盗铸的问题, 提出了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供适度的货币供给量、加深复杂的货币防伪工艺、推出合适的货币面值和实施严格的货币监管手段等建议。^[36] 清末民初, 直隶省定县翟城村曾在全国率先实行村级自治, 开创了民国乡村自治的先河, 刘宏和贺彬梳理了翟城村农业科技改良与推广的成功经验, 认为重视农业科技改良与推广、契合农村实际、按农民需求推广科学技术、“博士下乡”、重视农业科技实验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37]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以系统、成熟、独树一帜的面貌成为新古典微观

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挑战者。刘文超和李辉从异端经济学综合者的角度来理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认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关注微观经济学问题, 还表现出微观经济学的探索是 20 世纪异端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抗争史, 是部分经济学家对真实世界经济学的追求。^[38]

五、世界经济

(一) 国际贸易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李延军和林雪瑞通过利用 GARCH 类模型度量了 2017—2020 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股票、债券及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水平及风险传染程度。研究发现, 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对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显著, 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水平效应和趋势效应有着不同的反应特征。^[39] 卢艳辉基于 1999—2019 年数据分析了我国和美国服务贸易状况, 认为美国几乎在所有分行业中都保持着强大的比较优势, 我国传统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不再明显, 新兴服务业比较优势在个别行业开始显现, 提出应针对性开展区域合作, 警惕中美服务贸易争端扩大, 重视技术进口方式和地理结构多元化, 有序开放服务市场。^[40] 刘文勇和郭新利综合考量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四种动机以及三种情形的“微笑曲线”, 构建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政府的“稳就业与保就业”政策对于提升国内就业数量和质量效果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就业数量增长和国内人均工资增长, 出口贸易与国内就业呈现显著的互为因果正效应关系。^[41]

徐永利和张悦通过运用改进后的 G-L 指数测度我国与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 并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 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发展水平不是限制两国产业内贸易的绝对因素, 提出应进行针对性调整提升我国与其他金砖四国产业内贸易水平。^[42] 成新轩对自由贸易区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界定, 提出了我国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啮合点”, 并从我国自由贸易区区域价值链构建、市场规模扩张、一体化深度加强、自由化程度提升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提出了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政策保障措施。^[43] 朱坤萍和

康佳亮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现状,使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和贸易互补型指数,发现中亚具有的显性比较优势远远大于我国,说明我国在能源贸易方面和中亚国家不存在竞争关系,在能源方面有很好的合作前景。^[44]

(二) 一带一路

我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体现了大国崛起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责任的变迁过程。胡建梅、郝杰、张意博等通过研究我国对外援助的部门特征、时代特征与区域特征,发现我国对外援助的地区和部门分布与受援国需求紧密相关,“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对外援助分配影响显著,我国对不同部门的援助资金主要流向了特定受援地区,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我国的对外援助重心逐渐由东南向西北偏移,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战略倾向的转变。^[45]乔敏健和马文秀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减贫;贸易量增长与资本丰裕度提升是“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减贫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效率水平提升和市场规模扩张,农村人口比重上升会加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46]杨栋旭和于津平认为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制度质量、金融服务等不同类型的投资便利化建设,均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TFP的提高。^[47]

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增强发展后劲。杨栋旭和于津平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我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48]潘涛和李惠茹基于ADB-MRIO2018等数据库中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结合增加值分解法,认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制造业升级呈正相关,差别化的投资有利于我国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49]鲍静海和韩小蕊采用57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我国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全面分析

其出口效应,结果表明,对相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带来的出口结构优化作用比相对发达国家更为显著,提出未来要在充分考虑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的基础上,精准选择与优化投资方向,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效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50]

六、三农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21年,河北省对三农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重大课题进行了集中研究。

(一) 农业、农村、农民

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王金营和苗绘在对全国2001—2020年典型土地信托模式梳理的基础上,从横向突破和纵向突破两种路径提出了创新的土地信托模式,提出了“六位一体”的土地信托保障机制,以此促进农业产业链形成,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51]陈薇伶、黄敏、郭燕基于区块链理论溯源及技术特征,结合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从共识机制、非对称加密、可追溯性、智能合约及共享资源性等区块链核心技术构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可以促成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发展,推进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52]马秀峰和倪学志认为生态农业工业化是降低生态农业技术供给成本、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最佳途径,县域城镇则是开展生态农业工业化的有效载体,工业化模式和生态农业在县域城镇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促进剩余劳动力就近城镇就业、推动农业高效绿色发展。^[53]

农村普惠金融是一项涉及基础设施、政策法规、金融供给需求等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进。梁洁在对当前农村普惠金融供给现状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实践经验考察,对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和重点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合理配置供给资源、优化供给环境、完

善供给监管、升级供给服务的发展路径。^[54]熊晓轶、尹晓菲、史雪娜就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 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样本期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流动性约束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促进样本期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实施土地流转政策效果更为明显。^[55]王冬和柴国俊通过构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评价体系, 运用2009—2018年省级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农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 各地区依托农业主体生产能力指数实现农民消费水平提升的效应较强, 依靠农业资金保障能力指数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效应较弱。^[56]

(二)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 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吴宇和许元博提出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资源集合—经济体激活”两步发展动态模式, 论述了其作用机理和实施该模式的可行路径。^[57]吴海平、李士森、尉京红通过0-1规划模型设计农作物保险安全费率厘定方法, 测算了粮食作物的安全费率和相应补贴额度。研究表明, 我国粮食作物安全费率及所需的财政补贴额度在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 安全费率方法有利于费率的“动态调整”和财政补贴政策的“区域差异化”。^[58]

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乡村多元一体化综合建设和全面发展的总体规划, 温科通过研究发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 乡村产业遍地开花, 但同时伴随产业特色不明显、同质化严重, 科技创新力不足, 产业融合程度低等问题出现。^[59]韩景旺和刘宾通过实际调研对河北省金融扶贫的成效进行分析和评价, 探索农村发展层次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的金融支持路径, 以实现金融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及时有效对接。^[60]郭小卉和冯艳博基于京津冀地区2014—2017年县域面板数据, 采用空间杜宾误差模型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消费型、保障型和发展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可以显著减缓相对贫困, 信用服务会明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61]

(田学斌: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胤: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吕荣杰, 徐梦瑶, 杨蕾.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J]. 金融与经济, 2021(07): 63-71.
- [2] 杨胜利, 姚健.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J]. 南方人口, 2021, 36(1): 31-42.
- [3] 杨胜利, 邵盼盼. 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西北人口, 2021, 42(5): 42-54.
- [4] 杨胜利, 高向东. 人力资本、社会支持与流动人口失业持续时间[J]. 城市问题, 2021(6): 83-94.
- [5] 杨胜利, 姚健. 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再测度与思考——以京津冀为例[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 10(3): 123-133.
- [6] 魏强, 吕静. 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养老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6(1): 99-107.
- [7] 高彦, 赵君彦, 曹园. 不同寿命下最优退休年龄的测算[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2): 75-79.
- [8] 尹成远, 仲伟东.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省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1, 41(8): 51-63.
- [9] 张亚明, 宋雯婕, 武晓涵, 等.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与多元路径[J]. 科研管理, 2021, 42(12): 19-28.
- [10] 代冬芳, 俞会新. 基于哈肯模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动力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6): 36-42.
- [11] 齐晓丽, 郭沛珍, 梁艳阳. 政府支持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J]. 财会月刊, 2021(4): 126-134.
- [12] 卞晨, 初钊鹏, 孙正林.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仿真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7): 12-22.
- [13] 王智新, 赵沙俊一, 朱磊. 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1, 42(01): 117-124.
- [14] 邢会, 王飞, 郭辉丽等. 税收优惠、企业异质性与实质性创新——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J]. 会计之友, 2021(10): 22-29.
- [15] 王雅洁, 韩孟亚.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空间联立方程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1, 38(12): 59-68.
- [16] 叶莉, 王苗, 许文立. 政府债务高杠杆、金融稳定与“双支柱”调控框架[J]. 投资研究, 2021, 40(11): 4-18.
- [17] 李国柱, 李晓壮. 新金融业态风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J]. 金融与经济, 2021(10): 30-39.
- [18] 魏学辉, 段小雪. 金融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J]. 财会月刊, 2021(2): 130-138.

- [19]康书生,袁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3):63-72.
- [20]王勃,白翠芳,李莹.异质性视角下以社会资本提升单位领导关系强度的路径思考——以变革型领导为例[J].领导科学,2021(18):70-72.
- [21]刘斐,夏显力.异质性预期、社会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中的农户有效参与[J].改革,2021(4):121-135.
- [22]李峰,朱钰.复合邻近性下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2021,35(2):21-30.
- [23]孙正林,卞晨,初钊鹏等.政府监管视域下碳排放规制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演化仿真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1,40(12):103-112.
- [24]郑林昌,李泽阳,付加锋.中国不同类型城市低碳、环保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J].财经理论研究,2021(1):12-23.
- [25]屈秋实,王礼茂,王博等.中国有色金属产业链碳排放及碳减排潜力省际差异[J].资源科学,2021,43(4):756-763.
- [26]邵红岭,崔玉妹,杨晴等.猪肉价格波动对中国生猪养殖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J].家畜生态学报,2021,42(12):91-96.
- [27]刘晓东,彭晓彤,白丽等.水足迹视阈下河北省农业用水驱动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11):188-198.
- [28]陈凯,陈钰,郭峰.能源、水资源和建设用地经济治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29]张伟,于思凡,王韶华.京津冀区际产业转移对能源消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J].管理现代化,2021,41(3):20-24.
- [30]王韶华,何美璇,张伟等.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1,37(5):110-116.
- [31]王树强,刘赫,徐娜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区际协调方法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1,29(3):37-48.
- [32]李从欣,王晓元.绿色金融对环境污染的政策效应研究[J].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2021,31(2):1-5.
- [33]王韶华,何美璇,刘晔等.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J].统计与决策,2021,37(20):109-112.
- [34]李国柱,黄琪骏.京津冀能源—经济—环境—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1,37(14):129-131.
- [35]王韶华,刘晔,张伟等.基于粗糙集与未确知模型的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差异性分析与协调性分析[J].运筹与管理,2021,30(5):200-207.
- [36]朱安祥.秦汉时期的盗铸现象与应对[J].中国金融,2021(5):95-96.
- [37]刘宏,贺彬.清末民初翟城村农业科技的改良与推广[J].经济论坛,2021(3):125-132.
- [38]刘文超,李辉.20世纪真实世界的微观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企业理论发展90年回顾[J].社会科学战线,2021(1):110-121.
- [39]李延军,林雪瑞.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间风险传染效应及影响因素[J].金融发展研究,2021(1):69-77.
- [40]卢艳辉.中美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分行业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37(2):136-140.
- [41]刘文勇,郭新利.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影响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21(4):114-128.
- [42]徐永利,张悦.中国与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4):116-127.
- [43]成新轩.中国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啮合点”[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5):122-129.
- [44]朱坤萍,康佳亮.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分析[J].商业经济,2021(11):1-4.
- [45]胡建梅,郝杰,张意博等.中国对外援助的空间演化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3):454-464.
- [46]乔敏健,马文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减贫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37(7):153-157.
- [47]杨栋旭,于津平.投资便利化、外商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经纬,2021,38(2):54-63.
- [48]杨栋旭,于津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J].国际经贸探索,2021,37(3):65-80.
- [49]潘涛,李惠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1,37(8):124-127.
- [50]鲍静海,韩小蕊.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中国流通经济,2021,35(4):82-92.
- [51]苗绘,王金营.中国农村土地集合信托模式创新与保障机制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7):127-136+145.
- [52]陈薇伶,黄敏,郭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构建[J].商业经济研究,2021(9):123-126.
- [53]马秀峰,倪学志.县域城镇化新动能:生态农业工业化[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4):40-46.
- [54]梁洁.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重点与路径选择[J].西南金融,2021(4):41-51.
- [55]熊晓轶,尹晓菲,史雪娜.土地流转背景下普惠金融赋能农村可持续消费增长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9):46-50.
- [56]王冬,柴国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居民消费: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2):109-120.
- [57]吴宇,许元博.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的动态模式

- [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2):79-84.
- [58]吴海平,李士森,尉京红.安全费率视角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研究[J].会计之友,2021(17):108-114.
- [59]温科.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创新系统的构建[J].中国果树,2021(11):113.
- [60]韩景旺,刘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61]郭小卉,冯艳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基于京津冀县域空间面板数据[J].武汉金融,2021(2):70-80+88.

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

陈志国 席增雷

一、2021年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为河北省区域经济、部门经济发展以及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从研究数量上看,2021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呈现稳步上涨趋势。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视阈呈现多元化特征,具体研究涵盖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竞争力、城市经济等方面,以及部门经济中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商贸经济等各个具体领域;同时,一些研究选题具有新意和时代性,深刻探讨了数字经济、碳排放等当前学术热点问题。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立足具体领域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研究,尤其对于产业集聚,除了深入探究工业、服务业、制造业等产业的集聚效应以外,也拓展探讨了物流产业、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从产业集聚的理论机制、影响因素、集聚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于河北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陈玉杰、刘胜、刘学军在《物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传递机制探讨》一文,以我国物流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对物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传递机制进行探究,认为隐性→隐性传递机制可以使企业内部的隐性创新思路传递到物流产业集群中,进而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提升我国物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依据。

第二,紧扣时代旋律,关注社会热点。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且在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的热点问题上,数字经济位列第五^①。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例如,王韶华、杨志蕙、张伟在《数字经济助推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一文,提出要利用数字经济助推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通过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有效化解河北的过剩产能,避免资源浪费;依托临近北京而具有的独特数字技术优势,可以更快地促进工业绿色协同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固定空间资源的经济集合,起到连接地区经济以及国家经济的重要作用。从生产角度来看,区域经济代表着某地区内的所有物质生产活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科学配置经济资源,调控内在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内涵持续丰富。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不断地释放,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协调性增强的良好态势。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不同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与碳排放、物流行业、交通情况等因素的耦合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

^① 新华社:《大数据看2022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2lh/2022-03/03/c_1128434876.htm。

区域经济差异、相关行业发展等对河北省区域经济的整体影响等。

王少鹏、苗欣茹、席增雷从空间分布以及空间效应角度分析了高校科技创新活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1]认为,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着引领社会创新的作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研究者搜集整理了2008—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ArcGIS的自然断点法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时空演化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空间效应,在引入控制变量的同时,对各变量的空间效应进行分解,深入探讨了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各省域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联系;各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更加集中;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促进效应;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规模等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因此建议,各区域不仅要大力推动高校科技创新,重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也要在扩大开放和发挥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注重职业和就业培训,充分发挥人才优势,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武义青、姚连宵分析研究了我国省域碳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基于该贡献率对省域经济发展方式作出划分。^[2]认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碳生产率、能源消费等联系密切,协调经济增长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对我国实现产业绿色转型,保障经济增长同时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利用中国1997—2017年省际数据,探究碳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判别各省域经济增长方式,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厘清省域发展现状,为碳减排、各省域经济发展转型方向提供了指导。研究结果将全国各个省域经济发展方式划分为低碳Ⅰ型、低碳Ⅱ型、中碳Ⅰ型、中碳Ⅱ型、高碳Ⅰ型和高碳Ⅱ型六种类型,并由此解释在1997—2017年中我国部分省域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最后给出建议:应进一步加强碳核算体系建设,构建灵活、安全、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技术创新,建设保障措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

李峰、朱钰引入社会经济特征对人力资本进行多维度的异质性细化,将复合邻近性、异质性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究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基于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维度指标对人力资本进行异质性细化,并在复合邻近条件下探究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复合邻近性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但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区域积累与效应发挥均出现了明显的“舍近求远”特征;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初、中级人力资本均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但中级人力资本邻地效应明显,而高级人力资本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均不显著;从社会特征角度来看,男性与女性的高级人力资本作用存在差异,男性高级人力资本对邻地具有积极影响,而女性高级人力资本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彭永芳、张梦凡采用实证方法验证河北省区域经济和物流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河北省经济和物流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4]认为,河北省经济和物流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强。研究者以河北省2001—20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构建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的指标体系,再利用熵值法计算指标体系中各个变量的权重,计算出物流和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最后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河北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物流综合发展水平都呈上升趋势,物流能力上升比较快,经济发展能力上升比较平缓,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耦合关系,并且耦合协调度在逐渐增强,达到了优质耦合协调程度,说明河北省经济和物流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强。

赵姗姗、王露爽、刘佳、卢秀茹以棉花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服务化作为一个评价整体,对棉花“五化”与区域经济的耦合程度进行定量分析。^[5]认为,河北省是黄河流域重要棉花生产地之一,承担着棉花生产安全及分散棉花产业风险的重任,也是区域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统筹河北省棉花生产“五化”与区域经济耦合系统的逻辑关系和耦合原理,运用无量纲化的熵值法处理研究数据,深入分析河北省棉花“五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与协调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棉花“五化”与区域经济各系统发展情况的综合评价指数存在明显的“剪刀差”现象,并有阶段性变化;河北省棉花“五化”与区域经济间耦合程度呈现上下波动特征,但大体保持良好耦合关系;耦合协调度走势与耦合度大体略同,但其协调等级变化更为明显;2009—2018年二者的耦合关系由濒临失调到初级协调再到中级协调状态,这表明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协调效应越来越明显。由此研究者提出五条建议:加快棉花“五化”与区域经济信息共享;改善棉花“五化”基础设施,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完善棉花社会服务体系,提供经济保障;加大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耦合发展;严控棉花品质品种,提升多元化附加值。

张彩霞、韩正涛设计了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区域经济绿色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将区域经济绿色协调发展视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6]认为,在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时,应突出绿色协调发展的时代主题,把经济效益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已不符合时代要求,而更应从多方面积极推进区域绿色协调发展。研究者基于现场调研数据分析了河北省区域经济绿色协调发展涉及范围,充分了解河北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将该系统划分为经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四大子系统,共32个相关指标。最后,运用熵值法对区域经济绿色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客观赋权,并测算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减弱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尤为重要,河北区域经济绿色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趋于合理化。由此提出建议:政府需要搭建平台大力支持并鼓励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技术研发,更要以政策为引导,制定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绿色科技成果转化。

三、区域竞争力

区域竞争力是支撑一个区域持久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讨论如何提升区域竞争力,创造竞争优势,为本区域经济在大区域中进行资源优化

配置,提供区域经济战略与决策的新思路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从区域科技竞争、区域产业竞争、区域人力资本竞争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韩素芬、王鑫斌基于对京津冀全域和京津冀各省(区、市)创新效率演变趋势的分析,提出了京津冀创新效率投入和产出指标,探究了创新效率变化的原因。^[7]研究者基于Malmquist-DEA方法对2012—2019年京津冀区域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研究表明,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正在缩小,京津冀全域创新效率逐渐提高,技术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衰退,技术进步指数逐渐提升,技术进步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技术效率,京津冀各省(区、市)中创新效率增长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河北、北京、天津,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成效逐步显现。基于此,研究者对京津冀创新效率的提高从增强统筹协调能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建立创新共享平台以及推动协同创新体系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对策建议。

何姝、余军探讨了创新资源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8]利用2015—2019年我国各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将创新资源数据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解释变量,并综合考虑把各地区的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等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当中。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未来需要继续提高创新资源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升教育水平,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恩极、李群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互动形式出发,揭示新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科技竞争的新特征,考察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9]认为,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存在策略互补型竞争,创新竞争已成为地方政府之间新的竞争模式。研究者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这种激励作用随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机制检验结果则表明,政府围绕科技创新展开竞争会提高企业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改善企业创新环境,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李林汉、田卫民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10]认为,数字金融水平和产业结构转型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子星”。研究者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具有积极的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的结果上,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能够缓解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

矫立军、周明生、吴云静、矫立超以天津市为例,对传统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效应进行研究。^[11]认为,要高度关注我国产业集聚中存在的问题——高新科技产业是否居于集聚的核心,高科技是否在区域经済中与其他制造业协同发展,是否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强调要在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研究者选取2004—2016年天津市高新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协整分析对两者协同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两者部门间产业关联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虽然存在长期均衡和协同发展关系,但也呈现出非均衡性特点,表现为高新科技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大于传统制造业对高新科技产业的支撑作用。基于此,应通过促进天津市高新科技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强化产业间关联、以实现高新科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协同均衡发展。

周爱军从人才生态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新区的发展现状、发展态势。^[12]认为,通过对雄安新区复杂的内外环境的基础测评,探索一条更为科学、适宜的人才生态环境优化路径,以人才的高质量发展来全面推动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研究者通过对雄安新区人才生态环境的指标设计与量化测评,得出如下结论:雄安新区人才生态环境建设正处于孕育生机的原生态阶段,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才种群和群落,但外来的高端高新产业人才群落尚未形成,与人才成长、成熟和再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产业、公共服务环境对人才的滋养能力不足,急需补齐短板。因此,应以“双一流”大学建设为核心构建雄安现代教育网络,以“京雄同质化”为目标夯实雄安的公共服务基础,打造重视人才、服务人才的现代化治理环境。

四、城市经济

城市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功能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物质基础。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体现了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区域经済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本身的发展。因此,通过分析城市经济现状,以此健全城市规模体系,大力发展城市圈,有利于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就城市空间格局、创新型城市发展、城市群、城镇化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赵安周、王冬利、王金杰、胡小枫将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切入点,对城镇化、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障碍性因子进行研究,通过应用耦合协调度和灰色 Verhulst 模型构建了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旅游业—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3]研究者对该城市群2000—2017年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和未来10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并对三者的障碍性因子进行了诊断。结果表明,2000—2017年,京津冀城市化综合水平和旅游产业水平均呈现增加的趋势,生态环境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2000—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其耦合的类型可划分为生态环境超前和城市化超前型;预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2018—2027年)三者的耦合协调度保持小幅度持续上升的趋势;从各一级指标对三大系统的障

碍度来看,人口城市化水平(UPI)、旅游收入(TRI)和资源要素条件(REI)对城市化、旅游业和生态环境三大系统的影响最大。总体来看,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应重点关注UPI、TRI和REI对三大系统的影响。

邢会、谷江宁、张金慧选取了中国2009—2019年273个城市面板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作用,并考虑不同要素禀赋结构、自然禀赋和制度禀赋的差异性。^[1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是中国提高制造业TFP的重要引擎。研究发现,这两个行业协同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我国大多数城市仍处于拐点左侧;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要素和技术要素丰富的城市更容易跨过拐点,发挥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自然禀赋丰富的城市更容易跨过“U”型拐点;《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的颁布会强化两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行政等级城市不利于两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发挥。研究结果为产业协同集聚理论提供了新视角,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赵培红、李庆雯研究了河北省沿海城市“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15]研究者基于“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机理的分析,构建了“港口—产业—城市”三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沿海城市秦皇岛、唐山和沧州在2013—2018年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成为制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较高,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互动作用关系;复合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港、产、城三者协调发展处在由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河北省沿海城市需要在提高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优化系统内部协调机制、加强与其他城市联系等方面发力。

陈娟、鲁斌从物理层、信息层和服务层3个维度提出了能源共享、信息共享和服务共享的未来城市能源共享体系基本框架。^[16]认为,共享发展理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加速突破和应用,将使未来生活场景发生深刻改变。能源共享是共享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互联网的核心价值是互联共享。研究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能源消费需求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城市未来能源综合利用体系的开放与共享、数字与智能、耦合与融合、去中心与市场化、全要素广域节能体系5个特征,并从物理层、信息层和服务层3个维度提出了能源共享、信息共享和服务共享的未来城市能源共享体系基本框架构建。

吴敬茹、杨在军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为背景,对京津冀城市群先进制造产业的集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索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17]研究者选取2016—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等9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先进制造产业集聚情况的影响因素,从京津冀城市群先进制造产业的资源获取能力、资源转化能力、创新发展能力、未来增长潜力四个维度构造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索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特征,呈现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向外逐次递减的分布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空间递减效应逐年减弱。此外,对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人口等是影响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张建文、梁彦庆、崔立焯、官洋溢、杨群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法和重心转移模型探讨城市经济集聚的时空变化特征。^[18]研究者选取了2012—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在基础处理并经统计数据对比验证的基础上,采用基尼系数、首位城市集聚度以及市域亮源地区均灯光强度表征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及各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经济集聚程度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上相对稳定,各城市经济集聚程度随时间变化分层更加明显;城市群经济集聚呈现稳定的双核—多中心发展空间结构,以京津为中心形成双核中心结构引领、西北—东南走向集中的高经济集聚区,以唐山、石家庄和廊坊为中心形成东北—西南走向的经济集聚第二梯度区,其余城市分布在城市群外围形成低经济集聚发展区;城市经济集聚在离散趋势上呈收缩

状态,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北—西南分布格局,时间演变上相对稳定;经济集聚重心无明显的方向特征,在东北和西南方向上小幅摆动。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当前国家的三大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其顺利实施对于缓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优化城市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促进生态、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了要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因此,为达到大力缩小京津冀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的最终目的,2021年河北省学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针对如何建立反贫机制,找准地区角色定位,利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方式推动地区社会、生态、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康霞、周立宁对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协同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19]认为,京津冀地区承载着建设成为国际先进创新型城市集群的历史任务,协同科技创新在打破发展藩篱、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研究者在分析区域科技创新协同效果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为促进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为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发挥科研院校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孙凯昕、王知人对京津冀地区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研究。^[20]研究者从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三个角度选取指标建立 TEE 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 2009—2019 年京津冀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考虑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因素分析与效应分解。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 TEE 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始终保持逐步上升趋势,最终均达到协调模式,并且发展各具特点,北京市具有鲜明的经济优势,天津市具有自身生态文化特色,河北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使用空间反距离矩阵,采用 SDM 模型,认为旅游收入对提高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生态环境发展较为被动,而经济发展在系

统内部极易增大各子系统之间发展差距,应加强经济在系统内部的枢纽作用,促进系统内部良性循环发展;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生态压力的大小以及生态响应的速度对邻近地区的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本地区,故加强生态建设会极大带动周边地区,稳步达成区域协调。

王韶华、杨志葳、张伟提出要利用数字经济助推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21]认为,数字经济可从“破旧”和“立新”两方面契合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的现实需要。“破旧”即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有效化解河北的过剩产能,避免资源浪费;“立新”则是指数字产业化催生新市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因为临近北京而具有的独特数字技术优势,可以更快地促进工业绿色协同发展。并基于此提出,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过程,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京津冀地区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统筹考量各地区发展现状,立足比较优势分工协作才能让各要素充分涌流,共同推动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

索贵彬、李曼、赵素彦对资源约束下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22]从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两个维度,对京津冀城市协同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分维度看在绿色方面整体表现较好,其次是协调维度和效率维度,而共享和创新维度则表现较差,尤其河北省城市创新严重不足。进一步分析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现其空间特征表现为“南北分异”,“北好南差”的空间格局依然明显。京津冀三地处于良好稳定的协同发展状态,三地在绿色协同方面表现最佳,而在创新协同方面表现最差。

刘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进行了探讨。^[23]认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不仅关系到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高效疏解,实现该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协调发展,构建新常态语境下具有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区域增长极,而且影响到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转变。因此,研究者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在阐释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对企业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影响基础上,

分析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现状及困境,并提出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生态环境、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建设、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产业支持等对策建议。

贾巨才、孔伟、任亮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冀西北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开展了研究。^[24]研究者以张家口为例,着力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并辅以协调发展度模型,对 2005—2016 年张家口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定量测度。得出,张家口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关联度逐渐增强,两者正处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耦合协调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并基于此提出,未来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应兼顾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稳步推进城乡环境治理进程,促进两者协调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李清、温可仪、刘海云提出,要利用自贸试验区联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5]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提出至今已实施 6 年,在获得许多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差异、未形成有效的互动和合作、创新驱动辐射带动不足等。基于此,应紧抓北京自贸试验区成立的契机,利用自贸试验区联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提出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政策谋划一体化、共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区域联动发展、探索产业合作模式推动京津冀三地产业链协同、北京引领津冀走向数字产业化发展以及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京津冀统一开放市场等对策建议。

六、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由在地理上相互邻接的、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的企业、供应商、金融机构等各市场主体组成的,目的在于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外部经济以提高区域整体竞争优势的区域经济集群。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产业集群能够促进规模化经营、优化市场结构,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市场主体协作促进产业组织优化。2021 年,河北省学术界就特定行业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效应、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等展开了探讨。

秦建群、户艳领、李佩利用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三步法、Sobel 检验分析互联网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影响和中介机制,重点考察了范围经济、交易成本和知识溢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26]认为,互联网整体上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在不同区域、行业和城市约束下,互联网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即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中部地区、大型及以上城市、低端等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通过范围经济、交易成本和知识溢出三个路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且均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大小依次为交易成本、知识溢出和范围经济。最后提出了通过发挥范围经济效应、提升交易效率、促进知识溢出来支持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等政策建议。

陈玉杰、刘胜、刘学军以我国物流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对物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传递机制进行探究。^[27]认为,隐性→隐性传递机制可以使企业内部的隐性创新思路传递到物流产业集群中,进而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物流产业集群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资源,促使物流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传递机制转变为显性→显性。隐性→隐性传递机制可以促进企业对已有创新成果进行再加工,为物流产业集群的持续创新提供动力。企业创新吸收能力在物流产业集群隐性创新能力的传递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在物流产业集群显性→隐性传递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不明显。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物流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提供了政策建议。

曹楠楠、牛晓耕、胡筱洁辨明了金融支持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机理,筛选赫芬达尔指数对新能源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选取了 2016—2019 年的相关指标月度统计数据,构建新能源产业集聚程度和金融支持之间的计量模型,以实证解析为依据,找准金融支持的短板和关键着力点。^[28]认为,金融支持是驱动产业集聚和集聚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新能源产业集聚是促进产业自身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现有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仍处于成长期,集聚效益和辐射效应尚未最大限度发挥,对金融

支持的依赖会进一步加强。最后提出政府应强化顶层设计,调控引导金融市场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创新融资模式、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应更加重视完善资本市场和产业金融体系的建设,打破产业集聚发展的行政藩篱,加速区域间资本流动。

孙颖、张佩佩、陈思霞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工业集聚程度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依据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检验了产业集聚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异质性。^[29]认为,工业集聚与环境绩效之间为倒“N”型的关系,存在两个拐点。在环境规制程度低的地区,工业集聚与环境绩效呈倒“N”型关系,但拐点有所变化;在环境规制程度高的地区,两者呈“U”型关系。在技术创新水平低的地区,工业集聚与环境绩效呈完全负相关关系;在技术创新水平高的地区,两者呈“U”型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工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后为促进我国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环境治理目标,提出了相应建议:鼓励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转型升级;坚持创新驱动,激发产业集聚与创新的交互作用,改善环境绩效。

王金营、王晓伟利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75个城市2008—2017年短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检验区域城市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不同匹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30]认为,人口集聚总是滞后于经济集聚,当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次序错位,经济集聚优先时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匹配状态,而劳动生产率高低有别。人口空间集聚高于或持平于经济空间集聚的匹配使得劳动生产率较低;经济空间集聚优先于人口空间集聚,人口集聚跟进追赶,则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若经济空间集聚处于稳定状态而人口空间集聚离心力强化时,劳动生产率将处于徘徊状态;当高经济空间集聚与高人力资本集聚和低人口空间集聚相匹配时,劳动生产率高位运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化理想状态。

王雅洁、韩孟亚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创新过程分成了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集聚

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31]认为,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在创新两阶段均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的地区交互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即邻近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技术研发阶段为正,在成果转化阶段不显著,邻近地区创新绩效对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在两阶段均为负;分时段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双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其地区交互作用则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强,且在空间溢出效应中表现出创新阶段差异性。

金浩、刘肖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32]认为,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的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最后提出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要素投入、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建议。

七、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学者们不断地深入研究,农业经济的研究范畴更加广泛和精细。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农村土地流转、农产品生产状况、农业资源利用水平、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绿色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苗绘、王金营、李海申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将金融信托模式引入土地流转。^[33]认为,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扩大、速度加快,以传统形式为主,存在金融支持力度不足、效率低、成本高、期限短、规模化效益不明显等弊端,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通过对黑龙江省五里明镇、安徽省含山县等地开展的

新型土地流转信托模式实践和分析可知,将金融信托模式引入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银行信托融资、土地资本化、土地收益质押权贷款等金融安排,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支持及综合金融服务,能够有效推动土地高效流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张亚军、苗俊玲、张旭青、张雄伟通过对河北省粮食生产状况分析,运用经济学原理,探讨出河北省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的目标值为3.6~3.8公顷,并提出河北省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以及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34]认为,政府应该把握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总体方向,采取多种形式的奖、补政策,促进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的形成;河北省各个县区应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扩大经营规模,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应该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推进城镇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

苏炜从土地流转、产权保护、政策支持等方面入手,对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管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路径进行研究。^[35]研究发现,我国土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够完善,各地区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办证工作进展存在差异,农业生产主体老龄化、妇女化问题严重,所以加速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此,要加强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制度保障,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创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社会服务机制,并完善农业规模化发展与管理的相关立法工作。

田颖莉对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机制建设进行了研究。^[36]认为,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存在服务成本过高、监管难度过大、服务程序烦琐等诸多问题。为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三农”,需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加速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体制创新。

王楚鑫、宁永红、丁立江认为当前农村经济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形态升级新阶段。^[37]分析表明,依托技术创新与大众新的消费需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既降低了农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

依赖程度,也延伸了农村产业价值链。为此,要将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坚持从农村寻找文化创意之根,助力文创产业与农村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发展。

王冬、柴国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影响农民消费的机制,通过构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评价体系,运用2009—2018年省域数据进行实证检验。^[38]结论显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农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但该提升效应表现为中、东、西部依次递减的区域非平衡特征;改革的组成成分影响农民消费的效应亦具有区域差异性,但也存在共性,即各地区依托农业主体生产能力指数实现农民消费水平提升的效应较强,依靠农业资金保障能力指数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最后,从提振农民消费的视角,提出了“补短板、强优势、提动力”的政策建议。

吴曼、赵帮宏、宗义湘为了理清公司与农户契约选择行为机制,建立了交易属性、关系特征与契约选择的研究框架,对湖北、广西两省份水生蔬菜加工公司、合作社、种植大户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选择8个水生蔬菜公司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39]结果表明,双边资产专用性越高,公司与农户越能形成显性契约关系;在公司与农户均进行了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升高有助于双方建立显性契约关系;在农户专用性投资近乎为零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升高会使得农户机会主义行为更加频繁,隐形契约更多;小农户专用性投资低、行为不确定性高、守信意识差,绝大多数“公司+农户”无法达成长期、稳定的显性契约关系。

刘晓东、彭晓彤、白丽、高春雨根据作物需水量和作物实际用水量测度河北省农业生产蓝水足迹及绿水足迹,利用LMDI模型解析河北省农业用水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40]结果表明,2002—2018年河北省农业水足迹数量呈波动下降趋势,技术效应、种植规模效应和节水效应对河北省农业水足迹变化呈增量效应;管理效应和种植结构效应对河北省农业水足迹数量变化呈减量效应。对此,提出针对提高节水技术、加强节水管理与调整种植结构等三方面改进意见,

从而实现河北省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八、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它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础，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时工业经济也存在着污染严重等问题，需要探究工业经济的绿色转型。因此为了进一步强化工业经济，需要对其深入研究。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从工业国际竞争力、工业技术创新、工业转型发展、工业效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发展区位等方面对工业经济展开了探讨。

杨千河通过分析我国智能制造的发展现状、应用优势及问题，提出了智能制造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机制的构建路径。^[41]认为，依托机器人运营的智能制造，既是现代科技的集成之作，也在产业制造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应用与国外相比尚存在不小差距，尤其是存在技术和产业短板。为此，急需形成以智能制造为抓手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互促共进机制，通过智能制造培育及其在其他领域中的推广应用，加快实施突围战略，构建高科技核心竞争力。

于强基于区位熵视角，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42]认为，产业转移是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北京制造业产业转移应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指引，以国家产业转移指南为总体导向，以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高效集聚为基本原则，从地区产业集中度优势和地区产业劳动生产率优势两个角度确定北京制造业产业转移先行行业选择条件。作者在传统区位熵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将区位熵概念扩展为投入区位熵、产出区位熵以及劳动生产率区位熵，赋予了区位熵更丰富的内涵和研究价值。在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可比较的29个行业大类的三种区位熵进行测算和比较后，结合三个区位熵标准的分析判断，对北京制造业向天津、河北转移的先行行业进行了选择。

王韶华、何美璇、刘晔、张伟基于专家赋权法和粗糙集理论，对2003—2018年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了考虑时间序列动

态性特征的改进障碍度模型识别关键障碍因子。^[43]结果发现，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受环境质量的影響最大，2003—2018年工业绿色发展、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工业环境治理、工业增长质量总体上分别呈先下降后上升、波动频繁、上升、下降、“N”型趋势；工业废水治理占工业环境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比重、工业环境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降低率和工业绿色产业比重等为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障碍因素。

张彩霞、马春旺研究了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44]认为，在评价工业发展时，应突出绿色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多方面分析工业发展水平，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因此，设计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研究者通过分析众学者对工业发展的研究，结合新时代要求，对工业绿色发展评价系统进行了改进。改进的评价体系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科技和社会五方面，共22个相关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客观赋权，揭示了工业发展各个内涵效益的具体权重，对促进我国工业朝着正确的绿色发展道路前进、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参考意义。

李从欣、王宁选取我国2004—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工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45]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其自身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以正效应为主，对工业技术创新的负效应逐渐减弱；工业技术创新对其自身和环境规制主要为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其自身、环境规制和工业技术创新主要为正向影响，在后期对环境规制及其自身的影响会转为负向。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工业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的贡献率逐渐增大，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两者之间的相互贡献程度较小。根据研究结果，研究者分别从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王伟、张晓晴、万宝春的研究表示，“十三五”期间，河北省能源消耗仍以化石能源为主，工业能源消费占比最高。^[46]利用规模以上营业收入衡量其经济产出水平，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对各

工业行业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经分析得出：高经济产出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等行业碳排放贡献率较高，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行业碳排放贡献率较低。

九、商贸经济研究

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建立，我国的商贸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基本形成主体多元、形式多元、开放发展的流通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经济运行中各类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国民经济中不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电商与物流企业的发展、区域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等课题进行了探讨。

吴敬茹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47]认为，中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包括物流业在内的各个行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流业要主动求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物流业更好地发挥其支撑作用、促进作用、先导作用和纽带作用，同时也给物流业发展带来了更多服务需求，有助于推动供应链物流的数字化转型。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中国物流业仍然存在系统性网络化水平不高、与其他产业缺乏融合与联运、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风险。应通过推动整个供应链创新、推动物流业创新、努力完善消费物流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物流供给侧改革等措施，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

高鑫、王黛鑫认为城乡居民收入是反映我国经济建设水平的晴雨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标志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下的流通业发展不均衡被认为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流通业的发展在改善流通要素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创造新的居民收入增长点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48]研究者采用VAR模型考量2000—2020年流通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动态变化的关系，认为商贸

流通业的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中短期，初期呈现为显著扩大居民收入差距，随着时间推移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成新轩、杨博以本国贸易附加值有效测度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自贸区网络中各个区位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49]认为，自贸区网络成员的增多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值的增长，制造业也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作用并不显著，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2008—2016年期间呈逐渐下降趋势；自贸区网络依据不同空间关联性规则呈现不同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同时产业空间关联性越来越容易在经济或贸易开放水平相似的成员之间发生；网络成员之间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与对外贸易开放水平、自贸区优惠利用率、原产地规则严格程度、外部冲击因素依据不同空间关联规则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网络中地理或贸易开放水平相似的成员之间有制造业产业链国内化的趋势。

张若望、张晓萍、李小娟，采用资产化贴现值、空间作用力、衰减系数分别构建了金融资本流动系数、人力资本流动系数和流通产业协同系数，基于经验数据，对2020—2030年雄安新区的金融创新和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情况展开了预测。^[50]认为，雄安新区的金融承接总量和效率在预测期内逐年上升，流通业资本化幅度未呈现“指数化”趋势；北京地区对雄安地区的空间作用力和人力资本流动系数均呈现“倒U型”结构，雄安新区预计于2022年完成核心功能区建设；北京与雄安新区的流通业之间存在技术势差，且不断缩小，预计于2024年实现“协同式”发展。在雄安新区建设初期，就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流通产业的协同发展，为未来雄安新区的发展奠定基调提供了参考。

郭海玲、马红雨、朱嘉琪从信息视角出发，基于信息生态系统和服务生态系统理论，结合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特点，在深入分析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以及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概念模型。^[51]认为，跨境电商信息服务机构要有明确的服务功能、服务对象、服务载体和服务时空。对于自身在信息服务环境中的职能和角色，

及对信息服务内容资源的范围和质量要求要进行明确界定。同时,信息服务机构也需要与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物流、跨境支付及跨境营销平台等众多跨境电商服务行业进行有效协同,各主体在竞争与合作的相互作用中达到共存和协同发展,实现信息服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2021年,河北省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需要提升的地方。第一,研究成果总体数量偏少。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2021年河北省有关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的论文数量不足全国的五分之一;第二,高质量研究成果总体偏少,从2021年河北省学者发表的论文质量来看,CSSCI、SCI、核心期刊占比偏少,与先进省、市差距较大。同时,在区域经济与部门经济方面鲜见学者在诸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第三,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应用研究。河北省相关研究多为以数据为支撑的应用型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理论等学科理论方面的研究鲜少。

(陈治国:河北大学教授;
席增雷: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少鹏,苗欣茹,席增雷.高校科技创新、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J].技术经济,2021,40(04):49-57.
- [2]武义青,姚连宵.基于碳生产率的我国省域经济增长方式评价[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42(04).
- [3]李峰,朱钰.复合邻近性下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2021,35(02):21-30.
- [4]彭永芳,张梦凡.河北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师,2021(11):161-164.
- [5]赵姗姗,王露爽,刘佳,卢秀茹.基于耦合角度的河北省棉花“五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5):69-78.
- [6]张彩霞,韩正涛.河北区域绿色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1,36(12):105-110.
- [7]韩素芬,王鑫斌.基于Malmquist指数的京津冀创新效率动态演变趋势[J].工业技术经济,2021,40(10):109-115.
- [8]何姝,余军.创新资源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1,40(08):47-51.(3)
- [9]李恩极,李群.地方政府创新竞争与企业创新[J].当代财经,2021(04):16-27.
- [10]李林汉,田卫民.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

论与实践,2021(02):8-16.

- [11]矫立军,周明生,吴云静,矫立超.传统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效应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产业组织评论,2021,15(01):108-137.
- [12]周爱军.雄安新区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与涵养路径[J].河北学刊,2021,41(06):147-152.
- [13]赵安周,王冬利,王金杰,胡小枫.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旅游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因子诊断[J].水土保持研究,2021,28(04):333-341.
- [14]邢会,谷江宁,张金慧.两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禀赋差异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21,35(12):72-79.
- [15]赵培红,李庆雯.沿海城市“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09):37-41+48.
- [16]陈娟,鲁斌.共享理念下的城市能源综合利用体系构建[J].热力发电,2021,50(11):144-150.
- [17]吴敬茹,杨在军.京津冀城市群先进制造产业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37(14):97-100.
- [18]张建文,梁彦庆,崔立焯,官洋溢,杨群叶.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集聚特征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3(12):95-104.
- [19]康霞,周立宁,李伟.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协同效果影响因素分析[J].投资与合作,2021(11):120-122.
- [20]孙凯昕,王知人.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统计与管理,2021,36(11):110-117.
- [21]王韶华,杨志葳,张伟.数字经济助推京津冀工业绿色协同发展[N].河北经济日报,2021-12-04(003).
- [22]索贵彬,李曼,赵素彦.资源环境约束下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1,44(06):117-121.
- [23]刘宾.协同发展中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路径探讨——以京津冀为例[J].理论探讨,2021(04):84-90.
- [24]贾巨才,孔伟,任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冀西北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02):167-173.
- [25]李清,温可仪,刘海云.利用自贸试验区联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J].商业经济,2021(01):13-15+28.
- [26]秦建群,户艳领,李佩.互联网发展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吗?——中介机制与经验证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06).
- [27]陈玉杰,刘胜,刘学军.物流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传递机制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1(08).
- [28]曹楠楠,牛晓耕,胡筱洁.金融支持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1,43(04).
- [29]孙颖,张佩佩,陈思霞.工业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治理关

- 系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04).
- [30]王金营,王晓伟.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匹配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21,43(06).
- [31]王雅洁,韩孟亚.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空间联立方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2).
- [32]金浩,刘肖.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1).
- [33]苗绘,王金营,李海申.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流转借助信托模式融资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10):101-109.
- [34]张亚军,苗俊玲,张旭青,张雄伟.河北省农户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研究[J].农业经济,2021(05):19-20.
- [35]苏炜.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管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1(02):28-30.
- [36]田颖莉.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机制建设研究[J].农业经济,2021(08):100-101.
- [37]王冬,柴国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居民消费: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2):109-120.
- [38]王楚鑫,宁永红,丁立江.农村文化创意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及发展路径[J].农业经济,2021(02):48-49.
- [39]吴曼,赵帮宏,宗义湘.农业公司与农户契约形式选择行为机制研究——基于水生蔬菜产业的多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0(12):74-86.
- [40]刘晓东,彭晓彤,白丽,高春雨.水足迹视阈下河北省农业用水驱动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11):188-198.
- [41]杨千河.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推进产业升级[J].宏观经济管理,2021(03):78-82+90.
- [42]于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基于区位熵视角[J].中国流通经济,2021,35(01):70-78.
- [43]王韶华,何美璇,刘晔,张伟.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J].统计与决策,2021,37(20):109-112.
- [44]张彩霞,马春旺.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1,36(01):108-113.
- [45]李从欣,王宁.环境规制、工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1,34(06):1-8.
- [46]王伟,张晓晴,万宝春.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河北省工业行业碳排放和经济产出分析研究[J].经济论坛,2021(11):5-9.
- [47]吴敬茹.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价格月刊,2021,(8).
- [48]高鑫,王黛鑫.基于VAR模型的流通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动态变化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1,(20).
- [49]成新轩,杨博.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空间效应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21,(10).
- [50]张若望,张晓萍,李小娟.雄安新区金融创新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基于非首都功能疏解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1,(6).
- [51]郭海玲,马红雨,朱嘉琪.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与概念模型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1,(19).

财政学研究

孙健夫

一、2021年财政学研究的总体进展

2021年,河北省财政研究学者和专业工作者为引领财政实践的科学发展,结合宏观财政运行的形势和本省的财政工作实际,从现代财政理论创新到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扩大社会就业和民生需求的财税政策,以及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财政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择其要者,有以下亮点:

关于现代财税理论领域的研究,近年来河北省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其研究范围

主要涉及财政的属性、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公共财政理论、公共经济体制的建设、财政职能的内涵等。2021年,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着重研究了公有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众所周知,财政是我国公共经济形成的重要基础,国有经济的资产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国家财政的投入,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也属于国有资产,并按着一定的分配制度上交国家财政,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公共经济和公共财政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研究成果先期发表在《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后在《海派经济学》2021年第3期转载。

河北省财政厅的科研工作历来讲求务实性研究,对本省的财政实际情况进行的专题分析很有价值。比如,高云霄发表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将河北高质量财政建设推向前进》,赵新海发表的《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河北财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河北财政高质量建设》,朱云飞等发表的《推进河北省高质量财源建设研究——基于“十三五”期间河北省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分析》《欠发达地区“要素密集型”行业税收运行分析——以河北省为例》《“十三五”时期河北省财政经济运行研究》《河北省财政运行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祝永革等发表的《“十四五”时期河北财政运行应注意的问题及建议》,白志平等发表的《基于河北实践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特色非常突出,对于指导河北省财政工作健康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研究是一个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首先是财税政策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效果研究,有多位学者给予了重点关注。我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引领着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但是,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实际产生可见的成果之前充满了不确定性,其成本投入的风险性往往会令经济主体不愿承受过大风险的压力。为消除企业的恐惧感,增强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政府给予其一定程度上的利益补偿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市场进行调节的重要体现。河北经贸大学李雪筠和郭峰发表的《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我国应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王殿茹和李卉婷发表的《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供给的影响分析——来自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一文,选取了2015—2019年制造业企业年报中的微观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法,对于影响企业创新供给的一个影响因素政府补贴进行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的创新供给之间相关性很强,影响作用十分显著,政府补贴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励。其次是有学者关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为完善问题。例如,河北工业大学刁心薇等在《中国管理科学》杂志发表的《混合碳政策下两产品供应链的协同研究》一文,在碳税—碳交易并行的混合碳政策下,面对存在低碳偏好的市场,以单一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其生产和销售存在一定竞争关系或替代关系的两种不同产品时,供应链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减排决策,并改进收益共享契约,提出了通过构造同解方程进行契约设计的新思路。河北工业大学栾新风等发表的《政府补贴对扶贫供应链的决策影响》,利用无政府补贴的基准模型,运用博弈方法,探讨了税收减免、生产成本补贴及组合补贴对贫困地区涉农供应商和生产商组成的扶贫供应链的决策影响。结果表明,这三种补贴均能有效改善扶贫效果,组合补贴下扶贫效果最好。进而提出适度政府补贴对扶贫有积极意义的观点。

关于民生财税政策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河北省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与党和国家以民文本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代表性成果有河北大学杨胜利和姚健发表的《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再测度与思考——以京津冀为例》。作者注意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各市的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增长较慢,而人口增速较快,造成公共服务资源压力增大,提出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关注具有较大人口吸引力的各市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升,进而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河北大学吴宇和许元博发表的《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的动态模式》认为,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作者提出了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资源集合—经济体激活”两步发展动态模式,有较强的创新性。河北经贸大学王晓洁等发表的《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与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提出鉴于“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迈向中度老龄化,需要实现到2022年全面建成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为此亟须构建配套的税收政策。王晓洁发表另一篇论文《人口老龄化下我国养老服务财政保障政策的演进特征及展望》,同样是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指出,纵观我国70年来养老服务财政保障的演进路径,养老服务的财政保障责任呈现出“福利性特征明显的少量供给的财政主导—财政保障责任缺失—财政保障责任回归—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元治理”的变迁特征。“十四五”时期,为促进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我国应重点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所需的财政保障政策,建立支持农村养老服务的财政保障政策,构建起养老服务财政保障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担机制。争取到2035年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养老服务制度。河北大学李超长期从事残疾人群体的研究,他在《农村重度残疾人家庭照料负担及政策支持研究》一文中指出,调查了河北等省份的重度残疾人生活照料问题,提出农村重度残疾人家庭不仅面临着医疗康复等客观负担、照料者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还面临着因照料重度残疾人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当前,农村重度残疾人照料负担的社会分担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为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贫困边缘群体返贫,需要大力整合残疾人社会救助、老年福利及扶贫政策资源,扩大集中托养服务覆盖面,开展照料者照料知识和技能培训,构建照料负担的多元参与分担机制。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问题是河北省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同样也得到了财政学界的高度重视。河北省财政厅冯鸿雁和朱云飞发表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河北承接对策研究》一文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了明显进展,初步形成京津冀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布局。然而,受限于河北的经济基础薄弱、先进要素匮乏、城镇化水平较低、

营商环境不佳等因素,河北的承接能力不足,制约了承接非首都功能的效果。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河北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需要进一步完善承接政策、筑牢承接基础、提升承接能力、优化承接平台和改善承接环境,在承接过程中实现河北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河北经贸大学马斌等发表的《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结合2005—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了京津冀公共服务的仿真模拟模型,在对模型科学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提出维持现状、平稳发展和优先发展共计三种模拟情景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等状况表现出阶段性、地域性和“虚假性”特征;京津冀各自子系统公共服务敏感性各不相同,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高速发展难以带动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显著提高;经济因素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起主导性作用,人口因素则起辅助性作用。这项研究对调整财政政策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此外,有较大部分的论著属于财政支出绩效分析等财政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河北大学一批青年学者得到了优秀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同时也得到了学校的支持,由此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得以快速成长。贺佳博士、李晓鹏博士和孙颖鹿博士分别与导师一起连续发表了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贺佳博士的专著为《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作者基于税收优惠政策,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机理和发挥作用的路径,对我国现行的高技术产业税收激励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现有水平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适当方法对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阐述了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最后就如何进一步通过税收激励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出了政策建议。李晓鹏博士的专著为《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作者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城乡配置四个维度考察了财政支出对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化空间

形态、城乡关系相应影响的理论机制实证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影响。孙颖鹿博士的专著为《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研究》，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针对地域特殊性及贫困复杂性，选取河北省燕太片区为研究对象，进行财政扶贫绩效评价及治理研究，突破已有研究视角，凸显学科交叉与融合。(2) 在对现有财政扶贫绩效水平提升进行对策建议的基础上，对相对贫困阶段的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提出对策。(3) 构建 DEA-Malmquist-Tobit 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进行绩效分析以及因素分析，通过静态绩效评价与动态绩效评价相结合，分析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从技术进步、创新及管理角度对分析效率变动进行分析，完善了 DEA 分析在财政扶贫绩效分析领域的应用，为地方财政改进扶贫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从过去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分析，河北省财政学研究仍然以河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和河北省财政厅为主要的贡献单位。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也都从自身学科专业设置的优势出发，提供了较好的财政政策建议。在此期间，河北省召开了新一届财政学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成员，并且面向社会发布了新一年的河北财政研究课题。可以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新生力量加入河北省财政学的相关研究。

二、财政基本理论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与公共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至于有的专家将财政与公共经济视为同一口径的概念。财政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财政收支的分配，行使配置资源的职能，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发挥着关键作用。武建奇指出，公有主体、国有主导是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首先，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生产关系决定了它比非公有经济有更高的效率，从物质条件方面促进“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性条件是富裕，富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源配置效率极大提高，没有这个条件即使“共同”了也不是共同富裕而很可能是共同贫穷。社会主义国

有企业的国有属性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国家用来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像“经济人”那样只斤斤计较于企业自身的微观效率。为了保证宏观经营便利会主动牺牲自身的一定效益以换取全社会整体上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即宏观高效抵消微观“低效”的差额后仍有“净剩余”，这是整个国家“算大账”而非只打私人公司“小算盘”，这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率提高、改进富裕程度的一个决定因素。同时，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它比其他经济成分更加重视和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从利益关系上促进“共同”的决定性因素。公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手段，其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一般也高于非公企业，公有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原则的真正落实有利于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公有主体保证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扩大到两极分化的程度。^[1]

三、河北财政运行质量研究

高云霄联系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出要立足新征程、担当新使命、再创新佳绩，坚定不移将全省高质量财政建设推向前进，努力为“十四五”开好局，为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财政支撑。作者提出了五个准确把握的命题，即准确把握提高政治“三力”，坚定不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财政工作；准确把握落实“三新”，坚定不移把主动作为强支撑贯穿财政工作；准确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把统筹资源促发展贯穿财政工作；准确把握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坚定不移把勇于争先推改革贯穿财政工作；准确把握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定不移把坚守底线防线。^[2]赵新海本着河北财政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出了六个必须，即必须更加注重财政资源配置的优化，必须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完善，必须更加注重民生保障的可持续性，必须更加注重财政体制机制的完善，必须更加注重财政风险的防控，必须更加注重财政法治的建设。^[3]朱云飞等认为，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等影响，河北省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不断积聚。为此，河北财政充分发挥自身职能，有效防控了公共风险的暴发，但也导致财政自身风险的累积，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持

续增长后劲不足, 财政支出保障难度逐步增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有隐患, 其他领域风险趋向财政转移。^[4] 祝永革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5] 他们还专题调研分析了河北省欠发达地区“要素密集型”行业税收运行情况, 得出结论: 税收收入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反映。河北省行业税收收入存在的以上特征, 根源在于河北省的产业规模与结构, 容易造成税收经济运行“低质量、无后劲、有波动、易失衡”四类风险。^[6] 为此, 他们提出了加强河北省财政高质量建设的对策建议。以优势产业为主导, 构建符合省情的现代产业链条, 成为高质量财源的主引擎; 以技术创新为引领, 优化各类先进生产要素供给, 打造高质量财源的新驱动;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当好高质量财源的助推器; 以深化“放管服”为手段, 不断改善发展环境, 筑牢高质量财源的有力支撑; 以重点领域为指向, 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外资金, 拓宽高质量财源的财力基础; 以提升资金绩效为目标, 加强统筹财政资源, 优化高质量财源的配置水平。^[7]

四、财政税收政策研究

财税政策研究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研究领域。总的来说, 有关研究是针对现行的财税政策观察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 并根据其存在的问题或者新出现的问题探讨完善的空间和方法。

(一) 关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

贺佳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研究。在阐述税收优惠政策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机理的基础上, 实证分析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效应。利用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 分别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支撑、科技转化效率这四个方面, 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效应。此外, 在模型中引入特性变量, 从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创新意愿、企业所在地理位置、企业金融约束这四个方面, 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异质性对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 目前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从具体的效应来说,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技投入的促进效应最强, 然后依次为科技支

撑促进效应、科技转化促进效应、科技产出促进效应。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措施来看, 研发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的促进效应较强, 减按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的促进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此外, 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创新意愿强、东部地区、金融约束小的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8] 李雪筠等为了深入认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水平, 从 R&D 经费投入强度、R&D 人员投入和三方专利数三个指标来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结果是: R&D 经费投入强度处于法国和美国之间, 且先落后于韩国和以色列等国家, 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R&D 人员投入总量大, 但投入强度低。从每千人就业人员从事 R&D 活动这一指标来看, 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差距较为明显; 三方专利数与排名靠前的日本、美国相比, 仅相当于日本拥有量的 25.59%, 美国拥有量的 37.42%。因此, 我国的研发产出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作者提出, 税收优惠政策应作出如下完善: 一是建立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一方面要提高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层级, 另一方面, 要整合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解决优惠政策碎片化的问题, 提高优惠政策的效率。二是直接税收优惠与间接税收优惠相结合。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逐步提高间接优惠政策占税收优惠政策的比重, 使两者协调配合。三是加强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9] 王殿茹、李卉婷研究了生产制造企业的财政补贴对于创新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有两个结论: 其一, 政府补贴对于企业整体的创新供给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利用 Logit 模型法可以发现政府补贴对于企业整体的创新供给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并且在分属于不同行业、不同控股类型、不同企业规模的企业, 政府补贴对于其的创新供给的平均处理效应是不相同的。其二, 政府补贴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有效的激励作用。政府补贴作为企业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 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有效的激励作用, 但是从研究中发现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 政府补贴在国有控股企业其起到的作用被弱化了。所以在正常的政府补贴的处理中, 要逐渐减弱国有控股企业由于企业本身与政府的政治联系得到政府补贴的便利性。^[10]

（二）关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供应链的稳定具有很强依赖性。刁心薇等分析了在碳税和碳交易政策并行的情况下，两产品供应链的决策和协同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1）在混合碳政策下，不可忽视供应链企业间的依存关系，只有加强上下游间的相互合作，这样才可以有效改善供应链整体的经济效益；（2）改进的收益共享契约是实现供应链协同的有效机制，它不仅使得供应链的利润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且可以保证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实现帕累托改进；（3）在收益共享契约中，零售商返还制造商的利润主要依赖于双方的议价能力和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然而只要其在特定区间内波动，就可实现供应链协同。研究成果对碳减排的政策设计有一定意义。^[11] 栾新风等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扶贫供应链的决策影响问题。他们认为，供应链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政府补贴引导激励贫困供应商积极脱贫需要核心企业将贫困供应商嵌入其供应链。作者以无政府补贴为基准模型，探讨了政府对供应商实施税收减免、生产成本补贴及组合补贴三种补贴方式对扶贫供应链的决策影响。结果表明供应商适度的分摊社会责任成本利于改善扶贫效果，政府补贴均对缓解相对贫困，增加社会福利和可持续扶贫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增加生产商利润。依据研究结果，作者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政府需要根据不同扶贫产业制定不同的扶贫补贴政策；第二，供应商应通过与其他供应商合作、银行贷款或融资等方式增强分担社会责任成本的能力，获得更多供应链价值增值，实现可持续扶贫。^[12]

数字化手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河北地质大学彭剑君等从促进河北省电子政务发展需求出发，就完善政府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了研究。虽然河北省的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一些成绩，但在当今大数据“爆炸”背景下，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在资金投入方面，作者指出，电子政务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但成功的电子政务会带来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河北省目前电子政务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投入的资金来源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政府拨款，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广泛力量，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低。因此，政府必须在加大投资的同

时积极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加快建立现代化投融资体制机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前期可以建立以政府财政投资为主、企业投资为辅的多元化资金注入机制；后期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授权或者外包的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进来，通过建立大数据中心、区块链中心等方式引导企业，企业通过参与电子政务的筹资、运营、维护等环节，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共赢，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大化的便利服务。^[13]

（三）关于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北省财政学界的高度重视。冯鸿雁和朱云飞研究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河北承接对策问题。他们针对原来的研究成果大多是某个层面的单先研究特点，从经济基础、要素供给、承载平台、发展环境、政策机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他们认为，尽管河北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有了明显进展，但对标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形成我国经济发展新支撑的协同发展目标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典型体现在京津冀经济总量在全国位势逐步下降，三地间发展差距却不断拉大，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作为三地发展程度最低的河北承接能力不足。而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调整现有政策：包括完善承接政策，加强京津冀规划对接和政策衔接；筑牢承接基础，形成京津冀紧密协同的产业链条；提升承接能力，吸引京津各类先进生产要素集聚；优化承接平台，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园区发展；改善承接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和生态治理。^[14] 朱云飞等分析了影响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程度是导致京津冀公共服务政策、标准差距较大的根本因素，削弱了公共服务领域合作基础；二是北京虹吸效应对河北公共服务供求两端都影响较大，人才、资本、技术等优质要素依然向北京转移；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客观增加了公共服务合作对接的难度，促进区域协调是京津冀面临的共同问题；四是河北地理环境复杂、行政区划过多、中心城市较弱和内部相互竞争，加大了公共服务的对接成本；五是京津冀公共服务对接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部分领域尚未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协而不同”现象依然存在。^[15] 马斌等对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路径进行的研究，认为京津冀地区由于经济总量、人口数量以及行政

地位的巨大落差,导致区域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存在不均衡、差距大等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进程中最具研究意义的区域。作者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了2005—2017年京津冀公共服务的仿真模型,模拟了不同发展路径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演进结果,并对模型科学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等状况表现出阶段性、地域性和“虚假性”特征;京津冀各自子系统公共服务敏感性各不相同,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高速发展难以带动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显著提高;经济因素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起主导性作用,人口因素则起辅助性作用。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公共服务政策;差异化重点关注敏感反馈程度极端领域;注重公共服务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16]王 晓洁等对雄安新区的税收政策的创新进行专题研究。作者认为,雄安新区特殊功能定位对税收政策创新提出了需求,包括高端高新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创新需求、吸引人才的税收政策创新需求和新型住房供给体系的税收政策创新需求。当前,雄安新区税收政策创新主要存在缺乏鼓励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和转移的税收政策、缺乏吸引高端人才落户雄安新区的税收政策、缺乏和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相配套的税收政策等三方面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尽快制定鼓励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和转移的税收政策、吸引高端人才落户雄安的税收政策和促进新型住房供给体系构建的税收政策。^[17]

京津冀作为在地域上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近年来在共同治理大气污染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河北经贸大学王月红和宣宇研究了其中的生态补偿问题。生态补偿是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迄今为止,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仍未出台,严重制约着京津冀生态环保协同发展做深做实,创新思维方式、构建非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厘清了传统生态补偿认识误区,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统一框架,将“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和“受益者付费原则”(BPP)统一在“改变者付费原则”(CPP)分析框架中,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京津冀大气治理CGE模型具体测

算了特定大气质量控制目标下河北应获得的生态补偿额。这对于加快补齐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短板、有效弥补河北大气治理资金需要、强化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和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治理具有普遍启示意义。^[18]

城乡融合发展也属于区域发展的一种特定概念。孙健夫、李晓鹏在《中国财政》杂志撰文,就我国“十四五”期间财政支持城乡融合发展提出建议。他们的总体政策建议是:“十四五”时期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作为一个五年期的政策,其目标设定既要考虑到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矛盾,又要与党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设计目标相衔接,与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相适应。政策要体现出先进性,明确优先发展农村农业的指导思想,让农村群众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以坚定农村群众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基于此,“十四五”时期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目标可以设定为:以财政收支稳健协调运行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职能,全力支持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助力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19]李晓鹏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

(四) 关于民生财政政策

民生问题涉及广泛。在河北省学者的研究中,较多地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

杨胜利、姚健对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进行了测度。他们利用客观赋权法,分别以各省市辖区范围内和全市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公共资源数量为计算口径,对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在全市

范围口径下,各市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要大于市辖区范围口径下的均等化程度;2006—2016年,全市口径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渐向好,而市辖区口径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未好转。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各市的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增长较慢,而人口增速较快,造成公共服务资源压力增大。全市(包括市辖区和县域)范围内各市公共服务供给增速加快,促进了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提升。今后在发展中需要关注具有较大人口吸引力的各市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升,进而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21]

社会养老是当前民生领域一项重要课题。王晓洁等对支持社会养老服务的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作者在分析现行税收支持政策缺陷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第一,从宏观角度优化人口老龄化风险下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健全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体系,以激励养老服务人才、老年人本身以及家庭照顾成员的发展需要。要加快制定鼓励老年人创造收入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政策以支持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要加快制定从青壮年经济向老年经济转型的税收政策,以吸引民间资本。未来出台的房产税也要针对老年人的特征加以考虑。第二,规范居家养老税收支持政策并加大支持力度。对赡养老人费用实行差别化的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政策,对退休后再就业的老人取得收入实行减税或免税政策,对达不到纳税标准的纳税主体在赡养老人时应根据相应状况进行财政补贴,尽快推进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全国范围实施,制定出台房产税时要给予老年人特殊照顾。第三,拓宽社区养老服务税收支持政策的覆盖面。第四,吸引民间资本,完善机构养老的税收支持政策。^[22]李娟等分析了唐山市推行智慧养老建设的路径。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促进智慧养老体系发展的重要保障;提高智慧养老的信息化水平,要打造具有自身特色和标准的智慧养老平台;大力推进智慧养老专业人才培养建设。智慧养老离不开政府资金的投入,应客观分析智慧养老的各项影响因素,在短板层面加大支持力度。^[23]

河北经贸大学刘叶等研究了支持三孩政策的家庭亲善福利体系建设问题。作者认为,三孩政

策是我国新时期根据人口结构实际适时调整的重要人口发展策略。为化解中国居民生育意愿偏低,构建生育友好的家庭亲善福利体系是完善“三孩政策”的解困之举。该体系应以弹性、照料、假期、援助四个维度为重点内容,整合有效资源,服务不同员工需求,并进一步推动形成国家政策法律制度保障。政府需要对相关税收优惠制度和生育津贴制度等进行新的审视和调整。^[24]

吴宇、许元博关注了巩固扶贫成果的问题。他们认为,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提出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资源集合—经济体激活”两步发展动态模式。作者对此模式进行了解释:该模式的运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经济资源集合阶段与经济体激活阶段。经济资源集合阶段,在明确各方职能、资源协作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政府支持、社会治理、公共监管、个体提升”的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治理模式,同时保证社会资金在筹集与使用中的公开与透明。经济体激活阶段,在资源集合阶段确保主体职能清晰、权责边界确定与资源整合效率优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巩固脱贫成果模式,调节经济资源,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逐步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体激活。通过两个阶段的共同作用,最终达到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为此,作者提出,需要通过政府职能的转换推动资源向脱贫地区积聚。在脱贫成果的巩固中,政府应剥离对具体事务规划执行的职能,专门从事政策方针制定、组织协商监管及适当引导等工作;注重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的协商性及弹性、与扶贫政策的衔接性,配合脱贫成果巩固有效率的整合与安排掌握的资源;调整参与经济管理的策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5]

李超等对重度残疾人的家庭照料政策给予了特别重视。作者指出,沉重的家庭照料负担极易导致农村重度残疾人家庭陷入致贫返贫风险。他们通过对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及广东等地428个农村重度残疾家庭的调查显示,家庭成员是重度残疾人最主要的照料者,以提供生活照料为主。农村重度残疾人家庭不仅面临着医疗康复等客观负担、照料者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还

面临着因照料重度残疾人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当前,农村重度残疾人照料负担的社会分担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为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贫困边缘群体返贫,需要大力整合残疾人社会救助、老年福利及扶贫政策资源,扩大集中托养服务覆盖面,开展照料者照料知识和技能培训,构建照料负担的多元参与分担机制。^[26]

五、财税制度改革与税收征管研究

胡晓英对共享经济的税收征管发表看法。作者认为,税务部门能通过“以票控税”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纳税的监管,但共享经济是与传统经济大相径庭的新兴商业模式,其交易主体和方式的改变势必给我国的税收征管增添新挑战。相应的配套实施办法一直没有出台,导致法律条文在实践过程中可操作性差。共享平台交易中还未能确定纳税主体,计税依据难以界定。因为,共享经济作为一种采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商业模式,如果还以传统经济的课税对象标准来判定计税性质是不合理的。这增加了税收管辖权判定的难度。作者提出,要加快相关税收立法,进一步明确共享经济的纳税主体,明确其中关于个人所得的认定及完善其费用扣除制度。基于共享平台里个人行为的差异,可建立专职从业者推定制度,将个人主要是从共享平台而获取的收入推定为工资薪金所得;将个人在共享平台兼职而取得的收入推定为劳务报酬所得。如果使用共享平台的个人可按自雇经济体去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那么能进行相应的专项扣除;如果个人能准确提供子女教育与赡养老人等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的家庭信息,那么可参考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来进行扣除。还要定义计税依据的界限。当平台与司机签订的是雇佣合同并且平台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时,网约车司机即为网约车平台的雇工,此时网约车司机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是按照员工工资计算的。而当平台与网约车司机没有签订雇佣合同且网约车司机的车辆属于自己,无须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赁,能够直接进行个人运营并仅需定期向网约车平台缴纳一定的信息服务费时,就认定网约车司机从事的是个体运营,应按照相应的个体工商户的税目进行纳税。这些建议很具针对性。^[27]

俞会新等基于政府监督视角,就政府创新补

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作者提出以下财政政策建议:政府应扩充创新补助资金的行业种类,加大对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助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因此政府应继续对国有企业创新进行扶持。一方面政府应在创新补助类型方面进行完善,目前创新补助的类型有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企业自主创新基金等,政府应在原有创新补助的基础上扩充创新补助的种类,设立行业创新补助基金,如在医药卫生行业设立医疗创新基金,对国家重点行业进行有效补助来促进该行业持续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应加大政府创新补助力度,政府应加大对国有企业创新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的创新,如疫苗、5G 通信技术等,应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28]

牛晓叶等对排污费改税给企业环保投入带来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在税制改革与清费立税背景下,我国于2016年12月进行了环境税改革,将征收了近40年的排污费改为由税务部门征收环保税,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这一研究采用广义DID方法来实证检验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其影响机制,深入剖析排污费改税是否意味着更高的环保税率、更强的执法强度或更确定的政策信号,为政府相关部门厘清环保税的激励机制并制定有效的规制政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税力度越大地区的企业环保投入也越高,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发现,排污费改税主要通过提高排污费率与增强征管执法两个机制发挥作用;排污费改税政策效应在行政干预力度强的地区、次高污染行业的效果更为明显。^[29]

王晓洁等探讨了非税收入的征管改革。作者认为,当前,非税收入的征管职责正在由财政等部门转为税务部门征收,而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根据对费税收入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情况,作者提出了短、中、长期改革目标,并且提出了几项重要改革议题。第一,以法律规范“非税收入”概念,把“非税收入”写入《预算法》。建议把财政收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税收收

人,一部分为非税收入。依此划分,社会保险费、债务收入等也应该列入非税收入的范围。目前我国《预算法》中还没有“非税收入”这一提法,应该在明确非税收入概念的基础上,把“非税收入”尽快写入《预算法》,为下一步非税收入法制化提供基本的依据。第二,考虑将部分非税收入实施“费改税”。要重新考虑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险税征收,将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改为地方附加税征收。第三,培育“协税”理念,构建税收共治格局。要保障非税收入的应收尽收,除了税务部门自身加强征管外,必须加强税务部门与其他行业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积极推进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协同共治。第四,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管理权限。^[30]

河北经贸大学李永贞对数字经济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的税收规则遭受挑战,世界各国致力于商讨出统一的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税收规则,但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共识。因此,各国纷纷推出单边的征收方案以维护本国利益。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提出,我国需要积极参与数字税制改革。首先,在数字税征收进程中,互联网企业应积极提供技术和管理方式,参与数字税改革,获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从而争得有利于自身发展以应对数字税的机会。其次,数字税的影响将是全球化的,只有加强国际间合作才能保证税收公平。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和经合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在全球制定统一的适应数字经济的国际税收规则时,我国积极发声,努力掌握制定权和话语权。互联网企业应该在政府的协调下,积极参与到数字税制改革中,为我国在国际上商讨有关数字税征收和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发出行业声音,进而尽可能维护企业利益。^[37]

李克桥等对河北省地市级财政透明度的研究。作者基于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地方财政透明度指数,分析了财政透明度的现状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全省财政透明度评价得分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各市财政透明度质量较低,财政透明度评价得分缺乏稳定性。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建设的推进、政府的主动性、地方对外公开信息的自由裁决度等为河北省地级市财政透明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尽快完善地方配套的

法治建设、强化地方执政者的绩效激励机制、重视媒体及网络建设、推进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方面的对策。^[32]

六、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财政支出绩效是公共财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目的在于防止财政资金的低效甚至无效使用,这是政府为人民理财的基本职责。

孙颖鹿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多层次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通过调研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贫困县1250户家庭的基本情况作为微观人力资本变量,并以统计数据为宏观变量,深入剖析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微观层面,人力资本要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储蓄能力、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以及财政分权度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负向效应不显著。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不同宏观因素的影响,不同人力资本要素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县域影响也呈现差异化特征。^[33]

于艳芳等关注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财政支出的绩效问题。作者指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持续性的特点。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领域的财政支出呈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这对我国的财政体制和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区别于其他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要考虑不同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特点,进行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依据财政部2020年印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在充分考虑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特点的基础上,设计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广泛征求河北省财政厅、高等院校、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等专家的意见,进一步优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对优化后的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为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提供参考。^[34]

李克桥等对河北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作者首先设计了由财政总支出和财政人均支出两个一级投入指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教学成果及师资力量三个一级产出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进而在河北省省级层面与各地级市层面进行绩效评价分析,剖析河北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并且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省级与市级财力均衡角度进行新的探索,研究省、市两个层面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等因素不匹配、义务教育支出区域间不均衡、部分地级市经费支出监管不严、支出效率较为低下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健全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体系、委托第三方参与绩效管理、进一步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落实到位等相关对策。^[35]

王冬年和周悦运用三阶段 DEA 模型研究了环保投资效率。作者基于 2008—2017 年石家庄市环保投入产出数据,运用三阶段 DEA 模型,在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对其环保投资效率进行测算与分析。研究表明,石家庄市环保投资规模与环境保护投资效率波动较大,个别年份存在投入冗余现象,环保投入的无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无效率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也使得环保投资效率无法达到前沿面水平。结合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现状,作者提出,可从增加环保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管理效率、加强技术创新及完善预算体制等方面发力,提升环保投资综合效率。^[36]

段洪波等基于参与精准扶贫调查评估的经验积累,以 J 县为例研究了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结合中国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政策要求,作者以平衡计分卡(BSC)为工具构建评价指标框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指标权重的设置,构建以贫困户收入增长与帮扶满意度为核心的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并将 J 县 2019 年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效果与资金运营等情况应用到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中,对 J 县产业扶贫资金在群众满意、资金效益、资金管理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37]

叶莉和曹思奇基于自助法修正的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政府扶持与国有能源企业产融

结合仅从效率进行了研究。作者利用 2010—2017 年国有能源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分析企业产融结合运行效率及政府扶持因素的影响,发现我国国有能源上市公司产融结合效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现阶段静态效率整体处于中上水平。政府扶持因素对产融结合效率值产生反向作用,表明尚存在政府干预过度、补贴投入冗余和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了产业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为此,作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对产融结合型国有能源企业进行扶持时,要适时完善能源行业补贴标准和门槛,严把审核关,兼顾公平与效率,杜绝“寻租”、骗补等行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产融结合中的作用,可在合规范围内给予地方国有能源企业更多自主权,优化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推动金融资本向能源行业转型升级方向、清洁能源领域和重要基础设施集中,同时,在国有能源企业应从自身出发,完善金融业务政策落实和风险监控情况报告体系,重视企业金融投资与能源主业关联度和投资回收风险等关键问题,防止出现利用期货业务投机套利、财务公司对外高息贷款等现象;积极开辟多元化融资渠道,真正实现国有金融资本与能源产业有效对接。^[38]

七、政府债务研究

张文君针对国债市场结构相互分割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多层次的国债流通市场的建议。在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推进债券市场的互通互联,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具体来说,第一,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交易系统,逐步实现债券市场中国债的审批、交易、登记等环节的整体统一,以促进全国统一的国债流通市场的建立;第二,进一步统一国债交易的托管、结算机制,不断健全各国债托管、结算子系统之间的联网工作,从而实现各国债子系统间的统一互联;第三,根据银行间国债市场回购制度的相关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在一定的资金额度内进入交易所国债市场,并逐步取消标准券制度,改成现有债券相对应的方式,以改革国债市场回购制度。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均衡发展场内、场外两个国债市场的主张。目前,我国国债流通市场呈现出银行间国债市场逐步扩大、交

易所国债市场不断萎缩的局面。具体来看,银行间国债市场实行的是做市商制度,而交易所国债市场采用的是指令驱动的交易制度,这两种交易制度各有利弊。但从各国国债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两种交易机制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于我国未来的国债市场交易机制,也应积极探索混合型的交易方式,发挥两种交易制度各自的所长,均衡发展场内场外两个国债市场,以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39]

叶莉等分析了政府债务高杠杆、金融稳定与“双支柱”的调控框架。作者对文献的研究表明,政府债务正在成为引发金融风险的关键因素,“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普遍认为是抑制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鲜有研究关注“双支柱”框架对政府债务高杠杆引致金融风险的调控机制与调控效果。该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在于:(1)基于政府债务高杠杆视角,分析“双支柱”调控如何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这对于完善和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立足政府债务的风险特征,将宏观审慎政策盯住目标细分为紧盯总信贷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偏离以及紧盯政府信贷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偏离,力图实现精准施策;(3)基于我国“双支柱”政策实践以及国内已有研究,选取准备金制度和资本要求两种形式宏观审慎政策与混合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寻求最适宜的政策制度组合以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40]

(孙健夫: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武建奇.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的新境界[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09).
- [2] 高云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将河北高质量财政建设推向前进[J].2021(07).
- [3] 赵新海.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河北财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J].中国财政,2021(20).
- [4] 朱云飞,安静.河北省财政运行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J].财政科学,2021(03).
- [5] 祝永革.“十四五”时期河北财政运行应注意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财政,2021(21).
- [6] 朱云飞,赵志伟.欠发达地区“要素密集型”行业税收运行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21(04).
- [7] 朱云飞,安静.推进河北省高质量财源建设研究——基于“十三五”期间河北省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分析[J].财政科学,2021(12).
- [8] 贺佳.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
- [9] 李雪筠,郭峰.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J].经济论坛,2021(09).
- [10] 王殿茹,李卉婷.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供给的影响分析——来自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2).
- [11] 刁心薇,曾珍香,孙丞.混合碳政策下两产品供应链的协同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1(02).
- [12] 栾新风,陈阳阳,康凯,张敬.政府补贴对扶贫供应链的决策影响[J].科技促进发展,2021(05).
- [13] 彭剑君,白海琦,曹鸿飞.促进河北省电子政务发展完善政府数字基础设施[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2).
- [14] 冯鸿雁,朱云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河北承接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1(01).
- [15] 朱云飞,安静,马源禾.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进河北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J].预算管理与会计,2021(02).
- [16] 马斌,姚东来,夏梓莹,韩冰.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优化路径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01).
- [17] 王晓洁,王丽,李金荣.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21(03).
- [18] 王月红,宣宇.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研究[J].生态经济,2021(03).
- [19] 孙健夫,李晓鹏.“十四五”时期财政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J].中国财政,2021(20).
- [20] 李晓鹏.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
- [21] 杨胜利,姚健.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再测度与思考——以京津冀为例[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03).
- [22] 王晓洁,李小倩,陈肖肖.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收经济研究,2021(04).
- [23] 李娟,刘迎香,杨立明.唐山市推行智慧养老建设的途径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 [24] 刘叶,孙雪华,王丁,李猛.支持三孩政策的家庭亲善福利体系的构建[J].社会工作,2021(03).
- [25] 吴宇,许元博.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的动态模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
- [26] 李超,陈德妹.农村重度残疾人家庭照料负担及政策支持研究[J].残疾人研究,2021(02).
- [27] 胡晓英.共享经济中的税收征管问题研究[J].上海商业,2021(07).
- [28] 俞会新,关忠路,张森,邢会.监督视角下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21(10).
- [29] 牛晓叶,刘宏地,曹志文.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21(21).

- [30] 王晓洁,周楚涵.非税收收入管理法制化:阶段演进、地方经验及未来展望[J].财政监督,2021(20).
- [31] 李永贞.数字税的推行对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及对策[J].河北企业,2021(05).
- [32] 李克桥;杨云腾;康世宇.河北省地级市财政透明度比较及提升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2021(12).
- [33] 孙颖鹿.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研究[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 [34] 于艳芳,陈泓亚.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1(03).
- [35] 李克桥,梁天琪,孙钰静.河北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效益实证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1(03).
- [36] 王冬年,周悦.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的环保投资效率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J].统计与管理,2021(04).
- [37] 段洪波,刘金辉.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 J 县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
- [38] 叶莉,曹思奇.政府扶持与国有能源企业产融结合效率研究——基于自助法修正的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J].科技促进发展,2021(01).
- [39] 张文君.我国国债流通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J].商业经济,2021(09).
- [40] 叶莉,王苗,许文立.政府债务高杠杆、金融稳定与“双支柱”调控框架[J].投资研究,2021(11).

金融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王重润 蒋超楠

一、2021 年金融学研究总体进展

2021 年,河北省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普惠金融、家庭金融、绿色金融、金融市场效率、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等多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

其中,在普惠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张爱英、孟维福的《普惠金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城乡收入差距》,郭小卉、冯艳博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基于京津冀县域空间面板数据》;在家庭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康书生、袁薇的《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以及康书生、余军的《客户非财务特征的金融排斥结构对家庭财产差距的影响研究》;在绿色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叶莉、房颖的《差异化定价视角下绿色信贷交易机制优化研究》以及宁金辉、苑泽明、王晓祺的《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在金融市场效率方面,代表性成果有范庆祝、孙祁祥、冯璐的《中国寿险市场存在议价能力差异吗?——基于供给侧视角的分析》以及乔敏健、高子涵的《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国有企业资本错配程度的比较分析》;在资本市场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李桂萍的《股利税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李志萍的《我国风险投资的空间特性及经济效应研究》;在金融

风险管理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李妍的《不完全信息视角下公私合作模式风险分担研究——基于参与主体的不同出价顺序》,张瑞锋、李欣秋的《基于 SWN-SEIRS 模型的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传染测度研究》,王重润、王文静的《同业业务对中小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孟娜娜、蔺鹏的《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竞争的影响:微观机制与实证检验》以及叶莉、王荣的《金融科技、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在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李国柱、李晓壮的《新金融业态风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二、普惠金融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2021 年,河北省学者就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康书生、冯艳博认为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仍存在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反贫缺乏协同、大扶贫格局尚未形成等问题。后脱贫时期,京津冀要深化“协同精准”,整合各自区域内和整体区域内扶贫金融资源,优化协同扶贫体制机制,推进构建大扶贫格局,以提高金融反贫效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

张爱英、孟维福采用 2007—2018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测算我国各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并从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特性视角探讨普惠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实证分析表明: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四个子维度均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且金融渗透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空间计量模型显示, 普惠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且本地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缩小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作用要大于缩小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2]

郭小卉基于京津冀地区 2014—2017 年县域面板数据, 采用空间杜宾误差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这一收敛效应主要作用于本地区, 对邻近地区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在二级指标中, 覆盖广度的减贫效果最好, 使用深度次之, 数字化程度排第三位。不同业态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一定异质性, 消费型、保障型和发展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可以显著减缓相对贫困, 升级型服务中投资业务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 信用服务甚至明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

徐临、张译允利用八省市 2010—2020 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 评估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1)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2) 在普惠金融政策的影响下, 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大于高收入家庭。^[4]

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金融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晓翌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和基金业四个方面重点研究了资本市场的扶贫现状, 提出了相应的扶贫对策与建议。^[5]

在后治贫时期, 重点在于寻求可持续脱贫的方略。李胜连、张丽颖、李润亚构造了金融科技创新、可行能力结构与农户持续增收之间的理论关系模型。以 665 份调研问卷为数据基础, 利用 SEM 模型, 对所构造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与优化。结果显示, 农户可行能力结构优化与科技创新是后治贫时期可持续脱贫的重要考量因

素; 传统守旧的资产管理观念依然阻碍着农户的持续增收; 后治贫时期物质资产的帮扶整体上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已不再显著, 相反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注重其社会资产与人力资本的增加才是未来返贫阻断的重要形式。^[6]

田颖莉认为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存在服务成本过高, 监管难度过大, 服务程序烦琐等诸多问题。为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三农”, 需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加速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体制创新。^[7]

曹袁阳、张欣慧基于 2011—2019 年 6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 对二、三线城市居民消费的正向作用强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由此可见,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我国消费市场向二、三线城市下沉, 政府应当重视二、三线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8]

余军、康书生基于中国 2017 年和美国 2019 年家庭截面数据, 通过构建收入(就业)决定模型, 运用 Shapley 值分解法, 将中美家庭普惠金融服务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三个核心维度进行了效果对比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1) 基金理财已成为美国低收入家庭增收的重要金融途径, 借贷和保险则成为激励低收入家庭就业的两大金融动机; 然而, 金融泛化导致的家庭收入差距尚未有收敛之势。美国家庭普惠金融可归为非均衡的高效率型包容增长模式。(2) 中国储蓄理财和统筹社保兼具家庭增收益贫性、收入差距低贡献性的特征, 借贷则具有增收益富性和收入差距高贡献性的特征; 三大金融服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激励作用微乎其微。中国家庭的普惠金融属于兼顾结构均衡性的弱效率型包容增长模式。均衡模式的效率虽偏低, 却是符合中国当下国情和包容性理念的普惠金融模式。^[9]

韩克勇、孟维福采用 2006—2018 年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从影响机制、非线性特性和空间溢出特性视角探讨了包容性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包容性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消费升级是包容性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机制。门槛模型显示, 包

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及其子维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非线性关系,但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非线性关系。空间模型显示,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且本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于提升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作用要大于提升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据此,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体系,并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消费升级的正向作用,通过消费升级这一传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0]

李瑞晶、王丽丽、程京京分析了融资担保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融资担保可以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未能有效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贵”问题。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的担保增信方式存在差异,抵质押担保对于银行贷款更有效,信用保证对于民间借贷更有效。不同规模的小微企业应用融资担保的增信效果也有所不同,规模较大的企业融担增信效应更强。^[11]

张文镜通过社会调查获取跨境电商供应链企业的融资数据,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改善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的融资绩效,并且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效果更佳。供应链网络健康水平与供应链网络嵌入程度与中小企业融资绩效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性。因此,应该不断创新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加强供应链金融的顶层设计,同时整合优化跨境电商供应链网络。^[12]

企业创新是发展创新型国家的关键。程京京等通过构建广义投贷联动指标发现,投贷联动对企业创新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风险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随着银行信贷的跟入呈几何倍数增长,银行信贷会弱化风险资本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其主要缓解的是创新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贷联动通过关注长期利益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途径促进企业创新。^[13]

三、家庭金融

伴随数字金融的发展,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2021年,河北省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居民金融素养对防范金融诈骗风险的作用和金融排斥结构对家庭财

产差距的影响等方面。

康书生、袁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14]

人口结构、教育资源、环境关系等非财务特征形成的金融排斥结构对家庭财产差距的影响不容忽视。康书生、余军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对应分析法测算出信贷、账户、保险三类非财务特征的排斥结构,利用Shapley值分解法得出他们各自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率。发现:(1)整体上,信贷排斥结构的财产差距贡献率最高,账户其次,保险最低;穷人家家庭的三种排斥结构的相对贡献率均高于富人家庭;(2)非财务配置机制可避开穷人家家庭的财务劣势,比财务配置机制更具包容性和鼓励性,但也避开了富人家庭的财务优势并对银行机构带来一定冲击,于借贷双方均不利;(3)对农村样本研究发现,学历、手机和年龄的账户排斥结构的财富差距贡献较为突出,其次为年龄和性别的信贷排斥,保险排斥整体较低。^[15]

偶发的金融诈骗现象给居民家庭生活带来困扰,各地政府对金融诈骗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予以打击。然而,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金融诈骗风险。李媛媛、张春蕾、随力瑞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Probit和Oprobit回归方法,研究居民金融素养对防范金融诈骗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有利于防范金融诈骗风险;风险偏好对金融素养对金融诈骗风险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减弱了金融素养对金融诈骗风险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对居民金融素养各维度(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行为)进行细分研究发现,各维度均可以降低家庭金融诈骗风险,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且金融技能与金融知识起关键作用。^[16]

四、绿色金融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绿色金融提供强力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展绿色金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加大对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2021年，河北省学者就区域绿色金融发展路径、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展开了分析。

王重润认为目前河北省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任务依然繁重，绿色金融要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构建科学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可以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提供行动指引，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为绿色环保、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支持。在需求端，要建立经过标准认证的绿色项目库，包括绿色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数字产业等，在指定平台及时公布绿色项目信息包括融资需求、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等，定期对项目库进行更新，建立公开透明的绿色金融市场。在供给侧，利用财政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费用补贴、创新奖励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绿色项目集聚，打造绿色金融机构聚集高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更好整合税务、行政审批、燃气、水电、环保等部门的相关功能，为企业提供多维度精准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减少银企信息不对称。^[17]

差异化定价视角下，建构能够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利益均衡的绿色信贷交易机制是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与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叶莉、房颖通过构建包括政府监管、银行供给与企业执行的绿色信贷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银行和企业绿色信贷交易过程中的策略选择，运用 Matlab 模拟仿真了影响三方利益均衡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绿色信贷交易过程的三方博弈存在多重演化稳定策略。通过优化绿色信贷交易机制，包括改变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初始行为偏好、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加强对银行的补贴力度、加大对企业的补贴与惩罚，可以促进三方博弈稳定策略向兼顾低利率、绿色生产与高效监管的理想区间转化。^[18]

宁金辉等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考察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作用机理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呈递增的时间趋势。^[19]

宁金辉、王敏基于公司金融期限匹配基本原理，利用“2016年绿色债券市场启动”这一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债券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债券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影响机理检验表明，绿色债券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信用评级较高企业、非高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信用评级较低企业、高污染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方面，绿色债券可以通过抑制投融资期限错配发挥降低企业风险的间接作用。^[20]

宁金辉、史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经过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且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缩小贷款规模，来降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21]

五、金融市场效率

资本配置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能够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现实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干预因素使得资本错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中。2021年，河北省学者就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国有企业资本错配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风险投资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作用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等展开了分析。

乔敏健认为，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纠正资本配置过程中的价格扭曲，对于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结合资本

配置理论、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构建了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纠正资本错配的理论框架。测算国有企业资本错配程度,并根据上市地点从海外上市与境内上市、H股上市与A股上市、H+N股上市与A股上市、H股上市与H+N股上市四个维度对比分析了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效果。^[22]发现境外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显著低于境内上市的国有企业,与境内上市相比,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更低。近些年,境内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低于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与在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相比,香港单独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更高。^[23]

优质中小企业贷款逐渐成为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价格竞争的主要空间,明晰国有银行与中小银行价格竞争策略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问题有重要意义。叶莉、房颖构建商业银行价格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研究,针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定价探究中小银行与国有银行竞争策略的演化轨迹及内外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价格竞争视角下,异质性银行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博弈双方的利益均衡来实现的;提高中小银行软信息分析能力和贷款市场竞争,能够促进中小银行与国有银行实现动态博弈均衡,推动博弈稳定策略向兼顾自主定价与低利率的理想区间转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解决融资贵的难题。^[24]

宫兴国、李贺杰以2014—2018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股票流动性正向调节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股票流动性越高时,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商业信用融资的作用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25]

企业创新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环节,风险投资在企业创业创新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袁媛选用风险投资机构数据与社会网络模式经验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结论:目标企业想获得源源不断的社会网络资源,必须通过风险投资者在企业发挥作用。^[26]

由于行业背景、市场交易、供给方信息差异

等因素,保险代理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议价能力可能存在差异。范庆祝等通过分析CHARLS数据包含的经验证据,评估了保险代理人和被保险人的议价能力及其差异。首先构建了一个测度寿险市场议价能力的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然后利用这一模型分析了保险代理人和被保险人的议价能力及其来源。实证结论表明,被保险人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平均来说,议价能力差异使得市场达成的实际价格比合理价格水平低8.43%;同时,保险代理人与被保险人的净剩余也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死亡风险较高、年龄较大、偏好风险的被保险人,在和保险代理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最终支付了比适合自身合理价格水平更低的实际价格,获取了较多的剩余。他们从行业背景等供给侧视角对溢价能力差异的来源进行了解释。^[27]

六、资本市场

经济政策对企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河北省学者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推进注册制与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的关系以及我国风险投资的空间特性及经济效应展开了探讨。

刘莎、田莹莹以2009—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使企业倾向于向下盈余管理,同时显著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提高盈利质量和财务报告质量;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带来的政府监督机制与社会监督机制影响企业盈余管理。一方面,在政府监督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顺利获取政府补贴,将提高盈利质量和财务报告质量;另一方面,政府补贴带来高度的社会关注,将监督企业经营,削弱盈余管理动机。^[28]

张晓萍、张若望选取我国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供应链集中度、盈余透明度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盈余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资本结构调整的偏离程度,提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供应链集中度能够显著降低资本结构调整的偏离程度,提升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同时能够增强盈余透明度对资本结构调整偏离程

度和调整速度的影响。^[29]

科创板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精尖产业培育注入新动能,科学合理评估科创板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对促进我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及证券市场有序运营具有重要作用。科创板上市公司普遍采用单一传统评估方法,缺乏公司价值驱动因素的考量,忽视公司非财务价值评估。林妍从科创板上市公司价值评估体系建设角度出发,探索公司价值驱动因素,明确价值评估方法选择路径,完善科创板价值评估机制,提高上市公司价值评估准确性。^[30]

依据中国股利税减税、差异化及调整三次改革的准自然试验,李桂萍利用2000—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联立方程组、多元回归模型等,实证研究了三次股利税改革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揭示了我国股利税改革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机理。^[31]

李志萍对我国风险投资的空间特性以及相应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基于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对影响省级层面风险投资空间集聚的因素、风险投资机构本地偏好的同群效应以及风险投资的空间集聚、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科技事业的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区域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均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投资集聚。^[32]

封文丽、温霞以2020年年报为依据,分析了上市公司质量的整体水平,并以2019—2020年实行注册制的公司和核准制下创业板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注册制改革提升了上市公司的质量水平。从具体作用机制来看,注册制下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强化外部约束,改善了上市公司运营的生态环境,从而提升了上市公司的质量水平。^[33]

王晓翌等基于巴菲特“烟蒂”择股法,以沪深300作为选股母集,以烟蒂指标($PB \times PE$)、净资产收益率、预测净利润增长率和市现率为择股指标,以指标中位数为阈值,借助量化投资技术,构建了一个“烟蒂”价值投资多因子策略。经过回测发现,与作为比较基准的沪深300指数相比,该策略无论是从年化收益还是从

夏普比率看,无论是在震荡还是在极端行情下,均具有明显的优势。^[34]

2019年底,沪深300股指期货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上市,成为我国首只股指期货。封文丽、耿悦研究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短期内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情况,通过选取其推出前后股票指数日收盘价数据,运用GARCH和TARCH模型分析。发现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引入短期内会增加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但影响程度有限;在信息冲击的差异分析中,利空消息对股票市场的冲击大于利好消息的冲击。^[35]

柴渊哲、孙玮、蒋超楠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关联、负债融资能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负债融资能力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但会促进企业的投资不足;金融关联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同时改善企业的投资不足,增强负债融资能力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改善负债融资能力对企业投资不足的促进作用。^[36]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对房价产生影响。王重润、赵昶利用2004—2019年30个省市的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整体上看抑制房价上涨,但基于遗产动机对房价上涨起促进作用,而基于无风险资产偏好对房价上涨起抑制作用。人口老龄化对房价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经由遗产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无风险偏好下的中介效应,中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因此,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同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老年金融体系,提高老年家庭的资金配置效率。^[37]

七、金融风险管理

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集中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经济政策风险以及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等内容的研究。

跨境资本流动逐渐成为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曹衷阳、关田田对跨境资本流动作用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及传导机制进行探讨,发现长期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不显著,其他投资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

有显著的助推作用；证券投资对国有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不大，但增加了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短期内，银行系统性风险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动比较敏感，国有银行对外国直接投资冲击的反应程度较大，但持续时间较短。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变动对国有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相对较小，对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冲击较大且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其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调节作用显著。^[38]

股权质押爆仓事件频发，对资本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逐渐引起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的重视。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背景下，王培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在厘清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交易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这种影响因上市公司产权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更显著。还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各利益主体解读信息的难度加大，控股股东实施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9]

辛兵海等基于 2009—2018 年 24 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定向降准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定向降准政策的实施增大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且随着实施力度的增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随之增大。定向降准政策通过增大银行的杠杆水平增大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定向降准政策下，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性比率较高，成本收益比较低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高。^[40]

在金融市场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市场极端风险溢出会影响一国金融稳定，因此需要关注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传染机制。袁薇等通过构建 MVMQ-CAViaR 模型用以分析我国五个主要金融市场间极端风险的传染路径，借助 Wald 统计检验及分位数脉冲响应工具探究各市场间极端风险传染的存在性、方向性和动态影响过程。研究发现，1% VaR 能较好地描述我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价值动态变化；模型参数和 Wald 检验结果表明，五个金融市场间存在单向风险传染，传染链条依次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

场、汇率市场及黄金市场，某一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价值有助于其他金融市场未来极端风险的预测；分位数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新息冲击对本金融市场影响力度更大、持久性更强，对其他金融市场影响较小、持久性较低，且作用方向不同。监管当局和金融投资者应密切关注金融市场间的极端风险传染，防范交叉风险传染带来系统性风险。^[41]

李媛媛、陈文静为考察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从金融生态主体、环境、调节三个维度出发，构造金融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运用稳定性指标进行预警研究，模拟多种冲击对当前系统的影响，探索现有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冲击，并以河北省为例，确定模型具体参数。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环境子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主体子系统的波动性最强，2020 年以后河北省金融生态系统便处于安全状态。在具体冲击情景下，P2P 停业对系统影响较小且有利于后期发展；银行业智能化转型不可一蹴而就，营业部一次性缩减上限为 3.1%。^[42]

张永礼将社会网络理论与神经网络优化算法应用于信用风险预测领域，阐述了智能算法优化后的神经网络模型在银行系统风险传播和个人信用贷款风险传播中的应用，同时介绍了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思维进化算法、灰色理论等神经网络优化理论及其应用。^[43]

李延军选取 2005—2019 年我国沪深 300 股指期货和沪深 300 股票指数日收盘价数据，结合股票推出时间、股价波动性，设置样本组、对照组，运用 GARCH 模型、DCC-GARCH 模型、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与现货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沪深 300 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间存在双向的风险传染效应，且经 DCC-GARCH 模型分析表明风险传染效应在动荡期尤为明显；影响这种风险传染效应的因素有很多，主要表现为微观因素中的股票市场流动性和股票市场不确定性与极端事件两个方面。^[44]

李延军、白云方等利用 GARCH 类模型度量了 2017—2020 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水平及风险传染程度，之后利用改进的事件分析法，量化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传

染的溢出效应、水平效应和趋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对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显著,风险共担和投资者资产配置调整是该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从统计显著性、效应大小和影响持久度来看,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水平效应和趋势效应有着不同的反应特征;由于贸易摩擦事件频发,导致投资者产生惯性预期,进而出现“贸易摩擦事件尚未发生、流动性风险传染便已上升”的现象。^[45]

李延军、唐胜芳以2004—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从投资者情绪异质性视角,研究股票流动性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股票流动性对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股票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短期行为理论”和“治理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相关性: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或者企业治理水平较差,股票流动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都会明显放大;考虑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下,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会加剧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且分组检验发现相比悲观情绪,乐观投资者情绪对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作用更强。^[46]

张瑞锋、李欣秋针对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传染问题,采用SWN-SEIRS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发现:SWN-SEIRS模型可以有效描述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传染路径与过程;网络规模扩大增加了信用风险传染的速度,增大了信用风险扩散范围;核心企业数量的上升虽然加快了信用风险传染的速度,但有效控制了信用风险扩散范围。^[47]

王重润、王文静运用上市中小银行2011—2020年股票收益率数据,采用CoVaR方法与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对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同业业务规模增长会加大中小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期限错配程度越高,同业业务对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越大。第二,当中小银行面对流动性冲击时,同业业务放大了流动性冲击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程度。第三,银行经营地域不同,同业业务对其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不同,区域性中小银行受到的影响比全国性中小银行受到的影响更大。第四,大银行系统性风险也会受到中小银

行同业业务风险溢出的影响。^[48]

陈凯、刘筱慧等重点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不良贷款率差异明显,2008—2019年期间呈现出“先降后升再分化”的变化趋势;对比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不良贷款率,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差异最小,东部地区差异在两者之间并呈持续扩大趋势;地区经济环境、金融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等区域因素对各省级行政区的不良贷款率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增速、贷款余额占GDP比例、财政自给率对地区不良贷款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存贷比、产业结构比产生了抑制的作用。^[49]

李媛媛、张春蕾、方会琳基于CHARLS(2018)数据,采用XGBoost算法识别出影响我国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的关键因素,并使用ISM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级结构关系,深层次挖掘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辨识出影响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的前35个重要因素。遵循从因素辨识到模型重构的思路,按照各因素之间由浅入深的逻辑构成,重构了兼具代际关系、人情关系与社会保障的因素层级,并将其归纳为浅层诱导因素、中层影响因素、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预防中老年家庭金融诈骗风险的对策建议。^[50]

李妍、刘颖、李吉栋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102个发展中国家2000—2018年6074个PPP项目数据样本,分析国家的制度环境与PPP项目风险分担结构类型和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PPP项目所在地的制度环境会通过项目风险分担结构来影响项目成败。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金融支持会促进私人部门选择承担更多风险,项目参与主体越多使得私人部门分担风险越少;制度环境对PPP项目风险分担结构类型的选择存在混合效应,并且对不同行业PPP项目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民众话语权、政府控制腐败能力等制度变量对私人部门参与交通、能源、水与污染领域PPP项目的积极性作用较为显著,在通信领域作用则不明显。^[51]

李妍、薛俭基于讨价还价动态博弈理论,考虑PPP模式中政府部门、项目公司与银行三方博弈过程的不同出价顺序,分别构建了政府与

“弱势同盟”之间、同盟内部之间的风险再分担模型，分析了均衡状态下各方风险分担比例。研究表明，PPP 模式风险分担博弈过程中先出价一方具有“先动优势”，考虑到谈判损耗因子，参与方应尽量减少谈判时间和成本等。研究对于 PPP 模式界定各参与方权利、义务和风险边界，有效促进参与方的理性行为和谨慎观念的培养以及提高谈判效率具有重要意义。^[52]

王重润、胡雨婷利用 2011—2019 年的季度数据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结构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房地产企业负债比例提高会增大银行系统性风险，短期负债占比越高则银行系统性风险越大。研究结果证实房地产企业融资“三条红线”监管新规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53]

八、金融科技

近年来，金融行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2021 年，河北省学者就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竞争的影响、“区块链+大数据”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河北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孟维福、刘佳鑫从技术创新的内生和外延两种视角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 2011—2018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不仅有助于企业通过内生方式获取创新水平的提升，还有利于企业投资的多样化与便利化，进而帮助其通过外延的方式获取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的内生式创新效应更为明显，相反，在国有企业及大规模企业中的外延式创新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所带来的融资约束和财务状况的缓解，在其助力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4]

金融科技兼具信息技术属性和产业发展特性，给银行业竞争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孟娜娜、蔺鹏利用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结合系统 GMM 回归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竞争的微观机制与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第一，金融科技显著影响了微观银行业竞争。一方面，金融科技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信息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作用于银行市场势力，抑制了微观银行业竞争。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市场挤出效应的外在机制作用于银行市场势力，促进了微观银行业竞争。第二，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微观竞争影响存在异质性，且主要源于银行微观竞争水平是否由市场化的市场势力决定。^[55]

叶莉、王荣基于中国 2011—2018 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综合讨论了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竞争共同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可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银行业竞争增强了金融科技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融资约束是金融科技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中介，金融科技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银行业竞争对融资约束的中介路径产生着非对称的调节效应，即银行业竞争能够加强金融科技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减弱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56]

李媛媛、刘思羽利用中国创业板 2010—2019 年科技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科技型企业不同阶段科技金融网络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密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 U 形影响，网络联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有 U 形影响。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网络密度的促进作用在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同时存在；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倒 U 形影响和网络联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U 形影响仅在成熟期与衰退期显著存在。^[5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不足和融资受限严重影响其健康发展，而缺乏抵押物、组织化程度低和信用记录缺失是造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境的主要原因。杨兆廷等认为“区块链+大数据”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而且可以建立起多方的信任机制。要基于“区块链+大数据”分别建立农地登记、交易和智能抵押系统；构建起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联合体的横向组织优化，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产业联盟链的纵向组织优化；构建以村为信息节点，采集多维信息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征信体系。^[58]

九、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2021年,河北省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机制、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发展等方面。

张双才、尹庆伟在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建立了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模型,利用200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9]

李国柱、李晓壮构建了新金融业态风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新金融业态中四类金融风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后运用偏态t分布估计重点考察新金融业态中重要事件的发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作用。研究表明,三个期限维度内,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显著,市场风险则为负向影响。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在低分位数下抑制作用显著,在高位数下促进作用显著。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期望与标准差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与偏度呈负相关性。宽松(收紧)的新金融决策虽然在短期内促进(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对中长期的影响效应不足。^[60]

王晓翌、纪世乾认为,金融对产业转型和升级以及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催化剂的作用,而金融对科技创新支持的主要落脚点在企业。他们构建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并对河北省2010—2018年间的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状况进行纵向对比分析,通过河北省与京津冀经济区域平均水平的横向对比,发现存在的不足,据此提出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61]

(王重润: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蒋超楠: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康书生,冯艳博.后脱贫时期京津冀金融反贫长效机制构

建[J].北方金融,2021,(06):13-20.

- [2]张爱英,孟维福.普惠金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城乡收入差距[J].东岳论丛,2021,42(09):63-76+191.
- [3]郭小卉,冯艳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基于京津冀县域空间面板数据[J].武汉金融,2021,(02):70-80+88.
- [4]徐临,张译允.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基于河北等八省市的经验分析[J].河北金融,2021,(12):17-21.
- [5]王晓翌,任鑫楠.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精准扶贫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1,(02):11-19.
- [6]李胜连,张丽颖,李润亚.金融科技创新、可行能力结构与农户持续增收——基于665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检验[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05):42-49.
- [7]田颖莉.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机制建设研究[J].农业经济,2021,(08):100-101.
- [8]曹衷阳,张欣慧.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影响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21(24):21-29.
- [9]余军,康书生.中美家庭普惠金融服务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效果对比研究[J].武汉金融,2021(09):49-60+70.
- [10]韩克勇,孟维福.包容性金融发展、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J].现代经济探讨,2021,(07):93-104.
- [11]李瑞晶,王丽丽,程京京.信贷资金、融资担保与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的比较分析[J].上海金融,2021(04):24-32.
- [12]张文镜.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绩效——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21(16):176-179.
- [13]程京京,王彧婧,俞毛毛,杨宜.投贷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21,37(09):180-183.
- [14]康书生,袁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03):63-72.
- [15]康书生,余军.客户非财务特征的金融排斥结构对家庭财产差距的影响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1,41(01):61-77.
- [16]李媛媛,张春蕾,随力瑞.居民金融素养对防范金融诈骗风险研究——兼析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08):92-95.
- [17]王重润.加大对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N].河北日报(知与行),2021-02-03.
- [18]叶莉,房颖.差异化定价视角下绿色信贷交易机制优化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12.
- [19]宁金辉,苑泽明,王晓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J].金融论坛,2021,26(06):7-16.
- [20]宁金辉,王敏.绿色债券能缓解企业“短融长投”吗?——来自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21,(09):48-59.
- [21]宁金辉,史方.绿色信贷政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

- 财会月刊, 2021, (21): 44-53.
- [22] 乔敏健. 国有企业境外上市的资本错配纠正效应研究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03-01.
- [23] 乔敏健, 高子涵. 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国有企业资本错配程度的比较分析 [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02): 110-118.
- [24] 叶莉, 房颖. 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定价研究——基于银行竞争视角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05): 49-55.
- [25] 宫兴国, 李贺杰. 股票流动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商业信用融资 [J]. 财会通讯, 2021(16): 65-69.
- [26] 袁媛. 风险投资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作用研究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04): 41-45.
- [27] 范庆祝, 孙祁祥, 冯璐. 中国寿险市场存在议价能力差异吗? ——基于供给侧视角的分析 [J]. 经济科学, 2021(01): 122-133.
- [28] 刘莎, 田莹莹.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盈余管理吗? ——基于政府补贴视角 [J]. 财会通讯, 2021(18): 89-93.
- [29] 张晓萍, 张若望. 供应链集中度、盈余透明度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J]. 财会通讯, 2020(23): 51-55.
- [30] 林妍. 我国科创板上市公司市场价值评估分析 [J]. 会计之友, 2020(23): 140-143.
- [31] 李桂萍. 股利税与权益资本成本: 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1-09-01.
- [32] 李志萍. 我国风险投资的空间特性及经济效应研究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11-01.
- [33] 封文丽, 温霞. 全面推进注册制与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J]. 财会通讯, 2021(24): 8-12.
- [34] 王晓翌, 张金领. 基于 Python 的“烟蒂”量化投资策略构建与实证分析 [J]. 中国物价, 2021(03): 78-81.
- [35] 封文丽, 耿悦. 沪深 300 股指期货推出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J]. 北方金融, 2021(01): 29-34.
- [36] 柴渊哲, 孙玮, 蒋超楠. 金融关联、负债融资能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J]. 财会通讯, 2022(06): 62-65+71.
- [37] 王重润, 赵昶. 人口老龄化、财富效应与房价关系研究 [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02): 105-108.
- [38] 曹衷阳, 关田田.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1, 42(06): 54-64.
- [39] 王培辉, 王双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J]. 武汉金融, 2021(07): 69-78.
- [40] 辛兵海, 朱晓娜, 刘雪薇. 定向降准、银行异质性与风险承担 [J]. 华北金融, 2021(03): 1-11.
- [41] 袁薇, 王双微, 王培辉. 我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传染路径研究 [J]. 金融监管研究, 2021(03): 80-91.
- [42] 李媛媛, 陈文静.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稳定性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J]. 系统科学学报, 2022(03): 125-130.
- [43] 张永礼. 基于社会网络模型的金融市场风险交叉传染机制与智能防范策略 [M].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21-10-01.
- [44] 李延军, 林雪瑞. 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间风险传染效应及影响因素 [J]. 金融发展研究, 2021(01): 69-77.
- [45] 李延军, 白云方, 王诗惠. 我国金融市场间流动性风险传染与防控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J]. 金融发展研究, 2021(06): 10-18.
- [46] 李延军, 唐胜芳. 股票流动性、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 [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3(03): 18-29.
- [47] 张瑞锋, 李欣秋. 基于 SWN-SEIRS 模型的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传染测度研究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1, 42(02): 20-26.
- [48] 王重润, 王文静. 同业业务对中小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 [J]. 南方金融, 2021(08): 40-52.
- [49] 陈凯, 刘筱慧, 王雪, 史升平, 李刚.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10): 116-127.
- [50] 李媛媛, 张春蕾, 方会琳. 我国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预警与因素层级研究——基于中国情境下的辨识与重构 [J]. 西北人口, 2022, 43(02): 15-27.
- [51] 李妍, 刘颖, 李吉栋. 制度环境与 PPP 项目风险分担结构影响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 PPP 项目数据 [J]. 金融与经济, 2021(09): 24-31.
- [52] 李妍, 薛俭. 不完全信息视角下公私合作模式风险分担研究——基于参与主体的不同出价顺序 [J]. 科研管理, 2021, 42(06): 202-208.
- [53] 王重润, 胡雨婷. 房地产融资结构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J]. 河北金融, 2021(04): 42-48.
- [54] 孟维福, 刘佳鑫.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内生”还是“外延” [J]. 学习与探索, 2021(11): 119-127.
- [55] 孟娜娜, 蔺鹏. 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竞争的影响: 微观机制与实证检验 [J]. 南方金融, 2021(12): 3-17.
- [56] 叶莉, 王荣. 金融科技、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06): 49-57.
- [57] 李媛媛, 刘思羽. 科技金融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06): 119-128.
- [58] 杨兆廷, 李俊强, 付海洋. “区块链+大数据”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研究 [J]. 会计之友, 2021(04): 156-161.
- [59] 张双才, 尹庆伟. 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 [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11): 156-160.
- [60] 李国柱, 李晓壮. 新金融业态风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J]. 金融与经济, 2021(10): 30-39.
- [61] 王晓翌, 纪世乾. 河北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现状及对策研究 [J]. 经济论坛, 2021(08): 114-124.

法 学

法学理论研究综述

董颖

一、2021年法学理论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道路探索中成功经验,成为学术界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法治经验,传承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中国法治的发展变化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并通过一系列法治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河北法学界因时而进,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总结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法治经验史料,研究涉及红色法治理论的多个领域。同时,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也走向深入,力争深化理论研究,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化表达。在法制史研究方面,研究更具有专业性特点,寻求特色学科有所突破。总体上看,河北法学界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较上一年度有较大幅度提升。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

伊士国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重大实践价值,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的战略地位,并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工作部署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为真正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澄清了理论认识的误区。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203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远景目标,即“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实现这一远景目标,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因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离开了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无法顺利开展,也无法获得成功。而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2035年如期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根本保证所在。^[1]

梁平探讨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问题,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在于人,需要高校培养越来越多的“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只有全民法治素养的全面提升,才能使人才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第一资源”。这就要求高校的法学教育不能局限于法学专业学生,而是需要面向所有学生,深入开展法治理念、法治信仰、法治精神培育和法学知识、法学实践教学,推动校园法治文化建设,使法治成为每一个人的内在修养、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即高校要树立把每一名学生培养成为融专业、德育、法治于一体的高素质人才。高校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推动法学教育教学改革,面向全校师生、不分专业领域,构筑全面依法治国人才资源的“基本面”。当前对“法治人才”的理解偏狭,法治理念培育先天不足,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有待完善,需要着眼于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人才”的定位,构建全景式、融合式、渐进式的“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以法学专业学生为重心,以所有学生为

“基本面”，构建全视域、全覆盖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要打破人才培养壁垒，建立融合式、共享式的“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型，即从传统意义上的法学专业学生教育转向全民法治教育，实行渐进式高校“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培养路径。新时代“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是高校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的范围和境界，高校需要着眼于“十一个坚持”对人才法治素养的要求，着力补齐法治人才教育短板，即法学专业学生“厚德育、强专业、重实践”的有机统一，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治信仰、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培育，使高校培养的所有人才都能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第一资源”。^[2]

马一超、尼培红认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指明的政治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唯一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领导的性质、定位、作用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断，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就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3]

三、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法治经验

姜祖桢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戒毒工作方略的沿革。指出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至今的 100 年间，高度重视毒品问题，并把戒毒方

略的探索与实践作为禁毒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戒烟措施发端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目标明确、措施有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带头作用，制定了分人分期戒除、实施奖惩办法、研发戒烟药物等措施，并把戒烟与宣传教育、说服教育、榜样教育、集体教育、个别教育联系起来，不仅号召广大烟民戒除烟瘾、重新做人，而且注重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禁戒鸦片烟毒运动，禁绝鸦片烟毒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有效的禁戒措施，仅用了 3 年多的时间就基本消除了过去 200 余年来未能解决的鸦片烟毒问题。之后的 30 多年里，尽管鸦片烟毒问题偶有复发的动向，但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制定了关于严禁毒品的相关政策、法规，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毒品问题没有大规模爆发流行。1990 年至 2006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戒毒方略处于初创成型阶段，制定了全国性禁毒戒毒法律法规，规范戒毒场所与创设戒毒体系，确立了吸毒人员的身份和相关权益，探索系统科学的戒毒措施与方法，重视戒毒科学研究工作。戒毒法律法规初具规模、机构相对稳定、管理愈加规范、措施更为系统、方法趋于多样，为今后戒毒工作向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7 年至今，是戒毒方略的确立成型阶段。21 世纪以来，在国际性毒品问题的猛烈冲击下，中国已由毒品过境受害国转变为毒品过境、消费与制造并存的国家。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毒品滥用形势，以《禁毒法》《戒毒条例》为代表的法律法规及一批部门规章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戒毒法律体系更加健全，更加注重对戒毒人员的人文关怀，注重戒毒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戒毒工作取得了斐然成就。2008 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戒毒方略处于完善定型阶段，戒毒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戒毒基本原则更为明确、戒毒场所管理更为规范、戒治康复方法更加科学。戒毒机构以提升教育戒治质量为中心，不断强化戒毒专业队伍建设、完善戒毒场所功能设施与物质保障、帮助戒毒人员重建社会支持系统、推进戒毒工作社会延伸，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4]

骆艳青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认为强调司法的人民性，强调司法实践应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是党领导法治建设的一大显著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期，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法治思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的提出传承了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这一党领导法治建设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通过习近平同志的历次论述可以看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包涵了法治建设为了人民、法治建设依靠人民、法治建设造福人民、法治建设保护人民、法治建设效果由人民来评判等精神实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根本动力、根本目标和根本尺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原则、立场、理念和基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新时期的延伸与发展。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法治原则的延伸与发展，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法治理念的延伸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传承和发展了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依据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以人民为中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传承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5]

刘勇等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平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进路，总结了党领导平安建设的历史经验。首先是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平安建设的最高原则。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平安建设领域的体现，是在我国平安建设实践发展历程中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同时，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平安建设的根本立场。平安建设的核心是人，以人民为中心是平安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平安建设的着眼点、落脚点。必须把“自治、

法治、德治、智治”四治协同作为推进平安建设的基本途径。强化自治的基础作用，引导人民群众增强自主意识。强化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平安建设。必须强化德治的教化作用，以德治扬正气，增强平安建设的道德底蕴和情感认同。强化智治的支撑作用，大力推进智慧治理，增强平安建设预见性、精准性、实效性。牢固树立强基固本的思想，建立健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的工作机制，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高基层战斗力。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一是补齐认识短板，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二是补齐机制短板，努力形成平安建设的整体合力。三是补齐法律法规短板，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在平安建设中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尽快出台《中国共产党平安建设工作条例》，推动新时代党领导平安建设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该条例应继承和发扬党领导平安建设优良传统，充分吸收这些年平安建设的创新成果和经验，将党领导平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任务、领导主体及职责、工作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监督和责任等通过高位阶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6]

李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经验。认为百年反腐主要有以下经验：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不论是执政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腐败的危害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把治理腐败作为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在建党之初，党的一大至四大通过的党纲和党章中，就对党的纪律作出了具体规定。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腐败斗争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是党的领导始终贯穿在反腐败斗争的全部实践中，这有力揭示了反腐倡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这是廉政建设始终能够坚持正确方向的关键。第二，制度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障。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有力地规范和监督党员干部行为，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起到独特作用。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第三，权力监督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内容。只有扎牢不能腐的笼子，让人民监督权力，

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国情出发强化对权力监督制约的重大制度创新。发挥国家监察的重要作用,确保所有公权力都能纳入其监督的视野里,让监督无死角、全覆盖。第四,教育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推进新时代反腐倡廉工作的行动指南。第五,惩治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举措。我党历来主张严惩腐败,特别是针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贪腐行为严惩不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达百万余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规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各类贪腐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无论什么人,有多高的职务,只要他们贪污受贿,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与腐败斗争的决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回顾百年反腐败斗争的历程,总结经验,在新发展阶段把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推进。^[7]

董颖探讨了红色司法的价值理念,分析了红色司法的先进性特征。认为新时代公正、廉洁、高效、为民的司法理念与红色司法的价值理念一脉相承。红色司法有强烈的人民性。早在苏区时期,尽管司法制度处于萌芽阶段,条件简陋,但在审判工作中广泛发动群众,以方便群众为目标,开创了人民司法工作的先河。司法的人民性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种种降低人民诉讼成本、便利人民诉讼的措施。为减少讼累,推行刑事和解和普及民事调解,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回应了民众不同层次的司法需求。华北人民政府时期,审判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传承了红色司法的一贯理念,明确了法院的人民属性,确立审判工作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新中国成立后,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沿袭了司法的人民性这条主线。红色司法还体现了平等性特征,在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红色司法传承中始终重视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成为红

色司法公平正义理念的思想源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也是红色司法的重要价值追求,有针对性地回应了社会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与司法最根本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体现了先进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案件的审理方面体现出求实的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除了强调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调查中通过传讯证人、分析物证、勘验现场、人身检查等,进行充分的证据核实,对于重大案件,还深入到群众之中征求意见,动员他们搜集证据,以全面了解案情,辨明真伪。在分析案件材料时,边区司法机关提出要有正确的、科学的观点,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合理公正的裁判。这些观点都体现出了科学性和严谨性,也成为红色司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司法在当今仍具有时代价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人民群众感受到看得见的公平正义,是红色司法的初心,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8]

蔡欣欣探讨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价值。认为诞生于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传承和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为化解边区在战时的各种矛盾纠纷,稳定边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东方审判经验的典型代表,对当代法治理念和司法实践都产生了深远意义。作为优良的司法传统,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在新时代,将其所包含的基本理论和法治价值,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探索中,依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治理效能。因此,应当挖掘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的理论资源,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是坚持政治方向,马锡五审判方式积极应和当时政治大局,在新时代,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第二,要注重调查研究。马锡五审判方式严格以调查研究的事实为依据,遵循依法办事准则,掌握确凿证据,坚决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深入调查研究,不仅能了解事物的一般表象,更能洞察到其实质,进而搞清各种基本关系,以中立的态度对待各方当事人,从而审慎明晰矛盾纠纷,达到政治、法治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的价值追求。第三，是提倡深入群众。马锡五审判方式倡导在司法过程中法官与人民相通，主动将民众力量引入纠纷解决，吸纳群众参与评理说教，调解百姓矛盾，用朴素的话语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发挥法律的教化作用，达成社会动员的政治目的，赢得了民心。人民司法的理念得以传承至今。马锡五审判方式还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特点，并非单纯调解，而是坚持法治刚性原则，严格区分案件类型。在多元纠纷解决的大格局下，马锡五审判方式仍具有生命力。^[9]

王艳宁研究了西柏坡时期的法治建设经验，并分析了其时代价值。认为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成就丰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主共颁布法令规章200多项，内容涉及政权建设、支援前线、经济建设、财政税务、工商贸易、公安司法、民政、金融、交通、农业水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国家管理的多个领域。主要包括制定实施政权建设法令规章，为共产党局部执政提供制度保障。华北人民政府在党中央领导下加强政权建设，这些法令规章保证了华北人民政府的有序运转，为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的管理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依法高效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制定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最重要的法规，它总结了近二十年共产党土地立法的经验，确立了土地改革总路线，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和土地立法提供了历史经验；制定实施经济法令规章，为推动经济建设支援前线提供法治保障。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经济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蓝本；制定实施教育科技文化法令规章，为提高人民教育科学文化素养提供法治保障。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崇尚科学、鼓励创新、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意识。制定实施社会治理法令规章，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提供法治保障。这些法令规章的实施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对有效解决基层群众的民事矛盾和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西柏坡时期法治经验具有时代价值，法令规章的制定实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的，是人民意志的具体体现，奠定了新中国法治的基础，开辟了中国特色的人民

司法道路。不忘法治初心，牢记时代使命，对于今天的法治建设而言，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的经验仍然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是对西柏坡时期依法治国理念及全面系统法治实践的历史传承和发展。^[10]

靳志玲对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功实践进行了探讨。认为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丰富实践，成为新中国从河北走来，人民代表大会从河北走来的历史见证。1947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听取审议通过工作报告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等4个条例；审查了军事、政治、农业、工商等八方面1180件提案；选举产生了由27人组成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完成了我国政权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构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前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最高层次的区域性权力机构，从会议组织、程序、功能等方面已具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特征，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的先河，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奠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建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在政权建设方面，大会以及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制定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为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原创性探索。1949年7月21日至8月9日，石家庄市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大城市同类会议中最早的一次，是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我党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功探索，为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提供了成功范例，开普选制先河。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农村建立村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村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依据是《华北区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华北区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基层民主的伟大实践，它探索了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用事实说明村人民代表大会是农村民主政权建设的正确选择，不仅为当时短时间内建立起稳固的新型人民政权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基层普遍建立区、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11]

张永刚，牛凤鸣以阜平县为中心考察了全面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基层公安建设问题。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启了重建警察系统的历程，这一实践成为中共历史上全面建立基层公安队伍之滥觞。作为模范根据地巩固区的阜平县，其基层公安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为全面考察抗日根据地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样本。由阜平县观之，公安队伍建设成就的取得，仰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组织领导；其建设实践较为系统地体现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初建基层公安队伍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框架，所产生的历史经验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日根据地公安队伍建设的组织保障。抗战时期阜平县公安队伍的建设经验，可大致较为完整地体现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初建公安队伍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框架。阜平公安队伍的建设历程显示，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采取政群结合的方式，使得县以下基层公安队伍得以顺利构建，其构建方式完全体现出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公安队伍建设过程中，中共通过组织整理、教育培训和制度建设，净化了干部和群众队伍，养成了团队素质，规范和提升了个体行为，各环节既在不同层面展示出基层公安队伍的建设历程，又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在提高基层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上呈现出一种多管齐下的交响效应。而这一切建设成就的根本保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的组织领导，为将抗日根据地基层公安队伍锻造成人民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忠诚卫士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现实从历史中走来，在当前公安队伍建设强调警民联手、提高公安队伍素质、依法保护群众权益等内容时，全面抗战时期诸如在阜平巩固县、区、村三级公安队伍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当可发挥一定的启示作用或镜鉴。^[12]

四、国家治理法治化

苏永生等研究了“法德合治”的法治取向。认为“法德合治”是对中国传统“礼法合治”的扬弃，是对西方“唯法治理”的超越，强调法与德的内在一致性。科学把握“法德合治”，应当认识到“法德合治”是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涵括，在立法上坚持实质法治优先，把道德规范作为形式规范的前规范；在法律实施上则

须坚持形式法治优先，把道德作为解释法律的重要依据；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路，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自主化建设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具有扬弃传统、超越西方的独特的法治意蕴。“法德合治”的确立具有鲜明的法治取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首先，“法德合治”是对中国传统“礼法合治”的扬弃。其次，“法德合治”是对西方“唯法治理”局限性的重要超越。当前，“法德合治”强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目的就在于克服唯法治理的弊端。这显然是对西方“唯法治理”的重要超越。第三，“法德合治”强调法与德的内在一致性。“德治”在我国主要呈现实用主义色彩，彰显法治与我国国家和社会治理传统的关联性，突出法治的内在性，注重从文化维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旨在建立法治的文化根基。“法治”在我国主要呈现理想主义色彩，彰显国家和社会治理对法治的刚性需求，突出法治的建构性，注重从政治维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旨在建立法治的制度根基。正是这种介于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展现出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曲折性、丰富性和生动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法治与德治不但具有并置性，而且强调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纠正各自的谬误与偏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有效贯彻“法德合治”既要警惕借助“德治”和复古主义来削弱本来就比较脆弱的法治观念和机制，又要警惕借助西方镜像中的理想主义法治样板来否定“德治”的合理成分。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既要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建立有机合作机制，又要在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13]

孟庆瑜认为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法律遵守属于浅层次的法律信仰，主要靠利益的激励予以实现，而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则属于深层次的法律信仰。其中，法律尊重主要基于情感而产生，而法律尊崇主要基于理性而产生，二者共同塑造了法律的权威

性。通过法律遵守，可以成就消极意义上的守法，而借助于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可以实现积极守法。消极守法向积极守法的转化，是法律权威建设的过程，也是法律信仰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法律的规范性由“他律”转为“自律”。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规则意识体现了法律信仰的本质要求，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则奠定了法律信仰的文化基础，创造了培育法治观念的文化环境。因为规则意识，法律信仰有了明确的内涵和具体的指向，使得法律信仰的学理分析能够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因为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法律信仰有了确定的载体和实质性的内容，从而为涵养法律信仰的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建立法律信仰，必须着眼于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积极互动，通过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机制予以实现。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现三条路径间的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体系性合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14]

五、法制史

张波等考察了中国古代监狱人犯的囚粮供给问题。通过对各朝代监狱的囚粮供给情况分析，揭示监狱供给之下国家经济社会的背景。清代以前，各朝代多是部分性供给囚粮，而非全部人犯都可以享受。其划分主要是以人犯有无家属和家属居住距离远近为标准，至于人犯家属的家庭经济状况，很多时候反而被忽略不计。在囚粮的拨付来源上，指定来源也比较狭窄，导致囚粮的筹集总量难以满足需求。此外，各朝代将囚粮问题的解决主要寄托在地方官员身上，而地方官员出于各种顾虑，却不愿依赖朝廷指定的来源，于是另辟蹊径，或设置狱田，或差额供给，或收取折杖陋规以供囚粮等。然而，这些办法因为各自的局限性，最终都注定无法完全解决囚粮的问题。

作者认为囚粮供给始终是历代监狱所面临的最主要、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从秦汉至明清，历代政权几乎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寻找到解决办法，然而都未成功。究其原因，就在于囚粮的供给并非是单纯的监狱或者司法系统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时代的缩影。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司法公允，监狱人犯数量自然就会较少，囚粮的供给随之亦不是一个问题。反之，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妥善解决这一难题。^[15]

张波、赵玉敏研究了清代监狱瘟疫问题。作者关注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期间，监狱内部亦暴发疫情。监狱内为何会发生瘟疫的原因、特点及防治措施等应引起关注。因为监狱的密封性和其中所关押人犯的密集性，监狱中一旦发生瘟疫，其后果往往更为严重。通过考察清代监狱内瘟疫的相关情形，为当今监狱防疫提供借鉴。清代皇帝和各级官员出于传统的悯囚恤囚思想，通常都会积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进行防治。但是，由于对瘟疫发生原因和传播途径的认识不足，其措施往往不能尽如人意。直到清末，因为近代卫生防疫知识的引入和传播，此种情形才有所改观。在监狱瘟疫问题上，清代官方的主要举措，包括妥善救治染疫囚犯、加强监狱卫生医疗和饮食保障、清理刑狱，减轻刑罚、修建新式监狱，积极推进监狱改良，监狱改革后，狱内宽敞通风，干净卫生，医药充足，衣物具备，设施简单，犯人发病率大大降低，起到了防疫抗疫的效果。清代监狱瘟疫的发生及防治举措，无疑为窥探中国古代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清末之前，由于对瘟疫发生原因认识的局限，官方的防治措施通常沿袭前代，存在一些不足，尽管如此，整体上清代皇帝、官员和监狱方面应对监狱疫情的态度尚属积极。清末，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司法和监狱的改革，以及恰巧发生的东北鼠疫，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防疫知识的迅速传播，令国人在监狱防疫的问题上更加科学进步。^[16]

王胜国探讨了“礼”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作为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礼，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要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礼自身在来源上所带有的“天人合一”的特征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罩上了顺应“天理”的神圣光环；“以礼统律”的思想和实践不但为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罩上了神圣性，还直接促成了封建立法者“德主刑辅”“重礼轻刑”思想的形成。礼自身追求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贵和”思想和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规定了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官员处理各种司法案件追求的最终结果和终极目标。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受礼的影响和制约而表现出的“贵和”“息讼”和“慎刑”的倾向，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缓和了社会矛盾，减少了由诉讼过多费时费力而对生产生活的冲击和干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和痛苦，而且降低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礼本身追求社会秩序、公众和谐而拥有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特征，不仅补充完善了“刑”（法律）的内容和作用，而且规定了“刑”的性质、提供了基本方向。中国古代法律的总体特征是“礼法合一”，如何认知礼与法、与道德的关系以及礼自身的性质，应该把礼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某一时期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之中去研究、去考量、去评价。^[17]

2021年，河北法学界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论文发表的层次也有提升，约三分之一的论文在核心期刊CSSCI期刊及扩展版发表。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围绕红色法治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问题研究走向深入。在法制史研究方面，以中国古代狱政史为研究视角，形成了一定特色。但总体上看，河北法学理论研究仍缺乏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河北法学界需进一步确立使命担当，以更高的站位谋划创新性科研成果，促进河北法学理论研究新的发展。

部门法学研究

肖辉

2021年，河北省法学界在部门法学研究方面承续往年惯有的特色，重调研、重对策、重应用，领域较为广阔，种类较为齐整，基础性理论研究有所充实，数量和质量继续保持一定规模和水平。

- (董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参考文献：
- [1]伊士国.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价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J]2021(2).
 - [2]梁平.新时代“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意蕴[J]湖北社会科学2021(2).
 - [3]马一超,尼培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法治中国贡献力量,共产党员[J]2021(1).
 - [4]姜祖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戒毒方略百年沿革,犯罪与改造研究2021(3).
 - [5]骆艳青.党领导法治建设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报[N]2021-08-04.
 - [6]刘勇,唐保丽.党领导平安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发展进路,中国社会科学报[N]2021-08-04.
 - [7]李靖.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经验与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N]2021-08-04.
 - [8]董颖.红色司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先进性,中国社会科学报[N]2021-08-04.
 - [9]蔡欣欣.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科学报[N]2021-08-04.
 - [10]王艳宁.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经验及其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N]2021-08-04.
 - [11]靳志玲.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功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报[N]2021-08-04.
 - [12]张永刚,牛凤鸣.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基层公安队伍建设论析——以阜平县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学刊2021(6).
 - [13]苏永生,张冲,孟庆瑜.“法德合治”的法治取向[J]理论探索2021(4).
 - [14]孟庆瑜.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J]河北大学学报2021(5).
 - [15]张波,赵玉敏.中国古代监狱人犯的因粮供给问题考察[J]兰台世界,2021(8).
 - [16]张波,赵玉敏.清代监狱瘟疫问题研究,中国监狱学刊[J]2021(4).
 - [17]王胜国.礼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邢台学院学报[J]2021(1).

宪法及宪法性法律方面的研究围绕宪法实施、民主制度、公民权利、政党建设、立法制度、监察制度、国籍制度、国家安全等领域展开。其中，政党建设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质量和数量都有一定程度提高。行政法研究内容广

泛,包括学科建设、政府建设、行政改革、行政主体、行政监管、行政处罚、交通管理等方面,但与2020年比,质量和数量均有一定幅度的缩减。诉讼(程序)法方面的研究继续覆盖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领域,公益诉讼研究继续保持一定势头,仲裁制度研究保持相对稳定。民商法方面,延续民法典专题研究热度,内容涵盖行政主体义务性规范、人格权条款、个人信息、居住权及离婚损害赔偿等诸多领域。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人身权、物权、合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等,而商法研究则成果不多。刑法研究继续分为刑法理论、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三个方面,研究质量和水平较为均衡,刑法分则研究的理论厚度进一步提高,数量可观。经济法研究内容丰厚,企业制度、税收法治、金融法治研究保持平稳,环境法治研究红红火火,旅游法治研究初露荷尖,但整体看,经济法研究的规模有所下降,种类也有一定程度的减缩。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维持适度水平,有待引起学界关注。军事法研究继续受院校职能调整及转型影响,数量有所下滑,主要涉及军事思想、部队建设、军事行动、军事资产、边防警卫等领域。司法及相关制度研究种类繁多,除司法制度及法律适用外,监狱制度、社区矫正、纠纷解决、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均有涉及。其中,社会治理研究最为集中,成果丰硕,监狱制度、社区矫正和法治建设也保有较大规模。国际法研究领域,国际公法研究有所减退,国际经济法研究保持平稳,国际私法研究则鲜有涉猎。总体上看,民法典专题研究、刑法分则各具体犯罪研究、环境法治研究、社会治理研究成为本年度各学科研究领域中最集中且热度最高的四个板块。

一、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研究

(一) 宪法实施

伊士国对宪法全面实施的学理内涵及实践逻辑展开研究,认为宪法全面实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程,但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需要我们首先明确宪法全面实施的学理内涵及其实践逻辑。其中,法律的实施方式是宪法全面实施之方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宪法全面实施的模式,中国特色宪法实

施之路是宪法全面实施的道路选择,依法执政是宪法全面实施之关键环节,宪法解释是宪法全面实施的重要保障。^[1]

(二) 民主制度

夏妍对基于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构建我国总体治理系统的时候,依法治国和我党领导间存在的关系属于政府需要着重考虑的大问题。协商民主在宪法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需要从多角度出发研究并探索基于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法治化路径。同时,宪法实践也表明,协商民主有关原则已得到全面应用,并已将其权力制约和保障等重要价值充分展现出来。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对国家具体情况加以掌握,对宪法发展、建设相应整体脉络加以掌握,完全明确宪法的建设以及发展方向,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以实现构建宪法的目标和理想。^[2]

(三) 公民权利

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重要形态。对此,范海玉、张思茵以河北省为例,研究了生态环境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法律机制,认为公众参与在提高生态环境地方立法质量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强化生态环境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法律机制建设,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促进环境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公众行使政治权利和环境权的重要体现。以现行中央和地方立法法律规范、环境法律规范为依据,结合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法制实践现状,应当通过完善全过程、常态化的公众参与机制,健全公众参与的沟通反馈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的激励补偿机制,严格考核监督与责任机制,建立大数据应用法律机制,确保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3]

范海玉还研究了地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认为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应当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河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在实践中的具体实施以及省内各设区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制定都要坚持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广泛吸纳公众参与立法过程,做好立法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做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京津冀协同和城乡一体。河北省生活垃圾分类立法的精细化完善和充实应当进一步明确湿垃圾计量收费的具体规定,建立引导性强的可回收物投放机制和点面结合的大型生活垃圾投

放制度，并加强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日常监督、巡查。^[4]

(四) 政党制度

任广浩、冀晓鹏以党内法规为线索，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的探索轨迹、时代发展与经验启示，认为制度治党概念在党的十八大后才正式提出，但其理念和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制度优势，始终贯穿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制度治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制度治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党的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清晰并逐步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治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战略，采取了很多原创性、独创性的重大改革举措，通过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构筑适应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制度体系，使制度治党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和突破。总结百年制度治党的经验，可以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使制度治党的制度优势更加有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5]

伊士国、郑洁仪对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的制定权作出研究，认为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在整个党内法规制定体制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规范设计包含制定主体、制定权限、制定权的监督三个方面。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存在主体范围不清、权限模糊、监督效果不佳等问题，应通过准确界定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主体范围、厘清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限、健全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监督机制等途径，不断健全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规范体系，保证其规范行使。^[6]

伊士国、吉利对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制度进行研究，认为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是最低层级的党内法规制定权，在党内法规制定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从实践来看，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还存在制定主体范围不清及其权限划分不明、“再授权”、制定程序不健全、监督乏力等问题。为此，我们应通过厘清省级党内法规制定主体范围及其权限划分、防范和禁止省级党

内法规制定主体“再授权”、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完善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监督机制等途径，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制度，规范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行使。^[7]

伊士国、燕恬还研究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的构建问题，认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程序依据所在，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尚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尚未实现规范化、制度化。为此，我们应借鉴立法后评估程序，并结合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自身特点，以合规性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公开原则、科学性原则为指引，具体构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包括评估对象、评估主体、评估方案的选择和确定，评估工作启动时间的科学界定，评估信息的搜集与研判，评估报告的形成、公布以及运用等环节，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的开展提供程序保障。^[8]

(五) 立法制度

陆洲、王文韬研究了雄安新区立法权限的配置，认为雄安新区建设应当坚持立法先行，保障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于法有据。目前，雄安新区立法权限配置尚不明确，立法权限的配置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发展因素以及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授权立法下雄安新区存在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授权立法和河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立法三种配置途径；职权立法下雄安新区可过渡到城市管理体制建设成设区市，依法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9]

马雁对行政规划视域下的“先行先试”立法展开研究，认为城市规划的立法配置是界定行政规划的要素和法律属性，需要厘定规划裁量立法与新区规划中“先行先试”立法问题的交叉与区别。基于“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的不足，结合立法类型学，从地方立法权配置角度理解“先行先试”法律规范存在问题，包括专门针对综合配套改革的法律文件缺乏、综改地方立法进程迟缓、立法内容泛化等。归纳“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在《立法法》中的体现，从政策法治化和“非同质化”、选择性立法、行业或部门立法、立法能力建设等方面确认“先行先试”立法特色，以加强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的衔接协调、统筹配置立法资源、体现立法

适应改革、引领改革和提高引领性立法质量为视角,分析“先行先试”立法保障的原则。^[10]

(六) 监察制度

牛忠志、李泽君基于对古代监察制度的考察及所获得的启示,研究了我国监察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防范官员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设立了制度化、常态化的监察制度,凝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智慧结晶。针对我国现行监察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借鉴古代监察制度的优秀成果,应当在监察官员的选任标准、特殊人身保护措施,以及加重其职务犯罪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完善。同时,构筑以《监察法》为主轴,以单行的监察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低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体系,是推进我国监察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11]

(七) 国籍制度

王钧、马勇、刘一家等就西方主要国家的退籍制度展开研究,认为,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赋予其国籍管理职责。作为我国国籍管理的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已无法适应当前国籍管理新形势。近年来,随着我国移民数量的激增,变更国籍现象已十分普遍。我国退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亟待研究解决。西方主要国家的退籍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为此,应当在我国国籍法确立的单一国籍原则基础上,增加退籍条件,完善退籍程序,明确退籍效力,切实保障未成年人权益。^[12]

(八) 国家安全

网络空间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新领域,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网络安全的重点,已成为网络攻击首当其冲的重点对象。对此,樊林畅、马金强、李同寒等立足于国际视野,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管理机构进行分析与研究,认为借鉴世界各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我国加速推进网络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通过分析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上的设置情况,以及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设置中的经验与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应当完善我国关键基础信息设施保护制度

体系,进一步做好我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13]

马晨、赵慧广就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公安大数据安全治理的挑战与应对作出研究,认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安全治理也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实施公安大数据战略,是实现新时代公安机关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选择。这就需要全面认识公安大数据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推动公安大数据安全治理的体系架构,落实安全治理总体规划,抢占安全治理技术制高点,完善数据终端安全治理,建设公安大数据安全管理队伍,加大经费投入,依法开展工作,为公安大数据安全治理作出积极贡献。^[14]

二、行政法研究

(一) 学科建设

李敏对我国警察行政法学科的属性问题作出探析,认为我国警察行政法研究从体系选择上究竟应当依托于行政法学抑或警察法学是其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起点问题。当前,警察行政法是否属于特别行政法存在一定探讨空间,将警察行政法划归入警察法学科体系也面临较大争议。从法理层面分析,警察行政法学以警察行政权研究为核心,但由于权力主体分离状况的存在,警察行政权与国家行政权的相容关系并不能完全地折射到学科属性的研讨空间中。^[15]

(二) 政府建设

孟祥林从在扩大第三部门行动自主权过程中、政府需要保持“在场”还是“退场”的角度,研究了第三部门发展的困境与出路问题,认为第三部门承担了政府剥离的非核心职能,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实现了从“万能政府”向“高效政府”的转型。传统管理模式下的行政强制需要转为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互动,管理过程要突出治理措施的理性设计。传统管理模式在很多方面都要发生变化:权力下放由集权管理转为分权管理,职能定位由“划桨员”变为“掌舵师”,运营方式由国有国营变为国有民营,关注重点由重视投入转为重视产出,经营机制由垄断经营变为竞争经营。在扩大第三部门行动自主权过程中,政府需要保持“在场”而不是“退场”,政

府的职责在于优化政策环境和加强疏导。第三部门发展进程中仍然面临意识、制度、需求、人才等瓶颈,这需要在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建立科学约束机制、建设动态轮值小组、强化公民参与意识、谋求持续资金支持等方面下功夫。^[16]

(三) 行政改革

贡太雷、张俊祥立足于司法行政管理改革背景研究了警囚矛盾关系的类型、原因及其改善,认为在司法行政管理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部分监狱在治理变革中存在着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行之间的逻辑与经验悖论。在监狱安全治理中,权利保护和执法管理之间的博弈,已使得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对制度认知与执行产生一定程度的困惑。从罪犯权利实现的复杂性、罪犯自身特点的不确定性和罪犯参与事务类管理的特殊性归纳警囚矛盾关系类型。坚持法治、民主和人权三大原则,解决警囚矛盾关系的不协调。通过改善警囚矛盾关系,实现监管执法和权利保护的高效、公正和权威。完善监狱执法监管公示制度,增强监狱执法监管全过程记录制度,健全监狱执法监管重大执法事项决定法治审核制度,是提升新时代监狱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监狱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17]

(四) 行政主体

晏楠对新时代公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的途径问题进行探索,认为规范化建设是公安派出所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影响和保障公安派出所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着公安基层工作开展的成效。当下社会的快速发展虽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也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治安状况变得愈发复杂,对新时代下公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现阶段公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应从硬件装备、组织机构、执法规范、服务措施以及绩效考核等五个方面着手,全面加强公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工作,提高基层公安工作效率,维护辖区良好的社会秩序。^[18]

(五) 行政监管

蒋冰晶立足于国家治理需要,从数据要素供给的视角出发,对信用数据开放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信用数据开放有助于国家全面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信用经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展开全新的国家治理。信用数据多数携带信用主体

信息,无法全部开放,应当根据信用数据的类型区分数据开放等级,分别进行全社会开放、有条件有期限开放、约定模式开放、自愿开放等,平衡权利保障和数据供给。同时,通过完善信用数据开放机制、技术、标准来保障和提升信用数据开放质量。信用数据开放后,信息泄露案件发生概率加大,可能带来“权利黑箱”和“强权控制”,可能扩大资源差距。因此,需要明确信用数据开放中安全义务主体与内容,重视行政监管,建立成本与效益评价标准。^[19]

(六) 行政处罚

2020年2月27日,司法部发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这一文件显示出我国对于永久居留立法工作的高度重视。但是现行法律中关于取消永久居留资格的规定较为模糊,学术界也缺乏对取消永久居留制度法律属性的探讨。对此,李佳瑶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在分析现有行政处罚论与行政强制措施论的基础上,提出多元论的理论观点。在国家高度重视永久居留立法工作的大背景之下,有必要捋顺取消永久居留资格的法律属性,使理论上的探讨可以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立法工作。^[20]

(七) 交通管理

刁道远、冯兆蕙等对高速铁路安全立法问题展开研究,认为高铁安全治理应该强化社会公共责任,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走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化路径。为此,应当从外高铁安全事故梳理分析入手,剖析影响高铁安全的各项因素,比较高铁与普铁对安全治理需求的差异,梳理比较普铁、道路、航空和水路运输的安全法律法规,借鉴日本、德国、法国等高铁、普铁安全立法经验。在此基础上确立高铁安全立法的相关内容,并对高铁建设质量、专用设备质量、线路、运营安全及监督管理、应急救援和反恐等进行系统梳理,借此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21]

三、诉讼法研究

(一) 民事诉讼

陶建国、田静怡研究了离婚诉讼中离婚教育制度的构建问题,认为为了发挥家事审判的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我国有必要建立离婚教育制度。美国、韩国离婚教育制度的发展比较成熟,当事人接受离婚教育

是一项程序上的义务,拒绝接受教育的,法官可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我国在建立离婚案件当事人教育制度时,既要考虑本土实际情况,也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在制度的具体内容方面,应当围绕教育项目开发,教育内容,离婚教育授课人员,接受教育的条件、形式和时间,拒绝接受教育的法律后果等若干问题进行研讨。^[22]

(二) 刑事诉讼

雷堂、杜亚欣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作出研究,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试点伊始,大多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展开探究,与之相对应的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却受到忽视。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没有明确,合法权益保障不力,权利救济的渠道较窄。因此,明晰被害人在该制度适用中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依法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与量刑参与权,确立被害人的法律帮助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依法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理性选择。^[23]

庞敏英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互作用问题作出分析,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当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两部法律,但是都属于刑事法律的范围,因此二者在运行的过程中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相互交叉,同时还表现出了复杂的交互关系。在运用这两部法律的过程中,既要明确二者的关系,又要了解二者交互作用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促进它们彼此之间的配合协调,进而将法律制度的功能更好地发挥出来。^[24]

王常聪研究了大数据侦查的司法风险及其完善路径,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对我国传统刑事侦查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数据侦查模式凭借着高效、全面等优点,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比对、整合,在预测警务工作、犯罪侦查工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此种侦查模式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出现有罪推定、侦查权滥用、侵犯公民权利、法律定位模糊、破坏侦查权等司法风险,应当对目前大数据侦查进行全方位的价值评析与法律定位,从修正有罪推定、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分析报告的证明力、信息数据分级处理等方面进行完善,以促进刑事大数据运作模式的良性发展。^[25]

(三) 行政诉讼

高景芳、张丽伟对杨永智诉济南大学不授予学士学位案进行了法律评析,认为杨永智诉济南大学不授予学士学位案蕴含了很多有关高校学位纠纷的话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总体而言,济南大学作出不授予学士学位行为程序存在“瑕疵”,但尚未转化为“违法”;高校应有权制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具体化上位法规定,包括制定必要的“品行条款”;本案二审法院虽然绕开了对纪律处分的司法审查,但其判决的可接受性方面并未实质提高。^[26]

(四) 公益诉讼

陶建国、谢佳欣就现行立法背景下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不当性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我国消费公益诉讼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起诉主体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自2018年开始,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多数法院支持了惩罚性赔偿请求。由于缺乏法律规则的指引,各地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出现较大的差异性。实际上,在现有法律制度背景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请求惩罚性赔偿实属不当。有的法院认为,起诉主体是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的,因此享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也有法院认为,对司法解释进行扩张性解释可以推导出享有这一诉讼请求权。应当说,上述两种司法观点都存在偏颇。为了有效规制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我国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仅适用于公共利益损害的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将相关制度具体化。^[27]

柯阳友、胡超则具体研究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认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实体法理论基础是惩罚性赔偿的制裁与威慑功能理论,程序法理论基础是诉讼担当理论。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审慎原则和适度原则。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以法定倍数赔偿标准为基础,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造成后果、获利情况、经济承担能力、将要承担的其他财产责任等进行综合考量,以确定相对合理的惩罚赔偿数额。^[28]

(五) 仲裁制度

闫珂、陶建国对仲裁权限扩大到专业性调解组织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根据仲裁法规

定,只有依据仲裁法设立的仲裁委员会才有权对民商事纠纷进行仲裁,其他纠纷处理组织无权利用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为了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借助民间力量推动仲裁制度的发展,有必要扩大仲裁权限的享有主体,赋予一部分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权限。赋予专业性调解组织仲裁权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仲裁民间性的本质要求、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需要、实现仲裁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需要、实现调解与仲裁有效衔接和相互协调的需要。赋予专业性调解组织仲裁权还需要配备相关制度,包括设置专家鉴定委员会,建立法律适用的律师咨询制度,建立仲裁员培训制度,建立仲裁机制运行报告制度等。^[29]

殷雁双就国际仲裁中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原则的适度应用作出分析,认为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及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等。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利弊,发现当前“一带一路”的发展程度暂不适宜建立以国际条约为基础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应当继续推进国际、国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的对接,推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完善。^[30]

殷雁双还研究了国际商事仲裁中第三人利益的保护问题,认为自经济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国际贸易活动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由此带来的国际商贸纠纷也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争端有时涉及的不仅仅是协议双方当事人,有关第三人的利益纠纷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而目前针对仲裁第三人的制度还存在较大争议。这就需要充分了解该制度在我国及在世界各国的现状,以探寻在国际商贸纷争中更好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路径和方法,使其财产不受损失。^[31]

四、民法研究

(一) 民法典专题

张国敏、郝培轩以《民法典》中行政主体义务性规范为视角,研究了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性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社会治理需要公法与私法的共同参与。《民法典》中有多条规范涉及行政主

体的法律义务,这是民法视角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在社会治理活动的参与。其不仅是民法与行政法的立法衔接问题,也体现了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公法与私法呈现出融合性治理的态势。但公法与私法本身不因融合性社会治理模式而失去各自的边界融为一体,而是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不断探索其中的交叉地带,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32]

刘娟、刘俊敏对《民法典》中的一般人格权条款进行探究,认为对人格权进行专编规定,是《民法典》回应时代需求的重大创新。准确把握《民法典》在人格权具体制度上的一系列突破,尤其是一般人格权条款的科学内涵,需要厘清人格权的概念及其由来,以及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的关系等问题。从概念的本源来看,法律上的人格权缘起于人们获得尊重的伦理诉求,是对这种诉求的反映与保障。人格权集中体现和保障着民事主体的诸项人格利益,是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必然要求,亦构成了其他民事权利的前提与基础。人格权所包含的种种具体权利内涵,均指向人格尊严这个抽象而核心的内容。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是人格权的本质内容与核心内涵。对《民法典》所规定的一般人格权条款的科学理解与准确把握,将有助于实现法律对民事主体人格利益的充分保护。^[33]

贾柠宁以《民法典》第999条切入点,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的形塑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在大数据+AI的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益与价值的多元性,造就其需要在保护信息主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信息合理合法的流通与使用。《民法典》第999条率先将合理使用原则引入人格权,且在第1036条提出个人信息使用的免责事由,但未能对该原则进行系统性规定。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制定具有正当性,而现行立法对于该原则规定存在缺憾,为此,应当明确类型化条款与增加保障性检测规定。^[34]

田韶华、史艳春对《民法典》居住权制度进行了探析,认为《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对于实现房屋利用的多元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居住权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有赖于对其予以妥当解释。居住权的功能定位应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其主体应当限定为自然人,其客体应为“住宅”,既包括城市居民的

住宅,也包括农村村民的住宅,既可以是住宅的全部,也可以是住宅的一部分;居住权的取得和消灭均应当在《民法典》的视野下作体系化理解。居住权制度适用中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抵押权人、住宅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基于民法理论予以解决。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还应包括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35]

田韶华、史艳春还研究了《民法典》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在性质上属离异损害赔偿,与夫妻间侵权责任彼此独立,但存在一定的交叉。《民法典》第1091条新增“其他重大过错”的范围应以是否严重违反家庭义务或家庭伦理以致威胁到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判断标准。重大过错行为与离婚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应采用推定原则。离婚赔偿范围仅指因离婚造成的精神损害,而不包括财产损失,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应与婚姻家庭有关的特殊因素纳入考量范畴。为避免双重赔偿与过度惩罚,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财产分割之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以及夫妻间侵权责任制度的协调适用。^[36]

(二) 人身权制度

田韶华就身份行为能力展开研究,认为身份行为能力是行为人有效实施身份行为所应具备的精神能力,法定婚龄、收养法定要件等不属于身份行为能力的制度范畴。基于身份行为有别于财产行为的特性以及保障精神障碍者基本权利和个人福祉的需要,对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应摒弃以抽象化、定型化为特点的民事行为能力标准,而采取以个案审查方式为原则的意思能力标准。这意味着对于精神障碍者而言,即使其没有实施财产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也仍然可能具有身份行为能力。在以自由为主导并兼顾安全的价值取向之下,对于身份行为意思能力的认定应主要考察行为人能否理解身份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一般观念上该身份行为的后果,而不应要求行为人对身份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特别是财产后果均具有理解能力。行为人若欠缺身份行为能力即不能实施有效身份行为,不适用法定代理以及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实施规则,但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需要可有例外。欠缺身份行为能力者所实施的身份行为无效,但可经由补正转为有效。^[37]

(三) 物权制度

徐超、李文卓、赵秀丽从政策到法律的视角,对承包地“三权”运行的框架选择进行分析,认为新形势下中央为破解承包地流转、利用的困境,提出“三权分置”政策。但由于土地改革的渐进性和现实中各地区的差异性,政策中“三权”难以与法律中的权利衔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地改革的推进。鉴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成功经验,应当从“三权分置”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土地经营权的生成路径选择,以回应“三权分置”政策的价值追求,并实现政策中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对应与衔接。此外,还应将“三权”置于土地经营法律关系运行中加以分析,构建承包地“三权”动态运行的法律框架,以推动承包地“三权分置”由政策向法律转化。^[38]

徐超、王肖楠进一步研究了“三权分置”下承包地发包制度的内涵、构成与定位,认为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和《民法典》颁布,承包地“三权分置”由政策转化为法律,但是承包地“三权”关系以及“三权”运行在法律表达上并不清晰,是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障碍。承包地发包制度奠定了“三权”关系的基础,是“三权”运行的逻辑起点和首要途径,需要从理论上解析制度内涵、探究要素构成、明确体系定位,并证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机理。^[39]

张永辉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就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展开研究,认为现行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是基于旧有的城乡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由农户无偿取得、无期限限制、只能在本集体内部流通等特征,其功能是将宅基地资源的使用权限制在村集体内部,以保障本集体成员的居住需求。但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以人为本、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目标的提出,要求土地等资源能够随着人口的流动而重新配置,宅基地使用权开始成为理论的焦点。为此,应当以宅基地使用权的制度功能为切入点,分析现有制度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功能缺失,参考国家政策导向、地方创新实践和域外的发展趋势,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体系化解释和完善提供指引,为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的妥善解决提供参

考,为宅基地使用权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撑。^[40]

刘广明、张俊慈立足于“适度放活”视阈,就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路探索与制度重构作出分析,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不仅关乎亿万农民的切实利益,而且关系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推进。“三权分置”构想的提出、“适度放活”方略的明确,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了方向指引,新型有限流转方案应当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当然之选。重构现行制度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有限流转,前提在于妥当界定使用权继受人资格,核心在于建立有偿有期限使用规则,关键在于进行流转收益的合理分配,并应实行宅基地用途的严格管制。^[41]

(四) 合同制度

冯建生对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结中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作出研究,认为在商业特许经营中,特许人掌控着特许经营的重要信息。基于诚信与善意行事的要求,为使受许人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投资特许经营,特许人在合同缔结时即对受许人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为避免过于繁杂的信息给受许人带来甄别上的困扰,特许人披露的信息应限于与特许经营相关的重大信息。重大性是法律和事实的结合,由理性第三人标准加以判断。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违反的形态主要有信息披露不充分、虚假信息披露等,对虚假披露与吹嘘行为应加以区分。英美判例法国家和大陆法系的德国、意大利等国在特许人信息披露义务违反的认定上有着丰富的裁判经验,可资我国借鉴。^[42]

(五) 知识产权

刘宇晖研究了戏仿他人姓名的商标问题,认为戏仿他人姓名的商标是指并非他人姓名正确表达但易于引人联想到特定自然人的商标。这类商标不是特定自然人的姓名但又基于与特定自然人姓名的某个连接点,如谐音等,使公众联想到该自然人但又不使公众认为该商标与该自然人存在某种联系。对此,《商标法》应作出应对性规定,扩大解释现有条款,禁止戏仿他人姓名之商标的注册或使用,在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时间标准上严格把握,切实杜绝此类商标的应用。^[43]

宋慧献、贾贵梅基于传媒竞争视角对新闻产权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新闻产权是传媒机构对其采集、制作、发布的新闻内容享有的排他性财

产权益。1918年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国际新闻社案的判决较早涉及新闻财产权问题。基于新闻实践状况与现有法律框架,新闻产权可分为新闻著作财产权、新闻传媒邻接权和新闻信息财产权。在线环境下新闻出版者邻接权与新闻信息财产权是当下传媒业与法律界面临的棘手问题。^[44]

(六) 侵权责任

孙日华、任欣对人工智能驾驶侵权责任的判定方法作出研究,认为侵权领域本身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而人工智能驾驶的兴起和运用在原本成熟的侵权责任体系中引发了新的权利冲突。如果制度对于人工智能驾驶领域的侵权问题回应不当,将无法对相关主体间的利益进行平衡,势必导致人工智能的畸形发展。对于人工智能驾驶在侵权领域受到的冲击,需要构造责任的判定方法。通过区分责任类别的方式考量无人驾驶的类型,主体上纳入系统提供者、制造商的法律责任,通过加强监管和保障措施对人工智能驾驶领域侵权责任的分配调整,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促进驾驶领域人工智能的科学、有序发展。^[45]

(七) 商法研究

刘东涛就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法律理论与实务问题展开研究,认为股票发行制度直接影响证券市场配置资源、便利融资等功能的实现,我国实行注册制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这就需要对注册制所涉及的重大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业内对注册制尚存争议时,意义更是重大。我国注册制改革具有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注册制改革的本质即是政府还权于市场,路径依赖是依法对证监会进行分权化改革。同时,我国推行注册制应当立法先行,在修订《证券法》时应进一步细化注册制的相关内容。^[46]

五、刑法研究

(一) 刑法理论

郭玮、韩玫对传统犯罪网络化刑法解释的隐喻进路作出研究,认为刑法规范由语言组成,社会及语言的衍变重塑了刑法规范的认知图式与适用逻辑。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传统的刑法解释模式无法妥当适用于网络化型犯罪的处理,解释结论饱受争议。语言的隐喻趋势为刑法解释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网络隐喻使刑法解释过程愈加充分,缓解了刑法规范适用的机械与僵硬,

使刑法解释结论更贴近国民的认知与思维,可接受性更强。选择合适的语境,设定科学的目的,能够克服隐喻固有的模糊性,建立源域与靶域清晰、合理的映射,最终实现刑法扩张与谦抑的平衡。^[47]

翟中东对国外罪犯文化教育及其进展作了介绍,认为虽然罪犯文化教育发展历史比较久,但其规模化发展是在二战后。罪犯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罪犯净化灵魂、提高文化水平、提高就业能力、降低重新犯罪的可能程度。组织罪犯文化学习的模式不尽相同,有教育行政机构主导模式、司法部主导模式和矫正机构主导模式。有的国家罪犯教育的实施者是社会教育机构,有的国家罪犯教育的实施者则是学校。在当今西方国家,在监狱中推动高等教育是其新走向。借鉴国外的经验,考虑中国的需要,中国应将罪犯文化教育纳入国家文化教育的主渠道,由教育行政机构主导罪犯文化教育,促进罪犯人群的文化教育水平跟上全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步伐。^[48]

苏永生研究了德国刑法合法性原理的双重视角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认为在德国,从费尔巴哈到李斯特再到罗克辛,都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论证刑法的合法性,致使德国的刑法合法性原理独具特色。这种理论向度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德国缺乏法律至上传统和在赶超型国家背景下坚持了政府主导型法治。论证刑法的合法性,应当紧密结合本国国情。与德国相比,中国更为缺乏法律至上传统,故更应当从积极方面论证刑法的合法性,激活《刑法》第3条前段规定,提升刑法的理论自觉性;同时,应当继续坚持从消极方面论证刑法的合法性,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有效贯彻提供理论支撑。^[49]

(二) 刑法总则

牛忠志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就当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了法教义学层面的解析,认为适应《刑法》第13条的要求,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每一个要件及其整体都应有定性和定量的测算功能。由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客体要件是国家预防、控制“甲类”传染病法律秩序及其所承载的法益的统一。其实行行为需有一定的强度,并且能够产生法定的具体的危险状态;其主观要件也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即以行为人对“妨害行为会产生危险结果”这一因果

关系为认识和意志之对象的犯罪过失(即属“不纯正的犯罪过失”)。司法解释对本罪罪名的概括不准确,应称之为“过失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罪”。^[50]

洪求华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归责认定进行研究,认为关于中立帮助行为能否被刑事处罚的问题,主观说与客观说都不能作出有力的解释。中立帮助行为虽然具有日常性、职业性等诸多特性,但其本质应是一种社会交往角色行为,之所以被认定犯罪,不能仅满足于行为者的故意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件,还应进一步探究行为是否塑造了构成要件实现的意义表达,才能对行为进行归责。中立帮助行为只有违反了社会交往角色的要求,才能认定该行为具有塑造构成要件实现的犯罪意义表达,才能对其进行归责。^[51]

韩玫、李鑫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竞合作出研究,认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及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有效规制,依赖于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从一重罪处断”条款罪数形态的澄清。对此,学界尚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坚持法条竞合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大竞合论的学说。然而法条竞合的观点只看到了构成要件的形式侧面,缺少实质性的理解,且不符合全面评价的原则。大竞合论则会掩盖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亦不可取。通过考察刑法的立法目的、按照刑法规范的解释规律、遵照罪刑均衡原则可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一重罪处断”条款只能是对想象竞合的规定。^[52]

翟中东对缓刑刑种化问题展开思考,认为所谓“缓刑刑种化”是指明确将缓刑制度规定为刑罚种类。缓刑刑种化不仅是解决我国社区矫正发展问题的需要,使社区矫正成为无争议的刑罚执行活动,而且是解决轻罪惩治的需要,是推进我国刑罚体系发展的需要。缓刑刑种化在我国具有合理性,这是因为将缓刑规定为刑罚符合中国的国情,缓刑已经成为我国抗制犯罪的重要手段,缓刑实际上已经被作为刑种使用,缓刑刑种化可以有效地解决社区矫正法制定及社区矫正推进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因此,我国应当将缓刑规定为刑罚种类,列为主刑之一。^[53]

(三) 刑法分则

冯军、马丽丽对危害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犯罪的立法作出述评,认为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严重危害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安全行为的犯罪化,是落实党中央加强生物安全保护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保障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重要措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了危害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犯罪具体个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为危害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犯罪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刑法依据。但是,对照政策要求以及考虑到相关法律规范间的协调关系,刑法典第334条之一对危害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犯罪个罪罪状的设计,存在客体范围狭窄、行为方式不周延、法定刑设置失衡等问题,建议通过正确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或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具体罪名,解决客体范围狭窄问题;通过合理解释,解决行为方式不周延问题;充分利用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理论,解决法定刑配置失衡问题。^[54]

田旭、李昊天就“毒驾”入刑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毒驾”是指在毒品刺激状态下或者在毒瘾发作的异常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毒驾”具备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入刑也具备正当性。管控“毒驾”行为应当考虑建构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在《刑法》层面,“毒驾”与“醉驾”颇为相似,将其置于危险驾驶罪之下更为合理,并为其制定具体罪状。另外,吸取“醉驾”入刑的教训,应当对“毒驾”行为设置合理的出罪口,并将不以刑罚评价的“毒驾”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之中。结合“毒驾”人的特殊性,不仅要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毒驾”的处罚措施,还要在《禁毒法》中规定相应的瘾癖戒除规定。在设置“毒驾”行为的查处机制上,应以驾驶障碍说为入罪标准,以唾液检测方式为“毒驾”行为的初步筛选,并以清醒测试和血液检测方式为最终确定方式。适用于危险驾驶罪等轻微犯罪的刑事速裁程序,可参照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处罚令的相关规定进行改良,对危险驾驶罪这类轻微罪进行书面审理,主要审查是否符合处罚令适用情形和是否具有胁迫或其他违法情形,旨在更加快速的审理轻微犯罪。^[55]

韩啸、张光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

对象作出研究,认为正确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以刑法规定价值取向为逻辑起点,合理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在圈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时,应当兼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两方面利益,适用适当刑法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和发展。正确解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公民个人信息,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还要准确认定犯罪阻却事由。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不能太窄也不宜过于宽泛,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看待这个问题。公民个人信息范围大小直接由国家有关规定决定,国家有关规定的內容应该在刑法总则第96条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解释,过宽的解释不仅有害于信息经济,更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部门规章不应包括在内。^[56]

牛忠志、晋泽禹论述了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废除问题,认为1997年修订的《刑法》增设的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权宜之计。由于该罪在立法目的、犯罪构成等方面与贪污罪十分相似,故如何区分二者一直困扰着司法机关。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法定刑远低于贪污罪,如果对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不以贪污罪严惩,将给触法的贪官污吏提供了一个制度“庇护所”。刑法解释对本罪持限缩的态势,该罪自设立以来其司法适用率也很低,目前,设立该罪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为了严厉打击侵害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应当在将来修法时废除私分国有资产罪,直接将私分国有资产之危害行为纳入贪污罪定罪处罚。^[57]

敦宁、于鸿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修正作出评析并进行了前瞻,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了专门修正,扩大了该罪中传染病的范围,并对其构成要件行为进行了适度拓展。这种修正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相关的修正内容仍然不够合理和周延,而且该罪的一些突出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因此,将来需对其进行体系性完善,一方面,应将该罪的传染病范围限定为“重大传染病”,并使用空白罪状规定其构成要件行为;另一方面,应明确区分该罪的故意形态与过失形态,并设置对应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前者应设置为特殊的抽象危险犯,后者应设置为实害犯。^[58]

冯军对非法提供假药、劣药犯罪的罪名确定

与罪状展开解读,认为为倒逼药品使用单位及其人员强化药品管理责任和用药安全意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药品使用单位人员非法提供假药、劣药犯罪。非法提供假药、劣药犯罪的个罪罪名应当确定为非法提供假药罪和非法提供劣药罪。两罪的客体都是复杂客体,即药品管理秩序和人体健康,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包括药品使用单位及其药品管理、使用人员。客观方面的表现因罪而异,非法提供假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提供假药给他人使用,非法提供劣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提供劣药给他人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故意,对假药劣药的认识都要求“明知”,非法提供假药罪的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危险状态的发生,非法提供劣药罪的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实害结果的发生。将“明知”作为两罪成立的必要条件,有失立法公平,亟须通过司法解释实现立法目的。^[59]

李鑫就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前置法的功能不足及补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所具有的明显法定犯属性和对“运动员”“兴奋剂”“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等核心构成要件要素的准确认定,决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认定离不开前置法的规定。根据相关前置法认定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仅会使对“运动员”的司法认定过程违反法律专属主义,而且无法为“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提供解释依据,同时会使对行为主体的认定结论陷入正当性危机。为此,应通过修改相关前置法,扩大“运动员”范围,明确“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含义和范围,拓展行政违法行为主体的范围,以补强其在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司法认定上的基本功能。^[60]

李鑫还与苏永生就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进行了教义学思考,认为国外关于兴奋剂犯罪的法益观主要有财产法益观、生命健康法益观和复合法益观,借鉴意义在于,应当根据兴奋剂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位置和相关行政法的规定来确定兴奋剂犯罪的保护法益。从我国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在分则体系中的地位及相关行政法的规定来看,该罪的法益包括公平的体育竞争秩序和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情节严重”是说明法益侵害程度的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其

内容不应包括“受过行政(刑事)处罚”“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可以包括“多次使用兴奋剂或对多人使用兴奋剂”“造成一人以上轻伤”“对未成年人、残疾人使用兴奋剂”等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情形。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在体育竞赛中使用兴奋剂的,成立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61]

苏永生则就环境犯罪违法性判断的特殊性及标准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传统的违法性判断属于实质判断,借助于法益侵害说、规范违反说以及社会危害性说予以展开。但在环境犯罪领域,法益侵害说、规范违反说以及社会危害性说均难以提供具有实质性的违法性根据,环境犯罪对人类利益侵犯的非直接性和环境伦理的难以感知性决定了环境犯罪违法性的判断依据只能是法律规范,具有非实质化特点。传统的违法性判断属于价值判断,表现为对法益的侵害、对文化规范的违反以及对社会关系的破坏等负价值。但就环境犯罪而言,环境的非价值评价性、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事实上的对立关系以及环境犯罪的法定犯性质,使得环境犯罪的违法性判断不具有价值性,而具有非价值化特点。传统的违法性判断属于个别判断,借助于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轻微原则来完成。但在环境犯罪领域,难以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故不存在根据违法阻却事由的排除违法性的判断,环境犯罪的法定犯特点也不允许对环境犯罪根据轻微原则作出排除违法性的判断,所以环境犯罪的违法性判断具有非个别化特点。环境犯罪的违法性判断标准只能坚持法规范违反说。^[62]

张丽霞、吕哲对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的几个问题作出研究,认为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中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是指一切基于军事目的,用于实施和保障作战行动的装备、设施。合格的标准,应以《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和《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为根据,同时考虑与保障军事行动安全的重要程度,综合加以判断。被征用时,行为人明知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不合格而不说明的,可以构成本罪。^[63]

胡建伟就营利型挪用公款罪中“但书”的适用展开思考,认为实践中对营利型挪用公款罪

“但书”适用情节的把握，应在严格坚持基本犯罪构成的基础上，根据案件“情节”的罪量属性，正确判定“情节”是否具有出罪功能。对于法律明确规定的除外适用的定罪情节，不能成为适用“但书”出罪的裁判依据。只有在实质上能够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行为人的自身危险性大小，从而影响罪与非罪的情节，才是司法者援引“但书”出罪应予重点考量的因素。^[64]

六、经济法研究

(一) 企业制度

赵树文、苏加彤就民营企业的法治保障制度系统化建构展开研究，认为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已成为当前经济改革深入推进的重要着力点，而良好的法治保障制度则是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需条件，否则借助民营企业来激发市场竞争效应的预期将难以实现。为此，必须秉承系统思维，推进民营企业法治保障制度的系统化建构，注重对立法、执法与司法制度的整体性推进，以期有效地实现法治保障制度对推进民营企业发展所具有的政策促进功能、主体保障功能以及信心提升功能。对此，应以系统思维为指引，有针对性地推进我国民营企业法治保障制度的系统化建构。^[65]

赵树文还与安丽云、宋雪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平等保障机制的完善进行研究，认为强化民营企业刑事司法平等保障机制建设是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当前这一机制依然存在罪与非罪区分不清、强制措施适用不灵活、原罪问题处置不合理以及司法规则适用不平等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阻碍了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此，应围绕科学划分刑事案件界限、优化强制措施的使用机制，科学处理原罪问题、强化刑事司法平等理念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正，以期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刑事司法平等保障机制的完善，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并推进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66]

(二) 税收法治

李大庆基于公法契约视野，对税收法定问题作出研究，认为税法欲解决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

需求冲突以及同一主体自身内在的不同需要的冲突，纳税人从表面上看是为国家纳税，实际上是自己纳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可以形成类似于契约的对等关系。关于税法的定位，学界始终争议不断，特别是在经济法和行政法之间。通过公法契约理论，在检视税收之债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运用行政契约、公共治理以及合作治理的相关范畴，可以发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对等关系”，从而摆脱“二元论”的束缚。而存在于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的“过头税”“任务治税”等问题，恰恰是传统上把税法作为行政法的分支、过分强调税务机关单方面权力而忽视纳税人权利的后果。这就需要从公法契约的视角出发发展开论证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有效纠正实践中的各类问题，促进我国税收法治水平进一步提升。^[67]

补国苗、张志文、郑世成以河北邯郸市民营企业税费政策为例，对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展开研究，认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乎我国高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新型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容纳了我国大部分就业人员，不仅是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还是我国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新发展理念、充分增加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参与者。为此，应当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税费政策功能，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民营企业税费政策机制，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继续深化税制改革，提高民营企业预期效应，加大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宣传力度，扩大优惠普及面，进一步优化“放管服”改革，突破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障碍，建立健全市场监管体系，更好地保证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68]

(三) 金融法治

宋阳、陈莹、王乃成以货币信任与信用为视角，研究了数字加密货币运行的法律基础，认为技术信任和法律信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传统货币是依托国家和权威第三方以及法律为基础的货币信任模式。大多数数字加密货币依托区块链为底层技术，形成以技术信任为基础的“去中心化”货币信用机制，但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货币的信任基础。货币的价值源于社会信任及其

自身信用,数字加密货币目前面临严重的技术和程序限制,各个国家接受程度不尽一致,难以单独建立起使社会群体信任的货币信任方式。数字加密货币信任机制的建立,既离不开国家信任背书,也需要依靠其自身技术和成熟的内部规则。通过法律治理和区块链技术自动化治理的结合,使法律规则和技术规则融合,以全新的治理模式形成新的货币信任机制。^[69]

张文镜则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例,对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绩效展开研究,认为金融服务严重滞后于跨境电商市场的发展是制约当前我国跨境电商业务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供应链金融是目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行金融服务的有效尝试。通过对跨境电商供应链企业的融资数据分析,可以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与跨境电商中小企业融资绩效的关联性。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改善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的融资绩效,其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效果更佳。供应链网络健康水平与供应链网络嵌入程度与中小企业融资绩效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性。因此,应该不断创新跨境电商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加强供应链金融的顶层设计,不断整合优化跨境电商供应链网络。^[70]

(四) 环境法治

孟庆瑜、徐艺霄就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的构建问题作出研究,认为随着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在全国试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中各类资金问题愈发凸显,这也成为建立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的基本动因。然而,目前地方相关基金制度公益性与营利性相冲突、资金来源匮乏、业务运营模式单一等问题限制了其主要功能的发挥。因此,需要通过厘定组织形式和隶属关系、明确新的资金来源、引入商业化金融解决方案等措施,为中国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功能实现的制度路径。^[71]

孟庆瑜并与张思茵一起对流域法治的空间审思与完善进阶进行研究,认为以空间视角推动流域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基于当前流域法治存在流域立法未能体现流域空间诉求、流域规划缺乏流域空间整体统筹、流域空间管理存在体制性障碍等空间失语现象,需要按照“价值遵循—治理工具—组织基础”的分析框架,确立流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坚持“人—地—水”和谐的流域空间法治基本理念,遵循

整体统筹与分区分治相结合、目标引领与底线约束相结合、利益配置均衡与权责关系明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流域立法、规划、管理体制、协调机制的改革、调整和完善系统推进流域空间法治进程。^[72]

二学者还共同研究了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法律调适问题,认为水资源用途管制是政府基于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和公共利益需要而干预市场的一项专门制度,我国两级水权市场上相关主体的行为均需要贯彻落实该制度要求。当前,水资源要素市场存在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水资源用途管制高成本低效率的管制失灵问题,以及初始水权配置中市场缺位、水权交易和水市场建设进程缓慢、水权市场运行基础薄弱等市场不足的问题。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优化政府管制和健全市场机制两方面进行法律制度调适。具体措施包括: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基准,明确政府管制的职能边界;通过构建水资源用途管制的沟通协调机制、适度放松机制、决策参与和监督机制,提升政府管制效能;构建和完善水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水权交易利益补偿制度、水市场运行的支持保障体系,实现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协调、良性互动。^[73]

李清章、朱家奇、李梓茗则研究了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问题,认为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必须在考虑有关各方的利益下,通过法治的手段,建立相应的合作与救助机制,以实现环渤海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74]

苏丽、马景顺对河北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对策作出研究,认为河北省农村的环境污染不容忽视。各种污染不仅影响了农民的健康,也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尤其不利于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在建立生态保护规划协调机制背景下,河北省生态环境存在着制度上、意识上、监管上的问题。为治理农业农村污染、建设美丽乡村,河北省应探索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之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增强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充实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支持,构建河北省生态环境法治新体系,全面、科学有效地解决河北省农村生态环境问题。^[75]

（五）旅游法治

贾霄燕、梁若雪对长城旅游开发追责机制的构建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长城是线性文化遗产，涉及 15 个省、市、区，很多保存较好的长城都进行了旅游景区的开发。这就需要从生物学分类的视角提出长城旅游的显性开发和隐性开发，从分析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角度提出长城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显性损害和隐性损害，并从公益诉讼的角度提出解决的具体路径，进而构建起长城旅游开发的追责机制体系。^[76]

对此，赵树文极为认同，认为长城旅游显性开发与隐性开发是紧密联系和相辅相成的。显性开发是长城的外部包装，隐性开发是长城的灵魂打造。两者内外统一，使长城旅游开发带给游客丰富、立体、多元的文化体验。因此，在重视显性开发保护的同时，也应重视防止隐性损害。^[77]

七、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

（一）劳动法律制度

贾玮莉基于共享经济体制背景的要求，研究了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认为在共享经济体制背景下，新型工作形式随之产生，与此同时也伴随许多风险。随着共享经济的到来，劳动者的用工形式也发生了改变，碎片、自由、灵活化是其新的显著特点，同时劳动者工作的稳定性与劳动者的薪资等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共享经济带给劳动者的风险性主要表现在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经济收入不稳定、劳动安全和劳动条件难以保障等方面。尽管共享经济会给劳动者带来自由与便捷，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不容忽视。只有充分了解共享经济背景下劳动者就业的特点，并从共享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总体概况、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法律规制以及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视角出发，分析共享经济背景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现状与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有效提出保护网约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对策和建议。^[78]

齐晓宏则对我国劳动争议的处理方式作出评析，并提出完善建议，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劳动争议也不断增多，面对逐渐增多的劳动争议案件，如何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成为诉讼与仲裁的

重心。调解制度可以更好地保障双方的权益，维持和谐的关系状态。为了减少法院的办案压力，仲裁成为诉讼的必经程序。为此，应当对劳动争议处理方式作出科学评析，做好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合理衔接。^[79]

（二）社会保障制度

肖辉研究了新时代加强虚拟养老模式建设的法律对策问题，认为虚拟养老模式的良性有序发展需要法律调整与保护。为此，立法必须到位，不能空白和缺失。虚拟养老模式需要从立法到执法再到司法的全面到位。立法上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上真正做到执法必严，司法上积极培育良好的司法救济机制，使虚拟养老模式能够得到法律全方位的保障。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可分别或综合采用基本法修订、专门立法以及政策法律化等模式；对于执法的要求，主要强调执法的及时跟进和政策的有效衔接，另外，政府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关于司法保障问题，则需要改进现行司法体制及机制，加快法院网络化建设步伐，建立司法绿色通道。此外，公益诉讼的探索与适用也是一项有效手段。当然，虚拟养老模式还需要整体法治环境的提升，特别是需要培育良好的守法环境及社会舆论氛围，使包括老年人及其家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全体参与和监督，以有效保障该模式的实际运行效果。^[80]

赵立新、高华时对日本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与改革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认为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20 世纪 60—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对之前的社会保障法进行了补充修改，进一步完善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制度。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老龄少子化的出现，日本效仿德国颁布了《护理保险法》，使其成为继德国之后拥有五种社会保险立法的国家。但同时引发的社会保障费用增长使国家财政面临巨大压力，为促进财政再建，20 世纪后期开始进行调整改革。^[81]

八、军事法研究

（一）军事思想

郭永良对新时代人民战争的思想展开研究，认为从人民战争的政治属性入手，在武装冲突、

公共卫生、反恐怖斗争、禁毒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个具体情境中分别盘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的理论内核，可以激活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同时，基层在适用人民战争中应注意处理好本体价值和工具价值、集体主义和个体需求、政府法定职责和可能的泛化适用之间的关系，确保人民战争发挥磅礴伟力的同时不致出现功能异化。^[82]

（二）部队建设

项靖航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为例，研究了美墨边境防控力量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认为美墨边境面临着非法移民、毒品走私、恐怖分子涌入等现实问题，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作为美墨边境防控的重要力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编制结构、情报来源、装备构成、培训体系等方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为此，我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可借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建设和使用方面的经验，以现有常规综合执法队伍为基础，打造一支规模适度、全天候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且满足边境防控需求的特战队伍。^[83]

司谨源、郭永良从海外公民保护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警务联络官的职能定位及未来发展问题，认为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如何加强海外公民保护，完善现有海外公民保护体系成为重要问题。当前，我国海外公民保护工作面临全新挑战，保护体系存在短板，警察作为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专业力量，应在海外公民保护工作中发挥相应职能作用。警务联络官作为警察的海外代表，应重新定位其在海外公民保护工作中的职能，补充海外公民保护体系中的专业力量，进而完善海外公民保护体系，促进警察队伍建设不断发展。^[84]

（三）军事行动

王国梁、叶莹莹、李明月等研究了我国与非盟维和合作的机遇与挑战问题，认为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不断深入，非盟在联合国维和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非盟和平与安全架构也越来越完善，这为中国携手非盟开展维和合作创造了宝贵机会。然而，中国与非盟维和工作的开展也面临着西方维和和大国对非盟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维和话语权不高以及中国与非盟在安全领域合作不成熟的巨大挑战。因此，应当抓住机遇，

加大对西方维和势力与非盟维和伙伴关系的研究力度，聚焦非盟和平与安全架构，开展点对点合作，进一步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中国与非盟的维和合作。^[86]

黄强对中国维和警察行动的指挥体系作出探析，认为中国积极参加海外维和行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我国现行海外维和行动指挥体系存在话语权不足、应急指挥体系不够健全、指挥技术保障能力较弱、情报信息有限等问题。新形势下构建我国维和警察海外维和行动指挥体系，应坚持联合国指挥与出警国指挥有机结合，突出指挥官培训和中高级岗位竞聘，提升我国维和话语权，加强维和行动指挥技术保障和情报收集分析能力，加强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最大限度降低维和警察安全风险，更好地履行维和使命，促进我国海外利益整体保护。^[87]

（四）军事资产

田乾坤、孔炜良对维和警察防暴队的车辆配备展开思考，认为车辆是维和警察防暴队执行任务最重要的装备之一，做好车辆配备相关工作能够显著提升防暴队的整体能力，这就需要总结归纳防暴队车辆配备方面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查找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此，应当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数据库建设，推进车辆通用化，减轻后勤保障压力，科学配备车辆保障力量，加大培训力度，充分发挥车辆效能。^[88]

（五）边防管理

陈墨对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的边境社区警务工作展开研究，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边境社区警务工作面临着人财物流动规模增大、涉外法律规范滞后与缺位、社区警务工作队伍不适应新情况、边境社区警务工作含“科”量不足等新问题。为此，边境社区警务工作应当紧密联系群众，完善涉边法律体系，加强边境社区警务工作队伍建设，提升科技应用率。^[89]

张娜则研究了我国临时入境机动车的管理问题，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临时入境机动车逐渐增多，管理难题也随之凸显。为此，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立足管理和服务两项基本职能，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结合临时入境机动车的法律定位和特点，从完善立法、协同治理、信息化技术应用等方面着手，推动建立系统

高效的“入境检查—境内管理—出境检查”闭环管理模式,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稳定。^[90]

李振华、张健具体研究了中朝边境地区的应急警务管理问题,认为受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国际局势等因素影响,非法越境、越境犯罪、走私偷渡等活动严重威胁着中朝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这就需要充分了解中朝边境地区应急警务的特点及工作内容,研究当前中朝边境地区应急警务存在的问题,从应急警务指挥、边境地区管控、力量体系建设和边境智慧警务等方面,加强中朝边境地区应急警务管理。^[91]

(六) 警卫工作

郭振鹏就新媒体对警卫工作的影响及对策问题作出研究,认为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也给警卫工作带来冲击和挑战。为此,应当增强舆情引导思想意识,继续优化完善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应对机制,加强新媒体环境下警卫任务中的保密工作,主动发声并加强与官方媒体的合作,切实提高警卫工作应对新媒体的能力和水平。^[92]

九、司法及相关制度研究

(一) 司法制度

陈玉忠研究了我国司法的实质公开及其保障问题,认为基于不同的要求和所呈现出的不同状况,司法公开有全面公开、部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形式公开、实质公开之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基本实现了由单纯的庭审公开向司法活动的全方位公开的转变,以及由以审判程序公开为主向审判程序公开和裁判结果公开并重的转变,使中国司法公开制度初步具有了统一性以及全面性的特点。但也应看到,包括裁判依据、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在内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依然在公开之列。实质公开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公开的效果,制约着司法公开终极目标的实现。实现司法公开尤其是实现司法的实质公开,既需要各级法院各类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更需要不断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保障以及不断创新司法工作机制的支撑。从当前来看,应当重点解决司法流程信息还未真正全面公开、裁判依据未能做到详尽公开、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不允

许公开等问题。^[93]

梁平研究了我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规范与技术进路,认为,2020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其中“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属于新提法,是法院审级与法院职能的组合,大体上包括初审管辖权配置、几审终审制、事实审与法律审等方面。对此,梁平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在科学界定各级法院职能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当事人权利救济、诉讼机制社会效用、司法效益最优配置等因素,针对各层级法院各审级的案件分布不合理状况,对审级制度以及案件审理机制进行改革。具体可分为规范进路和技术进路两种方式,前者是通过修改基本法律规范来推进和巩固改革成果,后者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基本法律框架内进行技术性调整,基于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性,适宜采取“技术—规范”的改革进路,实现四级法院职能在理论应然、法律规范、司法实践这三个维度上的高度统一。^[94]

徐昀、李敏围绕审判中心论,就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层逻辑展开研究,认为在事实查明层面,案卷移送制度、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判中心主义存在功能主义关联,因三者功能重叠且程序前后相继而形成“实质化的阅卷+有必要才召开的庭前会议+形式化的庭审”之事实查明的结构,进而导致审判中心主义被消解。以司法一体化为特征的刑事诉讼纵向线性结构或行政结构,对于事实查明的程序正当化没有功能需求,是消解审判中心主义的深层原因。因此,我国刑事诉讼需要完成两次转型,跨越三个阶段,从行政结构到司法结构,从职权主义模式到当事人主义模式,才能实现实质的审判中心主义——被告人中心主义,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从技术到理念的一系列问题。^[95]

陶建国、谢佳欣介绍了日本儿童被害人司法询问制度,并就其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思考,认为日本在学界以及社会团体的大力推动下,于2015年正式建立检察、警察、儿童福祉三个机构的联合司法询问制度。司法询问的程序和方法是在心理学家主导下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后确立的,主要包括导入和建立信赖关系、儿童自由报告、结束三个阶段。其特点为:尽可能询问一次、禁止诱导性询问、引导儿童自由陈述、对询

问结果进行录音录像。目前,我国一些地区探索建立“一站式”询问模式,应当发挥心理学家、精神医学家的作用,扩大联合询问主体的范围,注重提升儿童陈述的真实性,建立询问技能的培训机制。^[96]

(二) 法律适用

梁平、张亦弛研究了“回应型法”的泛化运用及匡正问题,认为由于回应型法概念具有吻合于转型期的开放特征和呼唤法律发展的独特品格,深为我国法学界认可和青睐,相关著述亦可谓汗牛充栋,体现了我国法学界对域外社会法学理论的接受与运用。但对回应型法概念的应用和研究也存在明显的误用现象。一方面,大量研究将本不属于回应型法语境的问题纳入探讨范畴,致使回应型法概念面临外延泛化的困境;另一方面,部分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其直抵回应型法的呼吁似有急功近利之虞。追本溯源,上述问题均源于对回应型法概念的理解偏差。若要准确、周延地把握其内涵,便需明晰回应型法概念的提出意在调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完整性与开放性之间的矛盾,其方法论基础是以目的为中心的法律解释,故司法与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才是回应型法讨论的真正范畴。回应型法概念的生发植根于一定的法律发展模型,因循着固有的发展规律,脱离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的基础构建的回应型法极易沦为蹈空之论。^[97]

宋阳、陈莹则针对民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地位展开研究,认为我国民商事实体法明确赋予了作为自治性规则的习惯的司法适用地位。但由于这类规范在性质上具有复杂多元的客观属性,因此在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不宜将习惯笼统地作为一类独立的法律渊源,进而机械地为其设定司法适用地位以及顺序。而应当在成文法律的框架内,将不同民商事习惯区别对待和处理,并透过合理的程序步骤确定民商事习惯相对于成文法能动的补充性适用地位。^[98]

(三) 监狱制度

翟中东、孙霞通过研究,提出了修改《监狱法》主要条款的建议,认为随着监狱改革的深入推进,现行《监狱法》的某些条款已经与监狱发展极不适应,有必要对《监狱法》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监狱法》修改应当明确刑罚惩罚的地位,明确规定“促进罪犯融入社

会”的内容,将第三章章名修改为“刑罚执行的程序”,在第四章中规定“开放监狱,增加学习释放与劳动释放”的内容,将“危险控制措施的内容”写进法律条款。^[99]

范秋迎针对新时代监管改造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展开思考,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依法治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际出发,不断推进监管改造工作高质量发展,对教育改造罪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00]

郝晨阳、郭虹利、沈世越等对AR+VR技术在罪犯改造中的应用作出研究,认为AR+VR技术在司法领域内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将AR+VR技术与罪犯改造工作有关的场景和相关信息有机结合,是监狱改革和科技强警的一次新的尝试,是对罪犯改造的一次大胆探索。利用AR+VR技术推动罪犯改造思想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从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变,力求建立新时代罪犯改造新格局。通过利用AR+VR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我们可以精确地分析出每个罪犯的不同特点,制造出具有极强针对性的虚拟现实情景,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罪犯改造新模式。^[101]

李书金、郇晓宁对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矫正系统的有效构建展开研究,认为针对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的监管困境,立足于管理科学角度,从系统论出发,对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矫正系统的构成要素、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矫正系统的构建过程中,应当以提升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矫正效果为目标前提,在调查、比较、学习过程中对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矫正系统进行逐步的改进与完善。同时,还应当依据系统分析方法,提出针对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矫正系统科学设计的方法和步骤。^[102]

李天发则具体研究了我国终身监禁犯的改造问题,认为我国的终身监禁在执行中存在“认罪服判问题亟须解决”“诚信教育没有系统开展”“劳动改造项目匹配性差”等问题,行刑效

果较差。对此,在依法治国并不断强化提升刑罚执行效率的背景下,我国应当进一步明确终身监禁执行的基本原则,制定日常管理制度体系,开展系统的心理矫治和教育改造,立足罪犯特点,匹配以科学合理的劳动改造项目,同时畅通矫正出口,让终身监禁罪犯看到新生的曙光,积极改造,以彰显终身监禁的刑罚功效。^[103]

(四) 社区矫正

张凯以我国社区矫正法相关规定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现状及推进路径,认为未成年人是服刑人员中的特殊群体,是社区矫正的重点适用对象。减少监禁损害,加强社会联结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价值所在。然而,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原则未有效贯彻、专门性的矫正项目缺少、专业化的工作队伍缺乏,严重掣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化发展。适用比例不高、区分程度不够、矫正措施不精是其困境表征。为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改造未成年人的优势,需要减少未成年人监禁刑罚适用,减短监禁期限;落实区别对待原则,设计符合未成年人的矫正项目;提升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技能,提高矫正措施的精细化水平。^[104]

张凯还就京津冀一体化视野下社区矫正协同发展的价值、实践与保障进行研究,认为社区矫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治理特殊社会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社区矫正协同发展是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大局,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创新社区矫正实践模式的现实需要。当前,京津冀社区矫正协同发展面临协作意识不到位、工作制度不统一、信息沟通不畅、平等对待不充分等难题,需要三地司法行政机关及相关部门提升协作意识,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互,开展联合督查,向协作互动常态化、协助管理制度化、教育矫正协作化、协商会议平等化方向发展,推动京津冀社区矫正工作再上新台阶。^[105]

翟中东、孙霞则对责任培育矫正项目及其框架作出研究,认为责任培育矫正项目是9个核心矫正项目之一,其目标是培育罪犯承担责任意识、促进罪犯责任行为。该矫正项目通过提高罪犯对自己行为及后果负责的意识、态度与习惯,促进其形成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意识、态度与习惯。责任培育矫正项目的操作与其他矫正项目一样,需要使用社会工作方法,特别

是个案工作方法。^[106]

牛忠志、张奥林对社区矫正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展开研究,认为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社区矫正工作精细化的抓手,可分为四个模块,分别衡量矫正对象的遵纪守法能力、心理人格完整程度、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道德素质水平,建立层级结构模型,成对比较矩阵计算各项指标权重,对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并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的分值,制定一套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布表。应定期开展社区矫正效果评价,评价结果可以作为及时调整社区服刑人员个性化矫正方案、实施动态的分级处遇和提出延长矫正期限建议的依据,也可以为解矫之后的安置帮教工作提供参考。为此,需要在《社区矫正法》第6章增加规定:矫正对象不服从社区矫正监督管理,严重违法违规,但又不构成犯罪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提出延长其矫正期限的建议,并由法院作出裁决。^[107]

(五) 纠纷解决

吴英旗研究了修复性正义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的启示,认为医疗纠纷发生后的患者、家属及医疗人员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此时医患双方都需要通过修复的平台促进了解与体谅从而让伤害得以复原。修复式正义的基本目标在于平衡医患双方及社会利益,修复纠纷双方紧张的关系,努力促成多元关系社群的动态和谐。在医疗纠纷处理中运用修复式实践模式可以纠正现有处理方式在处理理念、处理效果和处理方式等多方面的局限性。修复性正义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理念及路径具有重要启示,如提供医疗事故风险救济或补偿方式、建立有利于医患沟通的对话平台、推动医患共享决策模式以提升沟通品质、整体化处理医疗纠纷的思路,以及关怀小组积极介入协调医疗纠纷等。^[108]

(六) 社会治理

陈焘、梁平立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视角研究了区域法治及其实践进路问题,认为“区域法治”既包括单一行政区划内的地方法治又包括跨行政区划的一体化、合作型法治,是与国家法治相对应的法治实践样态,也是国家法治在地方的具体实践。在国家整体主义、理性建构主义等视角下,区域法治面临着碎片化、法治动力来源、跨行政区划法治合作等理论争点和实践困

境,需要立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法治规定性,正确对待区域法治的客观存在和现实需求,在中央立法主导的前提下,坚持国家法治统一性与区域法治发展性的有机统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转化为区域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并探索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法治合作机制,打造区域一体化的法治市场,增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支持。^[109]

孟祥林研究了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认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110]

孟祥林还进一步研究了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博弈、受益权边界与居民冲突治理,认为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社区基于公共空间使用权的冲突趋向复杂化,这给社区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社区冲突是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而在公共空间使用权的博弈中形成的,因此解决冲突的过程就是权衡冲突各方利益的过程。解决冲突需要厘清公共空间使用权边界、受益权边界,通过帕累托改进提升各自效用水平,同时也需要社区管理者充分了解冲突各方的价格参考点,提升解决冲突的效果。既然冲突基于利益产生,就需要从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分割、使用权限制、使用权保障、使用权支撑等方面的制度缺

陷着手考虑对策,通过埃奇沃斯盒状图分析冲突各方基于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博弈机制,探索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制度演进轨迹。因此,解决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冲突,需要合理分割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完善社区公共空间使用规范,厘清业主付费与受益的关系。^[111]

窦竹君研究了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认为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治理,主要依托基层社会组织进行。本书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组织机制、运作机制和保障机制进行研究,认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推进文化建设,构建民众心底里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由此奠定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是化礼成俗,以便生活化地实现治理;传统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特质,这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能;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够融治理于利益之中,化治理于普通生活中,规范与惩戒融为一体;官府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最终保障,使之得以有效进行。^[112]

吕洁则结合对华北某个村庄的考察,就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展开研究,认为近十几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就业和收入方式逐渐多元化,村庄边界逐渐开放,村民的异质性大大增强,村庄共同体意识逐渐淡化,乡村社会结构及乡村治理模式也随之而发生改变。在工业化进程中,由村民生计方式、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说明基层自治组织与村庄精英良性互动,有利于引导村民致富,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实现村庄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113]

张继红、蒋冰晶对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法治路径进行研究,认为高校学生参与权的切实保障是大学善治的内在要求,而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中存在的诸多法治缺陷是学生参与不足的重要原因。学生参与机制法治水平的提升,是提高高校内部治理水平的优先选择。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法治路径包括:充分完善学生参与的相关立法和高校章程,充分保障学生的参与主体地位;厘定学生参与的范围和边界,确保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健全学生参与的程序制度、完善学生参与权的救济途径,为学生参与权的实现提供程序和救济保障。^[114]

梁岩妍、王千石研究了“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构建问题,认为网络媒体已成为当下我国高校青年学生获取信息、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高校青年学生思想活跃,但不够成熟,易受不良网络媒体信息误导。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西方国家利用舆论对中国民生进行恶意攻击,对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为此,应从三方面构建“后疫情”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法治建设;二是加强后疫情时代网络舆论监管,正确引领网络舆论导向;三是采用教育方式增强高校师生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15]

王利军、张永进研究了涉诉信访的法治化问题,认为涉诉信访针对依法属于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具有政治功能和法治功能双重功能,应当从涉诉信访的处置主体、处置方式、处置程序、处置结果和处置模式分析、搭建涉诉信访的处置框架。需要从涉诉信访的基础、历史、功能、域外情况、处置、特征、联动、改革等方面对涉诉信访作出全面研究。借鉴域外类信访制度经验,在准确把握涉诉信访特征的基础上,充分认识涉诉信访联动的必要性,完善涉诉信访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配套体系,切实实现涉诉信访的法治化。^[116]

马金强、田俊静、苗志宏对我国暗网犯罪展开分析,并对其综合治理进行研究,认为目前暗网犯罪范围不断扩大,类型不断增多,遏制暗网犯罪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对我国暗网犯罪的现状和趋势作出分析,以总结相关的经验教训。为有力打击暗网犯罪,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应立足国情,发挥制度、组织优势,坚持法治与技术并举,通过制度的统筹安排,创新监管模式;同时,通过政策引导,积极鼓励社会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大众等多方参与防范暗网犯罪的技术研发,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提高安全用网意识,构建防范、打击暗网犯罪的协同共治新局面。^[117]

郭辉、杨乔强对我国红十字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展开研究,认为我国红十字会作为以人道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团体,在协助政府防灾减灾救灾、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国际交流

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作用。近年来,与红十字会有关事件的发生折射出红十字会组织管理机制体系行政化、信息披露机制体系片面化和对外联络机制体系封闭化等治理体系不完善问题,同时也凸显出在治理能力方面存在决策不够民主、科学化、信息化程度低、资金缺乏专业管理等治理能力弱化问题。为此,应当结合红十字会组织的宗旨和性质,研究红十字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路径,确保其功能充分发挥,以善治助推“善业”。^[118]

(七) 法治建设

孟庆瑜研究了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认为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现三条路径间的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体系性合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119]

米萍、刘东涛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法治保障体系的构建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法治体系构建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乡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各项法治问题主要表现为村民法治意识不强、农法机制不全面等,为此,需要探索有效的乡村法治体系构建路径: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完善农法体系、加强团队建设、推行完整的食品安监政策等,全面构建乡村法治环境,带动乡村经济发展。^[120]

张春晓、宋阳对生物安全语境下防止生物入侵的法治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如今生物工程技术不断开发与应用的背景下,生物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前景不断扩大,但同时也给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带来诸多潜在威胁。为防止生物入侵对我国的生物安全造成损害,需要分析防止生物入侵的法治建设中存在的困境,探究生物安全

语境下相应的法治措施,制定一系列的法治保障制度规范,以此来推进我国生物防御法治体系的完善与发展。^[121]

刘艳梅、徐振增基于对22个县(市、区)样本的分析,对县域营商环境评估“执行合同”指标的现状、影响因素和优化策略作出研究,认为“执行合同”是营商环境评估的重要法治指标之一。在与世界银行评估可比性前提下,聚焦县域实际,通过样本分析县域“执行合同”指标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应从五方面加以优化:进一步优化法院工作机制,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推动关口前移,着力破解送达难;进一步优化法官工作机制,改进法院审判管理和服务的软硬件,挖掘提升“执行合同”审判质效潜能;继续优化执行工作机制,提高执行质效;以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作为提升“执行合同”指标和法院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建立以简易程序和速裁机制提高审判质效的支持保障体系,发挥其在提升法院营商环境指标方面的优势。^[122]

法治建设离不开法治人才,人才培养很关键。梁平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意蕴,研究了新时代“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培养问题,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境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在于人需要高校培养越来越多的德法兼修法治人才,但不限于法学专业人,而是涵盖所有专业的学生。只有全民法治素养的全面提升,才能使人才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第一资源。当前对法治人才的理解偏狭,法治理念培育先天不足,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有待完善,需要着眼于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人才的定位,构建全景式、融合式、渐进式的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以法学专业学生为重心,以所有学生为基本,构建全视域、全覆盖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123]

梁平还对新时代德法兼修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探索,认为新时代德法兼修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迫切需求,是高校立德树人的使命使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蕴。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着德育教育、话语体系、教育内容、能力塑造、育人格局等方面的现实困

境,应当紧紧立足于中国法治这个根本,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以复合型、应用型、创新性法治人才培养为目标,推进融合式的“厚德育”铸魂工程,建构“话语+现实”的法治教育资源,创新“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探索“知识+体验”的特色实践教育,深化多维度协同机制,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124]

(八)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郭雪慧研究了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困境与定位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展望,认为人工智能在解决司法审判疑难问题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大。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法律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不够完善,法律数据不够充分,再加上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与实务的人员对法律行业的重视不够等因素,人工智能多适用于非裁判、简单的审判中。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审判领域中的运用还需要完善,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智能化,走出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困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数据,加强监管力度,构建办案高效、公平的智慧法院,做好传统法院与智慧法院的融合。^[125]

郭雪慧还研究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挑战与应对问题,认为人工智能的研发需要庞大的信息与数据进行支撑,大量的个人信息被采集、整合,被进一步分析和挖掘,个人信息在人工智能时代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个人信息安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存在信息处理者非法、不正当和过度收集、利用与擅自披露个人信息等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加上相关法律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个人防护意识差等问题的存在,使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目前,我国基于欧盟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实践方面的得失,正在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明确处理个人信息要遵循的原则,细化相关规则,设置专门保护个人信息的机构,完善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通过制定个人信息跨境处理规则,充分保障个人权利,加强个人防范意识,使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并构建多元化的救济途径。^[126]

面对大数据背景,贾柠宁、韩玫对后疫情时

代个人信息公开与保护的路径建构作出研究,认为在中国有力的疫情防控政策下,我国将率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后疫情时代。面对大数据背景下的后疫情时代,个人信息的公开与保护对于防疫常态化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疫情前后不同时期个人信息的法益分析可知,后疫情时代个人信息的公开与保护主要以平衡为目标。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与域外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后疫情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应采用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目的限制原则、信息安全性原则和存储限制性原则,并采用以上基本原则为导向的“全生命周期保护+分类保护”路径,此路径的建构对于平衡社会公益与公民私益具有重要意义。^[127]

十、国际法研究

(一) 国际公法

马雁、史志钦就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序展开研究,认为在全球治理暨法律多元主义体系下,国际秩序面临功能分化时代的治理规则再书写、国家主义单一视角不足、国际法遵守理论盲点及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如何整合等问题。基于国际法规制中客观存在的法律漏洞填补和功能性国际法造法问题,厘清模糊性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分析因规则滞后导致全球治理失灵的原因,剖析全球化社会法权的内在结构,为国际法遵守机制的合理性创建,提供反身法规制的知识考古学验证;阐释系统论社会学理论对新兴国家全球化参与中,确立主体性及构造规范秩序的价值与启示,发展全球治理中的平行规制体系对一切义务的法理进阶;从国际法遵守机制角度,针对全球治理中的规制体系与碎片化等突出问题,阐释治理主体责任建构的理论经验;扩展现状结构,采用过程建构主义和实践理论假设,探索全球治理多元规范的新秩序及与国家治理体系衔接、全球治理规则与共同演化的策略。^[128]

高杰、牛继承就欧盟非法移民遣返的国际合作向度作出研究,认为欧盟作为世界上移民吸引力较强的地区备受移民青睐,非法移民问题也随之而来。欧盟在非法移民遣返方面的实践较为长久,却也饱受非法移民遣返难题的困扰。近年来,欧洲局势错综复杂,欧洲难民危机的发生使

得非法移民问题更加凸显。欧盟为促进非法移民遣返逐步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国际合作路径,即通过“安全第三国”、再入境等政策提高非法移民的遣返效率,取得一定效果,对于解决非法移民遣返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29]

(二) 国际经济法

石可涵对“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加以探究,认为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包括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及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等。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利弊,可以发现当前“一带一路”的发展程度暂不适宜建立以国际条约为基础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而应继续推进国际、国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的对接,推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与完善。^[130]

石可涵还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法律保障问题作出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大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境外投资。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治水平参差不齐,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及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相差极大,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风险。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典型案例和类型化风险,研究国际国内相关法律规则,为企业提供保障。政府层面,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推进国际治理与国际法治,视情况参与企业境外谈判,提供政治支持,推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企业层面,制定全球化管理策略、本土化战略,建立合规体系,重视项目前期调查,合理规避风险。^[131]

宋阳对国际商事惯例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认为应当认真厘清不同语境下的国际商事惯例概念界定问题,对于国际商事惯例的认知应当从语境论的角度观察和认识,并从法律发展的视角解决国际商事惯例作为法律渊源的地位问题。国际商事惯例之所以在中世纪时期能够发挥调整商人之间的交易行为的作用,不过是因为当时商业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在此背景下,商人不得已接受的次优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商事惯例在现如今不能再发挥任何法律作用,只是我们不应过分迷信国际商事惯例这个法律渊源,认为国际商法的所有制度都应当建立在它的

基础之上。^[132]

陈莹、王乃成则研究了国际商事惯例对国内法的影响,认为国际商事惯例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则是否会影响主权国家的立法,历来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国际商事惯例作为一种自治性和事实性的规则,是否与以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内法之间存在交集处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难以确定的问题。目前,国内外许多主流学者的看法是两者之间是各行其是、各成系统的,基本不存在交叉领域。但是,国际商事惯例在实体角度上能够对国家的国内法产生影响,使两者之间产生一致化的现象。国际商事惯例在一些领域可以透过国内法所给予的“准用空间”直接适用于国内法律关系;国内法在立法过程在有限的领域中也会对一些国际商事惯例予以直接吸收,从而使国际商事惯例和国内法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133]

(肖辉: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伊士国.宪法全面实施的学理内涵及实践逻辑[J].政法论丛,2021(03).
- [2]夏妍.基于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径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0).
- [3]范海玉,张思茵.生态环境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法律机制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02).
- [4]范海玉.地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01).
- [5]任广浩,冀晓鹏.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探索轨迹、时代发展与经验启示——以党内法规为线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
- [6]伊士国,郑洁仪.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06).
- [7]伊士国,吉利.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制度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21(10).
- [8]伊士国,燕恬.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之构建[J].廉政文化研究,2021(01).
- [9]陆洲,王文韬.雄安新区立法权限配置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
- [10]马雁.行政规划视域下的“先行先试”立法研究[J].行政科学论坛,2021(02).
- [11]牛忠志,李泽君.论我国监察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基于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09).
- [12]王钧,马勇,刘一家等.西方主要国家退籍制度研究[J].

武警学院学报,2021(01).

- [13]樊林畅,马金强,李同寒,王浩.国际视野下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管理机构分析及借鉴研究[J].网络安全和信息化,2021(10).
- [14]马晨,赵慧广.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公安大数据安全治理的挑战与应对[J].武警学院学报,2021(12).
- [15]李敏.行政法学抑或警察法学——我国警察行政法学科属性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2021(09).
- [16]孟祥林.政府“在场”抑或“退出”:第三部门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
- [17]贡太雷,张俊祥.警囚矛盾关系的类型、原因及其改善[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1(03).
- [18]晏楠.新时代公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路径探索[J].武警学院学报,2021(03).
- [19]蒋冰晶.数据要素供给视角下的信用数据开放研究[J].征信,2021(09).
- [20]李佳瑶.论取消永久居留资格行为的法律属性[J].武警学院学报,2021(11).
- [21]刁道远,冯兆蕙等.高速铁路安全立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22]陶建国,田静怡.论离婚诉讼中离婚教育制度的构建[J].保定学院学报,2021(05).
- [23]雷堂,杜亚欣.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害人权益保障[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03).
- [24]庞敏英.《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互作用问题分析[J].法制博览,2021(28).
- [25]王常聪.大数据侦查的司法风险及其完善路径[J].武警学院学报,2021(10).
- [26]高景芳,张丽伟.杨永智诉济南大学不授予学士学位案法律评析[J].阴山学刊,2021(02).
- [27]陶建国,谢佳欣.论现行立法背景下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不当性[J].前沿,2021(03).
- [28]柯阳友,胡超.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J].保定学院学报,2021(01).
- [29]闫珂,陶建国.论仲裁权限扩大到专业性调解组织[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02).
- [30]殷雁双.国际仲裁中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原则适度应用分析[J].新余学院学报,2021(04).
- [31]殷雁双.国际商事仲裁中关于第三人利益的保护[J].法制博览,2021(09).
- [32]张国敏,郝培轩.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性社会治理——以《民法典》中行政主体义务性规范为视角[J].河北法学,2021(06).
- [33]刘娟,刘俊敏.《民法典》中的一般人格权条款探赜[J].法学,2021(12).
- [34]贾柠宁.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之形塑——以《民法典》第999条切入[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5).

- [35] 田韶华,史艳春.《民法典》居住权制度探微[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
- [36] 田韶华,史艳春.《民法典》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J].河北法学,2021(01).
- [37] 田韶华.身份行为能力论[J].法学,2021(10).
- [38] 徐超,李汶卓,赵秀丽.由政策到法律:论承包地“三权”运行的框架选择[J].农业经济,2021(11).
- [39] 徐超,王肖楠.“三权分置”下承包地发包制度的内涵、构成与定位[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
- [40] 张永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研究: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 [41] 刘广明,张俊慈.“适度放活”视阈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路探索与制度重构[J].世界农业,2021(03).
- [42] 冯建生.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缔结中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04).
- [43] 刘宇晖.戏仿他人姓名之商标应休矣[J].中华商标,2021(01).
- [44] 宋慧献,贾贵梅.传媒竞争与新闻产权刍议[J].新闻爱好者,2021(07).
- [45] 孙日华,任欣.人工智能驾驶侵权责任的判定方法[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 [46] 刘东涛.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法律理论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 [47] 郭玮,韩玫.传统犯罪网络化刑法解释的隐喻进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1).
- [48] 翟中东.国外罪犯文化教育及新进展[J].中国监狱学刊,2021(03).
- [49] 苏永生.德国的刑法合法性原理之双重视角及其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21(02).
- [50] 牛忠志.当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法教义学解析[J].江西社会科学,2021(10).
- [51] 洪求华.中立帮助行为的归责认定[J].法律适用,2021(10).
- [52] 韩玫,李鑫.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竞合[J].保定学院学报,2021(03).
- [53] 翟中东.缓刑刑种化问题的思考[J].天津法学,2021(03).
- [54] 冯军,马丽丽.危害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犯罪立法述评[J].河北法学,2021(08).
- [55] 田旭,李昊天.论“毒驾”入刑[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21(02).
- [56] 韩啸,张光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对象研究[J].河北法学,2021(10).
- [57] 牛忠志,晋泽禹.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废除[J].天津法学,2021(02).
- [58] 敦宁,于鸿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修正的评析与前瞻[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1(02).
- [59] 冯军.非法提供假药、劣药犯罪的罪名确定与罪状解读[J].法治研究,2021(02).
- [60] 李鑫.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前置法的功能不足及补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12).
- [61] 李鑫,苏永生.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教义学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06).
- [62] 苏永生.环境犯罪违法性判断的特殊性及标准[J].甘肃社会科学,2021(01).
- [63] 张丽霞,吕哲.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的几个问题[J].中国军转民,2021(19).
- [64] 胡建伟.营利型挪用公款罪中“但书”适用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21(10).
- [65] 赵树文,苏加彤.民营企业法治保障制度化建构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21(06).
- [66] 赵树文,安丽云,宋雪.民营企业刑事司法平等保障机制完善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1(02).
- [67] 李大庆.公法契约视野下的税收法定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21.
- [68] 补国苗,张志文,郑世成.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以河北邯郸市民营企业税费政策为研究案例[J].新理财(政府理财),2021(12).
- [69] 宋阳,陈莹,王乃成.数字加密货币运行的法律基础——以货币信任与信用为视角[J].海关与经贸研究,2021(02).
- [70] 张文镜.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绩效——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21(16).
- [71] 孟庆瑜,徐艺霄.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构建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设想[J].河北学刊,2021(02).
- [72] 孟庆瑜,张思茵.流域法治的空间审思与完善进路[J].北方法学,2021(02).
- [73] 孟庆瑜,张思茵.论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法律调适[J].中州学刊,2021(09).
- [74] 李清章,朱家奇,李梓茗.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
- [75] 苏丽,马景顺.河北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对策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01).
- [76] 贾霄燕,梁若雪.长城旅游开发追责机制构建[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1(01).
- [77] 赵树文.长城旅游开发也应重视隐性损害[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 [78] 贾玮莉.基于共享经济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1(23).
- [79] 齐晓宏.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方式评析及完善[J].法制博览,2021(09).
- [80] 肖辉.新时代加强虚拟养老模式建设的法律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21(02).
- [81] 赵立新,高华时.日本社会保障法:发展、完善与改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

- [82]郭永良.论新时代人民战争思想[J].武警学院学报,2021(11).
- [83]项靖航.美墨边境防控力量建设与启示——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为例[J].武警学院学报,2021(11).
- [84]司谨源,郭永良.海外公民保护视角下警务联络官职能定位及未来发展[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1(03).
- [86]王国梁,叶莹莹,李明月等.中国与非盟维和合作的机遇与挑战[J].武警学院学报,2021(03).
- [87]黄强.中国维和警察行动指挥体系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2021(05).
- [88]田乾坤,孔炜良.关于维和警察防暴队车辆配备的思考[J].武警学院学报,2021(09).
- [89]陈墨.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边境社区警务工作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09).
- [90]张娜.我国临时入境机动车管理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05).
- [91]李振华,张健.中朝边境地区应急警务管理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05).
- [92]郭振鹏.新媒体对警卫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05).
- [93]陈玉忠.中国司法的实质公开及其保障[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
- [94]梁平.我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规范与技术进阶[J].政法论丛,2021(06).
- [95]徐昀,李敏.审判中心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层逻辑[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
- [96]陶建国,谢佳欣.日本儿童被害人司法询问制度及启示[J].少年儿童研究,2021(09).
- [97]梁平,张亦弛.“回应型法”的泛化运用及匡正[J].山东社会科学,2021(06).
- [98]宋阳,陈莹.民商事习惯司法适用地位研究[J].民间法,2021(02).
- [99]翟中东,孙霞.关于《监狱法》修改的主要条款建议[J].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研究,2021(01).
- [100]范秋迎.新时代监管改造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J].中国监狱学刊,2021(04).
- [101]郝晨阳,郭虹利,沈世越,李天发.论AR+VR技术在罪犯改造中的应用[J].法制与社会,2021(14).
- [102]李书金,郦晓宁.限制减刑服刑人员矫正系统的有效构建[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1(08).
- [103]李天发.我国终身监禁犯改造问题研究[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1(03).
- [104]张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现状及推进路径——以我国社区矫正法相关规定为切入[J].长白学刊,2021(06).
- [105]张凯.京津冀一体化视野下社区矫正协同发展的价值、实践与保障[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05).
- [106]翟中东,孙霞.责任培育矫正项目及其框架[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1(12).
- [107]牛忠志,张奥林.社区矫正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1(03).
- [108]吴英旗.修复性正义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的启示[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1(03).
- [109]陈焘,梁平.新时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区域法治及其实践进阶[J].河北法学,2021(08).
- [110]孟祥林.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
- [111]孟祥林.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博弈、受益权边界与居民冲突治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
- [112]窦竹君.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13]吕洁.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114]张继红,蒋冰晶.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
- [115]梁岩妍,王千石.论“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构建[J].新闻前哨,2021(06).
- [116]王利军,张永进.涉诉信访法治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21.
- [117]马金强,田俊静,苗志宏.我国暗网犯罪分析与综合治理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12).
- [118]郭辉,杨乔强.我国红十字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现代化[J].保定学院学报,2021(02).
- [119]孟庆瑜.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
- [120]米萍,刘东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法治保障体系构建路径探索[J].法制博览,2021(35).
- [121]张春晓,宋阳.生物安全语境下防止生物入侵的法治建设研究[J].决策探索(中),2021(04).
- [122]刘艳梅,徐振增.县域营商环境评估“执行合同”指标的现状、影响因素和优化策略——基于22个县(市、区)样本的分析[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06).
- [123]梁平.新时代“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意蕴[J].湖北社会科学,2021(02).
- [124]梁平.德法兼修: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进阶探索[J].河北法学,2021(03).
- [125]郭雪慧.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困境、定位与展望[J].社会科学家,2021(11).
- [126]郭雪慧.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挑战与应对[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5).
- [127]贾宁宇,韩政.后疫情时代信息公开与保护的进阶建构[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
- [128]马雁,史志钦.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序[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

- [129]高杰,牛继承.欧盟非法移民遣返的国际合作向度[J].武警学院学报,2021(09).
- [130]石可涵.“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探究[J].新余学院学报,2021(04).
- [131]石可涵.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法律保障研

究[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1(07).

[132]宋阳.国际商事惯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33]陈莹,王乃成.论国际商事惯例对国内法的影响[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21(03).

政治学研究

张建军

一、2021年政治学研究总体状况

相较2020年,2021年的河北政治学研究不但在学术研究水平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和学术会议举办等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胥士元通过对我国古代思想家和封建帝王的“为君之道”进行探讨,挖掘“为君之道”的内涵,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展示“为君之道”作为“治道”的重要作用。根据这一任务,胥士元试图回答一系列关切到我国古代“为君之道”的问题:“为君之道”为什么首先要关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为君之道”如何处理君臣、君民关系?君主自身的经历对“为君之道”会产生什么影响?“为君之道”的差异对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后果?现代治理文化建设如何借鉴古代“治道”?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以及对思想家即封建帝王为君之道的阐释,一方面可以充实对古代“治道”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客观地认识古代君王的作为,着重于挖掘某种程度上帝王意愿与民众诉求的交融性。在人物的选择上,胥士元慎择精选,从古代众多的思想家和封建帝王中,选取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开拓者周公,思想家代表孔子、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帝王代表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通过思想家的探讨,了解这些“帝王师”心中的“为君之道”,通过帝王的实践,分析“为君之道”对社会发展及民众生活的影响,后关照现实,从古代的“为君之道”中借

鉴启示。^[1]此外,胥士元还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荀子的治国思想,认为荀子的治国思想以人性恶为前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措施,阐释了君臣在治国中的地位 and 关系,分析了治国者重民之要旨。荀子希望通过节省用度、重农轻赋税、适度发展商业和强化行政管理等措施,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同时,胥士元认为,荀子期盼统一,结束战国纷争的局面。他的治国思想中“外儒内法”的治理手段和“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对古代治国理政者产生了重要影响。^[2]

戴木茅认为,为了有效维持政治秩序,韩非提出以内心恐惧约束行为的观点。“悚惧”是《韩非子》中描写君主对臣属心理震慑的专用词汇。虽然儒家亦赞成臣属对君主怀有畏惧之心,但是法、儒之别在于法家的“悚惧”拒绝仁爱且更注重心理认知。为使臣属心生悚惧,就需要将君主塑造为“神”。韩非的神明观以老子道论为哲学基础,“惟恍惟惚”的道经过“莫知其极”的过渡,在政治治理层面转化为“神隐不测”。秦汉皇权建立后,思想与现实产生共振,本欲震慑重臣使其不敢为非的“悚惧”显露两种异化危险:其一为增强君主独断性;其二为悚惧泛化,最终可能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悚惧。^[3]

张秋山分析了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张秋山认为,二程的君臣论也是宋代理学家关于君臣关系的典型表述。在君臣关系上,二程主张尊君,维护君主权威。同时,二程也主张君臣一体,并力图在理论上寻找君臣相合的切入点,希冀君臣和谐相处,共治天下。但二程的“君臣共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分立,更不是某种制度化的国家建构原则,它着眼于如何通过君臣合力共同完成儒家平

治天下的政治目标，而非挑战皇帝的最终政治裁定权。可以说，在儒家与政治的交互中，儒家倡导的政治模式实为儒者对所处时代的一种理想的政治期待。^[4]

钱寅认为，乾嘉后期以凌曙为代表对康有为对公羊学思想乃至改制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康有为认为公羊学应该划分为为义、例、礼三个方面，并且指出由礼到例再到义的公羊学路径。在公羊之礼的方面，康有为提倡凌曙之书可看。以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的“春秋礼”为考察点，可以发现其对凌曙《春秋繁露注》中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由此可以认为凌曙的学术对后来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为之前学术史所忽视的。^[5]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有几篇重要论文。

谷更有认为，战国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与社会秩序，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重要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不同阶段的政权与民众的统制关系的变化上。其中，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豪族对部民的支配，和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乡绅势力的形成，都对传统的专制——集权的国家政体提出了严重挑战。宋以来乡绅势力的形成，是知识与经济实力结合并杂糅于官权的综合体，是一支特别的富民势力，他们对乡村社会中公共事业、事务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官民之间的介体，影响了政权治理基层的方式：由以往国家事无巨细地直接管理，逐渐变为把一些乡间民事权力让渡给中间力量，包括乡绅在内的中间力量成为维护政权意识形态与保证民众生存利益的双重代言人。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多元的结构，也表现在乡村社会中的多元的权力体系，基层的社会秩序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秩序既有政权对民众的总体约束，也有政权统治所衍生出来的神权体系。唐中后期以来民间宗教的兴起，给国家政权带来了多重负面影响。正统与非法的神权体系，也成为影响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6]

刘志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政是指对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而《周礼》中的市政概念除了“掌其卖儻之事”，即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管理之外，还有着“封邦建国立社稷”的深层政治意蕴。其“面朝后市”不仅是“市”与“城”关系的管理规则，且体现出封建社会“国王理

朝政”“王后理市政”的家天下理念。^[7]

姜锡东分析了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的出现与发展。他认为，这表明宋代迎送礼仪进一步完善，标志着宋代官员迎送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官员公务迎书从通书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信文体，具备独立完成信息沟通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宋代荐举制度推动了官员公务迎书的发展，使其脱离格式化的模式，彰显出写作者个人的特性，公务迎书的书写与官员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官员通过公务迎书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诚意，品级越低的官员所作公务迎书的政治性诉求越强烈。^[8]

廖寅认为，“公吏”是“公人”与“吏人”的合称，与《庆元条法事类》陈述有所错位的是，公人原本由一、二等大户充当，地位高于吏人，王安石役法改革后，与原本由第四等户充当的“胥徒”合流，地位才转居于吏人之下。“公吏”是宋代非常独特的称呼，在宋人语境中，多指“公家之吏”，旨在突出吏职的公家属性。除了国初，宋代公吏主要契合社会中层期望值，是社会中层的最佳出路。在公吏价值最为低微的南宋中后期，“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反常的背后，是日益壮大的士人群体试图改造州县社会权力结构。随着公吏群体的污名化、“毒瘤”化和士人群体分享顾问权、治民权，州县社会形成了近似于两个等边三角形的超稳定权力结构。^[9]

廖寅还认为，随着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力度逐渐增强，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原来适合分散社会的大幅员乡里制不再为国家所需，必然让位于适合整体性社会的幅员更小的乡村组织，都保制于是应运而生。在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保甲、经界、地图三合一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在收乡权于政府的同时，新的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权威体制。宋代乡村社会缺乏门阀、乡绅一类明显的支配阶层，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改变乡村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也导致宋代国家对于乡村的权威，既超越汉唐，亦为后来的元明清所不及。^[10]

衣长春分析了清代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他

认为,清代督抚是衔接中央与地方治理的权力枢纽,其职能变化是中央地方治理策略变化的一种反映。直隶总督作为“八督之首,疆臣领袖”,除具备一般性职能外,还负有其他总督无可比拟的职能。因此,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更具特殊性与代表性。清代,直隶总督的职能经历了复杂的调整,从顺治时期中央在直隶省设多位行政长官到晚清时期直隶总督成为权势显赫的封疆重臣,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涵,体现了中央治理地方能力的变化。^[11]

三、治理理论、政府治理、协同治理、基层治理研究

韩兆柱的关于治理理论的专著分为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介绍、理论综述、比较研究、理论应用以及治理理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将治理作为逻辑出发点,从治理走向公共治理,重点讨论具有前沿性的公共治理理论,厘清六大前沿理论的关系、地位。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第三部分对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第四部分探讨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应用的问题。第五部分重点以治理理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应用为例,讲述理论应用于并指导于实践的故事,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12]

杨光以公共治理为主题,从区域层面的公共治理着手,探讨了如何推进公共治理现代化。著作分为九章,前两章介绍了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以及西方国家的经验,第三章至第八章讨论了区域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区域公共治理的价值再塑、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区域公共危机与风险协同管理以及区域数字化公共治理,第九章则对全文进行了总结。^[13]

王春城探讨了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问题。王春城认为,人类社会反贫困的努力始终受到诸多悖论的挑战,“政策依赖行为”便是一种与政府扶贫实践几乎如影随形的顽疾,存在于整个贫困治理过程当中,更是中国接下来以相对贫困为主题的脱贫攻坚时代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当前,理论和实践界对以“等靠要”为表征的政策依赖行为,更多的是从宏观上作出贫困人口道

德瑕疵等感性归因,进而提出宣传教育、积分奖励、约束惩戒等治标之策,无法从根本上提供长效的制度性解决之道。通过激励理论之“需求—动机—行为”的基本逻辑可发现,政策依赖行为是对激励理论的现实背反:政府的扶贫政策供给作为一种外部干预性激励因素,当它作用于部分扶贫对象之后,产生了与预期激励目标(帮扶起来)相反的效果(滋生依赖)。面对避免贫困治理政策失灵、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挑战及任务,以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等经典激励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背反现象发生机理开展微观层面的挖掘剖析,可进一步找到政策依赖行为矫正的关键路径——政策供给调适,具体包括转变政策供给机制、政策供给重点、政策供给理念和政策供给方式。这是一篇重要论文。^[14]

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有几篇论文涉及了这个问题。

赵永刚、徐立敏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而城乡信息互通共享则是城乡融合发展中一体化市场建设、产业协同培育升级和要素高效配置的重要条件。为此,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出现与市场机制城乡发育程度尤其是信息差距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立足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制约因素,从而为我国城乡一体化推进中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有助推进城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城乡融合深入发展。^[15]

刘仕宇、金福子认为,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方向。论文借助 SCP 范式,引入目标管理、策略选择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主体与购买内容结构对不同主体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参与主体策略行为对最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上级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整体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目前二元协同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不同策略选择行为所导致的绩效侧重对该策略具有正反馈。据此,应通

过扩充参与主体并保障其参与地位、加快专项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绩效评估内容等方式优化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平台,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16]

杨英法认为,智能化时代步入家门,智能化技术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城市公共服务平台作为城市运营的关键性环节,有运用智能化技术来提高便捷性,实现转型升级需发挥文化的催化剂作用,以其助力城市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一是对城市各类文化进行凝练,使其易识易记;二是借助文化消除智能化技术在城市各个领域运用的障碍;三是找到文化与智能化技术及城市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的具体操作方法;四是引导文化行业、智能行业人士交融共进,力争两能毕具。以上方式协同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智能化转型、人文氛围营造。^[17]

有论文讨论了协同治理问题。

王燕、刘邦凡、栗俊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海洋产业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推动下,我国海洋产业正在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经略海洋、深耕蓝色国土是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分析了我国海洋治理及其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提出了构建海洋产业发展新格局的对策建议、推动海洋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18]

李清章、朱家奇、李梓茗讨论了协同治理问题。论文指出,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迟缓延宕。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必须更好地在搞好顶层设计的同时,更好地理解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及自然资本的相互作用,充分发挥相应各方的积极性,通过法治的手段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进行,并使环渤海经济区环境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振兴战略以及海洋战略协同推进、梯次发展,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只有将环渤海经济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其他国家战略纳入一体化考虑,才是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正确理解,只有对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博弈有正确理解,并积极应对,才能使环渤海经济区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19]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基层治理带来了重大

影响,特别是人口流动带来了村庄村民异质性的增强,使得村民的共同体意识逐渐淡化,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治理模式也随之而变。吕洁分析了工业化进程中村民流动对基层治理对影响,指出,由村民生计方式、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谁分层与社会结构变化,揭示了基层自治组织与村庄精英的良性互动,引导村民致富、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内在逻辑和嬗变过程。^[20]

基层治理依然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

张继良、赵丙尧认为,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尤其需要基层党委政府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履行主体责任:第一,强化基层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第二,提高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协调能力;第三,优化基层党委政府职能配置。从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提高社会治理协同性和实际效能的要求来看,当前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快解决基层党委政府权责失衡问题,即权限相对较小而责任相对较大的问题,保证其迅捷、有效地处理基层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二是解决县区级党委政府与乡镇(街道)党委政府权责不匹配问题;三是解决基层党委政府社会协调能力不强问题;第四,促进短期治理任务与长期治理目标相衔接。^[21]

王颖探讨了网络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政府如何趋利避害,用好网络新技术,改善与社会和公众的关系,提高治理社会的能力。认为政府要真正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执政为民,这是社会治理要达到的目标。^[22]

孙娇、赵建辉以我国城乡相对贫困为研究对象,对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进行充分分析,在借鉴他国相对贫困标准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标准,并梳理解决相对贫困的治理思路,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城乡一体化格局、激发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形成相对贫困的常态化治理等。^[23]

盖宏伟、牛朝文认为,我国乡村的现代转向中存在着复杂、不确定的系统风险,严重危及乡村振兴。在乡村系统风险应对中,组织抗逆力有着较强的适切性,具备全过程、全方位、网络化、协同化的整体性治理优势。当前,我国乡村系统风险治理面临着生态系统脆弱、生计系统萎缩、社会文化失范、互助功能式微、资源条件匮

乏等问题,需要我们提升乡村组织抗逆力,即加强乡村基层组织抗逆文化建设,增强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的抵抗能力、复原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更好地治理乡村系统风险。^[24]

戴雅娜认为,回乡能人群体因有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社会关系较广,可连通城乡两地,是农村发展的宝贵人才,故成为补齐农村发展人才短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珍贵人力。因此,要持续完善现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与制度、优化乡村生活与发展环境,吸引能人群体回乡创业,引导乡村企业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乡协同发展,有效带动民众就业、增加收入、减少贫困人口,传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农村社会的凝聚力,从而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25]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政治和外交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的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与长期以来西方盛行的“中心主义”产生文化摩擦与碰撞,造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一系列文化困境。

李新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文化困境有:文化异构导致人类共同价值认同的长期性、文化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等带来的国际文化交流的障碍性,以及国际社会各文化主体低程度的参与性困境。破解此文化困境应实行以下策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有序高效的交流机制;依托“一带一路”,扩大文化认同辐射范围;直面文化差异焦点,精准实施文化策略;拓展文化交流渠道,构建多层次全方位交流平台等。这些策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解决世界争端、促进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6]

张骥、耿直认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其基本内涵阐明人类解放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力量、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想归宿的历史实践活动,同样关怀人类社会前途命运。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逻辑一致性,主要表现为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理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世界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通

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对话协商”“交流互鉴”“共建共享”及“绿色低碳”进行探析,探究其建构路径,可为破解当今世界发展困局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27]

刘文勇、雍尚玲认为,合作共赢、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是中国在经济“走出去”的主要优势特征,但在自动化产品、加工工业品、保险与养老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中依然存在替代与竞争关系。此外,中国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内的社会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社会全球化是服务贸易出口的正向格兰杰成因、是商品贸易出口的负向格兰杰成因,政治全球化是服务贸易出口的负向格兰杰成因、是商品贸易出口的正向格兰杰成因,商品贸易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格兰杰成因。提出应强化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动态比较优势与竞争力,密切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全球化发展态势,系统性制定产业、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宏观调控政策等对策建议。^[28]

宋晓丽、张文海分析了古巴特色的卫生外交。认为古巴从1960年以来将卫生外交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领域,带动了国内医疗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为地区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古巴卫生外交早期阶段主要以周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援助对象,大力践行国际主义理念,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范围及手段开始逐渐扩展。冷战后,古巴卫生外交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推行务实的多元化政策,特别是劳尔·卡斯特罗主政后强化卫生外交的经济功能,更新对外医疗援助内容和手段,致力于发展全面而持续的健康计划。古巴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号召,优先使用医疗人力资源,针对性地培训援助人员,重建和改善受援国的卫生医疗体系,重视预防工作,提倡多边卫生治理合作框架,大力开展卫生外交。60年间古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卫生外交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制定本国的国际卫生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对于我国卫生外交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29]

五、党史党建研究

党史、党建研究依然是政治学界研究的重

点,特别是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各种学术探讨、纪念文章应接不暇。

申文杰、武雨欣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道德建设途径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善于利用各种宣传媒体为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和社会氛围,重视发挥舆论宣传的激励、引导作用;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推进道德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有效发挥规章制度的保障作用;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推动道德建设,切实发挥实践的养成作用;大力宣传、学习模范人物,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运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增强道德建设的感染力,积极发挥文化的熏陶、涵育作用;重视实现和维护群众利益,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充分发挥利益的基础性作用。^[30]

秦宁波认为,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是政党政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同时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史中动态演进的问题。二者关系的历史考察蕴含着系统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具体价值论的辩证统一:一是党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实现了从局部到系统的发展演变,生成为系统的认识论;二是党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实现了从简易到科学的发展嬗递,定型为科学的方法论;三是党如何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蜕变,呈现为具体的价值论。^[31]

李春峰认为,在百年的辉煌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行政监察体制从中央苏区的初步尝试,到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监察委员会的基层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立与撤销,到改革开放之后基本框架的发展与定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对公权力与所有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监督与制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些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国家行政监察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32]

任广浩、冀晓鹏以党内法规为线索,全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的探索轨迹、时代发展和经验启示。文章认为,制度治党概念虽然是在十八大后才正式提出的,但其理念和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制度优势,始终贯穿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制度治党经历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制度治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党的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清晰并逐步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治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战略,采取了很多原创性、独创性的重大改革举措,通过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构筑适应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制度体系,使制度治党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和突破。总结百年制度治党的经验,可以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使制度治党的制度优势更加有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33]

姚志军、姚雷认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两个务必”思想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改造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想作风和习气,锤炼人民军队的革命品格;改造革命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进城前后革命队伍中的“四种情绪”,树立继续革命的思想。这种革命实践启示我们:新时代改造主观世界必须回答时代之问、解决时代之困、增添时代之力。^[34]

张志永探讨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发展及经验。文章认为,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向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继续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这些创新和发展不仅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5]

刘新圣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过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党组制度、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确立“分兵把口”体制、建立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等重大举措,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框架。这些成就和经验启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全面

领导”和“长期执政”来理解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必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动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围绕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的领导制度。^[36]

杨文华、李鹏昊认为，习近平关于“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还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37]

六、民族共同体和国家认同研究

冯月季、石刚认为，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使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根脉，能够形成民族向心力；文化符号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能够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符号还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反思，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中保持民族文化的创造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文化符号入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通过“元符号性”升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赋予现代价值内涵，从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维度；在互联网兴起的全球传播时代，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进国家与民族认同。^[38]

张红、吴月刚对 2014 年以来中国知网 (CNKI) 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相关文献 2194 篇，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250 余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研究的现状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存在不同认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存在不同的理解；更加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多学科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外延不断拓展。现阶段研究呈现出研究成果数量与内容受政策影响显著、研究内容向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转变、研究

视角呈现多学科化趋势等特点。展望未来，应在打破学科壁垒、创新研究范式、丰富研究内容、提升研究层次等方面继续努力。^[39]

代洪宝、杨扬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历程是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统一，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百年理论探究的历程表现为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与传统“自然共同体”文化的统一，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百年历史探求的历程反映为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演变逻辑。百年实践探索的历程展现出特有的实践逻辑，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保障，价值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基础，交融整合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40]

七、总评

从上可以看出，2021 年的河北政治学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也呈现出了一些特点，比如河北大学侧重于基础研究，燕山大学的治理研究成就突出，河北师范大学的党史党建和国际政治研究有一定影响。当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第一，研究成果总体不够，且分散不系统。第二，研究成果畸轻畸重，集中在几个领域和几所高校。第三，基础研究仍然薄弱，河北省的政治学研究队伍建设仍需再加强。

(张建军：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胥士元. 中国古代治道理论与实践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 胥士元. 荀子治国思想探微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3] 戴木茅. 论《韩非子》中“怵惧”的逻辑展开与异化——以君主对臣属的心理震慑为核心 [J]. 江淮论坛, 2021(5).
- [4] 张秋山. 《君臣共治何以可能》——二程君臣论及其理论检视 [J]. 海南大学学报, 2021(01).
- [5] 钱寅. 乾嘉后期公羊礼学思想对康有为的影响——以《春秋董氏学》为视角 [J]. 思想与文化, 2020(02).
- [6] 谷更有.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论略 [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1(02).
- [7] 刘志琴. “立朝与立市”: 从《周礼》看中国传统市政的职能与理念 [J].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8]姜锡东.宋代官员公务迎书考论[J].江西社会科学,2021(01).
- [9]廖寅.宋代的公吏与“公吏世界”新论[J].史学月刊,2021(12).
- [10]廖寅.走向细化: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治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
- [11]衣长春.论清代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J].河北学刊,2021(01).
- [12]韩兆柱.《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
- [13]杨光.区域整合与公共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14]王春城.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J].政治学研究,2021(02).
- [15]赵永刚,徐立敏.以城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21(04).
- [16]刘仕宇,金福子.SCP 范式下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J].生态经济,2021(01).
- [17]杨英法.以文化助配城市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21(01).
- [18]王燕,刘邦凡,栗俊杰.构建海洋产业发展新格局 推动海洋治理现代化[J].中国行政管理,2021(07).
- [19]李清章,朱家奇,李梓茗.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
- [20]吕洁.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21]张继良,赵丙尧.强化基层党委政府社会治理功能[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08).
- [22]王颖.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1(12).
- [23]孙娇,赵建辉.城乡相对贫困的内涵特征及治理思路探究[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
- [24]盖宏伟,牛朝文.现代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策略:提升组织抗逆力[J].学术交流,2021(06).
- [25]戴雅娜.以“能人回乡”工程破解乡村振兴难题研究[J].农业经济,2021(11).
- [26]李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文化困境以及应对策略[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04).
- [27]张骥,耿直.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J].理论导刊,2021(11).
- [28]刘文勇,雍尚玲.中国经济“走出去”能力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视角的研究[J].学术交流,2021(08).
- [29]宋晓丽,张文海.古巴特色的卫生外交及启示——以埃博拉疫情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
- [30]申文杰,武雨欣.中国共产党领导道德建设途径的基本经验[J].道德与文明,2021(04).
- [31]秦宁波.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年审视[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 [32]李春峰.中国共产党行政监察体制的百年进程与现实启示[J].齐鲁学刊,2021(03).
- [33]任广浩,冀晓鹏.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探索轨迹、时代发展与经验启示——以党内法规为线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
- [34]姚志军,姚雷.西柏坡时期中共以“两个务必”思想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考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
- [35]张志永.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及历史经验[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4).
- [36]刘新圣.论过渡时期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成就和经验[J].科学社会主义,2021(02).
- [37]杨文华,李鹏昊.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J].江西社会科学,2021(03).
- [38]冯月季,石刚.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J].思想战线,2021(05).
- [39]张红,吴月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现状、特点与展望[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
- [40]代洪宝,杨扬.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党的建设研究

郑时雨 张勇

一、2021年党的建设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成果,从数量上看比往年有明显增加,高端精品学术成果进一步突破;在内容方面,主要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执政能力建设、“互联网+党建”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质量有所提升,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围绕“建党 100 周年”主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必将载入史册的一年。我们办成了一系列大事要事，战胜了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从 2021 年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成果来看，既有对过往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也有对走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的河北使命任务作出理论回应。

二是深度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论述，比如“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等。

三是党的组织建设相关研究内容中，高校党建已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党的制度建设相关研究内容中，党内法规制定及制度治党成为重点关注内容。

二、党史学习教育

2021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2021 年，河北省学术界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意蕴、学习方法、实践要求等展开了集中探讨。

曲谏认为，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历史发展主流及其本质至关重要；正确地看待中国共产党前进道路上发生的失误和曲折；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中汲取前进动力；“百年艰苦奋斗”“百年敢于牺牲”“百年理论创新”“百年为民造福”“百年自我革命”，这是党的百年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实践本质。^[1]

张勇认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体现。从党史中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才能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肩

负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2]

刘建军、申灿认为，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党性立场，有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不能偏离政治性。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将学习教育过程中激发出来的信念信心、热情激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3]

贾增岁认为，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结合部门职能，以“四个结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实落地。党史学习与“三会一课”相结合，制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方案，成立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纳入日常党员学习教育之中。党史学习与课程思政、“三进”工作相结合，及时将“四史教育”内容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作为重要的思政元素纳入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并有机融入新学期的课堂教学。党史学习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党史学习与文化育人相结合，大力开展文化育人工程，教育引导学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

魏四海认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在坚持历史思维中把握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在坚定历史自信中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是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必不可少的保障。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为了汲取历史智慧，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汇聚成磅礴的中国力量，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5]

魏先法认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重大决策，对于强党建、明大势、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传承党的精神血脉的一种重要方式，“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把握历史大势”“树立大历史观”的重要方式，对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推进社会革命，“办实事、开新局”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6]

代洪宝、杨扬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历程是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统一，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百年理论探究的历程表现为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与传统“自然共同体”文化的统一，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百年历史探求的历程反映为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演变逻辑。百年实践探索的历程展现出特有的实践逻辑，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保障，价值共识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基础，交融整合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路径。^[7]

李芬、袁倩倩认为，党史观是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根本见解。准确把握正确党史观，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百年党史。要从人民立场出发正确看待党史，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8]

王菲认为，知行合一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达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最终要落到学史力行上。学史力行，是学习效果的最终检验，也是引领学习落到实处的根本方法和归宿。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激励督促广大党员干部在锤炼党性、为民服务、推动发展上力行，努力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努力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业绩。^[9]

申灿认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在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中牢记初心使命，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在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中感悟思想伟力，

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的政治自觉。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党的历史是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是点亮未来的精神灯塔，蕴含着取得胜利的精神密码。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10]

三、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就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政治文化等课题展开了讨论。

康振海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11]

石宏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疫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以人民为中心抗疫，不仅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赢得抗疫斗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以人民为中心抗疫就是在抗疫斗争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及发动人民、依靠人民。抗疫斗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累积了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经验，助推中国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增强了中国软实力。^[12]

杨东广认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关键在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这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根本政治保证。^[13]

申灿、刘建军认为，全国一盘棋提出、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时期，在新时代被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全国一盘棋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整体与部分、系统思维、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动态平衡等基本特征。坚持和完善全国一盘棋要正确处理其与地方能动性、地方积极性、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和科学决策的关系。全国一盘棋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制度性保障，是将党的制度嵌入国家制度的成功范例，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14]

张志永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依靠广大群众，积极调动群众中的积极因素，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夯实执政基础、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重要法宝。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并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保证了党的工作重心顺利地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开启了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的转型。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实践群众路线的重要时期，取得了践行群众路线的新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5]

李兰、付臻认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一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思想有着丰富的意蕴，主要包括初心和使命的历史属性、政治灵魂、价值旨归和责任担当、关键举措、坚强保障及其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铸就了百年辉煌。在我们党百年诞辰之际，中国共产党赓续坚守初心与承诺，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伟大新征程。^[16]

张志永认为，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向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继续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这些创新和发展不仅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7]

曹凤珍认为，新时代人民幸福思想是在中国伟大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不仅为中国人民幸福提供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而且为世界人民幸福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探析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及实践路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人民的需要满足、愉悦的生活体验、辛勤的劳动创造是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哲学意蕴；人民性、实践性和整体性是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内在特征；奠定人民幸福的物质基础，完善人民幸福的保障制度，培养人民幸福的主体能力，是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实践路径。^[18]

梁瑞英认为，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要以科学的理论滋养初心，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固守初心，以担当作为的务实行动践行初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一定能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19]

胡伟认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任何社会、任何政党均有与之相称的文化，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进。政治文化属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范畴，借此不但可以解释政治系统内的政治行为及政治心理，还内蕴着政治制度中的政治价值元素。而党内政治文化指的是在政党建设的不同时期形成的有机系统，涉及政党的价值追求、政治心理及党内章程、党员行为规范等，在动态调整中逐渐发展成熟。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党内政治文化意识培养，将其视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贯穿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实践和文化积淀，得到了党员干部的普遍认同，系统而高效地推动着党组织运作，全面而深刻地规范着党员的政治行为选择。^[20]

四、党的思想建设

始终重视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

造，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发展。在新时代，要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准确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紧跟时代步伐，把稳思想之“舵”，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增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培育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思想指导、理论支持和舆论保障。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就伟大建党精神、理论创新、斗争精神、理想信念、革命精神、道德修养以及红色资源开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伟大建党精神

牛余庆认为，百年奋斗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中磨炼意志、砥砺精神的历史。精神需要传承，血脉需要赓续。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永葆生机与活力，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精神赓续、信仰如磐，血脉相承、薪火相传。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党的精神谱系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新的更大业绩。^[21]

靳娇娇认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并作出深刻阐释，号召全党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信仰，确立“明大德”的指导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彰显“守公德”的基础地位；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把握“严私德”的基本尺度。^[22]

许金哲认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当中，精辟地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四层内涵，号召全党要“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即救亡图存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源泉，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土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所蕴含的精神源泉、精神动力。^[23]

魏先法认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把“牢记初心使命”置于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号召之首，与“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一起，成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精神动力。在新的赶考路上，全体共产党员要牢记初心使命，必须做到准确把握初心使命，奋力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24]

（二）坚持理论创新

张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取得一系列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导向；必须坚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价值取向；必须坚持依靠党和人民共同奋斗，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智慧之源；必须坚持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生命活力；必须坚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保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民族特色。^[25]

李鉴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是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系严谨、意旨明确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它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真理力量。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根基，一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终身必修课；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之问；三是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26]

田海舰认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改革创新。这些宝贵经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27]

王国绪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在于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指导。“学史明理”要求我们，学习党史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学习党史不仅要了解党的光辉历程，更要深刻理解历史规律，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才能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发展的关键阶段，看清大势，认清自身，把握规律，赢得主动。^[28]

杨福忠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的理论，其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构建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价值追求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在用阶段性发展小目标推动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目标过程中，领导人民创造了“两大奇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完善包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制度安排为共产党取得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9]

魏先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党的百年历史进行了科学总结，尤其是关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倡导的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具有十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30]

（三）斗争精神

杨东广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敢于斗争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机盎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斗争已经成为我们党的独特气质和政治品格，深深熔铸于党的血脉之中。新征程上，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准斗争方向，永葆斗争精神，把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31]

王秀华认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敢于斗争，体现的是面对复杂局面和危难险重问题时的骨气和魄力，体现的是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危难险重任务时的能力和水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把准斗争方向，站稳斗争立场，把握斗争规律，谙熟斗争艺术，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32]

张勇、曹冉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永远不能骄傲自满、始终艰苦奋斗，时刻防范“糖衣炮弹”、永葆政治本色，是党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是根植于党的血脉之中的基因密码。我们要牢牢把握、始终坚持、赓续传承这些基因，只有把它们变得更为强大，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才能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新的历史伟业。^[33]

牛余庆认为，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理论品格和精神特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表现为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的风骨和品质，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要夯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根基；赓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血脉；培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意志品质；增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本领。^[34]

杨福忠认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是我们战胜困难、迈向成功的重要法宝。奋进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党

员干部必须练就高超的斗争本领，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传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练就见微知著本领、风险辨识本领、责任担当本领、科学应变本领、会干事干成事本领。^[35]

（四）理想信念

程瑞山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其中学史增信，就要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从百年党史中涵养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抵御各种诱惑与干扰，从源头和根本上筑牢精神防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36]

张勇认为，牢记初心使命是增强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内在动力，坚定理想信念是弘扬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奋斗精神，践行党的宗旨是贯彻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实践要求。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聆听时代呼唤，响应伟大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37]

韩立红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体党员发出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号召，是对历代治乱兴衰周期率和我们党的奋斗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重大思考。作为走过百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感受到人民的伟力，也体悟到信仰的伟力。^[38]

王彦坤认为，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伟大转变，历经磨难无往而不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拥有科学信仰、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高扬信仰、信念、信心的风帆，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

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39]

王永芹认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牢记和践行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觉和行动自觉，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不断体悟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增强为民本领，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40]

王菲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信仰是对某种思想理论的信奉敬仰，是一种深沉而笃定的精神力量。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坚定理想信念，为崇高理想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历史。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感悟信仰的力量，始终不渝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抱定必胜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41]

（五）革命精神

康振海认为，河北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和活动的重要区域，在河北孕育形成的李大钊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精神、董存瑞精神、冉庄地道战精神、一二九师精神、白求恩精神、晋察冀精神、西柏坡精神、唐山抗震精神、李保国精神和塞罕坝精神等精神财富，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河北乐章。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最大程度激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民族复兴辉煌业绩的精神力量。^[42]

陈秀梅认为，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伟大的革命精神。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核心内涵包含了居安思危、迎接挑战的“赶考”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西柏坡精神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前进的动力，新的征程上，西柏坡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砥砺前行。^[43]

戴建兵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至上精神；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创新精神；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西柏坡精神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强大武器，是实现中国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保障。^[44]

王彦坤认为，西柏坡精神至今没有权威规范的内涵表述，影响其学习传播和弘扬光大，凝练概括权威、规范的内涵，成为理论界亟待完成的重大课题。根据依据史实、突出特质、遵循论述、凝聚共识、便于传承的原则，西柏坡精神内涵凝练可概括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政治协商、团结合作的民主精神；立规严纪、集中统一的看齐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踏上新征程，需要理论界继续凝练概括，争取西柏坡精神内涵早日问世，为全社会知晓、记忆、理解、认同并践行，更好将西柏坡精神发扬光大并世代传承。^[45]

姚志军认为，西柏坡精神，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精神；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概而言之，“两个务必”“两个一切”“两个善于”和“两个敢于”，构成了西柏坡精神的“四梁八柱”。新时代党员干部传承弘扬西柏坡精神，必须用“两个务必”精神筑牢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党本色；必须用“两个一切”精神指引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追求和人民立场；必须用“两个善于”精神拓展践行初心使命的执政方略；必须用“两个敢于”精神指导投身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46]

姚志军、姚雷认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两个务必”思想改造主观世界，进而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以“两个务必”思想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改造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想作风和习气，锤炼人民军队的革命品格；改造革命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进城前后革命队伍

中的“四种情绪”，树立继续革命的思想。这种革命实践启示我们：新时代改造主观世界必须回答时代之问、解决时代之困、增添时代之力。^[47]

徐凡认为，塞罕坝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牢记使命是塞罕坝精神的核心，艰苦奋斗是塞罕坝精神的支撑，绿色发展史塞罕坝精神的特质。新时代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必须要坚守初心，始终把党的使命扛在肩上，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必须要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在本职工作中开拓奋进；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不断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不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48]

张彦台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抗震精神始终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的强大力量。面向未来，更好履行新使命、应对新挑战、完成新任务，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唐山抗震精神，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光大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迎难而上、奋发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49]

戴建兵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50]

（六）红色资源

王永芹认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及其物质载体，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记录着党的初心使命、奋斗历程、理想信念、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蕴藏着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精神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实践逻辑。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始终是激励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力

量,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坚定信仰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最好教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精神滋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51]

田海舰、李慧娟认为,建党百年,加快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有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推动河北红色革命文化得到切实有效传播,必须加快构建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从传播主体维度看,政府、学校、社会组织要相互配合、协同创新;从传播内容维度看,要系统整合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理直气壮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从传播路径方法看,要实现学校教育、理论宣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从传播载体维度看,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从传播方式维度看,要推动红色革命文化公益化宣传与产业化传播协调发展,致力形成受众广泛、立体化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格局,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52]

申灿、马亚敏认为,依托红色资源打造党性教育品牌不仅有利于深入挖掘、整合和开发当地红色资源,而且为开展党性教育和丰富党性教育形式提供了重要平台。河北是红色资源大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都排在前列,但在党性教育品牌建设上,河北存在着缺少精品、教学方式单一和党性教育市场不规范等问题。实施品牌“以大带小、以弱带强”工程,推动党性教育课程研发建设以及加强党性教育市场监管和成立干部学院等形式,是利用红色资源打造河北党性教育特色品牌的重要途径。^[53]

(七) 道德修养

孙英臣认为,高尚的品德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加强道德修养是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就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精神血脉,把崇高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要从我们党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力量,崇尚对党忠诚之大德;感悟为民情怀,崇尚为民造福之公德;感悟革命先辈及英雄模范的品

格风骨,崇尚严于律己之私德。学习党的历史,要自觉从党的光辉历史中寻找道德坐标,用共产党人的崇高道德滋养初心、引领使命,赓续精神血脉。^[54]

袁秀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唯一一以贯之地保持和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才能破浪前行、行稳致远,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变为现实。要通过有效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氛围,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与责任追究,促使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身体力行,将艰苦奋斗作为党性修养来修炼,作为良好生活方式来坚持,作为优良作风来发扬,使艰苦奋斗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底色。^[55]

郭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院校作为党和国家开展现代化公安教育的前沿阵地,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必然是公安院校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公安院校廉政文化建设仍然面临思想认识不够到位、长效机制不够健全、基础教育不够深入、宣传载体不够丰富等问题。为此,应该通过提高认识水平、建设长效机制、加强教育渗透、创新宣传载体、扩大覆盖面等途径提升公安院校廉政文化建设水平。^[56]

龚志宏认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政治建设统领的根本性。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与加强党性教育的基本任务具有内在一致性。深刻认识党性教育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的内在逻辑为根本遵循。提升党性教育质效,需要净化政治生态,发挥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管,营造党性教育的健康环境;需要强化政治自觉,使“学什么”科学化、“怎样学”实效化,持续推进科学研究、优化党性教育的基本要素;需要形成政治规范,优化顶层设计机制、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完善常态化机制,

使党性教育的规范化和长效性得到有力保障。^[57]

五、党的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组织工作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等领域展开了讨论。

刘汉利认为，军政委员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孕育于军事政治苏维埃构想，产生于长征前夕，建立于红军改编时期，发展于全面抗战时期。军政委员会制度在诞生早期与党组性质党委制度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早期军政委员会制度下，党的绝对领导取得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党组性质党委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组性质党委应该实行高度集中的集体领导，书记的人选由首长分工负责的具体情况决定，党组性质党委领导下不能忽视民主制度建设。^[58]

李光伟认为，高校承担着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的社会重任，高校党建工作在高校建设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要不断思考探索，创新发展，为高校健康有序运转提供保障。这就需要创新理论学习形式，严格规范党员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创新基层党建内容及形式，丰富党组织功能，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同时，还应与依法治校结合起来，全面提高高校教育工作水平。^[59]

杨萍、韩继锋、于扬认为，高校基层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党支部肩负着提升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培养教育管理积极分子以及学生党员的重任，是开展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是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工程，要从着力强化政治功能、完善党员教育管理、创新组织生活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入手，使学生党支部真正成为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战斗堡垒。^[60]

韩凤华认为，开展严肃认真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政治抓手，是加强和改进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政治要求，是

高校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的路径之一。从实际情况分析来看，部分高校学生党支部的党内政治生活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诸多问题，削弱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降低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声誉和威信，亟须加以重视、改进并及时纠正。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常态化，要坚持辩证思维，聚焦主体责任，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的领导力；坚持战略思维，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的凝聚力；坚持创新思维，聚焦创新组织生活方式，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的号召力；坚持系统思维，聚焦制度约束，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的执行力；坚持底线思维，聚焦监督问责机制，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力。^[61]

王亚坤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表现为：党员队伍结构失衡，党员队伍建设亟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规范性不够，农村基层党员教育较宽松；组织作用有所弱化，保障激励制度不完善。应优化组织结构，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效能；提升农村党员素质，抓好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严格组织生活，创新推动农村基层党员教育的管理模式，推动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共促进、双提升、高质量发展。^[62]

六、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纪律建设是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一体的党的自我革命过程，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铁的纪律是党葆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实现初心使命的根本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核心优势所在。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和反腐败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

孟庆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获得领导地位，发挥核心作用，并取得“四个伟大成就”，同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分不开的。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把全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63]

楚颖惠认为，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理论来源，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遵循的思想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坚持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推动社会革命，在自我革命中管党治党；理性认识自我革命，传承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保持活力的动力。广大党员干部要理性认识自我革命，在容错中及时纠错，在及时纠错中“治病救人”，在自我革命中高举旗帜，彰显优势。^[64]

甄贞认为，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党一贯秉持的坚定而鲜明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奋斗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于新时代条件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65]

七、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制度建设始终与党的奋斗历程相伴相随，并被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党的制度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更好坚持依规治党、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借鉴。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探讨了党内法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等现实问题。

伊士国、吉利认为，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是最低层级的党内法规制定权，在党内法规制定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从实践来看，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还存在制定主体范围不清及其权限划分不明、“再授权”、制定程序不健全、监督乏力等问题。我们应通过厘清省级党内法规制定主体范围及其权限划分、防范和禁止省级党内法规制定主体“再授权”、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完善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监督机制等途径，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制度，规范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行使。^[66]

伊士国、燕恬认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

序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程序依据所在，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尚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尚未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应借鉴立法后评估程序，并结合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自身特点，以合规性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公开原则、科学性原则为指引，具体构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包括评估对象、评估主体、评估方案的选择和确定，评估工作启动时间的科学界定，评估信息的搜集与研判，评估报告的形成、公布以及运用等环节，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的开展提供程序保障。^[67]

伊士国、郑洁仪认为，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在整个党内法规制定体制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规范设计包含制定主体、制定权限、制定权的监督三个方面。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存在主体范围不清、权限模糊、监督效果不佳等问题。应通过准确界定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主体范围、厘清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限、健全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监督机制等途径，不断健全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规范体系，保证其规范行使。^[68]

吴杰华认为，任期制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存在追责事项的范围和性质界定不清晰、追责主体过于单一片面、追责对象交叉模糊、追责程序不够具体、追责形式不明确等构建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协调统一的立法机制、完善衔接有效的程序机制、健全纠错救济机制以及建立制度化的决策机制进行化解。^[69]

李春峰认为，在百年的辉煌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行政监察体制从中央苏区的初步尝试，到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监察委员会的基层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立与撤销，到改革开放之后基本框架的发展与定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对公权力与所有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监督与制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些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国家行政监察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70]

任广浩、冀晓鹏认为，“制度治党”概念在十八大后才正式提出，但其理念和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制度优势，始终贯穿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制度治党经历了新民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制度治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党的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清晰并逐步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构筑适应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制度体系，使制度治党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和突破。总结百年制度治党的经验，可以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使制度治党的制度优势更加有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71]

常满荣认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践探索与话语表达，其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精髓是多党合作，真谛是人民民主。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度的新范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成果，是治理效能转化的新优势。新型政党制度对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四个自信”；对打破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作用，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政党履职本领；畅通参政渠道，激发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72]

李艳、苏静怡认为，2020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公共卫生安全、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挑战。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场全民抗疫斗争中彰显出巨大优势，充分展示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影响。在肯定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同时，要充分认识到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在效能转化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面临意识形态分化挑战、各民主党派作用不明显、制度共识待加强等。实现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向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既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提高其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同时也要培养人民群众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感，强化制度自信。^[73]

八、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探讨了治理能力提升等问题。

张继良、赵丙尧认为，推进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基层治理能力尚待提升的背景下，构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尤其需要基层党委政府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履行主体责任。第一，强化基层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第二，提高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协调能力；第三，优化基层党委政府职能配置，加快解决基层党委政府权责失衡问题，解决县区级党委政府与乡镇（街道）党委政府权责不匹配问题，解决基层党委政府社会协调能力不强问题；第四，促进短期治理任务与长期治理目标相衔接。^[74]

蒿帅凯认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点多、面广、战线长，是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北省近期疫情防控主战场、最前端、第一线。要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不断强化农村疫情防控，在治理机制上，创新构建农村应急治理体系；在治理基础上，有效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在治理环境上，培育良好舆论环境和卫生环境；在治理任务上，突出“四个重点管控”；在治理方式上，综合运用德治、法治、自治与智治。^[75]

九、“互联网+”党建

运用互联网技术推进党建工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互联网+党建”工作模式使党的服务功能得到延伸和拓展，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能力，促进各级党组织的有效衔接，满足了不同群体党员的实际需求。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就运用“互联网”“微视频”等技术，推动高校党建工作展开研究。

孙红帅认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给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和阵

地,同时也给传统的党建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要深刻认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着力构建完善“互联网+党建”工作新模式,进一步提升高校党建工作水平。首先,提高“互联网+党建”工作意识,使党建工作者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对于高校学生党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其次,健全“互联网+党建”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建工作管理中的各级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员具体工作责任制。再次,丰富“互联网+党建”工作内容,构建立体党建新格局。最后,促进线上线下党建工作有机融合,坚持“面对面”与“键对键”相结合,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相联动,激活党建工作。^[76]

祝国强、冯立刚认为,运用微视频可以创新党建育人途径。理论而言,微视频制作以党的创新理论形象化为现实目标,满足学生接受需要,集合了知情意信行五要素提升教育效果,切合学生实际寓教于乐。现实操作看,把握微视频制作的关键要点并以党支部为主导对学生进行微视频制作培训,在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77]

郭薇、张书皓认为,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党建工作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当前大学生党建工作较为薄弱,实践教学不健全、党建活动信息传递实效性不强等,成为影响大学生党建工作的重点问题。高校应高度重视新媒体为大学生党建工作带来的双重影响,积极健全党建平台体系,不断优化教育内容,努力创新完善党建工作管理制度,从而构建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党建工作新模式。^[78]

通过对2021年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充分挖掘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领域的诸多创新观点,以及探讨党的建设研究领域的诸多创新观点,以及探讨党的建设研究领域的诸多创新观点,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的成就既有广度且有深度。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还有进步空间。第一,一些基础研究,如坚持党的领导研究、党内民主研究、党的建设制度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等力度还不够,深度有待加强,因而一定程度上缺乏前瞻性、预测性。第二,在内容分布上,本年度“党的建设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建党100周年”主题展开,大量论文集集中在“党史学习教育”和“党

的思想建设”领域,对于党的建设的其他相关内容探究尚不够全面。今后一段时期,应当进一步拓展党的建设研究事业,深化党的建设研究内容,优化党的建设研究方法,深度挖掘党的建设的学术创新与突破空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治理现代化能力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郑时雨: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
张勇: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教授)

参考文献:

- [1]曲谏.百年党史的主流和本质[J].党史博采(下),2021(10).
- [2]张勇.学史明理,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N].河北日报,2021-04-14.
- [3]刘建军,申灿.讲政治: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所在[J].共产党员(河北),2021(07).
- [4]贾增岁.“四个结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实落地[J].共产党员(河北),2021(22).
- [5]魏四海.科学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J].共产党员(河北),2021(11).
- [6]魏先法.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逻辑和理论思考[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2).
- [7]代洪宝,杨扬.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3).
- [8]李芬,袁倩倩.准确把握正确党史观[J].共产党员(河北),2021(11).
- [9]王菲.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N].河北日报,2021-08-06.
- [10]申灿.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N].河北日报,2021-05-07.
- [11]康振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N].河北日报,2021-07-07.
- [12]石宏亮.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抗疫的根本经验[J].武警学院学报,2021(09).
- [13]杨东广.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J].共产党员(河北),2021(03).
- [14]申灿,刘建军.论全国一盘棋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和完善路径[J].治理现代化,2021(04).
- [15]张志永.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及启示[J].共产党员(河北),2021(20).
- [16]李兰,付臻.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思想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 [17]张志永.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和历史经验[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4).
- [18]曹凤珍.新时代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及实践路径探析[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 [19] 梁瑞英.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N].河北日报, 2021-05-26.
- [20] 胡伟.建党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演化[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28).
- [21] 牛余庆.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N].河北日报, 2021-04-07.
- [22] 靳娇娇.在涵养政德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J].共产党员(河北), 2021(17).
- [23] 许金哲.伟大建党精神的来源及深刻内涵[J].党史博采(下), 2021(10).
- [24] 魏先法.新赶考路上要牢记初心使命[J].共产党员(河北), 2021(19).
- [25] 张勇.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宝贵经验[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1(02).
- [26] 李鉴修.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N].河北日报, 2021-09-10.
- [27] 田海舰.略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基本经验[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1(01).
- [28] 王国绪.学党史应该明哪些“理”[J].共产党员(河北), 2021(18).
- [29] 杨福忠.实现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百年大党的不懈追求[J].新视野, 2021(04).
- [30] 魏先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科学思维[J].共产党员(河北), 2021(17).
- [31] 杨东广.敢于斗争:百年大党的鲜明品格[N].河北日报, 2021-05-19.
- [32] 王秀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N].河北日报, 2021-02-03.
- [33] 张勇,曹冉.百年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活力的基因密码论析[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1(02).
- [34] 牛余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N].河北日报, 2021-08-25.
- [35] 杨福忠.在实践中练就高超斗争本领[N].河北日报, 2021-03-19.
- [36] 程瑞山.从百年党史中涵养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J].共产党员(河北), 2021(17).
- [37] 张勇.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荣光[N].河北日报, 2021-07-21.
- [38] 韩立红.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J].共产党员(河北), 2021(19).
- [39] 王彦坤.信仰信念信心:克难制胜的强大精神力量[N].河北日报, 2021-06-23.
- [40] 王永芹.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不断体悟初心使命[N].河北日报, 2021-07-14.
- [41] 王菲.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信仰的力量[N].河北日报, 2021-05-19.
- [42] 康振海.奏响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河北乐章[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5-06.
- [43] 陈秀梅.让西柏坡精神在新的征程上绽放时代光芒[N].天津日报, 2021-08-30.
- [44] 戴建兵.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J].人民教育, 2021(10).
- [45] 王彦坤.西柏坡精神内涵凝练概括的若干思考[J].观察与思考, 2021(12).
- [46] 姚志军.西柏坡精神: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指南[J].党史文汇, 2021(05).
- [47] 姚志军,姚雷.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两个务必”思想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考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48] 徐凡.塞罕坝精神:牢记使命创造绿色天地[J].党史文汇, 2021(08).
- [49] 张彦台.唐山抗震精神:战胜风险挑战的强大力量[N].河北日报, 2021-06-02.
- [50] 戴建兵.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J].红旗文稿, 2021(21).
- [51] 王永芹.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运用好红色资源[N].河北日报, 2021-03-17.
- [52] 田海舰,李慧娟.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53] 申灿,马亚敏.河北红色资源在打造党性教育品牌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1(10).
- [54] 孙英臣.学史崇德,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N].河北日报, 2021-04-23.
- [55] 袁秀.在新征程上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N].河北日报, 2021-03-24.
- [56] 郭超.关于新时期公安院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J].武警学院学报, 2021(11).
- [57] 龚志宏.政治建设统领视域下提升党性教育质效的思考[J].武警学院学报, 2021(09).
- [58] 刘汉利.党组性质党委的初次尝试与历史经验——早期军政委员会考略[J].武警学院学报, 2021(11).
- [59] 李光伟.新时代高校党建创新之路探析[J].党史博采(下), 2021(03).
- [60] 杨萍,韩继锋,于扬.基于组织力提升的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1(22).
- [61] 韩风华.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路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1(04).
- [62] 王亚坤.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研究[J].办公室业务, 2021(19).
- [63] 孟庆云.新征程上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N].河北日报, 2021-08-11.
- [64] 楚颖惠.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 2021(03).
- [65] 甄贞.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及启示[J].党史博采(下), 2021(07).
- [66] 伊士国,吉利.健全省级党内法规制定权制度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 2021(10).
- [67] 伊士国,燕恬.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程序之构建[J].廉政文化研究, 2021(01).

- [68]伊士国,郑洁仪.中央工作机关党内法规制定权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06).
- [69]吴杰华.任期制下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困境及其化解机制[J].领导科学,2021(05).
- [70]李春峰.中国共产党行政监察体制的百年进程与现实启示[J].齐鲁学刊,2021(03).
- [71]任广浩,冀晓鹏.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探索轨迹、时代发展与经验启示——以党内法规为线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
- [72]常满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意蕴探析[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2).
- [73]李艳,苏静怡.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分析[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

(04).

- [74]张继良,赵丙尧.强化基层党委政府社会治理功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08.
- [75]蒿帅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强化农村疫情防控[J].共产党员(河北),2021(04).
- [76]孙红帅.运用“互联网+党建”提升高校党建工作水平[J].共产党员(河北),2021(06).
- [77]祝国强,冯立刚.微视频在高校党建管理育人中的应用——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J].高校辅导员学刊,2021(03).
- [78]郭巍,张书皓.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党建工作模式的构建分析[J].决策探索(下),2021(01).

社会学研究综述

田翠琴

2021年,河北省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社会治理研究、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协同发展研究等方面增加许多有创新性的成果,深化了人口社会学、老年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尤其生态环境保护与京津冀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出版了多部社会学专著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如《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田翠琴等)、《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吕洁)、《区域整合与公共治理》(杨光)、《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王金营)、《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张岭泉)等,学术著作的数量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2021年度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社会治理研究

(一) 社会治理

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方向。刘仕宇、金福子借助SCP范式,引入目标管理、策略选择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主体与购买内容结构对不同主体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参与主体策略行为对最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

治理机制尚未形成,整体治理结构尚未完善。提出应通过扩充参与主体并保障其参与地位、加快专项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绩效评估内容等方式优化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机制,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1]

第三部门承担了政府剥离的非核心职能,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实现了从“万能政府”向“高效政府”的转型。孟祥林认为,传统管理模式下的行政强制需要转为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互动,管理过程要突出治理措施的理性设计。传统管理模式在很多方面都要发生变化:权力下放由“集权管理”转为“分权管理”,职能定位由“划桨员”变为“掌舵师”,运营方式由“国有国营”变为“国有民营”,关注重点由“重视投入”转为“重视产出”,经营机制由“垄断经营”变为“竞争经营”。在扩大第三部门行动自主权过程中,政府需要保持“在场”而不是“退场”,政府的职责在于优化政策环境和加强疏导。第三部门发展进程中仍然面临意识、制度、需求、人才等瓶颈,这需要在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建立科学约束机制、建设动态轮值小组、强化公民参与意识、谋求持续资金支持等方面下功夫。^[2]

敏捷治理先后被定义为一种战略机制、控制机制、手段、能力和决策过程。任嵘嵘等通过梳

理敏捷治理相关定义的演化,认为敏捷治理是一种使组织能够快速适应环境变化,将敏捷应用到感知、响应和协调整个组织之中,使组织获得高绩效、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管理机制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变革。为应对持续挑战,各组织尝试将大规模敏捷方法应用到自身业务中,以灵活、持续、快速地协调自身业务组件和资源。敏捷治理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在组织绩效、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方面,为企业战略变革、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作者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敏捷治理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梳理,同时围绕敏捷治理的能力要素、内外部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构建敏捷治理研究框架,对当前相关研究有一系列思考。^[3]

工作环境主要指的是从业者在其工作单位中,在主观上所感受到的一种工作氛围与工作状态。工作组织与单位作为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制度载体,主要通过其所形成和营造的独特的社会环境或者组织文化影响并规范员工的组织行为。在欧洲,工作环境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交叉学科领域。在中国,学者们对工作环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主要从工作时间、工作报偿、工作场所以及工作中的员工参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中国组织工作环境研究: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一书,探讨中国组织工作环境研究的理论框架,分析组织中的社会团结、组织中的冲突与整合、组织中的保护与包容、组织成员的参与、组织成员的角色结构与互动以及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并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报偿以及工作参与切入,在中国工作环境研究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组织的工作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证的探讨,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组织工作环境状况,在学科意义上为工作环境领域的总体性研究和对话提供启示。^[4]

家庭不仅关乎社会成员的和睦幸福,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支点,而人户分离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治理。人口规模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发展经济学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人口规模流动的原因、过程和特点,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等人的二元经济理论将人口流动归因于收入水平差异,托达罗流动模型则将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的预期收入视为人口流动

的决定因素,推拉模型及卡林顿动态迁移模型等也从不同视角解读了人口流动问题。但在我国,人口规模流动除受经济学规律影响外,一个更为显著的因素是户籍制度。正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人户分离不仅可反映人口流动的规模,还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约4.93亿人,相比2010年增加了2.3亿人,增长88.52%。人户分离问题是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一大挑战,在特大型城市中尤为突出。人户分离人口增长较快,直接影响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人户分离造成社会成员身份标签化,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人户分离还是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的影响因素,加速传统社会解构,给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行业带来重大挑战。^[5]

在全球大变革背景下,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现代化转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区域整合与公共治理》以公共治理为主题,从区域层面的公共治理着手,探讨了如何推进公共治理现代化,介绍了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以及西方国家的经验,讨论了区域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区域公共治理的价值再塑、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区域公共危机与风险协同管理以及区域数字化公共治理。^[6]

(二) 社区治理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孟祥林认为,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政社合作”的方

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7]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的冲突趋向复杂化，这给社区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孟祥林认为，社区冲突是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而在公共空间使用权的博弈中形成的，因此解决冲突的过程就是权衡冲突各方利益的过程。解决冲突需要厘清公共空间使用权边界、受益权边界，通过帕累托改进提升各自效用水平，同时也需要社区管理者充分了解冲突各方的价格参考点，提升解决冲突的效果。要从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分割、使用权限制、使用权保障、使用权支撑等方面的制度缺陷着手考虑对策，探索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制度演进轨迹。因此，解决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冲突，需要合理分割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完善社区公共空间使用规范，厘清业主付费与受益的关系。^[8]

（三）乡村社会治理

近十几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就业和收入方式逐渐多元化，村庄边界逐渐开放，村民的异质性大大增强，村庄共同体意识逐渐淡化，乡村社会结构及乡村治理模式也随之而发生改变。《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一书以华北的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在工业化进程中，该村由村民生计方式、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揭示了基层自治组织与村庄精英良性互动，引导村民致富，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实现村庄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内在逻辑和嬗变过程。^[9]

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广阔实践场域。孟亚男、程达回顾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构，并与当前农村发展形成观照，讨论其与当代农村社会工作理论和经验的适切性。研究发现，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可以从平等友好接纳的价值、深化本土化理论方法的原则、发展性手段促赋权增能的模式、全域整合的系统性工作路径、同体帮扶与组织培育的趋势五方面与现代社会工作展开对话。提出构建“一主两维三层四式五面”的长效发展思路整合社区资源，倡导社会政策，扶助特殊群体，激发内

在力量，打造农村公共性和共同体，为晏阳初农村工作思想的经验传承提供有益的框架思考和当代社会工作介入路径。^[10]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是社会治理标准化创新的重要内容，其内涵是要在总结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模式的基础上，将标准化的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在形成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结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进行划分，围绕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体系、目标和手段制定共同规则的活动，以实现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向平萍、贾宝奎认为，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不断深入和发展，必然会提出标准化的要求，从现实来看标准化已经成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标准，但是仍存在标准体系不完善、有效性不足、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仍待增强、标准化专业人才相对缺乏等问题，需要从体系、标准、人才这三个方面予以解决。^[11]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陈宝玲等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Z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延延伸的进程中，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结果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12]

二、人口社会学

（一）人口理论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国际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党中央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王金营认为，构建和形成新发展格局中需要更加综合的视角考虑中国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人

口空间分布等因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和独特优势。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巨大市场效应,有利于促进和带来社会分工精细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而充足的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和人才储备;巨大的人口规模也为技术创新和进步提供人力资本支撑以及市场需求条件;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广袤的空间回旋优势、利用区域间发展差异特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梯次转移,保持产业体系的完整和协调发展,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禀赋的配置。即便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只要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巨大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等环节的联通枢纽作用,必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而保障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13]

王金营等出版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一书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关系、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关系等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和拓展。对于 OECD 部分国家和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开展了深入的实证检验和规律总结。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体系进行了系统预测和模拟,给出了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议。《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均有较强的创新性,丰富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提出了可供决策的政策建议。^[14]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应对劳动力减少及老龄化带来影响的重要途径。在未来人口负增长的情势下,人口的区域性集聚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人口集聚是否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前提是什么?王金营、王晓伟利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 75 个城市 2008—2017 年短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检验区域城市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不同匹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集聚总是滞后于经济集聚,当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次序错位,经济集聚优先时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匹配状态,而劳动生产率高低有别。人口空间集聚高于或持平于经济空间集聚的匹配使得劳动生产率较低;经济

空间集聚优先于人口空间集聚,人口集聚跟进追赶,则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若经济空间集聚处于稳定状态而人口空间集聚离心力强化时,劳动生产率将处于徘徊状态;当高经济空间集聚与高人力资本集聚和低人口空间集聚相匹配时,劳动生产率高位运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化理想状态。^[15]

(二) 生育与生育政策

我国于 2016 年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后,当年生育数量达到 1786 万人,不仅比 2015 年增加 131 万人,而且成为进入新世纪后的峰值。但之后的三年却持续减少,2019 年出生人数减至 1465 万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仅高于 1960 年和 1961 年两个特殊年份的最低值。对于生育政策调整放宽后生育数量不增反减的原因,学者们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重要结论,如经济压力大、生育与工作冲突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生育人群减少等。吕红平认为,生育成本是指把孩子从孕育、出生到培育成为一个合格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费用的总和。生育成本成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原因在于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增加、机会成本的增加、孩子效益与成本关系的变化。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家庭生育成本增加和子女收益减少所导致的生育意愿下降、生育动力不足的问题,就必须破解家庭生育成本上升的难题。^[16]

目前,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贾志科等利用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选取其中 54719 名已婚青年夫妇,对“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和“双非”夫妇的生育意愿及其行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三类青年夫妇的理想生育数量与打算生育数量在结构上较为相似,“双非”夫妇的多孩生育意愿更强;性别偏好均以“无偏好”为主,但“双非”夫妇的“女孩偏好”较弱;近六成“双非”夫妇已生过或现有 2 个及以上孩子,实际生过和现有孩子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夫妇;三类夫妇的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是 1.89~1.99 个,而实际生过和现有子女数是 1.46~1.47 个,“双非”夫妇的意愿均显著高于“双独”夫妇,均明显高于“单独”夫妇;“1 男 1 女”仍然是三类夫妇最普遍的理想数量和性别组合偏好,但仅有两成夫妇实现了愿望,“双

非”夫妇的生育意愿与“单独”夫妇接近，但在意愿实现的比例上均高于其他两类夫妇；在生育意愿与现实生育行为的差距上，与其他两类夫妇相比，“双非”夫妇的理想和打算大于现实的比例最低，理想和打算等于现实的比例最高，生育意愿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仍有三到四成青年夫妇的生育打算高于现实生育行为，其生育意愿存在进一步释放的空间。^[17]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关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是人口学领域比较重要的话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理论对其进行了解释。杨胜利、姚健基于CG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s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18]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令人关注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包括1个总体情况介绍和8个分公报）。基于对“七普”主要数据的初步分析，吕红平、耿之璇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数据采集方式电子化提高了效率，降低了误差。二是人口总量增速趋缓，近期即将转入负增长。三是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分布不平衡问题凸显。四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五是家庭户均人数减少，核心化趋势更加显著。六是总和生育率降至极低水平，生育预期不容乐观。七是人口受教育年限持续增加，文化程度构成显著改善。^[19]

人口的性别比失衡不仅会引起风险人群的扩大，更是与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管理等问题相互交织。很多研究认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关注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十分必要。王朋岗等对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30~44岁、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低、工作单位为非国有企业与从事个体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租房的妇女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比例更高。性别人流指数的年代变化与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息息相关，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加强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性别选择性人流总体呈现减弱的趋势，但将2017年生育状况调查数据与2001年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农村已有两个女孩的家庭中，妇女的性别人流指数反而出现了上升情况，而城市已有一个女儿的家庭中，妇女的性别人流指数和生育子女的出生性别比都出现升高状况，可见“男孩偏好”依旧存在。^[20]

（三）流动人口研究

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研究既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密切相关，也是现实中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一种回应。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现象、现状描述，逐步向实证分析和应对策略的转变。人口学中关于流动人口失业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关注流动人口失业规模统计与群体特征。第二类利用微观数据探讨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因素。第三类从宏观层面探讨流动人口失业的深层次原因。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呈现何种变动趋势？流动人口失业发生风险的形成机理与风险变动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杨胜利、姚健采用2014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年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2014年高出26%。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流入地地域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Oaxaca分解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63.67%可以由系数差异来解释，36.33%可以由特征差异来解释。受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失业保险、流动原因、人际关系等特征的变动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而耕地、宅基地、流动模式、暂住证等特征的变动增加了流动人口失业风险。^[21]

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流动人口呈现出规模庞大、空间宏大局面，促进了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在我国不同区域人口流动却存在着很大差异。王金营、李青利用区域人口净迁移率（代表人口流动强度）、产业聚集程

度、产业分工程度三个指标,通过筛选建立多模型检验典型产业的聚集和分工程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程度和方向,结果显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聚集对区域人口流入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产业聚集和分工对区域人口流动的影响又存在着差异,不同区域其产业聚集程度和分工程度的差异决定了人口流动强度的差异。区域之间要实现人口合理流动,应充分发挥区域禀赋优势,加大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养,提高人口素质。^[22]

就业是民生的重中之重。实现高质量就业要切实保障就业的公平性,只有通过公平竞争实现就业,促进就业机会均等化,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公平性,实现各阶层社会地位的流动,增强社会的活力。杨胜利等基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 OLS 回归模型检验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对于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子代教育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子代职业地位的获得显著正相关,家庭政治资本与子代的职业地位并无显著统计相关。具体而言,家庭的经济收入越高、父代的教育程度越高以及父代的职业地位越高,则子代获得的职业地位就越高,但这一结果存在队列差异,主要体现在 1993—2002 工作队列中。与其他工作队列相比,家庭社会资本与 1993—2002 队列的子代职业地位不存在显著统计相关。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教育在家庭资本和职业地位之间发生了完全的中介作用。作者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就业过程中的“唯能力论”以及加强对子女教育投入等三个维度提出了建议。^[23]

(四) 家庭婚姻研究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贾志科等通过梳理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

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提出应从五个方面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研究:(1) 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2) 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3) 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4) 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5) 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24]

“一工一农”家庭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夫妻双方中一方从事传统农业,另一方从事非农业以领取工资或补贴的家庭。陈静、王泥力在“国家—集体—家庭”分析思路下,围绕“一工一农”家庭成员自我观念的变化阐述家国精神内向而务实的特征和发展脉络,以“一工一农”家庭的生活和发展轨迹再现时代变迁过程中社会制度与家庭结构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从家庭劳动到社会主义建设,“一工一农”家庭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大我”与“小我”间的冲突与和谐。作为深受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熏陶的社会代,“一工一农”家庭以劳动者多元化身份把家庭的艰难经历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体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担当,以及对集体的认同和归属,见证时代发展贡献者家国精神的接续。^[25]

近年来,我国北方农村以及南方经济欠发达地区,“婚姻挤压”与“代际剥削”现象严重,甚至出现“因婚致贫”与“因婚返贫”现象。彩礼在一些农村地区成为家庭的最大开支项。目前,学术界对农村彩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框架下,对高额彩礼的形成原因与运作机制进行阐释。然而,中国农村彩礼性质存在显著区域性差异,已有研究缺少低额彩礼习俗维系机制的视角。彩礼的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婚姻圈位置维度是一体的,相互作用,形成不同彩

礼模式的运作机制。王敬基于广州市 F 村的驻村调查,从就地城镇化背景下的市场福利、团结型宗族社会结构下的保护机制以及婚姻圈流动状态下的高地位优势等维度,为低额彩礼维系机制提供新的解释路径。^[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后推行“租售并举,以租为主”的住房政策,禁止房屋买卖。贾志科、高幸利用 2019 年 5 月在雄安新区下辖三县针对 249 名农村青年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选择其中 15 名未婚青年及其家庭进行深入追踪访谈,对其婚姻住房观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传统婚房观与住房新政相抵触,租房结婚成为农村青年的无奈选择;当地户籍身份对未婚青年婚房观的影响有增强倾向,潜在效益不容忽视;农村青年面临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住房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大龄未婚男青年陷入婚恋窘境,择偶形势不容乐观。导致雄安新区农村青年陷入窘境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面子、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建议从深化政策观念、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树立正确婚姻住房观念、强化教育培训等多方面入手,缓解雄安新区农村青年婚姻住房窘境。^[27]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康书生、袁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 Probit 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为了提高家庭金融服务对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的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28]

三、老年社会学

(一) 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效率直接关系到老年群体所能接受到的福利待遇水平。尹成远、仲伟东基于 2013—2019 年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应用 DEA-Malmquist 和 Tobit 模型

对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估与分析。结果显示,2019 年有 21 个省域未达到 DEA 有效,东部地区整体效率值最为领先,地区之间有着显著差异。近五年来,我国整体城乡居保效率有些下滑,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制约,同时城镇化水平对城乡居保制度运行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实施差异化的效率提升策略,进一步提高制度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完善运营监管制度等政策建议。^[29]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近十几年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困境。贾志科等通过对数十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总结和归纳了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与养老金并轨、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农村养老保险困境及对策研究、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及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等方面。分析了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包括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家庭“捆绑”与“松绑”机制的深入研究、对养老金并轨成本的精算研究、对消除男女两性养老金性别差异的政策措施研究、对社会养老保险再分配效应作用的深入研究。^[30]

赵立新、高华时研究了日本社会保障法的发展与完善过程。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20 世纪 60—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对之前的社会保障法进行了补充修改,进一步完善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制度。战后日本社会保障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基本满足了日本各阶层国民的现实需要,但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老龄化的加剧,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社会保障法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也面临众多矛盾与无法回避的挑战。随着老龄少子化的出现,日本效仿德国颁布了《护理保险法》,使其成为继德国之后拥有五种社会保险立法的国家。但同时引发的社会保障费用增长使国家财政面临巨大压力,为促进财政再建,20 世纪后期开始进行调整改革。进入 21 世纪的

第一个十年,日本人口增长在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减少。与此相对应,日本的社会保障法体系也面临着更大的改革压力。^[31]

(二) 养老服务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趋势下,公共养老金与健康保险金需求规模持续增加,亟须推动公共养老储备基金入市。由于我国社保基金成立时间不长,公共养老储备基金管理运作存在监管不力、投资渠道狭窄、资产配置失衡等问题。而国际先进的公共养老储备基金管理模式具备完善的政策法规、层级化的管理结构、全面化的增值方式和动态化的溢价策略,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朴宪、苏锋提出应积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探索创新投资路径、创新基金运作模式、健全监管体制等,最终实现公共养老储备基金的资本化经营,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保障和支撑。^[32]

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并存,且失能、失智、认知症老人不断增加。刘晓静、罗椅民认为,加快适老辅具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康养需求、实现失能、失智、认知症老年人生活重建的重要举措。适老辅具,首先要适应中国老年人的居养环境,其次要适合家具环境,再次要符合中国人的人体工程学要求。适老辅助技术在老年人康养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可以补偿康养护理人员的护理能力,改善失能、失智、认知症老年人的功能障碍,代偿环境功能障碍。适老辅具技术适配评估主要从考虑因素、程序规定、内容方面、功能评估、适老环境等维度考量。发展中国适老辅具技术,需要纳入养老服务政策议程,借助护理保险制度,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营造适老环境。^[33]

失能老年人因其生活能力受限,主要通过亲友向外扩展社会网络。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部分家庭照顾者对失能老年人关注不够,致使其社区社会网络范围较小且扩展速度慢。社区社会规范往往强调或者导向对普通社区成员的关注,忽略失能老年人的诉求。过多的家庭依赖制约了失能老年人向外寻求物质帮助和精神寄托的动力,社区发展也因重视社区优质的一面而弱化了对失能老年人社会参与、休戚与共、守望互助的责任,从而影响了失能老年人获取社区社会信

任资本。社区社会资本是促进失能老年人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刘凤、吴晨旭分析失能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弱化对其社会融入的制约,提出增进失能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議,可以为失能老年人融入社会提供有益帮助。^[34]

扩大养老服务消费的核心在于将老年群体潜在的服务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服务利用行为。王晓波、耿永志从嵌入性视角研究发现,是否利用养老服务是一个嵌入家庭关系之中的决策问题,老年人和对其负有经济支持及照料责任的家庭成员可能在偏好、观念和费用分担等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引发协商乃至妥协,并最终对服务消费形成不利影响。激发养老服务消费潜力的举措应当更加关注老年人所在的家庭,使其了解养老服务,认可养老服务,并且愿意使用养老服务。^[35]

当前,老年健康服务供给需求不平衡属于结构性失衡,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和服务项目安排时,未能充分考虑社会经济环境、老年人疾病、老年人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变化,健康服务不能转化为有效供给。胡耀岭、王广州认为,有必要以老年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建立自下而上的科学决策和动态调节机制,促使老年健康服务供给需求从一个平衡状态进阶到下一个新的平衡状态,有效提升老年健康服务效果,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36]

心理健康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健康中国”规划纲要着重关注的部分。失独人群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关乎健康老龄化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任杰慧基于广州、成都和南京三地的田野调查,运用“倡导、赋权、协调”三个基本策略探讨失独老人心理健康促进的实践和方法。研究发现,失独人群的心理健康促进具有三个特点,即倡导的特殊性、赋能的多样性和协调的融合性。根据这些特点采取的支持与干预措施有利于促进失独老人心理健康,同时对其他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具有借鉴意义。^[37]

在我国养老服务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也存在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困境。二是

机构养老服务模式与中国传统养老理念契合度不高。三是社区养老服务功能不健全。侯建华分析了新时代养老服务呈现出的四个新趋势。一是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催生养老服务新业态。养老服务供给除了个人与家庭以外,是政府独揽的,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向“社会化”“市场化”转型。二是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模式出现融合发展新态势。三是健康养老成为新时代老年人新追求。四是智慧养老成为信息化社会养老新趋势。^[38]

四、农村社会学

(一) 乡村风险研究

我国乡村的现代转向中存在着复杂、不确定的系统风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下一阶段乡村工作的总抓手,其中一个重要焦点就是乡村所存在或潜在的风险问题。在乡村系统风险应对中,组织抗逆力有着较强的适切性,具备全过程、全方位、网络化、协同化的整体性治理优势。当前,我国乡村系统风险治理面临着生态系统脆弱、生计系统萎缩、社会文化失范、互助功能式微、资源条件匮乏等问题,必须补齐现代乡村风险治理的短板,提升风险治理的能力,完善风险治理体系。盖宏伟提出,我国乡村亟须建构一个更具全面性、连贯性、协同性和整体性的风险治理框架,提升乡村组织抗逆力,即加强乡村基层组织抗逆文化建设,增强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的抵抗能力、复原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更好地治理乡村系统风险。^[39]

(二) 乡村公共文化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孟祥林认为,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

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40]

乡村伦理作为乡村文化的灵魂,在坚守固有属性的同时,也随着乡村变迁在不断转型。李冰认为,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乡村的社会关系。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乡村社会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乡村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只要有社会变迁,伦理转型就会发生。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只要称其为乡村,乡村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种种变化。解释与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本质特征。^[41]

留住乡村文化记忆才能发展乡村文化,物理空间是乡村文化记忆的基本支撑,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能够进一步强化物理空间的张力。孟祥林认为,公平的对话语境是拓展有效制度空间的基础,这样才能保证制度空间建构过程中村民在场,在乡村场域内实现生活场与文化场套叠,提升文化主体在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和刻写空间内的活跃程度,形成“政府+村民+社会”的多元主体治理构架。但是在乡村文化记忆空间拓展过程中,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多元虚拟空间正在被挤压,在探索乡村文化记忆的多举措中,需要在保存社会网络、守住空间线索、形成文化意象、实现平等对话和壮大文化主体等方面做文章,才能构建起乡村文化记忆的多向度表达方式,留住乡村文化记忆、系住乡愁和拓展乡村文化记忆空间。^[42]

(三) 贫困研究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中国进入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既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延伸,又是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是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工作重点。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吴宇、许元博提出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资源集合—经济体激活”两步发展动态模式,论述其作用机理,并提出实施该模式的可行路径。^[43]

消灭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议题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亟须以我国城乡相对贫困为研究对象,对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进行充分分析。孙娇、赵建辉在借鉴他国相对贫困标准经验的基础上,梳理解决相对贫困的治理思路,提出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标准,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城乡一体化格局、激发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形成相对贫困的常态化治理等。^[44]

五、环境社会学

(一) 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

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有力抓手和重要保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措施和有效途径。如何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既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实践创新。田翠琴撰写的《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以河北省为例》^[45]一书,从经济变迁的维度研究环境治理转型,探讨经济变迁对环境治理转型的影响机制,探讨环境治理转型的历史过程、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对构建环境治理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价值。经济变迁是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维度。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需要以经济变迁为重要维度,综合分析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关系、相互影响、互构机制等问题。作者以中国经济结构变迁、工业化、城镇化及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为背景,通过对影响环境治理转型的主要因素,如产业结构、工业化、城镇化等进行深入分析,探寻影响环境治理转型的主要因素,探寻经济变迁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和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进而探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环境治理的路径与策略的变化,探讨环境治理的转型趋势与发展方向。经济变迁是影响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作者以经济变迁为视角,分析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互动机制,探寻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的相互影响,阐述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环境治理历程与经济发展历程的耦合性、不同发展模式与资源消耗的关系、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模

式的转型,直接影响到环境治理的转型,而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则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污染排放及资源消耗。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也同步加剧和突出。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转型是我国环境风险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

(二) 乡村生活垃圾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生活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农户与地方政府决策行为视角探究农村突出的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对实现农村环境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宋焕、王瑞梅基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现状,利用微分博弈的方法,构建了基于连续时间的农户与地方政府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微分博弈模型,首先获取了农户和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其次探讨了不同参数变化对最优策略的影响,最后利用 Matlab 对模型进行了仿真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环保监管意识和环保监管能力及对违规排放生活垃圾的惩罚力度影响农村生活垃圾的污染量,第三方力量的环保监管意识和环保监管能力影响地方政府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的努力程度。^[46]

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从源头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根本方式,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宜居的迫切需要。张春玲、范默苒从提升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能力、影响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因素入手,侧重于影响因素关系构建及对策研究。运用网络分析法,判断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从而推动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有效。现阶段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个人层面的文化及观念因素,组织层面的制度、参与及资金因素,实施层面的创新及人才因素。结果表明,多元共治的模式是垃圾分类治理的根基,个人层面要高度重视乡村女性主导地位,组织层面要建立具有乡村特色的垃圾分类体系,实施层面要在新基建这一背景下发挥技术创新及新乡贤的引进。^[47]

(三) 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能源消耗与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不

可再生能源消耗又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破坏抑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环境治理、能源开发、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科技创新。李国柱、黄琪骏根据 2006—2017 年北京、天津及河北的面板数据,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能源、经济、环境和科技四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大体上呈上升态势,各子系统发展势头良好;京津冀四元系统耦合度较好,大部分达到 0.8 以上;京津冀耦合协调度由轻微不协调调整到温和协调。为了促进京津冀能源—经济—环境—科技系统协调发展,建议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强化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加强科技创新,减少污染排放。^[48]

为实现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掌握城镇化、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障碍性因子。赵安周等在综合考虑三大系统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应用耦合协调度和灰色 Verhulst 模型构建了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旅游业—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该城市群 2000—2017 年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和未来 10 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并对三者的障碍性因子进行了诊断。结果表明,(1) 2000—2017 年京津冀城市化综合水平子系统和旅游产业子系统均呈现增加的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呈现减少的趋势;(2) 2000—2017 年期间京津冀城市群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其耦合的类型可划分为生态环境超前和城市化超前型;(3)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 10 年(2018—2027 年)三者的耦合协调度保持小幅度持续上升的趋势;(4) 从各一级指标对三大系统的障碍度来看,人口城市化水平、旅游收入和资源要素条件对城市化、旅游业和生态环境三大系统的影响最大。^[49]

为判断我国城市低碳、环保与发展的协同状况,郑林昌等利用构建的城市低碳环保发展评价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我国 285 个地级市以上城市的低碳环保发展指数和指数间协调性进行评估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低碳指数、环保指数与发展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发展指数不仅评价得分高于低碳指数和环保指数,增速总体也明显

快于两指数;低碳指数、环保指数与发展指数之间协调性相对较好,三大指数之间协调性不断提高,且总体具有城市规模越大指数协调性越好的特点。但城市低碳生产指数与低碳消费指数、环境污染指数与环境管理指数的协调性相对较差,不过近期已有所改善。^[50]

(四) 海洋生态研究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其重要性日益显著。杨云飞、屈桂菲基于 DEA 模型测算我国沿海省(市、区) 2008—2017 年的海洋生态环境效率,探究其时空演化趋势及区域差异,结合 Tobit 回归模型剖析海洋生态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整体效率不高,且呈现波动演化趋势;海洋生态环境效率空间重心格局整体呈现“南移”演化趋势,由“南、北、中相对均衡”态势演化为“南移且以南部重心居多”的空间格局;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效率区域间差异显著,效率差异可分为上升型、下降型、平稳型、波动型;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科技投入对海洋生态环境效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海洋生态环境效率产生负向影响,港口活跃度、陆域工业规模对海洋生态环境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51]

(五) 碳排放研究

卢灿、李伟出版的《新常态下中国碳排放峰值预测及减排对策研究》一书,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背景出发,运用全新的视野、思路、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揭示和探寻了在新常态下实现中国碳排放峰值的内在原理,奠定了碳排放峰值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了将碳峰值的研究更贴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作者将新常态纳入碳峰值框架体系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碳峰值研究理论体系。为中国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从强度控制转变到总量控制提供了决策依据;为未来中国将更多采取经济手段、市场机制加速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为确立成熟的碳配额制度创造条件,进而建立和规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执行减排路线图的具体时间表提供基础参考。^[52]

为了分析各行业需求变动对 CO₂ 排放的影响,张伟、王韶华考虑产业关联状况,基于里昂惕夫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建立 CO₂ 排放量对投资

结构、消费结构的弹性分析模型,测算了中国 31 个行业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份额变动对 CO₂ 排放的影响,并从中筛选出了投资结构、消费结构调整的关键部门。研究表明,其他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食品和烟草业是消费结构调整的关键部门,增加这三个部分消费需求占比,同时减少煤炭采选产品的消费需求占比对碳减排具有最大的作用。其他行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电业是投资结构调整的关键部门,其中减少对其他行业的投资份额,与此同时不管增加哪一产业的投资份额均有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53]

六、城市社会学

(一) 城市转型研究

城市低碳转型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主题,是一项涉及城市发展规划、能源结构、空间秩序、消费方式等因素在内的多元化综合性转型。田翠琴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城市低碳转型的途径:(1) 创新城市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城市低碳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对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2) 重构城市低碳转型的能源体系。城市低碳转型的核心与发展主线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3) 重塑城市低碳转型的空间秩序。国土是低碳城市建设的空间载体。要因地制宜,构建规范有序、高效畅通、生态宜居的低碳化城市空间秩序。(4) 构建城市低碳转型的消费模式。消费模式低碳化转型,是城市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力和社会支撑力量。控制和减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必将是城市低碳转型和减排温室气体的重点领域。^[54]

保存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根脉、打造现代城市人文之美,是提升城市建设品质的重要途径。张丽认为,城市记忆更能体现人文之美。人文之美是城市记忆的核心与目标,体现了城市记忆的文化内敛性。保护和传承好城市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对留住城市记忆的血脉、推动城市文化持久繁荣至关重要。人文地标作为能够体现城市记忆、代表城市人文积淀的标志性建筑,是城市记忆的文化名片,应积极打造代表城市风格的人文地标。新时代的人文精神是一座城市坚定走向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标志。应塑造以新思想新理念为内核的新时代人文精神,发挥友好善治的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包容性和整合力,积极推动人文精神与城市发展相合相生。^[55]

(二) 城市群研究

王金营、贾娜以中美典型城市群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 和世界人口数据库美国微观数据 (IPUMS),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方法,引入不同城市群劳动力收入溢价偏离程度,定量分析不同空间岗位优势和劣势的收入效应对劳动力的吸引能力,并通过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与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对比,以期为中国未来城市群发展提供借鉴。结果显示:(1) 中国三大城市群中约 50% 的样本呈现为收入偏离的优化,比其他区域在劳动力吸引方面具有优势。波士华城市群通过高品质发展拥有更强的吸引聚集劳动力的能力。(2) 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劳动力收入受单边向下偏离幅度较小、变动趋势平稳、收入吸引效应稳定且强劲;中国三大城市群劳动力收入下偏扭曲较大,而且在劳动力吸引上表现不够稳定。(3) 劳动者到大城市群就业,能够避免在竞争市场中岗位搜寻的劣势。波士华城市群的经验表明,世界级城市群更高的国际分工定位与内部合理空间分工可规避过度竞争等带来的集聚劣势,以更高品质、更丰富的岗位选择为劳动力提供就业精准对接。因此,中国城市群应向这一方向发展。^[56]

(三) 城乡关系研究

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发展与平衡的关系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叶璐、王济民从背景、时代环境、经济发展出发,还原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形成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进行总结。70 多年来,中国城乡关系历经“对立”→“趋好”→“统筹”→“融合”四大阶段。城乡关系演变贯穿其中的发展规律如下:宏观环境是直接影响因素;中央政府基于宏观环境变化选择相应的国家战略目标,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在目标的指引下逐步建立完善了以产业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公共资源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体系,推动城乡关系战略实施,进而推动城乡关系变化。顶层设计以及系统实践促使中国城乡关系经历深刻变革并得到极大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破除,城乡

差距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出现新的趋势和特征。新时期解决城乡关系问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要素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增收等方面有所作为。^[57]

七、消费社会学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消费将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正从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推动型,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来源。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同时扩大消费也面临一些短板。许永兵认为,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需要强化需求侧管理,补齐消费需求的短板,打通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堵点。一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二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三是增加社保投入,改善居民预期;四是坚持“房住不炒”政策定位,降低居民杠杆率;五是增加有效供给,助推消费升级;六是改善消费环境,激活新的消费热点。^[58]

移动购物行为及其执行意向是消费者、场景、环境、技术与服务等多项因素系统驱动的结果,只有整合这些复杂因素,探索消费者情感与态度变化、行为驱动的关键机制,进而才能揭示移动消费行为规律。《移动购物行为及其执行意向机制研究》一书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揭示了移动购物行为执行意向的作用机理、关联演化机制,这有利于建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移动购物情景感知、价值共创、个性化推荐与服务的共生型商业综合体,对数字化场景变革具有重要的社会与理论意义。^[59]

在现实网上购物中,很多网上商家通过为顾客提供免费赠品来让顾客欣喜,从而达到增加产品销量和维系顾客的目的。为了解免费赠品促销本质,张跃先等以利益一致性框架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影响顾客欣喜的作用模型,刻画了感知不确定性和顾客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不送免费赠品相比,免费赠品促销能够显著增强顾客欣喜;享乐型产品提供享乐型赠品比实用型赠品更能增强顾客欣喜,实用型产品提供享乐型赠品和实用型赠品在驱动顾客欣喜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且顾客类型和感知不确定性显著调节享乐型产品—赠品组合利益与顾客欣喜之间的关系。^[60]

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青年的消费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精致”成为青年消费的新指向,借贷成为部分青年塑造维持“精致”人设的生活常态。林江、李梦晗以青年超前消费现象为视角,从青年渴望拥有“精致”形象的动机与呈现“精致”人设的过程入手,通过网络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辅以商业报告数据,解释说明在追求“精致”人设的过程中青年群体超前消费的动机与行为的变化。通过分析青年群体如何因渴望“精致”形象而超前消费的动机,探讨青年为呈现“精致”人设而进行超前消费的过程,进而为青年超前消费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对策建议。^[61]

(田翠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刘仕宇,金福子.SCP 范式下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J].生态经济,2021(1).
- [2]孟祥林.政府“在场”抑或“退出”:第三部门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3]任嵘嵘,齐佳丽,苏露阳.敏捷治理:一个新的管理变革——研究述评与展望[J].技术经济,2021(8).
- [4]张彦,宋争辉,李俊,董金秋.中国组织工作环境研究: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5]王凤丽,赵莉华.人户分离影响城市社会治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5-19.
- [6]杨光.区域整合与公共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7]孟祥林.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8]孟祥林.社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博弈、受益权边界与居民冲突治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9]吕洁.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10]孟亚男,程达.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对乡村振兴的理论启迪——基于社会工作视角[J].社会工作,2021(1).
- [11]向平萍,贾宝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研究[J].中国产经,2021(12).
- [12]陈宝玲,黄英,国万忠.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
- [13]王金营.中国人口回旋空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势和作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14]王金营等.人口与经济发展方式[M].北京:科学出版

- 社,2021.
- [15]王金营,王晓伟.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匹配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21(6).
- [16]吕红平.降低生育成本:推进“全面两孩”政策落地的重要条件[J].人口与健康,2021(3).
- [17]贾志科,罗志华,茅彦婷.全面两孩政策下“双非”夫妇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分析[J].人口学刊,2021(4).
- [18]杨胜利,姚健.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19]吕红平,耿之璇.“七普”公报主要数据引发的几点思考[J].人口与健康,2021(6).
- [20]王朋岗,汪滕,杨胜慧.中国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新趋势[J].人口与社会,2021(1).
- [21]杨胜利,姚健.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J].南方人口,2021(1).
- [22]王金营,李青.区域产业聚集和分工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J].山东工会论坛,2021(4).
- [23]杨胜利,姚健,苏寒云.家庭资本与子代职业地位获得:教育的中介效应分析[J].西北人口,2021(1).
- [24]贾志科,罗志华,张欣杰.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J].西北人口,2021(5).
- [25]陈静,王泥力.时代变迁中劳动者多元化身份与家国精神的接续——以“一工一农”家庭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2).
- [26]王敬.低额彩礼习俗维系机制的多维度分析——基于广州市F村的驻村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21(4).
- [27]贾志科,高幸.未婚青年的婚姻住房状况与分析——基于雄安新区“租售并举”新政的调查研究[J].晋阳学刊,2021(3).
- [28]康书生,袁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29]尹成远,仲伟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省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现代财经,2021(8).
- [30]贾志科,高天跃,张欣杰,杨祎茜.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述评与趋势展望[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31]赵立新,高华时.日本社会保障法:发展、完善与改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32]朴宪,苏锋.公共养老储备基金管理运作: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策略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2021(6).
- [33]刘晓静,罗椅民.深度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适老辅具技术:应用、适配评估与发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1(2).
- [34]刘凤,吴晨旭.运用社区社会资本促进失能老年人社会融入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21(6).
- [35]王晓波,耿永志.嵌入性视角下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影响因素研究[J].兰州学刊,2021(4).
- [36]胡耀岭,王广州.以需求为导向的中国老年健康服务模式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37]任杰慧.失独老人心理健康促进研究——基于广州、成都和南京三地的田野调查[J].社会保障研究,2021(1).
- [38]侯建华.把握养老服务发展新趋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18.
- [39]盖宏伟.现代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策略:提升组织抗逆力[J].学术交流,2021(7).
- [40]孟祥林.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41]李冰.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J].齐鲁学刊,2021(1).
- [42]孟祥林.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发展的向度、瓶颈与对策[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
- [43]吴宇,许元博.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的动态模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44]孙娇,赵建辉.城乡相对贫困的内涵特征及治理思路探究[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45]田翠琴,赵乃诗.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以河北省为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 [46]宋焕,王瑞梅.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博弈研究[J].生态经济,2021(6).
- [47]张春玲,范默苒.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影响因素及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48]李国柱,黄琪骏.京津冀能源—经济—环境—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1(7).
- [49]赵安周,王冬利,王金杰,胡小枫.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旅游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因子诊断[J].水土保持研究,2021(4).
- [50]郑林昌,李泽阳,付加锋.中国不同类型城市低碳、环保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J].财经理论研究,2021(1).
- [51]杨云飞,屈桂菲.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环境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52]卢灿,李伟.新常态下中国碳排放峰值预测及减排对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53]张伟,王韶华.中国CO₂排放对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弹性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3).
- [54]田翠琴.探索城市低碳转型的新途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9-22.
- [55]张丽.彰显城市记忆根脉的人文之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9-22.
- [56]王金营,贾娜.大城市群收入溢价的劳动力吸引效应——基于中国三大城市群与美国波士华城市群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1(6).
- [57]叶璐,王济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与未来展望[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58]许永兵.扩大消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2).

[59] 王林等.移动购物行为及其执行意向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60] 张跃先,吴美芝,马钦海.免费赠品会让顾客欣喜吗?利

益一致性框架下的观点[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61] 林江,李梦晗.“精致”人设的自我呈现:青年超前消费问题探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3).

教育 学

教育学研究

薛滩

一、2021年教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2021年省域内教育学研究成果总体状况为:专著或编著数量可观,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在许多方面有所涉猎;调查研究报告主要从河北全域或具体市、县出发,针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相当一部分研究报告得到领导的肯定与批示,对河北全域或市、县等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建设提供了较好的佐证与参考;学术论文数量总体可观,涉及面比较广泛,针对性较强。总之,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展示了研究者的水平与实力,对于提升河北教育质量、促进河北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或参考价值。对一线广大教育工作者也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与助力作用。比较明显的表现为——

第一,“红色教育”,尤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发展研究成果突出。比如薛国凤的《“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儿童观》、刘奉越等的《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教育发展历程、成就与展望》、宁永红等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作用、基本经验及展望》、柳靖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高考制度的发展观、价值观、改革观探析》等。

第二,针对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及时,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李阳的《中外合作办学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思考》、白然等的《后疫情时代家校协同的变革路径探析——基于“停课不停学”期间144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徐莉等的《两个世界的对垒:中学生手机依赖学校管理难题的叙事探

究》、赵宝柱等的《论省域“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逻辑主线》等。

第三,研究内容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比如曹静等的《3~6岁幼儿对文化的传承现状分析研究》、李姝雯等的《儿童书面言语的因果表达及逻辑思维特征研究》、于川等的《师范生眼中的“好教师”——基于117份教育叙事的文本分析》、朱文富等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逻辑框架》等。

二、河北教育

近年来,河北省教育布局和教育建设不断迈向新台阶。

马雪玉等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流动儿童社会适应问题进行了研究。^[1]采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对石家庄市1090名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现状进行研究发现,社会适应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总体上女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略高于男生;不同年级的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有显著差异,年级越低,儿童社会适应能力越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流动儿童数量日益增加。儿童作为社会中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环境的变化更容易导致社会适应问题。所以,要从政府政策支持、学校平等尊重、家庭关心爱护和社会共享包容四个层面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进行关注。

许珂等对京津冀中外合作办学现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2]认为全球高等院校创办与发展模式,通过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高等学府共同形成联合性高等教育实施过程已然成为主流之一。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以京津冀为代表的

“首都经济圈”范围内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状况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形成了较大的差异性,与一般高等院校相比较同样体现出了诸多的不足,不同层面依然残存着缺乏细化认识、缺乏教育教学及管理科学性、整体模式未完善等情况。京津冀中外合作办学要树立统一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全球范围内对于优势学科的引入与合作构成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学系统,才能够帮助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不断地创新成长,促进京津冀高等教育院校的国际化水平,从而能够塑造出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全面发展的青年大学生。

王胜本等对新时代高校本科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3]以河北省为例,基于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理论,在分析国内外典型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提出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以学生能力发展为本,打破专业之间的界限,甚至打破高校与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上的界限,构建各学科有机结合、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其实施过程,可为我国地方高校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提供广阔的学科平台,为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付鸿彦等对河北省骨干高校学科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相关性及优化策略进行了研究。^[4]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获取大量学科结构和产业结构数据,以河北省新兴产业结构和省属13所骨干院校的学科结构为研究对象,绘制出河北省学科结构、产业结构比例和走势图,发现河北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且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新兴产业整体仍处于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状态。调整高校学科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布局相适应的建议:高校要增强社会服务意识,提高办学水平;政府要促进高校和产业之间的协调共生;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提高自身能力。

康巍巍等分析了河北省高校外籍教师域外思想传播及对策。^[5]传播途径:通过第一课堂进行传播,具有直接性和持续性;通过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进行传播,具有持久性和广泛性;通过新媒体网络资源进行传播,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应对高校外籍教师域外思想传播的策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强化高校的阵地意识;改进教学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教

学;完善外教管理计划,加强历史人文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河北省高校外籍教师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河北省教育国际化的贡献者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又要守护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让高校外籍教师在尊重中国文化,遵守中国规则的前提下传递本国优秀文化。

三、基础教育

从2021年研究成果来看,基础教育研究更多倾向于问题研究,即针对现实中教育问题进行研究。

李阳对中外合作办学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6]面向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即将进入“普及化”“特色化”发展阶段。认为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先后经历了调整探索发展时期、注重内涵发展时期和深化提升发展时期。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必须不断加强党建工作,牢固坚守中方主导权;必须树立“品牌”意识,实现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以开放促改革;必须坚持“为我所用”,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

薛国凤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儿童观中的“变”与“不变”。^[7]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也是中国儿童发展百年史。儿童的发展与党的革命理念及执政实践紧密相连,不同实际的儿童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理论和文化、政治、经济、科学认知等方面的发展构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儿童观变化的动因。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在对待儿童的看法上保持着基本的核心理念“不变”,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保持一定的张力之“变”,这表现在日益关注儿童的“民生个体”性、注重儿童的全面发展和核心素养,强调儿童在红色基因传承下的“中国人自信”以及注重儿童培养的全社会协调等方面,即重视和强调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并逐步突出儿童本位思想,实现儿童在“个人—社会”关系维度上的平衡。

范明丽对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的方向与制度设计进行研究。^[8]以“政府主导”发展学前教育为切入点,以公共服务型政府理论为基本视角,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下建构理论分

析框架,坚持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个案剖析与规律探讨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对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问题,主要影响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剖析。要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地方改革探索,科学把握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进行宏观、顶层制度设计,有效推进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

曹静等对3~6岁幼儿对文化的传承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9]通过对近15年幼儿文化传承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以往研究涉及的方面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的理论研究;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德育的研究;传统文化渗透于游戏活动、主题活动、一日生活活动的实践研究。从文化内容来看,关于传统节日、传统中医、民间工艺、中华武术、地域文化等方面逐渐与学前教育领域渗透、融合。尽管在重要价值、实施策略、教育资源维度上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仍暴露出某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当前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融入幼儿园中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3~6岁幼儿成长的视角,围绕传统文化启蒙和传承教育,建议在养成生活习惯,增强社会性发展,培养道德品质,增进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等方面进行文化教育功能的拓展与深化研究。

李姝雯等研究了儿童书面言语的因果表达及逻辑思维特征。^[10]以我国1800名小学生的作文为研究样本,使用人工标注、信息自动检索技术和描述统计等方法,分析了儿童的因果表达特征,并以此探究儿童因果逻辑思维的发展特点。发现,儿童的因果复句表达虽然整体上随年级递增呈上升趋势,但各年级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面对不同认知复杂度的因果表达,儿童在书面言语中倾向于说明性因果表达;儿童在因果表达上存在“五年级现象”,即五年级儿童对因果逻辑表达更为敏感。对我国小学生的语言教学的建议:在儿童语言教学上强化儿童视野和经验的拓展;五年级语言教育教学上应着重培养儿童互换或者逆向的逻辑推理能力。

白然等对后疫情时代家校协同的变革路径探析。^[11]疫情期间的居家学习给家校合作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重新审视家校关系的契机。以家庭支持因素对小学生居家学习表现的影响进行分析,根据家长参与的特点,可将家长分为陪伴

型、指导型和旁观型三类;不同家长陪伴的学生居家学习表现差异显著;家庭支持因素对小学生居家学习表现影响显著,家长参与因素的影响最大。剖析新教育场景中家校协同育人的内涵,构建以学生发展为核心、以多元教育共同体提供教育服务为特点的家校协同发展模型,要把制度保障、技术支撑、学校引领和研究推动四个维度作为关键策略。只有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决策者需要共同探讨家校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家校合作中的问题,使多元教育共同体协同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可能。

石磊认为,农村现代“小先生”落实的重要措施是学生、家长的角色经常互换。^[12]对农村小学课堂的教学活动观察发现,多数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意愿以及将知识清楚表述的能力,这些是限制学生学习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家庭教育中家长与学生的互动质量对提升学生学习质量至关重要。着眼于家长、学生教与学的方式转变,可以重温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小先生”制,使学生与家长角色互换,让家长扮演“学生”,让学生担任“教师”,构建现代“小先生”学—教循环的学习模式。这样有助于查找学生学习中的不足,并通过自我价值的塑造和互动行为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参与意愿和互动能力,促进学生高质量的学习参与行为发生,以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张文霄等通过实证方法对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评估与培养进行研究。^[13]认为自主学习能力作为一项关键素养,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鉴于小学生处于独特的发展阶段,对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估与培养也异于中学生与大学生。评估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最适宜采用观察法,并辅之以访谈法。一方面可直接教授小学生自主学习策略,一方面也需要创设有利于自主学习发展的课堂环境,包括给小学生提供实践自主学习的机会和支持性的社会因素。

徐莉等对中学生手机依赖学校管理难题的进行叙事探究。^[14]认为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或“必备品”。与此同时,具有“手机依赖”行为的群体在中学校园里更为突出。再加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促使学校不得不再次面对学生“手机依赖”的管理难题。学校管理难题的根源:第一,管理者与中学生之间的网

络代际差异是引发管理难题的重要因素；第二，管理者传统的认知和管理方式是引发学校管理难题的根本原因；第三，新型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管理存在冲突。解决手机依赖管理难题是学校管理者了解智能化时代学生的特点，转变传统管理理念，树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教育管理理念；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应意识到原有理论及管理方法的陈旧，突破与创新管理模式，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求的智能校园管理模式。

江雪梅认为，应该微调学校组织架构，提升学校管理活力。^[15]学校组织架构是为了实现学校发展目标而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的分工与协作的安排。受学校环境、发展战略、发展周期、规模以及师生员工的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的组织架构，只要在一定时期内能实现学校发展目标，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学校的教学效率与教学效益，就是合适的管理模式。直线式—层级制架构是目前通用的中小学校组织形式。“微调”的核心是理念的变革。微调学校组织架构变“管理”为“服务”。为了获得这种学校管理者、教师与学生活力的整体性的释放与解放，学校组织架构的整体变革是一个好的尝试。

乔莉娟等对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现状进行了探析。^[16]邯郸市部分初中生的农业科普教育现状显示：初中生对于农业科普教育的关注度不高，只有 40.08% 初中生曾关注农业科普教育；75.2% 的初中生遇到有兴趣的形式愿意去参与农业科普教育活动。但是，希望通过农业科普教育树立投身现代农业领域志向的占比最少，仅占 6.94%。对策：明确农业科普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构建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体系；解析农业多功能性，挖掘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的价值；发挥地方高校优势，参与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培养农业科普教育人才；多主体多途径，寓教于乐，促进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的全面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徐莉等研究了新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核心要义与发展方略。^[17]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小学校长必须改变传统的领导模式，形成与其相适应的领导能力，中小学校长需要建构起战略领导和战术领导、管理领导和教学领导、个别领导和集体领导等多元视角耦合统一的管理模式。为此，新时代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发展要向历史靠

近、向理论靠近、向融合方向靠近、与高校学者牵手合作。

四、教师教育

于川等研究了师范生眼中的“好教师”。^[18]对搜集到的某大学 117 名师范生撰写的“我喜爱的好教师”教育叙事，运用 Nvivo12 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系统分类，发现师范生眼中的好教师形象可以从专业角色、专业精神、专业智慧、人格特质和外在外在形象等方面进行描述。师范生眼中的“好教师”的外部形象是“好教师”专业精神、专业智慧、人格特质的反映，同时，“好教师”外在形象的评价又反作用于“好教师”的专业精神、人格特质、专业智慧，从而促进师范生不断完善对于教师专业角色的认知。

辛雅静等对城市公立小学派遣制教师队伍建设进行研究。^[19]目前城市公立小学派遣制教师以青年女教师为主体，担任的职位类型多样；多数具备小学教师应有的师德师风以及任职资格与能力，但师资质量整体低于在编教师师资质量；专业态度良好，但对自身教师专业发展关注不足、专业发展受限。所以，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不仅是优化派遣制教师队伍、助力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消除派遣制教师对工作不稳定的焦虑、想入编而不得的焦虑的关键。

石磊等研究了民办教育机构教育科研现状及问题。^[20]发现民办教育机构的科研状况主要存在成果数量少、整体质量不高、研究领域单一、各机构间科研发展极不均衡等问题，其成因：政策及制度支持不力、缺乏教育中介组织引领、民教机构教师科研意识淡薄、科研能力缺失。推进策略：做好顶层设计，促进民教机构科研发展；加强组织引领，充分发挥教育中介组织作用；引智助力，提升教师科研能力；积极探索，凸显民教特色。

孙西朝研究了“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教育的发展。^[21]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以“互联网+教育”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以及国家系列政策、相关文献分析为背景，发现提升新时代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专业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培养，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互联网+

教育”迅速发展,促进技术大融合,构建教育新生态,对教师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战。所以,新时代教师教育要走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策略,推进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新时代教师教育发展。

五、高等教育

柳靖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高考制度的发展观、价值观、改革观进行了探析。^[22]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推动考试招生制度发生历史性变革。高考制度在科学总结发展历程和深刻把握人才选拔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树立与时俱进的制度发展观;在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进一步树立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的制度价值观;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考制度综合改革的期待和诉求的过程中,进一步树立公平公正的制度改革观。探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考制度的发展观、价值观、改革观,对推动高考综合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切实落实党中央新时期新要求有着重要意义。

龚继峰对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化模式进行了探析。^[23]在立德树人教育背景下,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积极探索人文化的思政教育模式。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化模式必要性,就要对思政教育的问题展开分析,思想政治人文化教育模式的建设策略:基于科学理论指导,转变思政教育观念;建立以人为本的思政教育范式;积极创新思政教育教学方法;创新学生思政教育的服务体系;优化高校学生的实践管理。真正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

王胜本等对新时代高校服务育人的重要价值、优化图景、推进路向进行研究。^[24]服务育人作为高校育人改革的先行领域和重要内容,其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共同构成了高校的三大基本活动。进入新时代,高校服务育人也应融会“五育”并举和“三全育人”理念,在育人目标上,聚焦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均衡发展的时代新人;在育人方式上,精准推进服务育人与教育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互嵌;在育人资源上,统筹整合覆盖高校全系统的多样化资源,从而发挥

“全人培养”和“协同育人”重要价值。

朱文富等对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逻辑框架进行了研究。^[25]作为特定历史场域下彰显职业教育跨界性和时代主题的新命题,产教融合型企业是多重社会资本结构和多元行动者合力塑造的产物。以“起点—价值—行动”的逻辑理路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分析框架,是新时期亟待探究和阐明的课题。以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行考察,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多元经济资本介入、职业教育文化自信是诱发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要素。鉴于参与职业教育自主性嵌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构筑“政校行企”产教融合网络治理空间以及实现教育与产业跨界融通和利益调适的价值理性,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应实现从异域到本土、从功利到公益、从管理到共治、从失衡到精准、从空泛到具体的突破和跨越。

王永颜等对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进行了回顾、反思及建议。^[26]认为家政学自改革开放恢复重建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就研究文献的内容来看,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重在学科理论研究、学科发展历程研究和研究范式研究三个方面。这些研究理论基础薄弱,未形成系统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及范畴片面化,学科定位不明确;研究范式问题的探讨较为肤浅,需进一步深化。未来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应重视国家顶层设计的具体化实施研究,重视高校的家政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研究,深化职业院校家政服务专业设置研究,加强对国外家政学学科建设经验研究。

李彦群对高校特殊教育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改进进行了研究。^[27]本科毕业论文是考查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是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表现,但在实践中,特殊教育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存在概括性不足、真实性存疑、学术性欠缺、创新度不够等共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应对:1. 增加课程期末考察中写作训练的比重和强度。2. 锻炼思维意识,增加提取信息的能力;树立学术规范意识,增强毕业论文的真实性;强化理论知识学习,提高教师的学术指导能力;理清学术基础,练习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

六、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职业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两个分支学科，放在一起进行编纂，是因为这两个学科在实施过程中交叉重合现象比较明显。

姜丽杰等研究了近 20 年中职师生关系。^[28]通过对收录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 737 篇有关中职师生关系研究的论文（2000—2019 年）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近 20 年来对中职师生关系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人员上均不断增加，在新型师生关系建构、师生关系类型的划分、师生课堂教学发展研究、新时代教师角色定位和中职生发展变化需求等领域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进入新时代，师生关系领域有待拓展，研究对象需进一步细化，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研究机构间的通力合作、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综合运用以及加强对师生关系形成的理论研究，都将是中职师生关系研究未来持续关注的焦点。

孙芳芳等研究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检视与推进路向。^[29]认为构建适应科学发展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和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通过检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状况，发现层次高移、就业导向等逐渐成为职业教育的垄断性旨趣，随之引发的过度教育、吸引力弱化、基础不足等问题也开始为学界所关注。表明教育结构失衡将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就业导向造成职业素养出现短板，基础不足加剧职业教育吸引力弱化。这势必影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挥适应需求、有机衔接、多元立交之功能。因此，夯实职业启蒙教育基础，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多元分散并协同治理，应该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路向。

赵宝柱等对省域“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逻辑主线进行了论证。^[30]科学编制省域“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以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为指导，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协调，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规划的逻辑主线应确定为：持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形成多元化办学新格局，增强职业教育的

适应性。通过建设职业教育高地，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方案”。省域职业教育发展高地建设并非仅限于省级，而应在地市级乃至职业院校全面推开，培育树立一批职业院校发展的先进典型，进而实现宏观与微观结合，共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同时，编制区域（省、市）职业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31]贯彻职业教育政策精神，要锚定方位点，彰显职业教育适应性；总结职业教育发展成就，找准起始点，定位新时代工作任务；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瞄准切入点，明确服务定位；回应职业教育民众诉求，抓准发力点，提高教育满意度；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施策，盯准突破点，完善现代职教体系；建构“1311”发展规划框架，擘画支撑点，建设职教新高地。

景宏华等认为，精准施教是班主任建班育人的时代诉求。^[32]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慧，借鉴我国“精准扶贫”的典型做法，基于中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时代诉求，立足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德才兼备的技术技能人才，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是“三全育人”的推进者。精准施教蕴含精益求精、因材施教及按需供教，强调班主任铸魂育人工作贵在“精”和“准”，重在“落实”。为党育人须与思想政治课程同向同行，为国育才须把握学情，关注学生未来的职业面向。

王再宙等对我国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研究的热点与趋势进行了分析。^[33]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分析从 CNKI 中筛选的有关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研究的 1485 篇文献，发现 2002—2020 年间我国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研究呈现“增长—回落—高峰—回落—回温”的趋势。职业院校主题聚焦在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现状研究、双师型教师培养路径研究、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发展研究、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发展研究。以后的研究热点应该集中于深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研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重视培养双师型青年教师等方面。

曹福凯等研究了职业院校产业学院的运行逻辑、现实掣肘与发展进路。^[34]产业学院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产物和一种新的办学模式，是职业教育政策驱动的发展逻辑、新型产业发展

需求的内在逻辑、产教融合深度推进的现实逻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市场逻辑等多重逻辑推动的必然,但也存在制度体系不够健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独立发展能级偏弱、发展规模总体松散等现实掣肘。必须要在创新改革中赋予产业学院独立运行能力,在整合资源中提高产业学院持续发展能力,在完善制度中保障产业学院科学规范运行,在优化治理中构建产业学院顺畅治理结构,以提高产业学院的发展效率和发展质量,助力我国职业教育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张栋科研究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与行动路径。^[35]认为,应该立足于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实践困境,聚焦于专业群建设的价值误区与逻辑偏差,秉持以生为本的理念,通过分析知识社会背景下高职教育的角色定位和反思高职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实践困境的观察视角从“社会需求”转向“个体生涯”,进而从“职业生涯导向”价值取向、“双联动”行动逻辑和基于生涯追踪平台的实施路径三个方面,建构以人为本的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体系。

徐莉等研究了“共同利益”理念对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启示。^[36]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所提出的“共同利益”理念,强调了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对知识和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义,对传统教育实现了根本超越。启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构建需要以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念为指导,采用基于健全的伦理道德和新知识视野的新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法,建设全社会共同平等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最终建构起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新体系。

刘奉越等研究了 UNESCO 参与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治理的作用机制与路径。^[37]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教育组织,UNESCO 将成人学习和教育治理作为教育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GRALE 是 UNESCO 有效推进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发展的柔性治理的关键手段,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 2009 年以来 UNESCO 先后发布的四份 GRALE 分析发现,它参与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治理的作用机制包括目标导向机制、协同

运行机制、监测评估机制以及反馈调节机制四个部分,为了使其有效运作,要采用理念引导、测评手段多元化、运用数据和确立专业权威等多种治理路径,尚可实现其基本目标。

白然等研究了我国学习成果认证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未来展望。^[38]通过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我国十余年学习成果认证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学习成果认证研究与政策话语的演进和实践需求密切关联;基于学分银行的学习成果认证研究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历程可划分为初始借鉴期、实践探索期、反思创新期三个阶段,呈现出从关注国际领域发展到探索中国本土化解决方案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以理论思辨研究、国际引介研究和实践案例研究为主,学习认证基本理论和基于实证的案例研究尚待加强。建议采用“借鉴—反思—探索—创新”的研究思路,将建构我国本土学习成果认证基础理论作为研究重点,并在研究范式上注重证据为本的政策监测与评价,以推进学习成果认证研究本土理论的发展和“中国学派”的形成。

张栋科等对推动高校开放办学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进行了研究。^[39]德国于 2011—2020 年间实施了“通过教育促进发展:开放式大学”行动计划,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多元参与机制、搭建开放性学习网络、丰富课程内容体系、支持混合式学习模式、强化课程应用循环更新、加大短期项目开发力度、推动学习成果评估认证等方面,引导地方高校开放办学来构建高质量终身学习体系。由此,从塑造区域开放性大学、建构立体式课程开发机制、实施项目化课程运作方式、完善学分认定与积分制度等方面,为我国构建高质量终身学习体系提供了参考借鉴。

王凌霞等对地方政府与地方高校构建“双师课堂”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行动路径进行了研究。^[40]“双师课堂”助力乡村教育缓解现实困境、突破发展瓶颈,助力乡村教育均衡发展,是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与地方高校应协同共建“双师课堂”,逐步健全宣传引导机制、协同整合机制、资源配置机制与监督考核机制等;双方提升共建意识,通过搭建合作平台、科学顶层设计、开拓资源渠道等路径,创新乡村振兴新模式、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助力乡村振兴,提升群众获

得感。

薛国风等对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研究。^[41]在对河北省 11 市乡村留守儿童及乡村教师的调查中发现,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存在着未把网络使用与育人目标充分结合、对留守儿童缺乏科学的网络教育指导方法、教师网络信息技术整体素养普遍偏低等问题。要通过更新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理念、重视乡村教师选拔中网络信息技术能力并加强职后培训,提升乡村教师融合网络信息技术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的能力,加大专项投入并持续优化乡村学校网络文化环境,引导乡村教师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并搭建乡村教师为主体的云平台等对策来提升乡村教师整体网络信息技术素养。

七、中外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同属于教育史学科,河北大学外国教育史博士点是全国第一批博士点,培养的弟子中许多已成为教育战线的翘楚,所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不但在河北是强项,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教育史也是疾步直追,尤其体现在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地市一级的师范学院、学院,而其他个别高校等经常涉足于此。特别是地方上经常针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教育发展历史进行挖掘和分析总价,成果独具特色,无可替代。所以,中外教育史研究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刘奉越等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教育发展历程、成就等问题。^[42]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使乡村学生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乡村教育历经探索期、奠基期、调整期、优化期四个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面普及义务教育,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经费投入机制日益健全,办学经费逐年增长;师资队伍建设效果显著,教师供给质量增强;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优先发展乡村教育、加强城乡教育一体化、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

宁永红等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作用、基本经验等问题。^[43]中国共产党

成立百年来始终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并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在唤醒农民救国意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深化农村改革、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始终坚持为农民谋幸福,通过开办夜校、建立农业技术站、实施百万中专生计划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普及农业技术、提升文化教育水平;始终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为农业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在服务乡村建设过程中不断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建立并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精准扶贫化解农村贫困。

吴洪成等对唐代蒙学教材进行了探讨。^[44]唐代,“汉唐盛世”的辉煌体现在学校教材上,表现为由政治集权而带来教材的一统。蒙学教材运用于家塾、私塾、乡学、寺学等不同类型的私学中,以儿童启蒙类为主,兼及儒家经典、文学诗赋及经史文词等诸多领域,突破了固有模式的藩篱。常用教材包括继承前代的《急就篇》《千字文》等,相传相袭,但又有所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开始向多学科方向发展。唐代编写的蒙学教材《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对后世有极大影响,对今天编写中小学教材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而其官学教材与官学教育体制相适应,并保障官学教育活动的有效进行。^[45]两者共同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教育特点:由政治集权而带来官学教材的一统,尤其在儒学经学教材方面更为显著;课程设计的共同必修与专业分科选修促使教材的选用更具教育意义;各专科技官学确定相关专门技术知识的教学内容,导致专业教材地位上升;伴随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官学教材传播海外,影响世界。

郭海洋对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农科职业教育实践进行了考述。^[46]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农科职业学校的兴办,掀开了东北近代农业教育史的序幕。尽管当时东北农科职业学校规模不大、培养学生数量不多,但在推动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同时作为东北农科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标志着东北近代农科职业教育的开端。当然,清政府发展农科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统治,但毕竟其农科职业教育的兴办为东北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吴洪成等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应变进行了述评。^[47]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抗战形势,遵从抗战“建国”的战略目标,设立教育机构,整合教育资源,实施爱国主义教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抗日伪奴化教育。不仅团结了一大批爱国师生,为他们提供了求学报国的机会,而且破坏了日伪的殖民奴化统治,同时为全民族抗战增添了有生力量,有助于争取抗战胜利及延续文化命脉。尤其是在广大教育界先进人士与爱国教育家的努力下,国统区教育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时时激发着民众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热情,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思想上愚弄中国人民进而征服中国的邪恶用心,成为推动抗日战争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吴洪成等对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妇女杂志》进行了研究。^[48]指出《妇女杂志》作为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杂志,在女子教育与社会伦理教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妇女杂志》家政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倡导女子职业教育,推动教育改革;沟通知识女性,转变思想观念;形成教育平等意识,促进女子参政。

何振海等对学派兴衰进行历史考察及其对一流学科建设进行了研究。^[49]19世纪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史上,不同的兴衰境遇,与学派自身在组织机构平台、学术理论的持续创新以及核心人物和团队代际间传承等多方面的路径走向有着密切关系。结合学派与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逻辑,以推动学派稳定发展、实现学派持续繁荣的历史经验为参照,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引入学派意识,着力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健康的学术土壤,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学术基石和理论引导,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科带头人,打造具有内聚性、开放性和持久延续性的学术团队。

何振海等对吉森学派创始人李比希的学术角色及其理念进行了研究。^[50]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是近代化学史上著名的吉森学派的创始人,曾任教于德国吉森大学。作为学者,李比希开辟新的化学研究领域,为有机化学和应用化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作为导师,李比希通过创设基于实验室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化学教育模

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化学人才;作为学派领袖,李比希缔造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依托大学产生的科学学派——吉森学派,促成吉森大学成为“近代化学教育圣地”。李比希的科学精神、育人情怀和合作意识可资当代大学教师发展与优秀教师形象塑造为鉴。

何振海等对二战前后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快速兴起的历程、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51]二战前后,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在著名数学家库朗的带领下实现了快速崛起,成长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学科。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该学科确立了共同的学术理论基础,开辟应用分析数学的研究方向,打造了一支具有高度内聚性和延续性学术团队,营造了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学术交流氛围。我国大学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应着力开辟符合学科自身需求和特点的学术生长点,形成一支能够推动学术传承的具有内聚性特征的学术团队,营造有利于突破学科壁垒、激发学科交叉的学术交流氛围,同时结合学科特点有效发掘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

八、比较教育

比较教育重视中外教育的比较研究,尤其注重国外相关教育观念、思想、制度、行动以及个人言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河北作为全国比较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点较早的建设者,相关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富有建树的研究工作,成果颇丰。同时,对外也在不断地宣传与推广我国相关教育经验和措施,扩大我国教育对国际的影响力。

李松丽研究了美国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质量观的问题。^[52]20世纪之后,美国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质量观先后形成并凸显了三种样态:受西方传统经验主义哲学观影响的道德示范型质量观、受近现代技术决定论影响的技术理性型质量观和受当代主体能动实践观影响的反思实践型质量观。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质量观不同,其小学教师职前培养中的教师角色、知识基础、教育教学方式、教师教育治理等也不尽相同,但它们是相辅相成、彼此融合和互为承继的关系。在我国,小学职前教师培养培训应注重师范生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养成,凸显师范生个体的主体性伦理情怀。同时,师范院校的小学教育目标应与国家所制定的教师专业(行业)标准相吻合、相统一,

以顺应未来教育对优秀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

顾岩峰等对美国社区学院应对国际学生困境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53]美国社区学院国际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 10%。但美国社区学院正在面临招生、学业、语言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困境。为解决这些困境,美国社区学院通过完善招生方式、全面关注国际学生以及充分开发线上教学平台和学位互认等手段不断推进解决困境的进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可借鉴美国社区学院的系列措施,通过充分利用留学生招生网站、设置专业化的留学生教师队伍、留学生管理体系本土化以及完善上学习与学位互认平台这四个方面来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

朱鹏举等对于供需匹配视角下的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创新模式进行了研究。^[54]从供需匹配的视角对概念验证中心进行分析,揭示出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过程中研究人员每个阶段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说明概念验证中心在服务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功能配置及实现路径,为中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借鉴:强化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导向作用,使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成为大学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自觉;整合企业、大学和政府相关资金为大学科研成果提供资金保障;加强大学科研人员与企业界人士的沟通,激发高校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强化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培养大学科研人员的技术—市场远见;构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研人员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

荣艳红等研究了德国民众的契约与法律精神及其对双元职业教育立法的影响。^[55]德国民众的契约与法律精神对双元职业教育立法过程和立法目标的实现均有着重大影响,该精神不仅决定着双元立法出现的可能性、制约着双元立法的创制过程、影响着双元立法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决定着双元立法实施的程度。此外,民众的契约与法律精神,还对双元立法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影响:激励缔约方去实现立法的目标;约束缔约方可能的毁约行为,最终实现立法目标。

荣艳红等对德国社团主义传统及其对职业教育立法影响进行了研究。^[56]德国具有浓厚的社团主义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团主义已经渗透进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国联邦或州层次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在立法筹备、倡议以及

创制过程中,社团主义均有着明显的表现。社团主义不仅决定着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出台的可能性,而且对立法的最终表现形式、立法实施与监督的方式以及立法实施的效果等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底会娟等对加拿大儿童早期学习与保育等进行了研究。^[57]近年来,加拿大决定改变以往以省、地区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拼凑式”的托育服务体系,构建由联邦政府领导和资助的儿童早期学习与保育框架。该框架通过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决策、鼓励和投资最佳创新实践、扶持和发展土著居民的托育服务等方式,旨在为所有儿童构建高质量、可获得、可负担、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托育服务。从框架实施来看,虽然托育空间的数量显著增加,家庭托育费用有所降低,但也存在托育空间规划不足、费用削减昙花一现、土著项目成效难以评估、托育工作者招募和留任困难、托育服务质量难以改善等问题。借鉴:构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依托高质量的师资全面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将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

薛国风研究了日本高校社会服务新动向。^[58]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高校开始引进美国服务学习理念。日本高校服务学习实践开展具有明显的特点:国家教育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与助推,关注社区的发展变化,关注学生能力与高校教育质量的互推式发展,国内与国际服务学习活动并行发展等。启示:深化认识社会服务功能发挥过程中社区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双向关系;大力推进服务学习与社区和社会发展真实需求的紧密结合;为基于服务学习新理念的社会服务形式提供制度化和系统化保障;大力促进“产官学社”之间的密切有效合作并形成持久发展力。

王文利等对日本国立大学间多所大学同一法人的制度构想与实践进行了探索。^[59]国立大学间多所大学同一法人制度是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第三周期内的最新举措,这一制度在保留各国立大学办学独立性和特色的前提下,将各国立大学法人合并为一个新的国立大学法人,负责整合各校教育研究资源并统筹管理地域产学研合作事宜。这一制度彰显日本政府在国立大学群落引入“合作中竞争”理念以及整合国立大学优势资源

实现地域振兴和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双重战略目标。启示：引导合作理念融入“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均衡配置；整合校际优势学科，探索学科增长新范式。

王静等研究了韩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问题。^[60]选取韩国63所大学的147份融合教育课程教学方案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融合教育课程的开设情况、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等。启示：完善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政策法规，凸显对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强制性要求；改革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推进从特殊教育到融合教育的全面转向；调整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比重，突出学前融合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

姜茉然等对匈牙利职前幼师教育质量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61]作为综合性大学，罗兰大学在匈牙利职前幼师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实施的新举措很有代表性。罗兰大学采取的措施包括遵循并活用国家课程标准、开展能力倾向确认考试、建立自我导向型实践课程体系。启示：我国职前幼师教育改革和发展应该以保障最低质量为目标完善职前幼师教育课程国家标准，以把住“入口关”为目标建立能力倾向考核制度，以优化教育过程为目标重视教育实践课程。

九、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在近几年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对于大中小学和继续教育活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新兴学科，其技术也在不断变化、成熟和人性化：有的越来越专业化，有的也越来越大众化，或者由学科专业向大众普及。这样一来，其研究领域就会不断扩充，除了理论程度不断拓宽、加深，其应用更显得急需急迫和普及适用，不但成为特殊情况下的必备，也成为传统教育手段的重要补充，变得不可或缺。

段爱峰等对新世纪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结构进行了分析。^[62]教育信息化政策是国家调控、规范教育信息化活动的政府行为。基于扎根理论与共词分析的视角对2000—2019年间中国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进行二级编码与聚类分析，提取出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结构，主要包括信息化人才、信息化资金支持、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应用、信息化教师教育与信息化资源六大方

面。建议：重视政策的区域倾斜，经费投入不断加强；加强信息化人才培养，对学前与特殊教育等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教育信息化专项法规政策，建立政策评估与反馈机制。

徐莉等对人工智能+教育融合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研究。^[6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运用复杂系统科学的理论审视社会、教育和技术系统，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和教育融合面临社会—教育系统发展质量不充分、基础理论研究较薄弱和实践应用领域不均衡三大困境。要呈现开放动态的系统结构，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采用技术路线图的基本框架，描绘出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的三维关键路径，即打破知识技能壁垒、构建智慧学习体系和培育学习型社会价值系统。

孙西朝等对高校公共选修课在线教育进行了分析研究。^[64]高校公共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两部分。不同于慕课学习的学分互认、网络教育的学位授予，在线教育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供技术支持和学习服务。高校在线教育是以资源的有效供给、开放共享提供教育服务的，资源建设是在线课堂创设关键。所以，在线教育要创新教育组织形态，丰富现代学习方式，要成为教室的补充和课堂的延伸。这就要求在线教育模式逐步成型，注重在线授课与教室现场面授相结合，完善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潘新民等对信息化背景下农村教师的合作发展及实施路径进行了研究。^[65]互动理论是西方人际关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它是诸多内容相关、关系又较为松散的具体理论的集合理论。符号交流理论、人际互动理论、角色理论等都属于互动理论的范畴。农村教师合作可被视为一种特定场域内的人际互动，而互助合作是促进农村教师个人以及相互间专业发展的有效方式，同时也应看到信息化背景下农村教师有了新的合作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信息化背景下提高农村教师合作质量的策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农村学校主动承担起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职责；强化农村教师网络合作发展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养成。

总之，2021年省域内教育学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彰显了河北教育学科研究的实力和承继状况。但是，客观分析发现，其研究成果有待于进

一步提高。表现为：第一，在全国或者同行业内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比较少。网络搜索中，同一类或同一篇文章，省外同行所研究的层级占优多。长期下去，域内一般层次的教育研究成果就有被读者忽略的可能，因为引用者一般引用名家名篇名刊物名出版社的同类文章现象很普遍。第二，针对性不足。河北环绕京津，坐拥雄安，但对京津冀一体化教育和雄安教育的研究比较薄弱。地方教育研究不关注或者少关注地方教育新变化，就难以对地方教育建设提供直接的有力的支持与帮助。第三，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成果薄弱。尽管有针对实际的文章和图书问世，但发表的刊物级别和出版社层级不占优势，研究成果要落实到现实中还需要很大的努力。第四，许多教育研究的“名家”2021年少有或没有纸质成果呈现于读者。所以，河北教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层次化、体系化、特色化教育研究将成为必然。

(薛滩：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白雪玉,孙天姿,王鑫.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 2021(2).
- [2] 许珂,冯斌.京津冀中外合作办学现状的研究与分析[J].公关世界 2021(8).
- [3] 王胜本,耿立艳,张占福.新时代高校本科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4] 付鸿彦,张伊婧,杨倩.河北省骨干高校学科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相关性及优化策略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1(3).
- [5] 康巍巍,杨洋,刘东峰.河北省高校外籍教师域外思想传播及对策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21(1).
- [6] 李阳.中外合作办学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5).
- [7] 薛国凤.“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儿童观[J].少年儿童研究 2021(7).
- [8] 范明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的方向与制度设计——基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视角[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9] 曹静,刘晶,王欢.3~6岁幼儿对文化的传承现状分析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 2021(4).
- [10] 李姝雯,李曼丽.儿童书面言语的因果表达及逻辑思维特征研究——一项基于1800名小学生作文的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1).
- [11] 白然,张伟远,管艳,谢青松.后疫情时代家校协同的变

革路径探析——基于“停课不停学”期间144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 2021(3).

- [12] 石磊.呼唤现代“小先生”——论学生、家长的角色互换[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1(2).
- [13] 张文霄,李艳庆.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评估与培养:实证研究的进展[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21(6).
- [14] 徐莉,静爽爽,何佳敏.两个世界的对垒:中学生手机依赖学校管理难题的叙事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8).
- [15] 江雪梅.微调学校组织架构,提升学校管理活力[J].河北教育综合版 2021(4).
- [16] 乔莉娟,马静,焦云红.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现状探析[J].邯郸学院学报 2021(1).
- [17] 徐莉,杨丽乐.新时代基于“双螺旋式”结构的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的核心要义与发展方略[J].现代教育管理 2021(7).
- [18] 于川,郭艳肖.师范生眼中的“好教师”——基于117份教育叙事的文本分析[J].教师教育论坛 2021(3).
- [19] 辛雅静,张晓芝,田文歌.城市公立小学派遣制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基于河北省S市的调研[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1(4).
- [20] 石磊,高忠明,关卫华.民办教育机构教育科研现状、问题及推进策略[J].黑河学刊 2021(1).
- [21] 孙西朝.“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教育的发展与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 2021(2).
- [22] 柳靖,刘超.中国共产党领导高考制度的发展观、价值观、改革观探析[J].中国考试 2021(8).
- [23] 龚继峰.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化模式探析[J].文化学刊 2021(7).
- [24] 王胜本,刘旭东,李鹤飞.新时代高校服务育人:重要价值、优化图景、推进路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11).
- [25] 朱文富,董香君.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逻辑框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26] 王永颜,郭鹏慧.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的回顾、反思及建议[J].山东高等教育 2021(4).
- [27] 李彦群.特殊教育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J].绥化学院学报 2021(4).
- [28] 姜丽杰,宁存柱,宁永红.近20年中职师生关系研究的回顾及展望[J].职教发展研究 2021(1).
- [29] 孙芳芳,吴楠,王剑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检视与推进路向[J].职教论坛 2021(5).
- [30] 赵宝柱,闫志利.论省域“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逻辑主线[J].职业教育研究 2021(5).
- [31] 赵宝柱,王剑锋.区域职业教育“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六点”原则[J].职业技术教育 2021(30).
- [32] 景宏华,魏江南.精准施教:班主任建班育人的时代诉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5).
- [33] 王再宙,齐曹,张春香.我国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研究的热

- 点与趋势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 2021(8).
- [34]曹福凯,高晶,赵建辉.职业院校产业学院的运行逻辑、现实掣肘与发展进路[J].职教论坛 2021(5).
- [35]张栋科.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与行动路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36]徐莉,杨然,杨丽乐,何佳敏,杨旭浩.“共同利益”理念对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 2021(1).
- [37]刘奉越,王丽婉.UNESCO 参与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治理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基于 GRALE 的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 2021(4).
- [38]白然,谢青松,谢浩.从借鉴走向创新:我国学习成果认证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未来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36).
- [39]张栋科,王泽,陈娜娜.推动高校开放办学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德国路径与特色——基于 2011—2020 年“开放式大学”行动计划的解读[J].外国教育研究 2021(11).
- [40]王凌霞,刘小丽.地方政府与地方高校构建“双师课堂”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行动路径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 2021(4).
- [41]薛国风,王明,田二配.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基于河北省 11 市乡村留守儿童网络使用的调查[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1(3).
- [42]刘奉越,张天添.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教育发展历程、成就与展望[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43]宁永红,冯利臻,石秋香,林楠.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作用、基本经验及展望[J].职业技术教育 2021(25).
- [44]吴洪成,郭曦垚,杨蕾.唐代蒙学教材探讨[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45]吴洪成,贾璐.唐代官学教材述略[J].教育与考试 2021(2).
- [46]郭海洋.清末新政时期东北农科职业教育实践考述[J].职业技术教育 2021(21).
- [47]吴洪成,霍珊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应变述评[J].衡水学院学报 2021(4).
- [48]吴洪成,张珍珍.引领女学教育:《妇女杂志》的家教教育思想探析[J].教育学术月刊 2021(9).
- [49]何振海,刘玉杨.学派兴衰的历史考察及其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 [50]何振海,张铭.学者·导师·学派领袖——吉森学派创始人李比希的学术角色及其理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6).
- [51]何振海,杨搏.二战前后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快速兴起的历程、原因及其借鉴[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5).
- [52]李松丽.美国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质量观的历史演进、学理分析及其当代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28).
- [53]顾岩峰,郭涵萌.美国社区学院应对国际学生困境的措施与启示[J].经济论坛 2021(4).
- [54]朱鹏举,王振国.基于供需匹配视角下的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创新模式:概念验证中心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55]荣艳红,傅修远.德国民众的契约与法律精神及其对二元职业教育立法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56]荣艳红,傅修远.德国社团主义传统及其对职业教育立法影响[J].比较教育研究 2021(10).
- [57]底会娟,李春晖加拿大儿童早期学习与保育框架:背景、内容及实施成效[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11).
- [58]薛国风.日本高校社会服务新动向:服务学习的实践及启示[J].日本问题研 2021(4).
- [59]王文利,高伟航.日本国立大学间多所大学同一法人的制度构想与实践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 2021(9).
- [60]王静,范明丽.韩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现状与启示——基于对韩国 63 所大学学前教育专业融合教育课程的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 2021(7).
- [61]姜茉然,孙岑,陈君.匈牙利职前幼师教育质量保障新举措及其启示——以罗兰大学为例[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 [62]段爱峰,武雨晴.新世纪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结构分析——基于扎根理论与共词分析的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63]徐莉,梁震,杨丽乐.人工智能+教育融合的困境与出路——复杂系统科学视角[J].中国电化教育 2021(5).
- [64]孙西朝,孙璐璐.高校公共选修课在线教育探索与实践[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1(4).
- [65]潘新民,吴冠斌.论信息化背景下农村教师的合作发展及实施路径——基于互动理论的分析[J].河北教育 2021(11).

课程与教学研究

孙雪 邢秀茶

2021 年,河北课程与教学研究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高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受到政府

支持,许多成果都是在各级教学改革和科研基金项目支持下的专业建设成果,其中新工科课程建

设和培养模式变革研究成果突出；二是高校课程思政化实践与研究全面开展，成果较多；三是受疫情影响，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方法的信息化变革研究凸显。此外，以创新创业、产教融合为目标的课程研究，教学方法与策略应用等研究都促进了高校课程与教学研究。总体上，研究成果仍以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实践应用成果居多，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缺乏前沿的深厚研究。

一、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

本年度河北省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以期对我国的教育有所启示。学前融合教育是指为3~6岁的特殊幼儿提供正常化、非隔离的教学环境，提供相关的特殊教育和服务措施，从而促使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共同学习，达到真正融合的一种形式。幼儿教师是决定学前融合教育成败的关键要素，幼儿教师的融合教育素养越来越受到关注。

王静对韩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现状进行了研究，选取韩国63所大学的147份融合教育课程教学方案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融合教育课程的开设情况、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等，指出韩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的职前培养特点有：国家政策保障了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强制性与普及性；培养理念逐步从补充特殊教育素养转向培养融合教育素养；理论与实践并重，突出培养学生的融合教育实践能力。在研究分析韩国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基础上，结合我国该类课程的现实困境，指出对我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启示：一是完善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政策法规，凸显对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强制性要求；二是改革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推进从特殊教育到融合教育的全面转向；三是调整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比重，突出学前融合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1]

陈庆合对芬兰“现象教学”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有所启示。芬兰是世界上典型的创新型国家和教育发达国家，各类教育都因其独特的教育理念而知名全球，独创的“现象教学”课程模式和“横贯能力”培养是各类教育成功的“秘密武器”。“现象教学”是一种将能力培养和学科教学相融合的新型课程模

式，具有教学目标清晰性、学习过程真实性、学习环境情境性、理解事物整体性、学习资源协同性和考核评价自主性等特点。“横贯能力”是横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思维、内容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整合能力。芬兰应用技术大学运用LBD教学范式和RDI科研范式，实施“现象教学”和培养“横贯能力”。其中LBD教学范式是“Living-lab”（真实职业技术）项目教学，它将学生的学习活动与产业最新技术需求（即真实的“现象”）深度融合，RDI（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即“技术研发与创新”，是将技术研发创新与LBD教学紧密结合的一种科研范式。结合我国当前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了芬兰“现象教学”对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具体实施层面的四点启示：借鉴现象教学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学科教学；重视横贯能力培养提升应用型人才高阶思维和综合素养；借鉴RDI范式重视应用性科研，做到教学科研一体化；教师转变思维提升整体事物认知水平和知识应用能力。^[2]

随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职业教育校本课程的治理也迫在眉睫。陈庆合对我国职业教育校本课程及其治理进行了探究。作者研究分析了职业教育校本课程的本质特征、校本课程的地位和作用，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提出课程治理的特征：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决策，不同决策层的不同主体权利不同；课程治理的对话以多主体间的互动和协商为基础；治理主体之间为协作关系，对权力和资源更为公平的分配与再分配；与课程相关多元利益主体的责任通过治理过程进行分配。同时还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策略：建立明确的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标准；构建多层次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机制；改善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权力运作方式；明确职业教育校本课程的管理与开发主体；凸显职业教育校本课程鲜明类型特点。^[3]

二、高校课程思政化研究

课程思政是全面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2021年课程思政研究成果较多，包括理论与实践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刘育兵对生命哲学视域下青

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提出将生命哲学与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增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力,还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具体策略包括可在传统的思想政治基础上更新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实践融合、加强网络发展;引导青年学生积极树立尊重生命的意识,探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直面困境、享受生命的权利,在今后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发展。^[4]龚继峰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化模式进行了研究。表示所谓教育范式指的是在教育教学中所形成的理论、模型、方法和经验等的总和。高校思政教育中,人文化教育模式的范式建设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规律。研究指出构建人文化思政教育模式最基本的范式要求:实现教师、学生主客体关系的转变;构建以人为本的思政教育范式,重视思政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回归于学生的生活实际。研究在阐述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化模式必要性的基础上,就思政教育的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一是基于科学理论指导,转变思政教育观念;二是建立以人为本的思政教育范式;三是积极创新思政教育教学方法,在人文化思政教学模式下,按照逐步展开、层层推进的方式研究相应的教材,更好地服务学生;四是创新学生思政教育的服务体系;五是优化高校学生的实践管理。^[5]刘晓晨进行了河北历史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路径研究。研究在“课程思政”理念下挖掘历史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期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需求。指出,在河北历史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过程中,高校要改变重理论宣传、知识讲解的方式,结合大学生学业困惑、成才需要和精神需求,从专业实践中的历史文化沉浸熏陶、案例教学中文化融合产业的创新引领、翻转课堂中经典著作与新媒体共同助力三个创新路径,推动理论研究,实现文化产业和文化育人良性互动。^[6]王钟杰对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力提升策略进行研究,提出从师德素养、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三方面把握“课程思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为促进高校加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从思想自觉、行动科学、制度激励三维度探讨,提出“课程思政”力提升策略:思

想自觉是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前提;行动科学是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关键;制度激励是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保障。^[7]赵青以智慧校园平台为依托,对智慧校园背景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且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策略:运用大数据丰富智慧校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借助第三方丰富客户端教学资源推送形式;创建智能交互的学校思想政治智慧课堂;加强智慧校园平台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交互性;通过多方联动增强智慧校园平台协同育人功能。^[8]

在河北省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方面,阴冬胜进行了课程思政融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实践的路径设计研究。作者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师资等几个方面,探讨课程思政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实践路径设计:教学目标方面,突出创新创业教育立德树人价值导向;教学内容方面,增加更多的思政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突出课程思政教学的灵活性;教学师资方面,增强创新创业教育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9]冯利伟进行了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堂的建设研究,认为地域文化因其独特的价值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教育资源。唐山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研究提出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堂的建议:将唐山地域文化融入师资建设,优化师资队伍;将唐山地域文化融入教材建设,编撰地方辅助教材;将唐山地域文化融入教学建设,构建校内外一体化课堂。^[10]魏勃对抗疫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政课的实践进行探究,提出将抗疫精神融入医学生“形势与政策”课,能提高医学生对思政理论课的学习兴趣,并增强医学生的专业学习动力。具体探索包括: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和医学生兴趣的有效结合点;充分发挥抗疫精神对医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建立抗疫精神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研究提出应从两个着力点入手建立抗疫精神对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是在思政课中为医学生讲透抗疫精神;另一方面是在医学专业课中为医学生讲活抗疫精神。这是思政课教师和医学专业课教师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11]段秀芝对“大学物理”课程中课程思政教学进行探究,首先以“薄膜干

涉”为例，描述相关理论知识，进而阐述思政元素。通过讲述托马斯·杨刻苦钻研的事迹来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的优良品质，使学生体会到物理现象之美、物理理论描述之美与理论结构之美，并将物理理论提升到哲学层面；通过薄膜干涉的应用引出工匠精神，并对学生言传身教。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12]杨双菊对思政教育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融入策略进行探索，探讨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针对性的、可操作的融入策略。指出，要保证课程思政的顺利实施，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才能言传身教，以达到英语语言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13]

三、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研究

2021年河北省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研究成果中以工科院校居多，工程教育认证成为主要背景和促进因素。工程教育认证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工程教育认证是一流新工科建设的点睛之笔，在新工科和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制定适合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体系至关重要。刘志敏对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大学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改革进行总结，研究介绍了工程教育背景下的大学计算机通识课程的教学目标，围绕着“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核心教育理念，对大学计算机通识课程的定位、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提出了课程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一是立足培养学生计算机基本技能，使学生打下较为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知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做好铺垫。二是突出基本应用，增加教材的专业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使知识服务于生活，回归于生活。在综合应用层上，突出教学内容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着眼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工程应用，使学生树立工程理念，培养学生素养。在知识应用拓展层面上，引导学生自主式、探究式学习，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三是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主要包括加强直观教学，使用案例教学，加强师生有效互动。四是增加实验教学时数，培养学生实际操作技能。五是育人与教书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4]赵安周对新工科和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测绘

工程教学进行改革研究。研究结合河北工程大学的办学定位，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从人才定位“课程教学体系建设”“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确定了测绘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了四位一体育人新模式，实践证明研究成果可以提高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专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15]白梅等进行了以架构思维培养为目的大跨建筑设计教学改革研究。针对传统教学中学生相对薄弱的建筑结构基础和缺乏架构意识的现状，以《大跨建筑——邯郸客运东站设计》为例，阐述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三年级课程教学改革思路，通过植入架构思维，建立建筑设计与建筑结构相互融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将架构思维融入建筑设计之中。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课程激发了学生对建筑设计的学习兴趣，学生开始从结构知识分析入手，在方案设计中完成将结构与设计的有机结合。经过课改总结经验得出：以架构思维培养为目的大跨建筑设计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以结构为导向，使学生重新理解结构之于建筑的意义，从而形成具有逻辑性、精确性的设计思维，这是帮助建筑学学生建立综合性设计思路的新尝试，也是对传统建筑学教育中结构方向薄弱环节的有力补充。^[16]

窦新宇以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为例，将SWOT分析法引入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本科教学过程进行了教学研究。SWOT即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威胁（Threats）进行综合评估与分析，通过内部资源（内部优势和劣势）和外部环境（外部的机遇和威胁）有机结合来清晰地确定被分析对象的内外情况，依矩阵式排列，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将各种因素进行交互匹配加以分析，从中得出相应结论。该研究首先分析了该专业的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会和外部威胁，然后研究了该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环节存在的不足。最后，针对教学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给出了具体化的建议和改进措施。^[17]李欣对以应用能力为导向的国际工程外语人才培养路径进行了探析，提出国际工程外语人才应用能力培养的优化路径。高校作为国际工程外语人才

培养和输出的主要基地,必须要肩负其自身的使命,应以“应用能力培养”为起点和终点,在依照高校自身教学机制以及教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对于国际工程外语人才的具体诉求,树立以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及时地改进自己的教学管理模式,优化就业指导,使得学生能够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加大对自身应用能力提升的重视,明确自身应该做出哪些努力来增强应用能力;教师是负责培养外语人才应用能力的主要实施者,其教学理念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效果,教师要能够突破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树立以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加强对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情景设定、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提升学习兴趣。^[18]田云明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日语专业翻译课程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以 OBE 理念为指导重新构建课程体系的改革思路。结合毕业生问卷调查及走访用人单位,了解社会需求,明确翻译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对日语专业翻译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实践。研究结合唐山学院日语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日语专业翻译课程体系持续改进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继续贯彻 OBE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主要通过对毕业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对翻译课程体系的评价;其次,建立教学团队定期研讨机制,组织翻译课程任课教师就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选定、教学过程、试卷分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讨,对发现的问题给出整改方案,以持续提升翻译课程教学质量,确保课程目标的达成;最后,建立用人单位定期走访机制,了解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及社会需求,进而不断完善翻译课程体系,以实现培养目标的持续改进。^[19]

四、“金课”建设研究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印发《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中,关于“打造金课,淘汰水课”的有关要求,河北教育界对于“金课”“水课”开展了持续探讨。于平对信息技术视域下的“金课”建设进行研究,提出打造“金课”,要充分重视课堂教学效果,要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

造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主要以线上“金课”建设、线上线下混合“金课”建设、虚拟仿真“金课”建设及社会实践“金课”为抓手,分析信息技术与“金课”建设的深度融合。^[20]刘剑等对“新工科”背景下无机材料物理性能“金课”建设进行了研究。根据“新工科”背景下对《无机材料物理性能》的要求以及线下“金课”的建设标准,针对目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其课程教学进行了创新,对课程“线下”教学模式、评价模式以及课程内容等进行了优化,根据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点,以“成果导向”为指导,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具体体现在:第一,在上课前布置预习内容,并通过“学习通”发布一些小知识点的问题,促使学生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有利于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拓展教学内容的深度及广度。第二,以性能领域内某材料的当前发展现状、科学前沿以及研究热点为切入点,点明研究热点与所讲性能的联系,进而引出所讲教学内容。第三,在课本知识的讲解过程中,借助板书、多媒体、教具、视频等多种教学工具。第四,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案例讨论,增加课堂内容的挑战性。^[21]

杨丽娟进行了基于 CNKI 数据的“金课”研究可视化分析研究。研究以 CiteSpace 软件为研究工具,对 CNKI 中 2018.01—2020.10 关于“金课”的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内容包括年度发文量、重要作者、重要研究单位、关键词的词频、关键词的聚类 and 突现等,总结出现阶段“金课”研究主题领域包括基于与“水课”比较的“金课”特征研究、“金课”建设标准和路径研究、“金课”研究的院校、“金课”类型研究共四类,分析出课程、改革、慕课、教学内容、课程教学、微课等关键词是“金课”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热点领域。^[22]

五、以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的课程研究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全面部署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明确提出“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创新创业教育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形势

下,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新时代互联网经济下的全新教学理念与教育课程体系——创新创业教育应运而生。

张晓蕊等对“三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KGSIE 课程体系构建进行研究。该研究以生态教育和成果导向教育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为理论依据,在综合 KAB 和 SIYB 两种创业课程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提出“三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KGSIE 课程体系。“三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KGSIE 课程体系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立足于生态教育理论,本课程体系具有融合性、有机性的特点。KGSIE 课程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课程,实现了专业教育、思政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第二,立足于成果导向教育理论,本课程体系具有以生为本、可持续改进的特点。KGSIE 课程体系以创新创业教育目标为中心,注重创新创业教育的学习成果,配合多元化、弹性化、个性化的学习要求,注重第一、第二课堂以及实践、实训平台的互动,让学生通过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来展示他们的思考、质疑、研究、决策和呈现能力,实现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第三, KGSIE 课程体系具有全面系统、逐层深入的特点。按照 K-G-S-I-E 的逻辑思路进行教学内容的开发和设计,将学生置于一个从发现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到完成一项完整创新创业任务过程的环境之中,实现了创新创业教育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效果,将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打造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创新创业体验”之旅。高校的“三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 KGSIE 课程体系的构建原则:一是秉承“以学生为本、在讨论中学习、在实践中提升”三个基本理念。二是把握“意识精神培养、基础知识传授、实践能力提升”三个阶段,在课程设计过程中要注重三个阶段依次递进的关系,按照 K-G-S-I-E 的逻辑思路,循序渐进设计构建 K-G-S-I-E 链式课程模式,每个阶段要有与该阶段相适应的课程架构。三是构建包括“了解企业”(Know About Business, KAB)、“产生企业想法”(Generate Business Idea, GBI)、“创办企业”(Start Business, SB)、“改善企业”

(Improve Business, IB) 和“扩大企业”(Expand Business, EB) 在内的五大模块课程体系,并对该课程体系的主要特点、构建思路、基本内容以及构建过程中的问题等作了详细阐述。“三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KGSIE 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需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关键点:积极探索思创融合、专创融合的教学模式;打造一支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师资队伍;构建一套完善的创新创业 KGSIE 链式实践平台。^[23]高向杰对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通识教育培养进行研究,认为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要贯彻落实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紧密结合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特质要求,充分发展学生的创新素养,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和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素质要求。充分发挥通识教育在培养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中的重要作用,全方位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工程人才。研究提出,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要从理念定位、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队伍等多方面不断创新和持续改进,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24]

孙军英对新工科背景下基于竞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究与实践。提出竞赛考察的是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是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的平台,是高校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将其对应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拆解到相关的专业课程中,通过重构课程体系,重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建设阶梯式平台体系,发展三级交互式竞赛模式,真正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目标,培养了跨学科人才,增强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了学生竞争力。^[25]

六、学科课程改革研究

王永颜对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进行了回顾、反思,指出家政学自改革开放恢复重建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就研究内容来看,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重在学科理论研究、学科发展历程研究和研究范式研究三个方面。这些研究理论基础薄弱,未形成系统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及范畴片面化,学科定位不明确;研究范式问题的探

讨较为肤浅,需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未来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应重视国家顶层设计的具体化实施研究,重视高校的家政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研究,深化职业院校家政服务专业设置研究,加强对国外家政学学科建设经验研究。^[26]李川对化学系统性思维的表征手段与改革进行研究实践。化学系统性思维强调化学子系统之间,以及化学系统与其他学科系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习者整合、应用化学知识解释化学现象、解决化学问题。内外交织的多个不同系统很容易让学生迷失在纷繁复杂的概念体系中,需要借助 SOCME, OPM, BOTG, CLD, SFD 等可视化图形工具厘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以表征化学系统性思维。研究在明确化学系统性思维内涵的基础上,开展“化学平衡”教学改革,探索绿色化学课程建设,开展游戏化学习、服务性学习、深度学习、项目学习、工作坊或研讨会,有助于化学系统性思维培养实践的改革与落地。横向关联化学系统与其他学科系统的关系,纵向深入分析化学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开展化学系统性思维教学的关键。改革需要多学科的协同攻关,既要关注化学知识的社会应用,也要抓住化学学科本质和特征,才可以围绕化学概念和社会问题,建构纵横交织的多系统影响关系,促进学生化学系统性思维的发展。^[27]李哲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对河北高校应用型俄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进行研究。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京津冀区域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应用型俄语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河北省高校俄语教育在迎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压力和挑战。研究认为,新形势下河北省应用型俄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主要有:一是科学设定俄语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教育理念,这是科学设定俄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坐标点;尊重人的发展,这是科学设定俄语人才培养目标的出发点;提高学生素质,这是科学设定俄语人才培养目标的落脚点。二是系统建构俄语人才培养体系。俄语教学要按照“厚基础、宽口径”的思想设计教学环节,实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统一和融合,一方面在理论教学环节积极拓宽专业领域,加强学科知识教学,加大通识教育比重,实现人才宽口径培养;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和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开辟多种渠道,采取校内、校

外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三是优化改革俄语人才培养过程。首先,精心设计应用型俄语人才培养的时间过程,合理设置阶段目标;其次,强化应用型俄语人才培养的空间设定选择,多元化实施人才培养工作;最后,拓展改革俄语教学实施过程,实现传统教学的时代化创新。四是科学谋划俄语人才培养机制,尝试推进弹性化学制,改变传统学分制,充分发挥学分制在培养俄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应用能力的优势,加快完善评价体系。^[28]

马红霞基于 OBE 理念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混合式课程体系构建进行研究。为完善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课程培养人才的功能。研究依据 OBE 的教育理念,借鉴联结主义教学设计模型,通过线上搭建优质视频资源网络教学平台,线下打造精品体验实践活动,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混合式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有效地契合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激发了大学生的参与性和体验性,体现了培养适应未来变化社会的人才需求。^[29]高崇一等对基于 OBE 理念的“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研究。改革包括课程内容的优化、教学目标的制定、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以毕业要求达成度为产出导向对课程教学目标进行了反向设计与正向评价,通过课程内容的优化、教学目标的制定、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工程制图”课程的教学活动对其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之中,提高学生在工程知识、问题分析和使用现代工具等方面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对机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30]

七、教学设计与教学策略研究

康巍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机制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等方式,从文化符号、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三个层面了解当前英语专业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现状,并基于调查结果分析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一步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英语专业建设的重要性。提出,结合校本特色,以“立德树人”为己任,从人才培养理念、专业理论及实践课程设置和师资队伍建设和三方面

人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旨在培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社会责任感,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31]

秦辉就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英语教学内容中应用的优势进行讨论,提出以下策略:第一,改进高校英语教学大纲,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第二,提升高校英语教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素养。首先,需要教师能够对相应的文化知识进行传播与教学内容的渗透;其次,就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应用进行正面引导;最后,教师还需要能够在所有的文化体系中进行有效划分,让学生可以更好地辨别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能够有效地进行相互之间的文化转换。^[32]

马玉改对基于合作学习的混合式教学设计进行研究与实践,以地球概论课程为例,基于合作式学习,开展了混合式教学的可行性解析,分析了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和实施过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包括三个阶段:课前、课中和课后。课前,教师首先根据“学习的对话框架”设计四个循环。课中,教师根据课前自测,针对性地反馈线上学习内容,接着,教师将布卢姆认知目标中的应用、分析、评价及创造层次的内容,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开展深度教学。课下,教师根据“雨课堂”等工具发布的学习轨迹,察看学生预习情况、签到情况和课上答题情况等。实践结果表明,基于合作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活跃了课堂氛围,提高了课堂评价和课堂效率,增强了小组成员的自主学习能力。^[33]王旭影对基于翻转课堂的“工程地质”课程教学设计与评价进行研究。在总结“工程地质”课程特点的基础上,将翻转课堂引入“工程地质”课程教学中,开展基于翻转课堂的“工程地质”课程教学设计研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将线上与线下教学有效融合,提高了课堂效率,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课堂的参与度,学生成绩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翻转课堂教学班期末考核成绩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班;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环节、考核体系和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均超过90%,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研究还构建了形成性学习评价和考核体系。^[34]齐

丽娜等进行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研究对康复治疗学本科生《神经康复学》课程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表明,本科生的学习投入能够在网络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通过提高网络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投入增强学生学习满意度,促进教与学的双赢;促使学生的认知水平从程序性向策略性转变;网络教学平台中的共享信息能促进学生的伙伴学习过程。通过互动、参与、动机和满意度逆向改善在线课程,也促使教师不断建设课程平台中的教学资源,使在线课程平台不断更新挑战性和创新性。^[35]

耿飞等基于“OBE”教育理念对高师音乐教法课教学案例进行研究。在OBE理念引导下,对音乐教学过程中的训练目标、方式等提出新的要求:制定合理的音乐教法课程分段训练目标;选择多样化的音乐教法课训练方法;建立多元化的音乐教法课程评价方式;注重训练过程的持续改进。^[35]

刘剑等对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创新实验教学设计进行研究。研究以“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实验为例,通过翻转课堂的方式将分析化学实验教学进行改革。课前,老师录制相关实验教学视频、制作PPT和讲义,并上传到超星学习通泛雅学习平台,通过学习平台的统计数据监督学生对实验的预习情况。课上采用学生助教制和小组讨论的方式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最后通过合理的考核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实验内容及相关理论知识。通过一年的创新实验,该实验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升均有较大的助力作用。^[36]吴振华等对地理核心素养视角下县级博物馆研学旅行课程设计进行研究,课程设计利用地理核心素养与县级博物馆研学旅行课程之间的契合之处,从地理核心素养的视角解读馆藏展品,并以县级的曲周博物馆为例进行课程设计。经过反思发现,博物馆展品是研学旅行课程设计的根本,博物馆科研成果决定研学旅行课程质量,博物馆本应成为区域研学旅行的集散地,博物馆联动促进区域研学旅行向纵深发展。^[37]

曹玉霞对“互联网+”背景下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双语教学进行研究。研究了“互联网+”背景下《材料概论》课程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及教学策略：制定新的材料概论教学体系；探索适当的有效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以“互联网+”为背景改进教学方法主要有增加本专业的英文文献和视频材料，增加课堂讨论的部分，教材中的部分内容由学生查资料讲解。研究发现，在《材料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过程中，合理地运用网络资源，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38]

刘佳对基于 CBL 教学模式的移动机器人巡线课程进行研究，从培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人才的需求出发，探索将图像采集与处理技术引入具有机械专业背景的学生课堂的跨学科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对传统的基于项目的教学模式的实践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竞争学习（Competition-based Learning, CBL）的教学模式，并以基于视觉的移动机器人为教学平台，以巡线为项目任务，以竞速为比赛任务，开展教学实践活动。学期末，通过竞速比赛、实验报告、课堂展示的考核方式以及问卷调查的反馈形式，证明了该教学模式的有效性。^[39]赵金秀对基于 SPOC 的传热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研究与实践。提出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改为线上加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传统的评价模式由期末考核改为过程性考核为主，建立多层次知识点题库和解答反馈机制。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发展，满足了学生传热学课程学习时间和学习需求的同时，显著提高了传热学课程的教学质量。^[40]

八、核心素养下的基础教育教学

吴育飞等对核心素养背景下化学教材中人文意蕴进行研究，分析当代核心素养背景下学科核心素养中人文向度的部分缺失，以美国主流理科教科书《化学：概念与应用》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四则人文意蕴特征明显、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栏目典型案例。通过对其人文意蕴向度的结构性与教学价值分析，获得学科人文智性及其教育的启示，为完善当前学科核心素养内容提供如下参考：一是选材理念上，在教学设计中引入这类栏目的教学资源，发挥人文教育的导向性作用，栏目素材应尽量选取中国学生易于接受的科学人文素材，最好是具有现当代热度的我国

本土资源，避免机械搬运清一色的西方传统文化资源。二是教学准备中，将该类栏目的每个案例小篇作为一个导向性、弹性的辅助教学内容，视为一个载体支点，引导学生围绕载体支点内容进行课前拓展性阅读的方向和范围，奠定该栏目学习前充分且必要的知识基础。三是课程教学中，需要基于具体课程的人文教育目标，从给予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题目思考，到补充相关的背景知识和佐证材料，再到带领学生进行学科人文教育案例的概念解读、内容解构、架构分析，基于内容和学情引导学生做富于其个性化的深层次学习研讨，理解栏目内容辅助性的科学人文教育价值。四是目标达成中，教师可从具象分析到抽象提升，总结提炼科学教育资源中隐性的人文教育价值，让学生感悟体认其中的人文智性与审美，得到人文意蕴的品鉴与深层获得，以跨学科知识实现高中化学课程中科学与人文教育的均衡统一，落实当代核心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41]吴艳梅对新时代学校美育课程的应然价值取向及实践路径进行研究。研究从心理学认知、情感和实践视角出发，新时代学校美育课程的应然价值取向可划分为重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感知美”的认知教育、重在培养创新意识和提升科学人文素养的“欣赏美”的情感教育、重在锻造审美能力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创造美”的实践教育三方面具体的逻辑层次。因此，学校要遵循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并结合美育逻辑层次，分阶段、有侧重地开展相关教育教学活动，即学前教育阶段开展艺术游戏活动、启蒙美育意识；义务教育阶段举办艺术文化活动、鼓励美育体验；高中教育阶段丰富艺术课程内容、增强育认知；高等教育阶段整合公共艺术课程、促进美育实践。^[42]

耿飞对基于小学生音乐实践能力提升的教学进行探索研究，通过对 2020 年以“学生音乐实践能力提升的研究和评价”为主题的河北省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评选活动进行分析，从评选活动的亮点与进步、改进与完善两方面进行了思考，提出以下建议：小学音乐教师要加强理论知识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音乐综合素养；音乐优质课评选在音乐教学中具有导向、规划、调控、评价作用；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课堂教学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实现不能过于说教，

忽视音乐审美教育的过程性、有意性。^[43]李秋石对基于思维渗透的生物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进行研究。研究紧密切合中学生物学课程的专业内容特点,从辩证思维指导下的归纳与概括、系统思维指导下的演绎与推理、历史思维指导下的模型与建模、底线思维指导下的社会性科学议题论证四个维度出发,深度分析发掘课程内容,能够对基于思维渗透的生物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产生积极有效的推动,这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也有着重要促进意义。^[44]

九、信息化与抗疫教学研究

伴随着我国当前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已然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是推动乡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薛国凤等在对河北省 11 市乡村留守儿童及乡村教师的调查中发现,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存在着未把网络使用与育人目标充分结合、对留守儿童缺乏科学的网络教育指导方法、教师网络信息技术整体素养普遍偏低等问题。背后原因涉及乡村教师选拔、在职培训、教师自身认知困境和学习意志等。研究提出建议,更新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理念,重视乡村教师选拔中网络信息技术能力,加强职后培训提升乡村教师融合网络信息技术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的能力,加大专项投入并持续优化乡村学校网络文化环境,引导乡村教师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搭建乡村教师为主体的云平台等对策来提升乡村教师整体网络信息技术素养。^[45]闫鹏展等对在线教育网站黏性提升策略研究。在线教育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特殊情形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在线教育网站黏性不够,存在教学资源质量差、学习效率低、难以吸引学生等问题,如何提高在线教育网站的黏性,吸引学习者开展高效学习,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就在线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的网站黏性提升策略:注重在线教育网站资源质量,加强在线教育网站易用性,丰富在线教育网站交互。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增强在线教育网站的黏性。^[46]

疫情防控常态化给教学模式、教学环境、教学活动带来了挑战,全国高校为实现“停课不停教,在线教学”的要求,全面开展了在线教

学。针对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开展,宿辉等对高校专业课程在线教学的策略进行思考。研究分析了高校专业课程在线教学的开展模式、组织方法以及课堂动员等,对教学路径、载体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学校对教学作如下调整:一是三平台联动,推出了基于学习通平台+腾讯会议+QQ 群的教学平台组合;二是整合教学资源,优化教学内容。通过联系水利水电出版社,学生所需要的电子教材在“行水云课”平台上得以免费使用,通过提前整体布局,进行单元整合,将适合和便于在线教育的内容进行遴选、统合和优化设计,作为疫情期间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三是创新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兴趣,建立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课程评价。充分利用学习通平台的过程记录功能,建立基于行为的过程性评价,将出勤率、学习任务、作业、随堂作业等进行考察记录;与章节测验等结果性评价结合,作为学习过程的最终评价;引入虚拟仿真项目,丰富学生学习内容。取得良好的效果。^[47]李阳对小学在线教学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提出了小学教育在线教学的建议:强化师生互联网思维,适应性调整教育意识;探索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育新形态;完善学习支持服务,培养终身学习理念。并提出小学师生需要遵循“互联网+”规律,强化师生互联网思维,探索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育新形态,帮助学生培养终身学习理念。^[48]

十、产学研校企融合研究

伴随着科技和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对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需求显著上升。王凯等对产教融合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探究与实践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产教融合对高校教学改革的推动作用,指出当前高校产教融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高等教育改革的驱动力;企业缺乏参与高等教育动力;双师制的实际效果不佳。研究提出相应对策:需要产业与教育融合,只有二者双向发力、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实现产教融合;建立需求导向的闭环合作模式;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加深与地方政府的合作。^[49]吴娜等对新时代背景下地方高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进行了研究。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聚焦教学和人才培养改革”为核心,通过探讨高校与企业如何合作互补,给出了新时代地

方高校产教融合的指导思想,提出新时代“一头两阶梯”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研究探讨了高校如何与地方企业协同构建复合型、工程化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及实践能力培养,并以唐山学院车辆工程为例,建立了新时代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教学模式。^[50]

(孙雪:石家庄学院讲师;
邢秀茶:石家庄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静,范明丽.韩国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职前培养的现状启示——基于对韩国63所大学学前教育专业融合教育课程的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21(7).
- [2]陈庆合,李军,王海军,支子.芬兰“现象教学”对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启示[J].职教论坛,2021(7).
- [3]王剑锋.我国职业教育校本课程及其治理探究[J].职教论坛,2021(2).
- [4]刘育兵.生命哲学视域下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3).
- [5]龚继峰.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化模式探析[J].文化学刊,2021(7).
- [6]刘晓晨.河北历史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8).
- [7]王钟杰,王晓亚.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力提升策略研究[J].中国多媒体网络与网络教学学报,2021(11).
- [8]赵青.智慧型校园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途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3).
- [9]阴冬胜.课程思政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实践的路径设计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21(16).
- [10]冯利伟,刘旭东.唐山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堂的建设研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4).
- [11]魏勃.抗疫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政课的实践探究——以“形势与政策”课为例[J].党史博采,2021(5).
- [12]段秀芝,户立春,徐园园.“大学物理”课程中课程思政教学探究——以“薄膜干涉”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21(10).
- [13]杨双菊.思政教育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融入策略探索[J].校园英语,2021(52).
- [14]刘志敏,薛红梅,申艳光.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大学计算机通识课程教学改革[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21(3).
- [15]赵安周,张安兵,赵玉玲.新工科和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测绘工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21(2).
- [16]白梅,潘嘉杰,连海涛,张金江.以架构思维培养为目的的大跨建筑设计教学改革[J].建筑设计研究与教学,2021(3).
- [17]窦新宇,王玉娜.SWOT分析法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研究——以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为例[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21(2).
- [18]李欣,周继岩.以应用能力为导向的国际工程外语人才培养路径探析[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1(6).
- [19]田云明.基于OBE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日语专业翻译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以唐山学院为例[J].唐山学院学报,2021(6).
- [20]于平,贾永亮.浅谈信息技术视域下的“金课”建设[J].大科技,2021(11).
- [21]刘剑,赵文武,王秀文,陈瑞军,刘进强,郁建元,郝斌.“新工科”背景下无机材料物理性能“金课”建设研究[J].山东化工,2021(10).
- [22]杨丽娟.基于CNKI数据的金课研究可视化分析[J].唐山学院学报,2021(3).
- [23]张晓蕊,朱望东,马晓娣.“三位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EKGSIE课程体系构建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21(3).
- [24]高向杰,朱鹏举.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通识教育培养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1(2).
- [25]孙军英.新工科背景下基于竞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与实践[J].科技视界,2021(24).
- [26]王永颜,郭鹏慧.家政学学科建设研究的回顾、反思及建议[J].山东高等教育,2021(4).
- [27]李川,刘敬华.化学系统性思维的表征手段与改革实践[J].化学教育,2021(11).
- [28]李哲,张黎广.河北高校应用型俄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J].教育教学论坛,2021(27).
- [29]马红霞,彭焱,郑海英等.基于OBE理念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混合式课程体系构建[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30]高崇一,魏云平,戴俊等.基于OBE理念的“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唐山学院学报,2021(11).
- [31]康巍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1(5).
- [32]秦辉.浅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策略[J].海外英语,2021(10).
- [33]马玉改,郑树伟.基于合作学习的混合式教学设计研究——以地球概论课程为例[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6).
- [34]王旭影,王润生,杨建.基于翻转课堂的“工程地质”课程教学设计与评价[J].唐山学院学报,2021(6).
- [35]齐丽娜,许丽雅,马素慧等.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本科生学习投入在网络学习参与度与学习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21(10).
- [36]刘剑,赵文武,刘进强等.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创新实验教学设计——以硼酸钇光催化剂的探索制备为例

- [J]山东化工,2021(4).
- [37]吴振华,袁书琪.地理核心素养视角下县级博物馆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以曲周博物馆为例[J].地理教学,2021(1).
- [38]曹玉霞,黄雁,陈瑞军.“互联网+”背景下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双语教学——以《材料概论》课程为例[J].山东化工,2021(21).
- [39]刘佳,刘红宁.基于 CBL 教学模式的移动机器人巡线课程[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6).
- [40]赵金秀,周红星,王春慧.基于 SPOC 的传热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1(2).
- [41]吴育飞,林长春.核心素养背景下化学教材中人文意蕴的分析与启示——以美国教科书《化学:概念与应用》为例[J].化学教育,2021(15).
- [42]吴艳梅.新时代学校美育课程的应然价值取向及实践路径[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1(6).
- [43]李秋石,关亚萌.基于思维渗透的生物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J].生物学教学,2021(7).
- [44]耿飞.基于小学生音乐实践能力提升的教学探索——2020 年河北省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评选活动综述[J].教育实践与研究,2021(7).
- [45]薛国风,王明,田二配.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基于河北省 11 市乡村留守儿童网络使用的调查[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1(3).
- [46]闫鹏展,毕玉佩,谢昊.在线教育网站黏性提升策略研究[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1(19).
- [47]宿辉,马秋娟,胡宝文.高校专业课程在线教学的策略与思考[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1(1).
- [48]李阳.小学在线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疫情时期 25 所小学在线教学的问卷调查[J].教育探索,2021(7).
- [49]王凯,陈聪.产教融合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探究与实践[J].现代交际,2021(17).
- [50]吴娜,刘超,张卫国.新时代背景下地方高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以唐山学院交通与车辆工程系为例[J].中国科技产业,2021(10).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贾文彤

摘要:2021 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在体育产业方面,关注的重点是关于体育赛事和冰雪运动及相关产业发展等较为具体且顺应奥运时代的话题;在体育法学研究上,对体育法律结构和足协改革管理应对办法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在传统体育与体育文化方面,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传统武术的赛事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在学校体育方面,关于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实施和体育训练的方法与技巧的研究比较多;在大众体育方面,对农村体育及青少年体育发展进行了研究。相较之下,2021 年度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对于体育伦理、体育哲学、体育史学等方面的内容关注有所不足。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关系和基本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近年来,随着我国体育训练与教学等水平的提高,体育人才的培养也有了明显进步,体育人才的增多带动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进展,体育人文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体育事业更加合理有序发展,参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人员日益增多、研

究成果不断增加。因此,在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今天,体育人文化社会学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与良性运行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对 2021 年度河北省有关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汇总与分类,以此为研究对象,从发文数量、研究内容等方面对学科领域研究进行分析,厘清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内容的共性和不足,对其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评析,力图对 2021 年度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进行总结与概括,为 2022 年度研究工作做好铺垫,以期为推动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给予广大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高校体育教师以及其他相关的体育从业者以理论与方向上的借鉴。

一、2021 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概述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当前我国体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比拓展体育的生物学功能学说内涵更为丰富的人文体育学说的发展是我国体育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021年度河北省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就研究数量上来讲,比去年略有增多;在研究方法上较以往有了新的突破与进步;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时代特征较为明显。

就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看,过去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大都以调查问卷法为研究起点,调查社会状况,继而分析出现问题,给出解决答案。在2021年度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出现了田野调查法与实地调查法,真正做到理论来源于实践,辅助于实践,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如许鹏展在《河北海洋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现状及对策研究》一文中,对河北省海洋体育与旅游的现状进行调查,到相关旅游景点考察海洋体育设施及其影响范围,搜集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得出了可以促进河北省海洋体育与旅游发展的措施。^[1]姚冰在《张家口冰雪产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研究》一文的撰写中,对其中的产业现状部分进行调查,深入街头巷尾去调研,小到有关卖冰雪运动装备的小店,大到冰雪运动场馆,再到制造冰雪装备供应企业,一一调查总结出了张家口市的冰雪产业发展现状。^[2]

在研究内容上也表现出一种突破,具体体现在研究内容的跨界与结合:贾文彤在《社会权力语境下我国体育法学结构变迁研究》中,把社会学中的概念(社会权力)迁移到体育法学中来,把社会权力的概念、释义、性质、运行条件与规则等迁移到体育中来,为体育法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提出要变革组织结构体系、重塑体育行政行为、完善体育行政救济责任体系等措施来促进体育法学的发展。^[3]李磊在《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一文中,把计算机领域的知识应用到体育领域中来,实现了互联网与冰雪运动产业的结合,应用互联网知识来构建河北省冰雪运动新赛事体系,改变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的消费结构,使“互联网+”为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商业趋势,从而构建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的新生态系统。^[4]王海军在《基于“体医融合”的一流运动康复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一文中,把运动康复与医疗结合了起来,他认为以往的课程设计没有真正实现体育科学、康复科学与医学的有效融合,在“体医融合”和建设“国家一流专业”的背景

下,运动康复人才要求愈来愈高,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体系的建设水平和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该研究运用行动研究等方法对运动康复专业课程体系进行研究后,构建出了“体医融合”的运动康复专业课程体系,为开设运动康复专业高校课程体系建设提供参考。^[5]

研究内容的时代性明显,体现在2021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成果是围绕即将要开展的冬季奥运会进行的,与冰雪主题相关的研究很多,冬奥会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比拟的资源,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者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即将举办之际,展开了与冬季奥运会密切相关的冰雪项目的研究与应用。

二、2021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具体领域分析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的学科,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培养优秀体育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通过整理与分析,2021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体育产业、体育法学、体育教学与课程、大众体育与公共体育、民族体育与体育文化。以下从这五方面来分析2021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情况。

(一) 体育产业

体育产业作为一种绿色产业、新兴产业、健康产业,连接着生产、服务和消费,正在日益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临近,中国冰雪产业已来到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公众关注高、增长潜力大、产业带动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2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对冰雪运动产业的研究也是占据了体育产业研究的半壁江山。如闫磊磊在《北京冬奥会推动京津冀冰雪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一文中,分析了京津冀冰雪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机遇,对京津冀冰雪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做了梳理,并基于此从发展政策、资金体系、部门合作、整体观念、人才培养五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冰雪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6]孙玉龙在《冰雪体育产业发展视角下校镇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一文中,认为无论是从冰雪体育产业发展还是体育院校自身发展需要出

发,河北省体育院校与张家口冰雪小镇都有合作的必要,并认为利好的政策支持是河北省体育院校与张家口冰雪小镇合作的保障、良好的冰雪发展环境是两者合作的助推剂、优势资源互补是两者合作发展的前提、前期的服务对接是两者合作的基础。^[7]张宁在《冬奥背景下张家口冰雪旅游发展探析》一文中,认为张家口冰雪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也有良好的政策支持,对发展冰雪旅游产业很有优势,提出发展冰雪旅游有提升城市形象、促进经济发展、健全基础设施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发现张家口市的冰雪旅游产业面临的市场调控难、奥运会后冰雪场馆利用率下滑、生态压力大等问题,并基于此提出了要加大政府协调与市场管控、突出冰雪特色加大群众参与、培养专业队伍,完善基础设施的应对措施。^[8]王春雷在《后疫情时代河北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困境与路径》一文中,认为河北冰雪产业是现阶段河北经济的引擎、河北乡村振兴的发力点、作为体育强省的重要保障,积极的产业政策下河北冰雪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也面临很多困境,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提出了全面的应对策略。在宏观上,要立政策调市场,提质增效,完善政策落地保障机制,扩大群众冰雪运动消费,加大对企业的扶植政策,提高相关企业抗风险能力;在中观上,要完善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聚集融合(产业链升级、集聚效应、数据平台);在微观上,要加强合作共赢与多元化发展,提升冰雪运动行业的服务质量(强化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多元发展避免淡季无收入、引入国际规范提高管理水平)。^[9]赵晓红在《秦皇岛市冰雪产业发展研究》一文中,认为当前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场地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冰雪运动人才的全面培养、冰雪项目丰富、冰雪旅游业、冰雪制造业发展势头好的冰雪产业繁荣发展现状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如供给不平衡、室内滑冰馆建设不足,冰雪场馆配套设施不完善、冰雪人才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不足的问题,所以基于此提出了要研制、出台冰雪产业行业标准和管理办法,冰雪场馆建设要遵循绿色、经济、环保可持续原则,多渠道实施冰雪人才分类培养计划,加强“冰雪+旅游+文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冰雪场馆可持续化运营和发展的应对策略。^[10]总的来说,就现有的对冰雪产业的研究

成果来看,他们对河北省内的冰雪产业的发展情况描述清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冰雪运动和旅游产业的共识,都认为当前的冰雪产业运行存在一些问题,如专用人才不足、扶持政策和保障机制不到位、冰雪资源尚未完全开发、冰雪产品层次缺乏多样性等,并且都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可行的改进措施,为河北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对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的发展到了积极助推作用。

在体育产业框架之下,对体育旅游的研究也占有一定的份额。武琳娜在《河北省体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一文中,认为乡村体育旅游的时代价值在于体育旅游可以挖掘并体现出乡村的文化价值、可以适当地调整乡村的经济结构,认为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政策鼓励与扶持社会的协同发展、探寻新的体育旅游产业形式、培养体育旅游运营商和经营性体育旅游人才等方式来促进体育旅游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11]姚冰在《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体育—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一文中,综合考虑了河北省张家口市体育、旅游、文化丰富性与区域性特点,从规模、效益、企业机构和从业人员4个维度,对张家口市体育—旅游—文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建立协调度影响因素模型,深入解析体育—旅游—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得出了以下结论:体育—旅游—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状况逐年均呈现出稳步发展态势,其中旅游产业发展速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体育—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也刚步入起步阶段,需进一步加快三大产业间融合发展力度,加快融合发展步伐;要做到体育—旅游—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需重点做好张家口市境内公路里程、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进一步提升,以打造出“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消费新生态体系,培育张家口市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疫情常态化及后奥运时代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12]

体育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也亟须相关社科研究工作者不断丰富体育产业经济这一领域的理论构建,2021年度关于体育产业的研究对于促进河北省体育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体育法学

相较于体育产业来说,2021年度河北省关于体育法学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在研究主题上虽相对分散,但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贾文彤在《社会权力语境下我国体育法学结构变迁研究》一文中,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对体育法学中的关键要素——社会权力进行了解读,在对社会权力的概念释义、性质、运行条件与运行规则了解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包括变革组织结构体系、重塑体育行政行为、完善体育行政救济责任体系在内的对体育法学结构优化的措施。^[3]黄璐在《体育活动侵权适用自甘风险条款的规制与限度——基于〈民法典〉第1176条的分析》一文中,对《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的立法进展和司法实践进行阐述,并且对关于体育活动侵权的重要字眼如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司法认定、法律意义上的“故意伤害”等进行界定,文章专业性较强,对于体育活动侵权事件的解释能力很强。^[13]在黄璐的另一篇文章《自治视域下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研究》中,对中国足协调整改革的基本定位与全新布局进行了概述,认为中国足协改革是“政府授权”和“社会赋权”的高度统一,提出要从优化领导机构、专项委员会的自主权建设、注重专业人才建设方面优化足协改革,也从法律机构的实体化、法律机构任职人员的独立性方面对足协改革提出建议,给中国足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建议。^[14]

总的来说,虽然2021年度河北省关于体育法学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较为有限,但专业性较强且具有一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三）体育教学与训练课程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国对于素质教育和全面教育愈发重视,对体育教育和课程设置更为科学合理。2021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中,对体育教学与课程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关于具体的运动项目教学和训练研究。

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角度。林锦蛟在《体育教学与文化教育有效融合提升的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高校体育教学面临着新形式

改革,这为“四位一体”目标体系下高校体育教学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在当今高校体育教学教育改革迫在眉睫之际,高校体育教学需要不断地加深与文化教育的融合,并由此对高校体育教学和文化教育的融合策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加强师资力量,提高高校体育教师的整体素质、更新体育教学理念;提高学生重视度、加强师生之间的有效联系,实现师生两者的共同进步、完善体育教学的方法;以文化教育促进体育教学、优化体育教学与文化教育的评价体系,促进改革和改进措施科学化等改革措施,给高校体育教学带来一定的参考意义。^[15]连克杰在《论增强体质为导向的学校体育教育改革与实践》一文中,认为我国学校体育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快乐体育、终身体育、健康意识等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学生体质这一根本目标和指标却反映出这些尚未落实到位。作者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为教学内容,体育与健康的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结合国内外学校体育研究成果,探讨了我国当前学校体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以增强体质为导向的学校体育教育所起的理论作用,旨在提高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者对体质概念和意义的认识,初步奠定学校体育的理论基础,使学校体育工作更好地得到发展。^[16]崔冬雪在《运动参与目标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达成的方法》一文中,分析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运动参与”的解释,从运动参与的程度、态度、情感和效果四个方面对运动参与进行了本质探讨,认为“运动参与”更应重视参与的质。而后提出“利用场地、器材;任务驱动,过关升级;单元主题固定,课时条件多变;改进评价方式”的方法来激发和保持学生运动学习的兴趣,提高运动参与的质量。另外,借用日本小学体育教学中使用的学习卡,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并发现不足,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对于小学体育的科学授课有很大的指导意义。^[17]

在具体的运动项目训练和教学研究中,季彦霞在《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快乐体操创新发展研究》一文中,通过文献资料法,以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分析了快乐体操的价值与发展的局限,提出创新发展路径。认为,快乐

体操对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培育价值明显,但存在内容不完善、器材缺乏多样化、育人价值体现不足等发展局限,需要以深化内涵为基础,以创新内容为核心,以改革教学方法为重点,以丰富器材为突破口,以完善评价体系保障的多维度的创新;研究以快乐体操滚翻类动作教学辅助器材创新为例,刺激学生快乐学体操,这对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方面效果显著。^[18]张建永在《高校网球“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一文中,认为我国高校网球教学仍然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课时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等方面。因此,基于网球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根据社会对复合型网球人才的需求,首先对网球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的现代教育课程理论基础与重要意义进行分析与探讨;其次对当前我国高校网球课程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对高校网球“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具体构建方法进行探索,以对当前我国高校网球教学现状进行有效改善,以期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社会复合型创新性网球人才的培养需求。^[19]孙海泉在《青少年冰球运动员培养模式研究》一文中,认为我国冰球运动发展的起步阶段较为困难,特别是对青少年冰球运动员的培养没有形成完善且科学的培养体系,此文旨在对我国青少年冰球运动员的培养模式进行研究、阐述和分析,从而找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举措,为促进我国青少年运动员实力提升和冰球运动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在文中指出冰球运动存在加入冰球运动门槛过高、冰球教练员质量参差不齐、冰球运动市场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并基于此提出降低加入冰球运动的门槛、建立专业的冰球培训体系、创造健全的冰球发展市场等对策建议,推动我国冰雪体育运动健康发展。^[20]

在体育教学与训练课程中,无论是从具体的一个运动项目的训练课程来讲,还是从整体大的方向来研究体育教学训练,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有涉及,其中体操球类等运动项目的教学模式也有所创新,这对河北省开展体育教学与训练课程工作的意义重大。

(四) 大众体育与公共体育

随着健康中国、健康促进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的颁布和实施,国民对健康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也随之加强,随之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项目、内容、质量要求也会相应上升。2021年,河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对大众体育与公共体育相关问题也有所涉猎,为促进全民健身的发展和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贡献智慧。

刘少强在《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制度困境与对策》一文中,提出农村体育发展制度困境表现在路径依赖(指令化管理模式、制度存续的历史惯性、“被组织化”决策机制下、城乡二元供给结构限制)、制度约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建设不足、正式制度的缺位、非正式制度的边缘化)、文化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动不畅、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现代文化融入不充分)三方面,针对制度困境,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即破除依赖:顶层设计与基层需求表达的互融共通;制度强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供给(强化正式制度、深入挖掘非正式制度);文化互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深入整合(实现现代体育文化与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认同、借鉴现代体育文化传播方式发展传统体育文化),对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1]韩立明《河北省家校社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一文中表示,随着“体教融合”以国家战略的形式出现,新时期我国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越来越成为素质教育的核心组成。然而,近年来国内青少年健康问题正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包括超重、肥胖、营养不良、速度与力量发展接近停顿等,日渐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面影响。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既有不良抚养与生活方式,也有学校教育缺少对体育运动的足够重视。因此,家长、学校和社会应深度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既要学校教育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定,又要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提高家庭成员认识水平,还要构建联动机制,强化家长、学校和社会互动,夯实课外运动基础。^[22]

(五) 民族体育与体育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党和国家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适应国内国际大局,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进行新的探索的科学文化成果。同属于文化范畴的中华优秀传统体育

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传承至今,其独特的锻炼形式与价值也被当今世人所瞩目。在2021年,河北省对民族体育与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分布于对传统体育中的武术、摔跤的研究,以及关于体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研究。

刘志鹏在《武术进校园的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一文中,梳理了“武术进校园”的相关政策,探究了当前的问题,简述了研究区域与内容,分析了研究趋势,升华了武术价值,统计了策略,发现武术进校园发展的局面仍不乐观,并提出了贯彻“武术进校园”政策的建议,以期为武术进校园的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23]付建宏在《河北省民间体育赛事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以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为例》一文中,从历史沿革、活动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对沧州武术节的现状进行说明,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与沧州文化、经贸、旅游等领域资源整合在一起,发现其存在竞技化、功利化,忽视体育人文开发,缺乏人才,宣传单一,受众不广等不足。基于此,提出政府要提高对民间赛事的重视,相关单位要健全民间体育赛事组织体系,建立起稳定化、常态化、专业化的组织运营机构;相关单位要发挥项目优势,打造特色品牌赛事;相关单位要加强民间体育赛事的市场开发,促进赛事产业化发展;相关单位要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传播渠道等解决措施,进一步促进了沧州国际武术节的发展。^[24]李杰等在《中国式摔跤在新时代学校体育中的价值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式摔跤是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性项目,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统体育进校园的背景下,将中国式摔跤的项目特点与体育课程目标联系起来,分别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出发,探讨中国式摔跤对于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得出中国式摔跤是一项可以使青少年实现强健体魄、心理健康发展、锤炼意志品质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体育运动。在学校体育中推广中国式摔跤对于新时代青少年树立文化自信,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25]

在体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岳志荣等在《论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在思想根

源、内容体系、价值目标等方面的高度契合性决定了二者具有相辅相成、共生互促的逻辑关系。正确理解这一关系,不但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使二者共同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发挥应有的作用。作者以二者共同的思想根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出发点,从二者内容体系相融性、“以人为本”的先进性、价值目标一致性方面进行探讨,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契合。^[26]岳志荣等在《河北省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工程路径研究》一文中,从四个方面构建了河北省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的工程路径,即从政府层面构建政府主导的传承发展机制,为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大力加强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高质量传承与发展的队伍建设,为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必需的高素质的人力支撑;构建河北省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教育路径,打造文化传承的主阵地;开发河北省优秀传统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旅游产业路径,在提升河北省文化实力的同时,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27]

三、2021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小结与建议

总的来说,尽管2021年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是丰富的,但是研究深度还不够,对于深层次问题和热点类问题的剖析关注度较低,且研究是不平衡的,体育产业研究一枝独秀,体育法学与体育伦理等的研究略微逊色。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较少,学术研究多集中于现状研究,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应扩大研究人员队伍,实现科研人员层次合理化,同时进一步加强研究深度,挖掘新时代体育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众所周知,体育竞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热门的竞技领域,要促进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就需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面,突出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意识和问题意识,不断更替新研究理念,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更贴近实际,更好做到体育人文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最后,笔者连续写了两年的河北省年度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综述,深受稿件匮乏之痛。实话实

说,河北省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认识不断加深、加强,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联项目中体育项目的不断增加,这其中不乏好项目。这些项目能够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顺利结项。笔者强调的是,除了这些好项目,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关系项目,这些项目难出好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长此以往,影响的是整个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

客观讲,河北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

(贾文彤: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许朋展,武琳娜,尚宁宁.河北海洋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现状及对策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14):12-13.
- [2] 姚冰,何潇蓉,张涛.张家口冰雪产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3):53-56+71.
- [3] 贾文彤,杨金田.社会权力语境下我国体育法学结构变迁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1,35(02):1-5.
- [4] 李磊,郑弘溶.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新生态系统的构建[J].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1,(21):23-24.
- [5] 王海军,陈庆合,王大江,等.基于“体医融合”的一流运动康复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1,11(14):250-252.
- [6] 闫磊磊,谢君,任立峰.北京冬奥会推动京津冀冰雪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科技资讯,2021,19(07):191-193.
- [7] 孙玉龙,石鸿儒,郭强.冰雪体育产业发展视角下校镇合作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21,11(13):247-250.
- [8] 张宁,武显治,孙佐枫.冬奥背景下张家口冰雪旅游发展探析[J].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1,(05):7-8.
- [9] 王春雷,李阿建.后疫情时代河北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困境与路径[J].邢台学院学报,2021,36(03):123-129.
- [10] 赵晓红,武琳娜,李紫璇,等.秦皇岛市冰雪产业发展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01):15-16.
- [11] 武琳娜,范淑娟,刘志爽.河北省体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J].科技资讯,2021,19(25):174-176.
- [12] 姚冰,何潇蓉,肖钦文.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体育—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3):17-24.
- [13] 黄璐.体育活动侵权适用自甘风险条款的规制与限度——基于《民法典》第1176条的分析[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1,35(02):6-13.
- [14] 黄璐.自治视域下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1,35(04):15-23.
- [15] 林锦蛟.体育教学与文化教育有效融合提升的策略研究[J].文化产业,2021,(32):89-91.
- [16] 连克杰,王星明,孙绍生.论增强体质为导向的学校体育教育改革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1,(41):18-21.
- [17] 崔冬雪.运动参与目标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达成的方法[J].体育教学,2021,41(05):32-35.
- [18] 季彦霞,吕万刚.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快乐体操创新发展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47(01):50-55+100.
- [19] 张建永.高校网球“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1,11(26):84-86.
- [20] 孙海泉,马佳园.青少年冰球运动员培养模式研究[J].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1,(02):1-2.
- [21] 刘少强,侯京卫,乔璐,等.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制度困境与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21,(08):27-33.
- [22] 韩立明,杨建丰,谢朝波,等.河北省家校社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J].作家天地,2021,(09):172-173.
- [23] 刘志鹏,贾志军,吕丹,等.武术进校园的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J].中华武术,2021,(06):90-96.
- [24] 付建宏,刘志红,徐龙彪.河北省民间体育赛事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以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为例[J].体育视野,2021,(14):16-17.
- [25] 李杰,韩立明,闫当岩.中国式摔跤在新时代学校体育中的价值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2021,36(04):130-135.
- [26] 岳志荣,梁颖杰,王海军,等.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J].当代体育科技,2021,11(30):171-173.
- [27] 岳志荣,梁颖杰,赵晓红.河北省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工程路径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11):13-14.

文 学

语言学研究

侯晓舟

2021年度河北省语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统计,河北省相关学科领域教学、科研人员公开发表论文550余篇,出版译作及专著60余部。研究成果涉及汉语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外语教学以及翻译等方面。

一、汉语语言学研究

汉字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汉语疑难字的考释方面,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项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杨宝忠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大型字书疑难字汇考”的资助下,充分结合已有史书与历史文献,对疑难字的可疑之处提出疑问,并进行考证。^[1]文章以大型字书收录情况及其原始出处为依据,联系其异形词的考察、曾经误写的历史进行说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六朝石刻具有多方面研究价值。目前,其史学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而语言文字和文献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梁春胜作《六朝石刻丛考》一书,主要从释录校正、字词考释、石刻辨伪等方面开展工作,纠正前人释录方面的错误,考释疑难字词,鉴别伪刻和疑伪刻,从而为学界研究这一时期的石刻提供参考。^[2]全书共考释疑难字700余个,疑难词语和典故词语100余条,校正释录方面问题2000余条,鉴别伪刻70余方。尤其在疑难字考释方面,运用科学的文字考释方法,考释出一批前人不识或误释的字,是本书一大特色。

汉语语言研究主要涉及汉语的词汇研究、语义研究、语法研究、语体研究和音韵研究等。而词作为语言系统中最为活跃的语言要素,受到广泛关注。因此,作为一门独立且新兴的学科,河北省汉语语言相关的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词汇学的本体研究。

冯军伟对句末语气词“就是”的语气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探讨了“就是”不同语气类型之间的语义关联,以及“就是”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路径及其语义演变路径,并对“就是”与“就是了”和“就是啦”语气类型分布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与说明。^[3]研究发现,“就是”有表达确认、表达建议、表达强调、表达说话人“言轻言小”的认识意义和表达缓和语气五种语气功能,体现了由强到弱的气语变化。而这种语气强弱的不同,源于短语“就是”中的词汇项“就”和“是”词汇意义的语义滞留的不同影响。此外,通过对比“就是”与“就是了”和“就是啦”语气类型分布的异同点,发现它们的气语类型分布体现出相近的优选顺序,但也有微小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就是”在回忆性自述语体中还具有标记自述者视角和自述者态度的话语功能。

字符位置信息加工是词汇识别的重要环节。在中文阅读过程中,为了进行词汇识别,需要对字在词中的顺序进行加工,即汉字位置加工。顾俊娟和石金富对词边界与汉字位置加工关系进行深入考察。^[4]作者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在自然阅读中系统探讨如下三个问题:(1)词的首/尾汉字如何调节汉字位置加工过程;(2)嵌套词和歧义词边界如何影响汉字位置加工;(3)语境合理性和预测性如何影响汉字位置加工的词边界效应。本项目将为首个中文汉字位置加工模型的建立提供数据支持和科学基础,推进现有的中文词汇识别和词切分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并为词汇的高效率教授与学习提供科学指导。

汉语词汇学一般把词义划分为概念义和色彩义两个部分,“褒贬色彩”是汉语词义构成分析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同时,作为“色彩义”属概念之下的一个种概念,具有“色彩义”所具有的附着性特征。

张莉和邹朝倩在简要梳理学界对“褒贬色彩”已有认识的基础上,以逻辑学关于概念及其定义相关知识为指导,尝试给予“褒贬色彩”概念更为清晰的定义,即词的褒贬色彩是附着在词的概念义上,表现说话人对于词所反映的事物现象的肯定或否定态度的词义内容。同时,研究运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分解名词的概念义,在十一种概念义语义成分范围内,探寻其中能够附着褒贬色彩的语义点。^[5]研究发现,有七种概念义语义成分表现出了附着褒贬色彩的能力,包括名词所表事物及其行为所关联的主体和客体,名词所表事物的功用、来源,以及名词所表事物特定动作行为的目的、方式和量度。作者认为,这七种语义点能够附着褒贬色彩,究其本质,是它们所表现的要素不仅拥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这是词以概念义上附着褒贬色彩的词义形式来表现说话人主观评价所必需的基础。此项研究有助于使褒贬色彩的辨识更具操作性、更加客观化。

释义提示词一直都是辞书编纂者和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但目前对释义提示词的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袁世旭、许蒙蒙和郑振峰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辞书信息数据库的中国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的支持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他们穷尽统计,并对比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第6版中,释义提示词的使用和修订情况,并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6]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修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在释义提示词的使用方面更是精益求精。但是,由于修订的工作量过大,既要考虑到个体使用的准确性,还要考虑到群体使用的系统性,难免会有疏漏。因此,修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文章还提出了相应建议,认为辞书释义时,应尽量控制释义提示词的使用,需要使用时应坚持专用性和系统性的原则。该研究有助于为汉语语文辞书释义提示词的研究提供参考。

音韵研究主要针对现代音韵和古代音韵两个方面,对现代汉语音韵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现代汉语语音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语音,促进语言实践。对古代汉语音韵进行研究,有助于通过其与汉语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入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

田玉琪对以往的词韵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

现,以往的研究较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且主要是纯粹语言学成果,对其文学特征涉及不足,因而她试以入声韵为例,对入声韵部及文学声情在唐宋词调的历史发展演进情况作了详细探讨,主要包括唐五代词调入声韵的使用及其与词体的关系、北宋词调入声韵的使用与词体关系以及南宋词调入声韵使用的稳定与发展。^[7]认为,在入声韵与词调的具体联系及文学特征方面,唐五代词人对入声韵的使用显然较为粗疏。进入北宋,入声韵与词调开始逐步建立密切的关系,表现出特有的文学声情。南宋词人一方面使大量的北宋入声韵词调保持稳定甚至流行,另一方面又创制了不少新的入声韵词调,使入声韵词调在特定时代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作者认为,关于词调入声韵分部的讨论,虽然貌似仅属于语言学的范畴,但也是实实在在的文学内容,因此,应将其推而广之,全面研究中国其他韵文学,如诗、曲、赋等,为词体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价值。

随着数据处理和文本研究新技术的提高,利用技术手段研究音义信息,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此类型研究的解释力,推动了定量分析在此领域研究上的应用。

注疏类典籍是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音义材料是汉语语言学和汉语音义学研究的重要依据,但是,音义材料的非结构化特征不利于计算机提取和挖掘相关材料。姜永超和黄仁瑄以李善注《文选》为例,在遵循标注广度、深度、准确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从技术实现角度,比较XSLT可扩展样式表转换语言、Python+XML文本、Python+语义标注文本、典籍文本音注特征等四种音义信息提取方法,详细论述了标注的过程和音义材料的提取方法。^[8]研究认为,从准确性看,前两种方式既能发现音义信息的关联和层次关系,又易于发现音义信息的聚类状况,第四种提取方式无法满足研究需要。注疏类典籍标注既是注疏类文献语言研究的基础,也是机器自动标注和发现的前提。

近年来,河北省汉语语言学专家对省内方言研究尤为重视,特别是方言的语音描写和分析研究方面。郑莉等人撰写的《衡水桃城区方言研究》是《河北方言研究丛书》系列的第三本,是河北衡水桃城区方言的单点研究。桃城区方言

内部在语法、词汇方面存在较小差异,但在语音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且桃城区方言目前尚无系统描写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论著,散见的调查记录或专题研究也很少。^[9]本书是第一部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对桃城区方言进行共时描写的论著,将桃城区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进行比较,归纳了桃城区方言声韵调演变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核心话语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窦星辰和黄云明对语言进行了深刻论述。^[10]认为,为建构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优化话语体系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注重话语体系的哲学和社会历史属性,创新话语体系的传播方式,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文章形成了关于语言的实践属性、阶级属性、话语功能的比较系统的语言观,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南、价值引领和方法论指导。

汉语语言学的其他研究成果还有田玉琪《北宋词谱(上中下)》,冯军伟《现代汉语心理动词构式的认识情态研究》,刘振英《〈朱子语类〉文章学研究》等著作。河北省汉语语言学研究进步显著,但未来仍可从新方向、新技术角度进行突破,希望河北省专家学者紧跟学术前沿,积极投身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撰写出更多高质量的文章。

二、汉语文学研究

河北省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古诗、现当代诗歌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首先,学者们深入研究和分析了我国古代各类文学作品。杜志勇读闻一多讲《庄子》的笔记后,认为闻一多先生讲授《庄子》的笔记,透露出一位学者融讲课、板书、绘画为一体的才华和谦虚谨慎的治学风格。^[11]笔记以《庄子内篇校释》为基础,阐发了闻先生对《庄子》哲学及文学的认识,更加完整,也更加深刻。

尹策对唐修《晋书》所载张华获龙泉宝剑的故事进行了研究。^[12]他认为,就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其有与史实相合的现实要素。当然,该故事的虚饰成分远多于现实要素,张华所

获之剑与古代名剑无关,是时人为彰显故事的神异性而附会了各类名剑传说。除此以外,唐修《晋书》记述张华获剑的故事,并不只是表现张华的“博物”,独立的故事单元呈露出的宿命论思想,与传主张华之现实命运交相辉映,使《张华传》具有了更为打动人心的文学效果。

胡丽娜以危素《金华柳先生文集序》为中心探讨了元明之际金华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文章观。^[13]金华学派自许谦后,柳贯、宋濂、戴良等人由理学家转为文人,这是从黄百家开始学界对金华士人递嬗特点的普遍认识。但作者认为,对士人人生遭际的表层印象并不一定符合士人主观的身份认同。他们都以儒者自命,坚守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或出仕行道,或尝试寻找儒与文的折中点,具体到文章观上,就是主张“道之文”,坚持为道德仁义与礼乐刑政立言。虽然在方式上有所妥协,但积极行道的用世精神却从未动摇。

郭英德研究分析了明末清初时期唐宋古文地位的确立,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成果。^[14]作者认为,在明末清初近百年的文坛上,秦汉文、六朝文和唐宋古文三种散文典型鼎足而立,此消彼长,各领风骚。经由明末清初士人群体的倡导和践行,唐宋古文逐渐超越秦汉文、六朝文,成为文人的归趋、文体的正统、文章的矩范和文法的渊藪,从而确立了在文坛上的首要地位。明末清初唐宋古文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古典散文典型的重新建构,标志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全面崛起,也标志着正统文治权力的复盛兴隆。

李金善、高晨曦对黄文焕《楚辞听直》展开了研究。^[15]认为,黄文焕的《楚辞听直》仅选屈赋作注,且篇目次序遵从“意法同原”的原则,即行文章法结构与情感精神抒发皆切近屈原,与众楚辞注本殊异。注本首次明确将屈原生平与选篇序次联系起来,奠定了明季至清代注重考据屈原生平及流徙历程的基调,对后世注屈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古诗和现当代诗也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任文京对唐诗选本《御览诗》进行了研究。^[16]在唐代的唐诗选本中,唯《御览诗》系令狐楚奉诏编选,这一点与其他选本具有明显的不同。《御览诗》的编选宗旨,令狐楚未在选本的

前言中加以说明,史书也无片言记载,故而后世评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作者结合唐代的诗风演变、唐宪宗的诗歌雅好、牛李党争以及令狐楚所处之环境等因素,分析令狐楚选诗“引嫌避讳”而又委婉寄托的审慎心态。

石勒言探讨了方回与元初江湖诗人。^[17]江湖诗人在元初的政治背景下内涵变得模糊,但仍是一种重要的诗人群体。这一时期方回《桐江续集》沿用晚宋以江湖诗集为代表的坊刻出版方式,在长达 20 年的时段中持续地向文坛散播自己的影响。同时,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通过各种途径批判江湖诗体。方回身在江湖而试图引导江湖,与江湖诗人既接引又排斥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元初士人文学行为与文学思想之间的矛盾张力。

王淑梅探究了司马光的诗学思想。^[18]王淑梅通过分析《温公续诗话》,认为司马光主张“诗为文之精”,追求诗艺,以诗为心之声,体现了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倡导诗“有适于用”,注重诗歌的教化讽谏、往来交际、消闲娱情等功能;推崇平淡风格和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受到儒家诗教传统和当时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体现了北宋诗学的发展倾向。

吴昊分析了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是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的中期成果。^[19]作者深入挖掘了该诗的诞生及其经典化过程的相关材料,审视其创作和经典化历程。认为,该诗对当下的诗歌创作也有引导意义:诗作中有必要体现人民的位置,诗歌创作也应该重视人民的接受,创作出使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民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有必要重新得到重视,从而拓展、更新诗歌创作的资源。

杨宇静、景立鹏探讨了作为话语范式的地方诗学。^[20]认为,地方诗学的凸显,既与现代性话语和全球化语境带来的社会文化转型有关,又是汉语新诗话语焦虑的美学体现。地方诗学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范式,是汉语新诗面对当代语境和自身问题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它还重新启发了一种“物本主义”诗学的可能。

康鑫、郭智超分析了新闻文体与严独鹤的通俗短篇小说。^[21]认为,晚清报章文兴起阶段,对

内容的强调超过了对文体本身的关注,以启蒙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用报章来阐述时政局势。新闻时评的出现是报章文体进入 20 世纪因时而化的体现,其源头可追溯到梁启超的《清议报》“国文短评”栏目。这一栏目聚焦新近发生的社会事件并有感而发,篇幅较短。较之其他长篇大论,“国闻短评”式的新闻体文章在时效性上更能体现出优势,于是成为报章文体发展的新趋势。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文学编辑作为一种独特力量介入文学生产。陈黎明对文学编辑与 1980 年代中国文学生产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2]认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编辑之于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同路人”,新编辑群体引领了从“朦胧诗”到现代派小说、再到“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的发展,为此后先锋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做了很好的铺垫。文学编辑介入先锋文学生产时,不仅体现出“保姆”一样的热情,超越时代的审美境界和鉴赏力,敢于冲破陈规旧俗的气魄与胆识,而且还与作家、批评家建构起独特的文学共同体,在实现编辑、作家、批评家良性互动的同时,维系并延续了作家与刊物之间长时期的亲缘关系。

李静、孟新东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都市文学书写中的城市怀旧空间叙事进行了研究。^[23]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都市文学书写中,弄堂和工人新村成为继“蓝屋”“和平饭店”等繁华国际都市奇观后另一副怀旧面孔。王安忆赋予弄堂“上海的芯子”,巧妙地将上海中产阶级内心的韧性精明囊括其中;金宇澄以“老克拉”的身份图文并茂地绘制上海地图,其中因工人新村楼房结构的体验而激发出的种种欲望,演变成《繁花》叙事的内驱力,人民新村的自豪感、优越感被肢解;“80 后”作家张怡微笔下城乡接合部的工人新村,是向内封闭、向外开放的异质空间,淡化了政治特权的批判反思,多了在地新移民的日常性和时代感。文学想象中弄堂和工人新村不期然间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复兴和怀旧热潮中的镜像之一。

张士民探讨了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征。^[24]认为,在中国社会史探索发展道路的背景下,根据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对历史意识及其诠释功效的阐述,围绕《尚书》《春秋》《国

语》《史记》这四部史书历史意识演变成成熟的时间进程，可以重新厘清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点。从殷鉴与“《书》教”的政治历史观、春秋大义与历史认同、嘉言善语的明德鉴戒作用，到历史想象和历史责任的分析，可以发现，要想使历史回忆和历史意识为未来奠基，历史研究和历史撰写就必须使我们的历史传统富有更大的负载能力，新的社会历史反思和实践还是要从历史传统特别是古代史学的历史意识中汲取营养和发展的动力，发挥“宏大叙事”履行其文化导向的功能。

姜文振围绕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中的文学理论展开研究，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知识社会学视域下中国文论知识型的生成及转换研究”的成果。^[25]认为，通过反思以西方文论范式为重要理论资源的中国现代文论，考察世纪之交文论建构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知识型分化及转换状况，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仅仅存在于它与文学“现实”的互相映照与互相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由古代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语境，以及各种文论范式所由生成的知识型基底和具体情境，方可深刻把握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特质，获得阐释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理论合法性。

魏建亮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脱困”提供了一条进路，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和河北省社会发展课题“‘人民’导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的成果。^[26]近年，中国当代文学陷入作者群庞大而读者群弱小的“虚胖”之困境，所以必须保卫读者。因此，作者从政策性角度、专业性角度和媒介性角度提出了措施。这些措施不一定能够根治当代文学的病症，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学阅读的人口基数，使当代文学慢慢脱离发展困境成为可能。

张清芳评介了李浩的小说《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27]认为，李浩于2019年出版的此部长篇小说遵循了“理想小说文学观”的理念，通过讲述封建社会（兼影射古代亚洲个别地区与社会）11个帝王君主精彩纷呈的命运故事与人生遭遇，达到重新思考历史并建构现代性历史观及以此反观整个人类命运遭遇之目标的一部

“理想小说”。

原帅围绕《杜晚香》进行了研究。^[28]认为，晚年丁玲重写《杜晚香》的初衷是与新时期读者交流，写作和发表的一波三折折射出她在新时期的特殊处境和文学坚守。从莎菲到杜晚香，是丁玲“一体性”“生命结构”中的文学表达，内蕴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体成长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个体实践。《杜晚香》是一种“信仰写作”，是晚年丁玲重返新时期的路径和起点，是接续“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一次尝试。新启蒙主义的历史叙述征用了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用“断裂性”取代了“一体性”。

由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戏剧和话剧的创作与发展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杨宇静围绕老电影《牧马人》的再次走红展开了讨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物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9]作者通过对不同时期观众对《牧马人》的接受情况进行分析，认为这一变化凸显了1980年代情感叙事的内在政治逻辑及其中存在的裂隙。1980年代的情感叙事提供了转型期的意识形态调整策略，只是其内在的矛盾使得乌托邦化的情感难以维持长久的召唤力。

马兰对歌舞小戏《小放牛》进行了研究考证。^[30]经作者考证，由侯俊山进京时间判断，认定《小放牛》一剧产生时代应为1870—1874年，通过椰子剧种谱系与侯俊山戏路，判定《小放牛》应为兼具山陕椰子做工之长、山西椰子道白之音、直隶椰子唱腔之韵的椰子。伴随着唱片、电影等新媒介的传播，《小放牛》演红全国，又随着对外文化交流，而唱演国际舞台，在城市商业和政治两股力量的推动下，成为一种重要的民族文化表征。

韩田鹿在其专著《成为更伟大的自己：西游记启示录》中着重挖掘了《西游记》文化中那些特别具有活力的、能够为人生问题提供答案或借鉴的部分。^[31]该书主要针对当代人普遍存在的三大人生问题：一是因科学昌明、信仰崩塌而带来的意义缺失；二是因知识爆炸、信息过剩而带来的认知焦虑；三是因身处群体、面对他人而带来人际困惑。

陈玉强则在《轨范与心源：明代诗学的中古接受研究》一书中探讨了明代诗学对中古时

期(汉魏六朝)诗歌的接受情况。^[32]全书分为三编,上编探讨七子派的两位代表王世贞、谢榛的中古诗学观念;中编探讨辨体派的两位代表胡应麟、许学夷的中古诗学观念;下编探讨公安派袁宏道、六朝派杨慎的中古诗学观念。

由张如意、李俊勇批注,(宋)周邦彦撰,(清)郑文焯批校的《清真集(批注本)》为河北大学图书馆馆藏珍本,郑文焯批校《清真集》首次整理出版。^[33]该本由括庵借刘承幹嘉业堂所藏两种郑批本、一种郑稿本抄录而成“晚清四大词人”,此书独有其三,括庵所录郑批,达万言之多,涉及校勘、词论、交游等珍贵史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刘青松的《新辑泊居剩稿》将纪钜维的《泊居剩稿》进行重新标点、整理,并补录原书作者纪钜维散逸的诗作、文札,尤其是加入了纪钜维婿汪鸾翔之孙(端伟)所藏纪钜维手札130余种。^[34]其中还包括纪钜维与张之洞、端方、梁鼎芬、沈曾植、汪康年、汪鸾翔等学者的大量言论,涉及武昌各书院、戊戌政变、武昌起义、张勋复辟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期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北方大儒的精神境界。

刘玉凯将顾随先生、张弓先生、裴学海先生、韩文佑先生、魏际昌先生、雷石榆先生、詹鍪先生、黄绮先生等人的十几篇文章收录于其专著《学海梯航》中,展现了他和先生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让后辈学人再次领略了先生们的辉煌成就。^[35]

《冀中村落里的燕赵遗韵——耿村民间故事传承研究》一书由李敬儒所著,是《中国民间口头叙事文丛》的其中一卷。^[36]该书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常安镇下辖的耿村为主要研究地,耿村口头叙事立足于燕赵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借助燕赵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而将自己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

除上述文献和专著外,学者钱寅在《也说“袂袂之间”》一文中讨论了《史记》中“袂”“袂”之讹出现的原因。刘玉凯从解读鲁迅小说《故乡》本文出发,论述了作家的“走出”的生命意义与文化内涵。杨伟在阅读《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后,深入分析了吴福辉的“大文学史”观。官立结合钱谷融的自述、书信以及《〈雷雨〉人物谈》的审稿意见等相关资

料,对《〈雷雨〉人物谈》从单篇论文的发表到单行本出版中间的艰难历程作一还原。郑悦、石建炜则对《中国现代美育思想》一书作了简要介绍,提倡学者们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对该书选取的经典美育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从而提高自己的美育素养。此外,陈双新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为《薛克谬文集》和《李国华文集》。韩盼山出版了《韩盼山文集》。李浩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木船与河流》和《秋日繁忙》登于期刊,并出版了小说《飞翔故事集》。

总体来说,2021年河北省文学研究内容全面丰富,取得很大的进步,希望更多的学者在本领域积极探索,开拓创新,使河北省外国文学研究迈向更高的台阶。

三、外国语言学研究

在外国语言学领域,本年度河北省的研究成果涉及多个方面,采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语料库等,对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验证和延伸。

王旭对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理论框架进行建构研究。^[37]依据评价科学理论、话语权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按照“理论、方法与应用”的思路,提出从多维度、多要素、多指标、多方法融合评价学术期刊话语权的设想。通过探讨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的基本问题,并融合带有中国元素和国际元素的科学计量指标和Altmetrics指标,以实现传统评价指标的拓展和体系重构,进而科学评价中国学术期刊话语权。

为更清晰地认识我国英文期刊话语影响力的现状与差距并提供参考,王旭和赵蓉英探讨了学术期刊话语影响力相关指标的特征及关系。^[38]采用文献调研和多个统计方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对中国英文学术期刊话语影响力评价指标特征与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从宏观层面来看,目前中国英文学术期刊数量和规模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科研竞争力不相匹配。从中观层面来看,我国英文学术期刊数量在学科领域的分布上呈现不均衡特点。从微观层面,总被引频次、CiteScore、国内他引频次等六个指标占比对h5指数的影响或贡献度依次减弱,而SNIP、发文章量和参考文献数3个指标对h5指数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我国英文学术期刊应发挥中国学术

话语的重要代言人这一优势，为中国学术成果走出去和提升我国国际学术话语影响力贡献力量。

叶慧君、杨鑫妮探讨了外交话语中互动式元话语的应用。^[39]该研究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政治文化关键词中英对照术语库建设及其在翻硕培养中的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基于海兰德对互动式元话语的定义与分类，该研究以人工标记的方式从66场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提取发言人的互动式元话语，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两方面进行顺应性分析。研究发现，外交部发言人常使用模糊语、增强语、自称语、介入语等来构建与受众的互动关系，引导受众按发言人意图理解话语。从顺应论视角看，这一话语现象的本质和动因是外交部发言人基于不同的元语用意识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动态顺应的结果。该研究不仅丰富了元话语和外交话语的相关研究，也为人们提升元话语的使用能力提供参考。

随着研究的深入，非语言因素在交流中的作用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多模态话语分析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领域。多模态话语注重视听等感觉系统的研究，关注除语言媒介之外的图像或者声音符号信息传递的作用。张楠楠探讨了英国喜剧《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幽默语言。^[40]该研究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从文化、语境、意义、形式和媒体五个层面分析《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人物对白。研究发现，剧中的叙述语言具有明显的辛辣、幽默和讽刺意味，一方面注重使用反讽塑造人物性格，运用多变的语句使平实的文字倍显生动幽默，有助于反衬人物性格，另一方面也着重运用模糊语言折射社会大众复杂的价值观，从而投影时代社会背景。同时，媒体层面的伴语言和非语言媒体对语言传递具有辅助作用，可以让观众感受到了简·奥斯汀原著的文学底蕴，从而更充分和全面地将故事意义整合，进而透析影片幽默语言的艺术魅力。

郭书彩基于语料库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的动名词搭配进行了细致研究。^[41]限制性搭配是Howarth提出的搭配连续体的四个类别之一，其他三个类别分别是自由组合、比喻性习语和纯习语。在《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动名词搭配研究》一书中，作者着重研究

了学习者对限制性搭配的使用。该书共分为五章，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呈现学习者在英语书面语中动名词搭配的使用情况；二是探究学习者动名词搭配的使用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四个语言因素相关。这四个语言因素分别是搭配的限制程度、搭配在学习者母语（即汉语）与英语中的一致性、搭配中虚化动词的使用以及搭配在英语本族语者语言中的出现频率。

本年度河北省外国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希望广大学者深入思考，拓宽外国语言学理论的应用领域，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四、外国文学研究

2021年河北省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学批评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的象征。

2021年，李浩从不同角度对多部外国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通过对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煤桶骑士》的解读探讨了作者独特的写作方式。李浩认为，与其他处理“悲剧”的小说家相比，卡夫卡完全是个异数。^[42]这是因为卡夫卡作品的悲剧性是与作家紧密相连，在观念和认知世界的方法摆脱了前人的影响，这就使得卡夫卡作为“原点型作家”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追捧。该小说给读者带来了这样的启示：作家在时代中，但作品不是，伟大的作品往往是跨越时代的，它具有某种恒定的启示和唤醒。其次，在对博尔赫斯的小说《秘密的奇迹》进行解读时，李浩关注到了书中呈现出“博尔赫斯式”哲学议题的特质。^[43]作者通过对小说情节和反复出现的意象“梦”进行详细分析，认为《秘密的奇迹》的核心议题其实是时间，并对博尔赫斯是如何将如此多重的时间样态一并在小说中贴着故事的行进作出了分析。最后，李浩围绕蒂姆·奥布莱恩的小说《士兵的重负》展开研究。^[44]李浩认为，小说虽然主要言说战争故事，但文中美国士兵所携带的物，包括生活用品、武器和工具等才是文本言说的核心，构建起一个不带情感色彩和不断冲淡感情色彩的“物”的丛林。蒂姆·奥布莱恩利用不具感情的“物”遮挡着故事的完整性和情绪的积累，充分

彰显出他高超的技艺。

王春景基于谭云山的《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印度文化及其传播。^[45]作者在对文章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印度周游记》及《印度丛谈》确实为今天的我们了解印度以及反思今天的东西方关系留下了富有活力的种子,但谭云山在认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时,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殖民主义对主客体深入的心理影响,因此作出了矛盾的解释。他的另一篇论文则聚焦于印度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影响。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类型在印度出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伴随着西方的入侵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出现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美学的资源,但西方理论的影响依然存在。^[46]作者通过梳理分析女性文学作品在印度的传播和发展,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学翻译和研究为印度女性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支持,体现出文化交流中介的功能,只有加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才能创造更丰富的世界女性文学。

毕日生则基于《尼采的反哲学》讨论了阿兰·巴迪欧对尼采“反哲学”的解读,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文艺理论研究”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 21 世纪西方激进左翼文论批判研究”的成果。^[47]作者认为,巴迪欧对“反哲学”持否定批判的立场,他对“反哲学”的解读是一种“介入式阅读”,尤其对尼采的解读,其目的不是为了澄清对方的思想,而是借尼采的“反哲学”重申自己的真理哲学以及事件哲学构想。

高永对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的中国旅行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哈罗德·布鲁姆诗学中国旅行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48]高永认为布鲁姆诗学的中国接受具有四个方面内容,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表现出四种接受态度,体现为三个接受层面。布鲁姆诗学中国旅行的过程是外来理论与接受主体的碰撞、冲击、排斥、调整与融合,经历了一个从传入到变化再到创新的过程,这是其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特殊的自我超越过程。布鲁姆诗学中国本土化必须在接受主体的批判精神视界中才可能完成,它必然是一个外来理论的祛魅过程。

贺秀明则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成熟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领域,即生命写作,属于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籍华裔生命写作与中美文化交流研究”成果。^[49]作者认为,生命写作是关于叙述者自己或者他人生活经历、生命历程的写作,包括自传、传记、回忆录、书信、日记、邮件、博客等。当今中国生命写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传记文学研究,我们需要对接国际研究动态,拓宽研究内容和思路,进一步开拓跨国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模式。

牛军将现象学中的钱穆心性文学批评与乔治·布莱的文学意识批评作了比较。^[50]他认为钱穆从人格角度思考文学的观点与日内瓦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乔治·布莱的文学意识批评理论有着诸多相通之处。但也存在不同之处。在这两种理论的相互启发下,建构一种融合心性文学批评与现象学意识批评的新理论将成为可能,这将有助于从更为具体的层面形式化地把握虚灵的心性,从而使心性文学批评具有更强的学理性,避免陷入心性仅仅可以体悟而不可言说的窘境。

也有学者对外国影视作品和戏剧进行批评和鉴赏。田丽丽探讨了彼得·谢弗戏剧作品中“父亲”这一形象。^[51]作者通过分析彼得·谢弗戏剧中生父、教父和天父这一系列“父亲形象”,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在精神困境中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从维吉尔到昆德拉——世界文学经典导读》一书是作者高永多年讲授《外国文学名著选读》课程的一个学术总结,以文学文本分析为主要内容。^[52]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人之存在”这中心,综合运用主题解读、比较研究、传记研究、文化关照、理论分析等方式对具体作品进行解读,重点探索文学经典中蕴含的精神世界。

李正栓编写了三本英语专业学生文学教材。《英美诗歌欣赏》一书旨在帮助读者深刻了解英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的精髓,以及英美文化与文学的共性和个性。^[53]而《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第一册)》^[54]和《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第二册)》^[55]两本书则囊括了各时期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贯穿整个英国文学进程,便于学习者了解英国文学的全貌,同时也有利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研读作品能力、跨文化能

力、思辨能力、研讨能力和评论能力。

梁钊则在《韩国诗人李尚圭研究》^[56]一书中研究了李尚圭的道德哲学观点、李尚圭的中韩交流实践、李尚圭的诗歌创作精神、李尚圭的诗文合一运用等内容。

五、外语教学研究

就外语教学研究而言,本年度河北省各高校研究成果颇丰。随着网络平台、大数据等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研究者重点关注语言迁移、二语习得、外语教育与教学模式等方面。此外,基于不同教材、学情探究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和策略,且注重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

张素敏探讨了运动事件中的概念性迁移方向及迁移域。^[57]该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绪STROOP范式下的外语学习焦虑个体中、英文信息加工对比研究”的阶段成果。该研究运用概念性迁移假说区别概念和概念化,基于31个视频产出的2005个运动事件描述,选取100名某高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汉英运动事件焦点、路径及背景的识解的异同,分析概念性迁移产生的方向及迁移域。通过统计运动事件描述中的焦点、路径和背景频率,结果显示:1.汉英焦点表达无显著差异,但在冠词使用上存在系统性偏误;2.英语路径表达中,路径附加语产出过度;3.汉语背景起点表达显著较多,虽然汉英均显著较多地表达背景终点。研究发现,母语—目标语之间双向概念性迁移的方向及迁移域存在差异:母语对目标语的迁移易发生在语法、词汇层面,目标语对母语的迁移则易发生在句法层面。该研究通过学习者目标语组内一致性、母语与目标语表现的组内对应性这两种方法验证概念性迁移假说,并指出概念迁移和概念化迁移是母语—目标语语言概念特征和思维范式双重作用下的动态现象,推进了概念性迁移假说研究维度。

王玉环对《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教学》一书中的日语教学方法进行研究,以更好地提高日语教育教学效果,解决基础日语教学方法改进与学生交流能力提升问题。书中强调,日语学习与交流一定要有跨文化意识,只有切实了解日语文化,才能够更快地掌握好日语知识,才能更加精准地应用日语进行交流。^[58]基于此,作者提出日

语教学应利用丰富的语料库,教师创造不同应用场景及相应的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和含义,使词汇和语法学习变得更加具体生动,且不乏趣味性,采用互动学习方式,使学习者基础听力、口语表达能力以及日语思维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此外,为了能够提高学生日语交流能力,可以结合日常兴趣点展开日语学习,以提高学习效率。

卜少辉和赵玉荣探究了高校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学习分析应用策略。^[59]认为,近年来,混合式教学法被一些研究者和教师推广到教学实践当中,逐渐成为高校教育的主流。为了更好地应用混合教学模式,作者提出可通过收集学生学习行为的大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视化分析以及挖掘和预测,将学习分析应用于学生的学业测评、学习投入研究,教师个性化教学研究,以及教学干预框架研究等方面,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他们学习的自我调节能力,对混合式教学效果有正向促进作用。

高霄、李正栓、王密卿针对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在线外语教学形态进行了调查研究。^[60]他们的文章旨在探究高校学生和外语教师对在线外语教学形态的认知评价、教学形态表征形式及其认知评价对后疫情时代外语教学形态重构的启示。对全省范围内高校、外语教师(外语专业与公共外语教师),以及不同专业、不同生源和不同年级学生间展开问卷调查,研究表明,1.师生对在线外语教学的认知、判断与评价体现在积极、干扰、功能、效能和传统心理五个维度上;2.在线外语教学形态主要表征为自由性、技术性与互动性等三种形式;3.后疫情时代高等外语教育教学实践和形态发生着质的变化。

有关外语教学的研究成果还有张小倩著《大学英语思政阅读1》、杜伟华著《大学英语思政阅读2》、任梦著《全国医学博士英语统考阅读理解真题原文精析》、赵英俊著《E英语听说教程2》、李树学著《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与实践探索研究》、李哲和张黎广著《实用商务俄语教程》、韩红梅著《通用学术英语教程》等。本年度河北省有关外语教育与教学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广大学者可适当增加实证类研究,并注重将课程思政研究融入其中。

六、翻译研究

就翻译研究而言,本年度河北省各高校研究

成果颇丰。相关研究者针对翻译的问题及其对策、翻译技巧等进行深入探究。此外,相关研究还包括翻译研究领域的现状与前景、通过翻译考察中国文学,以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张素敏、闫东雪、刘雪婷从对比语言学角度分析“续译”在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中的作用。^[61]本研究选取某大学 160 名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为被试,采用多轮“续译”,对比学习者英汉互译中的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探究“续译”促译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发现:1. 学习者英汉互译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均提高显著;2. 英译汉中的英语理解及汉译英中的英语运用均提高显著;3. 英译汉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达到了对称发展,而汉译英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依然发展不对称。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思维模式的有意识转换是“续译”高效促译、促学的根源;学习者主导性语言作为译出语或译入语影响翻译技巧的理解与运用,但非主导性语言水平的提升可促进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对称发展。本研究能够为高质高效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参考。

马月兰对《雅歌》的文学化变译进行了深入探究。^[62]作者认为,一些译者对《雅歌》进行的变译能够凸显其文学性与翻译文学的价值。从字词、文化意象、局部结构三个层面入手,考察和合本之后出版的《雅歌》个人翻译的变译策略,阐释其意义,分析个别变译存在的问题,并尝试针对文学化变译提出建议。

王敬民对廖七一先生的新著《20 世纪中国翻译批评话语研究》进行评述。^[63]认为,该著作以详备得当的批评史料,层次分明的学理分析,从话语的维度提出了真知灼见,拓展了翻译批评的学术空间,成为他新近翻译思想尤其是翻译批评研究的又一力作。作者在文章中分别从话语空间与知识生产、话语机制与价值反思、话语体系与学科建构三个方面对该著作的深刻见解进行评析,反映出了作为跨文化语言应用的翻译,作为对翻译实践加以观照的翻译批评,更与时代语境紧密相连这一认识。

叶慧君和胡连影对 2011 年至 2020 年中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进行综述。^[64]作者以“公示语”+“翻译”“公示语”+“译写”“标识语”+“翻译”“标识语”+“译写”为中国知网上的主题词搜索学术论文及学位论文,从论文发表数量、

覆盖区域、外语种类、依托项目、行业领域、依托理论、误译类别、原因及翻译对策、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等方面,对 2011—2020 年间公示语翻译研究特点、趋势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和总结,并与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相关研究作对比,展望公示语翻译及研究的发展前景。作者在总结和评述目前公示语翻译研究的同时,提出应加强外语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加强对国外相对应的目标语、公示语的研究和借用、加大公示语语料库建设与研究力度等展望,希望为公示语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各类参考信息。

李正栓和程刚以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为例,对中诗西传第三方译者进行研究。^[65]认为,母语既非源语也非目的语的第三方译者在中诗西传的数百年历史中起到了不同忽视的作用。作者结合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背景与影响,通过对译者翻译理念、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分析,探讨第三方译者的传播路径对中诗西传的作用与启示。具体而言,第三方译者的传播路径对中诗西传的发展进程具有推动作用;第三方译者的翻译理念丰富了中诗西传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为通过第三方语言而进行的翻译提供了合理性佐证;第三方译者的翻译策略对中诗西传的翻译实践具有启迪作用;第三方译者的错解、误译对后来译者起到了警示提醒之鉴。

李正栓和张丹针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译者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毛泽东诗《沁园春·雪》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立意高远,意向突出,先后被译为多种语言并广泛传播。^[66]认为,不同译者行为不尽相通,所传意旨会有差别,所呈现的形象也会有所差别,因此,翻译效果可以通过分析译者行为来判断。作者选取布洛克与陈志让、巴恩斯通与郭清波和李正栓所译的《沁园春·雪》,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方面客观分析其译者行为,以及各自译文的合理之处。从译者的有关思想及其译外行为来看,三组译者的身份与素养、翻译思想和读者意识各不相同;从《沁园春·雪》和译者的译内行为来看,三位译者在词汇翻译、句法翻译和修辞翻译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也不乏思维差异,在典故翻译方面差异最大,体现了文化知识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崔嘉欣和宋永林对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

出版进行研究。^[67]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等外国人和中国知识界人士,成为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汉译法学出版领域整体呈现书籍数量多且主题丰富、出版时间与地域分布不均衡、出版机构类型众多、出版活动与时局走向紧密相连、出版质量参差不齐等特点;汉译法学书籍大量出版,助推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作者考察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概况,从出版数量和主题、时间与地域分布、出版机构类型、出版活动、出版质量五方面分析其特点,并客观评析其历史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近代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柴冰针对乾隆年间多语种《楞严经》的译制与流传进行了深入研究。^[68]乾隆皇帝以御制的高度推动了这一佛教经典的多语种化,并以官方颁发的形式使之供奉和研习于京城、热河、盛京、内蒙古、西藏等处各主要寺庙,使《楞严经》得到了更广泛的流布。作者从现存乾隆年间译制多民族语种《楞严经》的形制及流传出发,结合清宫档案的记载,分别从时间、多民族特色、颁发地域角度探究乾隆译传多语种《楞严经》这一重要文化工程的历史脉络和价值意义,对其蕴含的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史实加以厘清。

本年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还包括一些学者通过翻译深化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如张娟著《中外文化差异与英语翻译研究》,魏怡、王隽雅、王晓丹、杜梦臻著《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英文版)》,孙剑锋、王晓茹、王颀、王浩勇著《迎冬奥食品产业地图》。2021年,河北省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的成果显著,希望广大学者对本领域进行更深入地探索,拓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范围,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侯晓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杨宝忠.“■”字杂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05).
- [2] 梁春胜.六朝石刻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3] 冯军伟.句末语气词“就是”的语气类型——兼论词汇语义的语义滞留对虚化中语气词语气类型的影响[J].语言与翻译,2021(01).
- [4] 顾俊娟,石金富.汉字位置加工和词边界效应的认知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21,29(02).
- [5] 张莉,邹朝倩.汉语词汇褒贬色彩辨识及名词褒贬色彩附着语义点[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01).
- [6] 袁世旭,许蒙蒙,郑振峰.《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提示词研究[J].语文研究,2021(04).
- [7] 田玉琪.唐宋词调入声用韵的发展演进[J].文学遗产,2021(06).
- [8] 姜永超,黄仁瑄.注疏类典籍音义信息提取与网络化的技术实现——以李善注《文选》为研究依据[J].语言研究,2021,41(04).
- [9] 郑莉,钱曾怡,张振兴,顾问著,桑宇红编.衡水桃城区方言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0] 窦星辰,黄云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J].学习与实践,2021(05).
- [11] 杜志勇.读闻一多讲《庄子》笔记[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1(01).
- [12] 尹策.龙光射牛斗之墟——张华获剑故事的本事及其寓意[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
- [13] 胡丽娜.元明之际金华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文章观——以危素《金华柳先生文集序》为中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04).
- [14] 郭英德.论明末清初唐宋古文地位的确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0(05).
- [15] 李金善,高晨曦.“意法同原”:黄文焕《楚辞听直》篇目次序与得失[J].河北学刊,2021,41(06).
- [16] 任文京.令狐楚纂进《御览诗》“微旨”考[J].河北学刊,2021,41(03).
- [17] 石勛言.方回与元初江湖诗人:关于诗坛生态的考察[J].励耘学刊,2021(02).
- [18] 王淑梅.司马光诗学思想探究[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29(01).
- [19] 吴昊.《王贵与李香香》的诞生及其经典化过程[J].文艺争鸣,2021(07).
- [20] 杨宇静,景立鹏.地方诗学:作为一种话语范式[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29(01).
- [21] 康鑫,郭智超.新闻文体与严独鹤的通俗短篇小说[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04).
- [22] 陈黎明.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以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05).
- [23] 李静,孟新东.论上海怀旧想象的另一副面孔——以“弄堂”和“工人新村”为例[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0,28(02).
- [24] 张士民.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刍议[J].学术界,2021(08).
- [25] 姜文振.情境与建构: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审思[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01).

- [26] 魏建亮. 保卫读者: 中国当代文学“脱困”的一条进路[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 42(02).
- [27] 张清芳. “理想小说文学观”——以李浩《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为考察中心[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06).
- [28] 原帅. 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信仰与实践——以丁玲的《杜晚香》为中心[J]. 当代文坛, 2021(04).
- [29] 杨宇静. 转型期情感叙事的政治逻辑及内在裂隙——从电影《牧马人》的再次走红谈起[J]. 文化研究, 2021(03).
- [30] 马兰. 《小放牛》创编年代与剧种考[J]. 民俗研究, 2021(04).
- [31] 韩田鹿. 成为更伟大的自己: 西游记启示录[M]. 中华书局, 2021.
- [32] 陈玉强. 轨范与心源: 明代诗学的中古接受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33] 张如意, 李俊勇批注, (宋)周邦彦撰, (清)郑文焯批校. 清真集(批注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34] 刘青松. 新辑泊居剩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 [35] 刘玉凯. 学海梯航[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21.
- [36] 李敬儒. 冀中村落里的燕赵遗韵: 耿村民间故事传承研究[M].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
- [37] 王旭. 中国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理论框架建构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 65(12).
- [38] 王旭, 赵蓉英. 学术期刊话语影响力相关指标的特征及其关系研究——以中国英文学术期刊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1, 32(04).
- [39] 叶慧君, 杨鑫妮.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互动式元话语研究[J]. 外国语, 2021, 37(05).
- [40] 张楠楠.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曼斯菲尔德庄园》幽默语言的多模态话语分析[J]. 电影评介, 2020(15).
- [41] 郭书彩.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动名词搭配研究(英文)[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 [42] 李浩. 作为“忧伤的造物”: 卡夫卡《煤桶骑士》解读[J]. 小说评论, 2021(01).
- [43] 李浩. 和时间对峙: 博尔赫斯《秘密的奇迹》解读[J]. 小说评论, 2021(02).
- [44] 李浩. 隐于“物”的背后: 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解读[J]. 小说评论, 2021(06).
- [45] 王春景. “现代玄奘”谭云山的印度书写[J].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20, 28(02).
- [46] 王春景. 印度女性文学: 理解世界文学的一个角度[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1(02).
- [47] 毕日生. 重建真理: 阿兰·巴迪欧解读尼采的“反哲学”[J]. 学习与探索, 2021(02).
- [48] 高永. 本土化与祛魅化——哈罗德·布鲁姆诗学中国旅行分析[J]. 文学评论, 2021(05).
- [49] 贺秀明. 西方文论关键词生命写作[J]. 外国文学, 2021(02).
- [50] 牛军. 文学“意识批评”: 钱穆与布莱[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04).
- [51] 田丽丽. 探究彼得·谢弗戏剧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以“信仰三部曲”为例[J]. 中国戏剧, 2021(09).
- [52] 高永. 从维吉尔到昆德拉——世界文学经典导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53] 李正栓. 英美诗歌欣赏[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 [54] 李正栓. 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第一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 [55] 李正栓. 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第二册)[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 [56] 梁钊. 韩国诗人李尚圭研究[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21.
- [57] 张素敏. 运动事件中的概念性迁移方向与迁移域[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03).
- [58] 王玉环. 基础日语教学方法改进与学生交流能力提升——评《二语习得研究与日语教学》[J]. 中国教育学报, 2021(07).
- [59] 卞少辉, 赵玉荣. 高校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学习分析应用策略[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43(S2).
- [60] 高霄, 李正栓, 王密卿. 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在线外语教学形态调查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1(03).
- [61] 张素敏, 闫东雪, 刘雪婷. “续译”在翻译技巧理解与运用中的作用[J]. 现代外语, 2021, 44(06).
- [62] 马月兰. 《雅歌》的文学化变译[J]. 圣经文学研究, 2021(01).
- [63] 王敬民. 拓展话语空间: 翻译批评研究的新向度——《20世纪中国翻译批评话语研究》述评[J]. 语言与翻译, 2021(03).
- [64] 叶慧君, 胡连影. 2011—2020年中国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J]. 上海翻译, 2021(05).
- [65] 李正栓, 程刚. 申诗西传第三方译者研究——以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为例[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21(01).
- [66] 李正栓, 张丹. 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译者行为研究[J]. 外语教学, 2021, 42(03).
- [67] 崔嘉欣, 宋永林. 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研究[J]. 出版广角, 2021(07).
- [68] 柴冰. 乾隆年间多语种《楞严经》的译制与流传考略[J]. 中国哲学史, 2021(06).

文艺理论研究

姜文振

2021年,河北文艺理论研究界紧紧追踪学术前沿,在文艺美学、基础文艺理论、后理论及相关问题、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等多个研究向度上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与开拓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在省内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中,文艺理论研究成果的产出还不够均衡,但一些青年学人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已经显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学术前景,为河北省的文艺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集聚了良好的后备力量。

一、文艺美学研究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从那时起,从“审美”的视域解释文学艺术特征的思潮借助思想解放运动形成开来,审美文论由此产生,从审美的层面探究文学艺术本质属性的研究由此渐趋深化。在《守望审美的视界》中,邢建昌对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属性进行了进一步地深入探究。他指出,文艺美学是人的一种生命在场的方式,文艺美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唯有从这种“在之中”方可得到解释。这是讨论文艺美学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文艺美学学科的倡导者与审美文论的呼吁者具有思想理念和精神气质的一致性。他们都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审美品质,对文学艺术的认知,要从形象反映说转向情感体验说。无论是艺术的审美创造还是艺术的审美接受,都是以情感为核心、为动力的。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初创意义还在于从本体论承诺出发,肯定文学艺术的感性特质与人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虽然在2000年前后,文艺美学遭到了各种质疑,出现了诸多争论,但实际上对待文艺美学的学科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只有把文艺美学视为一种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文艺美学的介入功能。就此而言,文艺美学学科是一种观念、思想的生产,一种质疑、反思的力量,有能力揭穿现实的虚假和不合理性,抵达澄明之境。作为一种视

角、方法和论域,文艺美学是与审美这一人类独有的生命方式的独特功能相联系的。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定,没有对审美的体认,理论研究或文学批评就会滑向抽象的概念演绎的泥淖之中。审美批评不是与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批评并列的概念,而是“在之中”的前提性因素,规定了文学文本区别于一般社会学文本的特殊性之所在。审美判断承担着检测那些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批评是否有效的任务。审美的洞见真相、揭示生存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文学形式特殊性的关注。形式不是孤立的,形式并不是对历史的偏离,只是达成它的方式,艺术形式的重大危机几乎总是与历史激变相伴生。形式与历史的这种种关系,只有在美学的视野里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1]

文艺美学学科的建设 and 理论的开掘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论美学的根基。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艺审美特质的根本问题的探究,对于文艺美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文之道”与“文的自觉”》中,李卫华借鉴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本”、热奈特的“跨文本”以及赵毅衡的“伴随文本”理论,对《文心雕龙·原道》之“道”进行解析,明确指出儒家之道是《原道》之“道”的互文本,道家之道是其承文本,而魏晋以来“文的自觉”的大背景,则是其生成的广文本。《文心雕龙》是中国古典文献中难得的体大而思精的“论文”专著,是刘勰对中国学术史的独特贡献,“道”则是《文心雕龙》中的核心范畴。在刘勰看来,“道”的含义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而这不言自明的“道”,正是“文”的根源。作为《原道》之“道”的生成性伴随文本,儒家、道家之“道”均与《原道》之“道”形成了独特的跨文本关系。在《文心雕龙》各部分中,儒家之道都是最重要的互文本。互文本的三种形式(标明出处的引用、秘而不宣的借鉴、用典)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忠实”,即互文本之间形成互相支撑的意义关系。《文心雕龙》引用儒家典籍,无论

直接引用还是用典，都是在完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的，引用的儒家典籍直接用来佐证和强化刘勰自己的观点。在征引儒家经典的同时，《文心雕龙》也大量引述了道家典籍。道家之“道”是《原道》之“道”的承文本，它生成了《原道》之“道”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文之道”的宇宙论基础，二是“道之文”的外在表征。而就《原道》这一核心文本而言，刘勰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的时代思潮，是最为重要的“广文本”。刘勰身处其中，必然受到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并将其体现在《文心雕龙》之中，而《原道》中的“文之道”，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集中体现。刘勰正是以儒家思想为互文本，以道家思想为承文本，创设了一种崭新的“文之道”。这种“文之道”最独特之处在于，“文”不是装载“道”的工具、传达“道”的手段，“文”自身就是本体，它与“道”是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关系。这正是《原道》之“道”的广文本——魏晋以来“文的自觉”的时代思潮的彰显。^[2]

中国古典美学对于文艺接受形成了诸多观点，其中以“赏”为核心范畴建构的文艺接受理论，是西方接受美学的有益补充。“赏”范畴浸润于魏晋历史文化语境，是那个主情时代对于文艺美学的馈赠，又对此后的文艺创作及品鉴产生潜在影响。在《中国接受美学元范畴“赏”的形成逻辑及理论根基》中，陈玉强认为，中国接受美学元范畴“赏”是以魏晋玄学为其理论根基，在主客交融、人文一体、道艺辉映的逻辑链条中建构起其理论内涵。“赏”范畴诞生于魏晋“人的觉醒”及“文学自觉”的双重语境下，其在东晋至南朝的流行，是时人以审美眼光看待自然、人生与文学的结果，是当时“文学鉴赏自觉”的表征。“赏”之欣赏义普遍用于赏景、赏人、赏言、赏文、赏乐等各种场合，从而成为重要的文艺美学范畴。这种“心解”之赏，重在情感的往返共鸣，所以有“赏者辨情”之说。东晋以来，文人赏景重在赏心，一变山水比德传统，标志着山水审美新理念的出现；人物品鉴之赏人、赏言，艺术品鉴之玄赏、妙赏，重在品鉴形外之神与言外之意，这与魏晋玄学有着深刻的联系。东晋以来艺术品鉴之“赏”，突出了艺术鉴赏玄妙通道的特点，具有追求言外之意、

形外之神的倾向，召唤文艺“依希其旨”的审美性和朦胧美，构筑了时人的阅读期待视野，对于文艺创作及品鉴产生了深远影响。^[3]

文艺美学作为学科虽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但相关研究的展开自近代就已经开始了，梁启超、王国维是近代文艺美学的开拓者。在《论梁启超小说观的“审美功利主义”特征》中，胡海围绕《论幼学》《译印政治小说序》《烟土披里纯（INSPIRATION）》《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几个文本，讨论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在传统心性之学转向现代审美功利主义、中西美育思想会过程中所呈现的主要价值指向与理论特质。梁启超接续以政教为中心的文艺传统，立足政治革新和思想启蒙目标阐述小说的特殊功效，揭示了小说的审美本质与艺术特征，开启了文艺功用与本质同一的审美功利主义观念，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在教育极度落后的情势下，小说及其他通俗文艺形式对于儿童启蒙和大众启蒙都具有特殊效用；小说可以在政治革新和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不可思议之力”；启蒙事业和文艺创作都需要灵感、热情、意志和动力，美和艺术具有并且能够激发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小说借助想象与虚构广阔反映生活、深刻表现心灵，具有熏陶、浸染美好心性、激发思想和热情、提升精神境界的功效。文艺功效与审美本质、形式技巧密切相关，审美与功利统一于现代美育话语。总体看来，梁启超的关注点在于思想启蒙，论小说只是探讨启蒙的途径和手段，美和艺术本身也属于启蒙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人是有境界的人，美和艺术本身代表了一种境界；文学艺术可以求真（求知求道）、求善（培育道德）、求美，美是新人境界的基本要素。梁启超的“审美功利主义”既以美为目的又以美为手段，兼容美和艺术的多重目的。从美育角度看梁启超的小说功效论，其贡献主要在于：接续明道经世的广义文学传统——包括文章传统、学术传统、文艺传统，立足政治教化或启蒙目标来讨论文学艺术的感染力，让明道经世、育德树人成为中国文艺教育的宗旨，演化为寓教于乐命题。梁启超开启了中国文艺理论标举“美育”的路向。^[4]

现代儒者钱穆将文学艺术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予以观照、阐释，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学背后的思想世界，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

学观念乃至美学思想提供了指引。在《现象学视域下的钱穆心性美学思想研究》中，牛军对钱穆的心性美学进行了基于现象学的理论考察。首先，现象学文学批评强调透过作品发现作者的意识的内在结构，钱穆则强调文学作品就是作者人格的呈现。二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现象学文学批评更为关注的是作者的意识特征和内在结构，钱穆更为关注的是作者的人格修养。其次，钱穆也和现象学文学批评家一样主张将文学家的全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读诗要结合作家的人生与人格去解读，才能更好地欣赏和评价诗人的诗作。现象学文学批评在这点上与钱穆的观点是相合的，但西方文学中很大一部分是虚构文学，作家的意识结构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对于阅读作家全部作品的强调，是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作家独特的意识结构与模式。在作品可以虚构这一点上，现象学文学批评与钱穆是截然相对的。其三，钱穆是从心性的角度来谈论文学自觉的，这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审美自觉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的。西方文学自觉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谈论的，凸显了以文学自身为目的的无功利性。钱穆从心性的角度来谈论文学自觉，文学被视为修身和塑造完美人格的方式和途径。文学指向了自身之外的内容——人格。其四，现象学文学批评将重心放在认识作者意识的独特结构之上，钱穆的心性文学批评将重心放在了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塑造主体人格品性方面。在认清此种区别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建构一种新的心性现象学美学批评理论，即以认识作者意识的独特结构为基础，以引归读者人格塑造为最终目的的新的批评理论。^[5]

身体美学亦是近年来的重要学术热点，而“微时代”的到来，更使人面临着新的境遇。微时代“浩浩荡荡地走向以‘空间置换时间’或‘时间的空间化’为特征的新的存在景观”，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感知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经历着被解构与被重构的变化过程。身体的技术性延伸和虚拟空间的生成，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在现实感性之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虚拟感性”，并进而影响了人对世界的诗性建构，人类从“自然世界”走向了“人机世界”，这是人类面临的一种新的生存境遇。在《微时代的“具身化”新变与身体空间论建构》中，王亚芹强调，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和审视微时代

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境遇的时代意义。微时代的美学，与其说是在关注审美活动，不如说是关注人类的存在本身。西方传统美学在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思维主导下，主张把身体排除在理性的认知范围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具身化”“离身化”（disembodiment）的观点。而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将这种“非具身化”从单纯的“理论域”推向了“实践域”的高峰，甚至已经成为很多理论的指导思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新技术的双重效应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它一方面增强了人类管控身体的能力，一方面又模糊了机器与身体的边界；一方面提升了人类的自我认知能力，一方面又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可能性挑战；一方面促进了身体的民主化与可塑性，一方面又带来了主体身份的异化危机。身体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的问题，昭示着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在西方的传统哲学美学中，时间与精神始终受到高度重视，与之相反的是，身体与空间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正是这种长期以来以“时间”主导的历史决定论和时间的万能叙事模式主宰着社会思想和话语建构的进路，并导致了空间领域的日趋沉沦和涣散。而微时代语境的变化，使得关于身体美学的话语以及人类的生存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人们高度重视身体和空间，是因为身体空间已然成为新的问题。尽管这里对于技术、具身、科学、信仰、空间、存在等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精确，但至少说明了身体与上述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微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上述关系“重新洗牌”的时刻，它们的相互关联甚至直接影响到整个人文学科的未来走向。^[6]

二、基础文艺理论研究

“当代性”问题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增长点。在《当代性理论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世界坐标》中，王志亮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在西方话语体系内部获得一个位置，主要得益于这样一对基础理论和现实因素：在理论层面，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多元主义原则，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发展为全球化和当代性的讨论，其中多元主义的无原则性被剔除，保留了诸元素的差异性对抗；在现实层面，随着一批中国当代策展人留居

海外，中国当代艺术话语也开始在世界范围散播开来。由此，王志亮以泰瑞·史密斯关于全球当代艺术图景的理论探讨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了艺术的当代性问题。在他看来，当代性理论出现的第一个首要任务便是替代后现代，来描述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状况。它与后现代的核心区别就是往前看，而不是往后进行历史资源的挪用。当代性理论具有更宏观的艺术史和批评写作视角，它秉持全球化，甚至“星球性”立场，尝试消除东西、亚欧、南北、落后与发达等二元对立的结构，取而代之以平行的三元论叙事，试图将欧美和亚非拉的艺术进行三等分，给予相同分量的论述。中国当代艺术在泰瑞·史密斯的当代艺术三分法中，占据了其中的两个位置——“过渡期的跨国性”和“同时代的差异”，后者被其称为真正具有当代性的艺术。这类当代艺术理论警惕唯地域论的话语，认为它们在建立中国当代艺术自身阐释系统的同时，也具有封闭性的风险。正是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中，中国当代艺术得以进入西方主流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叙事，与曾经占据绝对中心的西方当代艺术共享同一文本。但是，当代性理论因其选取的样本主要是在西方语境中生效的中国当代艺术，所以依然不能完全摆脱西方视角的偏差。^[7]

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问题是当下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在《“情境”与“建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的审思》中，姜文振认为，文学理论是作为一种体系性的明述的知识而存在的。但是，人们在讨论文学问题或文学理论问题时，很少从知识学的层面上去明确界定什么是“文学知识”或“文学理论”，体现的乃是一种现代性的知识论认知模式，影响了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西方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之下，人们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的认识与理解才发生了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变化。20 世纪后半叶，西方传统知识学在后现代境遇中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和冲击。在后现代的视野中，任何知识都不再具有所谓的客观性，任何知识都是“情境化”了的，“情境”是知识之形成及可理解性的一个基本前提，而生成于情境之中的知识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部性和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特性的共时性结论实际上主要是 20 世

纪后期以来西方的知识社会学（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探讨中逐渐生成的。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为我们探寻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中的知识型生成转换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知识学的层面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特征的描述或界定存在着多种差异、分歧，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乃至体制性要求，形成了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的不同描述，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科学性”与“人文性”理论之“必然”与理论之“应然”等之间的话语紧张，共时态地存在着本有历时性落差的知识型、范式之差异，甚至对立。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表明，文学理论作为体系性的文学知识系统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生成和建构的，具有其鲜明的情境性（历史生成性）与建构性，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仅仅存在于它与文学“现实”的互相映照与互相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百余年来由古代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语境和各种文论范式所由生成的知识型基底和具体情境，方可深刻把握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特质，获得阐释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理论效力。^[8]

21 世纪初，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中“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的兴起，与 20 世纪后期在后现代影响下出现的现代性知识学“合法性”危机直接相关。反本质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意味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出现并逐渐影响到文论家们对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反思和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思考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观逐渐浮出了水面，现代性知识型与后现代知识型的理论分野由潜在状态走向了知识学的前沿，成为其后面对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知识讲述时不得不予以关注和考量的重要问题。姜文振在《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与当代文论的知识学转向》指出，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总体上体现出破除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不取消对于文学本质的追问，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和地方意识等理论取向，具体而言，大体包括反独断论与反实在论、强调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和公共关怀、强调文学理论的历史化与地方化的建构特质等三个方面。从根本上看，反本质主义是一种体现着鲜明的“反

思”特质的文论知识范式。在这样一种文论范式中，反本质主义通过标举反独断论和反实在论而揭示了文论知识的效度的相对性，通过强化公共关怀的现实政治指向而体现了文论知识的公共性，通过对于历史化、地方化、语境化的辨析而凸显了文论知识的建构性——建构性、公共性、相对性据此可视为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的知识学特征。这一知识学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知识生产与理论探索，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论知识型的知识生产与理论探索在经过了百余年的探索发展后，已经显现出向后现代知识型转换的明显态势与可能性，并在实际的文学、文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知识建构导向作用。^[9]

地方诗学或文学地理学近年来亦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论域。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新诗地方性问题凸显。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加快和中西交往的深入，新诗逐渐能够与西方现代诗同步展开对话。但是这种同步性和平等性带来的可能是诗歌美学话语同质化的危机和新诗的身份焦虑。地方诗学的出现恰恰是对这一现状的某种症候性回应。在《地方诗学：作为一种话语范式》中，杨宇静、景立鹏对地方诗学的内涵、特质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地方诗学的核心概念是地方性，它首先强调诗歌写作中的自然地理因素对写作特征或美学风格的影响。而在现代语境下，它还包括个人对地方物质性的形式化和美学呈现，亦即建立在物质地方性基础上的个人地方性。个人地方性强调诗人如何通过个人化的发声方式实现对物质地方性的审美创造与艺术生成。地方性是相对中心性、总体性等范畴而言的，指认的是一种自觉的、差异化和边缘性的“外省”立场和反思意识。这一点构成地方诗学作为一种可能的话语范式的立足点。地方性的最基本特征是物质性。它包括客观世界中的自然物象、景观和人文环境、景观的客观方面和主观物质性层面，后者更强调超越具体的场景、意象等具象层面，指向背后抽象的物质隐喻实体和一种普遍的物质特征和形式原则，强调作为美学原则和精神原则的客观性。同时，地方性是一个差异化的经验空间。差异性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特征，还提示了一种他者化的思维方式和美学认识论。地方性通过与地方他者和总体性话语的区隔来确立自身。地方诗学是“深入当代”噬

心主题和汉语新诗自身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朝向世界和自身的对话。它从诗歌美学层面实现对现代生存与地方经验之间张力关系的凝视与反思，通过一种美学自觉和美学实践试图纠正科学理性话语对地方生存空间的侵蚀。同时，又对汉语新诗自身进行反思。地方诗学通过地方经验的开掘，激活了一个丰富、有机的诗性空间，从边缘立场来反思汉语新诗美学和伦理上的可能性。^[10]

三、后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

近年来，“后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在《后理论及其相关问题》中，邢建昌简要考察了后理论理论探讨的历程，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后理论在中国的讨论是以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出版为标志的。虽然西方世界关于后理论的讨论的发生远在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出版之前，但理论界对后理论的讨论，实际是从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与拉曼·塞尔登等人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两本书开始的。从一开始，理论界对这两部书的读解就充满了个人意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预期规定了后理论的面相。实际上，《理论之后》不过是讨论文化理论的衰落问题，以及如何拯救日渐衰落的文化研究。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理论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批判锋芒的消失。伊格尔顿希望重建理论的政治维度，超越“重复”和“老生常谈”，向“新的话题”，向过去文化研究“一直不愿碰触的话题”敞开胸怀。邢建昌认为，把后理论视为理论研究的一种转折的倾向，一种反思的态度，是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倡导摆脱宏大理论的干扰，采用更为接近文本的理论或方法，把大理论置换成小叙事（多样的理论），依托特定知识型展开叙述等，这是后理论最为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提出了“反理论立场”。“反理论立场”并不是真的要反掉理论，扬弃理论，而是抵制一种空洞的、一般性的、“预设性的”理论，回归一种社会学的小型叙事。所有这些研究取向，内在地体现了收缩膨胀的理论疆域的主张和对理论有所不能的警觉态度，也体现了一种基于语言立场对文学性的强调，这与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观念无疑具有精神上的暗合之处。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

不是对理论的拒绝，而是在于强调理论的一种自性或内在构成，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所以，“抵制理论”与理论的消解或终结论没有关系。相反，理论的兴盛正在于这种抵制。正是基于非认知的、非表征的意义的强调，后理论取向回到了德曼的修辞批评的知识谱系。它们都表现为一种基于语言学立场的对于理论的反思态度，揭示的是理论的非确定性、可磋商性、不可简约性以及自我否定、自我作对的动态机制，体现了理论在特定知识学模式下看待问题方式的变化。^[11]

王亚芹的《作为一种知识型的“后理论”》在反思“后理论”学理进路的基础上，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追本溯源式的“回望”。一般而言，我们把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称为“理论帝国时期”。这显然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泛指一种思想方法和社会活动。后来，随着大批理论“大师”的相继辞世，“理论帝国”的盛况不再，于是，“理论”开始由盛转衰，各种“抵制理论”“哀悼理论”“反思理论”的声音逐渐兴起，并渐渐盖过了“理论”本身。在劈天盖地的被压制、被抵制、被诟病的话语中，“理论”被重新复活了。于是，“理论”与“后理论”的整体关联正式拉开帷幕。“理论”的变革本质上是一种思维习惯的转换，即从纯粹的认识论向知识型转变。目前，学界关于“后理论”研究状况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基础层面的思考，一是知识层面的追溯与探源。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变，充分说明我们对“后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再聚焦在具体的概念界定等认知形式层面了，其关注点已经从纯粹认识层转向了知识型的反思层面。概而言之，我们所说的“后理论”包括时间、空间和时空结合三位一体的关于“理论”的反思型研究，它从本质上体现了“理论”知识生产方式和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后理论”知识型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大融通”，各学科之间的知识融通实现之后，会使它们彼此之间的思想差距缩小，知识上的多样化和深度便会增加。“后理论”作为当前时代一种“知识型”，与时代知识的结构息息相关，既体现为空间差异与杂糅共生，又体现为一种知识构建与价值引导，还具有社会介入特质与话语实践性。而当下的“后理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对“理论”

本身的理解不够系统和深入，对于“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关系缺乏详细认知，对当下西方文艺理论思想的具体脉络尤其是各种新进的理论思潮没有兴趣或者缺乏真正的关心和介入。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和挑战。由此也可判断，“后理论”唯一的研究方向是“后理论”知识型本身。^[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理论”热潮逐渐走向衰落，“后理论”的反思渐趋深化，“后人类”思潮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在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究之中，“后人类”与“后人文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源源不断地催生新概念和新理论的思想浪潮，而其理论的主要指向也越来越清晰地集中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并延展到对于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的反思与突破。在《“后人类”时代的伦理困境与人文之思》中，姜文振认为，“后人类”既是对当下与未来人类存在的可能形态的一种描述和判断，又是基于此判断所衍生的一系列关涉，融合了科学、技术、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美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问题领域。作为对于人类未来存在形态的一个假想和预设，“后人类”体现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为前提的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后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后人类时代”，则是一个主客混杂、身份流动、机器与人工智能参与人的身体重构所形成的一个充满“后”色彩的新的时代。“后人类”的出现和相关理论探索，揭示了人类依托当代高科技突破自身生理极限、追求永恒生命与无限智慧的企图和梦想。实际上，突破人在时间和空间中必然的有限性去追逐无限，是世代代人们的终极梦想。后人类的技术观企求通过利用生命技术、人工超智能等高科技来实现人的完善，使人本身在健康、智力、寿命、道德、幸福等方面实现没有限度的自由发展。但是，看似在为人类创设更美好未来的构想与实践，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种种争论。围绕“后人类时代”之到来和当代科技手段之运用所引发的所有争论之关键，是以人的生命与存在为指归的科技伦理（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机器伦理等）与生命伦理等问题。人类在“后人类时代”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现实变化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直接导

引着学界关于人的存在方式暨人的主体性定位的反思,进而导引着后人文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改写和对于人的主体性的重塑。“后人类”时代所提出的种种新的问题,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祛除、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为指归,是从人文主义向后人文主义转向的重要表征。后人文主义围绕对传统人文主义中的“人类中心论”的质疑和批判展开其理论探索,并由此延伸至对于“非人”主体性的建构和言说。从根本上说,后人文主义既不是反人文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的终结。它所关注的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最终都仍然指向了人的存在与未来发展,其核心意涵之中内在地隐含着对于人类未来命运与生存状态的深刻忧虑。因此,后人文主义是后人类时代人文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和话语表达。^[13]

四、西方文论研究

雅斯贝斯艺术家论基于其存在主义哲学美学,对于历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进行了深刻地解读和剖析。孙秀昌对此所进行的系列的分析和讨论颇为学界关注。在《吸纳歌德的六个要求:雅斯贝斯论歌德》中,孙秀昌对雅斯贝斯关于歌德的演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探究。雅斯贝斯提出了吸纳歌德的不要神化任何人、歌德是一个路标、我们并不能教条化地引用歌德的话替自己的言行作理由化的辩护等六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不要神化任何人,歌德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能例外。雅斯贝斯认为,我们必须对每一个生存个体正挣扎于其中的这个难堪的现实处境作出毫不含糊的决断,并在向死而生、向无而有的生存决断与临界超越中赢得终局的解救。第二个要求是,歌德是一个路标,而不是一个可供模仿的典范。歌德为在世生存的个体探索人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路标”,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向他请教的时候,他是很乐意回答每一位请教者的提问的。如果有人“模仿”歌德当年的样子,试图跟随着他“亦步亦趋”地走路,他就会告诫这些“信徒”(“模仿者”“追随者”)——“要成为你自己”。第三个要求是,歌德固然为种种事情提供了理由,不过我们并不能教条化地引用歌德的话替自己的言行作理由化的辩护。第四个要求是,既要关注歌德式的“权威”,也要关注克尔凯郭尔、尼采式的“例

外”。与克尔凯郭尔、尼采式的例外有所不同的是,歌德最终在“灵”对“魔”的导引下将自己带到一个由理性之爱所照亮的和谐、温煦的人生境地面前,他凭借着理性之爱的力量“抽身返回”现实世界之中,并在不断地突破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着人性界限内的各种潜能。第五个要求是,不要把歌德的局限全然当成我们的局限,毋宁说我们已然超越了歌德特有的局限。歌德式的权威固然在内在超越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诸多可能性,不过肯定没有实现人的所有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尼采式的例外的存在就为人性的定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方式。第六个要求是,要把歌德故居建成收集歌德全部文献的场所与供人研究歌德思想的园地,在重新激活寓托于文字背后的原初人格的同时,与歌德展开诉诸“爱的斗争”的生存交往。歌德在哪里有重要价值,人格就在哪里有重要意义。雅斯贝斯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涌自心灵深处的生存交往,我们才能从歌德身上体味到一种“在家之感”,并在他的激励下不断地将“各种善的力量”融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14]

在《批评何为?——雅斯贝斯论莱辛的诗学思想》中,孙秀昌对雅斯贝斯关于莱辛诗学思想的理论探讨进行了深刻读解。在雅斯贝斯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视域中,莱辛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与唤醒者。他试图打破那些静态化、封闭化、独断化的观念体系,期待人们立足于本真、灵动、温煦的“生存意识”与诚实、公正、开放的批判理性,采取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行动,进而永不休歇地行进在通往整全的真理的途中。莱辛是一位颇富理性精神的诗人,这种理性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他人的批判性审查上,而且表现在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批判性反思上。雅斯贝斯认为,《汉堡剧评》是莱辛将他在《论寓言的本质》中使用的自我审查、自我理解的方法从寓言领域推扩到戏剧领域的典范之作。可以说,莱辛的“区分”方法同样是其批评自觉的具体体现,它以其理性精神所特有的澄明力量为后世的艺术批评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动力与活力。由于对“批评”这种文体形式的格外看重,雅氏又辐辏于“批评与诗意的想象”这一话题对批评在莱辛这里的独特韵致与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莱辛所谓的“批评”,指的是

凭借公开运用理性的权利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旨在激励自我超越”，它通过辨析对象、厘定界限、敞开空间、觅得基源，进而为诗人开辟出一条通向纯然真理的道路来，因此，“批评就其自身而言就是至高无上的形式”。莱辛的作品（艺术评论著作）以及弥漫于其中的“理性的气氛”是其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雅斯贝斯看来，莱辛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启蒙并且涌现出了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的时代。渴望在世生存的莱辛以其真诚、公正、开放的理性精神介入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于是，这位坚持不懈的思想开拓者为解决时代难题付出的种种努力便具有了另一重意义。雅斯贝斯依据其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对莱辛所作的诠释，为莱辛研究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与范式——生存哲学的研究范式。^[15]

在《斯威登堡的精神分裂过程与其通灵术：雅斯贝斯论斯威登堡（上）》中，孙秀昌系统解读了雅斯贝斯的《斯特林堡与凡·高》，讨论了雅斯贝斯关于瑞典作家斯威登堡的相关论述。斯威登堡是一位通行灵界的精神分裂症文学家、基督教神秘主义神学家。雅斯贝斯在《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中，把斯威登堡与斯特林堡作比照，认为这两个人的精神分裂症过程具有颇大的相似性，他俩的作品在内容上也都是对各自患病期间所体验的客观意识的表现，雅斯贝斯据此将二人一并归入客观表现型的文学家之列。雅斯贝斯重点阐说了如下三个话题：一是斯威登堡的病志，二是通行于“自然世界”与“神灵世界”之间，三是“通灵”能力的韵致与“通灵”经验的可传达性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斯威登堡的独特范式——精神病理学—心理学范式。在孙秀昌看来，无论是斯特林堡、斯威登堡，还是荷尔德林、凡·高，雅氏所关注的这些精神分裂症艺术家都比世俗实存（大众、常人）更敏锐、更痛切地感受到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断裂，并以各自的方式投身于缝合其间裂隙的志业。然而，这个裂隙太宽、太深了，他们都为此倾尽了全部生命的激情，可是迄今尚没有出现一丝弥合的迹象。这也许正是深陷“崩溃的逻辑”的现代世界图景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的现实文化契机。^[16]

毕日生关于阿兰·巴迪欧的研究也为学界所关注。在《重建真理：阿兰·巴迪欧解读尼采的“反哲学”》中，毕日生围绕《尼采的反哲学》一书讨论巴迪欧如何界定“反哲学”，如何解读了尼采的“反哲学”思想，并探析他如何在解读尼采基础上重申自己的真理主张和事件哲学思想。巴迪欧认为，反哲学家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反叛传统哲学：一是反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的真理、知识的反叛、悖逆中，建构了自己的观念大厦。二是反叛传统哲学家们在社会中扮演“立法者”的做法，使自己成为理性精神的“大师”“教师”或“民主人士”，既为他人立法，也为理性立法。反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陈述进行语言的、逻辑的、系谱的批判，消解传统哲学的真理范畴，瓦解哲学自我建构为理论的企图，采取哲学行动，揭示“真理”的虚伪和谎言，并针对“哲学是行动”而采取极端的革命行动。从“反哲学”的角度，巴迪欧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历史从1888年一分为二”“上帝死了”等命题解读为“断裂”，既是和传统哲学思想的断裂，又是哲学的回归与重构。“反哲学”恰恰在此意义上对巴迪欧“终结哲学的终结”，构建新的真理哲学、事件哲学提供了有力支撑。巴迪欧对海德格尔和德勒兹解读尼采的介绍，重点依然不是让人清晰地了解尼采的思想，而是从尼采思想中找到那个产生“新”的断裂点，而这下断裂点恰恰是“尼采的哲学行动”——透过尼采的“哲学行动”，人类历史的创新得以实现。巴迪欧的《尼采的反哲学》一书可以说是对尼采的一种“介入式阅读”。这种“介入式阅读”一方面关注尼采哲学中与自己哲学相关的命题、概念等，另一方面体现了对尼采阅读的高度的选择性与解释的主体性。“介入式”的阅读最终是为了解释、解决自己提出的哲学构想：“新”如何发生在情境中，哲学如何在“回归”和“重构”中“向前迈进一步”。巴迪欧对“反哲学”持否定批判的立场。他对“反哲学”的解读是一种“介入式”阅读，他解读四位反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对尼采的解读，不是为了澄清对方的思想，而是借尼采的“反哲学”重申自己的真理哲学以及事件哲学构想。^[17]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学中一个应用颇广的基本范畴，而这一范畴在国内叙事学界误解

颇多。李卫华在《“不可靠叙述”辩证》中试图纠正国内学界对这一范畴的误解误用。“不可靠叙述”是韦恩·布斯于1961年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的理论范畴，他在该书中为“不可靠叙述”下了一个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经典定义：“我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这一定义充分表明，“不可靠叙述”关注的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是否一致。但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流传最广的中译本并未将“unreliable”译为“不可靠”，而是译成了“不可信”，由此导致了許多对于这一概念的误解误用。除了翻译与研究的错位外，把“不可信叙述”当作“不可靠叙述”的同义词，或“不可靠叙述”的一种类型，这种误会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对于以色列学者塔玛·雅克比的论文《作者的修辞、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相异的解读：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的误读。李卫华认为，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弄清基本概念的理论渊源，阅读原初的原语种文本是非常重要的。在条件有限、找不到原语种文本、或不具备阅读原语种文本能力的情况下，至少应当核对关键性的人名、书名和术语名。但日益浮躁的学术氛围、急功近利的学术目标和囫圇吞枣的学术习惯，导致许多此类的误解误用并未减少反而增多。学界多年形成的这一痼疾，理应引起重视，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学术研究越来越反智化。^[18]

五、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近年来，随着文学艺术生存方式的发展变化和大众文化更为多元的延伸拓展，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相关研究也更趋于理论化。学界从多个层面讨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相关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化拓展了批评的视域，强化了批评的理论支撑。

在《文学批评的坚守与拒绝：哈罗德·布鲁姆的中国启示》中，高永认为，哈罗德·布鲁姆强调批评的身份独立性，其文学批评中饱含着书写者本人的精神向度、情趣意志与生命坚守。以布鲁姆为参照，中国文学批评标准的现代化建构需要强调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同时批评者应对文学怀有敬畏之情，在批评实践中

应坚守内在精神独立性、坚持自我审视、坚守民族身份；应对文化话语的过度侵袭和批评的商业化倾向有所抵制，并对当前“泛娱乐化”的批评倾向保持警惕。在高永看来，当前我们的文学批评面临一系列的困境：批评的身份焦虑——独立的存在还是文学创作的依附性存在；批评标准的失范——批评沦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操作”或“利益筹码”；批评价值的微弱——批评效果不明显或批评本身不足以引领阅读等。以布鲁姆的理论诉求与批评实践为参照，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从几个方向上获得进一步的深化拓展：第一，文学批评标准的现代化建构需要强调文学批评的自主性；第二，文学批评标准的现代化建构需要批评的不断创新；第三，文学批评标准的现代化建构需要我们对文学怀有起码的敬畏之情。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而存在，这不仅因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批评与文学具有同构性，也是一种精神生产。作为一种反映主体情志的活动，文学批评需要有所坚守。首先，文学批评家应坚守内在精神之城，亦甘于享受孤独。其次，文学批评家应坚持自我审视。批评的伦理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对于批评家而言，这种批评伦理应该具有一种内指倾向，即不断对自己的批评进行伦理反思。其三，文学批评应坚守民族身份。对于一个批评家而言，民族身份的认同也许都是其诗学的最终指向。同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书写，承载着探索文学本质、探寻生命力量和关怀人类精神的责任，因此批评家必须坚守自己独立的批评精神，树立批评责任意识，保持清醒，不为流俗所控制，体现出一种批判的力量。文学批评不仅应对文化话语的过度侵袭有所抵制、对商业化倾向进行抵制，还应应对当前“泛娱乐化”的批评倾向有所警惕。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理论体系建设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建设进入新历史阶段的今天，我们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需在以史为鉴、不忘本来的同时注意吸收外来。中国当代文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必须是中国学人在创新诉求的指引下，熔铸主体内在精神的创造过程，必须是在中外文论传统中进行必要的抉择与融合，以形成中国新文论体系和批评话语的过程。^[19]

在《文学“意识批评”：钱穆与布莱》中，

牛军比较分析了钱穆与乔治·布莱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点。日内瓦学派的布莱从意识的角度评论文学作品，钱穆强调作家人格显现于作品中才是优秀的作品。他们二人都将作者主体精神视为文学作品的源头，可以说他们关于文学的思考是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的。正因如此，他们的观点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乔治·布莱抑制自我意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作者的意识一致，以实现更真切的文学批评。他指出，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自我意识处于边缘的位置。钱穆则强调对人生境界高卓的伟大文学家作品的学习，是为了效仿他们伟大的人格。这背后隐藏的深意是读者最好先抑制现在的自我，以便成就更好的将来的自我。与此同时，他们关于读者对作者的认同的观点中也存在着差异。布莱主张对作家意识的再现就是目的，别无所求。钱穆则另有目的，那就是读者效仿作者高卓的人格，实现自我人格的提升。在钱穆这里，文学成为提升人格的中介形式。在布莱看来，作者的“我思”决定作品的所有特征，“我思”是最值得关注的范畴。文学批评就是要以读者的主体把握作家的主体，把握作家感觉与思维方式。钱穆也认为作家主体才是文学作品的源头活水，而且他认为作家的人格其实是作家为人处世的根本方式，类似于“我思”具有的原初性。布莱的意识批评非常关注作家“我思”的独特模式。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我思”的这种个性特征又蕴含着时代意识的普遍性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个性与普遍性因而又辩证地统一在一起。钱穆强调作家以道自任的担当意识与自信精神，认为这是实现个体与传统合一的基础。在具体分析作家的“我思”的时候，布莱从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方面具体展开分析，这些方面就是他对“我思”的形式化把握。在钱穆那里，我们找不到与布莱对“我思”形式化的相似做法。因为布莱的“意识”概念与钱穆的“人格”概念的有着明显的分别。布莱的“意识”概念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认识的对象。钱穆的“人格”概念，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如果我们吸取布莱存在的内涵，超越钱穆对道德之维的强调，则有可能医治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的道德一元论的局限，拓宽文学之道的内涵。如果我们吸收布莱在认识论层面的探索成果，我们可以将钱穆很多缺失的论证补全。在认

识与实践层面进行融通，赋予布莱的意识批评以更具实践性的意义，则可以促进文学与人生的关联。^[20]

20世纪中期，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的兴盛，结构功能主义对传播意义的思考，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论调，面对大众文化及其传播所形成的批判主义范式，在传播学研究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电视的技术与文化分析——论雷蒙·威廉斯的大众媒介观》中，李超讨论分析了雷蒙·威廉斯关于大众媒介的理论探讨，为文化批评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基于媒介批判的理论支持。面对20世纪60年代实现奋进的大众媒介，威廉斯坚决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传播者所坚持的预设，也否认科技对大众媒介发展的决定作用。至于大众媒介的效果，威廉斯也未如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表露出某种悲观，而是希望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相结合，共同参与到“漫长的革命”进程中。以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传播观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传播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在受发展主义支配的技术决定论的媒介观中，麦克卢汉等人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世界的变革与更新。在受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的批判理论传播观中，欧陆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出现代传播明显受制于政治权力以及追求利润的资本逻辑的控制，不仅未能加速实现特殊经验转换成共同经验的过程，而且大众俨然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威廉斯对上述理论观念都持一种批判态度。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威廉斯指出，并不是所谓的科技改革与创新创造了新社会，与此相反，正是新社会的诞生，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面对文化上的保守派，如利维斯，以及文化上的激进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威廉斯同样持批判态度。在威廉斯看来，这些精英分子通常将艺术的商业化、行业垄断或霸权化归结为新技术或媒介。威廉斯则意识到现代传播技术是一个中性的存在，因而导向了双重可能，既有可能成为为统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服务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民主参与和意义共享创造的现实，因此要研究电视对政治行为的效果。在审视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关系时，威廉斯指出，我们同样不能局限于媒介本身来研究，我们也必须放在整个社会与文化的过程里，才能获得准确地观

察。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论战可以看到,威廉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思考对大众媒介所进行的改造,他一方面偏重于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思考,另一方面特别是马克思对商品、劳动力、剩余价值思考的影响,更加专注于对“经济基础”的思考。为此,威廉斯在对大众媒介改造的设想中强调“政治经济权力与话语意识形态、制度结构与主体行动是相互构成的,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针对电视文化形式的思考所提出的“流程”理论和从经济基础角度对媒介所有权的设想,共同构成了威廉斯在大众文化领域所开展的“文化革命”。^[21]

(姜文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邢建昌.守望审美的视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23.
- [2]李卫华.“文之道”与“文的自觉”——《文心雕龙·原道》的符号学考察[J].符号与传媒,2021(秋季号).
- [3]陈玉强.中国接受美学元范畴“赏”的形成逻辑及理论根基[J].山东社会科学,2021(7).
- [4]胡海.论梁启超小说观的“审美功利主义”特征[J].美育学刊,2021(5).
- [5]牛军.现象学视域下的钱穆心性美学思想研究[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1).
- [6]王亚芹.微时代的“具身化”新变与身体空间论建构[J].美学与艺术评论,2021(2).

- [7]王志亮.当代性理论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世界坐标[J].中国文艺评论,2021(9).
- [8]姜文振.“情境”与“建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的审思[J].江西社会科学,2021(1).
- [9]姜文振.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与当代文论的知识学转向[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 [10]杨宇静、景立鹏.地方诗学:作为一种话语范式[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春之卷).
- [11]邢建昌.后理论及其相关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1).
- [12]王亚芹.作为一种知识型的“后理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 [13]姜文振.“后人类”时代的伦理困境与人文之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14]孙秀昌.吸纳歌德的六个要求:雅斯贝斯论歌德[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1).
- [15]孙秀昌.批评何为?——雅斯贝斯论莱辛的诗学思想[J].深圳社会科学,2021(3).
- [16]孙秀昌.斯威登堡的精神分裂过程与其通灵术:雅斯贝斯论斯威登堡(上)[J].语言文学前沿,2021(10).
- [17]毕日生.重建真理:阿兰·巴迪欧解读尼采的“反哲学”[J].学习与探索,2021(2).
- [18]李卫华.“不可靠叙述”辩正[J].探索与批评,2021(春之卷).
- [19]高永.文学批评的坚守与拒绝:哈罗德·布鲁姆的中国启示[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1(4).
- [20]牛军.文学“意识批评”:钱穆与布莱[J].山东社会科学,2021(4).
- [21]李超.电视的技术与文化分析——论雷蒙·威廉斯的大众媒介观[J].东南传播,2021(7).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张志勇 马吉兆

2021年,河北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继往开来,论文、论著、古籍校注整理等方面都各有创获。河北学者研究问题的角度和视野不断拓宽,在深度、广度上继续掘进,尤其在历代河北作家作品的研究整理方面不断深入,既有直面学科内各个领域的前沿、重大问题的研究,又有立足燕赵,担当河北学者使命、发挥地域特色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优秀学术成果。

一、古代诗歌研究

(一) 先秦诗歌研究

本年度《诗经》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针对某些具体篇目的考证与阐释,二是关于后世《诗经》研究理论著作的研究。前者有李育名《关于〈小雅·皇皇者华〉的主旨与创作年代分析》一文,通过驳斥何楷认为《小雅·皇皇者华》的创作年代为帝乙之世的观点,利用相关材料,得出了此诗应作于周宣王时期的结论。^[1]李申曦《庙见礼与〈周南·葛覃〉题旨的形成》一文,跳出了以往对后妃嫁与未嫁的拘泥性框架,从更广的维度上,考察了该诗的意旨。^[2]后者如高文霞以王夫之《诗广传》与《诗》教思想为关注重点的两篇论文,其《王夫之〈诗〉教思想的成人之道及当代意义》认为,

王夫之《诗》教思想是围绕培养君子的“和乐”道德品格展开，在“礼”的框架下通过“择善固执”“慎独”“恒定”的道德意志，促使君子的道德情感自觉内化，进而指导君子践行天下大通的“乐政”实践，最终实现“乐生”的终极道德理想。^[3]高文霞与杨建艳合作的《王夫之“和乐”〈诗〉教思想影响下的生死观——以〈诗广传〉为核心》一文，揭示了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理学家对死生关系的形而上探索，提出“择”与“恒”是实现“裕于生”的基本保障，而“仁”与“礼”则是一切行为的准则。^[4]

在明清之际众多的《楚辞》注本中，黄文焕的《楚辞听直》是颇值得重视的一部。李金善《“意法同原”：黄文焕〈楚辞听直〉篇目次序与得失》一文，从“意”与“法”的基本内涵、《楚辞听直》选篇的“意”“法”以及“意法同原”之得失等方面进行了探讨。^[5]李金善的另一力作《近现代转型期楚辞学的学术特征》一文指出，近代楚辞学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研究理念来说，楚辞学研究由直觉思维向逻辑思维转变、由传统的经学研究向科学研究转变；从研究方法来说，突破了传统楚辞学直觉感悟和分析归纳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走进楚辞研究领域；从研究范畴来看，古代楚辞学中从未出现的一些楚辞神话、楚辞考古、楚辞文化、楚辞性别研究等内容都出现在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中；从研究成果来看，楚辞学研究成果跳出了传统的章句、注、疏、短论、札记等形式，出现了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且立题符合现代学术标准，内容论证有严密的逻辑，学术视野超越传统范围。^[6]

（二）秦汉诗歌研究

本年度关于秦汉诗歌的成果不多，主要集中于对汉代重要诗歌理论著作《毛诗序》和汉代乐府诗的研究。

许春华、王欣《“风”：〈毛诗序〉思想旨趣辩证——兼与〈论语〉之“兴”比较》关注汉代重要诗歌理论著作《毛诗序》的思想主旨，并以之同《论语》以“兴”论“诗”之思想相比较，探讨汉代儒家诗学思想与早期儒家思想旨趣的差异。^[7]

向回《乐府古题创作方式演进与乐府诗体

经典化历程》一文在系统梳理文人乐府古题创作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对“乐府”一词含义演变历程的考察认为，文人拟乐府总体呈现出诗乐分离的发展趋向，这种趋向使得“乐府”一词成为诗体代称。乐府古题提升了乐府诗的地位，扩大了乐府诗的内涵，并且，唐人通过将乐府诗源头上溯至先秦诗骚阶段，进一步强化了它们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社会功能，确立了乐府诗体的经典地位。^[8]

刘璐《汉乐府俗乐歌辞中女性婚姻家庭价值观导向》一文，从家庭层面出发，结合汉代史实、古代礼乐制度及其教化目的，对汉乐府俗乐歌辞中的女性的正反两面形象进行了研究分析，揭示了其背后隐含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导向，同时为古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9]

（三）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陶渊明诗歌的“古”意，多与诗歌意象的选取有关。张奥《论陶渊明作品中写意性地名的文化含义》一文，试图通过考察陶渊明作品中写意性地名意象的文化含义，还原陶渊明形象、勾勒诗人心路历程，从地名意象中看陶渊明的超越人世之情、建功立业之意和归隐田园之心。^[10]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研究中，更重要的收获体现在对北朝诗歌的研究。

《高允集》21卷至迟产生于北齐，唐开元年间散佚一卷，宋初完全亡佚。王崢《高允诗赋考与系年》，通过发掘新的文献，指出前人辑本存在篇目缺失、鲜作存目和缺乏系年三点不足，对前人关于高允诗赋的辑佚本进行了补充，并对部分作品系年进行了新的考证，更加准确地还原了《高允集》的面貌。^[11]

魏晋文学虽分南北，可庾信的出现，又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岳洋峰的《复古与变新：北周〈郊庙歌辞〉的创作模式及其走向》，对庾信入北周后创制的42首《郊庙歌辞》进行研究，认为庾信融合了《周礼》以及前代《郊庙歌辞》雅正的音乐艺术，在吸收南朝明堂歌、五帝歌辞的三言、七言、五言等句式的同时，与五行之数的创作模式相互照应，并对歌辞内容、风格和韵脚等方面予以新变，使得北周《郊庙歌辞》呈现出新的面貌。^[12]此外，岳洋峰对北齐

的《郊庙歌辞》也作了关注,其《北齐郊庙用乐及〈郊庙歌辞〉文本结构探析》一文指出北齐《郊庙歌辞》的著录形态有《隋书·音乐志》与《乐府诗集》两个系统,歌辞内容由陆印、李愔等人奉诏而作,与南朝《郊庙歌辞》相比,北齐《郊庙歌辞》在文本结构方面,存在有文本嵌套、模拟以及乐舞歌辞同用等情况。^[13]

(四) 唐代诗歌研究

本年度隋及五代诗歌研究成果关注较少,未有突出成就。唐诗领域的研究最为活跃,也相应产生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仍是本年度古代诗歌研究的重点。成果集中体现在对唐代著名诗人诗歌创作的研究,其中又主要以盛唐、中唐诗人的诗歌研究为重点,针对诗歌内容与形式,分析其审美艺术建构。同时,研究者在唐代诗学研究、唐诗声韵研究,以及唐诗选本整理方面均有所开拓。

1. 盛唐诗人诗歌研究

本年度盛唐诗人诗歌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李白、杜甫以及二人诗风的对比。

其一,对诗人诗歌作品具体表现手法与技巧的研究。连用字对作为律诗对仗类型中的一种,在唐以来的众多诗人的诗篇中偶有涉及,但真正自觉、频繁地运用连用字对作诗的为数不多,杜甫是其中的佼佼者。张金明、裴旭岩二人《论杜甫七律中的连用字对》一文中对杜甫七律中连用字对的现象展开论述分析,指出杜诗中连用字对的三种类别,即反义连用字对、同义连用字对和相混连用字对。讨论了连用字对在律诗创作中的意象罗列与场景勾勒及其在情感强化上的独特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连用字对的拆用和连用字对在不对仗句式中的使用这两种连用字对的变体情况,反映出杜甫对七律体制的完善以及对后世的典范作用。^[14]

其二,对诗人诗歌作品整体风格形式的研究。李白、杜甫是唐代诗风的典型代表,其作品中的李广形象能够很好地体现出他们的风格差异。王福栋《李广形象与李杜诗风》中以李杜诗歌中的李广形象为参照,从两个层面出发探究李杜诗风的差异。在家国层面上,李白突出自己的“精诚”,而杜甫则表现自己的“赤诚”。在追求仕进层面上,李白好直抒怀抱,而杜甫则沉郁内敛。该文还关注了李白对李广德行的重视与

对其精神的继承,以及杜甫对李广形象的创造性,相比之下,李白较全面地挖掘了李广的形象内涵,甚至时常以李广后人自居,而杜甫则在李广形象的用典技巧上做得更好。^[15]

2. 中唐诗歌研究

中唐部分以郭怡君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对刘禹锡诗歌的研究较有特色。文学地理学认为,自然环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空间”,是作家创作描绘的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作家创作的题材、风格、文体选择甚至作家心态等。郭怡君《贬谪朗州对刘禹锡诗歌的影响》一文指出朗州为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第一空间”,迥异于长安、江南的文学景观。地域文化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丰富了其诗歌题材,影响了其创作风格,甚至帮助他改变了心态,为他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16]

3. 唐代诗学研究

本年度有关唐代诗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马燕鑫《唐诗证选》一书以《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为范围,将唐诗化用《文选》作品的诗句一一钩稽,并结合诗意和《文选》李善、五臣等注进行诗歌文本分析,对《文选》版本和《文选》注释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做了实证性的探讨,全面探析了唐诗与《文选》在文本上的关系。在文本分析上,注意到了《文选》版本差异的重要性,这对诗集笺注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文选》研究上,对《文选》在唐代的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对于唐代诗歌研究,则有助于对唐诗的诗学渊源、创作技艺进行具体入微的研究。^[17]向回、王昕二人在《唐代诗人的乐府情结》一文对唐代乐府诗学进行研究。该文从乐府诗体自觉与经典地位确立、乐府创作方法与诗学理论的相互探讨、乐府诗人的身份自觉与议政意识三方面分别展开论述,指出唐人普遍的乐府诗体自觉、理论自觉与身份自觉,使其创作转而重辞,体现新变。作者认为,这种自觉与新变是有机统一的,自觉是新变的前因,新变是自觉的后果,展示了唐人深厚的乐府情结。^[18]

4. 唐诗声韵研究

吴淑玲、韩成武《〈广韵〉〈集韵〉与唐诗声韵研究》一文从《诗韵合璧》宜谨慎使用、唐诗声韵的认知应以《集韵》为主要依据、点

校之误源于对韵书的漠视三方面对唐诗声韵进行研究。首先,作者研究得出《诗韵合璧》虽然依循平水韵 106 韵体系,压缩了韵部字数(把《广韵》《集韵》标明某些韵部可以通用的缩成一个韵部),但因编撰不精出现错误。故研究唐诗声韵,应以《广韵》《集韵》为依据,清人编著的《诗韵合璧》不足为凭。其次,根据对《广韵》《集韵》的分析研究,发现《广韵》注音释义颇详,《集韵》特点是扩大了个体汉字的韵部,《广韵》中某些汉字只有一个韵部者,《集韵》则增加到两个甚至更多,诸多诗例证明了《集韵》对研究唐诗声韵的可靠性。最后,根据研究得出,点校之误的产生源于对韵书的漠视,作者指出今人点校唐诗,无论点断诗句或是校正文字,都应查阅韵书,以保证点校的科学、客观与准确。^[19]

5. 唐诗选本整理研究

历代唐诗选本的整理与研究是唐代诗歌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任文京《令狐楚纂进〈御览诗〉“微旨”考》一文对唐代唐诗选本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该文指出,在唐代的唐诗选本中,唯《御览诗》系令狐楚奉诏编选,这一点与其他选本具有明显的不同。该文结合唐代的诗风演变、唐宪宗的诗歌雅好、牛李党争以及令狐楚所处之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令狐楚选诗“引嫌避讳”而又委婉寄托的审慎心态。^[20]另外,杜光熙《元稹进献令狐楚、唐穆宗两部诗歌自选集编纂考论》一文立足元和末、长庆初元稹重还长安任职期间,分别向令狐楚、唐穆宗进献两部诗歌自选集进行研究,认为两次献诗皆源于当权者对元稹文才之赏爱,对其仕途发展产生了积极推进,两部诗集所收作品,皆是元稹对此前所作千余首诗歌的精选,形式上古、律二分,简洁清晰,内容上既突出讽喻时政的思想价值,又彰显情韵优美的艺术价值。此外,从进献对象、编纂形式与意义等方面,两部诗集都典型地体现了元稹自选集类自编别集的特点。^[21]孙欣欣《明代唐诗选本与诗歌批评》一书指出明代唐诗选本数量众多、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体现出明人在唐诗文献整理方面的卓越。本书不仅对明代唐诗选本进行序跋、凡例等文献整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明代众多唐诗选本序、跋、凡例、评点、批注的分析解读比较,结合明代诗学的发展对明代唐诗选

本作总体观照,对唐诗选本在明代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线性的勾勒评析,探讨了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性灵等诗歌流派的关系,总结了明代唐诗选本的理论特色。^[22]

(五) 宋代诗歌研究

本年度宋代诗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研究主要立足于对宋代著名诗人诗学思想的研究,以及对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某类诗歌的研究。

1. 诗学思想研究

司马光自称“素无文,于诗尤拙”,但他存诗 1 100 多首,著有《温公续诗话》,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学观。王淑梅《司马光诗学思想探究》以司马光为研究对象,对其诗学思想进行探究,分别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具体论述:首先,探讨诗人主张“诗为文之精”,追求诗艺,以诗为心之声,体现了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其次,指出诗人倡导诗“有适于用”,注重诗歌的教化讽谏、往来交际、消闲娱情等功能。最后讨论了诗人推崇平淡风格和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纵观全文可知,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受到儒家诗教传统和当时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同时也体现了北宋诗学的发展倾向。^[23]

2. 诗歌内容研究

诗人们进行创作不但有其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也不可或缺,当时的社会环境、思想潮流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对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特定诗歌类型给予了较多关注。刘超男《九僧的天台宗思想与诗歌创作》一文呈现出宗教背景对诗人诗歌创作上的影响,该文以“宋初三体”之一晚唐体代表诗人群体“九僧”为研究对象,指出九僧的诗歌创作与其天台宗的宗教背景密切相关,并从天台宗思想影响下的九僧诗歌创作、天台宗思想对九僧诗境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通过九僧诗歌创作中的诗体选择、意象选择、表现手法三者分别论述天台宗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出天台宗“方便法门”与“止观双修”的修行理念影响了九僧的诗歌创作,使其诗歌呈现出三法无差的一如境、物我相融的圆融境与诸法实相的自由境。^[24]马小会在《杨亿的馆阁经历与颂美情结》一文中指出杨亿诗文中的颂美情结与其神童出身、馆阁经历密不可分。文章分别从三层面展开

论述,第一,是其神童身份与颂圣氛围的契合。宋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与重文的政策为神童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杨亿的神童身份也成为盛世的点缀,与颂圣氛围相契合。第二,是其读书秘阁期间展现的颂美倾向。读书秘阁期间,杨亿生活优渥,其颂美作品在取得帝王赏识的同时也换得职位的升迁。供职馆阁期间,杨亿的颂美情结更加突出。第三,论述任光禄寺丞、著作佐郎、左正言时期的颂圣表现。杨亿屡受恩宠的经历、职官角色的内在规定性以及宋初粉饰太平的需要,均促成了其本身颂美情结的产生。^[25]

(六) 辽金元诗歌研究

本年度辽金诗歌成果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元代。石勘言《诗书不坠:元初西秦张氏家族与江南文坛》以宋元易代之际的张氏家族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显示出元初士人生活与精神场域的整体内转倾向,展示了张氏家族与江南文坛的联结性。^[26]《方回与元初江湖诗人:关于诗坛生态的考察》一文在方回与江湖诗人既接引又排斥的互动关系中,展现了元初士人文学行为与文学思想之间的矛盾张力。^[27]董双的《〈瀛奎律髓〉所引梅尧臣集版本考兼论其校勘价值》梳理了元代唐宋诗选本《瀛奎律髓》所用梅尧臣集“刊本”的版本源流,在系统单一的梅集版本中发掘丰富异文,其提示的版本信息展现了梅集在流传过程中的文本变化情况。^[28]

(七) 明清诗歌研究

本年度对明清诗歌的研究成果涉及诗人生平研究、诗歌接受史、中外文学交流、诗文集整理等多个领域,于广杰对晚清桐城派莲池文系代表作家作品的研究与整理尤为引人注目。

黄周星是明末清初极有个性的一位诗人,唐元《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一书包含大量作者独到发现的考订成果,涉及黄周星籍贯与生卒年月日、入清后漂泊吴越始末、黄周星妻妾子女等重要生平经历,以及黄周星与东南遗民群体的交往,将杜濬、林古度、董说、汪象旭、陶汝鼐、吕留良、冒襄、戚理、张潮等人黄周星往还酬唱的诗文、书信,都一一予以系年,极有参考价值,堪称一部精心结撰、考订详覈的学术著作。^[29]

晚清桐城派北传直隶,形成了以张裕钊、吴

汝纶为核心的莲池书院文人群体。这一群体深刻影响了晚期桐城派的发展,推动了新文化思潮的兴起。于广杰《桐城派名家张裕钊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以畿辅桐城派文宗张裕钊为研究对象,将其诗学思想总结为兼取唐宋、熔铸众体,将古文的义法通于诗法,主张“因声求气”,奇崛中见出平易淡远,合乎自然之妙五点,其沉郁峭拔、萧疏清肃的艺术风格对直隶诗坛影响较大,尤以王树楠、范当世、李刚己受其沾溉最深。赵衡作为桐城派莲池文系的代表人物,其史论文最有价值,以抉发士人精神为核心,呈现了桐城义法的丰富内涵。^[30]于广杰《桐城派后劲赵衡的古文与诗歌创作述论》搜集整理赵衡佚诗,从《叙异斋文集·赵衡信都书院文卷》中辑录其诗22首,总结其创作思想为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性情之真,其诗作具有清刚雅健之美的特点。^[31]此外,于广杰点校整理的《叙异斋集 李刚己集》收《叙异斋文集》八卷、《李刚己先生遗集》诗文部分共为一书,在点校基础上辑录遗佚诗文、研究资料汇编,形成二人诗文集完备精校之本,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32]

关于诗歌接受史的研究,陈玉强《轨范与心源:明代诗学的中古接受研究》敏锐地发现了明代文人和汉魏六朝时期文人的异代共鸣之处,从后世接受的视角考察杨慎、王世贞、胡应麟等文人对汉魏六朝诗人、诗歌的接受,辨析二者在追求创作规范和探索创造心源之间的异同,并为研究明代诗学、中古诗歌后世影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33]

中外交流领域,梁钊《域外典籍与中韩文化:朝鲜金存敬与〈竹溪集〉研究》发掘域外汉籍资料,找到金代党怀英的部分珍贵佚诗,并以此为基础对古代中韩文化交流作了细致论述。^[34]常亮《康乾避暑山庄七十二景题诗英译》将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两组题诗首先翻译成英语,是帮助国内外读者了解清代避暑山庄的营建、作诗背景、重大历史事件的有益尝试。^[35]

古代诗文集整理方面,除前文提到的《叙异斋集 李刚己集》外,张佩纶《涧于集》由石向骞、王双、孙春青、郭海莉点校出版,该书广泛地反映了晚清一代名臣张佩纶整顿吏治、兴办

洋务及对外关系思想,具有“以诗证史”价值,是研究清末清流派和中法战争尤其是马江战役的重要资料。^[36]刘青松编校的《新辑泊居剩稿》除将原有资料重新标点、整理之外,补录佚文多种,字数约10万字。这些佚文包括纪钜维散逸的诗作、文札,尤其是加入了纪钜维婿汪鸾翔之孙(端伟)所藏纪钜维手札130余种。佚文内容有与张之洞、端方、梁鼎芬、沈曾植、汪康年、汪鸾翔等学者的大量言论,涉及武昌各书院、戊戌政变、武昌起义、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具有“诗史互证”重要史料价值,可补史载之阙。^[37]

二、古代散文研究

本年度先秦时期的文学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围绕诸子散文的史料研究、思想研究和历史散文的史料研究等。

(一) 先秦散文研究

1. 先秦诸子散文及其思想研究

本年度关于先秦诸子百家的研究内容丰富,其中荀子史料及其思想方面的研究数量最多。

范文华、董寅生、张润泽对荀子进行了史料方面的研究,三人合作完成的论文《〈郁离子·楚王好祥〉荀子史料研究》中,依托刘伯温所著《郁离子》中的《楚王好祥》进行研究,肯定该书虽为寓言,但内涵丰富,将书中有关荀子的内容与荀子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明清以来,荀子之所以越来越成为儒家道统“孔孟”之后不可或缺的圣人,刘伯温塑造的荀子寓言形象功不可没。^[38]他们还在论文《老年荀子禅让思想初探——〈郁离子·夷门〉荀子史料研究》中,对老年荀子的禅让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随着老年荀子执政兰陵期间,其禅让思想进入升华期,集中表现在《荀子·成相》对于“尧舜禅让”的赞美。可惜,老年荀子的禅让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表露在文学诗赋之中,而没有形成像《正论》那样完备的思想体系。^[39]此外,范文华还写有《荀子弟子浮丘伯考》,对荀子弟子浮丘伯进行了考证。该文阐述了浮丘伯本人在后世历来评价之高,解释了浮丘伯之名在史上本有二人,但随着中华儒道融合的发展,倍受儒道两家推崇的浮丘伯形象合二为一,既为儒家《诗》学之传经功臣,又为道家养鹤之逍遥神

仙,亦为恭贺寿星之民俗吉语,更为历代诗文之讴歌对象。文章附有作者所撰《浮丘伯辑传》一篇。^[40]

刘振英着重于对荀子思想的研究,其论文《从礼学到法术——论韩非子法术范畴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认为荀子、韩非子都存身于中国文化学术史的轴心时代,礼学与法术二者虽具有各自独特的学术品格,但又互生互融。韩非子的法术范畴与荀子的礼学思想存在天然的通变关系。^[41]刘振英在另一篇论文《〈荀子〉“富国”范畴探讨》中认为,“富国”是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其政治逻辑的基石,围绕这个核心,荀子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为了富国,建立了“节用裕民”“本、末、源、流”的理论逻辑,确立了“下富则上富”的政策方针;在“富国”“持国”理论上,提出了“独立”的原则。荀子深刻、全面、细致地阐述了富国的政治布局,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42]此外刘振英还发表了《论秦统一六国大变局前后的和合思想形态——以荀子、董子为中心》一文,认为先秦的和合思想自成体系,其中荀子与后世董子和合思想都与秦统一六国之大变局有着密切联系,是带有实践意义的融突与和合,荀、董和合思想对当今中国文化应对挑战具有借鉴意义。^[43]

吕庙军《先秦诸子视域下荀子治理思想学说新探》一文,认为荀子不但继承了孔孟的治道思想,还对其他诸子的思想进行批判汲取、融会贯通,从而在先秦历史上建构了独具特色、综合创新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荀子在稷下学宫受到管仲学派思想影响,荀子治理思想中的“治”与“理”多具有相近或相同的含义。该文认为荀子治理思想的提出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44]

在儒家经典《论语》的研究方面,张乃芳的《〈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一文,认为《论语》中虽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这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

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45]

2. 先秦历史散文的史料研究

本年度郭万青围绕《国语》展开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国语》作为一部先秦要籍，从民国时期就不断有新式整理本出现，郭万青《近几十年来出版〈国语〉新点校本平议》，对《国语》校点本出版物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评议，为后人选用研究《国语》的资料提供了相当大的参考价值。^[46]清人董增龄《国语正义》是继韦昭《国语解》之后又一部带有集解性质的著作，在《国语》研究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郭万青《董增龄〈国语正义〉研究》一文，从董增龄的生平与交游，董增龄《国语正义》的流传与刊印，《国语正义序》《国语正义》的内容，《国语正义》材料征引及存在问题，《国语正义》的学术价值共六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叙述。^[47]郭万青《俞樾〈国语〉研究平议》聚焦近人俞樾的《国语》研究成果，指出俞樾相关成就主要体现在《古书疑义举例》《群经平议》二书中，包括对《国语》书名、性质的认定，对续编经解中收入《国语》著述的裁断，对《国语》文例的揭示，对《国语》具体条目的考订等。^[48]太宰纯是日本《国语》研究的先行者，其《国语》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专著，而是散见在《紫芝园漫笔》以及后世的《国语》研究著作或批校中。郭万青《太宰纯〈国语〉注说辑证平议与日本〈国语〉研究》一文从太宰纯《紫芝园漫笔》、渡边操《国语解删补》、千叶玄之校订《韦注国语》、高木熊三郎《标注国语定本》、六谷藏书《国语》批校中，辑出标为太宰纯之说者125条，指出其说大致分为校订文字、训诂语义、音注订正等三个方面，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49]

《战国策·中山策》是最早的中山史料汇编，但其文本中以记言为主，缺乏明确的时间脉络。王崢的论文《试论〈战国策〉中山史料系年及其编纂疏误》，详细阐释了《战国策》中山史料可以划分为魏灭中山、中山称王和赵灭中山三个时期，而在此基础上的史料系年可以纠正前人的诸多疏误。但是由于《战国策·中山策》的编纂并未完全遵循“因国别”和“以时次之”原则，因此出现了收录不全、史料窜入和时间凌

乱等问题，在“除复重”方面也存在不足。^[50]

(二) 秦汉散文研究

本年度河北学者对秦汉散文较少关注，一些主要应归属于文献学、文字学范畴的研究对于从文学角度探讨秦汉历史散文具有一定基础支撑作用。

王红超、闫哲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研究一文对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木牍内容进行全面释读，在辨识疑难字的基础上明确诏书主题，并通过文本比对，印证《赵正书》的部分内容，同时还结合诏书、《赵正书》《史记》编制《秦二世继位大事年表》，最后根据《赵正书》中记载的内容，探讨“始皇帝遗诏”与“沙丘之谋”的关系。^[51]钱寅的《也说“袂襖之间”》一文，对叶庆兵先生对于《史记·外戚世家》“武帝被霸上还”中，“袂”字乃“襖”字之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该文引用大量史料，最终论证了后人注释凡作“襖”者，恐是由《玉篇》辗转而来，而“襖”字或许是古“袂”字的变体，于上巳之祭多用“襖”字，这就是“袂”“襖”之讹出现的原因。^[52]

(三) 魏晋南北朝散文和赋文研究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成果以《文心雕龙》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六朝时期中国文论的日益“文学化”，与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佛教化进程相呼应。但目前学术界存在关于《文心雕龙》中佛教元素存在与否的争论问题。梅维恒、李卫华的《〈文心雕龙〉中的佛教思想》一文，详细阐述了《文心雕龙》展现的中国文化传统与印度诗学思想的相互结合。作者肯定了佛教对《文心雕龙》的重要影响，并认为这部巨著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要超越现在学术界争论问题的本身，应是发生在六朝时期的中国美学巨变的一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对文学的反思和中国人的文学观念。^[53]

对于《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研究困境，李卫华的《“文之道”与“文的自觉”：〈文心雕龙·原道〉的符号学考察》一文，借鉴符号学的伴随文本理论，不再纠结于“《原道》之‘道’究竟是谁家之‘道’”，而是提出：“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创设了一个

怎样的‘道’？他是如何创设出来的？”在这一问题的引领下发现，刘勰是以儒家思想为互文本，以道家思想为承文本，创设了一种崭新的“文之道”，其中“文”与“道”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种“文之道”的创设，恰是魏晋以来“文的自觉”的彰显。^[54]

对刘勰批评体系建构的探讨，也是《文心雕龙》研究中最富有成效的学术领域之一。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内在连贯性或系统性出发，探讨这一系统性著作的研究却明显匮乏。蔡宗齐、李卫华的《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生成——〈文心雕龙〉与早期文献中的文学观》着眼于填补这项研究短板，集中审视《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发现从远古到汉代，中国文学批评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文学观，即以《尚书》为代表的宗教文学观、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的人文文学观和以《毛诗序》为代表的教化文学观；刘勰则继承了前人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和谐过程的基本模式，重新认识了文学的性质、起源、思想和语言的形成及其功能，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文学观。这四种文学观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一个复杂的批评体系，有力驳斥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国传统批评没有一个连贯体系的错误观点。^[55]

此外，孙文礼的《论庾信〈哀江南赋〉的“天命”叙事及天人观念》对庾信《哀江南赋》的天人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哀江南赋》一方面通过对《左传》预言的叙事结构、叙事功能的吸收、新变，形成了独特的“天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又在赋中传达出具有矛盾性的天人观念，既充分认可“人事”的重要性，又微妙地透露出对“天命”的无奈认同。^[56]

（四）唐宋散文研究

在明末清初近百年的文坛上，秦汉文、六朝文和唐宋古文三种散文典型鼎足而立，此消彼长，各领风骚。经由明末清初士人群体的倡导和践行，唐宋古文逐渐超越秦汉文、六朝文，成为文人的归趋、文体的正统、文章的矩范和文法的渊藪，从而确立了在文坛上的首要地位。郭英德的两篇论文对上述唐宋古文在明清时期进一步经典化的过程作了深入探讨。《论明末清初唐宋古文地位的确立》一文指出清初士人清醒地反思明代唐宋派的古文理论与古文创作，在观念上重

新建构了“趋于正”的唐宋古文典型，考察了这一历史现象以及作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派别，同时也阐述了清初唐宋古文地位确立的意义。^[57]《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一文则从何以为“正”、如何“趋于正”、为何“趋于正”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重新建构唐宋古文典型、避免“空疏浅薄之弊”以及唐宋古文典型的文化功能。^[58]《韩愈志》是一部以史家直笔、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的志传，又可视为一部勾勒古文发展脉络、借此观照韩愈价值之关键所在的韩学著述，其本身也是熔铸百书、别出机杼的宏文。钱寅《论钱基博与〈韩愈志〉》一文对于钱基博先生的《韩愈志》做出了客观评述。^[59]

本年度宋文研究成果较少，价值较高者仅刘振英《〈朱子语类〉文章学研究》一书。该书以语体分析为基础，以讲述、讲解、论辩三种语体形式为总纲，直面语录文本，对朱熹语体学和文章学成就做出以下总结：作为讲述语体，《朱子语类》的讲述与文学叙事存在区别和联系，有着述说故事、塑造人物的独特性；作为讲解语体，《朱子语类》的讲解与前代经学有着密切联系，其语体要素包括讲解方法、讲解话语本身和所讲解经典中蕴含的义理；作为论辩语体，《朱子语类》的论辩要素为议论和辨析，体现着追求真理、鉴衡是非的理学精神；《朱子语类》有别于《国语》，而近于《论语》《孟子》，显示了朱熹对学术、政治、历史、文学的睿智思考，更体现了他对讲学艺术和文章法则的高超驾驭能力。^[60]

（五）元明清散文研究

本年度元明清散文研究成果既有论文、论著，亦有古籍整理类著作，呈现较为繁荣活跃的状态。《岛夷志略》是元代一部记录海外各岛国风土人情的笔记体著作，黄云生《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之关系》一文，研究了今存《岛夷志略》里的“五年旧志”究竟指的是《岛夷志略》初稿还是前人所撰《岛夷志》。金华学派自许谦后，柳贯、宋濂、戴良等人由理学家转为文人，这是从黄百家开始学界对金华士人递嬗特点的普遍认识。但是，对士人人生遭际的表层印象并不一定符合士人主观的身份认同。^[61]胡丽娜《元明之际金华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文章

观——以危素〈金华柳先生文集序〉为中心》一文，通过对两代金华士人人生遭际与文章观的考察，指出他们以儒自命，他们以此身份认同为前提的儒文一体观折中了儒者使命与文学创作实践，具体到文章观上，就是主张“道之文”，坚持为道德仁义与礼乐刑政立言。^[62]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晚清时期在河北发展出其分支莲池文系。于广杰对晚清桐城派莲池文系的专题研究中，侧重古文研究的成果有论文《晚清桐城派古文创作的现代转型——以赵衡〈叙异斋文集〉为例》一文，该文重点关注赵衡古文及其文学思想，认为赵衡在其史论文、女性书写和文学思想的表述中，展现出以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和政治伦理思想反思中华文明的自觉，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冲击了顽固守旧思想的壁垒。^[63]

张志勇《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一书是燕赵方志文献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创获。该书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综合考虑文献存世数量和价值、特征等情况，划分北京、津唐廊沧、石家庄、保定及雄安、邢台邯郸、衡水、张承秦七大区域，对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展开专题研究。该书以京津冀碑铭墓志、摩崖石刻、经幢造像等各类金石文献为研究对象，主要对文坛名家、达官显宦的创作进行深度解读，阐述其创作特征及文学史的意义，并从伦理、教育、民俗、学术、宗教等角度，多层次地发掘其蕴含的价值，并归纳总结其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另外从文献学角度，结合史传、总集、别集等，探讨方志金石文献在校勘、辑佚上的独特功能。^[64]

此外，刘青松整理清人纪钜维作品编成的《新辑泊居剩稿》，石向騫、王双、孙春青、郭海莉整理点校的清张佩纶（1848—1903）《涧于集》等古籍整理类著作，多为诗文兼收，本文在诗歌研究成果部分已作综合介绍，此不赘述。

三、词学研究

本年度词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词谱的整理以及词韵词调的研究方面。从研究的时代定位来看，唐宋至明清皆有建树。从研究单位看，河北大学文学院的词学研究最为丰硕。

（一）词谱文献的整理

在词谱文献的整理方面，本年度最具学术价值的著述首推田玉琪《北宋词谱》。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出版，按时代、作者之序，编撰北宋词调之谱。以词调首创或首见之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列该调正体与别体。每调附首创或首见之作者小传，又有“调释”“体略”“图谱”“注释”四个部分。该书对词调的编排，既吸纳前人成果，又有诸多创新，文献扎实，校勘细致，是一部词学词调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为当代词学领域的研究学者提供了最具权威和学术价值的参考。^[65]

（二）词调与词韵研究

词体诞生之初，其词调、宫调、词韵等诸多要素决定着词之旋律、声情。宫调、词调、词韵是词体构成的核心要素，直接关系到词体的破与立。刘少坤《明清填词选调选韵理论申说》深入探讨了明清词学家对填词所选调与韵的情况，从宫调、词调与词韵三个方面，解读了明清词学家们根据唐宋词自身的用律规律，针对词的声律特征、格律特征，以及声律与格律之间的关系、词律与词创作之间的关系、词韵与词律之间的关系、词律内部特征、词律等作出探讨。^[66]田玉琪的论文《唐宋词调入声用韵的发展演进》，以入声韵为例，对入声韵部及文学声情在唐宋词调的历史发展演进情况作了细化研究，从唐五代词调入声韵的使用及其与词体的关系、北宋词调入声韵的使用与词体关系、南宋词调入声韵使用的稳定与发展三个方面叙述，为研究学者作个案性的声韵研究提供了参考范本。^[67]

（三）词人及作品的研究

此一方面，主要是针对历代著名词人所用词调以及某部作品的词调进行个别的深入研究。以具体作品为例的词调研究有刘瑶的《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现状与反思——以〈木兰花〉词调为例》，该文以《木兰花》为基础，反思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依此取得的成就与不足，阐明了明清词调研究展现出的学术空间和张力。^[68]李新、唐运奇《〈三国演义〉中诗词的题材、体裁艺术衍论》一文对《三国演义》全部120回小说文本中的二百余首诗词作品进行研究，论述诗词与小说的文体互动，论证“以小说存诗”的版本价值和“以诗

词论史”的艺术价值。^[69]

四、小说传记研究

在小说和传记类作品的研究方面,明清小说仍然是研究重点,同时也不乏一些学者在唐五代小说研究上作出探索。

(一) 唐五代小说研究

王淑梅的《从文学到影像:唐传奇影视改编的潜质和策略》一文,以唐传奇《聂隐娘》的影视改编为出发点,探索唐传奇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的接受与传承。作者指出唐传奇的改编潜质是因其“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审美价值,其描绘的长安市井生活构成了独特的时代风貌和想象空间”,而成为影视改编的“营养源”,并进一步结合电影《刺客聂隐娘》与原著的不同来展现现代媒介对于唐传奇的扩展与原创,从而为唐传奇发展和影视改编提供研究方向。^[70]

(二) 明清小说研究

明清小说仍然是河北学者小说研究的重点,其中经典名著是研究热点。蔺九章的《试谈〈水浒传〉一百零八人的身份问题》指出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位人物的身份应是“武士”身份,且提出了“武士说”的基本元素和最本质属性,进一步论证了观点,为水浒人物研究提供了新思路。^[71]蔺九章、刘芳的《论〈西游记〉中的信仰危机与再建》着眼于对《西游记》“取经缘起”的考量,认为《西游记》是“形象生动地诠释信仰危机与再建,进而‘再造’一个令人向往的社会秩序的小说。”作者借《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指出当时社会上礼崩乐坏、秩序混乱的社会背景,并总结出原著作家再造理想世界的“救世良方”,展示出《西游记》这部小说对明朝乃至整个传统民族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72]韩田鹿《成为更伟大的自己:西游记启示录》一书着重挖掘的是《西游记》文化中那些特别具有活力的、能够为人生问题提供答案或借鉴的部分,刷新读者对《西游记》的认知,并从中获得启迪。^[73]李新、唐运奇的《〈三国演义〉中诗词的题材、体裁艺术衍论》一文,对《三国演义》诗词的题材类型、体裁艺术等进行了系统、整体评析,并指出《三国演义》小说中诗词词句、意境作为改编剧内容、

主题曲歌词的重要创作素材来源,其彰显的当代价值与传承意义。^[74]

清代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两部著作上。李浩《〈聊斋志异〉明清鼎革书写旨趣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将数百年来学界对《聊斋志异》明清鼎革书写旨趣的解读分为清代点评期、索隐批评期、社会历史理论主导批评期、多元讨论期四阶段,并进一步梳理点评,在梳理过程中,作者以“《聊斋》明清鼎革书写与反清复明是否相联系”作为中心论题展开分类,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论题百年来的争论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用过于宏大、普适的社会背景解析《聊斋》明清鼎革书写之旨趣”的落后性,以及“必须从主观引申、攀附回归实证推断”的必要性。^[75]

“红学”研究也颇有成果。元伟的《“袅娜”发覆——〈红楼梦〉词汇“考古”个案》一文从书写史的角度论述了“袅娜”明确地描写功能、内涵与演变脉络,并最终回归到《红楼梦》中对秦可卿描写所运用的四次“袅娜”背后的所彰显的内涵。实现“借助词汇考古来揭示小说人物的传统渊源,深刻领会《红楼梦》的创作法度和文化蕴含”的主题思想。^[76]王梦的《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立足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故事,揭示了“风月宝鉴”背后所体现的佛学白骨观的思想,以及其展示出的教化价值。^[77]

此外,刘广瑞、胡明颖对太行山文书中的《许状元祭塔》作了研究,二人合作完成的《新见〈许状元祭塔〉本事考辨》一文指出《许状元祭塔》为研究白蛇传故事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最可靠的新资料,在人物形象、情节等方面对白蛇传故事都有一定发展和深化。^[78]

五、戏曲与说唱文学研究

(一) 戏曲研究

1. 戏曲序跋研究

郭英德、李志远《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的出版,是本年度戏曲文学研究的重大创获。作为一部长达12卷的皇皇巨著,该书搜集、编纂明清戏曲文献序跋凡4300余条,全面呈现明清戏曲序跋的完整面貌,编纂过程中准确查核版本出

处,选择较好的版本作为底本,并加校勘、标点,对与戏曲文献及其序跋撰写、出版、流传相关的时间、人物、事件等相关事项,进行细致的笺证,深入细致地考察作者的生平事迹,并附注相关传记文献名目。该书的面世给学界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戏曲序跋文献资料,有助于进一步开拓中国古代戏曲文献、戏曲史与戏曲理论的研究。^[79]

2. 戏曲史研究

岳洋峰《汉魏六朝时期“都卢寻橦”“橦末伎”及其表演机制》一文为了解汉魏六朝时期“橦末”文化和早期戏曲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作者提出,“都卢”起于国名,后逐渐成为“都卢寻橦”的省称,“都卢寻橦”与“橦末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均具有宫廷“秘戏”性质,并以伎人于橦末“演作诸势”而出彩。^[80]

刘知远故事自北宋以来即以“说话”形式流传,先后出现平话、诸宫调、杂剧、南戏等不同体制的故事文本。鲁玥含、都刘平《〈白兔记〉研究三题:故事流变、版本及南北同名剧考原》对不同时期、不同伎艺样式的《白兔记》文本中故事情节的变异作了梳理考证,指出刘知远本人发迹变泰的传奇内容在减少,而关于他与李三娘曲折波澜的爱情关目在增多;现存的《白兔记》南戏,在时间上晚于元人刘唐卿同题材杂剧,剧本在口语、押韵诸方面存留有改编、因袭杂剧的印迹。^[81]明清之际的文学家黄周星的《试官述怀》是一篇科举题材的杂剧,学界至今未有专门研究,唐元《论清初科举讽刺杂剧〈试官述怀〉的创作特色》从其文体、讽刺手法以及与作者自身经历等方面出发,对该剧作了专门、深入的分析,并对元明杂剧中的科举情节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评述。^[82]

3. 地方戏曲研究

本年度学界对河北地方戏曲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燕赵濒危剧种手抄本传统剧目整理丛书 丝弦卷》《燕赵濒危剧种手抄本传统剧目整理丛书 晋剧卷》由马兰编纂出版。^[83]鲁怡杉《论二人台〈走西口〉中“玉莲”的角色塑造》,对流传于晋陕蒙冀地区的地方剧种二人台的代表性剧目《走西口》塑造人物的方法和技巧作了探讨。^[84]

(二) 说唱文学研究

王树平《云南唱本〈唐王游地府〉整理研究》一书以汉族曲本和彝族《唐王书》和《唐王游地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和情节对比的方法,分析《唐王书》的题材来源于曲本《唐王游地府》,而并非取材于百回本《西游记》,指出《唐王游地府》与《唐王书》无论在情节发展顺序还是具体细节上都高度一致,值得关注。该书还通过对汉族说唱小说《唐王游地府》与彝族《唐王书》的主题思想的阐释、比较,探讨了汉、彝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85]

六、文学与文化研究

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河北学者利用文学资料,文史结合,对古代灾异文献、著名文学家的灾异思想、灾异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等进行的的研究呈显著上升趋势。

唐元《先秦时期文献记载的瘟疫认知与管理应对举措》通过历史文献考证梳理研究方法对先秦时期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表明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已经认识到人口密集是瘟疫流行的条件之一,春秋时期已经积极采取隔离防疫措施。先秦时期已经总结出时序失调容易暴发传染病,出现了怪兽现身带来疫情的神话之说,并相应兴起了驱逐疫鬼的仪式;认识到社会卫生条件恶化时容易暴发瘟疫,政府积极设立、派遣医生救治患者。得出了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对瘟疫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采取了有效应对举措的结论。^[86]

从汉明帝崩逝到汉章帝建初二年,面对东汉王朝陆续发生多起大范围自然灾害,王充提出一套与皇室成员、外戚及主流知识精英对灾异发生机制的阐释不同的灾异学说。李浩《汉章帝朝自然灾害与王充对“灾异谴告”学说的重构》阐明该学说一方面借由批判、否定“灾异谴告”论,撇清灾异与人事的关联;另一方面拈出所谓“国命论”,指出国家的兴衰治乱完全由“命时”决定。该文认为王充这套学说意在通过重新阐释灾异,制造有利于汉章帝的社会舆论,巩固汉章帝的政治权威,同时也充满强烈的自我建构意味,背后折射出的是汉代儒学政治文化建构路径的转向。^[87]

综上,本年度河北古代文学研究以先秦散文研究、唐诗研究成果最为集中,小说、戏曲、晚清诗文等也有较可观的创获,特别是《北宋词谱》《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等重量级著作的出版,更增加了本年度研究成果的分量和厚度。整体来看,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学术增长点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河北古代文学典籍得以整理点校,未来可望进一步收获更加丰硕可喜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

(张志勇: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吉兆: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李育名.关于《小雅·皇皇者华》的主旨与创作年代分析[J].今古文创,2022(03).
- [2] 李申曦.庙见礼与《周南·葛覃》题旨的形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9(05).
- [3] 高文霞.王夫之《诗》教思想的成人之道及当代意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1).
- [4] 高文霞.杨建艳.王夫之“和乐”《诗》教思想影响下的生死观——以《诗广传》为核心[J].邯郸学院学报.2021(06).
- [5] 李金善,高晨曦.“意法同原”:黄文焕《楚辞听直》篇目次序与得失[J].河北学刊,2021(06).
- [6] 李金善.近现代转型期楚辞学的学术特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9).
- [7] 许春华,王欣.“风”:《毛诗序》思想旨趣辩证——兼与《论语》之“兴”比较[J].东岳论丛.2021,42(11).
- [8] 向回.乐府古题创作方式演进与乐府诗体经典化历程.乐府学.2020(02).
- [9] 刘璐.汉乐府俗乐歌辞中女性婚姻家庭价值观导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2).
- [10] 张奥.论陶渊明作品中写意性地名的文化含义[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0(03).
- [11] 王峥.高允诗赋辑考与系年[J].安康学院学报,2021,33(05).
- [12] 岳洋峰.复古与新变:北周《郊庙歌辞》的创作模式及其走向[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1,42(09).
- [13] 岳洋峰.北齐郊庙用乐及《郊庙歌辞》文本结构探析[J].唐都学刊.2021(8).
- [14] 张金明,裴旭岩.论杜甫七律中的连用字对[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2(02).
- [15] 王福栋,彭宏业.李广形象与李杜诗风[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36(12).
- [16] 郭怡君.贬谪朗州对刘禹锡诗歌的影响[J].保定学院学报,2021,34(04).
- [17] 马燕鑫.唐诗证选[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
- [18] 向回,王昕.唐代诗人的乐府情结[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2283(06).
- [19] 吴淑玲,韩成武.《广韵》《集韵》与唐诗声韵研究[J].南都学坛,2021,41(03).
- [20] 任文京.令狐楚纂进《御览诗》“微旨”考[J].河北学刊,2021,41(03).
- [21] 杜光熙.元稹进献令狐楚、唐穆宗两部诗歌自选集编纂考论[J].名作欣赏,2021(02).
- [22] 孙欣欣.明代唐诗选本与诗歌批评[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23] 王淑梅.司马光诗学思想探究[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29(01).
- [24] 刘超男.九僧的天台宗思想与诗歌创作[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6).
- [25] 马小会.杨亿的馆阁经历与颂美情结[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43(02).
- [26] 石勖言.《诗书不坠:元初西秦张氏家族与江南文坛》,新国学,2021(12).
- [27] 石勖言.方回与元初江湖诗人:关于诗坛生态的考察[J].励耘学坛,2021(02).
- [28] 董双.《瀛壶律髓》所引梅尧臣集版本考兼论其校勘价值[J].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20(1).
- [29] 唐元.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
- [30] 于广杰.桐城派名家张裕钊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J].内蒙古大学学报,2021(1).
- [31] 于广杰,张旭圆.桐城派后劲赵衡的古文与诗歌创作述论[J].保定学院学报,2021(6).
- [32] 于广杰.叙异斋集 李刚己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33] 陈玉强.轨范与心源:明代诗学的中古接受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34] 梁钊.域外典籍与中韩文化:朝鲜金存敬与《竹溪集》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
- [35] 常亮.康乾避暑山庄七十二景题诗英译[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
- [36] (清)张佩纶著;石向騫、王双、孙春青、郭海莉,标点校注.涧于集[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
- [37] (清)纪钜维著,刘青松辑校.新辑泊居剩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38] 范文华,董寅生,张润泽.《郁离子·楚王好祥》荀子史料研究[J].现代交际,2021(17).
- [39] 范文华,董寅生,张润泽.老年荀子禅让思想初探——《郁离子·夷门》荀子史料研究[J].现代交际,2021(15).
- [40] 范文华.荀子弟子浮丘伯考[J].邯郸学院学报,2021,31(01).
- [41] 刘振英.从礼学到法术——论韩非子法术范畴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J].燕赵文化研究,2021(02).

- [42]刘振英.《荀子》“富国”范畴探讨[J].邯郸学院学报, 2021, 31(02).
- [43]刘振英.论秦统一六国大变局前后的和合思想形态——以荀子、董子为中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1).
- [44]吕庙军.先秦诸子视域下荀子治理思想学说新探[J].邯郸学院学报, 2021, 31(01).
- [45]张乃芳.《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重重意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6(02).
- [46]郭万青.近几十年来出版《国语》新点校本平议[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01).
- [47]郭万青.董增龄《国语正义》研究[J].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21(01).
- [48]郭万青.俞樾《国语》研究平议[J].长安学术, 2021, (01).
- [49]郭万青.太宰纯《国语》注说辑证平议与日本《国语》研究[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21, (02).
- [50]王峥.试论《战国策》中山史料系年及其编纂疏误[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2, 24(01).
- [51]王红超, 闫哲.《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 2021, 31(02).
- [52]钱寅.也说“袷襖之间”[J].江海学刊, 2021(09).
- [53]梅维恒, 李卫华.《文心雕龙》中的佛教思想[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1, 33(05).
- [54]李卫华.“文之道”与“文的自觉”:《文心雕龙·原道》的符号学考察[J].符号与传媒, 2021(02).
- [55]蔡宗齐, 李卫华.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生成——《文心雕龙》与早期文献中的文学观[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1, 33(01).
- [56]孙文礼.论庾信《哀江南赋》的“天命”叙事及天人观念[J].文化学刊, 2021, (12).
- [57]郭英德.论明末清初唐宋古文地位的确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05).
- [58]郭英德.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 2021(05).
- [59]钱寅.论钱基博与《韩愈志》[J].山东大学中文论丛, 2021.
- [60]刘振英.《朱子语类》文章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61]黄云生.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之关系[J].中国史研究, 2021(03).
- [62]胡丽娜.元明之际金华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文章观——以危素《金华柳先生文集序》为中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63]于广杰.晚清桐城派古文创作的现代转型——以赵衡《叙异斋文集》为例[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3(04).
- [64]张志勇.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65]田玉琪.宋词词谱[M].中华书局, 2021.
- [66]刘少坤.明清填词选调选韵理论申说[J].文学与文化, 2021(02).
- [67]田玉琪.唐宋词调入声用韵的发展演进[J].文学遗产, 2021(11).
- [68]刘瑶.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现状与反思——以《木兰花》词调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 2021(01).
- [69]李新, 唐运奇.《三国演义》中诗词的题材、体裁艺术衍论.保定学院学报, 2021, 34(01).
- [70]王淑梅.从文学到影像:唐传奇影视改编的潜质和策略[J].电影评介, 2021(05).
- [71]蔺九章.试谈《水浒传》一百零八人的身份问题[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21, 41(04).
- [72]蔺九章, 刘芳.论《西游记》中的信仰危机与再建[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0(03).
- [73]韩田鹿著.成为更伟大的自己《西游记》启示录[M].北京:中华书局, 2021.
- [74]李新, 唐运奇.《三国演义》中诗词的题材、体裁艺术衍论[J].保定学院学报, 2021, 34(01).
- [75]李浩, 王雅.《聊斋志异》明清鼎革书写旨趣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蒲松龄研究, 2021, (03).
- [76]元伟.“袅娜”发覆——《红楼梦》词汇“考古”个案[J].红楼梦学刊, 2021, (01).
- [77]王梦, 王会.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4(02).
- [78]刘广瑞, 胡明颖.新见《许状元祭塔》本事考辨[J].衡水学院学报, 2021, 23(06).
- [79]郭英德, 李志远.《明清戏曲序跋纂笺》[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 [80]岳洋峰.汉魏六朝时期“都卢寻橦”“橦末伎”及其表演机制[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1, (06).
- [81]鲁玥含, 都刘平.《白兔记》研究三题:故事流变、版本及南北同名剧考原[J].保定学院学报, 2021, 34(03).
- [82]唐元.论清初科举讽刺杂剧《试官述怀》的创作特色[J].中国戏剧, 2021(10).
- [83]马兰.燕赵濒危剧种手抄本传统剧目整理丛书·丝弦卷[M].河北大学出版社, 2021;马兰.燕赵濒危剧种手抄本传统剧目整理丛书·晋剧卷[M].河北大学出版社, 2021.
- [84]鲁怡杉.论二人台《走西口》中“玉莲”的角色塑造[J].大众文艺, 2021(01).
- [85]王树平.云南唱本《唐王游地府》整理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1.
- [86]唐元.先秦时期文献记载的瘟疫认知与管理应对举措[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21(6).
- [87]李浩.汉章帝朝自然灾害与王充对“灾异遣告”学说的重构[J].学术交流, 2021(12).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李致 田建民

2021 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看有亮点。河北学者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参与度高,学术影响力大,保持了鲁迅研究、小说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等传统研究特色基础上,在网络文学研究、戏剧诗歌研究等以往相对薄弱的领域发展了一些成果。田建民的鲁迅研究、阎浩岗的红色经典和土改叙事研究,杪楞的网络文学研究,都处于学术前沿。王力平、张清芳、刘起林、陈黎明、魏建亮等人批评的当代小说 1940 年代文艺和河北文学研究,也都值得关注。

一、文学思潮与现象

文学思潮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当代文学思潮与现象,而其中关于延安文艺思潮和网络文学创作现象的思考值得重视。田建民对延安时期暴露性文学创作思潮进行辨析,认为把 1940 年代初出现在延安的暴露性文学潮流称为“延安文艺新潮”是不合适不确切的。因为这股潮流并不“新”,它其实是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延续或再现。尽管这些暴露性作品表现了以科学理性反对封建保守的现代意识,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社会生活侧面及特定知识群体的真实的思想、情感与心态。但因其个性主义的诉求与当时历史所要求的集体主义不相适宜,加之其不适当地把农民和工农干部当成讥讽与批判的对象,导致二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对立。所以,完全否认其文学价值与积极意义,或抛开历史而谈其现代意识与独特贡献,都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一偏之见。^[1]王明娟则对抗战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时空叙事特征及其内涵进行解读,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烽火从东北蔓延至全国,女作家们从正面空间与负面空间两个角度,如实记录了物理意义上的战争图景。女性作家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深切的体验、敏锐的观察,真实记录战争的恐怖与残酷,揭示战争导致的生命创伤与苦痛,表达她们对战争的批判与控诉。在时空纵横并置的叙事空间中,人们在战乱中的空间流徙提升了战争罪恶的客观性事实的容

量,同时也在时间流转中也凸显出抗战时期人们心灵的创伤。女性作家记录战争的残酷、控诉战争的罪恶,在超时空追问中表达出鲜明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对于抗战时期女性作家思想及创作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2]当代文学思潮方面,陈黎明从文学编辑角度对先锋文学思潮的形成机制进行解读,认为在 1980 年代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学编辑作为一种独特力量介入文学生产,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则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编辑之于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同路人”,新编辑群体引领了从“朦胧诗”到现代派小说、再到“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的发展,为此后先锋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做了很好的铺垫。在新潮编辑的积极参与和引领下,一方面,借助主流期刊的力量,先锋文学实现了从文坛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一批年轻的先锋作家被发现与扶助,迅速闯入文坛,进而推动了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文学编辑介入先锋文学生产时,不仅体现出“保姆”一样的热情,超越时代的审美境界和鉴赏力,敢于冲破陈规旧俗的气魄与胆识,而且还与作家、批评家建构起独特的文学共同体,在实现编辑、作家、批评家良性互动的同时,维系并延续了作家与刊物之间长时期的亲缘关系。^[3]《乡土与城市之间的时代缩影——论“70 后”作家的小镇叙述》^[4]则对“70 后”作家创作中的小镇叙事进行解析,小镇兼具乡土、城市文明属性,在高速城镇化中成为时代的缩影。“70 后”作家,将小镇作为他们的文学地标。他们一方面在小镇文学中记录着社会发展、精神变迁,一方面批判与反思高歌猛进的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给小镇青年们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遇,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跨越现实与梦想之间的鸿沟。在留守、逐梦与逃离之间,小镇“围城”的困局与窘境便出现了。“70 后”作为在变革的年代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小镇,承载着他们深刻的人生体验。这便是“70 后”作家、小镇故事与改革开放进程之间的紧密联系。

网络文学是近些年迅速崛起的文坛新势力。随着网络文学的勃兴,网络文学显示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征,相应地网络文学也逐渐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点。杪楞是一位关注网络文学发展并取得成绩的研究者。杪楞认为,网络文学需要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在网络时代大众文化视域下观察其艺术水准和主题价值,它们显然都是具有典范意义的精品佳作。2019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将网络小说纳入评选范围,给予独立的文体地位,这是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节点。经过20多年的发展,类型小说已是网络文学的主体,除了遵循大众文艺的创作原理之外,不同类型又各有不同的创作规范和代表作品。2020年网络小说排行榜的10部上榜作品体现了网络文学在语言表达、叙事规范、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基本特质,其丰富的题材类型、充盈的文化内涵、鲜明的网络特性代表着年度创作水平的标高。^[5]以网络文学中的乡村题材创作为例,网络文学就展现出一些新的叙事特质。乡村题材小说是网络文学中一个十分小众的类型,这既与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嬗变有关,也与作为通俗文学的网络文学本身的都市文化特性有关。乡村叙事的衰变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大众文学的都市文化特征,成为影响乡村题材网络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作为通俗文学的乡村题材网络小说通过人物形象呈现对乡村的想象,其中多有与其他类型创作不同的叙事策略。例如,通过塑造新人形象和展现新的愿景,使之在延续乡村叙事传统的同时又有较多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又与网络文学迎合读者审美情趣、满足读者情感愿望的叙事目标相一致。这类作品通过塑造能够使读者产生代入感的人物形象满足大众的乡村想象,除了人物的成功叙事、模式化的故事套路以及凸显社会主流价值外,还采用了提供共情的形象、以对比手法形成反差效果增强叙事张力等策略,形成了新的叙事调性。^[6]

网络文学的读者也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刘相美认为,新媒体文学是读者全方位参与文学生产的一种文学形态,新媒体文学场域的“读者创作”接续了原初文学以人民为创作主体的集体再创作传统。从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特点出发,新媒体文学形成了适应人民群众

“期待视野”的审美特征。新媒体文学的“读者性”联系着“人民性”,但“读者性”不同于“人民性”,新媒体文学以“读者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带来其文学品质的下降。新媒体文学必须坚持“人民性”的立场,并且以“人民性”的价值来引领其发展,促使其“读者性”特征向“人民性”方向升华,从“读者”的文学走向“人民”的文学。^[7]魏建亮则明确提出“保卫读者”的文学立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陷入作者群庞大而读者群弱小的“虚胖”之困境,所以必须保卫读者。从政策性角度看,需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政策为指导,确立“读者中心”意识。从专业性角度看,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需做到心中有读者,为读者而写而思。最后,从媒介性角度看,需充分关注当下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转向数字媒介和数字读物。从宏观处着眼为读者回归当代文学场域确立制度保障,从微观处着手为“偏离航向”的当代文学阅读设锚导航。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媒阅读对读者的引导作用,需提升经典文学在数字读物中的比例、提高原创数字文学的质量、提速文学报刊的数字化步伐。这些措施不一定能够根治当代文学的病症,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学阅读的人口基数,使当代文学慢慢脱离发展困境成为可能。^[8]

就题材而言,科幻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可谓小众。美国学者宋明炜近年致力于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研究与海外传播,在对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作家作品进行具体解读的基础上,力图建构其诗学理论。张清芳对宋明炜的《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进行解读,认为宋明炜在《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一书中,不但在梳理由晚清到当下中国科幻文学史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并定义其内涵与外延,而且还针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学再度复兴且其中包含的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作品在近年风靡世界文坛的实际情况,反复强调后者在继承、拥有当代文化精英色彩与艺术上的先锋性、创新性等特征,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并非是通俗文学,而是属于严肃、高雅文学的范畴,这亦成为中国科幻诗学建构的一个立论基础。^[9]

此外,也有研究对严家炎的文学史写作进行分析,认为教材集体编写时代的文学史写作和文

学研究实践奠定了他一生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开启了其“现代化”的研究范式,21世纪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越过“五四”,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寻找“现代性”。严家炎价值立场和文学史观的演变带来研究范式的转型,他突出的学术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高度,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10]

二、鲁迅研究

刘玉凯对《故乡》进行解读,从解读鲁迅小说《故乡》本文出发,阐释小说的叙事背后的思想意义与相关的艺术设计,主要论述作家的“走出”的生命意义与文化内涵。作者认为,写小说不为素材所拘,是鲁迅的文学选择。鲁迅所描写的并不是真正的城,而是乡村化的小城。作者用灰暗格调来描写故乡,都是缘于鲁迅没有好心绪。鲁迅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可他笔下的故乡却完全相反。鲁迅的这种矛盾性既是五四作家共同遇到的,也有鲁迅的特殊性。飘零感、流浪感,构成了他的灰暗心理,也因此给故乡染上了同样的色调。鲁迅称自己是辛苦辗转的生活,也是无可奈何的。^[11]沈祖新则以《坟》为考察中心,探讨了鲁迅的“反抗绝望”思想内涵,认为“反抗绝望”是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思想复杂性的体现,“暗”与“明”的情感交织正是这种复杂性的表征之一。这种双重情感倾注在鲁迅思想的核心命题,如“青年”“生命”“中间物”等之内,表现在“希望”“绝望”与“反抗绝望”的思想悖论之中,呈现了更具“人间性”的鲁迅形象。^[12]

田建民、杨程则借助比较的研究方法呈现了鲁迅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田建民将《秋夜》与徐志摩的《北方的冬天是冬天》进行并置阅读,认为二者在立意与借以表达思想情感的主要象征性意象上是有相似或相近之处的,这可能是不经意间的暗合,但也不排除后者受到了前者的启发或影响。当然,这种启发或影响绝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一种转换与超越。就文体结构看,前者是一首抒情诗,不枝不蔓,抒情意向直接明了;而后者则是一篇散文诗,意象更为丰富、复杂,虚实交织、张弛有致。就抒情意向看,前者的主要意象——顽强坚韧的树枝,象征

的是诗人赞颂的现实中与黑暗势力抗争的英雄人物;而后者主要意象——枣树,则是诗人自己的内在人格、精神和心态的外化。就主题表现看,前者针对蔡元培辞职事件,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政治腐败,歌颂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的抗争精神,主题清晰而明确;而后者则不针对具体的人物或事件,重在表现文化批判精神与内在心理体验,其思想意蕴则显得含蓄、丰富而深永。^[13]杨程则对鲁迅与穆时英所塑造的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进行比较,认为尽管鲁迅与穆时英笔下都塑造过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但二人笔下的丑角形象具有异质性: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具有自觉性,以小丑身份为面具,掩盖自己的孤独与恐惧;鲁迅笔下的丑角多是非自觉的,因其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而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人当作小丑、疯子。这折射出两位作家迥异的生命观,穆时英从个体角度出发,写出了都市人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面具的无奈,对丑角表演持拥抱态度;鲁迅则从批判国民性的宏观角度出发,敏锐地意识到了丑角表演背后的隐忧,对其持拒斥的姿态。^[14]

王永祥通过对伊藤虎丸的“鲁迅形象”建构研究,梳理了伊藤虎丸研究鲁迅的学术范式及其价值。作为二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的伊藤虎丸,其学术研究首先是基于对自己参与的政治运动和大学改革的深刻反思。他一方面从鲁迅那儿寻找精神文化资源来解决自己的困惑,另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的思考,也加深了对鲁迅的认识。伊藤虎丸以自身的现实体验为基础,在继承了竹内好、丸山真男等前辈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了终末论意义上的鲁迅形象。在他的仔细审视中,日本时期的鲁迅把握了精神原理的欧洲,这是一种在整体性中的把握,并转化为自己的主体建构,而作为结果的欧洲只是缺乏整体性的知识、零件。伊藤虎丸正是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刺激和促发之下进入鲁迅的世界。重新阐释了留日时期鲁迅的个人主义、进化论以及得之于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意志,并阐释了作为“原鲁迅”的精神生成机制。^[15]

三、小说研究

小说研究是现代作家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其中关于土改叙事和红色经典的相关研究

成绩斐然。关于解放区小说的土地革命叙事，阎浩岗认为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预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16]吉媛圆则分析了赵树理小说的“算账”书写，认为在赵树理笔下，“算账”是一个常见且意味深长的现象，它不仅意味着算经济账，更指向意味深长的文化账、政治账。赵树理细描算账行为中的人和事，发现并讲述了农民“翻心”的具体途径。赵树理的“算账”书写，强调作家是从日常经济深入文化、政治改革，从生活细节召唤并建构农民的主体性，创造了通俗易懂、别具一格的文学形式，探索出符合中国本土特色文艺作品的创作路径。赵树理“算账”所提供的现实经验，对当下的文艺创作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深刻的启示意义。^[17]关于《李自成》的经典化路径研究，阎浩岗认为《李自成》自问世迄今，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估经历了初次经典化（1977—1987）、去经典化（1988—2007）和再经典化（2008年至今）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即再经典化尚在进行中。《李自成》第一次的经典化，可以说符合了童庆炳先生关于经典构建六要素中的所有六项：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获得从专家到普通读者的广泛承认、极高评价；作品本身内容丰富，有较多的阐释空间；它与新时期初期的意识形态吻合；文学理论批评界重视作品艺术性、审美感染力成为共同价值取向；它满足了那一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李自成》热逐渐降温，使《李自成》文学史地位动摇、经典价值被解构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来自文学批评界，来自专家学者。否认《李自成》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那些代表性人物，大多没有读过全部五卷作品，甚至作品出版日期也搞不准，持论漏洞百出，很不严谨。一旦进入正常语境，进入学理范畴，那些否定性观点不驳即倒。虽然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去经

典化，但姚雪垠先生这部巨著的再经典化，也是势所必然。^[18]也有研究对合作化题材的《香飘四季》作艺术分析，指出陈残云的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写法上既不同于《创业史》《艳阳天》，又有别于《山乡巨变》，因而其艺术特色与价值也异于其他同类作品：其人物与故事比较平实、比较接近生活原生态，但作品中的生活真实性又是与其特有的理想化书写交织在一起的；其理想化的表现形式不是意识形态化地拔高人物思想境界，而是只侧重写生活美好一面，淡化矛盾冲突。它以日常生活与地方风情描写取胜，但就其37万字的篇幅来说，这一写法或许稍显沉闷。^[19]王永祥对路遥的文学创作进行分析认为，路遥文学创作中对十七年文学传统有明显继承。当代文学在路遥身上延续和汇聚了三条线索。一是延续十七年文学传统，这中间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继承。这一继承既保证了路遥在文学史及接受史上的延续性，也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制性力量做了最后的释放。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写作取向被主旋律写作所取代。二是路遥的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及苏联文学乡土性的写实主义。只不过路遥作品几乎没有批判性而更多的是客观写实性，这一写实性对当代读者的现实感塑造及社会分析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三是陕北地域的生存焦虑所激发的自卑与自尊相搏斗的主观浪漫性、道德化宗教受难式的英雄主义成为底层励志的典范。这三个脉络在路遥身上汇合，使路遥成为当代文学反复讨论的对象。^[20]

孙胜存的郁达夫小说研究也值得关注。孙胜存分析了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提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充斥着“零余者”形象，这不无颓废主义气息的文学形象，向我们展示的是在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过程中，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构架和文化范式中脱胎而出，寻找、建构自我的艰难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同时，郁达夫笔下的性描述与性欲话语表达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这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范式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自我、族群以及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这是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记录了现代个体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美学反抗。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是中国现代情感伦理变革历程中的一个显著文学事件，为现代感性自

我这种全新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合法性。^[21] 苏丽娜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为切入点,着重对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进行分析。作者通过文本呈现出来的情节内容和人物性格塑造,分析郁达夫在对三位女性形象的建构中投入了怎样的内心投射,并以此探求郁达夫在文本创作中投射的潜意识根源,而郁达夫作品的独特风貌也正是体现在他创作时能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射在文本中这一特质方面。^[22]

其他研究对当代小说创作进行的研究多为文学批评。刘起林分析了台湾作家林佩芬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问·小说明末》,认为《天问·小说明末》以明朝衰亡为主线,“东虏”大清崛起、陕北“流寇”民变和江南复社士风为副线,显示出全景性再现历史的叙事格局。又以人性阐释历史,剖析了朝廷重臣和复社名士精神蜕败、人性堕落的人格状态,揭示出明亡的历史必然性。作品呈现了历史进程中“沉重的悲哀”和“壮烈的努力”,讴歌了大明将帅浴血疆场的气节和江南名媛洁身自好的情操。作品将王朝衰亡挽歌、人性蜕变哀歌和崇高人格颂歌有机融合,开拓了明清易代题材的审美新境界。^[23] 张清芳分析了张伟小说《刺猬歌》中齐文化孕育出的“野性(物)生命观”,认为张炜在文学作品中逐渐造就了自己独特的“胶东海边丛林世界”和韵致独特的写作风格,这也成为其最鲜明的文学特征。多年来在苦心孤诣地营造这片“胶东海边丛林世界”的过程中,作家逐渐赋予了它的精髓和灵魂——齐文化孕育出的“野性(物)生命观”,并在2007年出版的《刺猬歌》中达到成熟。齐文化孕育出的“野性(物)生命观”在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中发展成熟,其构成因素与基本内容既包括在充满浪漫传奇的齐文化氛围的胶东海边丛林世界中野物与人类的水乳交融关系,又包括那些充满奇人异事与野史传说的奇妙故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和客观性,使《刺猬歌》成为21世纪以来文坛的一部奇书,产生较大影响。然而由于“野性(物)生命观”在内部又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导致《刺猬歌》在艺术上也相应地出现一些瑕疵,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作者文学思想上的某种局限性。^[24] 杪椽评析了叶炜的“转型时代三部曲”,认为知识分子是当代文学写作中的重要主题,叶

炜的“转型时代三部曲”继承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通过对日渐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大学生活的描写,塑造了史真、牛万象、陈敌等知识分子中的失败者形象;在对学术生态乱象和校园伦理蜕变进行无情批判的同时,将人物放置在欲望与理性的博弈中,鉴照出复杂的人性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局限性。以故事为主的叙事方式、多样化的叙事视角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三部曲”充满对现实的精神关怀和理想期待,彰显出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25]

四、戏剧诗歌研究

戏剧研究。值得注意的有阎浩岗《赤叶河》研究和宋宇的新世纪中国话剧创作态势与特征研究。阮章竞的歌剧《赤叶河》曾与《白毛女》齐名,二者大致同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即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导,严格按该意识形态对社会阶级关系及不同阶级本质的判断进行艺术描写,并可以作为推动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运动的形象化教材,具有直接宣传鼓动作用的作品。而阮章竞此前写成的四幕秧歌剧《南王翻身谣》却属“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将这两部作品与作者当年参加土改时的原始笔记材料对照细读,可以发现其创作从“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到“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演化的轨迹,发现“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形成的现实基础、其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内在机理,进而认识其中的经验教训。^[26] 关于新世纪话剧的题材和审美,宋宇分析认为21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仍然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演绎为主,先后出现了多部以纪念革命历史、重温革命记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题旨的舞台精品剧目。剧作者、导演普遍以“情感表达”作为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方法与策略,凭借对革命历史的“在场性”叙述与革命英雄的“人性化”塑造,完成了对先前剧目题旨内容趋同现象与排演模式固化问题的突破。这些基于“人文立场”与“微观视角”的创新对今后同类题材话剧的创排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27] 21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创作对民族风格的演进侧重于文本内部的审美提升,剧作家整体上表现出在素材撷取层面对民族史述和民间传奇的内容借鉴,并注重在戏剧结构和语言层面对韵文曲艺及民间文化元素的渗

透。一方面，现代语境与民族语汇表述的融合作为话剧民族化进程中的理念尝试具有一定的史论价值；另一方面，其所呈现的审美架构与现代性评判视域互相博弈，具有迎合市场文化和相对民族主义的精神导向。^[28]薛媛对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进行阐释，指出欧阳予倩在近半个世纪的戏剧创作与研究中积累了丰富厚重、自成体系的戏剧理论成果。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与社会现实、时代风潮、民族命运、国家大义紧密相连，充满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回归人本、爱国民主等进步思想。欧阳予倩具有自觉的受众意识，在戏剧创作中生动运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刺”手法，并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富于自主意识的新女性形象。欧阳予倩的戏剧思想不仅是其个人戏剧创作经验的记录与总结，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历程的珍贵史料。^[29]宫立围绕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发表进行相关史料梳理，也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30]

诗歌研究。有研究对当代诗歌创作中呈现的某些美学特征进行归述，如杨宇静论述了新诗地方性问题：作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地方性问题的凸显，从外部来看，地方诗学是一种特殊的话语批判范式。从诗歌内部来看，诗歌地方性的凸显是汉语新诗话语焦虑的美学体现。地方诗学的凸显，既与现代性话语和全球化语境带来的社会文化转型有关，又是汉语新诗话语焦虑的美学体现。地方性包括以自然、人文景观为基础的物质地方性和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化想象力展开美学创造的个人地方性。物质性是地方性的基本特征，既包括地方物象的客观物质性，还包括其背后作为一种精神原则和美学气质的主观物质性。差异性不仅是地方性的特征，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美学认识论，具体包括地方性的空间差异性、时间差异性和主体差异性三个层面。地方诗学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范式，是汉语新诗面对当代语境和自身问题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它还重新启发了一种“物本主义”诗学的可能。^[31]诗人个案研究值得注意是景立鹏的顾城诗歌想象力的分析，作者认为从顾城的诗歌写作中，可以发现一种“生成的诗学”，这既体现在其诗歌想象力范式的三重嬗变上，又体现在每种想象力范式内在的生成性上。从早期的童话想象，到“朦胧诗”时期的历史想象，再到中后期的语言

本体想象，这一演变过程具体而丰富地实践了个体生存面对历史现实境遇的可能性方式。作为诗歌生成的内在动力，想象力彰显的不仅是一种修辞上的话语策略，更是重新创造自我与世界，更新词与物的二元关系的解放性力量。顾城诗歌想象力范式的嬗变的意义，在于他把诗歌从一种主客二元论的关系性存在，提升为一种实践性、创造性的一元论本体性存在。这为解决现代汉诗写作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32]

五、河北文学研究

河北地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河北四侠”的创作读解方面。李浩作为学者型作家，其小说创作呈现出明显的理论自觉。杪楞对李浩小说先锋写作流变进行梳理，认为李浩只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写作，而不考虑绝大部分读者的阅读感受，他只期待“理想读者”。这种写作观和读者观从根本上造就了他的小说的“先锋”相貌。李浩通过时间和视角等影响叙事的多重要素完成叙述，通过将场景化、形象化的叙说抽象为寓言式的讲述，来强化故事与观念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极具先锋性的风格。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和文学主张在李浩这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表达个体遵从个人的意志、精神和生活方式，不屈从于已被“大多数”人遵守的秩序和规则，表现人与现实之间充满“敌意”的紧张关系，是李浩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价值取向。他的小说出现了一些既与先锋派有所区别、更与长期居于中国文学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写作不同的特质，包括在先锋派小说基础上增强了现实的作用，加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寓言性，在注重形式的同时强化了主题指向等特征。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思辨意趣，既有对生活可能性的探求，也有对叙事可能性的思考和尝试。^[33]张清芳评论李浩新作《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时则强调了李浩小说的“理想小说文学观”理念，认为李浩因先锋性、创新性的纯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而拥有中国当代“先锋派的后裔”之誉。他在多年创作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与完善“理想小说文学观”理念。他的长篇小说《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就是遵循“理想小说文学观”的理念创作的一部“理想小说”，小说通过讲述封建社会（兼影射古代亚洲个别地区与社

会) 11 个帝王君主精彩纷呈的命运故事与人生遭遇, 重新思考历史并建构现代性历史观及以此反观整个人类命运遭遇。小说折射出李浩小说创作道路上不断追求艺术创新性的执着精神。^[34]“河北四侠”的另一位作家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发表后, 引起轰动。王力平和吴媛对小说艺术特质进行解析。王力平分析指出, 让“不会说、不会动”的祖奶, 以第一人称视角、用内心语言讲述自己的百年人生, 是作者的精心选择。“第一人称”是“限知视角”, 但祖奶的“第一人称”叙事是“超视域”的。她不仅具有情感和内心内容的丰富性, 不仅承载了独特的、形而上的观念内涵, 同时获得了鲜明的性格特征、具体的职业身份和独特的社会属性。同时, 《有生》在独特的“伞状结构”中, 塑造了祖奶人生接引者和生命摆渡人的形象, 同时讲述了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麦香在人生困境和生命湍流中苦苦挣扎的故事。五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物展开五个独立的故事, 共同构成小说“伞状结构”中的“伞骨”, 构成小说的“当下呈现”。它所“呈现”的, 是经过作家合目的性裁剪的一种人生遭际, 一种生命样态。^[35]吴媛分析了小说的叙述特色, 指出《有生》是作家在经历过种种形式的探索之后复归传统之作, 它为后疫情时代的民族赋形, 不仅塑造了祖奶这个饱经沧桑依旧平和的伟大女性形象, 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一种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民间秩序生活; 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始终保有明确的读者导向, 耐心细致地讲述了一个个有来路有去处, 有着独特声气的人物故事; 它高扬新时期以来的人本主义精神和个人化视角, 同时又呼应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史传”传统, “因人立传”“集传成史”, 将肇自《史记》的“互见法”与现代文学表现手段相结合, 找到了一条既直抵人性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叙述路径。^[36]

林莽作为“白洋淀诗群”的重要成员, 一直活跃在诗坛并为河北研究者所关注。杪楞认为林莽是一位改变了当下中国诗坛生态格局的诗人和诗歌“工作者”。林莽作为“白洋淀诗群”中的重要成员, 在至今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 他始终像一位“报警人”那样对时代生活保持着高度的敏感, 其创作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体验、记忆和由生活激发的情感之上, 多通过

自然的意象以象征手法表达自我的日常生活感受, 不断延展着白洋淀时期形成的创作风格。林莽还以“诗歌工作者”的身份为中国诗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参与和见证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史。^[37]

六、小结

本年度, 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指出: 第一, 研究梯队呈现出不错的势头, 刘玉凯和田建民的鲁迅研究, 阎浩岗的红色经典和土改叙事研究继续保持着国内学术研究的前沿地位, 王力平、张清芳、刘起林、杪楞、陈黎明、魏建亮等人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对话, 不断在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界发出河北声音, 发展势头强劲。第二, 学术新人崭露头角。宋宇、王永祥、景立鹏等学界新人崭露头角, 既为河北学术研究梯队的稳定提供了后备力量, 也为学术研究持续发展的提供了保证。宋宇的戏剧研究和景立鹏的诗歌研究未来可期。第三, 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前沿性得到一定程度加强。当代文学研究人员除了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外, 还有来自省作协和文联系统的王力平、杪楞、吴媛等人。其文学批评贴近时代和文学肌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强化了文学研究和批评对当代文坛发展进行干预的有效性, 为河北当代文学批评注入了生机。当然, 问题也比较突出, 也是老问题: 当代作家作品特别是小说研究成果数量较多, 但研究成果整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对作家的关注缺乏连续性。而且, 批评者从“历史—美学”高度作作家论批评的成果偏少, 文学评论的理论穿透力与历史穿透力都有待加强。

(李致: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田建民: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田建民. 集体主义语境下的个性主义诉求——也论“延安文艺新潮”[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 王明娟, 岳爱华. 抗战时期中国女性作家的时空叙事及思想表达(1931—1945)[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3] 陈黎明. 文学编辑与 1980 年代中国文学生产——以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为例[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 版),2021(05).
- [4]田建民,聂章军.乡土与城市之间的时代缩影——论“70后”作家的小镇叙述[J].长江学术,2021(02).
- [5]杪稷.在无限世界里展现人的丰富性——202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网络小说综述[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
- [6]杪稷.网络文学中的乡村想象与叙事策略[J].中国文学批评,2021(02).
- [7]刘相美,林沙欧.从“读者”到“人民”:新媒体文学的“人民性”发展方向[J].河北学刊,2021(04).
- [8]魏建亮.保卫读者:中国当代文学“脱困”的一条进路[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02).
- [9]张清芳.海外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研究及其诗学建构——以美国学者宋明炜的研究为中心[J].当代文坛,2021(06).
- [10]汪霖霖.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略论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01).
- [11]刘玉凯.《故乡》的“小说学”密码——鲁迅《故乡》艺术设计解析[J].现代中文学刊,2021(04).
- [12]沈祖新.“反抗绝望”的“暗”与“明”——以《坟》为考察中心[J].新纪实,2021(25).
- [13]田建民,田天.《秋夜》与《北方的冬天是冬天》的互文性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20(12).
- [14]杨程.丑角、看客与孤独者的悲喜剧——鲁迅与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形象之比较[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
- [15]王永祥.思想如何成为变革现实的力量——伊藤虎丸“鲁迅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意识[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
- [16]阎浩岗.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
- [17]吉媛圆.农民主体性的召唤与建构——论赵树理的“算账”[J].中国文艺评论,2021(07).
- [18]阎浩岗.《李自成》的经典化、去经典化与再经典化[J].新文学评论,2021(03).
- [19]阎浩岗.合作化小说的又一种写法——评陈残云《香飘四季》[J].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03).
- [20]王永祥.陕北路径与路遥文学创作取向的分析[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04).
- [21]孙胜存,邓招华.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与现代情感伦理变革[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
- [22]苏丽娜.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意识与潜意识——《她是一个弱女子》再解读[J].名作欣赏,2021(24).
- [23]刘起林.《天问·小说明末》:历史与人性并呈的末世悲歌[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
- [24]张清芳.《刺猬歌》中齐文化孕育出的“野性(物)生命观”的魅力与瑕疵[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01).
- [25]杪稷.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与精神自省——评叶炜的“转型时代三部曲”[J].枣庄学院学报,2021(01).
- [26]阎浩岗.从《赤叶河》的创作与修改看“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形成[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01).
- [27]宋宇,杨一森.宏大叙事中的情感表达——21世纪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排的方法与策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
- [28]宋宇.新世纪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审美基调与创作态势[J].河北学刊,2021(04).
- [29]薛媛.欧阳予倩戏剧思想的美学特质与文化意蕴[J].四川戏剧,2021(01).
- [30]宫立.关于钱谷融和《雷雨》人物谈[J].现代中文学刊,2021(01).
- [31]杨宇静,景立鹏.地方诗学:作为一种话语范式[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01).
- [32]景立鹏.生成的诗学——顾城诗歌想象力范式的三重嬗变[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04).
- [33]杪稷.在先锋写作的流变中——李浩的文学观与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21(02).
- [34]张清芳.“理想小说文学观”——以李浩《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为考察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21(06).
- [35]王力平.论《有生》的“超限”视角与“伞状”结构[J].小说评论,2021(04).
- [36]吴媛.对秩序与存在的召唤和回应——评胡学文《有生》[J].山西文学,2021(11).
- [37]杪稷.“报警人”藏身在丛林中——略论林莽的诗[J].百家评论,2021(03).

新闻传播学研究

张芸 郭毓娴

2021年,河北省新闻传播学研究立足新闻传播领域发展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探析学科发展创新之路,取

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实现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相融共进。

总体来看,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以下

特点：第一，紧扣重大时政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021年是建党百年，党的新闻传播理论与经验、新闻传媒的主题报道、主题出版等引发学者们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传播现象、传播规律也成为重要学术议题。第二，关注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应用指导性较强。许多学者以小视角切入大问题，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形成的研究成果，聚焦平台创新、乡村振兴、学科建设、国际传播等宏观问题，为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了前瞻性参考。第三，研究视野更开放，多学科交叉趋势明显。在泛媒介化背景下，新闻传播的社会渗透力越来越强，许多学者将新闻传播领域的创新成果置于多元社会体系之中，进行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研究，如媒体新型智库建设、智能营销传播、文化传播助推产业发展等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一、新闻传播实务

伴随着新一代传媒技术的应用，新闻生产理念、流程和内容形态发生深刻变化。2021年的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关注业界生产的新现象、新特征和新趋势，传统广电节目如何创新、如何建立新型的传授关系等成为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一）报刊出版

治丹丹等人从开放科学背景和科技期刊出版现状出发，归纳因开放发展度不足导致传统科技期刊出版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探索开放科学全新范式，引入区块链技术架构，有针对性地构建科技期刊开放发展机制。提出树立科学理念，拓展参与主体；创新方法手段，探索开放模式；完善体制机制，培育合作关系等有益启示。^[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有关新闻出版高端智库的讨论更是受到持续关注。崔嘉欣分析了我国出版智库建设的必要性，归纳了当前阶段出版智库的复杂性，指出，出版行业与智库建设在价值内涵与社会功能层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有助于协同发展；在政策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双重驱动下，出版智库成为出版行业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2]

赵树旺认为，“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出版业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加快内循环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化发展的外循

环。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支持不断推动出版业国际化发展，中国出版产品丰富，溢出效应明显，致力于满足国际社会需求，传播中国发展经验，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出版业应孵化具有国内国际适应性的高质量出版产品，打造国际化出版企业，了解与满足国际阅读市场需求，建构中国出版国际影响力指标体系。^[3]

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信息的重要载体。崔嘉欣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学术期刊的发展面临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必须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才能适应新时代下学术期刊的发展需求。提升学术期刊编辑的创新能力，必须建立一支高效专业的学术期刊编辑队伍，满足新形势下学术期刊发展的需要。^[4]

如何把握新时代的条件，运用当下的数字技术，改变传统的出版运营模式，找到合适的、高效的运营模式，是数字出版企业的当务之急。金强从产业链结构方面和在产业链结构系统之外的现阶段使用较多的盈利模式两方面入手，分析阐述了内容提供商主导型的运营模式、网络运营服务商主导型的运营模式、数字技术支持商主导型的运营模式、终端设备商主导型的运营模式、增值服务运营模式和第三方投入的运营模式这六种运营模式，并分析了在全媒体背景下数字出版运营模式遇到的问题，及应采取的相关解决策略。^[5]

主题出版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正在扮演出版业“时代尖兵”的作用，特别是2014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元年”之后，主题出版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刘冲等人分析了主题出版现状，剖析了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的新特点，并深入探讨了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的发展态势。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断推出符合融媒体传播规律、满足大众需求的精品力作，为实现出版强国之梦作出应有的贡献。^[6]

和曼等人认为，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社会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网络新闻编辑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精通网络媒体新技术、了解网络传播环境特点、具备新闻高度敏感性、能够最大限度优化组合新闻信息，成为网络新闻编辑必备的竞争力要素。网络新闻编辑应充分认识到构建核

心竞争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准确把握“四全媒体”的传播规律,提高网络风险防范与网络舆论引导能力,提升聚合新闻与场景应用能力,加强跨界联动与网络议程设置能力,强化信息运营与效果评估能力,充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打造更多网络新闻精品。〔7〕

治丹丹通过实证调研法,整合、分析ORVIUM平台相关网络信息与文献,分类剖析ORVIUM平台特色服务运营模式。提出ORVIUM平台在零延迟即时发表、持续透明协作同行评议、升级科研成果分享度、全面贯彻同行评议激励机制、出版内容质量提升、贡献者分享出版收益、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科学出版等方面优势显著。建议我国科技期刊应创建透明可信的科技论文出版管理工作流程,构建公平普惠的科技论文出版收益分配体系,探索开放获取的科技论文研究数据交易模式,打造动态自进化的科技论文同行评议专家库。〔8〕

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数字出版业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赵树旺等人指出,当前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面临传播力不足,只问传播不问效果,内容生产不能满足国际需求,缺乏对国际用户的了解,国际化数字出版人才不足等问题。对于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而言,顶层设计是核心问题,适应性内容是基本前提,传播力建构是主要手段,本土化策略是关键能力,人才建设是决定性要素。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应建构具有国际适应性的传播体系,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国际传播效果。〔9〕

(二) 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

丁立捷等人认为,电视时政新闻报道多年来遵从以“新闻通稿”为基本依托的加工生产程序,在保证时政新闻安全的同时,也为该类型电视新闻的创新设置了不应有的壁垒和“禁忌”。“通稿藩篱”的存在制约了电视时政新闻在当今媒体融合大背景下的提档升级,影响传播效果。电视时政新闻应顺应传播格局、媒体理念和受众需求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在管理理念上更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在传播内容上更具新闻性,在表现手段上更生动更鲜活,通过一系列合规范、可操作的实际举措,让重要会议、会见、领导调研等

常见时政新闻变得接地气、有新意,切实优化电视时政新闻这一重要新闻类型的传播效果,使之更具时代感、更具生命力。〔10〕

赵心认为,电视公益广告以其独具的公益性、弘扬主旋律正能量的特点,成为我国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创意主题最广泛、呈现形式最丰富、思想传达最深刻的软性思想引导的重要载体。目前,电视公益广告创作选题受限、创意匮乏、费用有限、刊播空间、媒介环境变化等问题显现。除省级卫视尚需自身发力外,国家加大专项扶持政策力度、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创新公益广告创作机制等多元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省级卫视公益广告创新创优尚有发展提升空间。〔11〕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受众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以及对内容的偏好较之以往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与分发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受众需求,也无法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全文瑶等人指出,面对这一发展困境,电视行业应抓住机遇,紧跟时代发展进程,创建市场受众度高、竞争力强的新兴媒介。同时分析了电视内容生产在现阶段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全媒体战略下电视内容生产的创新路径。〔12〕

彭翠等人指出,百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凭借真实的红色内容呈现、独特的叙述视角、非线性叙事结构,以及富有情感的声画语言,形成了大型献礼纪录片独有的传播特色。《山河岁月》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一部红色精品力作,在全民学习“四史”(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代语境中,具有展现百年大党行稳致远的传播意义,以及重温红色党史,坚定理想信念,继续艰苦奋斗,传承红色基因,打造时代精品,铸牢精神家园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精神文明内核的时代价值。〔13〕

沈静等人从国内首档老兵生活探访纪实节目《本色》出发,以“退伍军人转业后的生活”为主线,展开个体“生命故事”的再述。相较以往的纪实节目,《本色》的叙事注重平衡感性与理性,为观众打开一扇从平凡生活中发现军人本色的窗口,在大时代的变迁中映射出永不褪色的军人精神,彰显了探访纪实节目的社会价值,其传播路径的创新亦为同类节目带来诸多启示。〔14〕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锻造电视剧精品力作、推动电视剧艺术高质量发展,对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和曼等人从叙事学视角分析精品电视剧如何构建影像叙事模式,着重剖析影像叙事形态类型化、影像叙事手段复调化、基于VR技术重构影像叙事新秩序,旨在探求当代中国精品电视剧的叙事规律与建构逻辑。^[15]

资小玉指出,“熊猫和和”系列合拍动画片以国宝熊猫动漫形象和世界各国知名动物动画形象共同作为主要角色,通过演绎互助、友谊与成长的奇趣故事实现了对中国“和”文化内涵的创新表达,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影视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成果。该系列动画在探索中已然建构起比较成熟的国际合作品牌范式,对新时代动漫中外合作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经验。^[16]

在众多短视频类型中,微纪录片已成为进行主流价值观传播,凝聚我国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增强“四个自信”的重要载体。王晓旭等人对2020年以来各大新媒体平台播出的微纪录片进行了系统梳理,一些优秀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也获得了上千万播放量。微纪录片是折射新时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新的影像载体,将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17]

孙会收集了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近20年内,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出的抗灾类公益广告近百个案例,探究其审美价值、建构方法和传播特性等内容,感受其中的审美力量及美育功能。指出,电视公益广告以美的视觉形式承载公益观念,对人的精神和行为进行价值引导,审美性是其重要特性,亦是其职责所在。无论是社会热点话题、政府政策导向,还是突发重大事件,在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主体的媒体平台上,公益广告成为不可或缺的宣传力量。^[18]

近年来,在新兴起的地理媒介学视角中,看待媒介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陈姝睿聚焦于公路电影,将古典地理学与传播学结合,提出将地理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媒介,认为地理环境作为渲染氛围、以造型参与叙事与情绪表达的媒介出现,地理媒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角色经历与影片叙事之外、以地理景观要素寻

求突破的道路。^[19]

(三) 新媒体与媒介融合

周伟红等人认为,在理解侧重于传播概念意义的AI语音时,受众是依赖狭义语境——语流语境的,受众基本上不用借助语流之外的要素来理解语流所传播出来的意思。当前,AI语音只是在传播概念意义的领域变成现实,在涉及传播主体的情感意义和传播客体的形象意义时,由于受到语音数据库的限制,AI语音还无法像真人那样自由、准确地对传播主体的情感意义和传播客体的形象意义进行表达。对传播主体的情感意义和传播客体的形象意义自由、准确的表达是AI语音技术今后努力的方向。^[20]

在收听人群总数增长趋缓的前提下,广播的收听渠道正在逐渐由传统的无线广播终端向更加多元的移动在线终端转移。许海滨等人以河北交通广播开办的《992大家帮》栏目为例,指出其收听率一直位于河北省和石家庄广播前列的主要原因就是满足了本土化用户的收听心理。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外,该栏目也通过新闻客户端“冀时”和微信公众号进行视频直播,吸引更多用户参与节目。许海滨等人提出融媒体时代广播媒体能够做的就是解放思想,打破媒介壁垒,尝试多种传播方式,为用户更好地体验广播魅力创造无限可能。^[21]

耿立新认为,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优势,更好地为受众提供多样化广播节目、电视内容等,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提供更好的媒体服务。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程,为缓解广播电视竞争压力创造了条件,在新媒体时代想要促进广播电视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加强与新媒体的融合,创新新闻编辑,增加与观众互动,强化受众优势、传播力优势的转化,创新传播途径,改进新闻形式,充分发挥微信等社交平台优势,拓展融合范围,实现广播电视的全面发展。^[22]

和曼等人提出,整合多种媒介的叙述信号,强化话语系统的运作实践,发挥交往沟通的交际职能,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主体间性,成为融合新闻遵循的叙事规则。以此切入,厘清融合新闻叙事的信号逻辑,依托叙述者、叙述视点和叙述时空等类组号形成叙事集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新闻事件;阐释融合新闻叙事的表征实践,归纳表

演性、体验性和创造性等话语特征；加强虚拟现实媒介传播的有效沟通，调节叙述行为促进主体与客体抵达共识；瞄准交互主体性，分层建构融合新闻叙事，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和一致，为今后融合新闻的生产、设计与创新提供建设性的建议。^[23]

李敏等人认为，党报微信公号内容生产的关键在于从精英、严肃的纸媒向平民化社交媒体的转型，这需要重估媒介价值、调整定位及叙事方式。《河北日报》微信公号定位服务本省用户，选题上偏向生活化和服务性，话语风格上弱化政治性，以情感传播与客观陈述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实现舆论引导，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修辞策略，建构了不同于传统地方党报和营销号的话语模式。^[24]

赵军霞认为，新媒体时代，面对复杂的信息传播环境，以及日益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纸媒的转型发展之路可谓困难重重，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风险，要求运营者必须与时俱进，及时转变经营思维，在整合优势资源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手段培育核心竞争优势。以《中国新闻周刊》为例，从平台转型、改进文风、产业融合、尊重新媒体传播规律等四个方面入手，探讨其新媒体转型路径，希望能够为国内纸媒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借鉴。^[25]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促发了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形态、媒介表现形式已形成复杂而多元的模式，传受关系从单一型转化为复合交互型。自媒体、网络媒体发布的信息充斥网络信息环境，地方传统媒体声音在媒介环境中逐步被弱化甚至存在被替代的风险，新型主流媒体成为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陈姝睿以象征性互动理论为视角，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从模块互动、内容互动、“粉丝”经济与品牌创设等方面进行解构，提出“双优化”“三融合”方式解决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的不足，从而提高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动力，创建地方融媒体中心品牌。^[26]

樊拥军等认为，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之后，需尽快摆脱原来的经营管控思维与路径依赖，着眼于全媒体时代的集成服务平台角色定位，转向集成服务运维主导的枢纽中心建设指向，汇聚整合各种有价值的服务板块资源，建构

生机勃勃的集成服务生态，通过优化配置生产生活服务要素，协同群众个体、行业组织、公共机构共赢发展，并在介入引领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国民素养的积极服务作为中，助力干群关系改善，树立基层政府形象，最终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社会和谐共进的长远目标。^[27]

（四）媒介经营管理

高丽凤等人以咪咕阅读为研究对象，探究多维营销的渠道建构。认为4C营销理论强调的是用户、成本、便利和沟通，尤其是要以用户为中心。在激烈的移动阅读市场竞争中，4C营销理论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咪咕阅读站在用户的立场上思考营销策略，通过对用户阅读痕迹和阅读行为进行分析，不断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为用户提供最全最新的阅读产品是其主要服务目标。以受众为本，持续优化体验；提供个性服务，增强市场穿透性；加强战略合作，拓展市场空间；咪咕阅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其独特的营销手段有着重要关系。^[28]

广告教育从1983年开办至今，已走过了近40年。广告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代发展、技术革新等都对广告教育不断提出新要求，从整体上认清广告教育研究重点的转向非常必要。商建辉等人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结合CITESPACE分析软件，选取358篇文献，对样本的发文量、作者和机构等信息进行量化处理和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广告教育的研究大致经过了空白期、波动上升期和波动下降阶段。广告教育的推进和技术进步密不可分，近几年更注重对新技术的运用，且反复强调要培育“全媒体人才”。^[29]

张艳认为，随着算法在智能营销传播领域的普及应用，被算法黑箱所遮蔽的算法偏见等负面效果也渐次浮现，算法正在左右人们的认知习惯和消费偏好，并遮蔽了“算法权力”背后的决策偏见与市场力量，算法服务对社会的“隐性规训”正在显现。同时算法决策机制的动态性、隐蔽性与结构性等特征，增加了偏见识别和判断的难度，给传统规制理论和实践体系带来适用困境。元规制理论强调政府监管部门通过正反面激励与合规指引，促使算法控制者针对偏见问题作出自我规制回应，为算法偏见的规制与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30]

赵兵认为,平台型媒体是指在互联网思维下整合不同资源、具有融合性体制机制,以开放共享的技术平台为支持,重构与用户关系的融媒体生态系统。从长城新媒体的探索来看,平台型媒体本身具有更强的互联网基因,是传统媒体转型和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长城新媒体集团成立之初就把技术领先作为发展战略之一,依托冀云·融媒体平台构建起资源整合、多元应用、协调联动、数据挖掘、一体运营的省级新闻宣传管理“一张网”,成为数据总汇和运营枢纽。^[31]

二、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新闻传播实践的急剧变革热切呼唤理论创新。2021年,河北省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积极回应业界关切,研究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建党百年之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探讨、疫情之下的应急科普、直播带货的规范发展、县级融媒体与基层社会生态的连接等研究都颇具对话意识,拓展了相关研究维度。

(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和曼等人认为,当前,各大新闻院校都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不仅在教学实践中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方式方法,也紧密结合当前新闻领域发生的变革,教导学生坚持四个自信,铸就了坚固的治学根基。面对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的挑战与创新,要不断把握历史教育之“本”,强化巩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扎根实践教学之“根”,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确立教材建设之“魂”,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新闻院系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精髓贯穿到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构建“三位一体”育人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伦理教育及专业知识教育有机融合起来。^[32]

白树亮等人聚焦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分析了其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困境,比如亟须更新观念、完善理论体系、扩大人才培养规模等。结合理论探索和案例分析,认为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对新闻出版人才培养的统领作用,致力于培养五类高层次人才,包括培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新闻出版人才,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新媒体新闻出版高

端人才,高层次新闻出版科研人才,新闻出版名家和专家。^[33]

(二) 媒介传播与社会发展

徐占品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灾害事件中频现利用网络聚集效应和网民恐慌情绪制造传播谣言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谣言多发成为灾害信息传播的一大特点,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灾害谣言传播中的造谣、传谣、信谣三个环节,其不同的传播特点折射出不同传播主体的社会心理差异。始作俑者的造谣行为若勾连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谣言扩散离不开应激状态下的群体影响,信谣过程则是在安全恐慌和熟人社会机理下催生行为异常。^[34]

刘晓岚从开发与整合应急科普内容、打造全媒体传播平台、应急科普需形成合力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应急科普全媒体传播的意见与建议,包括开发与整合专业性强、形态全、体验深的应急科普内容。按照全媒体要求打造应急科普传播平台,及时跟踪和把握应急科普的传播效果,科普宣传与新闻宣传须形成合力,科普宣传须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应急科普也要开展新媒体营销。^[35]

张巨才提出,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科学、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基础,指引着其建设方向,关乎县级媒体深度融合的成败、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的形成和县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传播、服务、治理三者共融协同,同频共振,互动互促,构成支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铁三角;全媒体平台、综合服务平台、治国理政平台三位一体,构成融媒体以基础功能、延展功能与高阶功能为主要内涵的立体框架。^[36]

韩春秒认为,直播带货是网红文化、直播现场和粉丝经济商品化的结果。在经历2019年的爆发期之后,直播带货在2020年进入渗透期。直播带货是流量和商品寻求变现的场域,也是带货者与用户打破娱乐、消费与文化边界的狂欢之所。2020年度,河北省直播带货可概括为“主流化”“转型+公益”与“普遍化”三个方面,同时存在高端电商主播稀缺、知名MCN机构不足、直播供应链搭建滞后、传统产业支撑有限等短板。在对直播带货日益规范化、垂直化、多域

化与专业化的趋势把握基础上,从完善产业链配套体系、建构产业应用支撑、引导企业培养私域流量、布局直播带货人才链和完善监管机制等方面,对河北省直播带货提出发展建议。^[37]

杨秀国等人借助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的方法,从高、中、低三个维度探究《人民日报》在建构扶贫议题时所采用的新闻框架。研究发现,在高层次上,体现为领导人扶贫工作、脱贫成果展示、国际减贫事业、典型宣传、舆论监督、精准扶贫等六个框架。在中层次上,强化主要事件和口头反应框架,弱化事件背景和评估框架。在低层次上,大量使用限制性修饰语突显报道客观性,围绕“帮扶谁、谁来扶、怎么扶”建构新闻文本,将贫困群众的形象建构为贫穷苦难的经历者和扶贫事业的受益者,将政府形象建构为扶贫事业的积极推动者。^[38]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迭代升级,有声阅读行业正在历经生产结构性变革与产业链条的重塑,总体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在火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侵犯用户隐私、内容低俗化、数据造假等失范现象。张艳等人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各方资本在新媒介场和元场域中相互博弈是诱发有声阅读伦理失范问题的根源,并从各场域视角剖析有声阅读中的伦理失范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多元规制路径,为有声阅读市场的伦理重建提供思路和指引。^[39]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媒体迅速开展应急科普,帮助公众科学认识和正确应对疫情。张旭等人以地方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主流媒体应急科普的现实图景,发现地方主流媒体应急科普在协调机制、议程系统性设置、交互回应等层面存在的不足。地方主流媒体要建立应急科普常态化协调机制,加强优质科普内容生产者的供给能力;把握应急科普议程,提升应急科普报道策划能力;正视公众质疑与回应,提升公众科普获取能力;增强主流媒体从业者科普传播的使命感,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40]

张捧认为,后真相语境下,受众往往从情感出发,对所关注的新闻进行情感宣泄和表达。由于新媒体的话语赋权给了受众更为自由的发言权和传播权,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朝着多元化方向转变,网络新闻编辑审核新闻信息缺乏甄别和多维分析意识等原因,导致了模糊新闻、拼凑新

闻、煽情新闻等异化现象层出不穷。网络新闻编辑防范新闻异化需要强化意识,坚守新闻真实原则,提高媒介素养,转换自身角色,关注受众情感,做好引导工作,提升把关能力。^[41]

(三) 国际传播

郭广伟认为,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然而,由于中西方存在隐私观念、时间观念、礼貌观念、饮食习惯及身势语等多种方面的差异,给中西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造成重大障碍。究其原因,大致可归于价值观念、民族性格、自然环境三个方面。基于此,为保障中西之间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开展,建议从端正文化观念、全面了解中西文化背景、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等方面着手加以破除。^[42]

彭焕萍提出,传统上强调负面与冲突新闻叙事的西方新闻业正遭遇着公信力下降、受众流失的窘境。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开放性、辐射广泛的新闻理念成为西方新闻业“自救”的一种方式。建设性新闻实现了核心理念上的全维度革新:记者完成了从“旁观者”到“解困者”的转变;新闻文本的报道时空维度从“现在”走向“未来”、从“二元”走向“多元”;恢复性叙事推动人们的认知态度从“消极”走向“积极”;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变为主动的协作生产者。这种基于建设性和正面积极作用的新闻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媒体在全球资本市场驱动下追求“眼球”的报道逻辑。但是,建设性新闻在西方新闻界始终未能撼动新闻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负面、冲突新闻框架的统治地位,还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层面。^[43]

田苗认为,燕赵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发展,梳理燕赵文化资源,探索燕赵文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路径,有利于弘扬燕赵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燕赵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和跨国企业经营提供文化支持,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调查并对传播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拉斯韦尔“5W线性传播模式”理论为视角,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等方面提出建议,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传播效用,灵活运用媒体传播渠道,关注传播客体需求,进一步挖掘燕

赵文化资源。^[44]

韩立新等人提出,我国影视国际传播正在成为自塑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影视国际传播不仅仅是传播环节的工作,更是覆盖多元主体共建的生产、叙事和传播的系统性工程。从三方面来看,生产方式:中外合拍与技术创新;叙事方式: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基于新时代条件的传播融合。韩立新等人认为,要提高媒体工作者对媒介技术和社会形态关系的认识能力,就要对不同地区、类型、领域的内容生产选择相匹配的技术应用和传播方案,以期达到适宜的国际传播效果。^[45]

(四) 舆论舆情

马连以 2018 年 2 月上旬的“央视快评”为着眼点,探究主流媒体如何在新闻评论方面进行有益探索,重新凸显新闻评论在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提高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央视快评”准确把握了移动互联网传播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借助新媒介技术进行积极有益地探索创新,塑造央视主流媒体的权威品牌形象,打造全媒体矩阵,开通“两微一端”,打通线上线下,融合 PC 端和移动端,拓展全媒体立体化、场景化传播方式,满足用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接触需求。^[46]

刘毅等人认为,地方主流媒体是地方政府与公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在政策传播与舆论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媒体融合的传播新生态下,地方主流媒体依托传统端进行融媒转型,开设“三微一端”的新媒体平台,在实践中探索融合传播的成功之道。笔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平台——“冀时”客户端为例,进行受众调查及数据分析,探索地方主流媒体在融合传播中如何实现舆论引导策略的创新。在重大舆情事件爆发的关键期,要切实发挥慢直播舆情稳定剂的作用,为公众呈现“过程”,平息负面情绪。^[47]

陈志军等人通过对既有舆情事件文献中记录的政府政治传播行为进行类属分析,把政府政治传播策略解构为价值传播、事实传播、传播姿态、传播管道四个维度。在价值传播中,要面对显性群体与隐性群体、上级与下级、特殊与一般的张力;在事实传播中,要以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符号系统为基础,采用说服、议题设置和沉

默等策略干预受众对事实的认知;通过言行举止中展示的责任态度、表达方式、响应时间、效度和力度等姿态,激发受众的情感,增强传播内容的说服力;组合传播媒介,整合社会传播,构建全方位、多渠道、多主体的政府政治传播体系。^[48]

张玮等人认为,与其他类别突发事件相比,拆迁事件具有利益冲突激烈、诉求强烈、煽动情节明显等特征,极易引发社会关注。在拆迁舆情发展中,基层政府普遍存在对媒体重视不够、危机认知不足、缺乏舆情处置机制、不敢应对不善应对等问题。在城市拆迁舆情管控的具体工作中,相关政府部门和涉事主体要充分认识到舆情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从媒体和网民诉求的心理建构出发,把握好拆迁舆情路径转换关口,对舆情发展实施差异化处置措施。以此减少负面舆情发生概率,推动城市化建设科学、高效运行。^[49]

苏妍嫒等人挖掘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网络群体集聚特征刻画舆情扩散图谱,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网络舆情传播打破了网络空间生态均衡,甚至会造成社会混乱,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网络舆情涌现扩散受到事件、主体、环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在时效性、根植性、不均衡性、异化效应影响下呈现阶段演化、空间集聚、等级扩散、话题衍生等跨时空群体集聚演化态势,应充分发挥政府、媒体、智库以及公众多主体功能优势,实现网络舆情“棱锥型”治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50]

王秋菊等人认为,社交媒体目前已成为环境风险舆情形成和扩散的主要渠道。“媒介化社会”理论为探究社交媒体中环境风险舆情扩散提供了切入视角,一些环境事件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获得进入线上舆论场的“入场券”,并且在特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传播环境中传播。社交媒体中舆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扩大了环境风险舆情的扩散范围;环境事件性质和环境风险传播主体对环境风险议题的解读,成为影响环境风险舆情传播速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利益相关者维权博弈,议程间互动助推了环境风险议题的扩散深度。基于环境传播的伦理责任,要从环境风险舆情扩散主体的“舆情素养”“风险共

识”“信息供需”“互动传播”等方面加强对环境风险舆情的引导。^[51]

杜志民提出,新闻舆论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重要,在面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时,新闻媒体要对权威信息进行及时传播,积极回应群众的关切,引导并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平稳、积极、健康的情绪与良好心态。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新闻媒体更要强化新闻舆论的引导宣传作用,充分发挥网上网下的优势,实现新闻舆论的良性传播。要充分发挥全媒体优势,提升新闻信息专业性,传递正能量,用暖心陪伴强化民众抗疫信心,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52]

三、新闻传播史论

2021年,站在建党百年历史节点,河北省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回望历史、观照现实,突出河北特色,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关于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出版思想、河北新闻教育史、晋察冀新闻出版等专题研究,极大丰富了河北新闻史的研究视野并不断走向深入,成为史论研究的创新高地。

孙斐认为,民国期刊《商业杂志》反映了人才思想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在商业教育方面体现为学徒制与学校教育制度的冲突与重构,商业管理方面体现为封建家族制与现代管理制度的冲突与重构,在商业人才评价方面体现为“轻商”思想与近代工商社会新精神的冲突与重构。基于时代特征的人才思想研究,可以为近代中国的文明转型研究提供依据与参考。^[53]

王姗等人认为,党报百年经营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而变化。革命时期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读者群体,党报经营以发行为重心,经济上依赖拨款。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企业化管理,但于1957年中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党报为主体的报业在经营上持续创新突破,实现了市场化转型、集团化发展,开始了融媒化探索。党报经营重心经历了重发行,到重视报业产业链,再到创新融媒产业链的变迁过程。党报百年经营嬗变带来诸多启示,坚持“党报姓党”,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经营的前提;把握传媒产业规律,遵循市场经济要求,是搞好经营的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走好群众路线,是搞好经营的基本路径。^[54]

崔嘉欣认为,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等外国人和中国知识界人士,成为翻译出版西方法学书籍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汉译法学出版领域整体呈现书籍数量多且主题丰富、出版时间与地域分布不均衡、出版机构类型众多、出版活动与时局走向紧密相连、出版质量参差不齐等特点;汉译法学书籍大量出版,助推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55]

韩立新等人提出,报学教育的诞生,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思想解放、教育程度等息息相关。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下设立,是新闻教育中国化过程的先锋。时任第五任系主任刘豁轩,是新闻教育中国化的重要人物。他提出“新闻教育中国化要与实际结合”“新闻教育要造就时代的报人”等重要思想。在燕京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现河北大学前身)任课期间,进行课程、教材、实习等系列改革,推动新闻教育中国化进程。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中指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新闻教育不断中国化的这个过程包含了理论创新、自我创新。^[56]

在民族危亡、环境恶劣的艰苦岁月,晋察冀边区期刊出版事业作为根据地宣传媒介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在推进根据地建设、抗战动员、维护统一战线以及国际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领导下稳定出色的宣传堡垒。张金凤等人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从背景、规模、种类、内容及形式维度对于晋察冀边区的期刊出版事业进行分层综述。^[57]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发展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韩立新等人认为,在此阶段,党报党刊、新闻通讯社、图书出版发行等事业全面繁荣发展,新闻出版工作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成型,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搭建了总体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在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回顾西柏坡时期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传承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对于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推进新闻出版事业开拓

创新具有重要意义。^[58]

魏海岩等人认为,宋代邸报定本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报道事前审查制度,当权者借以实现政治宣传、舆论营造之目的。当时统治集团很重视定本权力,以至于处于权力上层的宰相与皇帝围绕它产生了明争暗夺,造成定本权制度存世期间经历了六次模式调整,即枢密院人员定本,进奏院监官定本,宰相(进奏院监官、宰相)定本,左右司郎官、宰执定本,给事中、宰执定本,给事中定本。定本制度对新闻事业发展兼具促进性和阻碍性,但后者是主流。^[59]

刘赞认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体育特别是重大体育赛事常常引发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而体育精神往往又反作用于社会,对于激发爱国热情、凝聚民族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力的增强又推动了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自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以来,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拼搏奋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赛事与社会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关联,不仅要经由社会价值观对其价值、意义进行评判,还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社会价值观。^[60]

韩立新等人认为,清末出现的农学杂志热是中国期刊史上值得关注的一页,其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当时出现的传统农业困境,是农学杂志热的社会基础。统计发现,这一时期创办的农学杂志有19份,其中由农会主办的杂志最多共有8份,科学社团主办的杂志共有7份,学堂创办的杂志共有4份。清末农学杂志热是现代科学知识传播在中国的滥觞,是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起点。对清末出现的农学杂志热的考察,有利于拓展中国报刊史和新闻史的研究视野。^[61]

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韩立新提出,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文学科为考察对象,既发现了技术性、商业性引发的人文学科危机,即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发现了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问题,即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两重性。前者关注的是人文

学科的现代化,后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中国化。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论断,为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建设提出了两个维度:一是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现代化;二是新闻传播学学科的中国化。^[62]

田建平等人提出,1944年晋察冀边区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4年初版《毛泽东选集》收入文章29篇,其中包括抗日战争开始到1944年6月期间的文章25篇,以及“七七事变”以前的文章4篇。这部《毛泽东选集》立意高远,理论性与现实性紧密结合,选文精粹,主题鲜明,集中体现了当时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体例严谨,分卷科学,反映了编辑出版者高度的政治觉悟及高超的编辑艺术。^[63]

技术与媒介变革正在重塑新闻传播生态,构建新型传播格局,也在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转换。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技术、新生态发展,推动理论研究科创新发展,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未来前景的重要问题。综观2021年河北省新闻传播学研究,与学科前沿问题的关注、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还略显粗浅与不足,尤其缺少具有学术代表性和开创意义的重要成果。回应时代呼唤,找准新闻传播学与社会互动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河北省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向。

(张芸: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郭毓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参考文献:

- [1] 治丹丹,任亮.开放科学背景下区块链出版平台科技期刊开放发展机制与启示[J].中国编辑,2021(11):49-52+66.
- [2] 崔嘉欣.我国出版智库建设的必要性、复杂性与前瞻性[J].出版广角,2021(16):34-36.
- [3] 赵树旺,李牧钊.“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出版国际影响力建设路径[J].出版广角,2021(24):45-49.
- [4] 崔嘉欣.学术期刊编辑创新能力的提升路径探究[J].新闻传播,2021(19):68-69.
- [5] 金强,马燕玲.全媒体背景下数字出版运营模式探究[J].编辑学刊,2021(02):115-120.
- [6] 刘冲,王梅.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的新特点与发展态势[J].出版广角,2021(14):38-40.
- [7] 和曼,焦飞越.“四全媒体”背景下网络新闻编辑核心竞争力的构建[J].中国编辑,2021(07):91-96.
- [8] 治丹丹.区块链技术支持的科技论文出版平台 Orvium 特色服务运营模式及启示[J].科技与出版,2021(05):

85-92.

- [9] 赵树旺, 栗文达. 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高质量发展路径[J]. 出版广角, 2021(04): 20-23.
- [10] 丁立捷, 韩涛. 电视时政新闻应突破“通稿樊篱”[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1(03): 67-68+109.
- [11] 赵心. 省级卫视电视公益广告创新创优研究[J]. 声屏世界, 2021(03): 67-68.
- [12] 全文瑶, 邓璐, 邢毓雯. 全媒体战略下电视内容生产的创新研究[J]. 中国电视, 2021(01): 55-58.
- [13] 彭翠, 李艳萍, 李敏. 百年大党行稳致远——红色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的传播特色与时代价值[J]. 电视研究, 2021(08): 86-88.
- [14] 沈静, 王雅迪. 探访纪实节目《本色》的叙事艺术与传播路径创新[J]. 中国电视, 2021(05): 46-50.
- [15] 和曼, 焦飞越. 精品电视剧讲好中国故事的影像叙事模式探究[J]. 电视研究, 2021(07): 75-77.
- [16] 资小玉. “熊猫和和”系列合拍动画片对“和”文化的创新表达[J]. 中国电视, 2021(07): 105-108.
- [17] 王晓旭, 陈艳南, 吴思雨. 微纪录片中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与传播[J]. 青年记者, 2021, (20): 88-89.
- [18] 孙会. 抗灾类公益广告审美解读——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广告为例[J]. 电视研究, 2021, (07): 83-86.
- [19] 陈姝睿. 地理媒介学视野下中国公路电影的话语空间与形象建构[J]. 电影评介, 2021, (08): 32-35.
- [20] 周伟红, 胡伟. 数据视角下 AI 语音传播的发展探析[J]. 青年记者, 2021, (18): 79-80.
- [21] 许海滨, 张玉蕾. 融媒体时代广播同步视频直播的用户分析[J]. 青年记者, 2021, (08): 86-87.
- [22] 耿立新. 新媒体影响下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融合发展研究[J]. 传媒论坛, 2021, 4(04): 38-39.
- [23] 和曼, 焦飞越. 信号、表征、沟通与交互: 融合新闻的叙事策略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10): 111-115.
- [24] 李敏, 马爽. 省级党报微信公号“准社交媒体”转向——基于《河北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分析[J]. 青年记者, 2021(10): 58-59.
- [25] 赵军霞. 《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转型路径探索[J]. 传媒, 2021(21): 43-45.
- [26] 陈姝睿. 新型主流媒体视阈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破垒与立局——以象征性互动理论为视角[J]. 传媒, 2021(07): 39-41.
- [27] 樊拥军, 张红光. 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集成服务运维取向与发展进路——基于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思考探索[J]. 编辑之友, 2021(12): 25-31.
- [28] 高丽凤, 帖洪宇. 咪咕阅读多维营销的渠道建构[J]. 传媒, 2021(17): 68-69.
- [29] 商建辉, 李萃. 中国广告教育近四十年研究热点转向——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呈现[J]. 保定学院学报, 2021, 34(04): 90-95.
- [30] 张艳, 程梦恒. 人工智能营销传播算法偏见与元规制路径研究[J]. 中国出版, 2021(08): 27-30.
- [31] 赵兵. 建设新型传播平台: 媒体深融的“关键一招”[J]. 传媒, 2021(20): 26-28.
- [32] 和曼, 白树亮.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人才培养创新思路[J]. 海河传媒, 2021(02): 9-12.
- [33] 和曼, 白树亮. 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的挑战与创新[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1, 20(07): 64-65.
- [34] 徐占品, 迟晓明. 灾害谣言传播的社会心理[J]. 青年记者, 2021, (10): 42-43.
- [35] 刘晓岚. 我国应急科普全媒体传播研究[J]. 青年记者, 2021, (10): 48-49.
- [36] 张巨才, 李晓宇. 功能定位: 县级媒体深度融合的基础和指南[J]. 河北学刊, 2021, 41(04): 210-215.
- [37] 韩春秒, 贾蓓. 直播带货的河北实践及其发展探索[J]. 经济论坛, 2021(04): 133-143.
- [38] 杨秀国, 刘洪亮. 新闻框架视域下主流媒体对扶贫议题的建构与呈现——以《人民日报》(2012—2020) 扶贫报道为例[J]. 新闻与写作, 2021(09): 54-62.
- [39] 张艳, 陈瑶. 场域理论视角下有声阅读中的伦理失范成因及规制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 2021(11): 30-34+79.
- [40] 张旭, 许可. 地方主流媒体应急科普的现实图景与优化策略——基于河北省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J]. 青年记者, 2021, (17): 68-69.
- [41] 张捧, 陈淼. 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新闻异化现象及防范[J]. 编辑学刊, 2021(06): 30-34.
- [42] 郭广伟, 杨英法, 孙立朝. 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障碍破除[J]. 衡水学院学报, 2021, 23(03): 121-125.
- [43] 彭焕萍, 申红洲. 西方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溯源与核心理念[J]. 保定学院学报, 2021, 34(06): 26-32.
- [44] 田苗, 宋土顺, 王燕敏, 边一鸣, 田壮. 燕赵文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研究[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04): 141-146.
- [45] 韩立新, 杨新明. 以影视自塑: 影视国际传播的经验、空间和人才培养策略[J]. 电视研究, 2021, (09): 8-11.
- [46] 马连. 从“央视快评”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创新[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1, (01): 106-108.
- [47] 刘毅, 闫十, 范学亮, 张明霞. 融媒时代地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策略探析[J]. 声屏世界, 2021, (15): 14-16.
- [48] 陈志军, 张泗考. 价值、事实、姿态和管道——解析舆情事件中的政府政治传播策略[J]. 新闻与写作, 2021(06): 60-67.
- [49] 张玮, 张燕, 孙双双. 城市拆迁问题之网络舆情的演进逻辑与管控路径[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12): 16-19+31.
- [50] 苏妍嫒, 张亚明, 刘海鸥. 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网络群体集

- 聚舆情传播治理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06):138-145.
- [51]王秋菊,仇悦颖,张凌然.社交媒体中环境风险舆情传播动因及疏导策略[J].传媒观察,2021(11):58-62.
- [52]杜志民.疫情防控下新闻舆论传播探析[J].中国报业,2021,(09):106-107.
- [53]孙斐.从民国期刊《商业杂志》看人才思想的近代转型[J].兰台世界,2021(03):148-150+155.
- [54]王姗,刘年辉.党报百年经营嬗变的历程与启示[J].新闻爱好者,2021(07):20-24.
- [55]崔嘉欣,宋永林.晚清时期汉译法学书籍的出版研究[J].出版广角,2021(07):88-90.
- [56]韩立新,杨一帆.刘豁轩与新闻教育中国化[J].中国出版,2021(24):69-72.
- [57]张金凤,耿天宇.抗战的号角:晋察冀边区的期刊出版及其特点[J].出版发行研究,2021(11):106-111.
- [58]韩立新,牛凤鸣.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工作的实践与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21(10):107-111+11.
- [59]魏海岩,韩立新,陈建群.皇权和相权争夺中的信息控制:宋代邸报定本模式演变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08):95-109+128.
- [60]刘赞.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奥运闭幕社论中的社会价值观[J].采写编,2021(04):87-89.
- [61]韩立新,王青原.清末农学杂志的兴起与发展演变[J].出版发行研究,2021(02):102-111.
- [62]韩立新,杨润东.新文科文献考察及新闻传播学的两个维度[J].出版广角,2021(07):17-20.
- [63]田建平,张金凤.1944年初版《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考论[J].出版发行研究,2021,(06):29-37.

艺术学研究

孟庆军

一、2021年艺术学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河北艺术学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与往年相比研究方向广泛多元,分析角度新颖丰富,从不同的艺术学科、艺术形式中深度发掘艺术创作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时代环境大趋势的引导下,理论结合实践,积极探讨研究。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吸取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内涵和美学理念,不同艺术门类、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交相映射,通过多种物质载体,逐渐尝试并建构和谐、合理的创意表达,不断提高对艺术的感知和解读,超越个体表征,形成共性认知。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省艺术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紧跟时代发展,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特征,贴近当代生活需求,无论从艺术创作本身还是从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理论深入,对艺术的表达方式和审美水平都有所提升。

第二,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创新,增强了文化自觉,坚定了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文艺发展,提高了审美情操和人文素养,规范了对艺术精神的追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学者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关注点逐层深入,多领域相互融合

渗透,形成了开阔的良性交流,知识结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系统梳理和延展,注重艺术语言的特性,形成了更为直观深切的解析和感受。

二、美术理论

美术,也称造型艺术或视觉艺术。它是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通过造型等手段,塑造出具有一定空间和审美价值的视觉形象的艺术类型总称。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对美术理论的不同方面展开了探讨。

刘君敏、张玲探讨了图绘、空间、时代、叙事——明代绘画中的园篱与早期园林形态。^[1]认为,“园篱”是中国园林的重要艺术组成,在明代园林绘画中可以窥见园篱具有的显著地位,传递出的文化表征也与园林空间的形塑有直接联系。通过研究其在园林中的空间组构与时空衍化脉络,有助于清晰了解时代园林修建过程中文化观念对空间环境的影响。在探讨传统园林艺术形式的同时,通过园篱这个物质载体去体会特定时代的园林风格,重新感知并梳理转化形成当今园林发展的实践导向。

聂道汨、杨灵敏通过对静观与空灵——孙纲风景油画解读,^[2]认为,判断一位画家是否成熟,是否真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

其绘画语言特征是否鲜明将成为评价的主要标准。得出深刻启示：对物象的观察角度与态度将决定画面的格局与品质；绘画语言是一门需要永恒修炼的必要课程，因为绘画真正的高度是水平和深度的高度，而非风格或者其他；一双具有发现美且能敏锐捕捉新事物的眼睛和一颗虔诚的心将是创作的不竭源泉。

刘桂荣、王肖南探讨了宋元山水画“平远”图式的美学意蕴。^[3]认为，“平远”图式呈现为视觉、虚实和时空图式，从而使其观照方式生成静观、游观和妙悟的特质。这种图式特征建构了平远山水的“意外之趣”和“平淡之境”，彰显出超越逍遥、平宁淡泊之生命境界，同时，此图式结构亦衍生为一种“文化记忆”，支撑并活络在文化生命里。

曹玉玺探讨了变与不变——中国“色彩”与“五行”体系关系。^[4]认为，中国传统色彩中的“五色”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中“五行”之间关联密切。在历史发展中，这两种理论经历了密切关联到彼此疏离的过程，并且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彩理论。中国色彩体系与“五行”在源头上依然具有相通性，亦以此发展、产生了中国色彩独特的运用方式及中国独特的民族色彩心理，这种民族色彩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对异质文化的吸收。

张廷波探讨了两宋风俗画中配景形态的演变及历史原因。^[5]认为，在中国绘画史从北宋至南宋的图式演进历程中，各绘画种类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形态变迁、样式更新与风格转换。而由于风俗画客观记录性的历史呈现与文献图证价值，学界对其关注点常定格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文献学等以图证史的研究领域，却对图像本体层面上的史学价值不断忽略。两宋风俗画配景形态中构图、布局、风格、技法的改变，表面看似是一种图像样式与造境意趣的转换，实际隐现的恰是一种作者观物取景的思考方式、时代审美的客观需要，以及艺术发展自身规律的时代转换所使然。

王凯探讨了徐渭与卡拉瓦乔绘画风格比较。^[6]认为，徐渭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抛弃了传统工笔技法的约束，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法，影响至今。他开启了中国文人画的水墨篇章，同时把花

鸟画的抽象意境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代的卡拉瓦乔，用社会底层的人当作模特绘制宗教画，他无情地描绘丑陋、死亡、悲伤。这种真实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宗教绘画的精神性，使得神凡人化。他先让一切都隐藏在黑暗中，然后用一束光照亮，明暗增强，使得画面的戏剧性突现。同一个时间轴上的两位艺术巨匠，照亮的是不同国度的不同文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16世纪到17世纪，对人本的关怀都是很深切的，都强调个体意志的表达。

段冬玲通过对英国圣彼得河畔雕塑项目研究，^[7]认为，圣彼得河畔雕塑项目深入挖掘了桑德兰城市的工业文化遗存，更新了区域文化形象，对促进社区认同、开发地区的发展潜力产生了巨大作用，其以城市历史和自然环境为依托，为特定区域打造出清晰的视觉文化身份；以艺术为媒介，建立起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交流；公共艺术、艺术家和观众的身份被重新定义。

李延、孙梦鸽、宋小青探讨了基于民间传说的城市地标塑造——以孟德武雕塑《曹妃回乡》为例。^[8]认为，城市地标性雕塑的创作与落成，展现出了地域民间传说文化的普遍性、传承性和发挥性特征，也成为城市中见证时间空间下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的代表性建筑景观。孟德武先生《曹妃回乡》的创作，运用其精妙的艺术语言与对于家乡文化的深刻理解，将文化象征矗立在城市之中，展现着其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影响着城市乃至每个人心中对于文化精神传承与信仰的温度和思考，拉近着这座城市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将艺术审美情感融入城市文化生活中。

张迪妮、胡帅奎研究探讨了历史文化名街空间色彩和谐度调研分析——以开封市龙亭区北书店街为例。^[9]认为，街道色彩是街道本身在特定的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当地居民根据色彩基色与喜好所体现出来的色彩表征，是蕴含地方文化与人文特色的具体化体现。涉及街道内的建筑、装饰、广告牌、道路等诸多方面，街道色彩主要是以街道内的建筑与街道内的诸多构成元素为载体进行表现，对街道内的各个部分处理的妥善程度、对街道整体的色彩表征尤为重要。通过对开封市龙亭区北书店街街道色彩的调研，经过现状分析得出问题并对街道和谐

度规划提出改善与建议,从而有针对性的、科学的、系统的进行规划设计。

三、设计理论

设计是二十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艺术范畴,设计对于美化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从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周延伟探讨了从特色塑造到地方营造——城市更新中设计的地方性表述。^[10]认为,在塑造城市特色的背景下,设计的地方性表述至关重要。城市更新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常态”,经历了从“特色塑造”到“地方营造”的视角转变,但究其根本都是要维持或重塑地方性,体现为视觉体验层面的景观更新。这种景观是利益团体相互平衡的产物。

孙喆、孔祥铮、刘君敏探讨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的室内空间设计系统建构。^[11]认为,VR技术在室内空间设计中应用具有多方面优势,对设计师来讲,可以减少自身的想象力压力,设计过程中也能够减少修改次数和难度,能够将设计成果直观地呈现在用户面前,有效降低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浪费;对用户来讲,在室内设计阶段也就可以直观地看到完成后的效果,便于结合自己的需求提出建议或者实施修改,更有助于满足自身个性化设计需求。基于网络平台上结合交互式开发技术标准,能够有效实现室内空间设计系统的可视化设计,满足室内空间设计的生动、形象化呈现;能够取得良好的室内空间设计真实性和生动性,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室内空间设计内容的丰富性和感染力。

张慧、封佳帝探讨了基于雨水花园的乡村庭院景观设计探究——以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村为例。^[12]认为,乡村庭院景观设计是改善居住环境的有效途径,在乡村庭院景观设计中引入雨水花园理念,使雨水管理与景观设计相结合,雨水花园设计与村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庭院景观设计相结合,这是未来乡村庭院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不仅可以缓解水资源短缺、乡村内涝问题,同时优化居住环境,满足人们的需求。

庞琳、孟立浩、张亦佳探讨了健康视角下对城市历史街区公共景观空间改造的思考——以山

西省晋商老街为例。^[13]认为,在当今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共景观空间是人们感受自然的重要空间,并且会对居民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作用。在公共景观空间中居民可以释放心理压力,同时加强户外运动,可以防止各类慢性疾病的发生,从而实现生理和心理健康。在老街的更新设计过程中,要围绕老街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健康作用条件,起到提升公共健康的作用。

刘以畅、陈丽通过探讨面料再造与构成结合的文化创意设计思维。^[14]认为,面料设计与再造运用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重要研究课题。装饰面料再造采用不同的工艺技法对原有面料进行再加工,追求形式意蕴的同时形成突破,使之更符合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整体风格的需要。针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和面料再创造过程中,思维方式的运用问题,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角度,结合艺术设计学,对装饰面料再造的美学法则,形式意蕴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装饰面料再造虽然是实践性很强的创造活动,却带有一定的形式因素、内容语言和精神价值的结果。

程元刚探讨了农产品包装的创新思路——评《农产品包装标识概论》。^[15]认为,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类产品也是琳琅满目。在众多的商品中,如何选择心仪的商品已成为一道难题。在商品包装如此重要的情况下,我国部分产品的包装并不理想,特别是农产品。目前,相比较其他商品的包装而言,商家对农产品在包装方面投入精力少、投入资金少。《农产品包装标识概论》一书既适合农产品加工与营销企业技术人员阅读,也适合农业创业者参考。作者将借评述《农产品包装标识概论》一书,浅谈我国农产品包装的创新思路及其研究。

王鹏探讨了户外广告规划提升城市景观视觉秩序——评《城市视觉重构:宏观视野下的户外广告规划》。^[16]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经济是主要动力,但文化、环境、形象等因素的融合发展也尤为重要。近些年,城市形象的品质提升受到各地政府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而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户外广告数量的多少,户外广告品质的优劣,广告形式的新颖与否都不能作为简简单单的评判标准,由于缺乏科学有效、标准统一的规划体系,随处可见的粗制滥造、五花八门的广告显得与城市环境格格不

人，这也就产生了难以协调的矛盾。

张净通过对空间构成课程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索,^[17]认为,空间构成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课,长时间固守最初的教学模式必将与现代环境设计的发展相矛盾,如何在有限的课时中最大化地培养学生的空间形态思维,提高设计语言的表现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因此,课程经过大量的课堂实践创立了一体化教学模式,从构成空间的体、面、线三大基础入手,逐层深入,由体块到结构,细化构成的形态元素及其设计方法,不仅可以突出空间设计的延续性和对材料的认知,而且能做到很好的前后衔接,使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空间形态构成思维。

闫晓从、张华、齐志辉、赵丹琳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红色文化在雄安公共设施中的表达。^[18]认为,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对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红色文化是雄安地区的代表文化之一,对雄安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同时红色文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公共设施文化表达的方式之一。通过后疫情时代红色文化在雄安公共设施中的表达的研究和实践,来将抗疫精神和红色文化进行设计融合,从而在雄安新区构建“未来之城”的城市形象,弘扬红色文化,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张放通过对服饰艺术设计创新探索,^[19]认为,服饰艺术设计作为一种艺术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的工学美术形式,艺术设计创新意识是其领域内的核心理念,培养服饰艺术设计创新能力是服饰艺术设计教育至关重要的教学组成部分。面对严峻且极具挑战性的社会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形势,服饰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需要不断完善个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积极寻找服饰艺术设计创新灵感和突破点,进而丰富服饰艺术设计形式,助力现代服饰艺术行业的长效发展。

张放探讨了数字媒体时代下的民族特色实验动画。^[20]认为,实验动画是先锋艺术与视觉文化中的重要成员,具有民族特色的实验动画代表了传统文化资源、民族审美元素和本土意识在动画艺术中的延伸与演变。传统民族特色实验动画因数字媒体而获得新生,新一代的实验动画则在继承前辈丰富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对传统美学观有着扩充,乃至或显或隐的颠覆反叛姿态。

邹永新、陈晓莹探讨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

场景设计可视化建模研究,^[21]认为,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场景设计可视化建模方法,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场景可视化中,能够克服传统场景可视化的弊端,提升场景可视化的设计效果,降低场景可视化成本。通过对当前场景设计可视化建模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找到各种方法的局限性;通过基于真实感模型的沉浸可视化建模方法建立场景可视化,优化场景可视化立体感;采用缓慢剔除算法优化场景的可视化渲染效果,设计仿真实验测试场景设计可视化建模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四、书法理论

书法艺术即文字书写的艺术,一般来讲,“书法”一词专指汉字的书写艺术。各种文字书写力求美化,注重气韵,与绘画同源,形态上具备造型条件,刚柔并济,内涵丰富。2021年河北省学者对书法艺术作了分析和研究。

荆子洋探讨“道本自然”的书学理念厘探:以张怀瓘书论为例。^[22]认为,在唐以前的书论中关于“神”“道”“自然”的描述都是零星的、片段的,但在张怀瓘书论中这三种概念是互相支撑的,最高审美标准是合于“自然”,“神”在“自然”论的基础上产生,能否合于“自然”是他确定“神品”书家的最重要的准则。“道”是以“自然”为法,比“自然”更为具体,主张既要掌握有形之“道”,即书写技法的规范性,又强调由技以达无形的“自然”之“道”。在后世书论的品评话语体系中,“神”“道”“自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张怀瓘是引领这种评价机制的先行者。

刘宗超探讨了当代书法的大众审美。^[23]认为,当代书法大众审美呈现出娱乐化特征,好看、好玩、易懂是大众审美的自发要求。大众审美具有趋同性,容易被媒体和专业团体的审美舆论所引导,当代书法大众审美的乱象和迷惑最终还是来自专业团体的审美分歧。要提高大众书法审美的整体水平,关键在于专业团体的自身建设和整体审美水平的提高。专业团体应该放弃狭隘的功利主义和清高,真正深入书法艺术的传统经典,让书法回归现代生活,并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作品,同时做好普及工作,书法大众审美的提高才会落到实处。

刘宗超通过研究形成了侯马盟书风格体系刍议。^[24]认为,对侯马盟书风格体系的把握,既要分清其内部风格的构成与区别,掌握风格的“同种之异”;又要立足盟书整体抓住主流书风,发现风格的“异中之同”,并把主流风格放在春秋战国时期书法风格体系之中加以考察,寻找其独特价值。

史洪存探讨了书法章法的对比美学。^[25]认为,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章法的美学研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书法技法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每种书法字体都不是孤立突兀地出现在书法史上,每种书法章法形式的出现也有前续和后延,各种形式之间又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其中,对比是书法章法美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哲学衍生的审美意识观,诸如动静、虚实、开阖、欹正、大小与疏密等对比矛盾给人以不同的视觉和意识上美的感受。

赵生泉探讨了西夏文篆书分类释名。^[26]认为,西夏文“篆书化”的途径并不稳定,甚至有些过于随意。进一步引申,尽管在理论上所有西夏文都可以有篆书形式,但在实际应用中,很可能仅有极少数的字在用于碑额、印章、符牌时才被“篆书化”。西夏文篆书是一种用于特定场合的,就特定文字内容进行装饰美化而形成的“新”书体。

五、音乐理论

音乐既是听觉艺术,又是时间艺术,它的基本手段是用有组织的乐音构成具有特定精神内涵的音响结构形式,通过音乐语言表达人的情感和思想,按照一定的意图和规律组织起来,形成音乐作品。2021年,河北省学者针对声乐、器乐以及音乐教育等不同的表现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齐易探讨了冀中“音乐会”的当代传承。^[27]认为,冀中地区的“音乐会”这一历史悠久的乐种,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遭遇到了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局内人以卓越的创造力,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探索民间乐社的当代传承发展之路。作者把目前冀中音乐会这一乐种的传承方式分为固守传统的传承、师徒关系的传承、吸收女性会员的传承等几种类型,文章将对这几种传承模式各自的特点进行剖析,以为传统民间

乐社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伟探讨了师范类专业认证下高校器乐教学的新探索——以河北师大音乐学院为例。^[28]认为,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器乐教学,在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师范类专业认证核心理念的行动指引下,针对课程目标、教学理念、授课对象以及教学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这些不断探索的新模式与新举措,是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音乐师资队伍质量建设的有力保障,不仅为高校音乐师范生的优质达标和卓越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推进高校音乐教育的改革及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年华探讨了俄罗斯浪漫曲的艺术价值及其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的运用。^[29]认为,欧洲艺术歌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俄罗斯浪漫主义歌曲,其艺术歌曲独具特色,其发展史与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是俄罗斯音乐艺术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浓厚的俄罗斯文化气息。对于高师声乐教学来说,当前需要运用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的艺术价值解决教学难题,抓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和要求,通过因材施教使之与声乐教学相结合,以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音乐鉴赏力和艺术素养。

张年华探讨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的实践对策。^[30]认为,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即以古典诗词为创作基础,配合现代歌曲编写而成的新型歌曲形式。虽然该艺术歌曲的词句均来自古诗词,但曲目唱法顺应现代化流行趋势。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已成为流行歌曲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与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因此,将其应用于声乐教学中,有助于声乐教学取得更好的成效。

苏娜探讨了高师院校音乐课程体系的生态构建。^[31]认为,高师院校音乐课程生态体系是音乐学科与生态学、人类学、教育学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高师院校音乐课程生态体系的构建要提升课程时空内教师个体的生态学理论认知水平与应用水平,构建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提升音乐课程中教学因子的生态效应,构建音乐课程体系生态链。

姚德鹏探讨了高校声乐融入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路径。^[32]认为,传统音乐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高校声乐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培养专业的高素质音乐人才,还能够从整体上提高高校声乐教学水平。现阶段,由于文化的多元性、教学重点的多样性等多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声乐教学中的融合度不高,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声乐教学中的融入是非常有必要的。

谢红认为,中国的钢琴教育从业者面对庞大的社会需求和全新的国家政策,如何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提升钢琴人才培养的质量、优化钢琴课程的设置,正是现阶段高校钢琴人才培养的重要工作内容。研究探讨的此次论坛涉及钢琴史论和文献知识钢琴教学法学科知识、多个高校钢琴人才培养方案及模式的介绍和讨论,并对专业钢琴教学模式、钢琴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钢琴发展现状等相关话题进行了介绍和探讨。^[33]

项阳探讨了区域民间音调与“准曲牌”现象——兼议《东方红》中区域音调的应用。^[34]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因相对稳定的亲缘关系,在千百年间生成区域社会民众有高度文化认同、特征明显、后世认定为类型多样的民间音调,人们依此不断锤炼并创造发展,在日常生活和民间礼俗中,以音声技艺形态表达一方百姓喜怒哀乐之情感诉求,从而生生不息。其特征是曲调框架结构既有变形又相对稳定,依此不断创制新词。“准曲牌”现象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文化认同,为延续千余载、以曲牌为主导的音乐特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人文基础,值得学界深入探究。

藏海萍探讨了新版民族歌剧《白毛女》的传承与发展。^[35]认为,民族歌剧《白毛女》是我国歌剧史上盛演不衰的“常青树”式作品。自1945年以来,先后有五版《白毛女》歌剧在中国民族声乐舞台上绽放出夺目的艺术光彩。2015年,雷佳担纲主演的新版歌剧《白毛女》,则在融汇前辈作品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展现出了别具一格、推陈出新的艺术风采。藏海萍从乐段改编创作、声乐演唱、剧情安排等方面切入来分析2015版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特征,借此明确:在借鉴吸取传统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契合时代精

神对歌剧情节及艺术语汇进行适度创新和发展,正是当前民族歌剧创作之“活的灵魂”。

单南探讨了鄂伦春原生态歌唱文化。^[36]认为,原生态音乐文化是一个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广泛领域的一个综合概念,原生态歌唱文化具备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综合属性,作者认为歌唱首先是歌,其次是唱,对于歌唱文化的研究应该以此两方面为基石予以展开。针对鄂伦春原生态文化进行分析,去探析该民族当地音乐特征、歌曲类型,由此助力人们解析鄂伦春歌唱艺术价值及文化内涵。

贾志伟、王欢探讨了歌剧艺术指导的职责与重要性。^[37]认为,欧洲的歌剧艺术发展十分繁荣,艺术指导工作者们会参与到整部歌剧的准备、排练以及演出当中,并始终陪伴在歌唱演员的左右。他们不仅能够对歌唱演员的歌词语言进行正确的指导,还会帮助歌唱演员恰当地掌握剧情处理方式,可以说,艺术指导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歌剧演出的整体效果。

郭琳探讨了徐州时期对曹正古筝艺术成就的影响。^[38]认为,中国古筝艺术家曹正的艺术成就的取得是各个时期艺术实践经验的积淀。尤其在徐州工作期间,是曹正古筝艺术重要的发端阶段,深入分析他这段生活历程,能够发现此时期对他的古筝艺术成就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生观和艺术观基础的初步奠定、古筝艺术走大众化发展之路理念的形成、古筝演奏与理论相结合实践的开启。

刘胜男、张齐探讨了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中国音乐史》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39]认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中国音乐史》的课程思政建设,在音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中国音乐史》课程坚定新时代人才培养任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渗透到音乐教育中,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教育观,指明新时代音乐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促进高等学校师范生成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

李建勋、孙姗姗探讨了燕赵舞蹈的文化生态适应。^[40]认为,通过对燕赵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梳理,分析燕赵舞蹈的文化生态适应。燕赵文化的产生是由历史决定的,燕赵舞蹈的形成是受到

其密切的影响而产生,这其中包含文化、历史、环境等诸多生态因素,其文化适应在形成、发展、成熟多阶段具有相互的适应性,这也是燕赵舞蹈形成的根本原因。

赵咏梅、孙涛探讨了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形式在高校舞蹈教学中普及传承的方式方法。^[41]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先进的科技开始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让以舞蹈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进行发展和传承,是相关人员所必须要关注的重要课题。让高校舞蹈教育和“非遗”舞蹈项目进行融合,让当地“非遗”文化能够得到有效地传承和普及,是艺术类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朱颖探讨了河北民间舞蹈人才培养机制与创新路径。^[42]认为,河北民间舞蹈作为我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燕赵大地独特的地域特征。在国家对民间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项目重视度逐步提高的情况下,河北应确立民间舞蹈人才创新机制,明确民间舞蹈的传承方向,通过多维度的视角,探索舞蹈的创新式发展路径。建立完善的舞蹈人才培养机制,拓宽人才培育的创新路径,建立民间舞蹈交流活动常态化的机制,使河北民间舞蹈能够得到更好地发扬与传承。

朱颖探讨了高校舞蹈教学传承民间舞蹈文化的路径。^[43]认为,民间舞蹈是一个区域或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载体,不同种类的民间舞蹈代表着不同的风土人情、民间文化与宗教信仰。而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民间舞蹈也处于持续地发展与衍变之中,进而形成极具地域特色与文化特色的舞蹈形式。因此,高等院校在开展舞蹈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应该在探索民间舞蹈内在文化的基础之上,展现出相应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内涵,实现对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为民间舞蹈的流传提供保障。

2021年河北省艺术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目前河北省的理论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研究成果总数偏少,而且较为集中在部分艺术学科中,出现了具体学科中研究的选题方向不平衡。第二,高质量的文章多集中在少数几个艺术学者身上,这种局面需要尽快突破。第三,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多积累、多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开展创新,从而得出更

具说服力的观点。

(孟庆军: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刘君敏,张玲.绘图、空间、时代、叙事——明代绘画中的园篱与早期园林形态[J].中国园林,2021(37).
- [2]聂道汨,杨灵敏.静观与空灵——孙纲风景油画解读[J].歌海,2021(2).
- [3]刘桂荣,王肖南.宋元山水画“平远”图式的美学意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3).
- [4]曹玉玺.变与不变——中国“色彩”与“五行”体系关系探析[J].美术观察,2021(5).
- [5]张廷波.两宋风俗画中配景形态的演变及历史原因[J].四川戏剧,2021(1).
- [6]王凯.徐渭与卡拉瓦乔绘画风格比较[J].大舞台,2021(4).
- [7]段冬玲.英国圣彼得河畔雕塑项目研究[J].公共艺术,2021(2).
- [8]李延,孙梦鸽,宋小青.基于民间传说的城市地标塑造——以孟德武雕塑《曹妃回乡》为例[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21,21(6).
- [9]张迪妮,胡帅奎.历史文化名街空间色彩和谐度调研分析——以开封市龙亭区北书店街为例[J].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21,39(1).
- [10]周延为.从特色塑造到地方营造——城市更新中设计的地方性表述研究[J].齐鲁艺苑,2021(1).
- [11]孙喆,孔祥铮,刘君敏.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的室内空间设计系统建构[J].现代电子技术,2021,44(22).
- [12]张慧,封佳帝.基于雨水花园的乡村庭院景观设计探究——以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村为例[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1,2(4).
- [13]庞琳,孟立浩,张亦佳.健康视角下对城市历史街区公共景观空间改造的思考——以山西省晋商老街为例[J].现代园艺,2021(15).
- [14]刘以畅,陈丽.面料再造与构成结合的文化创意设计思维[J].大众文艺,2021(20).
- [15]程元刚.农产品包装的创新思路研究——评《农产品包装标识概论》[J].食品工业,2021,42(1).
- [16]王鹏.户外广告规划提升城市景观视觉秩序——评《城市视觉重构:宏观视野下的户外广告规划》[J].环境工程,2021,39(8).
- [17]张净.空间构成课程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索[J].教育观察,2021,10(25).
- [18]闫晓从,张华,齐志辉,赵丹琳.后疫情时代红色文化在雄安公共设施中的表达[J].包装工程,2021,42(22).
- [19]张放.服饰艺术设计创新探索[J].棉纺织技术,2021,49(4).
- [20]张放.数字媒体时代下的民族特色实验动画[J].电影文学,2021(20).
- [21]邹永新,陈晓莹.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场景设计可视化

- 建模研究[J].现代电子技术,2021,44(1).
- [22]荆子洋.“道本自然”的书学理念厘探:以张怀瓘书论为例[J].书法教育,2021(7).
- [23]刘宗超.当代书法的大众审美[J].大学书法,2021(6).
- [24]刘宗超.侯马盟书风格体系刍议[J].中国书法,2021(2).
- [25]史洪存.书法章法的对比美学研究[J].艺术研究,2021(3).
- [26]赵生泉.西夏文篆书分类释名[J].西夏学,2021(1).
- [27]齐易.冀中“音乐会”的当代传承[J].中国音乐,2021(1).
- [28]张伟.师范类专业认证下高校器乐教学的新探索——以河北师大音乐学院为例[J].当代音乐,2021(3).
- [29]张年华.俄罗斯浪漫曲的艺术价值及其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的运用[J].艺术评鉴,2021(20).
- [30]张年华.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的实践对策探究[J].戏剧之家,2021(30).
- [31]苏娜.高师院校音乐课程体系生态构建的探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1(18).
- [32]姚德鹏.高校声乐融入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路径研究[J].艺术评鉴,2021(7).
- [33]谢红.凝心聚力 夯实提高——高校钢琴专业人才培养与一流课程建设高端论坛[J].钢琴艺术,2021(10).
- [34]项阳.区域民间音调与“准曲牌”现象——兼议《东方红》中区域音调的应用[J].艺术学研究,2021(5).
- [35]臧海萍.新版民族歌剧《白毛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戏剧之家,2021(33).
- [36]单南.鄂伦春原生态歌唱文化研究[J].四川戏剧,2021(6).
- [37]贾志伟,王欢.歌剧艺术指导的职责与重要性[J].四川戏剧,2021(7).
- [38]郭琳.徐州时期对曹正古箏艺术成就的影响[J].乐器,2021(5).
- [39]刘胜男,张齐.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中国音乐史》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J].赢未来,2021(29).
- [40]李建勋,孙姗姗.燕赵舞蹈的文化生态适应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1(8).
- [41]赵咏梅,孙涛.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形式在高校舞蹈教学中普及传承的方式方法研究[J].山西青年,2021(6).
- [42]朱颖.河北民间舞蹈人才培养机制与创新路径研究[J].青春岁月,2021(19).
- [43]朱颖.高校舞蹈教学传承民间舞蹈文化的途径研究[J].艺海,2021(6).

历史学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张春长 马超 成彩虹 陈静

一、考古学研究

2021年度河北省考古工作以主动性科研考古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为主,全年主要考古项目共计41项,其中主动性科研考古项目22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9项。全力推进“人类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等考古中国重大工程项目;助力雄安新区建设,继续做好雄安新区考古工作;推进燕、中山国和城市考古工作;做好配合基本建设等考古项目;课题研究稳步推进,扎实做好考古资料整理工作。

(一)“人类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等考古中国重大工程项目

1. 泥河湾人类探源工程

泥河湾盆地后沟遗址群位于张家口市阳原县

大田洼乡东谷坨村北300米的后沟两侧,分布于后沟东、南、西侧的梁上,地处泥河湾盆地东缘大田洼台地东部。2013年以来持续在该区域开展旧石器专题调查,发现10余个地点。文化遗物埋藏于泥河湾顶部的河湖相堆积中,综合地质考察、地层对比与古地磁、光释光测年,底部文化层位于BM界限(78万年)附近,上部年代在30万年前后。2021年发掘后沟6号地点,试掘8号地点。后沟6号地点为本年度主发掘区,发掘深度超过15米,揭露25个自然层,在第5、6、7、10、20、25六个层位发现文化遗物,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684件。后沟8号地点位于后沟剖面顶部,试掘约20平方米,发现石制品278件、动物化石565件。文化遗物埋藏于剖面顶部的黄褐、蓝灰色黏土质砂、砂质黏土层中,经与后沟遗址地层剖面对比,两者文化层分布一致,文化层按照土质土色与地层关系

可分为三个自然层,依据前期年代研究结果,距今 36 万—39 万年之间。

石制品原料就地取材,多为附近基岩可见到的白云岩、硅质灰岩、燧石、石英砂岩等,石料整体质地较差,燧石等石料节理发育,导致废片、断块等比例较高。以锤击法剥片为主,存在极少量的砸击技术产品。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石钻、雕刻器以及大量废片、断块等。石器以刮削器为主,使用硬锤修理,修疤欠规整,缺少加工精致的精制品。石核整体利用率不高,以权益性剥片为主,但发现一定数量石料优质的盘状石核,以及连续剥片的单台面石核,开始对台面调整修理,从这些典型标本判断当时人类的剥片能力相比早更新世有了明显提高,但当地的石料影响了古人类剥片技术的发挥。石器工业整体属于典型的小石器工业技术传统,是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以来石器技术的延续和发展。

后沟遗址发掘揭露了泥河湾盆地东缘中更新世的完整地层剖面,其间发现多个古人类活动文化层,基本上构建起该区域中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序列的框架,成为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演化文化序列中的最后一环,也是直立人向早期现代人转变的关键一环,有力证明了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连续演化和发展。发掘获得了不同阶段的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为研究中更新世时期古人类的文化面貌、石器工业与技术提供了基础资料。中更新世完整地层序列的揭露,对探索华北地区早更新世末期以来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阳原泥河湾遗址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 冀西北地区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学文化研究

(1) 兴隆遗址

兴隆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康保县照阳河镇兴隆村赛圪塔沟西侧的山前坡地上,遗址面积约 1 万平方米。2021 年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发掘清理了三层下房址 12 座,发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石器、骨角器和少量陶器,结合出土遗物的特点判断,发掘的房址时间跨度很长,涵盖了遗址文化分期的第一期至第四期,距今 6000~8500 年,特别是第四期房址的发现,完善了遗址分期,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房址按开口形状分

为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根据结构可以分为较浅的半地穴式房址和较深的地穴式房址,有房址内发现壁龛,有的留有陶片等遗物。部分房址经过多次使用,房址内发现有两个及以上明确的活动面,活动面上多发现有灶或者骨堆、石堆等遗迹现象,并留有动物骨骼、陶器、骨器、石器及相应的半成品、未燃尽木材形态等遗物。灶一般位于中部,可分为浅坑灶、石板灶、支石灶三种,个别房址内还在房址中部发现有火塘。

通过发掘,对不同房址结构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了解了房址建造、利用、废弃以及部分再利用的过程,为分析不同时期的建筑特点、聚落布局奠定基础。同时在此前工作基础上,系统采集年代学样品、动植物、土壤等样品,展开更为深入的生业经济和环境考古研究。

(2) 四台遗址

四台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是冀西北坝上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处于蒙古高原南缘。目前探明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由北往南分为四个片区。为了深入研究遗址的文化内涵,揭示冀西北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发展历程,2021 年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发现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发现了房址、浅坑等遗迹,出土了陶、石、骨、贝等类遗物。遗迹包括房址 12 座、浅坑 3 座、室外灶 2 座。房址为主要发现,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大多为圆角长方形或长方形,室内居住面大多四周略高,中间略凹,少量为石板灶,多支石或浅坑灶,柱洞靠近墙壁分布于周围,部分为壁柱。

遗物主要有陶、石、骨、贝等类遗物 100 余件。陶器出土极少,皆为碎片,均为夹砂陶、沙粒较粗,火候较之前升高。陶质疏松,陶色黑褐、灰褐色,纹饰多为戳印的折线纹、圆圈纹、锯齿纹。石器有磨制和打制类。磨制石器主要出土少量的小磨盘、磨棒等;打制主要为细石器,有铅笔头状石核、石片、细石叶、刮削器等。骨质品主要有骨针、骨锥、骨管等。还有一些贝壳、蛋皮、树皮、鹿角、肩胛骨等。

遗址堆积丰厚,延续时间极长,为辨识遗址各期的文化面貌和相对年代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四台遗址自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出现,至新石器时代一期遗存繁荣,再到新石器时代二

期遗存衰微至消亡,展现出一副冀西北史前社会发展的动态图景。新石器时代一期、二期遗存分别代表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重要内容,填补了新石器时代区系的空白。其对冀西北坝上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聚落与社会、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旧—新石器过渡等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冀西北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乃至与东北亚人群关系、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也是文化“三岔口”通道和中华文化交流、融合、互鉴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

(3) 邓槽沟梁遗址

邓槽沟梁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高家营镇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2021年发掘地点位于遗址东南瓮城,发掘500平方米,发现遗迹11处,出土陶、石、骨、玉质文物76件。解剖城墙1段,揭露瓮城1座,清理房址2座,灰坑5个,灰沟1条,窑址1座。发现遗物有篮纹罐、绳纹罐、双鬲、斝、双鬲敛口瓮、豆、骨器、石器、石片、玉器等。陶器以夹砂为主,泥质较少;纹饰以绳纹最为常见,其次为篮纹,素面,附加堆纹等。骨器多为骨簪、骨锥、骨环,石器有石斧、石球、石片、石镞等。玉器为玉环、纺轮等。

2021年度发掘基本揭露了瓮城面貌及出进通道,厘清瓮城结构和构建方式,确定瓮城的营建、使用及废弃时间;对城墙进行解剖,厘清了城墙修建方式及与瓮城相对早晚关系;了解了城内堆积情况等。出土遗存与老虎山文化相近,为研究张家口地区史前时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材料,有助于加深对冀西北地区文化发展序列的认识。该遗址延用时间长,年代距今4000年到8000年,文化面貌丰富。发现的龙山晚期石城,为河北省首次发现,堪称“河北第一城”,意义重大,其性质应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邓槽沟梁遗址史前城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北方地区史前城址的分布,城防结构形态、史前筑城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新材料。

3.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

赵窑遗址位于邯郸武安市赵窑村东南,处于

北流洺河与马会河交口的西南高台地上,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于1960年、1975年先后两次发掘,文化内涵为仰韶早期、先商、早商、中晚商时期,其中以中晚商时期的铜玉器墓葬最为引人注目。2021年考古发掘工作是河北省参与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课题项目,共计完成勘探面积20万平方米,确认遗址分布面积16万平方米,遗址丰富区4.4万平方米,共发现墓葬77座、陶窑62座、灰坑64座、灰沟5条。从遗址周边的调查、勘探与发掘来看,赵窑遗址主体为仰韶文化早期的后岗一期文化和中晚商时期商文化遗存,并包含一定数量的先商、早商、西周和汉代遗存。陶器可辨器型有釜形鼎、弦纹罐、平底钵、红顶碗、小口瓶、泥突缸等。彩陶数量较少,有红彩和黑彩,多三角纹和网纹。石器数量较多,有石环、石刀等,为典型的后岗一期文化。

赵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是冀南地区少见的典型遗址,赵窑遗址的发掘对于仰韶早期后岗一期文化的聚落布局和夏商周时期冀南地区文化序列的演进研究有重要意义。赵窑遗址的仰韶文化聚落,是整个河北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环壕聚落。另外,遗址出土的陶片火候较高,质量精良,遗址具有区域中心聚落的特征。中晚商时期遗址规模较大,分布范围超过16万平方米,其位置处于安阳殷墟与祖乙邢都(邢台葛家庄东先贤)之间,有高等级的墓葬、密集的陶窑,显然也是商王朝域内重要的核心聚落。赵窑遗址勘探出大量密集分布的窑址,在商周时期比较罕见,是研究商代陶器的生产工艺与流通方式的重要材料。

4.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

开展滦河流域考古调查,启动平泉东山头遗址考古发掘工作。2021年开展滦河流域围场、平泉市域考古调查,基本弄清红山文化的分布特点和文化特征,为后续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奠定基础。2022年,正式启动平泉东山头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闪亮的一颗。其肇始于距今6500年,到距今5000年止,连续发展长达1500年;分布范围广,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河北省东北部皆发现红山文化遗存,其核心区位于

西拉木伦河以南、大小凌河流域、努鲁尔虎山一带。北部越过西拉木伦河以北、向东越过医巫闾山至下辽河西岸、南可至渤海北岸、西达燕山南麓京津一带,影响范围甚至到达张家口地区。红山文化显示出与中原文明差异性的特征,是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证据。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早期社会、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完善社会复杂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 助力雄安新区建设,继续做好雄安新区考古工作

1. 南阳遗址

南阳遗址位于雄安新区容城县昝马台镇南阳村南,地处大清河水系冲积扇上,属太行山麓平原向冲积平原的过渡带。遗址保护范围南北 600 米,东西 700 米,面积为 42 万平方米。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内保存面积最大、文化内涵较丰富的一处古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 世纪 70 年代,遗址周围出土“西宫”铭文蟠螭纹铜壶、长方形附耳蹄形足铜鼎等铜器,有学者指出其为春秋时期燕桓侯徙“临易”或战国时期燕文公“易”城邑。

2021 年发掘面积 3700 平方米,解剖战国时期城垣 5 处,发掘西城门遗迹 1 处,清理墓地 1 处,共清理灰坑 468 座、房址 15 座、路 4 条、灰沟 10 条、窑址 1 座、墓葬 12 座、灶 2 座、瓮棺葬 16 座、井 2 座。出土遗物种类丰富,以陶质、骨质、铜质、铁质最为常见,石质、瓷质、蚌质较少,小件标本及可复原器物 736 件。

南阳遗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战国时期城址、“易市”陶文陶片的发现,为我们寻找战国中期燕国南部城邑“易”获得重要线索。南阳遗址的考古工作揭开了雄安新区城市考古的序幕,是雄安新区两周、汉代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实物载体和范例,进一步推进白洋淀区域先秦时期生态环境演变、人地互动关系研究工作。

2. 古州城遗址

古州城遗址位于雄安新区郑州镇古州村及周边,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地表现残存东、西、南城墙段落,其中南城墙东半部保存相对较好,城墙高出现地表 5~8 米。2021 年勘探面积 5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重点对“内城”东城墙、南城墙、护城河以及城墙内外道路等进

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内城”东城墙、南城墙及内外道路、壕沟(护城河)、建筑遗址(局部)等。城墙均为夯土结构,夯土层次清晰,质地较硬。城墙由基槽、墙体二部分组成。城址东南部新发现 4 处建筑遗存、6 处战汉瓮棺墓葬,部分墓葬燕文化特征明显。出土遗物 100 余件,多为残块。主要见有砖、瓦、瓦当、陶瓷器、铜钱等。其中以砖瓦建筑构件为主,年代多为汉唐时期。

古州城“内城”遗址考古工作,对于探究古州城址的整体结构、性质、内涵、沿革与变迁等历史信息十分重要。也为古州城址综合研究、保护与利用提供一手珍贵资料。古州城遗址作为“燕云十六州”城址之一,是研究冀中地区古代城市、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载体,也是新区重要历史文脉。发掘古州城遗址,探寻古州城历史面貌以及古州城与郑州城址之间历史沿革、变迁等,学术意义重大。

3. 城子遗址

城子遗址位于雄安新区容城县贾光乡城子村,东、北两面紧邻南拒马河,属冀中平原的缓倾平原。城子遗址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发现,为配合新区西北围堤的基本建设,抢救性清理位于城西北的墓葬区,共发掘清理墓葬 30 座,年代涵盖两汉、唐宋、明清时期,以两汉时期为主。其中 M7 为一座双墓道多室砖墓,初步判断年代为东汉末期,主体为十间墓室加双平行墓道结构,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此类墓葬形制在京津冀地区发现较少。发掘唐宋时期墓葬 4 座,其中 2 座保存较好,出土遗物包括鸟型白瓷器、铁鏃斗、铁三足鼎、陶罐等。根据对城子遗址的前期考古工作,现可基本判断城子遗址为容城旧治,始建年代不晚于西汉。墓葬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丧葬观念,与城址的发展沿革相互印证,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容城的历史沿革和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三) 燕、中山国考古和城市考古工作

1. 故郡遗址

故郡遗址位于石家庄市行唐县故郡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遗存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为早期鲜虞—中山国的代表性遗存之一,文化面貌具有明显的北方戎狄族群特色,同时又深受华夏系统文

化的影响,对研究东周时期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化进程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二号线车马坑周边相关遗存和故郡城址内部区域开展,累计发掘12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后岗一期文化灰坑1座,春秋晚期灰坑及灰沟各1座,战国早期车马—殉牲坑1座、杂殉坑1座以及战国中期的陶窑1座、灰坑75座、灰沟2条。

通过本年度勘探、发掘,确定了故郡城址南侧环壕的走向、形制结构及文化内涵,其时代不晚于战国中期;初步了解了故郡城址内部遗存分布状况及时代特点,其年代最早可至春秋晚期,为阐明城址的年代、历史沿革及文化内涵、城址与居址、墓地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完成M58杂殉坑、二号线车马坑北侧疑似M58墓组的兆域沟北侧一段的清理发掘,使故郡遗址中“王”级墓葬M58周边相关遗存的分布格局更加清晰;基本完成CMK12的发掘,其形制独特,为故郡遗址及东周时期的车马坑形制及车马殉葬制度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

2. 张家洼遗址

张家洼遗址位于保定市涞水县明义镇张家洼村,1984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并确定遗址的主体范围为张家洼村东、北部,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140米,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1993年被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前期较大范围的调查和2021年度发掘,明确了张家洼遗址包含有龙山晚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和战国时期四个时期的堆积。基本明确了发掘区台地的主体遗存分布情况。台地东北部主要是西周时期墓葬区。台地中部、西部为居址区。目前共发现墓葬10座、灰坑17座、窑址1座、水井1座,发掘出土各类遗物百余件。

3. 邺城遗址

邺城遗址位于邯郸市临漳县西南,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3—6世纪,邺城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故地、六朝古都。1983年以来,邺城遗址持续进行了38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2021年主要进行了邺南城宫城区与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两处

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2021年完成了邺南城宫城区中轴线北部206号大殿西侧附属建筑的解剖,确认了大殿西侧的廊房结构,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材料为主。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是继赵彭城北朝佛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大型北朝皇家寺院遗存,通过勘探与发掘,先后确认了寺院中轴线上的1号塔基、2号大殿和3号殿堂,以及由5号门址和两翼连廊与6号、7号廊房及北部8号复廊围合而成的核心院落。

2021年的发掘工作为深入了解邺南城宫城区北部中轴线上的建筑分布、宫院围合情况,以及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西部建筑结构及外围界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临漳邺城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4.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

正定开元寺南遗址2021年继续围绕寺庙建筑系统、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宋金至明清时期民居街巷系统等三个遗存系统,有针对性地开展考古工作,发掘面积500平方米,解剖沟9条,发现各类遗迹现象41处,出土遗物近400件。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是开元寺南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经过几年的工作,明确了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可以分为两期,城墙防御系统的发现为正定古城千年建城史提供了实证。通过对民居街巷系统的持续工作,明确了开元寺南侧区域自北宋开始成为古城内重要的人口密集区和重要的工商业区。

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发掘是河北省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发掘项目,正定古城在唐五代时期是河朔三镇之一,自唐至明清一直作为州、府治所所在,是河北省保存状况最好的古今叠压型城市遗址,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发掘从寺庙结构、城市平面形态、城市功能分区三个层面复原了正定这一府、州级城市的布局和变迁,立足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这些新发现和新认识不仅丰富了正定古城的文化内涵,也为华北地区中古以来府州一级的城市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个完善的个案。

(四) 基本建设工程和其他考古工作

2021年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9项,累计考古调查行程约5000余千米,勘探面积约8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

1. 王家岗遗址

王家岗遗址位于邯郸市涉县涉城镇寨上村东南，遗址背靠韩王山，面向清漳河。为配合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工程建设，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共计清理墓葬 4 座、窑 2 座、灰坑 54 个，遗址年代跨度大，包含后岗一期、大司空、夏、西周、春秋、战国、金元等时期，出土陶、石、骨、贝、铜等类遗物，其中可复原器物 50 余件套。

王家岗遗址所处位置较为重要，此处自古就是晋冀交流往来重要通道，通过发掘来看，该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文化面貌复杂且延续时间长，其中春秋战国墓葬的发现对本区域晋赵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 后百家村北墓地

后百家村北墓地位于邯郸市复兴区，是百家村墓群的一部分。百家村墓群的考古发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9 年、1972 年、2008 年进行过多次发掘，发现战汉墓葬及车马坑等遗迹。2021 年后百家村北墓地发掘战国、两汉、隋唐、明清四个时期的墓葬 465 座（含车马坑 2 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等文物 2400 余件。

作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邯郸不仅有成语故事，更有璀璨的文化遗存。后百家村北墓地发掘是赵都邯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墓地基本反映了邯郸城从战国到隋唐时期的兴衰演进。墓葬以战国至两汉时期墓葬数量最多，这也正是邯郸最为繁荣的时期。后百家村位于邯郸大北城西仅 2.3 千米，是战汉时期集中墓葬区，该墓地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丧葬习俗等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邯郸城市考古的开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3. 李家庄—古家疃墓群

李家庄—古家疃墓群位于张家口市蔚县李家庄和古家疃村之间，代王城墓群北区。2021 年对墓群及周边区域进行调查与初步勘探，发现墓葬近 150 座。对重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清理完成墓葬 10 座，出土遗物共计 280 余件，多为战国时期墓葬。出土遗物有铜器、陶器、玉器等。铜器有铜镞、铜剑、带勾等。陶器常见随葬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匜，以泥质为主，夹砂较少，纹饰多素面。玉器种类较多，材质有河磨玉、玛瑙、绿松石、水晶等，器类有玉环、

玉面饰、桶型玉管、玛瑙环、玛瑙珠、绿松石珠等。

发掘清理墓葬为代王城墓群北区新发现墓葬，多为战国时期墓葬，与代王城有着紧密联系，属于“代文化”体系。代王城独特的地理位置，受南方燕赵文化冲击较大，同时受春秋战国时期广泛分布于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体现出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批墓葬的考古工作，为“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资料，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4. 河北早期长城调查

河北早期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以后秦、汉、北魏、北齐、唐、金皆有营造，是中国北方早期长城分布较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具有历史久远、线路长、分布广等特点。为进一步明晰河北省早期长城的分布和年代，细化早期长城内涵研究，推动早期长城的科学保护、管理、利用，河北省早期长城勘察拟用 4 个年度对河北省早期长城进行勘察。2021 年完成赵南长城、中山长城、燕南长城勘察田野工作，完成了对 2009—2010 年河北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这三处早期长城记录文物点的再调查，对《河北省长城志》中记载的大部分相关遗址作了调查。勘察墙体 11 处、单体建筑 7 座、关堡 19 座、相关遗存 37 处、其他遗存 1 处。通过实地调查和对获取资料的综合分析，确定了三处早期长城遗址及其相关遗存的年代和性质，订正了多处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的认定错误，为早期长城的科学管理、保护、研究、利用奠定了基础。在勘察中，又在长城附近发现了新的遗存，为判定长城的年代提供重要参考，丰富了对长城沿线古代文化的认识。

对赵南长城西辽城遗址、燕南长城城子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勘探面积 65000 平方米，通过勘探确认了两处战汉城址，获得了长城附近相关遗址的新认识，推动了燕南长城、赵北长城本体和防御体系的研究。

5. 东明酒坊遗址

东明酒坊遗址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于 2021 年 3 月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发现。初步考古调查面积 15 万平方米。经调查，“十八酒坊”沿滏阳河两岸分布，以东岸规模最大。勘探区域位于原“十八酒坊”东南部，勘探面积约 3000 平方

米,根据勘探结果来看,该区域地层大致分四层:表土及现代建筑垃圾层、民国时期文化层、清代文化层、明代文化层,再下为生土。2021年度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古代酿酒作坊及相关遗迹32处,包括房址11座、窖池3处、摊晾场2处、蒸馏灶1座、灶2座、窖坑2处、润料池1处、道路2条、灰坑7座、门址1座。发掘出土遗物以陶瓷器为大宗,另有部分金属、琉璃、贝壳类遗物。陶瓷器以磁州窑彭城窑场产品占主流,其次为景德镇窑场产品,另有少量龙泉窑及北方青瓷窑址产品,器物品种包括缸、瓮、坛、罐、盆、碗、盘、杯、盅等,以各式酒碗、酒杯、酒盅居多;金属器有铜钱币、首饰、笔帽等;琉璃器有首饰、纽扣、烟嘴等;贝壳类器物仅见纽扣。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窑口涵盖明清磁州和景德镇南北两大窑址集群,遗物时代上自明代永宣、下迄近代,印证了衡水的城址变迁和蒸馏酒发展史,是明清陶瓷考古不可多得资料,对明代磁州窑研究更是殊为难得。

(五) 课题研究和学术成果

1. 课题研究

“河北肃宁后白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资料整理与研究”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后白寺遗址位于沧州市肃宁县梁村镇后白寺村西北、小白河东岸,遗址面积现存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775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厚,遗迹、遗物丰富,共清理房址、柱洞、灰坑、灰沟等各类遗迹210处,复原陶器近70余件,并出土有丰富的石、骨、角、蚌器及陶器标本1200余件。后白寺遗址大体包含夏、早商、晚商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遗址文化堆积厚、时代延续时间长。以后白寺遗址为框架可以建立较为完整的冀中东部地区夏商文化编年体系,尤其是夏至早商时期已经没有缺环,在冀中东部地区,后白寺遗址具有唯一性,放眼整个河北中南部,这样的遗址也是十分罕见的。后白寺遗址出土多种生产工具,不仅有石镰、石铲、石刀、石斧等农业工具,也有铜、陶、蚌等渔猎工具,有大量的陶质和蚌质的网坠出土,尤其是出土较多的鱼骨和蚌壳,显示其独特的生业模式,与其他同时期遗址相比有较强的个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后白寺遗址为近30年来冀中东部新发掘的遗址,发掘理念先进、采集信息全面,

可以弥补以前发掘资料的不足。比如,后白遗址是目前河北唯一年代分期有系列碳十四数据佐证的夏商时期遗址。

其他已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北行唐故郡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2015—2020年”,重点项目“武安磁山遗址发掘报告”“中山国灵寿城遗址相关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一般项目“雄安新区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及分类保护研究”“河北迁安爪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构建与研究”,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泥河湾人类起源、地质及环境背景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2. 学术成果

(1) 专著、考古报告

《邢窑》,^[1]邢窑遗址从北朝后期至元代,前后延续七百年左右,是北方早期瓷器、早期白瓷、透影白瓷、早期三彩的主要产地。本书汇总了1987—2014年6次考古发掘资料,即1987—1988年内丘电影公司和西关北,1990—1991年临城祁村、西双井,1992年临城山下,2003年内丘步行街,2012年内丘服务楼,2014年内丘翰林苑和服务楼,发掘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邢窑遗址的发掘获评“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书为上册文图、下册图版形式,主题内容以发掘时间、地点为顺序,分别对地层堆积、遗迹、遗物等进行了全面的分类描述,遗物统一形式划分,同时进行了分期与特征方面的总结,并在青瓷、黑(酱)瓷、细白瓷、素烧、三彩等方面倾注了较多笔墨。

《磁州窑冶子窑址》,^[2]是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州窑博物馆和磁县文物保管所于2015年、2016年对冶子窑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发掘面积332平方米,共发现窑炉2座、灰坑14个、沟1个,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瓷器近2000件、各类瓷片标本近6万片。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宋代白釉瓷器,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唐三彩装饰、宋棕黄釉刻印花装饰、宋涩圈擦烧工艺,不仅丰富了人们对冶子窑的认识,还对研究磁州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赞皇西高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地——2009—2010年北区发掘报告》,^[3]本书是南水北

调中线一期工程河北段文物保护项目——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西高北朝墓群 I 区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正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赞皇西高北朝墓群 I 区的 4 座北朝墓葬，附录收录了 5 篇西高北朝墓群的研究文章，汇编了目前所见的北朝赵郡李氏墓志。赞皇西高北朝墓群规模较大、排列有序、纪年清晰、遗物丰富，对研究北朝大族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 论文、考古简报

《河北行唐县故郡遗址东周墓 M2 的发掘》^[4] 2015 年对故郡遗址 M2 进行发掘，该墓为土坑竖穴积石墓，葬具为一棺一槨，出土遗物有青铜器、金器、玉器、绿松石器、玛瑙器、水晶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特点推断 M2 的年代为战国早期。从时代、地望及文化内涵看，故郡遗址应与太行山东麓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鲜虞和中山国密切相关。

《河北黄骅市大左庄隋唐时期制盐遗址发掘简报》^[5] 2016—2017 年对大左庄遗址的发掘，遗迹有井、灶、灰坑和灰沟等，出土遗物有瓷器、陶器、铁器、骨器、蚌器、铜器和铜钱等。根据遗迹特征推断遗址为一处隋唐时期的制盐作坊，作坊使用时间较长，布局有一定的规划性。遗址中与制盐有关的遗迹保存较好，基本可以复原出一套完整的制盐流程。

《河北蔚县三关辽代家族墓地 M3 发掘简报》^[6] 三关辽代家族墓地 M3 位于河北省蔚县西合营镇三关村。墓葬由墓道、天井、墓门、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门外部为砖砌仿木结构门楼。墓室为砖砌六边形单室，内部亦为砖砌仿木结构。壁画主要绘于除南壁外的其余五个壁面。绘画题材有备餐图、竹石仙鹤图、花丛对鸟飞雁图、起居图等。壁画整体采用工笔重彩描绘，双勾填色、分染、没骨等画法并用，有五代遗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具有汉地特点，壁画风格又有辽墓典型的“东向为大”的特点。张家口一带发现辽墓较多，此墓的发掘为进一步探讨宋辽时期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

《河北邯郸西小屯一号墓及周边墓葬发掘报告》^[7] 西小屯一号墓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西小屯村北 500 米处。2007 年 3—6 月，为配合邯钢新区建设，共清理墓葬 32 座，除确认西小

屯一号墓为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的带封土多室砖墓外，还发现 31 座小型竖穴墓，年代从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此次发掘为研究河北邯郸地区战国时期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

《河北蔚县大德庄墓地 M2 发掘简报》^[8] 大德庄墓地地表现存 5 座封土。因张石高速公路建设，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 月对大德庄墓地 M1 和 M2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 M2 为多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及后室组成，出土随葬器物种类繁多，有陶器、铜器、玉器及铜钱等。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分析，推断该墓的年代为东汉中晚期。M2 的发掘丰富了大德庄墓地的文化内涵，为同时期多室砖室墓及葬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对全面了解冀西北乃至河北地区东汉墓葬的分布规律、墓葬形制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河北定州市北刘家庄遗址发掘简报》^[9] 2013 年对河北省定州市北刘家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 2500 平方米，发掘清理了先商、春秋、战国、秦汉、宋金等时期的遗迹共 284 座，包括灰坑、灰沟、灶址、窑址、水井、蓄水池、墓葬等，出土遗物千余件。此次考古发掘为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文化谱系、生业、人群和环境等综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实物材料。

《河北正定县正定新区唐代纪年砖室墓发掘简报》^[10] 2014 年 6—9 月对正定新区石家庄国际展览中心工程区域的文物遗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编号 M49 古墓葬为砖室墓，出土青石质墓志一合，为该墓的年代判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墓内还出土铜器、瓷器、陶器等。该墓的发现为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研究增添了新的考古学资料。

二、博物馆学研究

2021 年，河北省博物馆学主要集中在革命纪念馆事业发展研究、博物馆教育理论与服务实践、博物馆陈列展览研究与实践、博物馆藏品保护与活化利用、博物馆区域合作与管理体制、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研究、博物馆文化传播与新媒体应用七大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科研队伍相对平稳，其中几篇高校硕士论文令人耳目一新。革命纪念馆事业发展研究、陈列展览实践研究、展示空间设计研究方面亮点频出，思想有高

度、思考有深度、思维有广度。

（一）革命纪念馆、博物馆事业发展研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河北省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建设与我党风雨同舟、不断发展，李宝才撰文梳理了河北省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将其分为创业高潮期、挫折期、缓慢恢复期、全面增速期、高质量提升期五个阶段。^[11]

文章先介绍了河北省红色资源的整体情况，即资源丰富、分布广泛，革命文物价值高、影响大、类型多样。其中，河北省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场馆等共2000多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00余处。全省有登记在册的革命题材的纪念馆、博物馆35家，登记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828处，国有单位馆藏革命文物26129件（套）。

在创业高潮期（1949—1965年），为落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征集革命文物令》《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成立了西柏坡纪念馆（筹备处）、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藁城梅花惨案纪念馆、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安国市毛主席视察纪念馆、定县张寒晖纪念馆、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冀东烈士陵园，加上较早建成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全省共有10个革命纪念馆园。文物征集方面，克服了人员匮乏、经验不足、经费有限等困难，成为征集革命文物最多、质量最高的时期，奠定了河北馆藏革命文物的基石。陈列展览方面，举办了《河北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文物展览》《河北革命少年儿童展览》《河北人民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斗争展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等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在挫折期（1966—1976年），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相关工作基本停顿，陈列展览大量减少。直到1969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逐步恢复，先后建设了潘家峪革命纪念馆、唐县白求恩纪念馆、城南庄革命纪念馆等，并举办了《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河北革命史陈

列》等临时展览。

在缓慢恢复期（1977—1993年），新建了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保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唐山地震资料陈列馆（后改为唐山抗震纪念馆）等；较大规模地改扩建了西柏坡纪念馆和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重建、修缮了冀东烈士陵园纪念馆、丰润潘家峪惨案遗址和纪念馆、冉庄地道战遗迹、西柏坡部分领导人旧居等。陈列展览方面，一些有条件的场馆举办了《周恩来总理伟大革命实践展览》《河北省革命史展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展览》《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图片展》《河北共产党人光辉业绩展览》《南京雨花台烈士史迹展览》《一代伟人毛泽东》等临时展览。这一时期，革命题材的展览显著增加，革命文物征集工作全面恢复，对纪念馆涉及的院落房屋进行了大面积征购，开展了基础性的革命文物普查等，一系列努力为深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尽管如此，仍存在人才流失、财政拮据、基础设施落后、陈列手段不足等问题。

在全面增速期（1994—2012年），随着中共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印发，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河北省委率先公布了第一批共21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拨出专款3000万元支持基地的建设。1997年7月，中宣部向社会公布了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北的西柏坡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等6家单位名列其中，河北省革命纪念馆、博物馆的建设达到了高峰。在建设数量上，全省革命纪念馆、博物馆新增15个，包括保定军校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等。在建设水平上，馆舍规划、建筑理念有较大提升，与纪念主题深度融合，强烈表达了红色宣讲的内容。在展陈形式上，采用现代工艺材料，声、光、电技术普遍应用。在教育活动上，内容灵活多样，服务功能齐全，符合人们的文化需求。此外，非国有革命题材纪念馆、博物馆也逐步进入发展序列。

在高质量发展期（2013年至今），国有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开始侧重提升办馆质量，加强馆藏文物和展线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护，

加大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保护力度,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升革命纪念馆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教育效果。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制定下发了《河北省革命文物利用工程(2018—2022年)实施方案》,提出了馆藏珍贵革命文物保存条件达标并得到保护和修复的发展目标,确立了对重点博物馆、纪念馆收藏的革命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性修复、消除病害、改善保存条件,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泛开展革命文物展示和革命文化传播,建立与周边学校、党政机关、城乡社区的共建共享机制等。2019年,河北省文物局投入500多万元,为涉县一二九师纪念馆和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库房、展厅安装了环境监测系统和恒温恒湿储藏柜,提升了馆藏文物的保护水平。2020年,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和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建立了数字化平台,搭建了数字资源信息存储、访问、应用的标准化体系。2021年,与省委宣传部、省党史办、省教育厅、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协作,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建党百年”主题活动,并遴选保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等20家革命纪念馆、博物馆作为重点支持和实施单位,年内计划推出210场红色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新馆建设方面,全省新增非国有革命纪念馆、博物馆3个,分别为保定市中国共产党员日记博物馆、保定市太行博物馆、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

李宝才认为,河北省革命纪念馆、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侧面反映了党和政府对革命文物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的不断认识的过程,希望各个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能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更为引人瞩目的成绩。

(二) 博物馆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1年河北省博物馆学专家立足党的百年华诞撰写文章,对博物馆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教育功能拓展延伸等进行了探讨,丰富了博物馆德育、美育的内容和方式,践行了博物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内涵和使命。

刘卫华梳理了河北博物院在新形势下传承、利用、发扬红色文化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与和努力。^[12]一是发掘红色文化内涵,推出系列红色主题展览。如常设展览《抗日烽火 英雄河北》;联合主办《辉煌燕赵 党旗飘扬——河北党史图片档案文献展》《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事迹图片展》等;联合承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展》《致敬40年——河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等,充分展示了地域红色历史,大力弘扬了革命精神。二是结合红色文物资源,策划丰富的红色主题教育项目。如“经典电影中的河北抗战故事”“感受革命烽火 争做少年先锋”等;在常设项目“朗读明星梦工坊”和“青葵剧社”中加入红色主题内容,扩大红色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三是探索多种服务形式,拓宽红色文化传播半径,如连续多年开展“歌声中的峥嵘岁月”“光辉的旗帜 血染的风采”两大红色主题宣讲;推出“光辉的旗帜 血染的风采”便携式展览,将红色文化送进景区、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四是合理利用新媒体,实现传播手段与时俱进。如开展“忆峥嵘岁月 颂民族英雄”网上专题活动、“感怀清明 遥寄相思”主题传播活动、红色故事直播活动等,利用新媒体平台将红色文化转化为感召公众的精神力量。五是策划专题教育项目,献礼党的百年诞辰。如“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主题活动、“镰锤星火 光耀千秋”专题讲解、“童心向党”主题活动、“讲党员故事 颂革命精神”主题活动等。文章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对省内其他博物馆、纪念馆红色主题活动的策办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刘蕴泽探索了新时代背景下传承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的路径和方法。^[13]一要注重红色文化内涵的延伸。以往的红色文化包括革命文物、革命文献、文艺作品、革命纪念地战争遗址、革命领袖人物故居、革命根据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传统,新形势下红色故事内容要与时俱进,应该以小见大,说真事、讲真人,避免大场面的空洞口号,更要避免说教式、填鸭式的讲述;应该因人施讲,面对不同阅历、不同领域、不同政治面貌的受众,及时调整宣传内容和宣讲模式;应该紧抓热点、与时代接轨,既有革命先烈,也要有时代楷模,让受众产生共

鸣。二要注重传播形式的变更。用新技术支撑新内容,积极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模式是博物馆探索的方向,广泛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VR、AR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公共平台,使公众足不出户云游博物馆。三要注重红色讲解员队伍的建设。目前,红色讲解员队伍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许多新入行的讲解员专业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还有待加强,建议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政府力量的介入,培养一批“政治思想好、知识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范带头好、社会影响好”的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贾叶青以河北博物院“朗读明星梦工坊”项目为例,思考了利用博物馆红色文化资源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14]文章先介绍了“朗读明星梦工坊”项目的理念,即整合优势资源,强化思想教育。项目立足“抗日烽火英雄河北”展览,利用抗战文物、经典红色诗文和电影资源,通过由浅入深的科学规范课程设置,个体差异因材施教的实施方式,引领儿童在朗读中学习抗战历史、把握朗读技巧、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并传承红色文化。接着介绍了项目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侧重点,即注重循序渐进,促进情感升华。项目以6~12岁儿童为活动对象,以展览中11首与抗战主题相关的诗文作为教学内容,充分遵循儿童的心理认知规律,以红色诗文的学习、朗读、共情为教学主线,从知识维度、技能维度、情感维度三个方面设计实施课程,通过学习、练习、应用三个环节引导儿童升华情感。随后概括了该项目的特色,即构建多重互动,优化体验教学。项目充分利用博物馆红色资源核心优势,密切结合红色文物和诗词,将其演化成课程中的“教材”与“环境”,通过情境融入激发热情,通过角色扮演重塑自我,通过协作交流丰富体验,通过打破壁垒提升领悟。最后对项目进行多样、动态、立体化评估,从不同视角记录儿童的成长,在不同层面对儿童的进步建构起立体反馈。文章对博物馆红色教育项目的策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夏丽娟以嘉峪关长城博物馆为例,探索了新时代背景下馆校合作的教学模式。^[15]认为馆校合作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模式,通过馆校合作能够弥补当前“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问题,但是

目前馆校合作的教学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健全。文章指出,馆校合作在提升青少年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尤其是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能够为学校教育提供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再有,馆校在教育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都是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方式,让学生通过不同的学习方式实现核心素养的培养,为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文章以嘉峪关长城博物馆为例指出建议:一要以学校需求为中心确定博物馆的教育计划,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设置不同的参观内容,确保各年龄段的学生都能够有所收获。教师应该根据学校教材的相关内容,确定参观文物的种类,以弥补教材内容的不足。二要以多种教学方式为实现教育功能提升,如举办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专题报告等,不断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文章对于促进馆校合作,实现博物馆和学校的双赢具有参考价值。

赵嘉玮的硕士论文探讨了博物馆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趋势。^[16]文章立足于当今时代背景,以观众体验作为博物馆教育的研究主体,结合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对博物馆教育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拓展博物馆的教育方式,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有效利用。文章主要分为五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目的意义以及创新点等,随后解读了博物馆教育的内涵、特征以及新时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相关政策。接着在对中国博物馆教育实例收集的基础上结合观众调查,对我国博物馆教育现阶段发展进行梳理,进而对博物馆教育新成果、新模式、新特点进行研究。作者从博物馆教育相关理论、博物馆教育活动现状分析、博物馆教育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思考了现阶段博物馆教育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博物馆教育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一要以观众为导向,注重观众的多元化参与体验;二要丰富教育选题,深度挖掘馆藏文物文化内涵;三要注重博物馆教育的特色,打造富有地域特色、城市情感的博物馆;四要加强沉浸式展览的设计,让观众在展览中看、听、触碰、感受,进而激发好奇心、洞察力、思考力等。

（三）博物馆陈列展览研究与实践

2021 年底，全省登记注册的博物馆 178 家，共举办各类临时展览 970 次，参观总数 1824 万人次，免费参观数量 1649 万人次，其中未成年观众 536 万人次。开展线下社教活动 5440 场，线上社教活动 827 场，社教活动参与人数 557 万人次。理论研究方面，河北省学者撰文探讨了博物馆专题展览的意义，分享了较有新意的展览案例。陈展实践方面，各地博物馆、纪念馆举办了大量红色题材的展览，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

理论研究方面，孙月撰文探讨了专题展览对博物馆建设的作用。^[17]认为举办专题展览能够充分发挥藏品价值，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应。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展示内容和文物数量毕竟有限，筛选馆藏文物举办专题类展览可以发挥馆藏文物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功能。举办专题展览能够展现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全面有效地落实党的方针与政策，明确党的中心工作，能够更加直接地向观众进行宣传与教育，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最大程度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举办专题展览可吸引大众并提升经济效益，通过展览内容的扩充更多地吸引观众参观，个别展览通过象征性收费的形式帮助博物馆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进而更多回馈博物馆的建设。文章肯定了专题展览给博物馆建设注入的生机与活力，对促进博物馆的建设和长远发展有积极意义。

展览实践方面，河北省文物局在省内举办大量红色题材展览的基础上，组织了“红色热土英雄河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省十大红色题材展览精品推介活动，进一步发挥了革命文物在服务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本次活动中，全省 40 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共推荐革命题材展览 50 余个，最终河北博物院等推荐的 10 个展览入选本次推介精品展、10 个展览入选优秀展。《河北日报》《燕赵晚报》《博物馆中国》等报纸、网络平台予以大力宣传。^[18]

参与评审的专家一致认为，河北省以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本地区革命史为主题的展览数量多、质量高，呈现出河北作为革命文物大省的底蕴，展示出河北革命文物宣传展示利用的最新成果。

专家一致希望河北利用红色文物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社教活动，发展文创产品、通过多方运作，扩大河北省红色题材博物馆、纪念馆的品牌影响力。

入选精品展的 10 个展览：中共河北省委主办，省委办公厅、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和河北博物院承办的《“英雄的土地 辉煌的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河北党史图片档案文献展》；西柏坡纪念馆的《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展》；李大钊纪念馆的《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把青春献给党”新增文物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的《寻路法兰西——中共旅欧支部文物史料展》；沧州市委宣传部、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沧州市博物馆的《革命烽火 红耀沧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沧州革命史展》；保定市博物馆的《京畿重地 红色热土》；唐山博物馆的《红色精神

唐山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展》；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的《走向全国执政的基石——晋冀鲁豫边区发展史》；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的《冀中冉庄地道战》等。

入选优秀展的 10 个展览：河北博物院的《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展》《岁月百年 初心永恒——河北优秀共产党员事迹展》；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的《走向新中国的红色财经——晋冀鲁豫边区财经工作》；晋察冀边区纪念馆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的《时代潮头 引吭高歌 秦皇岛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展》；保定市中国共产党党员日记博物馆的《百名党员百年日记庆建党百年》；迁安博物馆的《鉴往知来 恰是百年风华——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特展》；蔚县博物馆的《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历史巨变——蔚县党史档案图片展》；元中都博物馆的《辉煌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张北县历史展》；高邑县博物馆的《高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红色收藏展》等。

（四）博物馆藏品保护与活化利用

新时代下，各种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同样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文物保护工作者应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有效提升文物保护质量和保护效率。同时,应当拓展博物馆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渠道,将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生产性文化资本。

刘茂利以青少年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新发展理念下博物馆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途径。^[19]认为青少年参观博物馆的次数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在当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下,博物馆更应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进行文物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议:一要营造创新互动趣味氛围,摒弃以往仅仅用图文展板来进行陈列展览的方式,运用青少年习惯的语言和感兴趣的方式,展现展品所承载的内涵和价值,实现文物存在与传播的本质意义。在陈列展览形式设计方面,使陈列数字化、趣味化、活动化、细致化,尽量符合青少年的认知规律,增强他们的参与性与融入性。二要寓教于乐、以趣促学,与各个学校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与广大青少年学生同行,促进博物馆资源与课堂教学相融合、相促进。可结合馆藏文物陈列策划情景剧、舞台剧,让青少年通过剧目的角色扮演、剧情参与,做到真实还原、寓教于趣,在快乐氛围中感受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可在贴近各学段学生的生活实际、尊重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立足河北文物的实际情况,增加博物馆研学频次,编制相关研学手册,以“实践学习”为主要特征,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杜晓林撰文思考了新时代下博物馆文物保护、传承的创新策略。^[20]文章首先分析了新时代下利用新兴技术进行文物保护与传承的优势,如可以对现有文物进行全方位展示,可以实现文物的科学修复,可以实现文物资源的全方位共享等。随后阐述了新时代下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传承发展的三个原则,即安全第一、流程规范,与时俱进、全面考虑,科学系统、动态弹性。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保护和修复,要严格按照流程规范工作,有效减少对文物的损坏,实现文物保护和传承发展的科学性、系统性相统一。针对当下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传承发展策略,建议:一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加强文物保护与传承发展,促进文物保护与宣传工作创新,让更多公众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二要与相关科研机构

和高校进行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高素质博物馆文物保护人才,定期选拔优秀工作人员接进行培训深造,构建凝聚力较强的文物保护团队。三要利用信息化平台对博物馆文物进行统一管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公众开放,不断提升博物馆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四要构建完善的文物资源数据库,为国内各个博物馆之间的学术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文物信息,加强资源共享与沟通交流,实现博物馆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图文典拓是博物馆的重要资源之一,类别有图书、文献、典籍、金石拓片等。翟晶晶在立足国内图文典拓资源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思考了平台构建的原则和实施保障等。^[21]文章以2018年成立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图文典籍与金石拓片专业委员会为例,目前该专委会已吸纳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48家委员单位。认为图文典拓资源在各单位的分布是不均匀的,综合性博物馆因其等级、规模等原因在图文典拓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有所差别,行业内也缺少平台把这些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文章指出,图文典拓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有利于加强馆际交流,实现资源互通;有利于提高图文典拓资源利用率,为策展、研究等业务工作提供强有力地支撑;有利于扩大图文典拓行业的影响力,提升博物馆魅力。同时提出图文典拓资源共建共享平台的构建应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分级分层、信息安全原则,先召集参与意愿强烈的主任委员单位和副主任委员单位,逐步吸纳更多单位加入。最后,阐述了图文典拓资源共建共享平台的实施保障,一是充足的经费保障;二是完善的人才结构和梯队建设;三是建立跨地区的协调机制;四是搭建完善的平台框架体系。文章对全国图文典拓资源的共建共享、活化利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钊基于博物馆的文化资源,探讨了文创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路径。^[22]认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趋势良好,仍有一些博物馆在研发文创产品的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困惑,如与馆藏资源不匹配、产品品种形式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供应与市场需求之间严重不平衡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强化跨界合作。跨界合作即两个不同领域的合作,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领域的非竞争性品牌,发挥不同类别品牌的协同效应,以融合品牌元素为基础,以用户体验为

中心,加深用户对品牌延伸、品牌核心价值的理解,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品牌观念及审美态度相互融合,开发出新的产品,进一步拓展各自的市场价值,提升品牌的存在感和立体感。接着指出跨界合作的原则,即要满足融合性原则、品牌理念相符原则、整合创新性原则、文化初心原则、和谐共生性原则。以期用新发展理念,突破原有边界束缚,助力博物馆形成特色鲜明、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体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时期期待等。

(五) 博物馆区域合作与管理体制

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博物馆面临更多挑战,如何重新定位,如何跨界合作,如何增强造血功能,如何提升博物馆的运营管理能力,都是博物馆应该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021年,河北省内博物馆学专家撰文探讨了博物馆跨区合作、运行维护、档案管理、财务制度等,对创新区域内博物馆的合作模式、提升博物馆的运营能力有积极意义。

陈静基于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发展的经验和现状,对京津冀区域内博物馆协同发展的模式、方向、策略做了深入探讨。^[23]文章首先梳理了三地博物馆协同发展现状,并分析了不利因素。认为,近年来三地积极整合区域博物馆资源,合作节奏逐渐加快,合作形式日益多样,合作层次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区域博物馆联盟。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三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不平衡,不少中小博物馆专业人才欠缺,个别博物馆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随后探讨了三地博物馆的合作模式,认为合作的着力点与创新点仍然集中于陈列展览、社会教育、文创开发、科研共享等方面,如挖掘地域文化内涵,推进陈展项目合作;积极策划社教活动,共享公共教育资源;把握跨界融合方向,蓄力文创产品开发;建设学术交流论坛,提升地域学术水平等。最后展望了三地文化资源联动的可行性和措施策略,建议:一要加强业内联动,寻求差异化发展。尤其是中小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革新思路,根据自身优势,在基层文化建设上扬长避短,实现差异化发展。二要加大跨界联动,共建区域文化。博物馆与图书馆、档案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应相互支撑、密切合作,发挥整体优势,满足公众的文化

需求。三要加速馆校联动,践行文化强国。应将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紧密结合,进而推动教育功能最大化。四要加深文旅联动,引领发展新业态。三地博物院应谋求成为区域性文化中枢,联动各类文化景点构建文化景观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全面提升健康保障能力,创新云直播、云看展、虚拟景区等数字文旅产业,构建京津冀三地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修订,进一步强调了预算管理的重要性,也为事业单位加强预算管理指引了方向。沈明立足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为事业单位加强预算管理提出了合理建议。^[24]认为事业单位预算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如预算编制精细化程度不高、单位收入预算编制不规范、预算执行不到位、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推进迟缓、预算公开工作任重道远等。建议:一要提高预算编制质量,通过建立领导小组加强对预算编制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各项目提前做好工作谋划,将预算做全做细;二要进一步规范收入预算编制,财务部门牵头组织相关业务处室认真梳理单位各项收入,确保测算准确;三要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财务部门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尤其是督促各业务部门重大事项的执行进度;四要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年底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单位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量化评分;五要落实预算公开工作,财务部门应明确单位预算公开的范围、公开事项的明细程度以及相关时间节点要求。文章对事业单位贯彻实施好预算法实施条例有积极意义。

张玉青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博物馆财务管理入手,剖析了政府会计制度对博物馆的基础财务工作、预算、核算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25]认为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新会计制度下博物馆的财务管理存在很多不足。随着政府会计制度的逐步推行,博物馆财务粗放式管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多数博物馆已经开始建立较为完善的预算管理机制。政府会计制度对财务基础工作、预算管理、会计核算、财务人员素质等均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建议,政府会计制度下做好博物馆的财务管理,要夯实财务基础工作,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要转变预算管理理念,完善预算监督机制;要加强

财务信息系统建设,增加内控风险制约环节;要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加强资产数据贯通对接;要提升财务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对博物馆业务对称的沟通等。文章认为,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对博物馆类事业单位的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实践中,应系统分析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发现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夯实基础工作、完善制度、信息建设、提升人才队伍等,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财务会计监督是财务管理的一项职能,也是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陈永平撰文探讨了新时期博物馆财务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和创新路径。^[26]认为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机构,日常运营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博物馆只有做好财务会计监督工作,才能更好发挥出资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指出博物馆财务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一要增强财务管理意识,二要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三要对财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四要加强财务人员素质培养。随后指出当前博物馆财务会计监督存在人力配置不足、法规建设滞后、内部控制不力等问题。为做好博物馆财务会计监督工作,建议:一要制定完善可行的规划体系,完善专项经费规章制度;二要加强财务管理审计工作,保证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三要实行会计人员轮换机制,实行会计人员轮换机制;四要建设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从定量评价、定性评价两种方式对财务人员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文章对加强博物馆会计监督、推动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

档案管理是博物馆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王芑菲思考了如何有效运用标准化管理模式,创新博物馆档案工作方式。^[27]认为标准化应用管理在博物馆档案工作中是必然趋势,不仅可以转变管理方式,还可以提升管理水平,有效促进博物馆发展。指出,博物馆档案工作实施标准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标准化管理缺乏重视,二是缺乏资金投入,三是管理人员素质待提升,四是缺乏管理制度建设。建议:一要提高重视程度,只有引起重视,从思想上发生转变,才能有效落实下去;二要加大资金投入,对于陈旧或者已经发生损坏的设备要及时更换,制定资金使用方案,将每一分钱花在有用的

地方;三要提升管理人员综合素质,除了有关档案工作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有效适应标准化管理模式应用的需求;四要完善管理制度,保证满足实际所需,增强制度执行力,将具体效果落实下去,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文章对提升标准化管理模式应用成效,推动博物馆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 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研究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发挥科普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展览效果的好坏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展陈设计。成功的展陈设计能够合理利用博物馆的空间,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创造出一个舒适融合的空间环境。2021年省内高校博物馆学的硕士论文关注了博物馆的空间设计,为博物馆建筑功能划分及配套设施配置,合理评估展览空间承载力,提高博物馆空间利用效率提供了量化参考。

汪永赫基于承载力视角,对观众的观展行为展开定量研究,同时提出承载力评价标准,提出该视角下的优化思路与优化方案。^[28]论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研究背景与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明确了文章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在分析博物馆空间历史沿革的前提下,指出了博物馆空间现存的问题与不足,如观展过程拥挤、建筑功能及配套设施不足等,虽然多数博物馆通过预约控制人数,仍然不可避免某些时间段参观人数高于峰值,难以从展厅入口处精确控制进入人数频率等。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基于国内博物馆的现状,在对博物馆空间环境和观众行为进行案例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博物馆展览空间类型及观众的观展模式,并以绩溪博物馆为调研对象,剖析了观众的观看速率、持久度、弃展率以及博物馆空间的承载力。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根据行人特点模拟构建观展模型,并基于承载力视角提出了博物馆空间的优化方案,通过改变路径宽度与布展方式等设计场景,配置相应建筑功能及配套设施以满足观展需求。文章的创新点在于通过研究行人的观展模式,构建博物馆展览空间观众观展微观模型,并以承载力为评价标准,提出满意限值与最佳限值,为建筑师提供量化决策参考,完善展览空间设计实践。

专题博物馆是博物馆分类日益细化的衍生物,是对某一专门学科、领域内容的收藏和展示。印妍以专题博物馆为研究载体,体验式展示设计为研究点思考了专题博物馆体验式展示空间的设计。^[29]论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目的,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概述了专题博物馆体验式展示空间设计,即以人的具体行动为研究对象,让参观者积极主动投入到展示活动中去,产生更加真实丰富的体验感。第三部分通过调研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和国外的美国国家海军陆战队博物馆、日本方便面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的展示空间设计,阐释了体验式展示设计在专题博物馆中的应用。第四部分以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为例,把前期了解的体验式设计理论运用在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中,最大化地让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展品所蕴含的文化传递到参观者心中。总体来看,文章首先界定专题博物馆和体验式展示设计相关概念,然后对博物馆空间中的体验活动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体验式设计在博物馆展示空间中的重要性,通过比较分析法总结归纳出体验式设计在专题博物馆展示空间中的应用形式,最后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将前期的理论作为实践项目的基础,并运用到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展示空间中,顺应了新时代下专题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的发展趋势。

王伟以地震纪念馆为研究对象,从建筑现象学场所论与知觉论的角度出发,结合地震纪念馆场所营造和知觉引导,探索以人为主体的地震纪念馆设计原则和方法。^[30]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并说明论文的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总结了地震纪念馆相关设计的不足并提出论文创新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建筑现象学与地震纪念馆的相关概念,论述了建筑现象学应用于地震纪念馆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通过对建筑实践作品的调研分析,总结归纳出影响地震纪念馆场所营造与知觉引导的物质要素,提出基于建筑现象学的地震纪念馆设计策略提出提供了实例支撑。通过对地震纪念馆场所营造和知觉引导影响要素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运用建筑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国内外已建成的

案例对地震纪念馆的场所构建、营造场所精神以及内部空间知觉引导的设计策略展开详尽的分析与讨论。论文以建筑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研究地震纪念馆的设计策略,试图总结出一套以人的体验为主体的地震纪念馆设计生成理论,为提升地震纪念馆的纪念性、精神性起到积极作用。

(七) 博物馆文化传播与新媒体应用

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小到个人、社区,大到城市、国家,都在逐渐走向媒体化。2021年,河北省博物馆学专家撰文探讨了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新媒体宣传思路,以及如何运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博物馆业务工作等问题。

范婷婷思考了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的新媒体宣传,文章以国内13家知名博物馆(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为研究对象,总结出博物馆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主流做法,并提出相应的创新思路。^[31]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升级,博物馆依托线上宣传进一步优化了传播内容和服务体验,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内的13家博物馆在宣传手段上均通过官方微信开展云展上线、展览攻略、系列文物纪录片、专栏视频推送、线上教育课堂、探展直播、在线音乐表演、古乐科普音频、网上竞答互动、V-Talk访谈等各种类型的线上服务。在宣传内容上,表现出以展览为中心内容矩阵、以公众为中心的宣传理念、线上与线下的融合性宣传、注重把握当前时事热点等四个特点。为优化博物馆新媒体宣传,建议:一要注重打磨推文内容,打造以展览为中心的专题式宣传构架,官方微信更新率为一周一条或两条,每条2~5篇的信息量;二要摸清博物馆的受众群,培养核心的分众体,为想要获取更多知识的观众提供资料源;三要推动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内容的宣传成果,融合性地打造同一品牌。文章以国内13家主流博物馆为研究对象,对新媒体宣传有积极借鉴意义。

李解撰文探讨了新媒体对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影响。^[32]认为当前形势下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改革更新,利用新媒体、信息化设备等更好地发挥出博物馆宣传教育的效用。文章指出了新媒体博物馆宣传教育活动的一些不足,如对新媒体的宣传没有花心思进行设计和制作;新媒体宣传工作过于单一,只

宣传藏品的外在,没有考虑到藏品内在的文化历史、相关的知识;新媒体手段的管理、信息上传、民众交流等方面缺乏系统的规则,使新媒体手段成为“样子”;缺乏对民众需求的调查研究,无法满足民众的参观需求以及知识获取等。为改善以上情况,建议:一是建设线上网络博物馆,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建立一个微型的线上博物馆,利用三维立体技术,呈现立体博物馆的视觉效果,还可以设置一些现实资料、图片、历史背景的信息检索栏,加强人们的浏览体验;二是实现线上交流互动,博物馆在自己的微信订阅号、官方微博、邮箱等平台上传推出相关信息,观众通过线上进行活动咨询、活动内容准备以及票务办理等,加强了教育活动的覆盖率和辐射度,三是提升工作人员新媒体技术,博物馆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促进工作人员思考如何使用更多的新媒体形式进行博物馆宣传,增大博物馆线上内容的浏览率,扩大博物馆的群众基础等。

刘朋璋、黄薇等以石家庄市博物馆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分析观众对博物馆微信导览系统的需求,探索了馆内导览系统的优化提升策略。^[33]指出,近年来石家庄市博物馆利用微信小程序提供云展览,并对重点展区和重点文物进行详细的介绍,但在向观众传递信息等方面仍存与观众互动性不强、展品内涵展示较少等不足。为利用微信提供更周到细致的服务,建议:一要调查分析,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探究博物馆观众参观时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博物馆观众以青年、中年观众为主,一类是知识获取与研究型观众,主要为了获取知识与学术研究;其次是休闲娱乐型观众,主要为了休闲放松,缓解压力;再有是艺术鉴赏型观众,主要为了提升美学修养、艺术鉴赏水平。这些观众的需求和痛点表现在参观攻略制作信息不对称、娱乐互动性差、参观总结分享受限等。为增强观展体验,石家庄市博物馆对微信小程序进行了提升,如增设与展品有关的角色扮演小游戏,根据观众兴趣增加相关文创产品的精准推送,根据观众参观行为制定证书等。完善后的微信小程序使得观众在参观前有准备、参观过程中有互动、参观后有总结收获。石家庄市博物馆依托微信小程序,利用现代科技搭建博物馆的线上参观系统,实现了参观一体化,增强了观

众对博物馆的黏性。文章为综合类博物馆的微信导览小程序设计提供了细节参考。

2021年河北省博物馆学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尤其是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契机,组织策划了十大红色题材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使省内20余个红色精品展览脱颖而出,充分体现了河北省红色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等特点,展示了河北省博物馆较为先进的策展理念和陈展水平。在研究成果上,多篇高校硕士论文关注到了博物馆文创开发、空间设计等,丰富了博物馆学研究成果,拓宽了博物馆学研究视野,增强了博物馆学研究梯队。接下来,呼吁更多专家级学者深度关注博物馆管理、陈展研究、文旅融合研究等,期待下一年度取得更多成果和更大进步。

(张春长: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马超: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成彩虹: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
陈静: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

参考文献:

- [1]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邢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10.
- [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磁州窑冶子窑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11.
- [3]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赞皇西高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地——2009—2010年北区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09.
- [4]齐瑞普.河北行唐县故郡遗址东周墓M2的发掘[J].考古,2021(12).
- [5]雷建红等.河北黄骅市大左庄隋唐时期制盐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21(02).
- [6]岳改荣等.河北蔚县三关辽代家族墓地M3发掘简报[J].文物,2021(10).
- [7]陈伟等.河北邯郸西小屯一号墓及周边墓葬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2021(03).
- [8]雷建红等.河北蔚县大德庄墓地M2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2021(02).
- [9]任雪岩.河北定州市北刘家庄遗址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2021(03).
- [10]杨丙君.河北正定县正定新区唐代纪年砖室墓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2021(04).
- [11]李宝才.传承红色基因 强化使命担当——河北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建设及其发展历程[J].文物春秋,2021(03).
- [12]刘卫华.锤炼红色教育项目 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河北

- 博物院红色主题教育工作侧记[J].文物春秋,2021(03).
- [13]刘蕴泽.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讲好红色故事[J].博物院,2021(03).
- [14]贾叶青.博物馆“展教合一”红色教育活动开发模式探析——以河北博物院“朗读明星梦工坊”为例[J].博物院,2021(03).
- [15]夏丽娟.新时代背景下馆校合作教学模式的探索分析[J].丝绸之路,2021(03).
- [16]赵嘉玮.中国博物馆教育趋势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06.
- [17]孙月.专题展览对博物馆建设的重要作用[J].炎黄地理,2021(03).
- [18]李宝才.我省红色题材展览十大精品揭晓[N].河北日报,2022-01-4(02).
- [19]刘茂利.新发展理念下博物馆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N].河北经济日报,2021-08-21(03).
- [20]杜晓林.新时代下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创新探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17).
- [21]翟晶晶.关于博物馆图文献拓资源共建共享的思考[J].办公室业务,2021(03).
- [22]赵钊.加快博物馆文创产业跨界融合发展[N].河北经济日报,2021-07-24(05).
- [23]陈静 焦鹏航.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博物馆合作模式探索及联动展望[J].文物春秋,2021(5).
- [24]沈明.事业单位贯彻实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思考[J].财经界,2021(38).
- [25]张玉青.政府会计制度对博物馆财务管理的研究分析[J].财会学习,2021(08).
- [26]陈永平.新时期加强财务会计监督工作的创新路径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9).
- [27]王芭菲.博物馆档案工作中引入标准化管理模式的策略和意义[J].山西青年,2021(09).
- [28]汪永赫.基于承载力视角的博物馆展览空间设计优化研究[D].河北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6.
- [29]印妍.专题博物馆体验式展示空间设计研究[D].河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06.
- [30]王伟.建筑现象学视角下的地震纪念馆设计研究[D].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1.06.
- [31]范婷婷.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新媒体对外宣传思路分析[J].航海,2021(02).
- [32]李解.浅谈新媒体时代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J].长江丛刊,2021(08).
- [33]刘朋璋 黄薇.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博物馆导览系统设计与研究——以石家庄市博物馆为例[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21).

中国古代史研究

魏建震 冯金忠 陈瑞清

2021年,河北史学界中国古代史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综合研究、先秦秦汉史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和宋元明清史研究几个方面。现将各方面的成就予以综述。

一、综合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两部河北地方史研究著作,并对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地方历史资料整理方面,张志勇出版了《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该著作对民国之前京津冀地域旧方志中金石文献进行了辑录、考订和深入研究,分门别类挖掘阐发了方志金石文献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并提出了方志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该书综合考虑了京津冀金石文献存世数量和价值、特征等情况,划分为北京、津唐廊沧、石家庄、保定及雄安、邢台邯郸、衡水、张承秦等七大区域,对各个区域金石

文献展开了专题研究。^[1]

在保定地方史研究方面,张莉萍等学者编纂出版了《保定通史》古代卷,该著作将保定古代历史划分为原始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时期、元朝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等几个时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个方面,对保定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它的出版,对保定市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

在中国史学起源与发展方面,乔志忠先生发表了《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考析》一文。作者认为,中国历史学产生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际,与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起始时间同步。在中国上古历法缺乏准确纪年方法的状况下之所以会产生确切的连续纪年,就是得自官方连续性地记录史事。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促使官方编存一些文书、文献,但并

未直接促成史学的产生。史学产生之后，殷鉴意识下编存的文献如《尚书》，融入史学系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历史记录向下延续的同时，上古先人又从史学产生的原点向往古追溯，而对殷商之前的历史，只能通过修饰神话、传说的方式来构建，这自然形成如顾颉刚所云“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远古时期，中国只有“神话的历史化”，而不存在相反的现象。^[3]

在中华文化品格研究方面，魏建震发表《〈吕氏春秋〉的编纂对中国和谐文化品格形成的影响探论》一文，认为《吕氏春秋》的编纂融摄了先秦诸子学说，对“和而不同”的中国和谐文化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4]

在中国古代史综合研究方面，王茂华主编的《科学史研究论丛》，汇编了科学史研究方面的诸多论文，可以参阅。^[5]

二、先秦秦汉史研究

河北省史学界 2021 年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先秦秦汉历史史实与历史事件、历史文献以及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方面，现综述如下。

（一）先秦史专题研究

在先秦史专题研究方面，张翠莲教授出版了《中国环境史·先秦卷》。作者运用传世文献和出土考古资料，同时结合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先秦时期自然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人与自然之间纷繁复杂关系的流变历程和机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以期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所在。^[6]

在《尚书》研究方面，张怀通教授出版了其多年研究而形成的力作《〈尚书〉新研》。该著作采取了多学科互相交叉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并借鉴了口头诗学、文化人类学的新成果，将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进行参校对读，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结论。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康诰》诸篇体例研究，《洪范》诸篇文例研究，《洪范》史实与思想专题研究，《牧誓》诸篇史实与思想研究，《尧典》诸篇史实及礼乐研究等。^[7]

在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当下，中华文明起源

问题多年来持续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沈长云先生发表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考察》一文，从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角度，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强调以农为本。农业产生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才会有社会分工，由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和贫富分化，产生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最终发展为国家。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农业产生为上限，以国家的出现为下限。考古学成果表明，我国农业产生的时间大致在距今 1 万年前后，即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从此至夏王朝的建立这一段历史，正是我国文明起源与初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历史过程，正反映了当代人类学者所描述的人类由平等社会到不平等社会，再到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8]

在白洋淀地区史前村居生活研究方面，王菁发表了《南庄头遗址与白洋淀地区史前村居生活的萌芽》一文，认为南庄头先民生活内容迥异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与后世村居生活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展示出万年前白洋淀地区村落和定居史的萌芽状态，成为本地史前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开端。这一转变过程是人类发展和环境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9]

在中国传统市政研究方面，刘志琴发表《“立朝与立市”：从〈周礼〉看中国传统市政的职能与理念》一文。作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政是指对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而《周礼》中的市政概念除了“掌其卖儷之事”，即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管理之外，还有着“封邦建国立社稷”的深层政治意蕴。其“面朝后市”不仅是“市”与“城”关系的管理规则，且体现出封建社会“国王理朝政”“王后理市政”的家天下理念。^[10]

在先秦礼制研究方面，李申曦发表《庙见礼与〈周南·葛覃〉题旨的形成》一文。作者认为《葛覃》治葛、师氏、归宁等描写均透露出其与昏礼有关。葛之长成、女子受教于师氏，需历经三月，若以庙见礼释之，则能更好地解释这首诗的主旨。孔子熟悉这一礼制，故言此诗合乎人性、人情，意为嫁入夫家而不忘父母的人之

常情。诗篇原本描述的是初嫁女子行庙见之礼而成妇的过程，齐、鲁、毛对于诗旨的解说纠结于已嫁与未嫁，逐渐偏离原义。《齐诗》言其为已嫁，《鲁诗》以之为未嫁，两者差异甚明。《毛诗》试图调和两说，言为妇道，事夫念亲之思遂曲解为后妃勤俭的本性，从而使诗旨确立为“后妃之本”的解释。后世学者不断推衍诗义，使得其阐释愈行愈远。^[11]

在先秦货币研究方面，何艳杰发表了《东迁白狄货币——尖首刀币研究》一文。作者在分析梳理玉皇庙文化及周边发现的尖首刀币资料基础上，从尖首刀币的形制起源、出土环境、铸造条件、形成阶段、币文等方面，论证尖首刀币的首铸者应为东迁白狄。^[12]关于白狄族的研究，该作者发表的《多元交汇：先秦白狄文化变迁特征》也可参考。^[13]

在先秦考古学研究方面，张翠莲教授发表了《赵国考古学文化北进的轨迹》一文。该文通过对赵国北拓地区的相应考古遗存的综合分析，基本勾勒出赵文化北进的大致轨迹，并进一步尝试探索赵国北拓与赵文化北进之间的关系。^[14]在先秦考古学研究方面，该作者发表的《延怀盆地东周铜器群的播化与行唐铜器群的形成》^[15]《先秦中原与北方文化交流持久延绵》^[16]《行唐故郡遗址新出青铜器初识》^[17]等论文可以参看。

2021年，河北学者的先秦史专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思想史与先秦诸子研究方面。

在先秦燕赵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魏建震、温玉春合作出版了《燕赵学术思想史·先秦卷》。该著作在学术史研究中加强思想史的关照，以提高学术史的研究高度，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加强学术史的研究，以此为思想史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该著作对燕赵地域的学术思想的起源、燕赵地域的原始宗教、慎到、公孙龙、荀子、邹衍、苏秦与燕赵纵横家以及燕赵兵家的学术思想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勾画出先秦燕赵学术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18]

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许春华发表了《“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一文。作者认为：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

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句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19]

在孔子思想研究方面，李振纲先生发表《孔子仁学五题——儒家的人道价值关怀》一文，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仁”，其宗旨是教人懂得人道之爱和社会伦理责任，恪守礼仪，孝悌忠信，达到道德理性的自觉。“礼”是“仁”的仪范尺度，“孝”是“仁”的心理基础，仁、智、勇是人的三种重要品格，知行合一、实践考验是人格完成的必要条件。孔子仁学对于现代人的性格塑造、价值整合及社会关系的调整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细读和阐释《论语》中有关“仁”的论述，可以从思想源头上把握儒家人道思想之要义。^[20]张乃芳发表《〈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一文，认为《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

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21]

在老子研究方面，李振纲先生发表《哲学研究老学研究的回顾、反省与理论创新》一文，认为老子是中国也是世界影响最为久远的哲学家。老子首创的道家哲学及其所崇尚的道生德畜、自然无为、谦退慈柔、利物不争、敬畏生命、道宁天下的价值理想，源远流长，惠及古今。要弘扬这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离不开当代学人的自觉反省、理论创新与躬行实践。老子哲学的传承与创新，要充分了解老子哲学、老学史及道家文化的研究状况，对老学史源流演变及民国以来以至改革开放新时期老学研究的突出成绩、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及其理论得失，作出总结、分析和澄清。这样才能在扬弃前人的基础上，聚焦时代精神，追踪学术前沿，转换问题意识，创新理论范式、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把老子哲学及道家文化研究推向新的境界。^[22]

在孟子研究方面，王开元先生发表《面向善的存在：孟子哲学中的“思”》一文。作者认为，“思”在孟子建构其人性论体系中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在认识论层面，“思”是一种对自身道德意识的回忆性反思，这种反思以当下情境为前提；在工夫论层面，“思”是自身善端得以呈现过程中的推想与想象，并为推恩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道德动机；而在建构道德主体上，“思”则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维度：实践意义上的道德主体与本体层面的道德主体。上述三重含义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即个体获得内在的善是何以可能的。因此，“思”依靠其自身的作用与价值成为人禽之别的关键点，也有力彰显了人的内在价值。^[23]

在荀子研究方面，胥仕元出版专著《荀子治国思想探微》。该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荀子的治国思想，认为荀子的治国思想以人性恶为前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措施，阐释了君臣在治国中的地位 and 关系，分析了治国者重民之要旨。荀子希望通过节省用度、重农轻赋税、适度发展商业和强化行政管理等措施，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此外，本书还提出，荀子期盼统一，结束战国纷争的局面。他的治国思想中“外儒内法”的治理手段和“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

对古代治国理政者产生了重要影响。^[24]吕庙军发表《先秦诸子视域下荀子治理思想学说新探》一文。作者认为，战国末年，诸子务治，荀子不但继承了孔孟的治道思想，还对其他诸子的思想进行批判汲取、融会贯通，从而在先秦历史上建构了独具特色、综合创新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治理”概念的思想家，在世界上也属于首次。荀子在稷下学宫受到管仲学派思想影响，荀子治理思想中的“治”与“理”多具有相近或相同的含义。荀子治理思想的提出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25]在荀子富国思想研究方面，刘振英发表《〈荀子〉“富国”范畴探讨》一文。作者认为，先秦诸子的“富国”思想，以荀子思想最成体系。在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富国范畴是其政治逻辑的基石，围绕这个核心，荀子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荀子深刻、全面、细致地阐述了富国的政治布局，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26]

在韩非子研究方面，戴木茅发表《论〈韩非子〉中“悚惧”的逻辑展开与异化——以君主对臣属的心理震慑为核心》一文。作者指出，韩非的神明观以老子道论为哲学基础，“惟恍惟惚”的道经过“莫知其极”的过渡，在政治治理层面转化为“神隐不测”。秦汉皇权建立后，思想与现实产生共振，本欲震慑重臣使其不敢为非的“悚惧”显露两种异化危险；其一为增强君主独断性；其二为悚惧泛化，最终可能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悚惧。^[27]刘振英发表《从礼学到法术——论韩非子法术范畴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一文。作者指出，荀子、韩非子都存身于中国文化学术史的轴心时代，礼学与法术皆是历经百代淘洗的思想范畴之经典。二者虽具有各自独特的学术品格，但又互生互融。韩非子与李斯俱事荀卿的历史事实，使得韩非子的法术范畴与荀子的礼学思想存在天然的通变关系。韩非子对荀子礼学的“通”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得君行道”，学术成为公器与国君的结合；礼学与法术之学都以政治为中心；学术品格独特而鲜明。其“变”体现在三个转向上，即从王与礼的统一转向人主与法的统一；从纷繁复杂的礼学体系转向简明扼要的法术之学；学术品格从自由、独立转向功利化、依附性。^[28]

（二）秦汉史研究

在秦史研究方面，王红超、闫哲二位先生联合发表《〈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研究》一文。该文对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木牍内容进行全面释读，特别是识明其中的“史[记]”和“箸(著)[令]”两字(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诏书的主题，以及通过比对，印证《赵正书》的部分内容，同时还结合诏书、《赵正书》《史记》编制《秦二世继位大事年表》，最后根据《赵正书》中记载的内容，探讨“始皇帝遗诏”与“沙丘之谋”的关系。^[29]

在秦汉之际历史研究方面，王文涛先生发表《关于钜鹿之战的几个问题》一文。作者认为，巨鹿之战是推翻秦王朝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但迄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厘清。例如，赵将陈馥是否入巨鹿城而复出北收常山兵？章邯是否有权令王离围巨鹿？巨鹿之战中双方的兵力有多少？项羽救赵是先击退章邯而后虏王离，还是渡河后即击破王离而虏之？以上这些问题关系到对钜鹿之战的认识以及对项羽、陈馥、章邯、王离等人的评价，作者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细致地辨析考证，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30]

在东汉史研究方面，秦进才先生发表《〈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一文。作者指出：《后汉纪》记载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此事年代令人怀疑，需要校勘证实。通过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比较《后汉书》纪传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对应，考察崔寔与征辟、推荐者交集的任职时间，探究崔寔元嘉年间著作东观的情形，辨析崔寔官职的升迁，多角度辩证分析，认为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的年代当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的建和元年四月庚寅，崔寔诣公车当在其后，而非《后汉纪》记载的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31]

在秦汉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武占江、衣抚生出版《燕赵学术思想史·秦汉卷》。该著作对“子学时代”燕赵地域儒学的传播、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从王莽到刘秀：两汉之际学术思想的演变、“经学时代”的燕赵家学和秦汉时期燕赵方术思想与道

教、佛教的兴起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32]

在董仲舒研究方面，吕变庭发表《数量词与〈春秋繁露〉中的几个儒学思想范畴》一文。作者指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不仅创造了大量数量词，而且还使之规模化和系统化。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这些数量词本身特有的审美的蕴意来构造他的儒学思想体系，从而形成了董仲舒极其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思想特色。在董仲舒那里，一个数量词往往既是他的政治纲领，同时又是他整个思想学说的立论重心。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入考察出现在《春秋繁露》一书里面的那些数量词，或许会成为我们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33]王文涛发表《〈春秋繁露〉五行说对〈管子〉四时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作者认为，《管子》最早用五行理解人类活动的四时宜忌，采用了两种方法使四时与五行相配：一是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在夏秋之间加上中央土；二是把一年分成5个72日，以五季与五行方位相配。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这两种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法，将其纳入自己的五行之说，进而以其与人事相配合，创立了自己的天人学说。《管子》要求天子施政必须与五行的属性相配合，不能违背四时行政，否则，就会祸患横生。解救四时逆行的对策是“务时而寄政”“刑德不失”。董仲舒详细论述了人君顺，逆五行为治、为乱的种种情况，将解救四时逆行发展为“五行变救”，认为五行生变是因为人君施政未能顺应五行相生之理而招致祸乱，亟须以德救之。二人均将君王的刑、德与四时行政相联系，所不同者，董氏主张以德治为主，刑治为辅。他的阴阳五行说，是对先秦以来由《管子》创始的五行说、四时教令的吸收和发展，以五行为框架，设计了一套实际政治与时令相配合的政治措施，构建起服务于汉朝大一统的阴阳五行政治哲学。^[34]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

2021年，河北省史学界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出版专著9部，专著数量有较大增长，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涉及社会史、制度史、经济史、历史地理、教育史、金石研究、佛教史等领域。

（一）社会史研究

我国古代的家学形成于东汉，至唐宋时期，家学传承方式已比较成熟。在南北文化整合和科举制度兴起的背景之下，此时期家学的特点和作用进一步凸显。邢铁《唐宋时期家学传承研究》一书借助社会学的社会分层和流动理论，把“家学—科举—士族”视为一个互动的运行体系，以家学的传承为核心揭示三者的关系；把“世族→士族→士大夫”视为一个完整的演变过程，从士族的本质特征入手，重新审视士庶更替的真相和演变轨迹，探讨学问家族兴衰过程中所显示的规律。指出，此时期的家学传承具有地域特征，北方的“学术家族”或“学问家族”数量少、规模大，即使在隋朝到唐前期进士文学走红的时候也一直以治经学为主；而南方的“文化家族”或“文化世家”数量多、规模小，经学文学史学兼之，文学家族最多。科举制度给各个阶层都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对原有的精英阶层进行吐故纳新式的筛选，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不论出身士族或庶族，其子弟随时都有可能因“不第”而被淘汰。所以，培养更多的子弟科考成功，成为保持门第不坠的唯一途径，他们也因此更加重视家学的传承。特别强调了家学传承在士庶融合中的作用。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家学的崇尚和传承方式；第二章，南北文化格局下的家学传承（上）；第三章，南北文化格局下的家学传承（下）；第四章，科举制度制约下的家学传承；第五章，家学传承与学问家族的命运。^[35]《中国古代家庭经济研究：户等制度·家产继承》一书实则是之前该作者所著《户等制度史纲》和《家产继承史论》两本书的汇编本。该书分为两个专题：《户等制度史纲》和《家产继承史论》。这两个专题均属于家庭经济的范畴，其考察路径亦相同，都是以唐宋为中心前伸后延通下来的。其中，专题一按照时间线索分为户等制度的产生和确立、户等制度的发展时期、户等制度的高潮时期、户等制度的混乱阶段、户等制度的持续和衰落等五章；专题二则以问题为纲，分为家产继承方式的形成和维系、诸子平均析产、妇女的家产继承权、立嗣继承、遗嘱继承等五章。^[36]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许秀文指出，在此特殊的社

会历史条件下，仅仅依靠政府保障难免力有不逮，宗教、宗族等民间团体慈善救助活动应运而生，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由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具特色的多元供给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政府主体的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主体的民间救助实践等，反映了此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构成了社会保障的体系架构，并取得了保障百姓基本生存条件、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历史的进步性。^[37]她还以东晋为例，对此时期的疫病与民间救助进行了探讨。指出，东晋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灾害高发期，疫病具有与其他灾害相伴发生的特点，因而同样高发。东晋104年间见于记载的疫灾共25次，平均每4.12年一次，与水旱等自然灾害和战乱等恶劣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东晋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救助措施，但相比其他朝代已明显弱化。此时的民间救助则发展起来，作用凸显，世俗力量的宗族互助、民间医疗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僧医、道医为首的宗教组织救助成为这一时期疫病救助的特色，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38]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之前，学界多关注佛教对武则天的影响，顾乃武则探讨了武则天改名为“曩”及其称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指出，儒家经典《周易》的离卦，具有“中女”为“主”、治“如日月之明”意蕴的符命。武则天拥有“中女”身份及诸多女主符命，并根据《周易》离卦改名为“曩”。这是武则天对儒家正名文化的实践及离卦符命的政治宣传，更是对武则天正统地位具有天命合法性的理论论证。道家文化、女娲崇拜也是影响武则天改名称帝的重要因素，武则天称帝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开基立国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武周政权得以建立的文化特点。^[39]

国忌是封建王朝特定的本朝先帝、先后的逝世纪念日。张重艳指出，唐代的国忌日数在坚持以太庙正室神主数目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追谥太子和追谥皇帝的忌日、皇后的忌日、皇帝的个人意志，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忌日的废立。人情与礼制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因礼制宜逐渐向因情制礼靠拢。^[40]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无论是王朝初建还是遭遇危机之时,选贤任能往往总是最先被提及的主题。李华,被陈寅恪誉为古文运动的先驱。倪彬指出,李华察贤思想要点有三:崇儒尊经,为古文运动之滥觞;将察贤责任寄望于君主,其背景为士族到科举士大夫的政治主体转换;具体方式上依赖君主创造的政治环境,即“迁政化,端风俗”。并由此认为,李华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正俗察贤思想背后是李华对时弊之考量,日后古文运动之精神,李华已隐约兼具。^[41]

(二) 制度史研究

国内学界在研究唐代军事制度的成果中,有关府兵制的论著占了其中的大部分,这种状况固然揭示了府兵制对唐王朝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及学者对它的重视,同时却也反映了唐代军事制度研究领域中的畸轻畸重的客观现实。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一书即是针对唐代行军制度研究薄弱的现状而进行的深入系统研究之作。该书曾于1996年于台湾出版繁体字版,而今所出为简体字增订本。全书共十二章,从行军在唐代武装力量体制中的地位、行军制度之前的出征制度、唐代以前的行军制度、唐代行军制度的兵员构成、唐代的行军统帅和军将、唐代行军统兵机构的僚佐、唐代行军的编成及编制、唐代行军的兵种及其构成、唐代行军的侦查预警警戒、唐代行军的一些战术规定、唐代行军的后勤保障、唐代行军制度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42]

(三) 经济史方面

货币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重要研究领域。相比其他统一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和战乱,学术界对其货币制度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朱安祥《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选取货币铸造与发行、货币政策、货币流通与货币思想等四个中观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问题展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在深剖析某一时期,甚至某一种货币的历史渊源、形态特征、流通规律等具体问题的同时,又尝试将其与背后的历史环境相结合,进而揭示魏晋南北朝长达近四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全书按照时间线索,分为三国货币研究、两晋十六国货币研究、北朝货币研究、南朝货币研究等四章。^[43]

唐前期,华北平原是全国蚕桑丝织业中心。王昊对唐前期华北平原蚕桑丝织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及其所产生的生态效应进行探讨,以期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唐前期华北平原的经济状况。他指出,唐前期华北平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较丰富的植被与水资源,一方面为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然基础,使之成为蚕桑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种桑养蚕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以及改良土壤等方面也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应。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与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之间是相辅相成的。^[44]

(四) 历史地理研究

唐王朝定都长安,关中为其根本之地。顾乃武《唐代关中畿甸政区地缘建构研究》一书以唐代辅州制度的相关研究为中心,探讨了唐代关中经济、军事地位演变、政治地位变化及历史传统制约等京畿制度转型的因素,深入剖析了辅州制发展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及定型阶段的制度特点,兼顾辅州制对辅州社会发展的协调机能,并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京畿政区模式与近京社会发展融会贯通,具体而全面地梳理了古代畿辅资源分配的特点与京畿社会发展形势的变迁。认为,古代畿辅资源分配存在轻重有别的现象,这种现象是造成京畿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唐代辅州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克服了这种资源分配形势,使京畿社会大体保持了整体化的发展特点。全书以时间为序,分为五章:第一章,先秦至隋代关中畿甸管理体制概述;第二章,唐高祖至睿宗时期关中的畿甸政区群;第三章,唐玄宗时期关中畿甸政区群的发展;第四章,唐肃代德时期关中畿甸政区群的重构;第五章,唐顺宗至懿宗朝关中畿甸建构的发展。^[45]其他对于特定区域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有崔玉谦《督亢史探》等。^[46]

(五) 教育史方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教育获得极大发展,官学、私学中广泛设置数学、医学、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吴洪成等指出,为了保障教育目标的实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重视编写、选用科技教材的风潮,从而使这一时期学校科技教材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开创新局面,呈现出许多新的特色与成就。魏晋南北朝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科

技教材不仅对当时学校科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当今科技教材的编写和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及历史经验的借鉴。^[47]

唐代教育发达,官学制度日臻成熟,官学的类型、层次及组织管理较为完备。吴洪成、贾璐指出,唐代官学教材与官学教育体制相适应,并保障官学教育活动的有效进行。两者共同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教育特点:由政治集权而带来官学教材的一统,尤其在儒学经学教材方面更为显著;课程设计的共同必修与专业分科选修促使教材的选用更具教育意义;各专科性质官学确定相关专门技术知识的教学内容,导致专业教材地位上升;伴随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官学教材传播海外,影响世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唐代官学教材典籍文化、培养人才及思想传承的历史贡献基调。^[48]

在蒙学教育方面,吴洪成等指出,唐代蒙学教材运用于家塾、私塾、乡学、寺学等不同类型的私学中,以儿童启蒙类为主,兼及儒家经典、文学诗赋及经史文辞等诸多领域,突破了固有模式的藩篱,常用教材包括继承前代的《急就篇》《千字文》等,相传相袭,但又有所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开始向多学科方向发展。唐代编写的蒙学教材《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对后世有极大影响,对当今编写中小学教材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49]

(六) 金石研究

六朝石刻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目前,其史学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而语言文字和文献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梁春胜《六朝石刻丛考》一书,主要从释录校正、字词考释、石刻辨伪等方面展开,纠正前人释录方面的错误,考释疑难字词,鉴别伪刻和疑伪刻,从而为学界研究这一时期的石刻提供参考。全书共考释疑难字700余个,疑难词语和典故词语100余条,校正释录方面问题2000余条,鉴别伪刻70余方。尤其在疑难字考释方面,运用科学的文字考释方法,考释出一批前人不识或误释的字,是该书一大特色。该书分为相关研究的回顾、六朝石刻的研究价值、六朝石刻整理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六朝石刻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六朝石刻校读举正、六朝石刻字词考释、六朝石刻辑补与辨伪等七章。^[50]

(七) 佛教史研究

《金刚经》由鸠摩罗什首次译出汉文本。张开媛《〈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一书,对《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进行全方位、深入的分析。认为唐代世俗社会出现了《金刚经》信仰,对经本的使用倾向,是有宗化义学导向下的世俗化。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鸠摩罗什译佛经的流传情况;第二章,《金刚经》译作的主体选择性;第三章,唐人注疏对《金刚经》经义的阐释;第四章,《金刚经》对六祖慧能思想的影响;第五章,唐代《金刚经》灵验记、讲经文与变相。^[51]

南北朝后期,菩提达摩泛海东来,传授禅法,自此中国汉地佛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派——禅宗。按照中国禅宗的传承法脉,中土六祖中,三祖为僧璨。文志勇认为,僧璨禅师确有其人,绝非虚构,但在同一时期,至少有两位僧人名叫僧璨,应注意区分,避免混淆。并从三祖僧璨的法脉传承、得法经历与弘法行迹、《信心铭》中的禅法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52]他还认为,禅宗起源于嵩山少林寺,早期禅宗有四位祖师即初祖菩提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五祖弘忍等均与少林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初祖达摩以四卷《楞伽》印心,藉教悟宗,五祖弘忍劝人读《金刚经》,这种转变值得学界和教界关注并予以解读。^[53]

僧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唐义净法师的著作之一,完成于武后天授二年(691)。崔红芬统计,该书记载了61位(包括重归南海所记4位僧人)经不同线路去南海诸国、师子国、天竺等地求法学习的高僧,其中有38位僧侣分别从广州、合浦、乌雷、交阯、爱州、乜景、占波等地乘船出发。她根据该书的记载,梳理了海路求法僧人及其不同线路,并考证了唐初对外文化交往线路变化的影响因素,指出这些搭乘商船到南海诸国或天竺游历学习的僧侣极大地促进了唐与外界的文化交流。^[54]

响堂山石窟是东魏北齐时期开凿的我国著名石窟,学术界对响堂山的研究多侧重于造像和石窟本身,而对北朝之后数量众多的碑刻题记关注不多。朱建路以现存碑刻题记为中心,将响堂山佛教一千多年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指出每个时

期具有不同特征：北朝时期响堂山石窟为皇家石窟；隋及唐早中期失去皇家地位的响堂山，民众造像增多；晚唐五代宋金元时期响堂山被边缘化；明清民国时期响堂山作为地域信仰中心经历一个小的繁荣期。^[55]

现存于河北省平山县博物馆的《大唐西临山石龕像记》，刻立时间为唐大历四年（769），原位于平山县三汲乡西林山的山头寺。不仅历代金石著作、方志等未著录，就是当代考古和历史学界对其内容也鲜有涉及。冯金忠指出，它是继李宝臣纪功碑、神道碑之后，关于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的又一重要文物发现，一些记载可纠正、补充传世文献之缺失。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唐后期西林山石窟在李宝臣主持下大规模开凿的史实，反映出当时此地区佛、道并行的社会实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尽管西林山石窟始凿于安史之乱期间，但大规模开凿应始于李宝臣。从历史背景上看，应发生在大历三年（768）唐廷对幽州用兵之后。王缙以宰相身份出任幽州节度使，他在赴任幽州时，曾途经恒州（治今河北正定）。从种种迹象推测，李宝臣在西林山开窟造像，不排除源于王缙之建言。^[56]

四、宋元明清史研究

2021年，河北省史学界在宋元明清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专著4部、译著1部、古籍整理1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宗教史、民族史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一）政治史与军事史

贾文龙《宋代地方法治问题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全书分为七章，探讨了“唐宋变革”中地方法律与社会问题。作者以“司法结构”概念为研究思路，通过对宋代地方“司法结构”的构建与解析，多角度展示了宋朝地方法律的运行全景。作者认为，宋代地方行政与司法中“非完整的统治单元与完整的治理单元”并存矛盾，使宋代出现了“短安与长治”并存的社会治理局面，对中国传统政法体制作出了新的阐述。^[57]

关于两宋之际政治问题，姜锡东对南宋“八字军”领导人王彦的高级幕僚续霁的生平履历和仕宦特点进行了全面探讨，将续霁撰写的

《王彦四厢行状》与其他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行状》是研究王彦和“八字军”最原始、最系统的史料，但有遗漏和曲笔。^[58]姜先生还对宋金“海上之盟”进行了研究，认为宋金双方虽然多次谈判，但并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和盟约，对辽作战是各自行动；金军攻占燕京等地后双方最终达成，辽占汉地的疆域买卖盟约。盟约破坏，金军南下攻宋，直接责任在宋方。从长远的角度看，宋辽金政权在内部治理和外交决策上都有短板与失误，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表现得更为充分。^[59]丁建军、秦思源对宋徽宗东巡镇江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靖康元年，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往镇江避难。元人编纂的《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这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60]

关于宋、金官员问题，姜锡东、贺学娇对宋代官员公务迎书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官员公务迎书从通书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信文体，具备独立完成信息沟通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究其原因，宋代荐举制度推动了官员公务迎书的发展，使其脱离格式化的模式，彰显出写作者个人的特性。^[61]郭应彪对宋代天文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文官一般以选用畴人子弟为主、也会招募民间草泽予以补充，其选拔方式以试补为主，荫补和荐补为辅。随着科举的兴盛，儒官逐渐成为天文机构的主要管理者，使天文官的日常选用考核及业务管理等方面更为规范。^[62]殷荣辉、张倩对宋代镇官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镇市经济不断发展，镇的地位持续提升，国家逐渐重视镇市的管理，在镇市之中设官分职。监镇则由北宋到南宋经历了职权不断扩展、地位不断提高的变化。镇级官员的设置，带有明显的兼职和灵活弹性的特点，保持了基层在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之间的平衡。^[63]张又天对金朝宰执官员兼官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金朝宰执官员的兼官类型可具体分为常规兼官和特殊兼官两种。金代宰执官员兼官对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64]

关于吏员和僚从问题，廖寅认为“公吏”是宋代非常独特的称呼，在宋人语境中，多指

“公家之吏”。除国初外，宋代公吏主要契合社会中层期望值，是社会中层的最佳出路。随着公吏群体的污名化、毒瘤化和士人群体分享顾问权、治民权，州县社会形成了近似于两个等边三角形的超稳定权力结构。^[65]侯天霖对宋代文武官员的廉从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的廉从主要来自长官雇募，政府发放“廉人衣粮”和“廉人餐钱”等作为补贴。宋朝对外交十分重视，且出使有一定的危险性，故而使团中的廉从拥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白丁为廉从可以补官，有官身者可以减少磨勘，加快晋升速度。^[66]

关于基层政权问题，廖寅、杜洋洋对宋代乡里组织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宋代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保甲、经界、地图“三合一”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在收乡权于政府的同时，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权威体制。宋代乡村社会缺乏门阀、乡绅一类明显的支配阶层，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改变乡村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67]衣长春对清代直隶总督的职能进行了研究，认为清代直隶总督的职能经历了复杂的调整，从顺治时期中央在直隶省设多位行政长官到晚清时期直隶总督成为权势显赫的封疆重臣，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涵，体现了中央治理地方能力的变化。^[68]

在法制史研究方面，郭志安对宋代的保密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为了防范泄密，宋廷采取多种举措以加强保密制度建设，并建立了相应的奖惩制度。宋廷的保密制度和举措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对维系政权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69]高云霄对辽朝除名法进行了研究，认为辽朝除名法是吸收和借鉴唐律的一种惩罚犯重罪官员的附加刑。除名法适用范围广泛，主要针对威胁皇权、破坏政权、连坐得罪、职务犯罪、军事获罪的高级官员，客观上起到了强化皇权、整肃官风、维护礼法等积极作用。^[70]程麒对辽金时期“连坐”与“缘坐”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辽金时期学习中原法律体系，引入了中原汉制中的“连坐”与“缘坐”，但辽金两代均出现了将“连坐”与“缘坐”混淆的现象。^[71]他还对金代籍没法进行研究，认为金朝籍没法不断完善发展，成为制度化的法律，此法实

行的根本原因是维护金的统治。^[72]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郭志伟对北宋河北地区军事防御体系进行了探讨，指出河北作为宋辽之间重要的军事屏障区，宋政府对此十分重视，通过营建北京、划定防御圈层、扩充军兵、调遣将领等措施，最终形成三横两纵“网状”的防御体系，从而为和平化解宋辽危机、维持北宋中后期稳定的发展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73]侯天霖则从经济与军事联动的角度对北宋晚期河北军事防御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大量驻军增加了河北路的经济负担，黄河的泛滥降低了运输能力，以致影响了北宋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引起驻军规模持续萎缩、边防工事年久失修，防御能力大幅下降。^[74]李桥对黑水城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进行了重新考证，认为这件文书是西夏“千户刘寨”向上级汇报与蒙古战斗中阵亡、驱虏人口事宜的申状，这件文书对于研究西夏千户制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75]孙继民、宋坤、郭兴申利用上海图书馆藏《酉阳杂俎》纸背文书对明代巡检司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发现的明代巡检司文书，不仅印证了明代巡检司统领武力为弓兵的记载，而且提供了明代巡检司存在“代办农民”和“代办吏”参与文书运作、不同巡检司之间官员相互兼职、巡检司具有巡逻会哨和传递巡牌的职责，以及跨区调动执行军事任务等具体实例和确证。^[76]王宏斌对清代水师职能进行了研究，认为清代水师主要职能有：维护国家水域主权，维持江河湖海治安；管控偷渡和进出口走私，保护商业和运输业；管理检查商渔船只建造规模、技术和装备；搜救海难事故船只和难民；定期巡逻，保护渔业生产。清代水师尽管不是远洋海军，但基本发挥了滨海国家近海武装力量应有的职能。^[77]

（二）经济史与社会史

郭志安《北宋黄河水灾防治与水利资源开发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该书从北宋黄河水灾概况与时空特征、黄河水灾的社会危害、黄河水灾的救济、黄河水灾的防治机制、黄河水灾防治技术与经验的继承创新、黄河防治与北宋政治和军事、黄河农田水利资源的开发、黄河的漕运运营与桥梁建设、黄河水灾防治与水利资源开发中的奖惩机制及利弊分析等诸多方面，对北宋时期的黄河水灾防治和水利资源

开发给予更为全面、系统的探讨。^[78]

孙继民等著《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全书共四章,对目前新发现的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概述介绍,并对明代洪武三年小黄册和后湖黄册库藏黄册进行复原与研究,为研究明代黄册的发展演变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批珍贵新资料。^[79]

关于财政、赋税问题,姜锡东对宋代生产力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宋朝生产力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无与伦比。唐宋时期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推动欧洲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和近代化。^[80]姜锡东、李金闯对四川交子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北宋初期从四川运走白银和铜钱,同时禁止民间的绢帛交易,造成高值币缺位。之后,北宋尝试在川蜀恢复铜钱流通,但没有成功,民间大商人只好联合起来另谋出路,促成了私营交子的诞生。^[81]廖寅对宋代的形势户进行了溯源,认为形势户之“形势”主要是指主客对立两极之间的对比态势,即“主客之形,强弱之势”。形势户的形成与唐末五代主、客户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关联。与形势户对称的“平户”并非指上户中不服差役的民户,而是指名下没有客户的平常主户。形势户、平户主要为政治、法律术语,对应的大户、小户才是日常用语。^[82]刘施伟对金代军需钱进行了研究,认为金朝的军需钱由临时加派演变为岁课,征收的标准始终为物力,但征收物前后发生了变化。作为金朝特有的杂税之一,军需钱的实质在于维护金朝统治,体现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但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83]

关于区域经济史,陈丽认为北宋初统治者通过调整其经济政策,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给华北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定活力;另一方面,国防型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对华北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84]殷荣辉对宋代河北路市镇进行了研究,指出河北路市镇呈现出环大城市、沿河津渡口和农村中间地分布的特点。同时,因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原因,一些镇被迫迁移,导致镇的空间分布发生了变化。^[85]张勇对宋代东南地区的物资转运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北宋在淮南运河沿岸州军设置转般仓,又先后置发运司于真州和泗州,使其开始具有总管东南漕运事务的职

能。其他物资转输区域则经常出现改变转运方式的情形,中转区域改变了起始区域输出物资的运输方式,减轻了部分运输成本。^[86]陈丽、贺军妙对明代中后期华北府县财政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明代财政体制从设计之初就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华北府县官员通过灵活处理彼此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尽管其所用应对举措是限于一县一地的个案,但与明代财政体制的整体变化相关联。^[87]

关于香料问题,陈希对西夏香料进行了研究,认为西夏本土自产香料极少,但香料来源多样,宋夏贸易为其主要来源,丝路贸易次之。西夏境内香料种类丰富,见于文献记录的就有40多种,这些香料主要用于烹饪调味、医疗养生防疫、佛教仪轨、日常家用。香料的使用反映出西夏的生活、医疗水平和社会生活图景,从侧面说明了西夏与宋以及丝绸之路间密不可分的关系。^[88]马晴晴、吕变庭对《算学启蒙》涉及的元代香料进行了研究,认为《算学启蒙》中有关香料方面的算题,涉及元代市舶司的“双抽”和“单抽”、纸钞与铜银钱并用以及各种香料的价格等问题,具有独特史料价值。^[89]

关于明代公文纸背经济文献研究,孙继民、孟月对《艺文类聚》纸背的明代山西宗禄文书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这批宗禄文书提供了新见类型册籍的实物样本,为研究明代藩王宗禄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细节资料,同时也可以为研究明代赋役史、财政史和经济史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参考资料。^[90]孙继民、耿洪利对《文苑英华》裱纸所见的万历年间福建官府公文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批公文详细记载了入帘宴、鹿鸣宴、鹰扬宴等科举宴席的举办缘由及席面物品,为研究明代科举宴席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由公文内容可知,县衙、铺行及巡按御史在科举宴席中扮演着不同角色。^[91]张春兰对《乐府诗集》纸背的两件明代扬州府泰州宁海乡赋役黄册进行了缀合、复原,认为该黄册为研究明代赋役黄册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提供新的佐证。^[92]

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陈新海认为明清时期张家口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居于张库商道、草原丝路的交汇点。中俄和汉蒙间的贸易以及张家口厅等行政职能的设置,促进了张家口城市地域扩张和城市职能的演变。张家口城市职能的演

变, 历经张家口堡、张家口上下堡和张家口城市三个阶段的不同发展, 随着张家口城市职能的增加与主要职能的转化, 张家口由堡子发展为张家口城市, 是中外交流对交流沿线城市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充分展示。^[93]肖红松、刘建哲从陆路“港口”形成的区位条件、城市的港口功能和草原腹地市场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认为清代张家口居于内地与草原市场的转口贸易中心地位, 并与蒙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草原腹地市场, 是具有“港口—腹地”模式特征的陆路港口型城市, 切实凸显了清代华北地区陆路型港口城市的主要特点。^[94]

关于灾荒史研究, 杨双利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精准、长效的救荒口粮标准, 饥荒应对的过程中关于救荒物资的估算、调拨和发放都处于粗放模式。雍正、乾隆之际确立了“大口日给米5合、小口减半”的救荒口粮标准, 为清王朝准确评估不同灾区的救荒规模和制定钱粮调拨计划创造了条件, 也为救荒物资的散放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和操作规程。^[95]他还对清代的灾民群体与救灾策略进行了研究, 认为清廷继承前代政治传统, 结合本朝政权特点, 在优先旗人的前提下, 对农户、士人、军户等社会主流阶层给予了充分救济, 同时也对边疆民族地区及其他不同身份的灾民群体、不同境况的灾荒地亩进行了特别处理。在救荒实践中, 清廷灵活调整救济策略, 使身份各异、境遇不同的各类灾民都有了规则明确而形式多元的获救路径。^[96]

(三) 宗教史与文化史

王晓龙《宋代理学传播与地方治理散论》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该书采用专题探讨的方式, 对两宋时期理学作为一个思想学派的教育和学术传播活动, 从整体学术传播的历程、传播的主导者、受众、传播的途径、传播的主要信息、传播的特点和作用进行分析, 同时为弥补整体研究无法凸显个人作用的问题, 结合个案研究, 对两宋理学大儒如二程、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的教育和学术传播活动进行研究。^[97]

刘云军点校整理的《韩泐集》由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韩泐集》包含《涧泉集》和《涧泉日记》两部著作, 其中《涧泉集》20卷主要是韩泐的诗集, 题材较为广泛, 主要涉及

宦游行旅、山水田园、咏物言志、酬唱交游等内容。《涧泉日记》3卷主要是韩泐对宋朝历史、文学的片段记录和经史考证的学术笔记以及他对一些人物的品评, 可补史传之缺。^[98]

崔红芬、文志勇翻译的俄罗斯学者克恰诺夫的著作《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叙录》, 由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该书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地整理汇编的俄藏黑水城西夏佛经综合性目录, 对于学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俄藏西夏佛经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99]

关于宗教研究, 鞠贺、杨军以出土石刻为中心对辽代佛教的地域分布进行了探讨, 认为唯识宗主要集中在南京道、中京道、上京道和西京道, 净土宗分布也较为广泛, 以南京道最为繁荣。天台宗、密宗、华严宗和律宗在辽后期开始崛起, 在辽五京道内均可见其迹象。禅宗和三论宗分布地域有限, 在辽朝的影响力始终微弱。^[100]张重艳对黑水城文献中的Φ181号文书进行了研究, 认为这件文书是宋初真定府大悲寺比丘澄净同修行愿文的功德抄本和附抄文献, 说明宋代河北地区存在唯识学和弥勒净土信仰, 从中可以看出宋初真定的菩萨戒杂糅了梵网系菩萨戒、瑜伽系菩萨戒、密教菩萨戒的内容。^[101]唐晔、杨波对宋金元时期山西三教信仰进行了研究, 认为三教信仰是将儒释道三教祖师合祀一处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信仰形式, 宋金元时期山西三教信仰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依附于佛教, 到改造佛教, 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过程。民间的三教信仰思想既有与宗教精英“三教合一”思想相通之处, 又体现出重视功能方面融合的特点。^[102]崔红芬对英藏黑水城《佛顶心观音经》某些残叶进行了定名补正和缀合, 认为《佛顶心观音经》的内容模式主要借鉴了唐智通、伽梵达摩、菩提流志等译观音经典, 晚唐、五代以后此经广泛流行于北方地区。传入西夏后, 在仁孝天盛十七年(1165)之前被僧人法律翻译成西夏文, 汉、夏文本在境内都有传播。^[103]崔红芬、文志勇对西夏文残经《圆觉经》进行了译释考证, 并与拜寺沟方塔出土汉文本相结合, 对西夏文《圆觉经》略疏和科判的翻译年代和流行进行初步考证。^[104]文志勇对英藏西夏文《坛经》进行了考释, 确定它是依据最早的法海本《坛经》简写而成。在禅法思想上, 完全忠实于惠能本人

的原意,充分证明了译写经文者对于禅宗义理的解悟能力。^[105]柴冰对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六寺获颁《楞严经》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楞严经》是一部影响较大、流布较广、具显密圆融特色且版本众多的佛经。乾隆三十六年颁给热河等处寺庙藏文、蒙古文《楞严经》,意味着乾隆朝将《楞严经》译制成藏、满、蒙文后,还有向全国各主要寺庙颁发少数民族语文《楞严经》的举措。^[106]

关于民族史研究,陈瑞青、吴玉梅认为辽朝采取建立投下军州、整建制迁徙部落等方式,加强对河北地区的控制。金元时期,契丹族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河北地区的契丹族逐渐与当地汉族融合。^[107]何晓芳对满族民间家谱进行了研究,认为满族入关前创制的满文,清王朝建立后,满文应用逐渐衰落。满族家谱书写经历了从满文到汉文的嬗变,满族效仿汉族家谱形制,借用汉文完善家谱书写,直到完全融入汉文家谱文化。^[108]

关于文化史研究,申慧青通过定州文庙探讨了北宋定州文教,认为北宋时期定州作为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南北交通的要地,在大力发展武备之外,其文教事业也不断进步,文庙与州学的设立与发展即是最显著的体现。定州文庙作为河北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祀孔建筑,对研究文庙建筑的布局、古代尊孔祭孔活动的开展以及华北地区儒学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09]张浩然、艾丽君从天圣二年进士群体的交游情况入手,探讨他们与同榜以及其他榜进士的交游情况和人际网络的构建,并从中窥探北宋进士交游人际关系中的相关问题。^[110]张洁琨对宋代士人食素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宋代士人将素食作为追求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认为素食可以养生。同时,素食在宋代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追求素食就是追求清高淡泊的品行,对于生命品质的渴望已经超越了生活品质的低级需求。^[111]

关于古籍研究,时培磊认为《元典章》是由元代法律文书汇编而成的一部典籍,对于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近百年来《元典章》的整理与研究过程是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外史学在互动交流中的传承与创新。与此同时,《元典章》研究上的一些关键学

术问题的突破,还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来进一步推进。^[112]朱建路利用山西交城县玄中寺《宣慰谢公述修考妣功德之记》对《元史·谢仲温传》进行了补正,指出谢氏家族可能为唐兀人,后定居于交城县,笃信佛教,在姓名与婚姻方面显示出受到蒙古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蒙古化倾向。^[113]崔壮则对王钟翰先生点校《清史列传·文苑传》中存在的标点问题进行了纠正和订补。^[114]

(魏建震: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冯金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瑞清: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张志勇.京津冀方志金石文献述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2] 张莉萍.保定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
- [3] 乔志忠.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考析[J].史学月刊,2021(1).
- [4] 魏建震.《吕氏春秋》的编纂对中国和谐文化品格形成的影响探论[A].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第4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 [5] 王茂华.科学史研究论丛[A].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6] 张翠莲.中国环境史·先秦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 [7] 张怀通.《尚书》新研[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8] 沈长云.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学、考古学与人类学考察[J].历史研究,2021(1).
- [9] 王菁.南庄头遗址与白洋淀地区史前村居生活的萌芽[J].保定学院学报,2021(1).
- [10] 刘志琴.“立朝与立市”:从《周礼》看中国传统市政的职能与理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11] 李申曦.庙见礼与《周南·葛覃》题旨的形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
- [12] 何艳杰.东迁白狄货币——尖首刀币研究[J].中国钱币,2021(2).
- [13] 何艳杰.多元交汇:先秦白狄文化变迁特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8.17.
- [14] 张翠莲.赵国考古学文化北进的轨迹[A].三代考古(九).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15] 张翠莲.延怀盆地东周铜器群的播化与行唐铜器群的形成[A].青铜器与金文.出版社,2021.
- [16] 张翠莲.先秦中原与北方文化交流持久延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9.27.
- [17] 张翠莲.行唐故郡遗址新出青铜器初识.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21(6).

- [18] 魏建震,温玉春.燕赵学术思想史·先秦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0.
- [19] 许春华.“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20] 李振纲.孔子仁学五题——儒家的人道价值关怀[J].河北学刊,2021(4).
- [21] 张乃芳.《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22] 李振纲.哲学研究老学研究的回顾、反省与理论创新[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23] 王开元.面向善的存在:孟子哲学中的“思”[J].哲学研究,2021(5).
- [24] 胥仕元.荀子治国思想探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25] 吕庙军.先秦诸子视域下荀子治理思想学说新探[J].邯郸学院学报,2021(1).
- [26] 刘振英.《荀子“富国”范畴探讨》.邯郸学院学报,2021(2).
- [27] 戴木茅.论《韩非子》中“悚惧”的逻辑展开与异化——以君主对臣属的心理震慑为核心[J].江淮论坛,2021(5).
- [28] 刘振英.从礼学到法术——论韩非子法术范畴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J].燕赵文化研究(5),2021.
- [29] 王红超,闫哲.《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2).
- [30] 王文涛.关于钜鹿之战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21(6).
- [31] 秦进才.《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3).
- [32] 武占江,衣抚生.燕赵学术思想史·秦汉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0.
- [33] 吕变庭.数量词与《春秋繁露》中的几个儒学思想范畴[J].社会科学家,2021(1).
- [34] 王文涛.《春秋繁露》五行说对《管子》四时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J].衡水学院学报,2021(6).
- [35] 邢铁.唐宋时期家学传承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6] 邢铁.中国古代家庭经济研究:户等制度·家产继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37] 许秀文.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J].社会保障评论,2021(4).
- [38] 许秀文,汪建欣.东晋时期的疫病与民间救助[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1).
- [39] 顾乃武.从以“墨”为名看武则天称帝与传统文化[J].湖北社会科学,2021(1).
- [40] 张重艳.唐代国忌浅论[J].保定学院学报,2020(6).
- [41] 倪彬.唐代李华的正俗察贤思想[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25.
- [42]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43] 朱安祥.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44] 王昊.论唐前期华北平原蚕桑丝织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A].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32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2021.
- [45] 顾乃武.唐代关中畿甸政区地缘建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46] 崔玉谦.督亢史探[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21.
- [47] 吴洪成,周艳艳.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校科技教材[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2).
- [48] 吴洪成,贾璐.唐代官学教材述略[J].教育与考试,2021(2).
- [49] 吴洪成,郭曦垚,杨蕾.唐代蒙学教材探讨[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50] 梁春胜.六朝石刻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51] 张开媛.《金刚经》鸠摩罗什译本在唐代的流传和接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52] 文志勇.禅宗三祖僧璨考[A].释永信主编.少林学辑刊:第1辑《少林学研究》[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
- [53] 文志勇.禅宗早期诸祖师与少林寺渊源关系考[A].释永信主编.少林学辑刊:第1辑《菩提达摩研究》[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
- [54] 崔红芬.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看唐代中外海路文化交流[A].禅与人类文明[A].2021-06-01.
- [55] 朱建路.试论响堂山佛教的历史分期[A].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史研究:第12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56] 冯金忠.平山县博物馆所藏《大唐西临山石龕像记》初探[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2).
- [57] 贾文龙.宋代地方法治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03.
- [58] 姜锡东.南宋续霭及其《王彦四厢行状》考论[J].中国史研究,2021(1).
- [59] 姜锡东.宋金“海上之盟”新论[J].湖北社会科学,2021(6).
- [60] 丁建军,秦思源.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J].河北大学学报,2021(1).
- [61] 姜锡东,贺学娇.宋代官员公务迎书考论[J].江西社会科学,2021(1).
- [62] 郭应彪.宋代天文官选任与管理制述略[J].唐都学刊,2021(6).
- [63] 殷荣辉,张倩.宋代镇官考论[J].保定学院学报,2021(5).
- [64] 张又天.金朝宰执官员兼官问题探析[J].辽东学院学报,2021(2).
- [65] 廖寅.宋代的公吏与“公吏世界”新论[J].史学月刊,

- 2021(12).
- [66]侯天霖.宋代廉从考论[J].宁夏社会科学,2021(3).
- [67]廖寅,杜洋洋.走向细化: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治理[J].清华大学学报,2021(3).
- [68]衣长春.论清代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J].河北学刊,2021(1).
- [69]郭志安.论宋代的保密与泄密[J].河北学刊,2021(4).
- [70]高云霄.辽朝除名法探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3).
- [71]程麒.辽金时期“连坐”与“缘坐”制度辨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1(6).
- [72]程麒.金代籍没法探析[J].辽东学院学报,2021(1).
- [73]郭志伟.北宋河北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以“关南地之争”为中心[J].宋史研究论丛,2021(1).
- [74]侯天霖.从经济与军事的联动看北宋晚期河北军事防御[J].宋史研究论丛,2021(2).
- [75]李桥.俄藏黑水城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新证[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1).
- [76]孙继民,宋坤,郭兴申.明代巡检司的新史料与新认识——上海图书馆藏《酉阳杂俎》纸背所见巡检司文书探析[J].军事历史研究,2021(3).
- [77]王宏斌.清代水师职能初探——兼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前身机构比较[J].军事历史研究,2021(3).
- [78]郭志安.北宋黄河水灾防治与水利资源开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08.
- [79]孙继民,宋坤.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03.
- [80]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J].河北大学学报,2021(5).
- [81]姜锡东,李金闯.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货币供应与交子诞生原因再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1(3).
- [82]廖寅.何以称“形势”:宋代形势户溯源辩证[J].深圳大学学报,2021(6).
- [83]刘施伟.金朝军需钱探析[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21(6).
- [84]陈丽.北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华北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J].保定学院学报,2021(2).
- [85]殷荣辉.北宋河北路建制镇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21(5).
- [86]张勇.“承上制下”与“从左转右”:北宋物资转输区域的互动——以东南地区为中心[J].安徽史学,2021(1).
- [87]陈丽,明贺军.妙中后期财政困境与府县应对——以华北府县为考察中心[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21(2).
- [88]陈希.西夏香料初探[J].西夏研究,2021(1).
- [89]马晴晴,吕变庭.《算学启蒙》中的香料经济新探[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1).
- [90]孙继民,孟月.明代山西藩王宗禄册的发现与意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1(4).
- [91]孙继民,耿洪利.新见明代科举宴席公文初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1(2).
- [92]张春兰.两件《乐府诗集》纸背明代扬州府泰州宁海乡赋役黄册的缀合与复原[J].保定学院学报,2021(3).
- [93]陈新海.明清时期草原丝路沿线城市张家口的发展与职能演变研究[J].史学集刊,2021(3).
- [94]肖红松,刘建哲.陆路港口:清代张家口“港口”功能与草原腹地市场的构建[J].河北学刊,2021(3).
- [95]杨双利.中国古代救荒口粮标准考论[J].农业考古,2021(6).
- [96]杨双利.清代官方视野下的灾民群体及其救济策略[J].中国农史,2021(5).
- [97]王晓龙.宋代理学传播与地方治理散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04.
- [98]韩滂.韩滂集[M].刘云军,点校.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08.
- [99][俄]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叙录[M].崔红芬,文志勇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04.
- [100]鞠贺,杨军.辽朝佛教宗派的兴衰及地域分布研究——以出土石刻为中心[J].北方文物,2021(4).
- [101]张重艳.真定府大悲寺比丘僧澄净同修行愿文浅析[J].西夏学,2020(1).
- [102]唐晔,杨波.宋金元时期山西三教信仰研究[J].宋史研究论丛,2021(2).
- [103]崔红芬.英藏黑水城《佛顶心观音经》之相关问题考论[J].敦煌研究,2021(2).
- [104]崔红芬,文志勇.西夏遗存《圆觉经》科判、略疏及其相关问题考略[J].西夏学,2021(1).
- [105]文志勇.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西夏文坛经释考[J].西夏研究,2021(2).
- [106]柴冰.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六寺获颁《楞严经》述略[J].历史档案,2021(2).
- [107]陈瑞青,吴玉梅.辽金元时期河北境内契丹人的分布与融合[J].保定学院学报,2021(5).
- [108]何晓芳.满族民间家谱满汉文体书写嬗变的历史叙事[J].地域文化研究,2021(4).
- [109]申慧青.定州文庙与北宋时期定州文教之发展[J].保定学院学报,2021(4).
- [110]张浩然,艾丽君.北宋进士交游内在关系探究——以仁宗天圣二年进士为例[J].宋史研究论丛,2021(1).
- [111]张洁琨.宋代士人食素现象析议[J].农业考古,2021(4).
- [112]时培磊.传承与创新:近百年来《元典章》的整理与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1).
- [113]朱建路.《元史·谢逊温传》考补[J].西夏研究,2021(4).
- [114]崔壮.《清史列传·文苑传》点校订补[J].国学学刊,2021(4).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王坚

2021年,河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继续平稳进展,在各子学科、若干专题上有所推进,研究更为细化,更加注重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思维范式的变化。

一、政治史研究

(一) 政治人物研究

政治人物研究是近现代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2021年,河北省史学界持续推进相关政治人物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

作为晚清政学两界的重要人物,张之洞一生任职经历丰富。董丛林对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前的御外军事运筹进行了考察,认为,张之洞早年即对外患深为忧虑且有意御之,同时还具有经世致用思想,有的放矢地关注西洋兵学,这些都是其御外军事运筹之前奏。及至任山西巡抚期间,他密切关注中法战事并屡有筹策。出任两广总督后,他开始为抵御法国而竭力运筹:积极筹措军费、布置海防,酌情增募勇丁、精心选贤调将,进行战略筹划和具体军事布置,最后对清廷“乘胜即收”之举更是着力抗争。另外,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与实践也受其御外军事运筹之影响而有所发展,二者密切关联,互促共进。^[1]

郝晏荣对严复的国家意识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严复认为国家的失败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失败的根源之中的根源,失去国家这一大的平台,其他一切建造都是空中楼阁。与个人、群体相比,国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基于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复杂性,在国家发展的目标上,必须把完整、和谐、稳定作为首要考量,其他目标和追求都在其次。严复崇敬民主的政治价值,赞佩西方民主国家的成就,但在现实社会中,严复却反对中国建立议会宪政体制。严复认为现代国家必须重视立国基础和立国精神,中国国家的立国基础和立国精神,不仅应该包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治元素,同时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的仁政思想,应该认真总结并吸收传统观念中的现代元素。^[2]

张静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为中心,对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五四时期,李大钊借助《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媒体平台,通过办报、撰文、论战等方式,有效引导舆论,在拓展五四公共舆论空间的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3]裴赞芬对李大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性思考和初步勾画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开创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先河,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以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为参照,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方式、生产组织形式等许多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初步勾画,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4]

(二) 晚清、民国政制研究

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被迫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外国鸦片贩子为牟取暴利,无视条约的限制性规定,继续从事走私贸易。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场外交谈判持续10年之久,主要围绕如何征收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关税和厘金展开,涉及中、英、印三国的巨大经济利益。王宏斌以“洋药税厘并征”为中心,利用、对比已出版的中英文档案,探讨了中、英、印三国博弈的完整过程,认为,从1876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烟台条约》,将“洋药税厘并征”提上议事日程,到1885年7月《续增专条》签订,中国和英国、印度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外交谈判持续10年之久。清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将厘金和关税一起征收作为谈判的基础;印度政府意在实现鸦片利润最大化,反对中国提高鸦片关税和厘金,主张继续实行鸦片专卖制度;英国政府则坚持鸦片贸易,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国内外反对鸦片贸易的视线,并防止中国恢复鸦片输入禁

令。外交谈判时断时续，鸦片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考验着谈判者的智慧和各国的道德底线。^[5]

为维护国家水域安全，近代中西方都设立各具特色的管理机构，其中问题错综复杂，很多未经厘清。王宏斌在对清代水师职能进行了梳理，并与同一时代美国海岸警卫队前身机构的职能进行了对比，认为，清代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其中奉天、直隶、山东和福建的水师均为外海水师；黑龙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的水师均为内河水师；江苏、浙江和广东因既有海防任务又有江防任务且兼有内河、外海水师。这些水师主要担负五项职能：一是维护国家水域主权，维持江河湖海治安；二是管控偷渡和进出口走私，保护商业和运输业；三是管理检查商渔船只建造规模、技术和装备；四是搜救海难事故船只和难民；五是定期巡逻，保护渔业生产。清代水师与同一时代美国海岸警卫队前身机构，即灯塔局、缉私巡逻艇局、轮船检查局、救生局和航海局担负的职能，虽有差异，但基本相近。这说明，清代水师尽管不是远洋海军，但基本发挥了滨海国家近海武装力量应有的职能，不可单从是否具有远洋活动能力和是否取得对外一系列战争胜利来评价其价值。^[6]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以军事进攻和议和谈判的“武”“文”两手展开。刘宏以“惩办祸首”为中心，对庚辛年间列强对华军事进攻与中外议和谈判进行了考察，认为，庚辛议和期间，德国提出以“惩办祸首”为谈判的“先决条件”，遂使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凸显。谈判期间，清政府要求对“肇祸诸臣”须分别轻重，列强则要求全部处死，双方产生分歧和争执。德国元帅、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执行德皇旨意，对华实行严厉的军事制裁，每当谈判出现不顺利的情形，便派遣远征军实施军事打击，先后进攻直隶省保定、张家口等地，并攻入山西省境，意在威胁、恫吓。在列强军事打压之下，清政府先后4次发布“惩办祸首”上谕，最终不得不完全接受其要求。将列强对华军事进攻与中外议和谈判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通过“惩办祸首”这个特定环节来具体论析和展示，可以揭露列强对华政策的侵略性和强权特征，并揭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7]

衣长春、李想对清代直隶总督职能嬗变进行

了初步考察，认为，清代督抚是衔接中央与地方治理的权力枢纽，其职能变化是中央地方治理策略变化的一种反映。直隶总督作为“八督之首，疆臣领袖”，除具备一般性职能外，还负有其他总督无可比拟的职能。因此，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更具特殊性与代表性。有清一代，直隶总督的职能经历了复杂的调整，从顺治时期中央在直隶省设多位行政长官到晚清时期直隶总督成为权势显赫的封疆重臣，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涵，体现了中央治理地方能力的变化。^[8]

张治江对1921—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反帝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打倒帝国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纲领，集聚民族革命、阶级革命与世界革命于一体，成功地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诉求、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想与共产国际的指导融会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坚持将反帝的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坚持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并且要求反帝必须“面向劳动人民”。中国共产党反帝策略经历了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区别对待不同帝国主义，再到形成灵活反帝策略的过程。反帝纲领以及灵活反帝策略的形成与发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9]

二、抗日战争史与解放战争、共和国史研究

（一）抗日战争史研究

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这也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2021年，河北省史学界就抗日战争史展开了持续的讨论。

郑立柱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对抗战期间各边区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

“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0]

郑立柱还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大批综合性史料和专题史料的搜集、整理与面世，大量当事人回忆录、日记的出版，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日渐丰富、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面世。特别是随着社会史、新革命史、新文化史等理论的兴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也逐渐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视野，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重新审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史、全面呈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多重面相已成为一种趋势。总体而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已取得显著成绩，但还存在着研究论题不均衡、研究成果缺乏深度且同质化严重、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等“瓶颈”问题，有待学界进一步突破与推进。^[11]

李春峰对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商业贸易活动的规制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制定商贸政策、建立组织载体、培养商贸人才的同时，颁发多种经营凭证，提供充足的资金，开展各类物资的收购、贩卖、运销工作，要求商铺、行贩提供具备商业信誉的保人，掌握商贸情报、把握市场行情与规律，进一步加强了对商业贸易活动的规制，对于畅通边区物资渠道，繁荣边区市场，稳定边区经济秩序，乃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2]

（二）解放战争、共和国史研究

杨豪对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进行初步考察，认为，果实分配是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关键性环节之一，其分配的公平与

否直接关联着解放区政权的革命理念与民众动员的实践效果。从理论意义而言，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模式追求结果公平，彰显出解放区政权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乡村社会新秩序的有益探索 and 不懈追求。然而，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实践中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尤其是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粮款、家具和衣物等浮财的多分多占更是严重破坏了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原则。这一问题的凸显跟分配激励政策、基层薪酬机制和农村财政制度诸要素均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关涉公平性的客观结构位置与主观价值评判在革命的洗礼之下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而机会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准则更成为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公平与否的另一种参照逻辑与叙事空间。^[13]

崔水莲对1965—1989年间海河流域干旱缺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河流域降水量的丰枯变化较大。其中，1965—1979年属丰、枯交错波动期，1980—1989年属于连续枯水期。从气象角度看，1965—1979年属于平水期，但从农业用水要求看，基本属于干旱。在经历了大部分年份干旱的15年之后，又遇到20世纪80年代整整10年的连续干旱。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干旱缺水不仅对人类生存、生产形成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压力。^[14]

杨学新、高志勇对近代海河流域革命文化塑造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以慷慨悲歌为核心的燕赵文化是海河流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海河流域政治面貌的改变和革命文化的萌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变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海河流域的人民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海河流域的文化注入新的内涵。海河流域成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种在这里星火燎原。近代海河流域不仅面临着灾害频仍的局面，还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害和反动统治的压迫。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坚强领导，在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鼓舞下，海河流域塑造了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文化。^[15]

三、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 区域经济史

山西商人作为明清及近代的著名商帮，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刘秋根结合《晋商史料集成》编纂探讨了晋商史研究的创新问题，认为，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晋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地从事商业金融活动，取得了其他地方商人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秉承契约精神，建立了体系完备且极具技术操作性的会计制度以及独特的、代表中国传统最高水平的商业金融体制，再加上其特殊的制度及地域文化，为后世留下大量珍贵的民间契约文书资料。世事沧桑，战争、内乱使这些资料损毁很多，但留存数量仍相当庞大。如何利用这些资料应对当前晋商研究面临的资料瓶颈，从新的角度、新的侧面重新认识晋商经营机制，弥补晋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修正学术界对晋商的某些偏颇认知，真正理解晋商辉煌背后的真实动因和机制，是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16]

肖红松、刘建哲对清代张家口“港口”功能与草原腹地市场的构建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清代张家口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商贸城市。从陆路“港口”形成的区位条件、城市的港口功能和草原腹地市场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可知，当时之张家口居于内地与草原市场的转口贸易中心地位，并与蒙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草原腹地市场，是具有“港口—腹地”模式特征的陆路港口型城市，并切实凸显了清代华北地区陆路型港口城市的主要特点。^[17]

晚清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势和社会条件较之前发生重大变化。董丛林考察了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认为，从清前期直隶经济的总体情况看，即使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也远未能突破自然经济的藩篱，特别是与世界经济联系颇为有限，基本还是在传统之辙上缓步前行。鸦片战争后，地处北方，与当时通商口岸相距较远的直隶，所受影响远不如东南沿海那样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隶的经济可谓在一定新的变化之下而仍基本维持传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进而攫得一系列侵华权益，包括在直隶天津开口通商。天津开埠之后，直隶经济变迁开始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

业趋新等方面，而传统经济形态转型也日益明显。其中，直隶总督特别是“能员”的主观能动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总的来说，晚清直隶经济变迁所体现的“转型”趋向，若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这种“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由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过渡发展的时代进步性；二是受制于列强而不能完全自主、难以健康发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现相当程度的“畸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也就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状况。^[18]

张静对 1860—1928 年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变迁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1860—1928 年保定城市商业开始近代化转型：新式商业初步发展，新的经营方式和营销手段出现；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有所扩展，传统商业空间进一步拓展的同时，新式商业空间出现并得到发展；城市商业组织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商业呈现出新特点。^[19]

蔡禹龙、谢华对 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天桥官地的售卖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北京天桥是近代北京平民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是北京历史记忆中的文化符号。民国初年，天桥地区的逐渐繁荣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官地使用的规划与规范成为当务之急。从 1914 年—1930 年，天桥官地的租赁与售卖成为北京市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天桥官地的售卖，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展现了政府实施社会治理的面相。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允许商会参与此事，本想提高办事效率，实际产生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市政管理职能，在土地使用的规划与规范方面，应充分权衡各方利益，注重矛盾化解。^[20]

(二) 货币金融史

胡莹、戴建兵对清末民国广东标会融资渠道与资金流向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标会是中国传统金融合作组织合会的主要会式之一，历史悠久且因社会环境与公共金融机能不发达而顽强存续，对于民间融资、储蓄和救济等有着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国时期的广东，由于缺乏对生产与消费过程提供融资的公共商业性金融组织，个人、群体或机构的生产、经营与投资需求催生了民间信用借贷组织——标会的诞生与活跃，成为该地区民间金融体系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特征。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随着清末民国广东社会经济

的变迁，标会的金融功能呈现出不断演进的趋势。与此同时，广东标会作为合会的一种主要类型，由于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征加罚、保人担保、殷实铺保、实物抵押等制度被逐渐引入广东标会的运行之中，这样的现象已属于金融创新的范畴，可谓传统金融组织的制度创新。但任何的演进和创新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势必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或历史局限性。金融功能的逐步演进，标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逐渐走出了传统“熟人社会”的范围，延伸到全新的“生人社会”领域，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标会运行的风险性。^[21]

申艳广、王欣对 1934 年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行了考察，认为，1934—1935 年间，因美国高价收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引发白银危机。美国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而提高白银价格的举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工商业发展、财政收入及金融业安定等方面都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白银外流。就具体情况来看，国民政府经历了由静观形势到外交协商，再到实施自救、出台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的过程。国民政府内部、地方当局、金融界人士等对白银外流和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政策都有各自的态度和认识，其认识和应对是逐渐成熟，并非一蹴而就。^[22]

申艳广、王欣还对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币改革”中设立的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进行了考察，认为，设立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办理分会所在地法币发行准备金的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发生在 1935 年法币改革过程中。在“华北独立运动”的阴影笼罩之下，天津金融界、华北地方当局、南京国民政府均牵涉其中，各有打算。梳理天津分会的设立、组织构成、职责工作，对研究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法币改革均很重要，并对深入研究民国金融史、政商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不无裨益。^[23]

四、社会、教育、思想史研究

（一）社会史

衣长春对清代直隶辖区治理与社会变迁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直隶总督在清代诸多总督中政治地位最高，皇帝通过直隶总督，将中央意志

转换为具体政令，由直隶总督贯彻推行至基层社会。同时直隶总督根据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相应的举措和建议提交中央，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力运行轨道，达到中央增强地方控制力的目的。清廷为凸显直隶省首善之区的地位，不仅充分放权于直隶总督，更给予大量政策性扶持，以期将直隶省打造成全国区域内的治理标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纵观整个清代，直隶总督对辖区的治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全国其他省份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但就整体治理成效而言，雍正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治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直隶总督作为天子脚下的封疆大臣，他们对辖区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皇帝的意志。而辖区治理的好坏，也能反映皇帝与直隶总督之间关系的变化。^[24]

屈斌以青海东部“霍尔”地区为例，对清中以降甘青土司区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梳理，认为，18 世纪中叶以来，清廷在甘青边地继续沿用土司、千百户制度实行治理。当传统土司——土舍体制难以维持，土司及其代理人不得不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礼仪秩序，以维系其地方统治的合法性。这套礼仪通常是由土司或在地经纪主持进行，是一种有着明确边界的非自愿性组织。民间信仰提供了可资选择的礼仪资源。清王朝对内陆边疆的治理不再只是以“汉化”为最终指向，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对政治、文化的再确认和形塑。获得重新授权的土司、千百户正是从自身需要出发，依靠此秩序建立新关系，从中谋取相应的利益。所以，各自表述下的多元，表面看似离心，实质恰恰是对新的天下秩序下的区域权力等级关系的再确认。嘉、道以降，清廷不断尝试通过新编千户、百户的方式重塑当地社会秩序。该进程一直延续至民国马步芳统治时期。^[25]

刘晨虹、李楠以山西苏家堡王氏家产纠纷案为例，对民国时期太行山地区的家产纠纷及解决之道进行了梳理，认为，太行山文书中藏有 20 余件山西文水县苏家堡村王姓家族内部争夺家产的文书，记载了该家族百年间分家析产的情况。从道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该家族经历了多次分家，均立有分家文书。民国年间，王姓家族面对家产纠纷，诉之于法院，表明民国时期的太行山地区，村民解决纠纷的方式呈现多元化

的特点。但无论是民间调解还是法院审判，订立契约依然是保障个人权益的重要方式。^[26]

在近代中国，由于农村日渐凋敝，兴起了重建乡村的“乡村建设运动”，定县翟城村是起源地。刘宏、贺彬对清末民初翟城村农业科技的改良与推广进行了考察，认为，清末民初，直隶省定县翟城村曾在全国率先实行村级自治，开创了民国乡村自治的先河；1926—1929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又选择翟城村为其平民教育的实验基地。无论是翟城村当局，还是平教会，均重视以科技手段发展农业生产，遂使翟城村农业科技改良取得一定成效。在总结清末民初国内外农业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研究翟城村（包括平教会）农业科技改良、推广的成绩与经验，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启示意义。^[27]

薛建武对民国时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定县模式”与“邹平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救治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尤以“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影响最大。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两种模式，有必要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二者除了在目的、内容和结局等方面存在共同点外，还存在很多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领导人文化背景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和出发点的不同。对“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为解决当今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28]

（二）教育史

张翠莲、武杏杏对民国时代著名学者徐旭生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徐旭生的教育思想以哲学的高度立论，因现实的需要落地。他的“研究本位”和“转线于自然界”的教育思想以其世界观和科学、道德观为指导，“乡村教育”思想是前两者在现实经济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三者互为表里，集科学教育、平民教育和生产教育于一体，反映了徐旭生通过教育争取民族独立与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深刻剖析徐旭生教育思想的内涵，有利于推动教育改革中对社会调查实践的重视，有利于在思想觉悟上规避学术不端问题，进而形成追求真理、探索世界人生的行动自觉。在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徐旭生的教育

思想还警醒我们要立足自身、立足现实以深化教育和社会改革。^[29]

刘周颖、徐霞通过观摩会这一新形式，对近代学堂教育的空间互动与公共呈现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学堂逐渐取代私塾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形式。在私塾改良过程中，举办观摩会成为一种有效的改革方式，其良好的互动效果和多样的举办形式，切实推进了学堂教育的尝试和发展。近代新兴媒体为观摩会提供了文本呈现和讨论的公共空间，教育空间得以扩大和延伸，从而初步实现了教育的近代化转变。但囿于时局、社会经济以及实施因素的影响，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局限性。^[30]

（三）思想史

在中国古今学术知识的转型中，学制改革与中国现代学术各学科的生成是影响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李敏对清末学制改革与“中国文学”的演生进行了考察，认为，清季学制的酝酿出台，是近代学术分科体系建立的关键环节。在庚子后的学务筹议中，以西学分科条理中学成为一般趋势，“文学”逐渐进入学科体系，由于观念来源及制度设计旨趣的差异，含义随时代因人而异。在科举向学堂递嬗的过渡时代，各地科举考试、书院、学堂的分科设学实践中，“文学”呈现不同的形态。在壬寅、癸卯学制制定调整过程中，张之洞等人既要借径日本以立新制，又要借助“文学”以存国性。在国粹主义主导下，《奏定学堂章程》中的“中国文学”虽指向“中国文章”，但疑义并未因学制出台而消减，持续困扰着学科的发展。^[31]

董丛林对辛亥前后的“破坏与建设”思想进行了考察，认为，“破坏”与“建设”两词，虽说自古就有与现在通常义项略同的用法。但是，这两词起码到晚清，在对应性使用上少有，是到资产阶级革命发端之后，才呈渐多迹象，而至民国初年，则愈行发展甚至成为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辛亥之前，严格意义上是武昌首义之前，“破坏与建设”舆论兴动的旗手是革命党人，是他们作有“破立结合”的理论阐释。当然，其时在实践上无疑是侧重于“破”的。武昌首义和辛亥之后的由“立”到“破”。清朝倒台后舆论曾一度是以“建设”（即“立”）为凸显，而从“二次革命”到“护国运动”，重振

以“讨袁”“倒袁”为中心的“破坏”之声，显示进步国人重心由幻想“立”转“破”历程。五四前后“破坏与建设”舆论的勃兴。在“五四”前后，新文化、新思潮活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在中国传播，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形成、壮大，而李大钊、陈独秀等可谓独具风骚，引领潮头。及至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32]

把增强提出从纪念史视角来加强五四运动研究，认为，由纪念史这一视角来看，站在百年之后新时代的今天，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与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历程及其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对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如果从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与五四运动的纪念史还有着折射时代变迁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时期不同，我党纪念五四运动的话语体系也有所不同。分析纪念五四运动话语变动的历史轨迹，解读不同时期五四运动纪念话语的变化及其原因，既可折射出百年来世情、国情与时情的时代变迁和走势，还可揭示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四运动活动中注重引领并建构自身意识形态话语的历程。而如此种种的探讨，均将有益于汲取滋养，进而促进当今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33]

柳诒徵是近代中国著名史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孙文阁对柳诒徵史学进行了梳理与研讨，认为，20世纪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中国史学逐步走向了近代化，但传统史学还有着巨大的影响。柳诒徵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者面目出现，主张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主张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坚持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他提出了“明伦”“尚德”的文化主张。这是柳诒徵史学的文化基础。柳诒徵作为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家的史学思想，高扬治史以经世的思想大旗。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要注重“以史为鉴”“史以教民”。在史家道德修养方面，他注重史家的史德，认为史家要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而后才能谈治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他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传统，

治史的方法上，注重学术源流，但有着浓厚的信古思想。不过他在新的形势下对新史料的处理还是主张“新者宜新”的原则，并不完全保守。^[34]

2021年，河北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应该看到，其中还有不小的差距。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河北学者本年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高端精品成果偏少，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顶级刊物上没有发表的文章，不但与先进省市有较大差距，与河北省2017年度、2018年度成果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王坚：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董丛林.张之洞“鄂督”任前的御外军事运筹[J].军事历史研究,2021(2).
- [2]郝晏荣.严复的国家意识初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1(3).
- [3]张静.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2).
- [4]裴赞芬.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性思考和初步勾画[J].经济论坛,2021(8).
- [5]王宏斌.中、英、印围绕鸦片税厘征收之博弈(1876—1885)[J].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1(1).
- [6]王宏斌.清代水师职能初探——兼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前身机构比较[J].军事历史研究[J],2021(3).
- [7]刘宏.庚辛年间列强对华军事进攻与中外议和谈判——以“惩办祸首”为中心[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8]衣长春,李想.论清代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J].河北学刊,2021(1).
- [9]张治江.中国共产党反帝理论的形成与发展(1921—1937)[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4).
- [10]郑立柱.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
- [11]郑立柱.从传统史学到多学科融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社会科学辑刊,2021(3).
- [12]李春峰.革命与经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对商业贸易活动的规制[J].军事历史研究,2021(2).
- [13]杨豪.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新探(1946—1948)[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
- [14]崔水莲.海河流域干旱缺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1965—1989年)[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15] 杨学新,高志勇.近代海河流域革命文化塑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1-29.
- [16] 刘秋根.从《晋商史料集成》谈晋商史的创新研究[J].中国钱币,2021(4).
- [17] 肖红松,刘建哲.陆路港口:清代张家口“港口”功能与草原腹地市场的构建[J].河北学刊,2021(3).
- [18] 董丛林.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N].光明日报,2021-03-15.
- [19] 张静.近代保定城市商业变迁研究(1860—1928)[J].经济论坛,2021(3).
- [20] 蔡禹龙,谢华.20世纪20年代北京天桥官地的售卖[J].北京档案,2021(11).
- [21] 胡莹,戴建兵.传统金融组织的金融功能演进:清末民国广东标会融资渠道与资金流向研究[J].近代中国,2021(2).
- [22] 申艳广,王欣.1934年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J].中国钱币,2021(6).
- [23] 申艳广,王欣.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考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24] 衣长春.清代直隶辖区治理与社会变迁[N].光明日报,2021-03-15.
- [25] 屈斌.清中以降甘青土司区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路径选择——以青海东部“霍尔”地区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21(1).
- [26] 刘晨虹,李楠.民国时期太行山地区的家产纠纷及解决之道——以山西苏家堡王氏家产纠纷案为例[J].邯郸学院学报,2021(2).
- [27] 刘宏,贺彬.清末民初翟城村农业科技的改良与推广[J].经济论坛,2021(3).
- [28] 薛建武.“定县模式”与“邹平模式”比较研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6).
- [29] 张翠莲,武杏杏,徐旭生教育思想浅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
- [30] 刘周颖,徐霞.观摩会:近代学堂教育的空间互动与公共呈现[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2).
- [31] 李敏.清末学制改革与“中国文学”的演生[J].史学月刊,2021(9).
- [32] 董丛林.辛亥前后的“破坏与建设”策议[J].史学月刊,2021(1).
- [33] 把增强.从纪念史视角加强五四运动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2-21.
- [34] 孙文阁.柳诒徵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世界史研究

汪鹏 倪世光

一、2021年世界史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河北省世界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与往年相比,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学术成果的数量稳步增长。第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区域国别史三个学科方向均有相关成果发表,其中古典文明史、美国史和日本史方向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第三,除了省内传统世界史研究重镇河北师范大学与河北大学以外,部分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世界史相关的研究和翻译成果问世,部分学科如中国史、外语和法学等还出现了一些学科交叉研究的新成果,体现了河北省世界历史研究的进步和研究者国际视野的拓展。

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1. 世界古代史

古典文明史研究成果较往年集中出现,是2021年河北省世界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赵

克仁进行了希伯来与古埃及王权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1]。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同属中东古代文明,二者在政治体制上同属王权政治。作者认为,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二者的王权政治有很大的区别。在神权方面,虽然两者都属于神权政治观,都认为人必须服从于神,君权神授是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希伯来上帝将更大的权力授予更广泛的人群,埃及神灵则将权力授予君主;在王权方面,埃及王权比希伯来王权更加集中,埃及王权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而希伯来王权倾向于分权,朝着民主方向演进;在王权与神权的博弈中,希伯来是契约关系,而古埃及基本上是遵从关系。希伯来采取了有限君主制,而古埃及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作者指出,二者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历史观的不同、文明属性的差异、民族特性的区别,还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

郭云艳从货币史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调适和创新^[2]。罗马人从公

元前4世纪末开始正式发行货币,其货币的形式、种类源于对希腊的模仿,而在模仿的过程中,又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调适,做出重要创新。作者从币制、形制和币值单位三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币制上,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之前坚持以铜币为中心,银币与金币均与铜币挂钩;形制上,罗马人模仿希腊货币上的主题与表现形式,但多选用如雅努斯、罗马等本地神祇,或马尔斯、维纳斯、萨图恩等与罗马关系密切的神祇,在共和国末期,罗马人不仅模仿希腊化货币形制的统治者形象,而且吸收、同化该形象背后的“王权”概念,完成罗马社会中王权意识的确立;币值上,罗马人从开始模仿希腊货币的币值单位,逐渐过渡到根据自身需求统一币面形制,并在币面上标注币值单位,构成货币史上的重要创新。

许礼捷依据古代文献以及部分铭文的相关记载,探讨了罗马哈德良皇帝的巡视与帝国的行省治理^[3]。公元二世纪,罗马国力达到鼎盛并进入帝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恰在此时作为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采用了截然不同于前人的统治方式。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哈德良有一半时间在各行省的巡视中度过,这种新颖的治理手段从古典时代开始便吸引了大量传记作家的关注与讨论,并成为现代史学界研究罗马帝国早期行省治理的重要参考资料。作者认为,尽管传世文献多将哈德良行省之旅归结为个人性格特质的产物,但通过对文献中强化边防、平息地方矛盾、整肃军纪、给予到访地区各类恩惠等治理细节的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学者关于哈德良行省巡视的部分假设,即皇帝的行省巡视加强了地方与帝国政府的沟通,是一种地方治理的新模式。作者进一步提及,古典作家带有明显立场倾向性的叙事,也从史料角度揭示罗马皇帝与帝国元老阶层之间存在的斗争与矛盾。

除以上三篇研究论文外,2021年本省学者还有一部古典史的研究专著出版。吴国萍的《基于古希腊神话的英雄史诗研究》是希腊神话研究类专著^[4]。该著以基于古希腊神话的“英雄史诗”作为研究对象,从神话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入手,阐述了古希腊神话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古希腊的土生神话,再以希腊奇迹的产生为引,分析了荷马史诗及荷马的英雄观,阐述了英

雄与英雄崇拜,之后分析了“英雄史诗”与英雄时代,从忒拜战争、特洛伊战争到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描绘了“英雄时代”的群像,最后分析了“悲剧英雄”俄狄浦斯和“民族英雄”忒修斯,是国内希腊神话研究的一部力作。

2. 世界中世纪史

骑士制度和西欧中世纪史的研究是河北省世界史学科的传统优势领域,以倪世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世界史学者,多年来相继发表和出版了诸多在国内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021年,倪世光教授和牛姗姗博士考察了西欧中世纪贵族等级头衔^[5]。作者将西欧中世纪的贵族头衔分为顶级、高级和中级三个层次来考察,较为全面地讨论了上至国王(King)、下至扈从(squire)的各级头衔的情况。作者认为,西欧中世纪是等级社会,贵族等级制度是其重要内容,而且贵族的等级头衔和称号并非是由某一位君主或政治权威人物在特定时期统一颁布的通行规则,而是存在逐渐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头衔是划分贵族等级的标识,比起爵位、服饰和纹章等标识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贵族的等级状况,有些是延续罗马帝国的旧有头衔,有些是对日耳曼人旧有称呼的改造,还有的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作者进一步指出,西欧的贵族等级制度随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渐复杂和完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贵族等级制度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消亡,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对有杰出贡献者的褒奖方式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和敬仰,体现了西欧贵族文化深远的影响力。

刘程对中世纪后期北欧地区远程贸易模式的变迁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6]。作者认为,中世纪后期(10世纪—16世纪)北部欧洲的贸易发展先后经历了远程贸易的常态化、大宗商品转运和港口集散贸易3个阶段。各阶段的模式特征主要体现在职业商人群体、商品内容和规模、市场网络、货币形式、地理空间和贸易中心更迭等要素的变化组合当中。各阶段贸易模式植根于中世纪城市经济,各自依赖的市场网络皆受占据区位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城市所支配,特别是两大枢纽城市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作者进一步指出,到16世纪晚期,以现代国家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支撑的阿姆斯特丹强势崛起为世界经济“都会”,

这标志着由中世纪共同体参与的转运贸易落幕，由个人和股份公司主导的现代贸易模式代之而起。

三、世界近现代史

在世界近现代史领域，本年省内也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杨晓敏探讨了 19 世纪英国农业社会持续约三十年的“小土地持有”（small holding）运动^[7]。作者指出，英格兰的小土地持有以及立足其上的自耕农的消失，曾深为历史学家和社会改良者所痛惜。给农业雇工分配专属地，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道德的做法，由来已久。19 世纪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给农业雇工分配专属地，进而鼓励他们持有小块土地，使已经逝去的历史重回现实。市场条件的变化，带来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小土地持有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基于此种情况，作者认为自圈地运动以来盛行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农业大生产并不是无往而不利，没有哪一种土地持有类型能够称为理想类型，采用何种土地持有方式，要依赖特定时期、国家的特殊农业条件，特别是市场因素的变化。

贺秀明和甄雪艳以 19 世纪的早期美国华人代表王清福为例，考察了早期美国华人的文化与族裔意识^[8]。王清福作为早期的美国华人，以讲授中国文化和刊发华人报纸为主要谋生手段，在美国各个地方对中华文化进行口头讲授和笔头宣传，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对华偏见，为华人融入美国社会奠定了早期基础。王清福是一位 19 世纪的美籍华人英雄，首先，他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觉意识，其次，他具有超前的族裔和政治参与意识。他通过参与和发起华人民权运动而活跃于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也是被公认为第一个采用“Chinese American”（美籍华人）这一术语并致力于建构该身份的人，是美国华人运动的先驱，可以为海外华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权利提供有力借鉴。

刘雅军讨论了美国非洲裔学者的“非洲中心性”知识生产^[9]。作者指出，20 世纪后期，美国一群非洲裔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为“非洲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或“以

非洲为中心的”（afrocentric）知识生产，以应对当代非洲人的危机。他们认为，当代非洲人——包括大陆非洲人和离散非洲人的危机源于长达 500 年的殖民统治，以致他们丧失了作为非洲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把欧洲人的经验当作他们的现实，参与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历史的普遍理解，这种“错位”使许多人进一步远离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作者认为，“非洲中心性”文化革命的意图，是要把各地的非洲人重新安置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心进行分析和解释，使他们能够对各种现象做出更真实的反应。

刘向阳着力于现代美国环境史的专题探讨，以 20 世纪 70—90 年代美国环境政治考察入手，分析环境管制和公共舆论的互动^[10]。他指出，从 1960 年代中期起，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环保主义运动对其各项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轨迹，并非单向度的绝对增长，而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有着自身的高低起伏。同时他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质量的关心也与其自身的工作和就业状况、美国的经济形势、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着复杂的因应反馈和协同演变态势。作者认为，在对公众环境意识的认知上，我们不能笼统地概说，而必须深入具体地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不同时期公众的环境意识变化及其与政府公共政策的互动，在环境史研究中践行真正的人本主义。

同样是从环境史的视角出发，刘向阳还发表了另一篇专题论文，探讨环境史视野下对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滞涨危机”的新认识，并由之阐发环境史研究的经济转向和创新^[11]。他指出，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滞涨危机给予了多种解释，但鲜有人考虑同期美国严格的环境管制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透过大量原始档案文献，可以发现环境管制的成本最终通过价格上涨的形式传递给了普通消费者，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是诱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作者进一步表明，在坚持环境史的史学本位前提下，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求得惯常历史叙事的新解，既是环境史研究经济转向的表现，也可以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弥合，进而从史学研究的本体、认知、方法和层级等方面推进环

境史的创新。作者认为此种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揭示国家宏观环境战略的向下延伸与微观层面环境公共政策经中观向宏观的复杂反馈。宏观政策并非原封不动地自上层传递到下层,微观执行层面也有着自身的权变与因应。环境史的经济转向不仅有利于挖掘历史要素层累嬗变的内在机制,丰富历史的面相与内涵,而且有利于揭示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复杂的协同演进关系,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四、区域国别史

2021年,河北省在区域国别史方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俄国史和日本史研究领域。俄国史以梁立佳的两篇专题论文为代表性成果。其一,梁立佳讨论了19世纪初期沙俄开拓远东海上贸易的活动及其影响^[12]。19世纪初期,在商务大臣鲁缅采夫的推动下,沙俄政府多次尝试开拓中国广州和日本长崎的远东海上贸易。然而,受制于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的外贸管制政策,1804年列扎诺夫赴日使团与1805年戈洛夫金使华团队均以失败告终。作者指出,外交活动失败体现的是近代东北亚区域不同国际关系体系间冲突与碰撞的结果,其实质是近代欧洲国家寻求全球市场与追求商业利润的组成部分。俄国开拓远东市场计划的破产,使其错失改善太平洋区域贸易与殖民不利局面的关键时机。同时,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都在俄国的外交活动中感受到外域的威胁,两国政府在社会反应、应对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中日两国不同发展历程的具体展现。

在远东地区以外,梁立佳还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了太平洋地区,考察了19世纪俄美公司在夏威夷群岛的殖民活动^[13]。19世纪初,俄美公司为解决俄国美洲移民区的粮食危机,在夏威夷群岛进行了一系列的殖民扩张活动,其中尤以1815—1817年间舍费尔医生在瓦胡岛和考爱岛上的殖民活动最为重要。作者认为,沙皇政府的消极政策、夏威夷政治形势的变化、英美商人的联合抵制以及舍费尔殖民谋划的失误,最终导致这一殖民计划失败。俄美公司由此失却解决移民区给养问题的一个有效选项,被迫转向与美商贸易和罗斯托殖等其他渠道,这一结果进而对沙俄在北太平洋的整体扩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舍

费尔的殖民冒险问题上,探险家个人、俄美公司、沙皇政府三者间表现出的态度差异,揭示出19世纪上半叶沙皇俄国殖民扩张进程中私人商业与国家权力之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隐秘逻辑。

日本史研究领域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张如意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14]。日本自1192年镰仓幕府开始到1867年江户幕府结束,一直是由武士掌握政权,形成了日本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即所谓武家社会。作者指出,武家社会不仅为武士道的繁殖生长提供了土壤条件,而且孕育了日本独特的精神文化。时至今日,它对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都发挥着重要影响。作者对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线性的梳理和归纳,指出武家社会具有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武家社会特征,建立在儒道佛基础上的武士道实际上也是日本武家社会发展的产物。

许益菲讨论了日本元禄时代社会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15]。作者指出,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充满诸多令人深感悖谬的历史现象。在尾张国下级武士朝日重章身上存在好学与纵乐的悖谬,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中,存在铺张与俭约、奢靡与穷困、克制与纵乐并存的悖谬。作者由此发出疑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充满各种悖谬的历史现象?而历史表象折射出的又是怎样的文化本质?同时,活跃在元禄时代的町人大文豪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等人的作品中,往往会向世人宣扬义理与人情对立的道理。而元禄时代曾轰动一时的赤穗事件中,折射出的又是公与私、法与理的冲突。作者指出,义理与人情是解开日本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元禄时代日本社会文化中义理与人情的较量,至今仍然存在于日本社会中。深入探讨义理与人情、公与私这些概念,对解读元禄时代出现的诸如上述诸多悖谬现象会有一些的启示意义。除此论文之外,许益菲还作有《繁华之下的“杂音”:元禄时代日本社会的疫病与生活》《元禄时代日本武士生活中的异域空间》和《江户时代日本公家的知识世界与儒教》等文,在相关研讨会、学术年会上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并发言,推进了河北省日本史的研究,并扩大了河北省学者在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张敏翻译并出版了日本近世史和性别史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横山百合子的专著《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16]。作为日本近世社会史研究权威，横山百合子追溯了明治维新激荡时代的日本的庶民生活，讨论了明治维新对东京居民的影响，特别关注游女、流浪武士、商贩、贱民等群体，挖掘了底层民众的日记，并富有同理心地解读了这些普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生存智慧，视角独特，以身份等级制的分化与重组为线索，描绘了一幅新社会史研究方法和视角下的明治维新史。该书的翻译和出版，为国内日本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颖的参照对象，也是一部具有一定的影响的公共史学作品。

五、小结

2021年，河北省的世界史研究稳中有进。在保证研究成果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古典史、区域国别史领域的推进较为明显，特别是日本史的研究成果涌现，部分填补了省内学科研究的空白。总体来看，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成果数量上比往年有所增加，但高端精品成果较少，专著数量不足。第二，专业研究队伍仍然薄弱。多年来河北省范围内设有世界史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院校仅有河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两所，博士学位授权点至今仍然为零。第三，本省没有世界史专业期刊，历史学类的专业期刊也很少，多数成果发表于高校学报一类的社科综合期刊和省外期刊，从长远看不利于相关学科的发展。

(汪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倪世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赵克仁. 希伯来与古埃及王权政治制度比较研究[J]. 中东研究, 2021(1).
- [2] 郭云艳. 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模仿、调试与创新——以货币为视角[J]. 历史教学, 2021(2).
- [3] 许礼捷. 古代文献视域下的哈德良巡视与罗马帝国行省治理[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 [4] 吴国萍. 基于古希腊神话的英雄史诗研究[M]. 北京: 应急管理出版社, 2021.
- [5] 倪世光, 牛姗姗. 西欧中世纪贵族等级头衔考察[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 [6] 刘程. 中世纪后期北欧远程贸易模式变迁研究[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21(2).
- [7] 杨晓敏. 19世纪英格兰的“小土地持有”运动[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 [8] 贺秀明, 甄雪艳. 早期美国华人的文化与族裔意识——以王清福为例[J]. 名作欣赏, 2021(4).
- [9] 刘雅军. 美国非洲裔学者的“非洲中心性”知识生产[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6-28.
- [10] 刘向阳. 环境管制与公共舆论——20世纪70—90年代美国环境政治考察[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 [11] 刘向阳. 环境史视野下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涨危机”新解——兼论环境史的经济转向及其创新[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 [12] 梁立佳. 破冰之旅: 19世纪初期沙俄开拓远东海上贸易的活动及其影响[J]. 海交史研究, 2021(3).
- [13] 梁立佳. 19世纪俄美公司殖民夏威夷群岛的历史省察——以舍费尔殖民活动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1(3).
- [14] 张如意. 论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J]. 日本问题研究, 2021(4).
- [15] 许益菲. 元禄时代日本社会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J]. 读书, 2021(9).
- [16] 【日】横山百合子. 从江户到东京: 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M]. 张敏、丁诺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管 理 学

管理科学研究

魏杰 陈立文

一、2021年管理科学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丰富，其

中外文期刊发表数量与往年相比显著增加。管理科学研究更具多样性，主要分为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题研究两个主题，

每个主题下又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管理科学研究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选取相关理论,运用不同研究方法,丰富了企业层面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其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企业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各个企业都会涉及管理和决策问题。通过对企业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从2021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小组访谈、案例研究、二手数据等方式获取研究所需数据,结合相关理论对企业的组织、技术创新以及人员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层面的研究,为企业解决运营管理中的问题提供了参考。例如,《创新价值链视角下制造业企业的社会信息流动机制》以及《商业模式构建对新创电商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等研究都对企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二,管理科学研究分析了社会热点问题。管理科学是指以科学方法应用为基础的各种管理决策理论和方法的统称。因此管理科学的相关研究一直致力于解决实践中的管理决策问题。近年来,随着亚马逊、京东、淘宝等大型平台商的出现,网上购物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重要消费方式,大量企业也开始在电商平台销售产品。因此,通过平台商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时,如何决策才能使企业、平台商和消费者均能获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2021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许多学者已经结合实际问题,对平台企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跨境电商平台信息服务协同模式构建研究》以及《基于电商平台的定价顺序和销售模式选择研究》等都是关于平台运营的研究。

二、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管理科学理论作为管理领域的一个学派,是以运筹学、系统工程、信息技术等理论和技术手段,从操作方法、作业水平的研究向科学组织的研究发展,同时吸取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

新成果,进而形成的一种现代组织管理学。其特点是利用有关的科学工具为管理决策寻得一个有效的数值解,侧重于定量研究。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管理科学的一般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决策与对策理论与方法、评价理论与方法、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预测理论与方法、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以及知识与创新理论与方法八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一) 一般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胡悦、李雪燕、马静基于流动人口视角,利用2011—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河北省的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人力资本高级结构化与河北省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河北省各市间的创新存在空间相关性,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总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省外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省内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河北省的创新力呈现不同程度的正向驱动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1]

任嵘嵘、王波、卢福强等在第三方物流供应商(3PLS)有风险态度的情形下,利用条件风险价值(CVaR)的风险度量方法对风险态度进行度量,将风险因素融合到了多属性逆向拍卖中,以此来解决第四方物流集成商(4PLI)通过多属性逆向拍卖方式对第三方物流供应商进行选择的问题。结果表明,当3PLS为风险中性时对4PLI是最有利的,当3PLS为风险厌恶时,风险厌恶程度越小对4PLI越有利。^[2]

洪传春、刘某承、张雅静等运用灰水足迹理论和Hoekstra的灰水足迹核算方法,构建了农业灰水足迹强度与效率评价指数,利用京津冀2000—2016年农业生产数据,测算农业灰水足迹强度与效率,分析其时空格局变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区域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问题。^[3]

崔和瑞、朱晓宏、赵巧芝把握“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在金融开放发展中的空间交互特征及动态趋势,基于资本流量模型测算沿线56个经济体在2008—2018年的金融开放度,并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展开空间分布特征测算。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金融开放度从低水平的正向空间自相关转变为随机分布。^[4]

王士心、袁中美基于 2006—2019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债务影响的时空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债务增长有极为显著的长短期促进效应,已成为当前制约政府债务缩减的关键要素;人口老龄化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长期均衡影响大于短期波动影响,中西部地区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影响。^[5]

刘霞、封静娴、刘畅以京津冀中小企业为样本,选择了六项符合衡量融资效率的投入与产出指标,运用 DEA 方法和 Tobit 回归模型,研究京津冀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研究发现,京津冀中小企业总体 DEA 有效数量占比较低,大多都处于非 DEA 有效状态,整体融资效率水平不容乐观;企业质量、股权集中度和资金利用率正向影响企业融资效率,而资产规模则对其有负向影响。^[6]

Wang L 等结合任务技术适配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一个适合移动购物环境的综合模型,以研究视觉和技术刺激下网络购物实施意愿的机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 504 个有效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网络购物实施意愿的复杂因果模式进行了分析。^[7]

(二) 决策与对策理论与方法

Kang K 等研究政府补贴和公平关切对农户企业和核心企业组成的扶贫供应链(PASC)决策和协调的影响。研究发现,合理的政府补贴可以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加强涓滴效应,消除市场失灵,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户企业和核心企业的利润;农户企业的公平关切加剧了 PASC 内部的双重边际效应,降低了双方企业的利润;成本共担收益共享合同能够协调 PASC,实现帕累托改进。^[8]

Zhao M 等研究了概率语言环境下带有评论情绪的个性化产品选择问题,提出了一种将个性化启发式判断融入前景理论(PT)的多准则决策方法。首先,证明了三种常见的启发式判断(评论效价、情感极限和渴望水平)与 PT 三种行为准则之间的一致性。然后,根据提出的可调 PT 框架,将产品按照概率语言术语集输入进行排序,其中负偏系数来源于消费者的启发式判断。最后,通过一个实例和两个仿真实验验证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9]

赵萌、潘睿莹、肖启锐提出了基于三维信任网络的联合风险投资多属性群决策模型。首先,将二维信任函数拓展为三维形式,利用投资方相互投资和总投资次数确定信任矩阵并完成信任网络的搭建;其次,将概率语言集与信任评价相结合描述投资方的评价信息,体现风险投资决策模糊的特点;再次,引入可视化交互来提高群体一致性水平,并采用意见采纳因子平衡个体意见的独立性与群体一致性;最后,通过实例分析说明所提方法的实用性和决策结果的稳健性。^[10]

赵萌、李子超、高美等通过考虑决策者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提出了一种交互式共识模型。首先,根据决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采用 Louvain 方法对网络进行聚类,以降低大规模社会网络的复杂性。然后,基于可能性分布的犹豫模糊元素来表示每个子群的偏好,根据网络分析的中心性,计算决策者和子群权重。随后,给出三个层次的共识测量和反馈机制,来加速共识的达成过程。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并通过与现有方法的比较,说明了该方法的优越性。^[11]

赵萌、张晨曦、秦金磊等运用实验设计方法,对权重信息以概率语言给出的多准则决策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多次模拟权重重要程度及其概率,设计出多组实验权重,求得每组实验数据的得分,获得最适用回归方程,将决策问题的实际数据代入方程进行运算,得出方案排序结果。通过快速成型过程、柔性制造系统过程两个案例,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能较好地处理基于概率语言权重信息的多准则决策问题。^[12]

Zhao M 等针对需要向下转诊的慢性病患者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组决策可靠性的概率语言多准则决策方法。首先,将不同群体对推荐标准的决策信息表示为概率语言偏好,在制定标准时分别衡量群体的可靠性水平。之后,针对最不可靠的组重新调整决策信息和转诊标准,以提高整体可靠性。其次,根据概率偏好统计,对需要向下转诊的患者进行相似性度量排序,得到正式的转诊标准。最后,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冠心病真实病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13]

Zhang C 等考虑信任关系对共识达成过程的

影响,基于行为分析提出一种综合考虑领导行为和不合作行为的共识模型。首先,根据聚类结果,计算两个具有直接信任关系的决策者(DM)的偏好相似度,判断是否存在领导行为。其次,基于对领导行为的识别,通过判断有效DM的调整行为是否有利于达成群体共识来定义不合作或合作行为。第三,通过量化不合作或合作行为的程度来降低或提高有效DM和子组的权重。最后,通过仿真实验和对比分析说明所提方法的有效性。^[14]

吴晓丹、张晓亚、岳殿民等使用博弈模型,分析两家社区医院分别提供同质与异质医疗服务时,医患不签约、患者与单独医院签约、患者与医联体签约策略下社保机构、患者与社区医院的行为。研究发现,社区医院提供异质医疗服务,患者与医联体签约是一个社会最优策略。^[15]

(三) 评价理论与方法

本年度的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企业评价研究、区域评价研究和信用及价值评价研究领域。

1. 企业评价研究

杜命刚、韩同银、尚艳亮基于项目法人角度设计了一种集成德尔菲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的物资供应企业评价体系,研究铁路工程物资供应企业选择的最优决策问题。基于Delphi法构建包括6项一级指标、25项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应用AHP法构造判断矩阵,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应用优劣解距离法(TOPSIS)实现物资供应企业的最优决策。集成Delphi、AHP和TOPSIS的评价模型可靠度高、协调性好,为铁路工程物资供应链管理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思路。^[16]

宋万杰、尹德斌、宗成华以商贸流通企业为突破口,在产业联动和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支撑下,从政策、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了评价京津冀城市群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环境的九类核心构成要素,结合京津冀商贸流通企业的发展现状指出其核心约束。研究发现,政策环境约束主要表现为政府服务能力存在差异、配套政策趋同性较强;经济环境约束主要表现为产业布局有待优化、金融支持水平不足;社会环境约束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以及人才短缺等。^[17]

张慧明、赫连志巍、孟庆洪等从制造企业转

型特征和技术能力演化过程入手,分析制造企业转型与技术能力的构成因素及二者的关系,构建制造企业转型和技术能力匹配关系指标体系。选取39家样本企业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熵权法和数据包络法对技术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转型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出改进建议。^[18]

赵向阁、刘妮雅选择创办10年内的新创电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商业模式构建对新创电商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以新颖程度为主的商业模式构建能够提升新创电商企业经营绩效,吸收能力能够在以新颖程度为主的商业模式构建和新创电商企业经营绩效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19]

王明吉、刘方舟认为选取合适的考核指标、构建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尤为重要。首先,分析了现阶段小额贷款公司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现状并指出存在的问题。然后,基于平衡计分卡原理,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综合指数法,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构建小额贷款公司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为规范民间借贷、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提供参考。^[20]

Liu Z和Liu M基于投影寻踪模型,建立了一套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基于“相关性”和“可靠性”原则,选取了28个评价指标,并根据评价数据的特点创新性地引入了投影寻踪模型。该模型不仅可以克服传统评价方法的人为加权干扰和对数据结构的限制,而且在处理高维非线性数据时具有更好的鲁棒性、抗干扰性和准确性。文章选取了中国34家火电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21]

2. 区域及产业经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王韶华、刘晔、何美璇等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从要素、产业和制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区域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粗糙集理论约简指标计算权重,分别对2001—2017年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的差异性、空间相关性及协调性。^[22]

Yang X等结合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模型(GWTR)建立了一个综合模型,探讨2000—

2017年三种技术进步渠道（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引起的国际技术溢出和省际投资引起的省际技术溢出）对中国六大行业CO₂排放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三种技术进步渠道对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均呈现出空间相关性和差异性。^[23]

王杨在我国服务业发展与扩大内需之间双向互动机制理论剖析的基础上，采用我国2011—2019年省域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双向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服务业发展与扩大内需之间存在双向互动机制，两者之间互动关系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总体而言，服务业发展对扩大内需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东中西“梯度递减”态势，而扩大内需对服务业发展的反哺作用则表现为中部最强、东部次之，西部不显著。^[24]

仵风清、谢婷婷、刘婷在界定了高新技术产业有效供给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技术有效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二次组合评价方法依据2016年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有效供给能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各行业之间技术有效供给能力差距较大，总体水平不高；制约技术有效供给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以围绕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投入不足、政府支持强度不足、技术研发投资存在不平衡等问题。^[25]

刘晓静、刘艳丽研究了我国托幼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如0~3岁婴幼儿入托比例低、公办幼儿园数量减少以及家长经济负担重等）。研究指出，我国托幼服务发展应调动政府、企业、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发挥儿童福利司的作用，坚持普惠公益的发展方向，推进托幼服务一体化发展。^[26]

吕荣杰、杨蕾、张义明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三者间的动态关系表现出地区差异性；人工智能对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和产业升级分别产生“侵蚀效应”与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均没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产生负向影响。据此，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地区发展的政策建议。^[27]

刘晓静、罗椅民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与高龄

化并存，且失能、失智、认知症老人不断增加的现状，指出加快适老辅具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康养需求、实现失能、失智、认知症老年人生活重建的重要举措。发展中国适老辅具技术，需要纳入养老服务政策议程，借助护理保险制度，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营造适老环境。^[28]

许秀文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问题展开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对现存的城乡社保制度提出建议。为了更加凸显制度公平，可从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收入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和保险制度等方面入手，弥补农村社保资源不足的状况。^[29]

赵立三、周雯珺从不同类型资产收益率宽幅的角度，运用PVAR模型验证了高技术产业房地产化的原因。结果显示，投资性房地产高收益率与经营资产低收益率之间持续、非正常拉大的“收益率宽幅”现象是高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房地产化的深层次原因，抑制了高技术产业创新动力，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增长。^[30]

3. 信用及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范晓倩、于斌为探索绩效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整合了压力的交互模型与创造力的双重路径模型，对员工进行调研并通过Mplus7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绩效压力被评估为挑战时，领导者可通过灵活性路径从广度上促进员工创造力，当绩效压力被评估为威胁时，领导者可通过持续性路径从深度上促进员工创造力，领导-成员交换在两条路径中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1]

曲京山、张晶、孟宪宝等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以“双一流”高校为研究对象，结合“双一流”高校建设情况和高校社会责任的内容，以河北省为例构建了社会责任视角下“双一流”高校绩效评价模型，借以完善“双一流”高校绩效评价的内容与方法，以期为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评价提供相关理论借鉴和现实参考。^[32]

段洪波、刘金辉结合当前中国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政策要求，以平衡计分卡为工具构建评价指标框架，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权重的设置，构建以贫困户收入增长与帮扶满意度为核

心的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并将J贫困县2019年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效果与资金运营等情况应用到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中,对J县产业扶贫资金在群众满意、资金效益、资金管理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33]

王莉莉、乔微考虑政府扶贫机构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脱贫成效的考核评估,通过对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和服务质量等维度进行问卷调查,以基层扶贫干部视角来评价第三方机构评估的工作质量,进而从制度保障、组织建设、评估方法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优化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以提升评估结果的质量,助力精准判断脱贫成效。^[34]

杨桂花、王莹娟通过对审计署近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实务的分析与思考,提出了政策落实跟踪绩效审计的目标及审计路径,即评价地方政府配套落实政策设计的合理性、执行的有效性和政策执行的效果。^[35]

(四) 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李占雷、李学森、陈立等以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模式为研究对象,运用傅立叶定律和导热微分方程构建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违约风险传染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违约风险的传染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核心企业违约会导致中小企业违约概率增加,业务量规模、交易频率与中小企业的违约概率呈正比,信息共享程度、中小企业偿债能力和供应链地位与中小企业的违约概率呈反比。^[36]

张丽君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区块链信息技术下管理层风险偏好在企业内部审计增值中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管理层风险偏好会对内部审计增值产生显著的倒逼效应,两者显著正相关;区块链信息技术的应用能正向促进内部审计的增值,两者显著正相关;区块链信息技术显著增强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与内部审计增值的相关性。^[37]

孙丽文、李少帅从伦理嵌入视角出发,构建了新型风险治理体系,采取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风险治理主体之间的“垂直连通”和“水平协商”,并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能动作用,将治理触角渗透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及其规模化应用的诸多阶段,治理范围更加宽泛,治理

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研究旨在降低人工智能风险等级,为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启示。^[38]

宋波基于人力资源外包在饲料企业运用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现实背景,以饲料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分析饲料企业人力资源外包的原因以及人力资源在外包方面存在的服务质量无法满足企业需要,信息泄露导致经营风险增加,外包监督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提出风险防范有效的实施路径,对我国饲料企业人力资源外包业务发展起到推动作用。^[39]

(五)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朱清香针对企业绩效评价的政策需求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的问题(如财务指标在绩效评价中占比过大、绩效评价指标难以契合企业需求、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的矛盾等),从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价值导向三个层面提出新发展格局理论下的优化方案,探索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顶层设计,搭建更有质量的评价体系,并引导企业广泛认同,建立基于质量第一——科技领航——效益优先的新发展格局理论下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40]

王燕、刘邦凡、郭立宏采用SEEA-2012核算体系框架,构建了我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核算了我国31省份2007—2016年10年间的绿色GDP,并通过人均绿色GDP及绿色GDP指数等相关指标进一步揭示我国绿色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结果显示,在时间格局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仍然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在空间格局上,我国绿色GDP在全国范围内各省份发展不均衡;空间莫兰指数分析表明,我国各省份呈现全局自相关关系且某些省份具有显著的局部自相关性。^[41]

Li和Saeed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经验上识别技术创新、部门产出和出口增长是否会对工业和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证实,整体长期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其幅度大于短期。长期来看,经济增长1%会导致农业和工业能源需求分别增长4.6%和1.1%。出口是整个经济和农业部门能源需求的第二大贡献者。^[42]

张双才、尹庆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

构作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建立了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模型。利用 2003—2019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开展了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联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投入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43]

(六) 预测理论与方法

耿立校、刘丽莎、李恒昱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长短期神经网络(LSTM)模型,通过对融合资本市场交易数据、技术指标数据、投资者情绪三种源数据的量化来预测股票指数的走势。利用“上证 50 指数”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表明,LSTM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比传统模型更为优秀,数据源的增加也对模型准确率的提升有较大贡献,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44]

刘达、刘雨萌、许晓敏在电力企业招标价格预测建模中引入 Copula 函数,通过特征变量与目标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来分析变量间的相依关系。首先确定特征变量与目标变量的边缘分布,进行 Copula 参数估计,选取合适的 Copula 函数并计算相关系数来筛选供应商投标价格的特征,并以多种预测方法进行预测来验证引入 Copula 函数后预测精度是否提升。结果表明,引入 Copula 函数进行特征筛选后,预测精度更高、效果更好。^[45]

段晓晨、钱睿、孟楠以大道梁隧道为实例验证运维成本估算与控制模型,以期提高维护成本测算的准确性和维修及时性,使得隧道工程结构设施能及时得到维护保养,从而有效降低运维事故发生率,保证实现和延长结构设计寿命和时限。在预测基础上,对运维成本动态发展进行优化控制,并辅以 BIM 技术可视化控制,从而达到降低控制成本以提高利润的目的。^[46]

耿立艳、胡瑞、张占福指出城际高铁客流量序列呈现出不平稳和波动性特征,常规预测方法很难对其进行精准预测。文章提出了将 EMD、GRNN 和 ARIAM 模型相结合的城际高铁客流量预测模型(EGA 模型)。EGA 模型充分利用三者优势,提升城际高铁客流量预测精度。通过某城际高铁站日客流量数据检验 EGA 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与 GRNN 相比,EGA 模型获得

了更高的城际高铁客流量预测精度。^[47]

吴晓坤、雒水棵、苏雯利用中国人口死亡数据建立高龄人口的 CBD 模型,借助 Lee-Carter 模型的参数调整获取高龄人口预期寿命,然后以此为目标对 CBD 模型的参数进行调整,最后利用调整的 CBD 模型对未来人口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进行预测,并根据精算平衡原则分析评价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领取阶段面临的长寿风险。^[48]

段晓晨、孟春成、施振东等以成都地铁为研究载体,针对地铁车站建设极易出现的投资失控问题,将 BIM 可视化技术与计算机辅助管理手段综合集成余弦相似度算法、BP 神经网络、挣值法和 PDCA 循环相结合,提出一种地铁车站建设投资的智能预测与控制方法。该研究可以为地铁车站建设投资管理提供参考。^[49]

魏明坤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变化的学者学术影响力测度方法,以中国引文数据库为统计工具,利用 SIF 测度模型对 2019 年爱思唯尔发布的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的中国高被引学者学术影响力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SIF 测度模型弥补了 h 指数在评价学者影响力的不足,对学者学术影响力演变测度具有适用性,揭示了学者学术生涯的学术影响力演变过程。^[50]

(七) 复杂性与复杂系统

刘立波、张连春、刘洋等基于河北省 163 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调查数据,构建了多元理性假设下农产品封闭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控制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消费者安全需求与封闭供应链的垂直一体化程度对农产品封闭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控制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封闭供应链信息共享程度次之,预期净收益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较小,而企业品牌形象的影响效果不显著。^[51]

Wu X 等研究了药品运输中的车辆分配和路线优化问题,将问题制定为固定车队规模的多类型车辆分配和混合整数规划路线优化模型。文章基于混合粒子群智能启发式算法,提出采用遗传算法中的交叉和变异算子及 2-opt 局部搜索策略来解决该问题。^[52]

Guo L 等通过探讨客户信任(即对主播、社区成员和产品的信任)与客户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快速关系的中介作用,来检验影响直播电商

社区成功的因素。调查了 422 名观看过淘宝直播的客户,并根据他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建立了偏最小二乘法建模的模型。文章提供了帮助广播公司和从业人员利用直播来促进购物的见解。^[53]

Li X 等指出客户需求分析是产品创新的前提,是提高产品营销竞争力的关键。文章采用一种综合运用词汇联想模型、重要性排序方法、卡诺模型、情感分析和质量功能展开的方法来获取和分析客户关系。以手机在线评论为案例,阐述了提出的方法对企业推动产品迭代创新的实用价值。^[54]

胡悦、马静、李雪燕等基于 DPSIR 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京津冀地区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和障碍因子诊断。结果显示,2008—2017 年,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现向好的趋势;北京市影响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SO₂ 排放量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数;天津市的主要问题是城市人口扩增所带来的失业增加、有效灌溉面积的减少和生态赤字加大;影响河北省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主要在产业结构和污染排放方面。^[55]

孙丽文、李少帅以 15 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的领先企业为样本,收集样本有关多元化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赋能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技术层面、数据层面和企业层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核心影响因素可归结为技术支撑型、数据驱动型、组织变革型、服务生态型和营销整合型 5 种影响路径,可为不同类型企业增强人工智能赋能创新发展能力提供启示。^[56]

苏佳、夏雨基于信道容量最大化准则对天线选择算法进行改进,提出了适用于大规模 MIMO 系统的最大欧式范数双向选择算法。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最大欧式范数双向选择算法能够降低算法复杂度,能够在不同选择天线数和信噪比环境下保持较优信道容量,能够满足复杂的传播环境,更适合应用于实际的通信系统。^[57]

李盼盼、董志良、武天娇选取国际原油价格和中国新能源股指作为样本数据,研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波动对我国新能源股指的影响。结果表明,原油价格对新能源的影响方式有规律可循,这为投资者的相关交易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研

究原油对中国新能源股指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58]

杨凡认为在复杂风险环境下,基层网格治理表现出服务过程中的行政化倾向、技术使用上的表演化倾向、主体力量上的单一化倾向以及架构体系上的失重化倾向。为提升基层网格治理效能,应着重突破以下方面:治理地位的正确定义、治理内容的正确把关、治理形式的正确塑造以及治理规范的正确制定。^[59]

陈婷、侯文华、薛克雷将消费者信息安全敏感度、BDA 效率和网络价值融入可穿戴产品价值体系,构建了消费者感知效用模型,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消费者信息安全敏感程度、BDA 效率差异和网络外部性强度对制造商和网络零售商均衡决策的影响,并将网络零售商的最优零售模式作为分析的落脚点。通过模型拓展,使模型更加贴近现实背景,进一步验证了基本结论的普适性,给出了在不同的消费者特点和 BDA 竞争优势情形下,针对制造商和网络零售商提高利润水平的管理建议。^[60]

陈兰杰、闻航指出在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中,侵犯个人隐私的事件时常发生。文章结合区块链基础架构模型和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基于区块链的开放政府数据个人隐私保护模型,并从开放政府数据全流程角度对其实现机理进行了阐述,该模型对提升保护开放政府数据个人隐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61]

支凤稳、张萌、赵梦凡等基于双路径理论,以科学数据质量为中心路径,以数据来源可信度为边缘路径,从数据使用者视角构建科学数据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利用问卷调查获取 325 份来自数据使用者的有效样本,并借助 SPSS 和 AMO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研究结果可为人文社科尤其是管理学领域的科学数据共享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62]

张英英、夏一、杜纲针对产品族配置与考虑升级的再制造设计协同问题,提出了一种主从关联优化方法,并建立了一个双层规划模型。为求解该模型,开发了双层嵌套遗传算法及其相应的编码策略。最后,将该模型和求解算法应用于台式电脑产品族案例中,说明了主从关联优化方法在解决产品族配置与考虑升级的再制造设计关联优化问题方面的优势性。^[63]

张旭、袁旭梅、降亚迪针对需求与碳交易价格双重不确定下的多式联运路径优化问题,建立混合鲁棒随机优化模型,设计基于蒙特卡罗采样的灾变自适应遗传算法并进行有效性检验。以具有 15 个节点的多式联运网络为对象开展算例研究,比较不同模式下多式联运的运输方案及成本并分析不确定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受遗憾值约束的影响,需求不确定的鲁棒优化会增加多式联运总成本,而碳交易价格随机性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成本的增加。^[64]

(八) 知识与创新理论与方法

王石磊、王飞、彭新敏从传统技术创新阻碍因素着手,探究资源拼凑在社会关系嵌入过渡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深陷“盘丝洞”的中小企业更需要培养实物资源利用能力以及构建共同愿景实践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丰富和完善了技术创新理论,并对中小企业突破资源束缚实践技术创新提供证据。^[65]

方巍、林汉川以制度理论和社会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基于全球 24 个国家的 52 家中国海外工业园的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社会技术创新对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技术创新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嵌入创新三个维度对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产生正向影响。^[66]

李胜连、张丽颖、李润亚针对后治贫时期的可持续脱贫进行了研究,构造了金融科技创新、可行能力结构与农户持续增收之间的理论关系模型。以 665 份调研问卷为数据,利用 SEM 模型对所构造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与优化。研究显示,农户可行能力结构优化与金融科技创新是后治贫时期可持续脱贫的两个重要考量因素;后治贫时期物质资产的帮扶整体上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已不再显著,相反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注重其社会资产与人力资产的增加才是未来返贫阻断的重要形式。^[67]

刘琳、王玖河从知识结构的视角构建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顾客知识共享激励机制模型,创新性地分析了在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共享知识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比例的变化对顾客知识共享努力水平及收益分配系数的影响,并运用 Matlab 对该模型进行了仿真分析。结果表明,顾客的努力水平与共享知识的组成结

构有关,且当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比例均为 0.5 时努力水平达到最大值;收益分配系数与共享知识的组成结构有关,且当隐性知识比例为 1 时收益分配系数达到最大值。^[68]

李恩极、李群基于 2007—2018 年城市统计数据 and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互动形式进行检验,旨在揭示新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科技竞争的新特征,考察地方政府创新竞争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创新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这种激励作用随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弱的倒 U 型特征。^[69]

李涛、沈晶、宋沂邈等依据高阶管理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及战略领导理论,以 2011—2018 年创业板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 CEO 个人特征、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该研究对科学任用 CEO、合理使用激励方式以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具有借鉴意义。^[70]

刘琳、王玖河结合超网络理论建立了包含知识子网络、顾客子网络和企业组织子网络的顾客与企业间的知识共享超网络模型,从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整合阶段、创新阶段和维护阶段对顾客参与知识共享的过程进行分析,并通过仿真实验分析了知识共享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和顾客忠诚度对知识共享进程的影响。^[71]

三、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题研究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和行为科学及工程方法,结合信息技术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2021 年,河北省学术界就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运筹与运营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工程与项目管理、金融工程、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研究、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以及平台企业研究七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一) 运筹与运营管理

李慢、张跃先从顾客信任的视角,构建非递归模型揭示网络服务场景对顾客契合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实验法收集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假设。研究表明,网络服务场景中的审美诉求、功能布局和财务安全因素均有助于促进顾客契合和网络信任,但是审美诉求对顾客契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其主要通过网络

信任间接作用于顾客契合；网络服务场景因素刺激下的顾客契合和网络信任之间呈非递归关系；顾客经验对网络服务场景和顾客契合，以及网络服务场景和网络信任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72]

Yin S 等在 COVID-19 疫情导致新鲜农产品 (FAP) 供应链出现短期中断的背景下，基于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构建由供应商、第三方物流 (TPL) 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揭示了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大都市地区 FAP 的有效供应机制，并提供了未来大流行病例期间保证 FAP 质量和安全的经验。^[73]

侯玉梅、郑迪文、孔乐佳等为研究消费者策略性采购行为对全渠道 BOPS 运营服务区域和定价的影响，对全渠道零售商实行 BOPS 运营模式进行建模，并利用最优化理论 (K-T 条件) 得到全渠道零售商的最优定价及最优服务区域。该研究可为全渠道零售商进行服务区域设计和定价的联合优化策略提供实践指导。^[74]

代建生、陈瑞佳在损失规避下，探讨了零售商的订购和广告协同决策问题。零售商的初始资金状态存在三种情形：资金充足、资金相对短缺 (不需融资)、资金短缺 (对外融资)，并分别在三种情形下刻画了零售商的最优运营策略。探讨了损失规避、初始资金、融资利率、商品价格及广告促销的敏感性对运营策略的影响：在资金充足或资金短缺下，商品订购量和广告强度随影响因素的变动方向通常相同；在资金相对短缺下，商品订购量和广告强度随影响因素的变动方向相反。^[75]

黄春萍、王志文、章静敏等研究了开发式协作模式与探索式协作模式的最优选择和科技型企业与制造型企业的适用情况。研究表明，开发式协作模式与探索式协作模式在不同环境状态下均存在局部最优现象；面对资源丰富且动荡的外部环境时，科技型企业应选择探索式协作模式，相反则应选择开发式协作模式；面对资源丰富且稳定的外部环境时，制造型企业应选择探索式协作模式，相反则应选择开发式协作模式。^[76]

刁心薇、曾珍香、孙丞研究了供应链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减排决策，并改进收益共享契约，提出通过构造同解方程进行契约设计的新思路。研究发现，制造商和零售商采用改进的收益共享契

约可使自身利益实现帕累托改进，并使供应链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契约中的收益共享金额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溢价能力和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只要它在特定范围内波动，供应链就可实现协同。^[77]

赵斐、康建设、王雷震等针对单部件系统、关键部件提出视情维修与备件订购联合策略，系统退化服从两阶段延迟时间过程且采用非周期检测策略，退化初期以检测间隔 T_1 检查系统状态，而在第一次识别缺陷状态时，缩短检测周期为 T_2 、订购备件且进行不完美维修；若系统在随后的退化中被识别处于缺陷状态，执行不完美维修直至超过阈值次数 N_{\max} 并采取预防性更换，但若在检测周期内发生故障则进行更换。研究表明，联合策略能有效降低单位时间内的期望成本。^[78]

(二) 工业工程与管理

王韶华、何美璇、张伟利用 2000—2017 年北京、津、冀三个区域的时间序列数据，总结了劳动生产率、投资强度、能源消费结构、科技创新、环境规制等供给侧要素影响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降低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起促进作用；投资强度的上升对京津的影响微弱，对河北省起抑制作用；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对京津起促进作用，短期内对河北省起抑制作用；科技创新对京津冀的贡献显著，对北京市的边际效应较小；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对京津起抑制作用，对河北省的作用不明显。^[79]

吕荣杰、徐梦瑶、杨蕾基于我国 28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2SLS 与系统 GMM 进行分析，探究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数量与就业工资均存在显著地促进作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工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人工智能发展水平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就业工资，没有通过消费升级提高制造业就业数量。^[80]

孙颖、张佩佩、陈思霞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工业集聚程度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检验了产业集聚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异质性。^[81]

崔和瑞、王浩然、赵巧芝以提高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为发展目标, 利用随机前沿分析和马尔科夫链方法对 36 个工业行业 2000—2016 年 GTFP 动态演变特征及收敛趋势进行评价, 进而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展开关键因素研究。研究表明, 工业 GTFP 存在显著的自我锁定效应, 高耗能行业锁定效应最强, 中耗能行业接近行业平均水平, 而低耗能行业跃迁概率最高。^[82]

王韶华、刘晔、张伟综合运用粗糙集理论与未确知模型约简指标、计算权重、设置分级标准, 对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多指标综合测度, 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其协调性。结果发现, 京津冀间工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京、津波动频繁, 河北省上升趋势明显, 均已达到中等以上水平; 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分别受工业环境治理、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83]

(三) 工程与项目管理

陈立文、王静、赵士雯以绿色建筑认证为前因变量, 以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为中介变量, 构建绿色建筑认证—租赁意愿理论模型, 研究绿色建筑认证对居民住房租赁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 绿色建筑认证对居民住房租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对居民感知的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会价值在绿色建筑认证与租赁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84]

Li Y 和 Lu S 根据不同运输方式的特点, 建立了一个运输效用最大、生态影响最小、广义成本最小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并采用理想点法、线性加权法和层次序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和比较。结果表明, 理想点法更适用于该研究, 可应用于北京市交通结构优化。通过实例分析, 优化后的城市客运周转率和分担率更加科学合理, 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85]

Kong F 和 Dou D 介绍了一个新的实际调度问题, 活动的工期约束广泛存在于现实项目中, 该研究首次将其作为一个资源约束的项目调度问题提出, 证明了传统时间约束的缺陷, 并对其进行了改进, 开发了一个约束编程优化模型, 并使用 IBM ILOG CPLEX-CP 12.9.0 版优化器求解模型。实验表明, 与其他元启发式方法相比, CP 优化器速度快, 能在几分钟内为数百个活动的项

目提供接近最优的解决方案。^[86]

喇海霞、段晓晨、牛衍亮运用问卷调查、专家论证等方式, 识别与提取影响高铁工程全生命周期成本的因素, 并从各参与方维度出发, 对识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 构建基于 ISM 的高铁工程全生命成本解释结构模型, 对识别的关键因素进行层次关系与作用机理的深入挖掘梳理, 提出高铁工程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重点及高铁全生命周期成本智能估算基础数据库建设建议。^[87]

毕华玲、卢福强、胡彦莉等设计了改进的英氏逆拍卖机制, 针对一对多的情况设计了新的拍卖协议; 针对工期和费用的多属性情况, 引入多属性效用理论解决, 设计了相应的效用增加函数。最后通过一个算例来演示所设计的拍卖机制对解决此类决策问题的作用。结果表明, 所设计机制能够以拍卖方式描述费用和工期管理流程; 找到了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最佳增量效用, 并且建议的拍卖协议是发包方和接包方获得双赢结果的机制。^[88]

(四) 金融工程

He M 等研究了资本约束的纵向股权跨国供应链的融资策略选择和合同条款设置问题。结果表明, 资产结构、税负差异和持股比例是选择融资策略和附加条款的关键。首先, 更高的供应链资产结构可以增加供应链成员的利润。其次, 发现了与税收差异相关的合同选择阈值。此外, 存在与税收相关的最佳持股比例, 这可以避免买方融资下的双重边际化, 并减少银行融资下的供应链损失。^[89]

Gao R 等研究在不确定金融环境下, 标的资产价格被视为不确定过程的亚洲彩虹期权的定价问题。在股票价格服从独立流过程驱动的不确定微分方程下, 推导了亚洲彩虹期权的定价公式; 设计了一些数值例子来计算这些期权的价格。^[90]

段洪波、魏熙以 2013—2017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考察了外部审计中存在的“人和地利”现象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抑或上市公司关键高管拥有政治背景, 是促使客户与审计师产生“人和”关系的重要因素; 利用依赖政治关联形成的“人和”关系进行共谋, 存在“地利”优势的事务所和审计师更容易为客户所选择。^[91]

张一、刘志东、张永超等以中国 A 股与 H

股交叉上市公司股票为样本,选择1分钟高频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统计套利交易者和动量交易者在两地市场广泛存在,且其交易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股票价格的形成机理,A股市场的交易者多是依据市场历史表现的动量交易者,H股市场中基于股价价差的统计套利交易者更为普遍。〔92〕

(五) 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研究

吴国英、闫建钢利用刺激—机体—响应理论,基于直播电商退换服务特点分析消费者预期后悔情绪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直播电商退换服务会提高消费者感知价值,消费者预期不行动后悔会刺激消费者追求更大的潜在收益。权力感会调节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能动导向,进而影响消费者退换行为。〔93〕

Wei J等研究了信息共享策略和最优销售模式选择。结果表明,对于给定的信息共享策略,生产成本较低时,制造商同时采用转售和代理模式;当生产成本较高时,制造商只采用转售模式。无论制造商的销售模式和平台商的信息共享策略如何,消费者对产品绿色水平的敏感度越高,渠道成员的利润、产品零售价格和绿色水平就越高。〔94〕

郭海玲、王海鸽、潘露露等构建短视频平台下电商产品信息展示对顾客融入行为的影响模型,采用问卷调研方式并运用Smart PL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短视频博主产品信息涉入度、信息内容价值性和契合度对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愉悦感和唤起感对用户的互动参与意愿和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用户互动参与意愿对购买意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95〕

栾新风、康凯、尹洁璇基于绿色产品制造商和平台商组成的供应链中,考虑产品绿色度,运用博弈理论建立不同决策模型,研究制造商引入电商平台渠道的条件、最优销售模式和产品绿色度。研究发现,制造商不引入电商平台渠道,只通过自建网络直销渠道销售绿色产品时,产品绿色度最低;代销模式下,产品绿色度最高,制造商的利润最大;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度敏感程度的增强会促使制造商提升产品绿色度,但绿色投资成本的增加会降低制造商生产绿色产品的积极性。〔96〕

白献阳、邝苗苗对政府部门数字信息资源质量和数据开放平台的政府开放数据质量进行调查,发现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存在时效性差和可用性不高等主要问题。设计并构建了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控制机制,包括战略支持机制、组织保障机制、流程控制机制和监督反馈机制。〔97〕

Wu X发现物联网和深度学习等技术促使医疗保健从面对面咨询发展到远程医疗。为保护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免受伤害,实时监测生理指标至关重要。在该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物联网实时健康监测系统,该系统可通过穿戴医疗设备来测量生命体征,并应用各种深度学习算法来提取有价值的信息。〔98〕

陈建凯、张寒蒙、王鑫为了解决学校现有财务系统间的交互不足、跨部门间的数据孤岛问题,提出基于一门式服务体系的“互联网+财务管理”系统的构建方案。以数据融合、业务融合为核心,搭建了财务网上服务大厅,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了多元化全方位创新服务。〔99〕

徐建民、申永平、吴树芳针对现有微博推荐中未考虑分层关系对兴趣影响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分层社交关系的微博推荐算法。实验表明,与经典的微博推荐方法比,该算法在准确率、召回率和MRR上均优于其他方法。实验结果显示,综合考虑潜在兴趣和显性兴趣能提高微博推荐效果。〔100〕

吴敏基于数字经济和大数据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研究了管理会计应如何发展。经过调研发现,人们对于管理会计学科的认识也产生了不同观点,一种声音认为会计将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另一种声音认为传统会计要向管理会计转型,但是有些只是在炒概念。因此,基于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结合经济技术大环境,给出管理会计面对新机遇的发展策略。〔101〕

支凤稳、云仲伦、张闪闪为改善传统科学数据共享模式中存在的个人隐私安全、数据产权归属、数据异构化等问题,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个人科学数据共享模式。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区块链技术 with SQL 数据库的优势,构建模式架构模型,并分析其流程、特点与实现技术。研究发现,该模式具有灵活性高、安全性强、可追溯、可信任等优势,能够促进个

人科学数据共享流通,进而更好地发挥科学数据的价值。^[102]

王莉莉、李小莉针对利用互联网开展的传统审计工作中突显的问题,尝试构建了囊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两个模块的区块链审计平台的逻辑框架,实现内外联动,利用区块链技术远程保障审计数据安全,扩充审计覆盖面,增加审计结果客观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将加快审计信息化建设,促进审计模式改革创新。^[103]

郭海玲、马红雨、朱嘉琪在深入分析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以及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概念模型。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一方面可为进一步提高跨境电商信息服务机构的信息服务质量 and 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帮助跨境电商信息服务机构分析与解决信息服务失衡问题。^[104]

李海洋、郭扬发现当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存在着管理理念滞后、管理手段单一、管理人才匮乏、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征的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水平影响着高校管理改革的进程,许多高校通过引入信息化技术,实现学生事务的高质量管理。^[105]

张敬伟、杜鑫、田志凯等以过程取向的效果逻辑理论为视角,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在创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研究发现,创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呈现多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效果逻辑主导价值主张的构建,因果逻辑主导活动系统的构建;价值可行性评估的结果决定决策逻辑的选择,进而影响后续商业模式的构建。^[106]

(六) 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

张一、刘志东、张永超等基于主体建模思想,构建了模拟真实市场交易的人工股票市场元模型。以我国沪深 300 指数实际数据为参照,采用 Any Logic 系统环境下优化算法对模型参数赋值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股票市值和波动率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且所有交易者总财富值在无风险利率改变的条件下差别不大,说明交易者的操作策略和行为偏好直接决定了其财富状况。^[107]

田鹏慧发现,目前高校内部的集体决策存在

一系列制度缺陷。为此,应该根据公办高校的性质确定集体决策的参与者,建立内外结合、决策与执行分离的治理结构,通过立法制定高校内部决策程序,通过对高校依法监管实现高校内部集体决策的法治化。^[108]

李子彪、张亚男、李晗从烙印理论视角出发,以 2008—2019 年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在实证分析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和产权性质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的调节作用后发现:CEO 的从政经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尤其是利用式创新投入;CEO 从政经历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心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分别起到缓解和加重的作用。^[109]

张晓飞、王豪、高常玲等从城乡绿色发展战略与企业协同发展趋势的现实背景出发,选取宜兴市多家环保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总结提炼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研究发现,环保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定位选择不同类型协同战略,不同模式下的企业协同系统可以在序参量役使作用下实现自组织演化。^[110]

任嵘嵘、齐佳丽、苏露阳发现各组织为应对持续挑战,尝试将大规模敏捷方法应用到自身业务中,以灵活、持续、快速地协调自身业务组件和资源。文章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敏捷治理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梳理,同时围绕敏捷治理的能力要素、内外部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当前的研究有系统的思考。^[111]

许楠、王洁、牛晓蒙等以 2013—2019 年沪深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的创新性、竞争性及冒险性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数,检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增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112]

(七) 平台企业研究

康凯、王旭阳、张敬针对用户与司机在单归属环境下网约车平台进行交易过程,构建两个网约车平台的博弈模型,研究网约车平台定价策略、市场竞争强度和平台成本对网约车平台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平台成本增加导致占优平台与劣势平台的

服务价格均提高,从而引致自身平台双边用户减少,竞争平台的双边用户数量增加,且对劣势平台的影响更大;劣势平台可以通过控制平台运营成本提高利润并实现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最大化。^[113]

王雪莲、高凯凯、李娜根据理论抽样原则,选取“喜马拉雅”平台的18个节目样本,利用爬虫技术抓取用户评价数据,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此发掘并构建在线知识付费节目的顾客体验价值维度体系。该研究为在线知识付费节目提升顾客体验价值提供了参考依据。^[114]

郑文、张喆、朱静宜针对平台排他性竞争问题,构建了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双边市场系统,对比平台交易量、市场集中度和累积资产,还原双边市场竞争涌现的排他性。仿真结果表明,消费者与销售者依赖度增加,形成平台累积优势,平台间竞争演化出现排他性。探究平台排他性竞争演化,对双边市场监管具有前瞻性论域价值。^[115]

郭海玲通过文献分析及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不同类型跨境电商平台典型代表进行信息服务现状分析,总结了跨境电商平台在实施信息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通过政府和社会团体进行总体统筹规划,建立规范统一管理制度;平台立足用户需求,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平台践行共生理念,注重人才培养等对策建议以保障跨境电商平台信息服务协同模式顺利实施。^[116]

张春玲、范默苒基于爬虫技术,获取我国跨境电商相关文献2457篇,通过对文献主题的词频排序,形成研究热点方向,运用时间和主题间的关系,聚类跨境电商的研究脉络。研究表明,跨境电商研究经历了“规范性文件制定→第三方支付技术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研究→变革商业模式”的演化进程。^[117]

田晨、卢静会、魏杰基于两个制造商通过不同的电商平台以转销或代销模式销售互补产品的供应链,研究了制造商的销售模式选择和平台商的物流服务决策。研究发现,若平台商提供物流服务,则制造商倾向于采用代销模式在平台上销售产品;若平台商不提供物流服务,则制造商倾向于采用转销模式在平台上销售产品。^[118]

魏杰、常美静针对由单个多渠道零售商和单个平台商组成的供应链,以及电商平台的代理和转售两种销售模式,研究供应链成员在转售模式下的最优定价顺序,以及销售模式对供应链成员的影响。研究表明,转售模式下,供应链成员都在自己先制定零售价格时获得最高收益;当佣金费率高于中等水平但不是很大或消费者的交叉价格敏感性足够大时,供应链成员都倾向于选择代理模式,否则,他们倾向的销售模式并不相同。^[119]

章颖笛针对医疗物资相对紧张以及各大电商平台口罩一度断货的情况,从电商平台供应链的视角,通过对绝大多数平台口罩供应渠道的分析,以及国家政策、市场需求、民众的应激行为对口罩供应的影响,阐述此次疫情中“口罩难求”现象出现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相应思考与建议。^[120]

尽管2021年河北省管理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河北省在管理科学的研究上还存在若干问题。第一,高水平期刊发文量较少,虽然2021年河北省关于管理科学研究方面的发文量较多,但发表在管理类顶级期刊的论文数量较少;第二,不同研究方向上的论文数量分布不均,评价理论与方法、复杂性与复杂系统等研究方向拥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工程与项目管理等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成果较少。

(魏杰: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陈立文: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胡悦,李雪燕,马静.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以河北省流动人口为例[J].管理现代化,2021,41(2):77-81.
- [2]任嵘嵘,王波,卢福强,李伟鑫.风险厌恶下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选择的拍卖机制[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2(6):900-907+912.
- [3]洪传春,刘某承,张雅静,吴灵琦.时空视角下京津冀农业灰水足迹强度与效率分析[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21,44(2):128-135.
- [4]崔和瑞,朱晓宏,赵巧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度空间特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37(13):144-147.
- [5]王士心,袁中美.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债务影响的时空异质效应[J].管理现代化,2021,41(6):4-8.

- [6] 刘霞,封静娴,刘畅.京津冀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实证研究[J].商业会计,2021(23):36-41.
- [7] Wang L, Wang Z, Wang X, Zhao Y. Explaining consumer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in mobile shopping with SEM and fsQCA: Roles of visual and technical perceptions [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21, 49: 101080.
- [8] Kang K, Wang M, Luan X. Decision-making and coordination with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fairness concern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ly chain [J].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21, 152: 107058.
- [9] Zhao M, Shen X, Liao H, Cai M. Selecting products through text reviews: An MCDM method incorporating personalized heuristic judgments in the prospect theory [J]. Fuzzy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2021, 21(1): 21-44.
- [10] 赵萌,潘睿莹,肖锐铭.基于三维信任网络的联合风险投资多属性群决策模型[J].管理评论,2021,33(6):98-110.
- [11] 赵萌,李子超,高美,沈哲.基于 Louvain 方法的社会网络大群体决策交互共识模型[J].管理工程学报,2021,35(4):152-161.
- [12] 赵萌,张晨曦,秦金磊,张冰.基于实验设计的概率语言权重信息多准则决策方法[J].运筹与管理,2021,30(1):50-56.
- [13] Zhao M, Wang X, Xu Z, Lin M. A PL-MCDM method based on the decision-making reliability of multi-group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requiring downward referral [J]. Applied Intelligence, 2021, 52(3): 2655-2670.
- [14] Zhang C, Zhao M, Zhao L, Yuan Q. A consensus model for large-scale group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trust relationship considering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non-cooperative behaviors [J].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 2021, 30(3): 553-586.
- [15] 吴晓丹,张晓亚,岳殿民,Chu C.基于医保支付方式的基层医疗服务签约策略[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41(10):2548-2560.
- [16] 杜命刚,韩同银,尚艳亮.考虑多种因素的铁路工程物资供应企业最优决策仿真研究[J].铁道学报,2021,43(12):138-144.
- [17] 宋万杰,尹德斌,宗成华.京津冀城市群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环境评价与核心约束[J].商业经济研究,2021(20):29-33.
- [18] 张慧明,赫连志巍,孟庆洪,赵芹沅,藏佳杰.转型导向的制造企业技术能力评价[J].中国科技论坛,2021(7):125-136.
- [19] 赵向阁,刘妮雅.商业模式构建对新创电商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J].商业经济研究,2021(18):122-125.
- [20] 王明吉,刘方舟.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小额贷款公司绩效考核体系研究[J].现代商业,2021(22):144-147.
- [21] Liu Z, Liu M. Quality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ased on projection pursuit model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79: 123679.
- [22] 王韶华,刘晔,何美璇,张伟,赵陽春.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测度——差异性、相关性与协调性[J].华东经济管理,2021,35(4):71-81.
- [23] Yang X, Jia Z, Yang Z, Yuan X.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 on carbon emissions from various sectors in china—a spatial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301: 126949.
- [24] 王杨.内外双循环背景下服务业发展与扩大内需双向互动机制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1(2):175-178.
- [25] 作风清,谢婷婷,刘婷.基于组合评价方法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有效供给能力评价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2(2):81-89.
- [26] 刘晓静,刘艳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托幼服务现状、议题及思考[J].中国软科学,2021(S1):376-386.
- [27] 吕荣杰,杨蕾,张义明.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 PVAR 模型分析[J].管理现代化,2021,41(1):26-31.
- [28] 刘晓静,罗椅民.深度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适老辅具技术:应用、适配评估与发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1(2):57-64.
- [29] 许秀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社保制度统筹发展的困境及对策[J].农业经济,2021(2):111-113.
- [30] 赵立三,周雯珺.收益率宽幅是高技术产业房地产化的原因吗? [J].会计之友,2021(11):18-22.
- [31] 范晓倩,于斌.绩效压力如何促进员工创造力——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23(2):108-120.
- [32] 曲京山,张晶,孟宪宝,刘海英.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双一流”高校绩效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会计之友,2021(9):125-131.
- [33] 段洪波,刘金辉.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 J 县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2):66-78.
- [34] 王莉莉,乔微.脱贫成效第三方机构评估中的问题及其机制优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3):131-139.
- [35] 杨桂花,王莹娟.政策落实跟踪绩效审计的目标及审计路径——基于对审计署审计公告的分析与思考[J].财会通讯,2021(1):135-138.
- [36] 李占雷,李学森,陈立,李伶敏.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违约风险传染研究[J].会计之友,2021(11):68-76.
- [37] 张丽君.区块链信息技术、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内部审计增值[J].财会通讯,2021(9):72-76.

- [38] 孙丽文, 李少帅. 基于伦理嵌入的人工智能新型风险治理体系建构及治理路径解析[J]. 当代经济管理, 2021, 43(7): 22-28.
- [39] 宋波. 饲料企业人力资源外包的风险防范与有效实施路径[J]. 中国饲料, 2021(23): 143-146.
- [40] 朱清香. 新发展格局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优化研究[J]. 会计之友, 2021(9): 2-9.
- [41] 王燕, 刘邦凡, 郭立宏. 基于 SEEA-2012 我国绿色 GDP 核算体系构建及时空格局分析[J]. 生态经济, 2021, 37(9): 136-145.
- [42] Li Y, Saeed S. Energy consump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exuses in Malaysian [J]. Energy, 2021, 232(1): 121040.
- [43] 张双才, 尹庆伟. 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11): 156-160.
- [44] 耿立校, 刘丽莎, 李恒昱.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驱动的股票指数预测研究[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21, 57(20): 142-149.
- [45] 刘达, 刘雨萌, 许晓敏. 基于 Copula 函数特征筛选的电力物资供应商投标价格预测[J]. 技术经济, 2021, 40(10): 1-9.
- [46] 段晓晨, 钱睿, 孟楠. 隧道工程运维成本 PSO、BPNN、BIM 控制方法研究[J]. 铁道工程学报, 2021, 38(7): 100-105.
- [47] 耿立艳, 胡瑞, 张占福. 基于 EGA 模型的城际高铁客流量预测[J]. 中国市场, 2021(4): 26-28.
- [48] 吴晓坤, 雒水稷, 苏雯, 高建伟. 中国人口 CBD 死亡率模型的参数再调整[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23): 41-44.
- [49] 段晓晨, 孟春成, 施振东, 吴曼茜. 地铁车站建设投资智能预测与控制方法研究[J]. 铁道工程学报, 2021, 38(9): 106-111.
- [50] 魏明坤. 基于 h 指数修正的学者历时影响力研究[J]. 现代情报, 2021, 41(1): 152-157.
- [51] 刘立波, 张连春, 刘洋, 王飞, 王智莉. 多元理性假设下农产品封闭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控制意愿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2): 103-107.
- [52] Wu X, Li R, Chu C, Amoasi R, Liu S. Managing pharmaceuticals delivery service using a hybrid particle swarm intelligence approach [J].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21, 308: 653-684.
- [53] Guo L, Hu X, Lu J, Ma L. Effects of customer trust on engagement in live streaming commerce: mediating role of swift guanxi [J]. Internet Research, 2021, 31(5): 1718-1744.
- [54] Li X, He Y, Peng Q, Liu W. A computer-aided approach for acquisition and importance ranking of customer requirements from the online comment mining [J].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2021, 19(1): 132-151.
- [55] 胡悦, 马静, 李雪燕, 陈国鹰. 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21, 43(2): 206-236.
- [56] 孙丽文, 李少帅. 人工智能赋能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模糊定性比较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23): 11-19.
- [57] 苏佳, 夏雨. 大规模 MIMO 系统中范数双向选择算法[J].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21, 42(11): 3107-3113.
- [58] 李盼盼, 董志良, 武天娇. 国际原油期货对中国新能源股指影响: 从多项式拟合到复杂网络[J]. 系统科学与数学, 2021, 41(5): 1355-1368.
- [59] 杨凡. 复杂风险环境下基层网格治理韧性的强化路径探析[J]. 领导科学, 2021(4): 36-39.
- [60] 陈婷, 侯文华, 薛克雷. 基于消费者效用模型的可穿戴产品网络零售模式比较[J]. 系统管理学报, 2021, 30(2): 318-331.
- [61] 陈兰杰, 闻航. 基于区块链的开放政府数据个人隐私保护模型及实现机理研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1(1): 67-72.
- [62] 支凤稳, 张萌, 赵梦凡, 李善青. 双路径视角下科学数据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1, 11(6): 40-50.
- [63] 张英英, 夏一, 杜纲. 产品族配置与考虑升级的再制造设计主从关联优化[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2021, 27(7): 2053-2064.
- [64] 张旭, 袁旭梅, 降亚迪. 需求与碳交易价格不确定下多式联运路径优化[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 41(10): 2609-2620.
- [65] 王石磊, 王飞, 彭新敏. 深陷“盘丝洞”: 网络关系嵌入过度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J]. 科研管理, 2021, 42(5): 116-123.
- [66] 方巍, 林汉川. 社会技术创新对中国海外工业园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 35(12): 62-75.
- [67] 李胜连, 张丽颖, 李润亚. 金融科技创新、可行能力结构与农户持续增收——基于 665 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检验[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1(5): 42-49.
- [68] 刘琳, 王玖河. 基于知识结构的顾客知识共享激励机制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1, 29(8): 241-248.
- [69] 李恩极, 李群. 地方政府创新竞争与企业创新[J]. 当代财经, 2021(4): 16-27.
- [70] 李涛, 沈晶, 宋沂邈, 伊力奇. CEO 个人特征、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高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J]. 会计之友, 2021(19): 27-34.
- [71] 刘琳, 王玖河. 基于超网络模型的顾客参与知识共享研究[J]. 科研管理, 2021, 42(7): 147-155.
- [72] 李慢, 张跃先. 网络服务场景对顾客契合的作用机理: 一个非递归模型[J]. 财贸研究, 2021, 32(3): 98-109.
- [73] Yin S, Bai L, Zhang R. Prevention schemes for future fresh

- agri-products (FAPs) supply chain: mathematical model and experience of guaranteeing the supply of FAP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1, 101(15): 6368-6383.
- [74] 侯玉梅, 郑迪文, 孔乐佳, 沈梦思, 高晓娜. 消费者策略行为下全渠道服务区域及定价的优化研究[J]. *工业工程*, 2021, 24(5): 55-62.
- [75] 代建生, 陈瑞佳. 资金约束下损失规避零售商的订购和广告协同策略[J]. *中国管理科学*, 2021, 29(8): 81-93.
- [76] 黄春萍, 王志文, 章静敏, 曾珍香, 李香. 不确定环境下品牌联盟组织间协作模式选择的计算实验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1, 29(6): 189-201.
- [77] 刁心薇, 曾珍香, 孙丞. 混合碳政策下两产品供应链的协同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1, 29(2): 149-159.
- [78] 赵斐, 康建设, 王雷震, 张新辉, 张建. 考虑非周期检测的视情维修与备件订购联合策略优化[J]. *运筹与管理*, 2021, 30(9): 31-37.
- [79] 王韶华, 何美璇, 张伟, 刘晔. 供给侧要素对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的异质性影响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 2021(3): 8-18.
- [80] 吕荣杰, 徐梦瑶, 杨蕾. 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J]. *金融与经济*, 2021(7): 63-71.
- [81] 孙颖, 张佩佩, 陈思霞. 工业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治理关系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4): 161-164+171.
- [82] 崔和瑞, 王浩然, 赵巧芝.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3): 117-120.
- [83] 王韶华, 刘晔, 张伟, 何美璇. 基于粗糙集与未确知模型的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差异性与协调性分析[J]. *运筹与管理*, 2021, 30(5): 200-207.
- [84] 陈立文, 王静, 赵士雯. 双重价值视角下绿色建筑认证对居民住房租赁意愿的影响研究[J]. *建筑经济*, 2021, 42(1): 116-120.
- [85] Li Y, Lu S.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passenger traffic structure based on multi-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a case study of Beijing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1, 28(8): 10192-10206.
- [86] Kong F, Dou D. Resource-constrained project scheduling problem under multiple time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21, 147(2): 04020170.
- [87] 喇海霞, 段晓晨, 牛衍亮. 基于 ISM 的高铁工程全生命周期成本影响因素研究[J]. *建筑经济*, 2021, 42(8): 57-61.
- [88] 毕华玲, 卢福强, 胡彦莉, 黄敏. IT 服务外包项目工期与费用控制的多属性英氏逆拍卖机制[J]. *管理工程学报*, 2021, 35(2): 155-166.
- [89] He M, Kang K, Mu X. Impact of tax difference and asset structure on a capital-constrained vertical equity holding transnational supply chain [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80/00207543.2021.1926571>.
- [90] Gao R, Wu W, Liu J. Asian rainbow option pricing formulas of uncertain stock model [J]. *Soft Computing*, 2021, 25(14): 8849-8873.
- [91] 段洪波, 魏熙. 审计中的“人和地利”: 政治背景, 私人关系与地缘偏好[J]. *财会通讯*, 2021, 871(8): 34-39.
- [92] 张一, 刘志东, 张永超, 李喆. 异质交易行为对市场价格发现能力的动态影响[J]. *管理科学*, 2021, 34(3): 148-162.
- [93] 吴国英, 闫建钢. “趋利”还是“避害”? ——直播电商退换货服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1, 41(12): 65-77.
- [94] Wei J, Wang Y, Lu J.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ales patterns choice in a supply chain with product's greening improvemen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78: 123704.
- [95] 郭海玲, 王海鸽, 潘露露, 常青. 短视频电商信息展示对顾客融入行为的影响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9): 155-158.
- [96] 栾新风, 康凯, 尹洁璇. 考虑产品绿色度的制造商销售模式选择研究 [J/OL].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27.TP.20211012.1410.002.html>.
- [97] 白献阳, 邝苗苗. 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控制机制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7): 71-78.
- [98] Wu X, Liu C, Wang L, Bilal M. Internet of things-enabled real-time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using deep learning [J/OL].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https://doi.org/10.1007/s00521-021-06440-6>.
- [99] 陈建凯, 张寒蒙, 王鑫. “互联网+”下高校财务一门式服务系统的建设与实践[J].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21, 38(6): 14-17.
- [100] 徐建民, 申永平, 吴树芳. 基于分层社交关系的微博推荐算法[J].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21, 38(12): 3597-3603+3610.
- [101] 吴敏. 大数据背景下管理会计应对新机遇的路径[J]. *财会学习*, 2021(20): 70-72.
- [102] 支凤稳, 云仲伦, 张闪闪. 基于区块链的个人科学数据共享模式研究[J]. *现代情报*, 2021, 41(12): 69-78.
- [103] 王莉莉, 李小莉. 数字经济下区块链技术与审计工作的融合[J]. *会计之友*, 2021(21): 152-157.
- [104] 郭海玲, 马红雨, 朱嘉琪. 跨境电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与概念模型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19): 92-95.

- [105]李海洋,郭扬.信息化时代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析——评《高校学生事务信息化管理研究》[J].中国科技论文,2021,16(12):1383.
- [106]张敬伟,杜鑫,田志凯,李志刚.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在商业模式构建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基于互联网创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4):27-40.
- [107]张一,刘志东,张永超,李喆.基于元模型的异质交易行为主体下股票市场微观结构仿真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21,35(1):92-103.
- [108]田鹏慧.高校内部的集体决策:制度缺陷及其矫正[J].现代教育管理,2021(4):23-30.
- [109]李子彪,张亚男,李晗.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烙印理论的实证研究[J].领导科学,2021(20):75-79.
- [110]张晓飞,王豪,高常玲,李佳敏.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21,14(6):573-587.
- [111]任嵘嵘,齐佳丽,苏露阳.敏捷治理:一个新的管理变革——研究述评与展望[J].技术经济,2021,40(8):133-144.
- [112]许楠,王洁,牛晓蒙,王立岩,谢姝琳.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企业家精神与非效率投资——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财会通讯,2021(22):32-36.
- [113]康凯,王旭阳,张敬.分享经济下竞争市场双边网约车平台定价策略[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1,57(13):227-232.
- [114]王雪莲,高凯凯,李娜.在线知识付费节目的顾客体验价值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方法对“喜马拉雅”平台数据的发掘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6):141-144.
- [115]郑文,张喆,朱静宜.双平台市场排他性竞争仿真[J/OL].系统仿真学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092.V.20210826.1857.019.html.
- [116]郭海玲.跨境电商平台信息服务协同模式构建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21(7):139-147.
- [117]张春玲,范默苒.跨境电商研究热点及演化脉络解析[J].财会月刊,2021(6):113-118.
- [118]田晨,卢静会,魏杰.基于电商平台的互补产品物流服务和销售模式选择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21,26(2):188-195.
- [119]魏杰,常美静.基于电商平台的定价顺序和销售模式选择[J].系统工程,2021,39(1):94-100.
- [120]章颖笛.电商平台产品供应链发展探究——基于新冠疫情中“口罩难求”现象的思考[J].中国市场,2021(2):188-189.

工商管理研究

王冬年

一、2021年工商管理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河北工商管理研究成果与往年相比,外文期刊发文数量、学术专著数量都有所增加;同时,作者呈现出团队研究、高校间(跨省)合作研究的特征。有的学者对国企战略变革、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数据资产与科技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供应链管理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直播电商退换货服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基于知识结构的顾客知识共享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知识产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上级监督对企业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我国养老服务劳动力供给的宏观影响因素,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体验价值

视角下红色旅游游客公民行为影响机制,中国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二、企业管理

(一) 战略管理

企业要发展,战略必先行。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应从实际出发,对企业的未来做出总体运筹和谋划,制定并实施企业的发展战略。2021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国企战略变革、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等展开了研究。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实际控制人获取董事会席位后倾向于“因循守旧”还是“思变求新”尚未可知。李春玲等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选取2007—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考察对象,深入研究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对国企战略变革的影响及其具体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当非实际控制

人获得董事会权力后,确实能够显著提升国企的战略变革程度,并且,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果通过其制衡效应而非协同效应发挥作用,说明制衡效应是非实际控制人影响战略行为的主要路径,进一步分析表明,仅当非实际控制人的性质为民营或国企受地方政府控制时,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对国企战略变革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推出后,在战略性行业的国企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战略变革显著正相关,产生了明显的政策效应。^[1]

基于上市家族企业 2011—2018 年数据,于树江等人分析了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将社会情感财富分为家族控制、情感依恋、政商关系以及代际传承意愿等四个维度。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社会情感财富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不同,家族控制和情感依恋对战略变革起阻碍作用。相反,政商关系和代际传承意愿对战略变革起促进作用。同时,制度环境能够增强政商关系及代际传承意愿对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2]

选择合适的协作模式是联盟企业在动态环境中稳定发展的关键。黄春萍等人开创性地根据复杂性、动态性和敌对性三个维度将环境不确定性细化为八种状态,探究在八种不同环境状态下,开发式协作模式与探索式协作模式的最优选择和科技型企业与制造型企业的适用情况。基于 NK 模型并将其适应度函数优化后仿真,研究结果表明:(1)开发式协作模式与探索式协作模式在八种不同环境状态下均存在局部最优现象;(2)面对资源丰富且动荡的外部环境时,科技型企业应选择探索式协作模式,相反则应选择开发式协作模式;面对资源丰富且稳定的外部环境时,制造型企业应选择探索式协作模式,相反则应选择开发式协作模式。^[3]

张晓飞等人从城乡绿色发展战略与企业协同发展趋势的现实背景出发,根据理论抽样原则选取“中国环保之乡”江苏省宜兴市的 9 家环保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总结提炼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研究发现,环保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定位选择不同类型协同战略,主要呈现为共识企业集群、互补契约联盟、资本纽带联盟、企业赋能平台、互联生态平台 5

种典型模式,不同模式下的企业协同系统可以在序参量役使作用下实现自组织演化。^[4]

(二) 经营管理

新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经营管理会遇到新问题。2021 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入、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家精神与非效率投资等展开了研究。

孙颖等人利用 2010—2019 年我国 201 家科技服务企业的面板数据,在测度企业数据资产及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同时以“宽带中国”战略的应用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这一战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促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逐渐增强且趋于平稳的趋势;数据资产显著促进了科技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变换分析方法及调整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产权性质异质性,东部城市民营企业的数据资产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5]

为了探讨供应链管理与数字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翟伟峰等人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四个行业 544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法测量企业数字化投入水平,研究供应链国际化程度、供应链上游供应商集中度、供应链下游客户集中度,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管理对企业数字化投入存在显著影响,供应链特征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不是单向的,既有可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有可能阻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即供应链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数字化投入越多;与此相反,供应链上游供应商集中度和下游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投入越少。制造业企业采取与数字化转型战略一致的行动说明,我国上市制造业公司正在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提高竞争力。企业应根据所在行业和本企业供应链的特点,选择适度的数字化水平,找到本企业数字化程度高或者低的原因,及时调整数字化投资策略,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6]

陈俊龙等人在明确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属性特征和内容构成的基础上,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治理模式与高效运行机制。研究表明,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主体多元性、多重关系性、治理复杂性和内容扩展性的属性特征;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在治理主体、权力向度、实现方式等方面具有内在契合性;政府、平台型企业、社会公众、公共媒体、基层党组织和第三部门等主体应被纳入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多元治理体系中;治理目标一致、主体间有机协调、良好的运行环境和制度设计是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保障。^[7]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服务型企业处于快速变革的外部环境中,在不断迭代的突破性技术赋能驱动下,构筑服务生态系统的新型组织模式,以在系统动态演化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高素英等人以拾互动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为典型案例,剖析迭代技术赋能于企业服务生态系统,驱动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系统演化的内在机理。结果发现,第一,不断迭代的技术是企业实施创新战略的关键推动因素,赋能驱动企业服务生态系统能力提升。第二,企业服务生态系统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内发生层内互动及跨层交互,形成行动者及资源等创新系统组件有机耦合的服务生态系统互动结构,这种多层次结构是行动者进行资源整合及服务交换的基础。第三,服务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在技术赋能机制、系统学习机制及系统嵌入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当下阶段突破性技术的赋能及前一阶段系统涌现的价值共创行为,驱动服务生态系统向下一阶段动态迭代并持续演化,实现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的协同共生。^[8]

董香兰等人以高管激励为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调节变量,以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可以有效履行其监督职能;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股权越大,分类转移盈余程度越低,但削弱了控股股东

委派董事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正向监督效应。^[9]

基于失败学习理论,唐朝永等人引入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失败学习影响企业绩效的多路径模型,探索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驱动路径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分别在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在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驱动过程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战略柔性能够强化资源拼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10]

石善冲等人将制度环境与国有企业股权特征紧密结合并将其引入企业成本管理研究领域,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第二类代理问题角度考察了政府干预对企业成本黏性的影响,并基于企业实际控制人行政级别差异对上述影响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政府干预通过赋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对企业成本黏性产生显著的强化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中央国企,政府干预对成本黏性的影响作用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显著。^[11]

许楠等人以2013—201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的创新性、竞争性及冒险性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数,实证检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增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12]

(三) 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公司的线下业务转到线上,对人们的消费方式有很大影响。2021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网红直播带货营销机制、商业模式的创新、顾客参与知识共享、网络服务场景对顾客契合的作用机理、短视频电商信息展示对顾客融入行为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网络直播带货成为市场发展的新风口,然而直播带货退换货屡创新高,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严重影响。吴国英等人利用刺激—机体—响应理论(SOR理论),基于直播电商退换货服务特点分析消费者预期后悔情绪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直播电商退换货服务会提高消费者感知价

值,消费者预期不行动后悔会刺激消费者追求更大的潜在收益,从而增强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权力感会调节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能导向,进而影响消费者退换行为。^[13]

李杰等人合著的《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消费者认知与行为研究》一书,用实证方法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认知与冲动购买、电商购物节购买、在线评论和消费者投诉等行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上述行为背后的消费者价值观及个人特征的影响作用。针对粉丝情感与互动行为这一社会化商务的核心问题,从自媒体平台收集大量粉丝评论和互动数据,分析挖掘社会化商务环境下粉丝构成特征、互动行为和粉丝情感演化规律。^[14]

王凤飞著的《中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研究》一书,基于宏观经济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两种模式的协同发展问题。通过考察中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寻求并论证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协同发展的耦合度以及影响协同发展的显著性因素,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了仿真模拟和预测,着力从制度环境、保障体系、运行管理等方面厘清两者协同发展的架构设计和实践路径。^[15]

知识共享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和源泉,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共享经济”时代,顾客的参与为企业的知识共享注入了新鲜血液。刘琳等人结合超网络理论建立了包含知识子网络、顾客子网络和企业组织子网络的顾客与企业间的知识共享超网络模型,从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整合阶段、创新阶段和维护阶段对顾客参与知识共享的过程进行分析,并运用 NETLOGO 软件对顾客与企业间的知识共享进程进行仿真分析。实验结果表明:(1)共享能力、创新能力和顾客忠诚度的提升能够加快企业的知识创新进程,其中创新能力对企业知识创新速度的影响最为显著;(2)共享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加系统知识总量;(3)顾客忠诚度的提升对共享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间接的促进作用。^[16]

刘琳等人从知识结构的视角构建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顾客知识共享激励机制模型,创新性地分析了在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共享知识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比例的变化

对顾客知识共享努力水平及收益分配系数的影响,并运用 MATLAB 软件对该模型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顾客的努力水平与共享知识的组成结构有关,且当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比例均为 0.5 时努力水平达到最大值;(2)当知识组成结构相同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努力水平低于信息对称情况下的努力水平;(3)收益分配系数与共享知识的组成结构有关,且当隐性知识比例为 1 时收益分配系数达到最大值;(4)收益共享比例与风险规避程度成反比。^[17]

王雪莲等人根据理论抽样原则,选取“喜马拉雅”平台的 18 个节目样本,利用爬虫技术抓取用户评价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掘并构建在线知识付费节目的顾客体验价值维度体系。研究发现,匹配价值、成长价值、心灵价值和互动价值,是顾客在购买与使用在线知识付费节目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体验价值;节目的数字化属性与功能带来的便利价值与互动价值反映了顾客获得的独特数字体验;头部知识节目、专业 KOL 知识节目与长尾知识节目三类节目的顾客体验价值在不同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18]

张敬伟等人以过程取向的效果逻辑理论为视角,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在创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研究发现,创业企业商业模式构建呈现多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效果逻辑主导价值主张的构建,因果逻辑主导活动系统的构建;构建前期呈现阶段性的迭代过程,且各阶段均起始于由效果逻辑主导提出新价值主张,随即转向由因果逻辑主导构建活动系统,后期阶段均由因果逻辑主导活动系统构建以实现既定价值主张;阶段性的商业模式可行性(包括价值可行性和架构可行性)评估,特别是价值可行性评估的结果决定决策逻辑的选择,进而影响后续商业模式的构建。^[19]

商业模式创新是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郑浩等人针对钢铁企业的行业特点,构建了适用于钢铁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系统,并利用熵值法、时间序列数据和耦合度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钢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系统耦合的空间差异。研究发现,钢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系统的价值创造子系统、价值传递子系统和价值获取子系统之间存在耦合关系,但不同区域的钢铁企业商业模

式创新系统核心要素差异性较大,其中,华南、华东、华中地区的钢铁企业应持续加大研发和创新,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钢铁企业应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钢铁企业需重点关注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20]

杨志勇等人以抖音短视频平台用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本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层次回归技术对网络中心性与用户平台契合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讨论了平台信息质量(体验性和满足性)和用户自我建构扮演的调节角色。结果表明,当用户具有适度中心性时,表现出更多的平台契合行为,然而当网络中心性过高时,却显著降低了其契合行为。另外,信息体验性、信息满足性显著强化了两者的倒U形关系,而独立型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1]

顾客融入可以提升其对企业或品牌的黏性。郭海玲等人利用S-O-R模型,构建短视频平台下电商产品信息展示对顾客融入行为的影响模型,采用问卷调研方式并运用SMART PL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短视频博主产品信息涉入度、信息内容价值性和契合度对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愉悦感和唤起感对用户的互动参与意愿和购买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用户互动参与意愿对购买意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短视频平台中商家在进行信息展示时要重视博主产品涉入度、提升信息内容价值和内容与情景的契合度,进而促进用户的互动参与,提升其购买意愿。^[22]

沈占波等人指出,受益于数字化技术和服务的创新发展,国内各类直播App与直播门户网站随之兴起,网红直播带货营销也应运而生。基于品牌价值共创视角,研究了网红直播带货营销机制,认为网红直播带货营销是消费者参与下的多品牌价值共创互动行为,是对消费者品牌体验价值的重塑。消费者主要与网红个人品牌、待售产品(服务)品牌、直播平台品牌展开价值共创,其中网红个人品牌发挥着品牌价值纽带作用,将各方有效链接,信息流与物流则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消费者品牌偏好决定了各方在网红直播带货营销中的品牌价值共创路径。消费者偏好网红个人品牌时,应以直播内容营销为核心,重视消费者情感体验;消费者偏好待售产品品牌

时,应以品牌社群营销为核心,重视消费者产品体验;消费者偏好带货平台品牌时,以品牌电商营销为核心,重视消费者购物体验。^[23]

网络服务场景是在线顾客和企业交互的第一线,也是网络商店吸引顾客和保留顾客的重要营销手段。从顾客信任的视角,李慢等人构建非递归模型揭示网络服务场景对顾客契合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实验法收集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服务场景中的审美诉求、功能布局 and 财务安全因素均有助于促进顾客契合和网络信任,但是审美诉求对顾客契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其主要通过网络信任间接作用于顾客契合;网络服务场景因素刺激下的顾客契合和网络信任之间呈非递归关系;顾客经验对网络服务场景和顾客契合,以及网络服务场景和网络信任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24]

为了了解免费赠品促销本质,张跃先等人以利益一致性框架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影响顾客欣喜的作用模型,刻画了感知不确定性和顾客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不送免费赠品相比,免费赠品促销能够显著增强顾客欣喜;享乐型产品提供享乐型赠品比实用型赠品更能增强顾客欣喜,实用型产品提供享乐型赠品和实用型赠品在驱动顾客欣喜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且顾客类型和感知不确定性显著调节享乐型产品—赠品组合利益与顾客欣喜之间的关系。^[25]

在损失规避下,代建生等人探讨了零售商的订购和广告协同决策问题。零售商的初始资金状态存在三种情形:资金充足、资金相对短缺(不需融资)、资金短缺(对外融资),分别在三种情形下刻画了零售商的最优运营策略,结果表明:零售商用于商品采购和广告的资金产生的边际效用与边际负效用之比相等,且介于1与单位融资资金的使用成本之间;用于两项活动的最后一单位资金产生的边际效用相等。探讨了损失规避、初始资金、融资利率、商品价格及广告促销的敏感性对运营策略的影响:在资金充足或资金短缺下,商品订购量和广告强度随影响因素的变动方向通常相同;在资金相对短缺下,商品订购量和广告强度随影响因素的变动方向则相反。^[26]

(四) 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

2021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河北上市公司

治理、区块链信息技术与内部审计增值、股票回购能否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公司治理水平是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体现,完善公司治理是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企业规范化经营的内在要求,是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石晓飞等人合著的《河北上市公司治理研究报告(2021)》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河北上市公司总体发展报告呈现了河北上市公司发展脉络,总结了河北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发展现状,并提出河北上市公司治理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通过将河北上市公司与全国上市公司对比、不同板块之间河北上市公司的对比,分别从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高管治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六个重要的公司治理维度,全面系统地剖析了河北上市公司治理各维度指标的现状。^[27]

张丽君选择 2013—2018 年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区块链信息技术下管理层风险偏好在企业内部审计增值中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管理层风险偏好能对内部审计增值产生显著倒逼效应,两者显著正相关;区块链信息技术的应用能正向促进内部审计的增值,两者显著正相关;区块链信息技术显著增强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部审计增值相关性。^[28]

李炜以 2013—2017 年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战略差异和客户集中度在审计收费中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审计收费就越高,即客户集中度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战略差异越高审计收费就越高,即战略差异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战略差异显著削弱了客户集中度与审计收费之间的相关性。^[29]

宣杰等人以 2016—2019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熵值法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现金股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越高越有助于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可以通过影响现金股利政策来提高企业绩效。^[30]

疫情之下的资本市场恐慌情绪蔓延,不少上市公司为修复估值而跟风回购股票,然而实施股票回购是否利好市值管理,尚存在较大争议。陈晶璞等人以我国 2016—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崩盘风险视角考察了公司股票回购的市场效应。研究发现,公司回购股票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并且回购频次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票回购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存在股权质押、高成长性的公司股票回购更能够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31]

股权质押爆仓事件频发,对资本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逐渐引起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的重视。王培辉等人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在厘清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交易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这种影响因上市公司产权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更显著。还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各利益主体解读信息的难度加大,控股股东实施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2]

三、技术经济及管理

2021 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碳排放规制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失败学习对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王智新等人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企业数据,考量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样本来看,我国营商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内在机制来看,营商环境改善通过国际贸易变动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我国应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不断完善产权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营造更加公开透明快捷高效的营商环境。^[33]

徐珊珊等人指出,在开放式创新范式下,基

于排他逻辑的知识产权与基于合作共享逻辑的创新开放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冲突和现实悖论。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无法清晰解释开放创新范式下知识产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 306 家样本企业有效调研数据,根据开放式创新范式下创新要素双向流动的属性特征,实证检验了开放创新环境下知识产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资产组合规模对外部技术获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技术外部商业化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知识产权资产组合质量对外部技术获取程度和技术外部商业化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部技术获取程度与技术外部商业化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式创新在知识产权资产组合规模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知识产权资产组合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4]

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孟维福等人从技术创新的内生和外延两种视角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 2011—2018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不仅有助于企业通过内生方式获取创新水平的提升,还有利于企业投资的多样化与便利化,进而帮助其通过外延的方式获取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的内生式创新效应更为明显,相反,在国有企业及大规模企业中的外延式创新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所带来的融资约束和财务状况的缓解,在其助力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5]

王雅洁等人基于 2008—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对省际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路径。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对省际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全要素创新效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有显著提升作用,创新开放广度具有全部中介效应,创新开放深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互联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升东部工业企业全要素创新效率,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提升中西部工业企业全要素创新效率。并且,创新开放广度、创新开放深度的中介效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区域

差异性。^[36]

李媛媛等人利用中国创业板 2010—2019 年科技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科技型企业不同阶段科技金融网络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网络密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 U 形影响,网络联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有 U 形影响。(2)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网络密度的促进作用在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同时存在;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倒 U 形影响和网络联系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U 形影响仅在成熟期与衰退期显著存在。^[37]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技术创新逐渐成为新的官员晋升标尺,地方政府的竞争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并通过“有形之手”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李恩极等人基于 2007—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存在策略互补型竞争,且竞争在 2013—2018 年、主官处于第二任期、东部地区的样本中更加明显。这表明,创新竞争已成为地方政府之间新的竞争模式。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创新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这种激励作用随着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弱的倒 U 形特征。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围绕科技创新展开竞争会提高企业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改善企业创新环境,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38]

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而税收优惠政策因其较低的寻租风险和更少的激励扭曲备受专家推崇。邢会等人收集了 2011—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手工匹配和关键词筛选方法得到研究数据,综合运用 DID 和 PSM 等方法系统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提高创新要素贡献率、提供风险补偿保障和创新倾向转变三种作用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高于国有企业,无论实质性还是策略性创新都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高新技术行业的创新效果更明显,区域异质性创新效果呈现出东、中、西部递减的状态。^[39]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但创新的外部性与高投入特征导致企业创新内在激励不足,需要政府制定碳排放规制以实现对企业低碳创新的外部激励。孙正林等人基于政府监管视角,构建了碳交易和碳税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开展了碳规制工具组合交互性的仿真模拟。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效果受到碳交易价格、企业创新带来的可交易碳量和企业不创新时碳超排量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当碳交易政策激励企业创新作用有限时,政府必须提高直接可控的碳税征收税率并配合以合适强度的监管才能保证政策协同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当政府对创新企业实行减税政策时,碳交易政策效果可以得到强化,进而政策协同促进企业创新效果得以优化。^[40]

2018年,我国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与排污费征收相比,环保税的征收层次及严谨性进一步提升,意味着环保收费制度更加完善。王树强等人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A股重度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实验组样本,以轻度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对照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测量了上述制度改进的绿色创新效果。研究发现,环保收费制度的改进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长三角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京津冀地区。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非国有企业。制度改进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强于绿色发明专利。^[41]

卞晨等人基于政府干预的演化博弈视角,提出了解决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多重利益交错和各种政策工具交织的研究假设,构建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开展了单一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交互性的政策仿真。研究发现,渐进提高环境税征收和创新专项补贴政策效果更优,政府必要监管强度下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想演化稳定均衡更容易实现。进一步在考虑企业创新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科技政策情景、环境税改革结合宏观税负的税收政策情景的仿真表明,政府实施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帕累托改进”政策效果。^[42]

宁金辉等人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上

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利用“大气污染防治考核”这一外生政策,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发现,大气污染防治考核有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其作用机制是,大气污染防治考核通过缓解代理冲突这条路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考核PM₁₀地区、环境法治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小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考核PM_{2.5}地区、环境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更为显著。^[43]

李春玲等人以2013—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层面探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与行业竞争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显著提升国企的创新投入,其中相比于非国有股东持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投入的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以及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中。^[44]

失败学习与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的关系研究长期被忽视。唐朝永等人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失败学习对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的影响,分析资源拼凑及认知风格在失败学习与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失败学习与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失败学习与资源拼凑存在正相关关系,资源拼凑与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资源拼凑在失败学习与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认知风格(创新型和适应型)调节资源拼凑与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之间的关系,且创新型认知风格正向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适应型认知风格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的假设未通过检验。^[45]

叶莉等人基于中国2011—2018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综合讨论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竞争共同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可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银行业竞争增强了金融科技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融资约束是金融科技推动企业技术创

新的重要中介,金融科技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银行业竞争对融资约束的中介路径产生着前半段路径为正向和后半段路径为负向的调节效应,即银行业竞争能够加强金融科技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而减弱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46]

王楠等人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 2017—2019 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研发强度与企业成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研发强度与当期企业成长呈“倒 V 形”的非线性关系,最优研发强度应不超过 4.42%;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且只有当研发强度超过 6.83% 时才能促进下一期企业成长,二者呈“U 形”的非线性关系;最优研发强度对当期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比对下一期更大。^[47]

官员“下海”经商使得企业高管团队中官员型高管普遍存在。李子彪等人从烙印理论视角出发,以 2008—2019 年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在实证分析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和产权性质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的调节作用后发现,CEO 的从政经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尤其是利用式创新投入;企业股权制衡程度和非国有化程度越高,CEO 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CEO 从政经历还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心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分别起到缓解和加重的作用。^[48]

四、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资源。2021 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上级监督对企业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绩效压力如何促进员工创造力、人才吸引力因素与政策工具契合关系等展开了研究。

企业管理者如何有效促进和激发知识型员工从事创造性工作,发挥高度创造力,对企业整体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刘兵等人合著的《上级监督对企业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研究》一书正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对于企业而言,创新能力是其获取和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而企业的创新和成果研发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员工的创造性。在企业环境中,知识型员工是从事创新型工作的主体力量,他们

通常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教育水平,具备知识创造、知识利用和知识增值的能力,同时还具有应对多变环境的适应力。强调了在当前产业和技术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要重视企业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激励,以此获得持久性的创新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可持续成长。^[49]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陈亮等人合著的《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研究》一书,以柔性管理和人才柔性流动理论为基础,探索性提出人才“柔性共享”理论,目标是实现人才资源在区域内合理配置和广泛交流;综合分析京津冀地区当前人才结构特点以及河北与京津地区的人才需求差异等,剖析影响人才流动的原因,以“共享经济”理念构建和谐的人才共享关系。^[50]

创造力是组织生存和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剧,在组织不断“提速”的同时,员工也经历了更大的绩效压力。范晓倩等人为探索绩效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整合压力的交互模型与创造力的双重路径模型,对员工进行调研并通过 MPLUS7 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当绩效压力被评估为挑战时可通过灵活性路径从广度上促进员工创造力,当绩效压力被评估为威胁时可通过持续性路径从深度上促进员工创造力,领导—成员交换在两条路径中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51]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我国机构养老护理人员供给数量与结构化矛盾日益突出,未来机构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规模也将持续扩大。丁雪萌等人以 1996—2017 年机构养老护理员为研究对象,多角度定量分析其供给的宏观环境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人口、经济以及社会因素对机构养老护理员供给的长期静态影响;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与协整分析,检验其序列是否平稳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机构养老护理员供给的短期动态影响;利用状态空间模型综合分析不同时期人口、经济与社会各因素对其供给水平的影响程度与趋势变化。研究发现,人口、经济以及社会因素与机构养老护理员供给间存在长期与短期关系,三者对机构养老护理员供给的影响虽然存在时变性,但其最终均趋于平缓,因此机构养

老护理员的供给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变化阶段。^[52]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劳动力转型机制与升级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吕荣杰等人运用PVAR模型对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三者间的动态关系表现出地区差异性;人工智能对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和产业升级分别产生“侵蚀效应”与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均没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产生负向影响。^[53]

马丽等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工作—家庭冲突的视角,提出知识型员工和谐—强迫工作激情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以421位来自不同行业的知识型员工为调查对象,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型员工和谐—强迫工作激情分别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工作幸福感;工作—家庭冲突在知识型员工和谐—强迫工作激情与工作幸福感关系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调节了知识型员工和谐—强迫工作激情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并均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54]

朱清香等人基于资源基础观,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以2013—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人力资本、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人力资本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拓展研究发现,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二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使得二元创新也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另外,二元创新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55]

刘兵等人指出,领导宽容感召是领导者出于和谐的目的倡导员工产生共情,使员工在发生冲突时更易达成宽容。领导宽容感召具有双刃剑效应,既存在一定的温度效应,其背后也存在一定的硬度损伤,需要领导者有效地把握尺度以平衡二者。领导者要确立宽容原则,让宽容拥有底线;营造宽容氛围,让宽容深入人心;建立奖励

机制,让宽容得到反馈;说出内心症结,让宽容止于表面。^[56]

李嫒等人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认知→情绪→态度与行为”框架,探究当领导冒犯这一情感事件触发后,下属对领导冒犯的动机归因是如何通过影响情绪,进而作用于其“宽—容”选择的。根据201名员工提供的领导冒犯关键事件回顾,调研结果显示,当领导冒犯被归因为提高绩效动机时,员工更易达成宽容;而当被归因为个人伤害动机时,员工宽容则难以达成;在其间,消极情绪具有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57]

胡悦等人基于流动人口视角,运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河北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河北各市间的创新存在空间相关性,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总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省外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省内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河北的创新力呈现不同程度的正向驱动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58]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引进培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重磅政策。李婷等人为探求人才政策工具对人才的吸引力情况,在构建人才吸引力因素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对178位人才问卷调查获得人才吸引力关键因素,对河北163份人才政策文本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政策工具与人才吸引力因素的契合关系。研究得出创新氛围、人才培养培养、人才激励评价、创新创业支持、人才服务和薪资待遇等方面契合度高,政策效果较佳;工作场所仪器设备条件、配偶子女安置和住房补贴的契合关系为政策不足,应加大政策制定;人才载体和医疗社会保障的契合关系为政策冗余,需加强政策实施。^[59]

五、旅游管理

2021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体验价值视角下红色旅游游客公民行为、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在线评价的酒店选择新方法等展开了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旅游承载着传播红色文化、增强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陈欣等人基于游客体验视角,探究红色旅游游客公民行为的关键

影响要素和形成机理成为红色旅游项目质量建设的理论参照。根据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框架,构建基于文化依恋和感知传承价值的链式中介模型,明晰认知体验与文化体验对游客公民行为的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集的 894 份红色旅游游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红色旅游目的地提供的认知体验与文化体验正向影响游客公民行为;文化依恋在认知体验、文化体验与游客推荐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感知传承价值在认知体验、文化体验对游客反馈行为及推荐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文化依恋与感知传承价值在认知体验、文化体验和游客反馈行为及推荐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60]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机理与实现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翁钢民等人以中国 30 个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测算 2008—2017 年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指数,结合 ESDA 和 LMDI 方法,对旅游业碳排放脱钩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指数整体处于弱脱钩状态,在 0.4380~0.8758 波动,碳排放脱钩指数分布不均衡,脱钩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较低;随着时间推移,空间集聚程度有所提高,其中, H-H 类型的省域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 L-L 类型省域数量较少,呈零星分布;技术效应、游客规模效应分别是促进和抑制旅游业碳排放脱钩的主导因素,能源结构效应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经济效应的影响较小。^[61]

翁钢民等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 9 省份为研究区域,构建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健康距离模型和 GIS 空间分析法研究 2008—2017 年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 时间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9 省份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且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区域绝对差异减小,相对差异增大;(2) 空间上,旅游公共服务由不均衡中度失配向均衡良好水平演进,并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3) 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 9 省份旅游公共服务失配的因素各异,其形成机理是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2]

基于在线评价的酒店选择方法已经成为一个

热门研究课题。赵萌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概率语言术语集 (Probabilistic Linguistic Term Set, PLTS) 融合多网站在线评分和评论的酒店选择模型:(1) 基于 PLTS 相似度计算方法统一不同网站之间评分信息的评价属性,提出了语言尺度的转换方法以统一不同网站之间评分信息的评价尺度;(2) 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析,提出基于不同群体风险态度的用户评论集结模型;(3) 改进语言尺度函数以引入正负评价的不平衡效应;(4) 针对不同群体的偏好差异,提出属性权重计算方法。最后,以三个网站上的四家酒店进行案例研究,决策结果表明了所提方法的客观性和可靠性。^[63]

2021 年,河北工商管理研究紧跟热点,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河北工商管理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重实证轻规范,应加强对典型案例的研究;二是应提升发文档次,目前发表在管理类顶级期刊的论文凤毛麟角;三是河北学者在追踪热点的同时,还应深耕已有的研究领域,多出成果、出高质量的成果。

(王冬年: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李春玲,袁润森,李念.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国企战略变革[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8).
- [2] 于树江,王茹雪,李艳双.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战略变革——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财会通讯,2021(8).
- [3] 黄春萍,王志文,章静敏等.不确定环境下品牌联盟组织间协作模式选择的计算实验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1(6).
- [4] 张晓飞,王豪,高常玲等.环保企业的协同战略模式——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21(6).
- [5] 孙颖,陈思霞.数据资产与科技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6] 翟伟峰,张学文.供应链管理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1(10).
- [7] 陈俊龙,王英楠.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多元治理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21(7).
- [8] 高素英,张焯,金杉杉.技术赋能视角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动态演化机理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
- [9] 董香兰,董巧婷,王辉.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分类转移盈

- 余管理——高管激励中介效应和机构持股调节效应[J].数理统计与管理,2021(1).
- [10]唐朝永,牛冲槐,师永志.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22).
- [11]石善冲,皮晔正,代丽微等.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成本黏性的影响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12]许楠,王洁,牛晓蒙等.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企业家精神与非效率投资——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财会通讯,2021(22).
- [13]吴国英,闫建钢.“趋利”还是“避害”?——直播电商退换货服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1(12).
- [14]李杰,陈维军,杨芳.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消费者认知与行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15]王凤飞.中国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协同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16]刘琳,王玖河.基于超网络模型的顾客参与知识共享研究[J].科研管理,2021(7).
- [17]刘琳,王玖河.基于知识结构的顾客知识共享激励机制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1(8).
- [18]王雪莲,高凯凯,李娜.在线知识付费节目的顾客体验价值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方法对“喜马拉雅”平台数据的发掘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6).
- [19]张敬伟,杜鑫,田志凯等.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在商业模式构建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基于互联网创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1(4).
- [20]郑浩,韩同银.钢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系统的耦合空间差异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1(5).
- [21]杨志勇,赵芳芳.网络中心性对用户平台契合的影响研究——基于短视频情景的分析[J].财经论丛,2021(8).
- [22]郭海玲,王海鸽,潘露露等.短视频电商信息展示对顾客融入行为的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9).
- [23]沈占波,代亮.网红直播带货营销机制研究——基于品牌价值共创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24]李慢,张跃先.网络服务场景对顾客契合的作用机理:一个非递归模型[J].财贸研究,2021(3).
- [25]张跃先,吴美芝,马钦海.免费赠品会让顾客欣喜吗?——利益一致性框架下的观点[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26]代建生,陈瑞佳.资金约束下损失规避零售商的订购和广告协同策略[J].中国管理科学,2021(8).
- [27]石晓飞,李桂荣.河北上市公司治理研究报告(2021)[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28]张丽君.区块链信息技术、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内部审计增值[J].财会通讯,2021(9).
- [29]李炜.企业战略、客户集中度与审计收费[J].财会通讯,2021(1).
- [30]宣杰,王晓莹,闫睿等.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现金股利与企业绩效[J].财会通讯,2021(22).
- [31]陈晶璞,戚笑天.股票回购能否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基于A股的经验证据[J].会计之友,2021(17).
- [32]王培辉,王双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J].武汉金融,2021(7).
- [33]王智新,赵沙俊一,朱磊.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1).
- [34]徐珊珊,蔡双立.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知识产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J].东岳论丛,2021(6).
- [35]孟维福,刘佳鑫.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内生”还是“外延”[J].学习与探索,2021(11).
- [36]王雅洁,马树强.互联网对省际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路径——创新开放度的中介作用[J].科研管理,2021(12).
- [37]李媛媛,刘思羽.科技金融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21(6).
- [38]李恩极,李群.地方政府创新竞争与企业创新[J].当代财经,2021(4).
- [39]邢会,王飞,郭辉丽,等.税收优惠、企业异质性与实质性创新——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J].会计之友,2021(10).
- [40]孙正林,卞晨,初钊鹏,等.政府监管视域下碳排放规制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演化仿真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1(12).
- [41]王树强,范振鹏.环保收费制度改进对企业绿色创新效果的影响研究——基于环保费改税的准自然实验[J].工业技术经济,2021(8).
- [42]卞晨,初钊鹏,孙正林.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仿真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1(7).
- [43]宁金辉,苑泽明,史方.大气污染防治考核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12).
- [44]李春玲,袁润森,孙熠.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创新投入[J].预测,2021(1).
- [45]唐朝永,林琳,蔡瑞林.失败学习对衰落企业低成本创新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管理评论,2021(9).
- [46]叶莉,王荣.金融科技、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J].现代经济探讨,2021(6).
- [47]王楠,赵毅,丛继坤等.科创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双门槛效应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11).
- [48]李子彪,张亚男,李晗.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烙印理论的实证研究[J].领导科学,2021(20).
- [49]刘兵,刘培琪.上级监督对企业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
- [50]陈亮,石晓飞.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51] 范晓倩,于斌.绩效压力如何促进员工创造力——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2).
- [52] 丁雪萌,孙健.我国养老服务劳动力供给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J].江汉学术,2021(2).
- [53] 吕荣杰,杨蕾,张义明.人工智能、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PVAR模型分析[J].管理现代化,2021(1).
- [54] 马丽,马可逸.知识型员工二元工作激情与工作幸福感关系——基于工作-家庭冲突的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21(1).
- [55] 朱清香,高阳.双元创新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 [56] 刘兵,冯雪,李娜.领导宽容感召中温度与硬度的尺度把握[J].领导科学,2021(12).
- [57] 李娜,闫葳,步磊等.领导冒犯动机归因对员工“宽—容”选择的影响: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视角[J].技术经济,2021(2).
- [58] 胡悦,李雪燕,马静.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以河北省流动人口为例[J].管理现代化,2021(2).
- [59] 李婷,郭鸿湧.人才吸引力因素与政策工具契合关系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科技促进发展,2021(4).
- [60] 陈欣,程振锋.体验价值视角下红色旅游游客公民行为影响机制研究[J].旅游科学,2021(6).
- [61] 翁钢民,李聪慧,潘越等.中国旅游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1(2).
- [62] 翁钢民,李聪慧,潘越等.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演化与形成机理分析——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份为例[J].生态经济,2021(3).
- [63] ZHAO M, LI L Y, XU Z S. Study on hotel selection method based on integrating online ratings and reviews from multi-websites[J].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1(5).

农林经济管理研究

宗义湘

一、2021年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总体概况

2021年,河北省农经学界立足于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目标,把握农业经济领域前沿问题,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展开调查研究,深入剖析热点议题,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省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研究维度来看,农林经济管理涉及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其中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产业经济与产业发展、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契约与农户行为、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城乡融合与乡村治理、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人力资本与农民培育、区域协同与空间布局等成为河北学者研究和探索的重点领域。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省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紧扣时代脉搏。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农业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农业发展备受瞩目,为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提供时代热点议题。河北省农林经济管理领域学者们的研究以扎实的理论为基础,从实际问题出发,探究中国及河北省农业农村农民发展规律,为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献计

献策。

第二,定性与定量并重。目前,省内农林经济管理的研究范式表现为定性与定量并重。在2021年度具有代表性的51篇河北省农经研究成果中有24篇为实证类文章,占比达到47%。

第三,以中文成果为主。目前,省内农林经济管理的研究成果呈现形式多样,注重高质量中文期刊发表的同时与国际接轨,在英文期刊的发表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仍然以中文研究为主。在2021年度具有代表性的51篇河北省农经研究成果中有46篇为中文文献,占比超过90%。

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尽快厘清两大战略的理论逻辑关联,深化细化二者实质性衔接内容,谋实谋细衔接举措和工具,已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必须解答的现实课题。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返贫预警、产业扶贫绩效等问题展开讨论。

在“十三五”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任务，包括“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十三五”时期的政策实践及其现实成效表明，财政政策供给在脱贫攻坚如期收官、乡村振兴稳步起航中均是关键性支撑力量，当前面对“十四五”时期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财政政策供给调适便成为促进两者有效衔接的战略枢纽。王春城和王帅从“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需求出发，探讨财政政策供给的意义、规约、挑战及对策。^[1]在分析财政政策供给对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战略需求意义的基础上，从多向度、多维度、多梯度等方面把握两者衔接的特性及其对财政政策供给的规约，识别相关需求与挑战。对此，财政政策供给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财政保障力度、财税政策支持以及资金绩效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调适，以兼顾公平与效率、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确保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逻辑关系决定了二者衔接的必然性，金融在两大战略实施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金融创新助力两大战略深度衔接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但从市场现实情况来看，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已无法满足两大战略衔接的资金需求，亟待有效创新。故深入剖析农村金融创新供需错位现实问题之根源，依据战略衔接现实需求抉择金融创新方向与可用工具，在当下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李茂和王晨阳探讨金融创新如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衔接。^[2]金融是乡村发展的“源头活水”，深植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但是，当下农村金融创新面临内在动力不足、外在需求薄弱以及支持衔接的创新目标不清晰等多重阻力。为解决以上问题，作者通过理论分析和对实际创新案例的经验总结，并以河北W县建行的“裕农通”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新模式、江苏NJ市的创新型政银合作助农模式以及河南AY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等实际创新案例进行经验总结，以上案例均表明政府和各类金融机构可依托金融工具创新，在助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衔接方面大有所为，相对明确地提出了金融创新助力上述两大战略衔接的着力点及主要工具选择，并提出从完善服务体系、夯实市场基础、提高针对性和多元化等多个方面入手，系统性提升金融创新助力乡村建设能力与成效的建议，加快形成金融服务主体与产品多元化支持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温美荣和王帅探究政策协同视角下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3]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两者的跨界复杂性和多元综合性决定了其衔接过程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从政策协同视角来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衔接与协同理论相契合，其政策供给目标、政策供给方式和政策供给内容等方面在多个维度和层级都具政策协同性。因此，提出以政策协同为分析框架，从政策协同的内容入手，做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从政策协同的方式入手，统筹推进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从政策协同的机制入手，构建好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以此探索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路径。

张学敏等在乡村振兴视阈下构建返贫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助于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4]作者运用层次分析法与BP神经网络算法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广西东兰县256户脱贫家庭为研究对象，以脱贫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基本医疗保障占比以及义务教育保障情况等作为指标对该区域脱贫人口返贫预警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返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深入剖析返贫成因、合理设计返贫预警指标是确保返贫预警评价体系运行的基础；构建返贫预警评价体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能够起到科学有效的预警作用，可以对脱贫户进行及时的跟踪监测并对预警评价结果进行及时的反馈，有助于事先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从而制止返贫现象的出现。实证结果表明，脱贫人口收入、新农合覆盖范围、农民义务教育保障情况等指标在东兰县返贫预警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较大，是东兰县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返贫预警的关键性影响要素。最后，对不同程度预警人口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于重度预警脱

贫困人口，需要政府加大对该群体的政策扶持力度，建立以能力帮扶为主的扶贫机制；对于中度预警脱贫人口，可采取鼓励发展为主、兜底为辅的策略；对于轻度预警脱贫人口，应大力鼓励发展，提供更多培训机会，使其真正掌握一定专业技能，使扶贫方式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段洪波和刘金辉以J县为例，研究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5]产业扶贫作为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可以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持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是实现高质量脱贫的重要途径。作者结合当前中国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政策要求，以平衡计分卡(BSC)为工具构建评价指标框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指标权重的设置，构建以贫困户收入增长与帮扶满意度为核心的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并将J县2019年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效果与资金运营等情况应用到本文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中，对J县产业扶贫资金在群众满意、资金效益、资金管理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得到J县产业扶贫资金绩效优秀的结论。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提升产业覆盖面、壮大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等建议，以此为其他地区的产业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给予新的思路以及切实可行的借鉴。

三、产业经济与产业发展

农业产业经济分析能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对指导河北省农业发展意义重大。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产业(小麦、马铃薯、肉牛、生鲜农产品等)发展等问题展开研究。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是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两大重要任务，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王冬和柴国俊研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6]作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影响农民消费的机制，通过构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评价体系，运用2009—2018年份省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

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农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但该提升效应表现为中、东、西部依次递减的区域非平衡特征；改革的组成成分影响农民消费的效应亦具有区域差异性，但也存在共性，即各地区依托农业主体生产能力指数实现农民消费水平提升的效应较强，依靠农业资金保障能力指数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消费水平增长，而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改善消费环境渠道提升农民消费的效应较弱。最后，以提振农民消费的视角，从补短板、强优势、提动力出发更好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亳州市位于黄淮海区，是安徽省小麦种植面积第二大地市，亳州小麦产业化发展对安徽省至关重要，总结亳州小麦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为亳州小麦产业化发展提供建议。刘锐等分析研究安徽省亳州市小麦产业现状与发展策略。^[7]作者通过对亳州小麦产业和加工企业进行调查、组织小麦生产和消费的座谈会，收集小麦种植品种、种植面积以及产量等相关数据，分析小麦产业化发展现状，发现亳州市小麦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专业技能不足、价格偏高、产业链间的融合不够紧密等问题，同时小麦生产具有产量、加工利用、生产效益等方面的发展潜力，由此提出构建大规模小麦加工体系，发挥龙头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种植；研发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实现良种良法；打造优质专用小麦生产示范区，培育区域品牌等策略建议。

推进优质麦产业绿色发展，关键要靠绿色产业技术的支撑。李嫣资等以河北省优质麦产区为例，分析推进优质麦绿色产业技术的影响因素。^[8]作者基于河北省优质麦主产区436户麦农及技术专家实地调研数据，运用集成DEMATEL和ISM方法，构建绿色产业技术采纳的多阶梯结构模型。结果表明，麦农采纳绿色产业技术的成本收益以及麦农的粮食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意识直接影响麦农绿色产业技术采纳行为；麦农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性质和政府监管强度则属于深层影响因素。因此，应推进优质麦市场形成机

制,通过可复制的绿色生产模式直接带动绿色产业技术采纳;完善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以有效促进优质麦绿色产业技术应用。

马铃薯主粮化已成为我国第四次主粮革命的新趋势,我国马铃薯产业具有良好的产能基础,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球第一,但单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产业发展面临诸如加工能力低、经营模式落后、产业布局不合理的现实问题。为实现我国主粮多元化需要加快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李含悦等分析我国马铃薯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并对其空间集聚进行研究。^[9]作者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测度 2011—2016 年我国马铃薯 16 个主产区的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利用 Moran's I 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动态变化。测算结果发现,马铃薯产业整体技术效率偏低且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逐渐从技术进步转变到更加注重提高技术效率且主导因素存在区域性差异;形成了自成一体“新区”、南北连通的“西区”和强强联手的“北区”三大集聚区。马铃薯产业区域性明显,打破地理界线跨地区发展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最后从技术效率提升、区域产业布局、市场对接等方面对我国马铃薯产业优化调整提出了对策建议。

日本肉牛产业虽然发展成熟,政策体系较为完善,但依然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薛永杰等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本肉牛产业及支持政策。^[10]日本高端牛肉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恶化,需求骤降,价格暴跌并且肉牛育肥、犍牛交易、销售等环节受到影响,生产主体面临成本上涨、资金紧张等多重困境。为稳定产业发展,日本政府和相关组织相继调整了长期支持政策,并针对具体困难出台了包括鼓励销售商开发新消费群体,提高和牛肉的海外推广资助;降低肉牛育肥经营稳定交付金制度和犍牛生产者补助金制度的补贴门槛,提高补贴标准;补贴生产中各种费用,调整相关贷款规定从而缓解生产者的资金紧张等多项应急措施。日本重视对本土品种的支持,援助措施形成了全方位的产业稳定体系,紧急性支持政策积极响应了生产者应急需求,农协等生产者组织在应对疫情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给中国肉牛发展带来启示,值得深入思考和借鉴。

COVID-19 疫情造成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短期中断,暴露了现有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脆弱性。在 COVID-19 疫情暴发后,如何在未来的大流行中实现生鲜农产品的有效供应成为关键问题。Yin Shi 等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保障生鲜农产品的供应。^[11]作者基于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构建了由供应商、第三方物流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将病毒传染系数、大流行病预防努力等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病因素充分融入模型中,发现与生鲜农产品批发价格相比,储存能力和大流行病预防能力对生鲜农产品零售价格影响巨大,文章研究揭示了 COVID-19 大流行病期间大都市地区生鲜农产品的有效供应机制并介绍了保障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验。

四、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

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近年来河北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这一情况与日益突现的农业资源环境问题,以及 21 世纪以来国家重视并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现实进展密切相关。2021 年,河北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绿色发展、农业资源生产效率、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

绿色生态空间网络是耦合景观格局、生态过程与生态功能的重要桥梁,对于提高景观连接性、保护物种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于强等以此为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12]学者们梳理了绿色生态空间网络的研究脉络,阐述了绿色生态空间网络的相关概念及发展历程,构建、分析与优化其中的常见方法与主要特点,以及绿色空间网络研究中的相关理论,列举了绿色生态空间网络的主要应用领域,生态空间网络的研究范围越发广泛,从最初的城市规划、自然空间规划、动物保护领域逐渐扩展到防风固沙、矿区重建、水生态保护等领域。最后,对绿色生态网络的基本改变、研究方法、尺度研究以及和其他空间网络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展望。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化建设、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综合城镇化水平(CUL)和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ETFEE)研究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态保护。Ren Feng 等以河北省为例,对城市化与生

态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耦合分析。^[13]作者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评价体系,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4个维度测度CUL,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计算ETFEE,建立耦合协调度(CCD)模型计算CUL与ETFEE之间的CCD。结果表明:(1)河北省城镇化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冀东、冀中、冀北和冀南,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2)各城市ETFEE值总体呈上升趋势;(3)CCD处于从低中度耦合阶段过渡到中高度耦合阶段。此研究对决策者制定城市化与能源效率的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优越,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生产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屈秋实等基于2000—2018年大湄公河次区域5国1省的面板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区域内农业生产效率,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方面分解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4]研究发现:(1)2000—2018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效率水平整体较低。(2)农业生产综合效率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特征,老挝一直是大湄公河次区域中农业生产效率最低的国家。(3)中国云南、越南、缅甸和泰国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技术的拉动,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生产综合效率提升的贡献程度由初期的小于生产规模,逐渐转变为大于生产规模。(4)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是自然因素和生产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通过剖析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生产效率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揭示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生产状况,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支撑、合作交流等方面为区域内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建议。

耕地资源是中国农村发展与农户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王桂霞和杨义凤以黑土地保护为中心兼及其他为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耕地资源保护的实践探索与策略优化。^[15]强化耕地保护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践“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作者分析中国农村耕地资源保护的演进历程与特征,当代中国耕地保护历经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矛盾调和的初步探索期、建设占用与耕地

质量管护的制度发展期和新时代“三位一体”的转型完善期三个阶段,并以东北黑土区为核心,兼顾华北、西北、南方地区,探究不同区域农村耕地资源保护的实践与区域差异,发现新时期耕地保护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着行为主体、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现实约束。鉴于此,应因地制宜从增强组织引导与技术培训、加强差别化耕地保护顶层设计、强化新技术研发与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等方面探寻深入推进耕地保护的突破路径。

徐立敏和赵永刚对推进农村“四荒地”开发利用进行研究分析。^[16]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产业多元化日趋凸显,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民从事非农经营成为常态,导致农村“四荒地”愈发增多,造成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农村“四荒地”开发利用中存在产权归属不够明确、承包合同和收益管理不规范、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村务公开和村民监督流于形式的主要问题,制约农民经营开发积极性,集体利益得不到保障。为推进农村“四荒地”开发利用,作者提出可以采取的路径有:(1)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明确“四荒地”产权归属;(2)规范农村“四荒地”监管机制,防止村集体财产流失;(3)健全民主管理和集体财产管理制度,优化“四荒地”经营环境;(4)加强“四荒地”相关立法工作,构建经营和处置法律机制;(5)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监督,完善群众民主监督机制;(6)健全农村要素市场,将“四荒地”经营处置纳入市场机制。通过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探索有效利用的经营方式,并在制度层面上构建健全的“四荒地”处置机制。

随着对多种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增加,对土地的竞争日益激烈。景观生态学原理的土地调控是发展更可持续的土地利用规划途径的必要手段。Liu Lin等以河北省太行山区曲阳县为例,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确定了其整治的最佳实践。^[17]景观生态学在土地整理规划设计中优于传统方法,有利于土地生态效益的综合开发。景观生态规划可以有效减少景观破碎化,提高集约化经营。作者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基于GIS和Fragstats 3.3软件构建景观格局分析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香农指

数从大到小依次为现状景观、景观生态规划和传统规划。景观生态规划可以创造长廊道,其密度和连通度高于传统规划,平均廊道宽度低于传统规划,比传统规划更能保护生物多样性。此外,还能不同程度地提高研究区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从而阻止居民限制自己从事粮食生产。这对于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在当地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可见度,从而改善未来景观的生态功能具有巨大潜力。

河北省地下水超采严重、水资源长期供需不平衡的背景下,探究河北省农业用水真实消耗情况及其驱动因素,对水资源安全、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刘晓东等基于作物需水量和作物实际用水量测度河北省农业生产蓝水足迹及绿水足迹,利用 LMDI 模型解析河北省农业用水变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18]结果显示,2002—2018 年河北省农业水足迹数量呈波动下降趋势,技术效应、种植规模效应和节水效应对河北省农业水足迹变化呈增量效应,其中技术效应对水足迹数量变化的正向驱动贡献值最大,这说明农业技术应用、规模效应带动和节水成效保障加快河北省农业节约用水进程;管理效应和种植结构效应对河北省农业水足迹数量变化呈减量效应,这说明水利化程度、农业种植结构给河北省农业节水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作者认为要实现河北省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应重点强化农业节水技术、节水管理和结构调整。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进水肥一体化建设;加大节水政策的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设施维护保持能力;优化各地区种植结构,持续推进“一季休耕,一季雨养”的种植模式,提升水资源和种植结构的匹配度,从而减轻河北省水资源短缺压力。

张茜和耿晓通过对河北省节水农业的时空分布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以期对绿色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思路。^[19]作者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概念模型构建河北省节水农业体系,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通过熵值法计算系统发展指数,综合评价河北省节水农业 PSR 系统及发展趋势。评价结果为,节水农业压力中,冀中、冀南地区为河北省节水压力较高的区域,冀东和冀北的节水农业压力相对较小;节水农业状态中,冀南地区的邢台、邯郸、衡水应作为节水农业的

优先发展区,冀中地区的保定、沧州属于宜改进区域,冀东和冀北地区则属于节水农业较优状态区;节水农业响应中,以石家庄为中心的冀中地区属于较高水平,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属于中等水平,其他区域则相对较低。并得出相关结论:(1)河北省的高水平节水农业 PSR 系统聚集在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低值水平区聚集在以邢台为中心的冀南地区。(2)河北省小麦与蔬菜种植主要集中在地下水超采治理重点区域的冀中和冀南,种植结构调整、突出生态修复功能、推行合理休耕政策是其节水农业主要途径。(3)河北省应根据当前节水农业 PSR 系统现状因地制宜地的发展节水农业,依托河北农业大学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平台,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

赵安周等对海河流域干旱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探究。^[20]作者基于 MODISEVI、PET 和 ET 数据构建了改进的干旱严重度指数,并借助趋势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对 2001—2014 年海河流域干旱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1—2014 年海河流域生长季、夏季和秋季的 MDSI 与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和自适应帕尔默干旱指数的相关性优于干旱严重度指数。(2)时间上,2001—2014 年海河流域生长季的 MDSI 呈显著增加的趋势,春季、夏季、秋季的 MDSI 也呈现增加的趋势,表明近些年来海河流域干旱有缓解的趋势。(3)就典型干旱年 2001 年来看,干旱在 5 月最为严重,流域的西部地区在 6—8 月持续出现严重甚至极端干旱事件。(4)在季节尺度上,春季显著变干的区域主要位于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显著变干的区域主要位于河北西部和北部。(5)海河流域西部 MDSI 主要由 ET/PET 控制,而东部 MDSI 主要受 EVI 影响,与气象因子相关分析表明生长季 MDSI、DSI 与降水和相对湿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日照时数呈显著负相关。

五、农业契约与农户行为

农户行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一旦农户作为生产者和决策者,农户的行为必然直接左右农业生产的变动,影响农业政策的效率,从农户行为研究农业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农业问题的重要方式和重要内容,对我国农业

更具显示意义。农业契约是农户与农产品加工运销为农户提供服务和农用生产资料等企业所达成的一致承诺,农户通过契约选择希望获得最大效用。2021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农户禀赋异质性与农业契约选择、农户技术采纳、农户决策等问题展开研究。

为提高农业的有效供给,在示范效应带动下,各地政府鼓励公司采用订单、股权合作、纵向一体化等形式带动小农户。但现实中农户以市场交易为主,显性契约参与率低、违约率高。为解决农户显性契约参与率低,农户难以获得产业链增值收益的问题,吴曼等分析农户禀赋异质性与农业契约选择,探究农户在市场交易、订单农业、股权合作不同契约形式间的选择偏好和决策行为,引入风险偏好、守信意识等因素分析农户偏好不同的原因。^[21]作者基于2019年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各试验站及农户机抽样调查获得相关数据,采用SATA15软件进行模型估计,借鉴多元Logit研究方法,使用MNL模型,分析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户契约选择行为的影响,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随风险偏好上升,兼业农户更偏好市场交易,专业大户更偏好订单农业或股份合作;守信意识高的农户参与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的概率显著高于守信意识低的农户;种植面积的增加、专业化程度提高会加剧风险偏好、守信意识对契约选择的影响;200~300亩是显性契约与隐形契约的临界规模。为破解显性契约参与率低的难题,应充分考虑农户的偏好和需求,重视农户间的差异。政府应引导大户联合成立合作社带动小农户,与小农户采用较为灵活的定价方式,与大户采用期限较长的契约。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农业经济总量能够持续增加,主要依赖于化肥农药等物质要素大量投入,但高产出背后面临日益严重的土壤板结、污染、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土壤生产能力下降,农产品质量安全受到威胁。探索如何提高小农户采纳保护性耕地技术的行为主动性,外部激励能否形成小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内生长效机制,即实现农户节本增效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苑甜甜等从外部激励与内生驱动研究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22]作者基于拓展的S-O-R理论分析框架,选取河北省设施葡萄主产区360份种植户的实地访谈数据,运用形成型指标的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外部激励对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内在感知的中介作用和家庭禀赋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激励可以有效提高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内在感知对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外部激励和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家庭禀赋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家庭禀赋在外部激励—技术采纳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因此,应选择适合与灵活的政府规制手段,充分发挥溢价激励的作用,以提高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的采纳动机。

为探讨药农对新冠肺炎疫情需求中药材品种的种植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疫情短缺中药材资源稳产保供提供决策参考。王文青等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影响药农种植决策因素。^[23]作者根据农户有限理性理论和生产要素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选择金银花、黄芩、连翘和柴胡4个新冠肺炎疫情需求品种,基于道地产区454个药农样本,采用多元无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需求药材品种道地产区药农的生产要素投入和市场预期收益等因素对其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并比较不同规模药农决策行为的异质性。结果发现,(1)小规模药农和大规模药农均倾向于“面积不变”决策,中等规模药农倾向于“面积扩大”决策。(2)价格预期增加、劳动力投入容易、土地投入容易、加入组织、技术投入容易、风险偏好对药农种植决策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否兼业、种植面积、种植年限对药农种植决策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3)不同规模药农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其中,与企业订单种植对小规模药农有显著正向影响;价格预期增加、政策支持对中等规模药农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工费用高、技术获取难对中等规模药农有显著负向影响;价格预期增加对大规模药农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工费用高、土地流转费高和筹资难对大规模药农有显著负向影响。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对药农进行宣传引导、加快研发山地小型机械、发展中药材订单农业、加强对药农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建议,以期引导药农从事中药材种植,保证新冠肺炎疫情需求药材品种充足供应提供经验依据。

生猪养殖户补栏行为对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生猪供应具有关键性作用。分析政策认知对生猪

养殖户补栏行为的影响,旨在丰富“认知—行为”研究思路,同时为政府引导养殖户理性补栏、完善系列稳产保供政策提供参考。李鸟鸟等研究政策认知对生猪养殖户补栏行为的影响。^[24]作者从补贴、信贷支持、用地、环评、疫病防控、运输六方面构建政策认知指标,基于河北、陕西、河南3省884份生猪养殖户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政策认知水平,进一步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实证分析政策认知对生猪养殖户补栏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认知显著正向影响生猪养殖户补栏行为;风险偏好、养殖规模、上一期生猪销售价格、是否加入养殖合作社、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程度也会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补栏行为;受教育程度、与上一期相比单头生猪饲养成本变动、2019年是否发生非洲猪瘟则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户补栏行为。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从以下三方面,即政府相关部门需多渠道广泛宣传、解读生猪产业扶持政策,提高养殖户对相关政策内容、申请程序等方面的了解程度,积极跟踪政策落实情况,避免政策形式主义,切实解决养殖户面临的各种实际难题和风险,引导养殖户合理补栏;进一步加强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提升合作社技术培训、疫病防控等多种服务能力等着手提高养殖户政策认知水平以提高其补栏积极性。

六、农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

受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前景广阔,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如何突破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让信息化红利向农业领域辐射,使其成为农业发展新的支撑点,这将是未来农业经济研究必须重视的重要议题,是当前和未来农经研究的重要内容。2021年,河北省学者主要探讨了生鲜农产品流通电商模式、变革需求、电商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等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生鲜品的需求由量的增加转化为质的提升,更加安全、环保、绿色的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鲜宅配的发展。在传统方式下获得优质生鲜品的途径有限,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给生鲜品在网络上的销售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任向阳和吕娜对生鲜品电商与冷链宅配联合运送优化进行研

究。^[25]作者针对冷链配送生鲜品供应节点与需求节点距离长或者配送产品周期短等情况,考虑了中转点不同、配送车辆最大容量不同、不同的中转效率、城市车辆的限行、不同飞机飞行速度、天气情况造成的飞机延误等对联合运送结果产生影响,给出基于聚类的两阶段联合运送方法:第一阶段按照客户需求点的分布情况,提出基于模糊C-均值算法(FCM)的配送中转点选择和需求点划分方法,从而构建联合运送网络结构;第二阶段建立基于聚类的联合运送路径优化模型。最后,通过数据实验,验证所提方法和模型的合理性与高效性。

数字经济时代的各种数字化技术及现代信息网络与生鲜供应链行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更好地破解我国生鲜供应链面临着供应过剩、“卖难买贵”、高流通损耗与高流通成本等“痛点”问题。李美羽等立足于生鲜供应链发展实际,总结归纳了数字经济时代生鲜供应链的变革需求和创新机理与路径。^[26]首先,作者以生鲜供应链变革的本质为切入点,将数字经济时代生鲜供应链面临的变革需求归纳为外部环境驱动力变革、内部链间成员关系及技术融合促效率需求变革。其次,结合数字经济生鲜供应链创新的核心,提出以用户为中心、数字化赋能的跨职能生鲜供应链创新,从而构建向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和生态化系统转型的生鲜供应链的创新机理逻辑与关键实现过程,以期为我国生鲜供应链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参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互联网对农村腹地的进一步深入和渗透,表明互联网与农村的结合已经具备了技术基础,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农村经济转型是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Jing Wu等运用直觉模糊集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从农村互联网发展现状出发,在对“互联网+”进行诠释的基础上,探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应用。^[27]作者利用直觉模糊集算子对决策相关的多个属性问题建模,估计行业电子商务的影响,提出了产业转型的测度方法,证明了“互联网+”电子商务对农村商业文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持续释放的稳定而持久的影响可能成为技术经济的新范式,对于形成

以信息为媒介的“四化”联动机制,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常规路径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七、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

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在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搞活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问题有很大研究空间。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对家庭金融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问题展开研究。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康书生和袁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28]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

社会保障是国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宋凤轩和康世宇研究“十三五”时期社会保障建设的成就与问题并对未来进行展望。^[29]回顾“十三五”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其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及优抚政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管理服务日趋规范,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社保政策定位仍然有待明确、保障对象甄别机制有待完善、高质量的社会保障有待建设。展望“十四五”期间,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社会保障需要在社保政策定位、保障对象甄别、社保层次划分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建设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更高需求。

在我国现阶段,住房保障问题已经从只关注

居住功能的生存生活型阶段转向综合关注居民发展需求的民生改善型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中低收入居民是否对保障性住房的福利供给具有实质认同以及福利认同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宏观政策中补短板硬任务的落实还是从微观提升居民获得感的角度,对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都是十分必要的。踪程和陈立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30]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八、城乡融合与乡村治理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好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城镇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当今及未来持续研究的重点。2021年,河北学术界主要就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发展、农村养老、乡村治理等问题展开研究。

面对“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形势要求,认真总结已有的城乡协调发展经验教训,以创新性思维提出更具合理性的财政支持政策,是值得财政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共同思考的重大课题。因此,陈丽莎和孙健夫对“十四五”时期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进行研究分析。^[31]作者基于城乡发展总体目标和既有的城强乡弱的现实矛盾状况,总结“十四五”时期围绕城乡融合发展需重点完成主要任务,即在继续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同时,加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力度;将产业融合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任务;继续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充分考虑新形势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如财政能否稳健运行、财政政策如何科学把控、财政政策能否有效落实等,在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力求实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力促城乡产业融合;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宗旨,提升新时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加强监督和绩效评价为手段,提高财政支持政策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背后,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何正确处理发展与平衡的关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叶璐和王济民分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从背景、时代环境、经济发展出发,还原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形成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进行总结。^[32]发现 70 多年来中国城乡关系历经“对立”——“趋好”——“统筹”——“融合”四大阶段。得到城乡关系演变贯穿其中的发展规律:宏观环境是直接影响因素;中央政府基于宏观环境变化选择相应的国家战略目标,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在目标的指引下逐步建立完善了以产业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公共资源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体系,推动城乡关系战略实施,进而推动城乡关系变化。顶层设计以及系统实践促使中国城乡关系经历深刻变革并得到极大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破除,城乡差距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出现新的趋势和特征。据此提出新时期解决城乡关系出现的问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要素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增收等方面有所作为。

科学认识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村落转型过程和规律,是落实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李智和刘劲松基于此探究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33]作者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历城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从聚落空间、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探讨了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特

征与成长机制。研究表明:(1)农业村落建设用地规模显著增加,住宅用地不断扩展,工业用地沿村落边缘扩张,聚落空间转型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扩张、加速重构三个阶段;(2)农业机械化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占比逐渐增加,农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趋势显著,村落经济形态转型经历了生计农业、农户兼业化、农户非农化与兼业化三个阶段;(3)村落社会网络不断开放,村民社会生活不断重构,村落社会生活转型经历了传统村落共同体、职住空间分离、聚居关系重塑三个阶段;(4)自然禀赋、行为主体(村委会、农户、企业)、城乡互动、政策环境分别是农业村落转型的基础性约束力、内部推力、外部拉力、方向调控力,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农业村落的转型成长。最后提出了新型“村镇共同体”理念,为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破解中国农业村落转型发展困境,提供了理论参考。

乡村伦理作为乡村文化的灵魂,在坚守固有属性的同时,也随着乡村变迁在不断转型。乡村变迁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元素在乡村的渗透过程,是乡村社会的发展过程。研究乡村伦理一定要理解乡村社会,理解乡村变迁对乡村伦理的影响,这是新时代乡村伦理建构的基础和依据。李冰把乡村变迁作为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乡村的社会关系。^[34]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乡村社会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乡村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只要有社会变迁,伦理转型就会发生。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只要称其为乡村,乡村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种种变化。所以,解释与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本质特征。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陈宝玲等探究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的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35]作者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 Z 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

延伸的进程中,发现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研究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提出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当经济变迁、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与家庭结构急剧变迁不期而遇,养老成为各界持续关注和社会焦点问题。为了了解并解决日益严峻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知晓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此,宋凤轩等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古典家庭决策模型,利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在安徽省、广东省等十个省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等潜在影响养老成本的因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构建一个以经济保障、精神保障、服务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三位一体”的农村留守老人保障体系提供合理建议。^[36]

土地信托作为新型土地流转模式具有重要优势。目前,中国开展土地信托试点的地区,大多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现有土地信托模式在推广运行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政府行政管理过多,信托机构数量少、角色单一、发挥职能有限,不能充分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基于此,苗绘和王金营研究中国农村土地集合信托模式创新与保障机制。^[37]作者在对全国2001—2020年典型土地信托模式梳理的基础上,从横向突破和纵向突破两种路径提出了创新的土地信托模式:一是构建横向联合机制的农用地整合开发型集合信托模式,二是深化纵向延伸机制的农业产业链型土地集合信托模式。为保障上述创新模式的高效运行,提出了政府、监管当局、信托机构、金融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六位一体”的土地信托保障机制,以此促进农业产业链形成,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

廖寅和杜洋洋细化研究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

村治理。^[38]随着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力度逐渐增强,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原来适合分散型社会的大幅员乡里制不再为国家所需,必然让位于适合整体性社会的幅员更小的乡村组织,都保制于是应运而生。在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保甲、经界、地图三合一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在收乡权于政府的同时,新的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权威体制。宋代乡村社会缺乏门阀、乡绅一类明显的支配阶层,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改变乡村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也导致宋代国家对于乡村的权威,既超越汉唐,亦为后来的元明清所不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风险治理的制度供给进一步加强,但我国乡村风险治理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脆弱性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下一阶段乡村工作的总抓手,其中一个重要焦点就是乡村所存在或潜在的风险问题。因此,必须补齐现代乡村风险治理的短板,提升风险治理的能力,完善风险治理体系。盖宏伟和牛朝文对现代乡村风险治理进行研究。^[39]作者基于组织抗逆力这一新理念,分析组织抗逆力对现代乡村系统风险的适切性,发现在乡村系统风险应对中,组织抗逆力有着较强的适切性,具备全过程、全方位、网络化、协同化的整体性治理优势。归纳乡村系统风险治理面临着生态系统脆弱、生计系统萎缩、社会文化失范、互助功能式微、资源条件匮乏等现实问题,进而寻求乡村系统风险治理中提升组织抗逆力的策略,需要我们提升乡村组织抗逆力,即加强乡村基层组织抗逆文化建设,增强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的抵抗能力、复原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更好地治理乡村系统风险。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不仅关涉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推进。“三权分置”构想的提出、“适度放活”方略的明确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了方向指引,新型有限流转方案应当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当然之选。刘广明和张俊慈在“适度放活”视阈下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路与制度。^[40]作者分析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现行规

定,发现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日渐提高,严格限制流转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愈发明显,阻碍了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抑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隐形流转频发破坏了管理秩序。提出重构现行制度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有限流转,前提在于妥善界定使用权继受人资格,核心在于建立有偿有期限使用规则,关键在于进行流转收益的合理分配,并应实行宅基地用途的严格管制。

九、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本单元,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均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接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对提升我国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探讨了县域经济空间差异、职业农民培育、县域科技创新等问题。

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时期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张亚明等研究京津冀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与收敛性。^[41]作者在对区域经济收敛性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选取1994—2017年京津冀180个县(区)数据,运用ArcGIS和收敛模型围绕京津冀县域经济空间关联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京津冀县域经济全局空间关联程度呈逐年增大趋势。同时,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经济发展存在属于空间误差模式的绝对 β 收敛,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据此得出京津冀县域发展模式 and 县域发展模式的演变规律,对京津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并提出着力实现县域联盟成片发展、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格局等建议。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严重。县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充分问题怎么测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什么样的演变特征?监测和反映河北省各县平衡充分发展状况是新时期河北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关系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

基于此,司秋利以河北省133个县级行政区为例,综合测度平衡充分指数并探究其时空演变规律。^[42]结果显示,第一,整体平衡充分指数受政策影响呈现逐年加快增长的态势,河北省整体经济实现了较为平衡充分的发展;第二,县域经济平衡充分指数形成“三主峰、多次峰”的空间分布格局,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较为明显,“三主峰”格局在样本期内基本未发生变化。河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石家庄、唐山等大型中心城市对各县的辐射,其他中型城市的辐射作用有待加强。

县域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张旭等对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进行评价分析,构建二者在县域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与阶段,并以河北省石家庄市14个县(市)的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43]研究结果表明,各县(市)科技创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以科技滞后的拮抗型和磨合型为主,表现为“金字塔”模式,呈现“山地形”分布。分析科技创新水平、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与演化趋势,以期为落实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县(市)建设提供参考。

十、人力资本与农民培育

农村人力资源影响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以及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定位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相关财政投入、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如何进一步发挥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研究空间。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主要探讨了乡村教育、职业农民培育、人才规模等问题。

乡村教育是储备乡村建设优秀人才的关键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石,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大力推进,并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于莎和刘奉越基于城乡关系视域,分析乡村教育的演进图景与发展展望。^[44]城乡关系是影响建国以来乡村教育演变逻辑的重要维度。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实践经历了计划性城乡二元结构、市场性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融合等不同阶段,乡村教育在这些历史阶段中曲折发展,并且呈现出不同特征。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时代背景下,针对所面临的城乡教育资源供给路径依赖、教师资源流动机制不健全、生源流动的“向心性”“逆乡土化”趋势加剧种种挑战,乡村教育发展将会呈现新的态势,即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增强教师资源供给水平、注重质量提升和彰显乡土性。

农村成人教育是为提升人民群众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举办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破解农村人才制约瓶颈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切实提升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于莎和张天添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我国农村成人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制度逻辑。^[4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成人教育政策经历了以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为主、注重文化与实用技术学习的结合、开展新型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四个历史变迁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分析,从结构观看,政治体制改革为农村成人教育政策演进提供政治背景,经济体制转型为农村成人教育政策演进奠定市场基础,文化观念变化为农村成人教育政策演进提供思想根源;从历史观看,政策演进过程中深受政府、涉农办学机构及农民个体理性抉择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而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制度转化和制度断裂等四种制度变迁类型在其中均有体现。由此得出我国农村成人教育政策变迁属于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策变迁呈现出“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现象;渐进性变迁与突变式变迁并存等结论,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和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乡村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职业农民培育是着力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现实难题的理性方案,也是新时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近年来,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政策,为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和规范协调多元利益主体行为提供制度支持

和保障,希冀将培养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的既定政策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董香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分析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话语变迁与制度逻辑。^[46]话语制度主义为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路径,作者运用该理论分析和解读相关政策,发现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大致历经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的话语变迁过程。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视角解读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可以发现“以人为本”的政策核心价值、依附于特定的制度情境、“观念变化”引发政策变迁、强调政策行动者的话语互动是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蕴含的主要制度逻辑。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省始终把人才振兴放在乡村振兴的核心位置。为推进河北省乡村振兴进程,了解农村人才规模至关重要。Li Yibo 等基于分数 GM (1, 1) 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河北省农村人才规模分析。^[47]作者首先运用 GM (1, 1) 模型对 2020—2025 年河北省农村人才规模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几年河北省农村发展中,生产型人才规模将逐步下降,而服务型、经营型、管理型、技能型人才规模将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农村人才的重要性。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对生产型人才影响最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率对服务型人才影响最强,城乡收入水平对经营型人才、管理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影响最大。最后,根据 GM (1, 1) 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人才,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就业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分析疫情下的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对稳定就业、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杨胜利和邵盼盼通过对 12 省份农民工失业状况进行调查,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分析了疫情因素对农民工失业的影响,并通过 Probit 模型、替换自变量法以及分样本回归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48]研究发现:(1) 疫情冲击下农民工的失业率较 2018 年提高了 1.48%;(2) 疫情的传播性和破坏性对农民工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疫情对农民工失

业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人力资本、流动特征、社会保障能够有效抑制失业的发生,并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疫情严重程度的上升而增大。基于上述结果分析,从构建就业保障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十一、区域协同与空间优化

区域协同发展是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空间布局、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是新时代的新要求,区域协同发展和空间布局优化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就区域角色、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农村空间优化等展开了探讨。

纵览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史,无论是世界大国的崛起,还是国内发达省份的繁荣,都塑造形成了独特的角色,塑造角色不仅涉及某个方面、单一维度,而且涉及整个国家或区域的系统性变革。在国际竞争加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国内区域竞争激烈环境下,明确一个区域在大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中的角色定位,是谋求未来竞争优势、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前提。颜廷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河北省为例,研究区域角色定位方向、维度与实现机理。^[49]作者对区域角色定位内涵进行解读分析,探讨其塑造机理,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并总结其特点,以河北为例对区域角色转换历史演进、新时期区域特质对角色定位影响进行分析,得出面向未来的河北省竞争性角色定位应是“河北智造”,其中包括三个含义,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京津冀绿色食品旅游养老基地。提出构建以区域特质与角色定位为目标的良性传达机制、构建由核心企业至产业链条、产业生态圈的放大机制、培育壮大未来增长极、构建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区域角色的内外协同机制等实现机理。

京津冀区域协同是新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不仅关系到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高效疏解,实现该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协调发展,构建新常态语境

下具有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区域增长极,而且影响到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转变。刘宾以京津冀为例探讨协同发展中如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50]作者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理论和增长极理论,阐释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培育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动能、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推动构建创新驱动平台,对企业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分析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梯度差仍未根本改善、产业发展协同不够有效、协同创新效能不够显著的现状及困境,并着重从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完善协同创新机制以及强化创新产业支持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对策建议,以此形成提升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效能的对策与思路。

在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面对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但人居空间持续扩张的现象,如何科学应对以满足农村空间优化的发展诉求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岳晓鹏等基于精明收缩视角研究天津农村空间优化^[51],作者在梳理总结国内外运用精明收缩理论应对农村衰落的研究进展和成果的基础上,以天津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总体收缩现状进行深度剖析,发现天津农村人口流失、空间扩张、农业比重低,对不同类型村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总结归纳天津3类村庄的收缩现状、特征及模式。针对3类村庄现存问题,从精明收缩视角提出城市化村庄减量收缩、城镇化村庄弹性收缩、保留型村庄存量收缩的收缩原则及“三生”空间优化设计策略,以期为天津农村空间的优化提供参考。

十二、讨论与展望

2021年,河北省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学者们的选题紧扣时代脉搏,紧跟党的大政方针,从实际问题出发体现学科特色;学术研究范式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研究成果发表形式多样。但是,应当看到,目前河北省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还有不小的差距。根据cnki检索可知,2021年全国有关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发文量约74490篇,而河北省的发文量只有1197篇,仅占到1.6%。同时,高端精品成果仍需要进一步突破,2021年河北省学者发表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共43篇,而北京市CSSCI文章352篇,山东省

CSSCI 文章 157 篇, 数量对比与先进省市有较大差距。可能的原因: 一是农经人才和优质生源的不断流失, 学科的繁荣关键在于人才, 但近年来农经学科的高端人才和优质生源流失较多; 二是智慧农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农业以它的淳朴厚德迎接生物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 并不断创新蜕变, 迎来智慧农业发展新时期。智慧农业在国内展现出较好的发展潜力, 未来, 需要进一步利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 从多个方面向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环节延伸, 最终促进智慧农业更好地发展。但是目前的知识体系可能跟不上新的发展步伐, 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作为一个直面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学科, 如不能顺应智慧农业发展的潮流, 则极有可能更为弱化。

展望未来, 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 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第一, 继续强化“三农”问题的研究, 要在农业经济发展评估、农户行为研究、减贫与发展和农业资源与环境等经典领域的基础上, 向农业科技企业、农业产业链、农业循环经济、现代农业等领域拓展。第二, 更加注重对微观农林经济管理问题研究, 力求从小见大, 从一个具体的微观问题角度探测宏观政策应该或可能发生的变动, 在新时代背景下, 紧跟党的大政方针。第三, 更加注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分析, 注重对新技术选用的经济效益的分析, 推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技术的先进性、生产可行性和经济的效益性三者的有机结合, 而不是盲目地认为越先进越好。同时, 尽可能地融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所带来变化的内容。第四, 紧跟智慧农业发展潮流。我国未来农林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数据供应的定制化、数据模型的国产化、农业机械的智能化、农业经济产业链的虚拟化、供应链的金融普惠化、生物农业数据安全的增强化等。适应智慧农业发展步伐, 推进农业、农村全方位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 将有利于促进生产节约、要素优化配置、供求交对接、治理精准高效, 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宗义湘: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王春城, 王帅. “十四五”财政政策供给的继承与创新——着眼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J]. 地方财政研究, 2021(01).
- [2] 李茂, 王晨阳. 金融创新如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衔接[J]. 河北学刊, 2021(06).
- [3] 温美荣, 王帅. 政策协同视角下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4] 张学敏, 史玲燕, 薛艳, 吕新发. 乡村振兴视阈下返贫预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1(13).
- [5] 段洪波, 刘金辉. 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 J 县为例[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6] 王冬, 柴国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居民消费: 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2).
- [7] 刘锐, 刘晶晶, 王旭琳, 吴桂玲, 聂莹, 黄家章, 孙君茂. 安徽省亳州市小麦产业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10).
- [8] 李嫣姿, 白静静, 王健, 刘富强. 推进优质麦绿色产业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优质麦产区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21).
- [9] 李含悦, 张润清, 王哲. 我国马铃薯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及空间集聚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07).
- [10] 薛永杰, 闫金玲, 赵慧峰, 郑海晶.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本肉牛产业及支持政策[J]. 世界农业, 2021(01).
- [11] Yin Shi, Bai Lan, Zhang Runqing. Prevention schemes for future fresh agri-products (FAPs) supply chain: Mathematical model and experience of guaranteeing the supply of FAP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1, 101(15).
- [12] 于强, 张启斌, 牛腾, 王戈, 马骏, 杨林哲. 绿色生态空间网络研究进展[J]. 农业机械学报, 2021(12).
- [13] Ren Feng, Yu Xin. Coupling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 A case study from Hebei province in China [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1, 74.
- [14] 屈秋实, 王礼茂, 王博, 向宁. 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生产效率时空特征[J]. 资源科学, 2021(12).
- [15] 王桂霞, 杨义凤. 当代中国农村耕地资源保护的实践探索与策略优化——以黑土地保护为中心兼及其他[J]. 河北学刊, 2021(06).
- [16] 徐立敏, 赵永刚. 推进农村“四荒地”开发利用[J]. 宏观经济管理, 2021(06).
- [17] Liu Lin, Zhou Yapeng, Yin Haikui, Zhang Ruiqiang, Ma Ying, Zhang Guijun, Zhao Pengfei, Feng Jinxiong. Improving

- Land Use Planning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One Case Study of Quyang County [J]. COMPLEXITY, 2021, 2021.
- [18] 刘晓东, 彭晓彤, 白丽, 高春雨. 水足迹视阈下河北省农业用水驱动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11).
- [19] 张茜, 耿晓. 河北省节水农业时空分布及发展趋势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08).
- [20] 赵安周, 张安兵, 王冬利, 刘新侠, 刘海新. 海河流域干旱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J].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21(04).
- [21] 吴曼, 王丽丽, 赵帮宏, 宗义湘. 农户禀赋异质性与农业契约选择[J]. 统计与决策, 2021(02).
- [22] 苑甜甜, 宗义湘, 王俊芹. 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 外部激励与内生驱动[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08).
- [23] 王文青, 王建忠, 王斌. 新冠疫情下药农种植决策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07).
- [24] 李鸟鸟, 闫振宇, 王超. 政策认知对生猪养殖户补栏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 884 份调研数据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11).
- [25] 任向阳, 吕娜. 生鲜品电商与冷链宅配联合运送优化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2(02).
- [26] 李美羽, 王成敏, 朱艳新. 数字经济下生鲜供应链创新机理与路径[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1(11).
- [27] Jing Wu, Jie Tian, Sanjuán Martínez Oscar, Fenza Giuseppe, Gonzalez Crespo Ruben.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commerce on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using intuitionistic fuzzy sets [J].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2021, 40(4).
- [28] 康书生, 袁薇. 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9] 宋凤轩, 康世宇. “十三五”时期社会保障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展望[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0] 踪程, 陈立文.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J]. 财经问题研究, 2021(11).
- [31] 陈丽莎, 孙健夫. “十四五”时期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2] 叶璐, 王济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与未来展望[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33] 李智, 刘劲松. 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J]. 地理学报, 2021(04).
- [34] 李冰. 乡村变迁: 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J]. 齐鲁学刊, 2021(01).
- [35] 陈宝玲, 黄英, 国万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 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02).
- [36] 宋凤轩, 孙颖鹿, 朱碧莹. 新古典家庭决策模型下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J]. 东岳论丛, 2021(03).
- [37] 苗绘, 王金营. 中国农村土地集合信托模式创新与保障机制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07).
- [38] 廖寅, 杜洋洋. 走向细化: 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治理[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39] 盖宏伟, 牛朝文. 现代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策略: 提升组织抗逆力[J]. 学术交流, 2021(06).
- [40] 刘广明, 张俊慈. “适度放活”视阈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路探索与制度重构[J]. 世界农业, 2021(03).
- [41] 张亚明, 苏妍嫒, 严玲玉. 基于 ArcGIS 平台的京津冀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与收敛性研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1(03).
- [42] 司秋利. 县域经济发展平衡充分的综合测度及时空演变[J]. 统计与决策, 2021(16).
- [43] 张旭, 魏福丽, 袁旭梅. 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1(20).
- [44] 于莎, 刘奉越. 城乡关系视域下乡村教育的演进图景与发展展望[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24).
- [45] 于莎, 张天添. 我国农村成人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J]. 现代远程教育, 2021(03).
- [46] 董香君. 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话语变迁与制度逻辑——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J]. 现代远程教育, 2021(06).
- [47] Li YiBo, Bi Wenbin, Xiao Kuo, Li Huan, Yin Shi, Tang Chaoyong, Wu Lifeng. Analysis of Rural Talent Scale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Fractional GM (1,1) and the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odel [J]. Journal of Mathematics, 2021, 2021.
- [48] 杨胜利, 邵盼盼. 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西北人口, 2021(05).
- [49] 颜廷标. 区域角色定位方向、维度与实现机理——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河北省为例[J]. 河北学刊, 2021(03).
- [50] 刘宾. 协同发展中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路径探讨——以京津冀为例[J]. 理论探讨, 2021(04).
- [51] 岳晓鹏, 钱子莹, 丁潇颖. 精明收缩视角下的天津农村空间优化策略[J]. 规划师, 2021(23).

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

郭远远 刘灵芝

2021年,河北省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国家治理、公共管理模式与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包括国家治理研究、公共管理模式研究、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二是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包括基层社区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研究;三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体系建设研究、PPP模式研究;四是公共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制定和执行研究、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研究、乡村振兴和减贫扶贫政策研究;五是行政领导与政府人才政策研究,包括领导干部能力素质和管理研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研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和人才政策研究;六是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研究,包括电子政务和政府数据管理研究、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安全研究、政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政务新媒体研究。

一、国家治理、公共管理模式与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

(一) 国家治理研究

张艳茹和郭跃军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对新形势下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自媒体网络高度发展的新情况,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规范自媒体平台、健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通过科学高效的国家治理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1]李新研究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超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有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文化基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大同社会”提出的中国方案。^[2]梁瑞英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执行力的不断加强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我们不仅要价值理性上进行分析界定,对其理论和系统进行逻辑框定,而且还要在对党内法规执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有效机制进行科学设定,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3]商植桐等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力的作用,党内政治文化通过发挥其政治力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落实,发挥其组织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效能提高,发挥其引领力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发挥其凝聚力集聚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其约束力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规范科学运行。^[4]

韩兆柱系统研究了网络化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认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界的网络化治理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治理理论及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引入与介绍,主要集中在网络化治理研究的起源、概念与内涵及理论基础等基本方面;第二阶段为中国网络化治理研究的实践探索,主要聚焦于西方语境下形成的网络化治理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的应用性研究;第三阶段是中国语境下网络化治理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国内学者试图用中国语境下的概念对网络化治理进行理论本土化创新。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化治理研究正处于从理论应用到理论创新的过渡阶段,要构建属于中国制度逻辑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并形成中国特色网络化治理理论体系,还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做深入的研究。^[5]

(二) 公共管理模式研究

彭东立认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新契机。以人民为中心、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和深化改革,共同构成了新发展

理念下公共管理行动逻辑的关键环节。新发展理念给公共管理带来系统优化的重要契机,也集中围绕主体、制度、技术和价值四个维度得以实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制,离不开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以民主法治为内核的体制机制保障,以网络信息为支撑的技术应用驱动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主旨的价值体系引领。^[6]王立业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模式面临着许多层面的挑战和历史发展机遇,为使国家公共管理系统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需求,需要提升社会公共管理系统的高效运行能力,进一步优化公共管理工作策略,充分挖掘大数据在公共管理中的发展潜力,探究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和决策体系,大力提升公共管理的科学决策水平和服务能力,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7]韩兆柱高度评价了王锋《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精神》一书,认为后工业社会需要建构服务型政府模式及其超理性的行政精神,以此发挥行政主体的主体性和反思性,增强他们在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主动性和服务性,具体措施就是建立道德化的制度和行政道德发生机制,通过合作型组织实践德治构想。^[8]

(三) 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

左守秋和牛庆坤认为,国家生态治理体系高度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建设中仍有不足之处,政治上层建筑对生态治理的管控缺乏系统化,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视角,着力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立足于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实现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终目标。^[9]侯清华等认为,可以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逻辑视角出发,将环境治理系统与生态系统进行理论映射,根据治理体系中不同主体对环境污染危害的承受力、对治理资源的需求以及支配能力等进行生态位分析,基于协同理论和生态位理论建立囊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环保社会组织、媒体以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内的更符合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环境协同治理生态网络体系,以期更高效地实现环境治理目标。^[10]张凡认为,环保部门“无人机夜间巡航”已成为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巡视利器,其所建构的隐喻图景恰好映射了企业偷排、人的

执法效能(治理能力)、“中央—地方”环保权力结构(治理体系)等纷繁的本体事物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其多重内涵为构建刚性环境治理提供了方法论视角,也为人、技术与制度间的法哲学之思植入了形象的素材。无人机在环境治理中取得的实效主要来自精准取证、客观执法与超然的监管地位,这正是刚性环境治理的价值向度。以此为价值遵循改革环境监管体制,能有效地破解环保领域企业间的“囚徒困境”与地方政府间的“底线竞争”。^[11]

苗俊玲和王文华认为,我国环保行政约谈制度以其协商性和柔性优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主要涉及主体仍是政府和环境违法者,缺乏市场和社会的纳入。环保行政约谈的最佳模式选择是合作治理,即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主体的优势,约谈工作启动前共同收集环境信息,约谈会议上听取不同群体的代表表达意见,约谈后社会参与监督整改工作,保证约谈效果的持续性。^[12]司林波等认为,近16年来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五大热点领域是城市可持续性、城市气候变化治理、中国城市化发展、城市生态系统以及城市环境治理模式;城市可持续性是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热点领域的基础,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但伴随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协调、城市景观破碎化等城市问题,可持续性、弹性为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概念分析框架,多层次治理和多元化为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础;气候变化治理、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促进绿色空间的建立将成为未来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趋势;未来的城市环境治理研究,还应高度关注城市环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13]张春玲认为,现阶段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个人层面的文化及观念因素,组织层面的制度、参与及资金因素,实施层面的创新及人才因素。多元共治的模式是垃圾分类治理的根基,个人层面要高度重视乡村女性主导地位,组织层面要建立具有乡村特色的垃圾分类体系,实施层面要在新基建这一背景下发挥技术创新及引进新乡贤。^[14]

(四) 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侯清华和郑亚男认为,与单一政府主导生态治理模式不同,生态—社会系统协同绿色治理网络框架是针对京津冀区域内部社会、经济与环境

之间的复杂性,将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引入京津冀绿色治理体系,通过构建政策—经济—社会—环境网络来推动绿色治理协同发展,提高京津冀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效率。构建京津冀政府组织—市场产业组织—社会公众组织—环境系统四者协同发展的环境协同绿色治理系统,可以促进京津冀生态化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各方适应与协调问题。^[15]王韶华等参考四部委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京津冀工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分析,构建R&D投入、盈利能力、政府调控与工业绿色发展的SVAR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功能分析供给侧因素对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冲击效应。结果发现,R&D投入对工业绿色发展、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质量的贡献最大,产生促进效应;政府调控对工业环境治理的贡献最大,产生促进效应;企业盈利能力对工业资源利用、工业环境治理产生抑制效应。^[16]李清章等认为,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治理需要立法推动必须结合相应省、市、区的实际,通过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为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法律支撑。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一个权威性的环渤海经济区立法协商机构,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区域环境治理的科学安排,建立一个共享性的区域环境信息平台,建立一个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治理救助机制。^[17]

王华东等分析了京津冀水资源现状、水资源治理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典型资源治理理论及协同治理模式的分析,指出协同治理模式是京津冀水资源治理的最佳选择,并从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文化、治理过程、治理模式协同五方面提出了京津冀水资源协同治理模式体系。^[18]刘叶等基于296份白洋淀流域调研数据,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框架,构建农户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意愿SEM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水环境治理的行为意向受到的总效应依次为,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环境认知>政策认知>企业认知。据此建议,发挥村委会职能,增强农户参与治理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保障农户知情权监督权;加强政府引导协调,构建三元协同治理机制。^[19]

二、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 基层社区治理研究

刘洁认为,社区治理共同体联动机制是应对基层社会问题复合体的有效机制,它要求基层政府向多元角色职能转型,这就要改变以往基层政府过度管理与角色职能内卷、公共服务支持乏力、领导角色固化等问题,向社区良性运行的指导者、宣教工作的培育者、公共服务资源有力提供者、社区治理共同体组织者和社区购买服务的监督者转化。^[20]孙云霞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区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络的良好媒介,可以从党建引领、坚持创新、以人民为中心三个方面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创新,提升社区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协调力、动员力,使基层社区组织体系不断优化完善。^[21]杨凡认为,在复杂风险环境下,基层网格治理表现出服务过程中的行政化倾向、技术使用上的表演化倾向、主体力量上的单一化倾向、架构体系上的失重化倾向。为提升基层网格治理效能,应着重突破以下方面:治理地位的正确定义、治理内容的正确把关、治理形式的正确塑造以及治理规范的正确制定。从治理韧性角度着手,则应牵引多方力量,筑牢治理基础;强化应变能力,创新监控体系;补充技术人才,提升保障效能;弱化行政干预,凸显自治特色;结合地区特色,提高约束效力。^[22]白翠芳认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的重心,呈现出从基本维稳到政策执行,再到促进美好生活的阶梯式转移。加强政策沟通的制度设计可为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的解决提供一条规范化制度化的路径,而通过沟通技巧的运用则可提升基层领导干部沟通协调能力,通过有效沟通化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23]盖宏伟等认为,韧性治理是基层社区应对叠加型、复合性以及系统型风险的理论和现实选择。推进基层社区风险韧性治理,尚存在治理体制碎片化、治理工具同质化、治理议程扭曲化、治理资源稀缺化以及治理环境内卷化等瓶颈。实现基层社区风险韧性治理需要打造社区整体性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水平,优化社区风险治理的议程设置,消解社区风险治理的内卷化困境。^[24]郭钰等认为,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治理情绪低落与治理动力薄弱、治理态度消沉与治理行为慵懒、治理

认同感降低与治理成就感阙如等“疲态”现象成为基层治理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和短板。为此，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实践中优化基层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外部治理力量，重塑治理主体价值取向，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25]崔亚杰基于 B 市一个物业纠纷事件的单案例分析，认为转型期基层政府冲突治理中，政府通过运用各种治理机制，分三个阶段将政府角色从“干预者”转换到“当事方”。^[26]

吴景双认为，河北省在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政治引领，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筑牢共同体意识，强化民族认同，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完善民族政策，尊重宗教信仰，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发展特色经济，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坚持依法治国，推进“三治融合”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战略支撑。^[27]曹雪彦认为，石家庄市以疫情“大考”巩固和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种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各种传统和现代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28]同时认为，智慧社区成为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模式，是科技飞速发展后的一种全新的治理形态，能为百姓带来真正的智慧生活体验，能为石家庄的转型升级、绿色崛起带来新的动力，进而成为建设幸福石家庄的催化剂。^[29]

（二）乡村治理研究

罗杰和温小勇认为，农村基层党建与农村基层治理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不断强化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是提升农村基层治理实效和水平的必然选择。以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就是要强化政治建设以确保正确方向、强化组织建设以确保统揽全局、强化思想建设以确保科学施策、强化制度建设以确保责任落实，最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0]向平萍等认为，标准化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但是，从出台的国家 and 地方标准来看，仍存在标准体系不完善、有效性不足、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仍待增强、标准化专业人才相对缺乏等问题，需要从体系、标准、人才这三个方面予以解决。^[31]冯立刚等认为，资本下乡增强

了乡村经济活力、为乡村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强化了法律在乡村的运用。同时，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弱化了原有乡村治理主体的参与力量，进一步引发了农民阶层分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为此，要通过法治思维规范资本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农民自身能力建设来应对农民阶层分化，推进乡村德治建设，进一步提升村“两委”乡村治理能力等措施，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32]项贤国等认为，现代村规民约具有浓厚的法治属性，是一种民间自治规范，具有乡村秩序治理、行为规范和立法补充功能。然而，村规民约在运行中存在与国家法治的冲突、制定程序与内容失范、执行与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困境，应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修改程序、弥合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确保村规民约贯彻落实到位、严格村规民约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进而强化村级自治，推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33]刘月霞认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建构作用，具体途径包括：丰富传统美德的乡村传播途径；充分挖掘乡村道德文化资源；促进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挥乡村协同治理主体的示范作用。^[34]盖宏伟等认为，我国乡村的现代转向中存在着复杂、不确定的系统风险，严重危及乡村振兴。在乡村系统风险应对中，组织抗逆力有着较强的适切性，具备全过程、全方位、网络化、协同化的整体性治理优势。当前，我国乡村系统风险治理面临着生态系统脆弱、生计系统萎缩、社会文化失范、互助功能式微、资源条件匮乏等问题，需要我们提升乡村组织抗逆力，即加强乡村基层组织抗逆文化建设，增强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的抵抗能力、复原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更好地治理乡村系统风险。^[35]李砚忠等关注了乡村治安治理，认为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我国乡村治安须从“硬管理”到“软治理”转型，逐步实现多元主体协同下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36]王卫东通过对雄安新区三县 79 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建立健全“三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所存在的村民主体性缺失、法治建设根基薄弱和文化轻视等问题突出。基于此，结合雄安新区建设情况，从“三治”

方面入手,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大法治宣传,完善法律规范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实现“三治”有效融合,从而推进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37]

胡梦珠等梳理了我国村治研究的论域变化,认为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背景下,针对村治主体的微观研究逐渐升温,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嵌入型村干部”开始成为当下中国村治研究的新转向。^[38]赵宇认为,驻村第一书记在嵌入过程中面临着权威主导性地位争夺、双重代理角色相冲突、乡村逻辑规则难以转变的困境,制约着驻村第一书记治理效能的发挥。基于此,应促使权威竞争转为权威合作,保障驻村第一书记价值发挥;角色平衡传导至利益均衡,构建双重信息传递机制;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联合,重塑乡村社会价值。应以此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实现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无缝衔接。^[39]周瑾等对“新乡贤与乡村治理”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梳理后发现,一是新乡贤相比于传统乡贤而言,其内涵和外延有所延伸;二是乡村治理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其根源在于内生动力缺失;三是新乡贤有效契合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为激活乡村活力提供了人才支撑,但在其作用发挥中存在着多重制约因素。因此,深入丰富新乡贤与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对象范围与方法,提升理论与经验的实践指导价值。^[40]郝晓雅等认为,在一些地区,新乡贤的参与遇到了“局外人”困境,身份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对称的状况使得乡村社会对新乡贤的接纳程度有限,新乡贤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制约。为此,新乡贤要主动实施本地化融入,积极获取“局内人”身份;政府要完善和改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各项机制;村干部要营造乡村社会良性氛围,并提升村民的主动精神、合作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村干部、村民与新乡贤在内的乡村共同体,以多元主体和谐共生促进乡村振兴。^[41]崔航航和房建恩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农村社会组织设立难、培育滞后、各主体职责模糊等问题,为此必须明确各主体职责、有效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加强宣传与教育。^[42]王善哲等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着

重探究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网络建立、治理效率,多元主体参与规范性等方面的积极效果,发现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法律法规保障、有效监管、发展动力等问题,提出构建制度化管理体系、加强监管与监督体系建设、构建人才引进机制等对策建议。^[43]

佟林杰等认为,乡村数字治理能力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乡村普遍存在数字资源禀赋先天不足、数字建设历史欠账、数字服务需求表达失语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和应用条件相对匮乏等问题。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有五个维度,即文化维度上提升乡村数字意识与素养、经济维度上加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技术投入、社会维度上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协作机制、政策维度上建立健全乡村数字治理的政策体系、生态维度上打造乡村数字治理的生态系统。^[44]张春玲等从“战略—实施—需求—技术”四个维度对乡村数据治理问题进行探究,提出乡村数据治理需求是准绳,部门建设是基本,人才引进是保障,新技术运用是突破口的完善对策。^[45]她还通过对现有乡村信息化平台进行SOA(面向服务的架构)研究,从主体协同、灵活需求、信息安全及数据共享四个方面阐述了完善对策。^[46]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研究

薛亮认为,中国战“疫”在全球语境中的良好效果,是大国战“疫”中制度性优势与科学性力量有机结合的结果。中国战“疫”过程中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观。中国战“疫”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如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亟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等问题。未来,在敬畏自然,科学性力量前置着及制度性优势保持着这三个因素同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社会才能免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巨大损失与艰难挑战。^[47]丁荣嵘等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在信息管理系统、风险预警机制、智能应用和协同辟谣机制等角度为我国政府应急信息管理系统提出改进策略。^[48]古淑青等认为,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民众造成负面社会心态,包括群体恐慌、疫情污名化和漠视心理。为了引导疫情下民众社会心态,需要相关部门健全整体防护措施,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提供有效权威信息,净化舆论环境;民众个人需要积极应对危机,加强自身心理调适。^[49]赵辰玮等认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任构建对专家存在高度依赖,专家在疫情期间掌握着重要的信息,是政府新闻发布的头脑,一些重要的信息可以稳定系统地得到传播,另外也要兼顾社会舆论的变化。^[50]白树亮认为,在公共危机非常状态下,政府公关的角色定位是社会公共矛盾的疏导者、公共信息的双向传播者、政府形象的形塑者,^[51]政府公关应更加注重与媒体的合作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通过提升政府公关的“数智化”程度以积极适应智媒传播生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双向互动,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互惠共赢。^[52]

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一) 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曹雪彦认为,我国民生领域要在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着重下功夫,以期实现“十四五”时期民生福祉新水平的美好愿景,这是新形势下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是新发展阶段育才、引才、留才的有力保障,是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53]赵永刚和徐立敏认为,城乡信息互通共享则是城乡融合发展中一体化市场建设、产业协同培育升级和要素高效配置的重要条件。为此,必须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网络覆盖质量;构建农民网络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平台信息浏览兴趣;优化信息平台内容板块,提升平台信息更新速度;开通电子支付手段,拓展信息平台服务领域。^[54]徐立敏等还认为,在服务型政府创建中构建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平台,是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群众办事难度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一些残疾人和年龄较大的社保办理者而言,因其行动不便、距离较远和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线下公共服务业务办理辅助能力较差,构建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可为其办理业务提供极大便利。^[55]刘邦凡等认为,数字技术投入和数字技术产出对公共服务各领域的影响存在区别;投入并不能决定产出,但总体上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

在人力资本和区域分布双重异质性的影响下,数字技术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也进一步深化;人才聚集和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影响智慧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56]

杨胜利等对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进行测度发现,在全市范围口径下,各市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要大于市辖区范围口径下的均等化程度。2006—2016年全市口径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渐向好,而市辖区口径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未好转。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各市的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增长较慢,而人口增速较快,造成公共服务资源压力增大。全市(包括市辖区和县域)范围内各市公共服务供给增速加快,促进了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提升。今后在发展中需要关注具有较大人口吸引力的各市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升,进而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57]马斌等构建了京津冀公共服务的仿真模拟模型,在对模型科学性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提出维持现状、平稳发展和优先发展共计三种模拟情景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等状况表现出阶段性、地域性和“虚假性”特征;京津冀各自子系统公共服务敏感性各不相同,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高速发展难以带动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显著提高;经济因素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起主导性作用,人口因素则起辅助性作用。^[58]田芳等对邯郸市涉县主城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平均最近邻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购物、餐饮、金融、教育、医疗、公共交通设施空间上呈聚集特征,文体、养老、休闲游憩设施空间上呈随机模式;经营性设施聚集程度普遍高于公益性设施,医疗设施聚集强度和聚集规模最大,公共交通设施聚集强度和聚集规模最小;西部老城区各类设施密度高于东部新城,医疗、休闲游憩、社会福利设施与居住小区分布存在空间上的不匹配,并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59]

(二)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体系建设研究

刘华等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我国的全球文化战略,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如今在新态势发展背景下,必须进一步全面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科学供

给,强化公共文化团队建设,改善补充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目标。^[60]刘彩云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协调发展不仅是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保障落实民众文化权益的必施之举。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协调发展,应该深化文化管理体制,促进文化机构跨条线协作;畅通文化参与渠道,创建多元共建共治文化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服务,协调推进各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61]杨英法认为,城市公共服务平台作为城市运营的关键性环节,有运用智能化技术来提高便捷性,实现转型升级需发挥文化的催化剂作用,以其助力城市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一是对城市各类文化进行凝练,使其易识易记;二是借助文化消除智能化技术在城市各个领域运用的障碍;三是找到文化与智能化技术及城市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的具体操作方法;四是引导文化行业、智能行业人士交融共进,力争两能毕具。以上方式协同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智能化转型、人文氛围营造。^[62]

项琳认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贡献表现为: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形式,提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缩小了城乡和地区间的文化鸿沟,拓宽了文化惠民服务的广度;促进了文化和科技更好融合,带动了“互联网+公共文化”跨越式发展;助力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了特殊时期公众精神文化生活。“十四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需要加强数字资源内容建设,创新数字资源样态,深化智能化、一体化公共文化网络平台建设,推动公共文化大数据管理系统建设,推进“沉浸式”“互动式”数字文化实体体验空间建设,利用社会化平台打造线上服务品牌和“粉丝”文化社群。^[63]陈则谦等认为,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功能不完善,存在较多易用性和可用性方面的问题,可从顶层设计、服务功能和用户体验三方面予以优化。^[64]

(三) PPP 模式研究

李妍等探讨了地方治理理论与 PPP 模式的耦合性,根据风险与地方治理之间的敏感性程度不同构建 PPP 项目风险指标体系,结合解释结构模型和模糊网络层次分析法对风险因素进行层级划分,并得到风险因素的驱动性和依赖性。提

出政府基于 PPP 模式风险层次结构进行分层次治理,并将 PPP 项目风险管理纳入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完善风险分担促进地方政府善治效应。^[65]潘鹏程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区间直觉模糊理论的政企匹配模型,可以兼顾政企主体间的需求以及企业对于 PPP 项目的需求,同时利用区间直觉模糊理论解决复杂问题中精确打分不易获得的问题,并与传统加权打分法进行对比,验证了其有效性。^[66]陈玲玲等认为,合理的融资模式是实现特许经营公用基础设施 PPP 项目成功的关键,为此,在明确项目参与各方权责、义务的同时,重点做好项目投融资体系设计,以及政府在项目建设、运行管理方面的协调、监督、引领作用。此外,政府应按照兼顾公平和有效平衡好各方利益的思维,研究制定可行的投资回报方案,吸引社会投资人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更多符合使用要求的公共基础设施,实现服务于民、施惠于民。^[67]崔武文等结合高速公路 PPP 项目的特点以及绩效评价需求,设计出包括项目公司管理、建设期管理、运营期管理、移交期管理、风险管理、项目资料管理、环境管理、利益相关方满意度等 8 个一级指标及 31 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68]杨慧敏等采用 2016—2018 年河北省 11 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 stata15 进行研究,得出 PPP 模式可以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政府财力、拓宽融资渠道减少政府支出和较精细设计流程提高政府支出效率三种渠道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69]

四、公共政策研究

(一) 政策制定和执行研究

高鹏飞等提出遵循“数据—证据—政策”基本逻辑的新型政府循证决策模式。从数据到证据环节,政府要主动关注特定数据,以数据收集、收据分析、数据检验等过程生成有效证据;从证据到政策环节,政府要将科学证据与价值偏好、社会知识相融合,建立有效证据传导至公共决策的情境化过程,构建公共政策循证决策制度,促进有效证据嵌入公共政策监督,保障公共政策科学性。^[70]靳史青等认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政府应该利用新媒体平台实现网络时代政府与社会民众更好的交互沟通,建设良性公民参与

环境, 在实现双向沟通的同时, 政治系统由此完成由传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向新媒体背景下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转变, 实现政策议程创建模式的创新。^[71]陈宝玲和国万忠等认为, 乡镇政策执行是实现“两大奇迹”的坚实基础。他们通过引入“自主权”和“自主性”两个变量,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各阶段乡镇政策执行的主导性逻辑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 在政社合一的时代背景下, 人民公社自主权不足, 自主性匮乏, 但国家动员赋予其超强的政策执行热情和效能; 1978 年—2003 年, 央地利益一体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 乡镇自主权和自主性显著提升, 财政包干制时期, 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乡镇政策执行的主导逻辑; 2003—2012 年分税制时期, 乡镇自主权和自主性被相应剥离,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相对孱弱, 政策执行意愿相对不足, 政策执行中的目标偏差现象时有发生; 2012 年至今, 乡镇发展迎来新机遇, 政策执行权得以巩固, 政策执行力得以强化, 政策执行效能得以提升。^[72]

(二) 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研究

邢明军等认为, 政民互动日益频繁, 政府也倾向于将市民意见和建议纳入政府决策中来。但是, 政府对市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议题设定仍有选择性和主动性; 尽管参与的方式较为灵活多样, 但市民的意见多大程度上反映到公共政策中去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和公开。今后需要在强化法律制度保障、加强回应与公开以及提升公民参与积极性等方面加以改进, 以期进一步扩展和发挥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作用。^[73]李飞等认为,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目前存在高度形式化的问题, 难以发挥公众参与应有的作用。而社会许可理念能够给公众参与带来一定的借鉴, 如重视环境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实质性价值, 强调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持续性, 明确公众参与主体的决策权等。在此基础上可建立“二元”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对话机制, 充分利用社区发展协议等创新公众参与形式, 更好地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制度。^[74]范海玉等以河北省为例, 认为公众参与在提高生态环境地方立法质量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应当通过完善全过程、常态化的公众参与机制, 健全公众参与的沟通反馈机制, 推动公众参与的激励补偿机制, 严格考核监督与责任机制, 建立

大数据应用法律机制等确保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75]他还认为, 河北省在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中应当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广泛吸纳公众参与立法过程, 做好立法实施前的准备工作, 做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京津冀协同和城乡一体。^[76]祝晓光等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草案)》的历次审议过程为例, 提出要构建网络传播方式创新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 具体途径包括: 建立常态化宣传、参与、评估机制, 提高公众参与意愿; 重视官方两微一端平台建设, 拓展立法信息公开渠道; 搭建公众网络参与平台, 丰富公众参与立法的网络途径; 加强与媒体沟通, 充分发挥舆论引领作用。^[77]

(三) 乡村振兴和减贫扶贫政策研究

沙占华系统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减贫积累的宝贵经验, 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消除农村贫困当作全党全社会的重要工作; 不断深化改革,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一切从实际出发, 与时俱进调整农村减贫政策; 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 最大程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注重加强减贫的国际合作, 共享先进减贫理念和经验。^[78]他还认为, 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有机衔接, 在政策供给上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坚持统筹推进和分类施策相结合、坚持对脱贫攻坚政策实施成功经验的接续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在具体政策的接续和转化上, 要围绕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做文章。^[79]刘建民等认为, 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消除绝对贫困、打赢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障, 要继续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总结历年来贫困治理工作的经验,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正向治理效能, 促进二者的关联协同和良性互动。^[80]王春城结合乡村振兴的内在属性与目标要求, 接续和创新脱贫攻坚考核评估的经验, 可从理念定位、内容设定、方式选择、结果运用等方面构建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 将静态层面的构成内容转化为动态层面的运行流程, 包括地方自评、集中审核、第三方评估、综合评价、沟通反馈、落实整改六个环节。同时, 建立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体系还需要人才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法律规范机制等发挥支撑作

用。^[81]他认为,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财政政策供给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财政保障力度、财税政策支持以及资金绩效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调适。^[82]他还认为,要通过政策供给调适,具体包括转变政策供给机制、政策供给重点、政策供给理念和政策供给方式来矫正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83]段洪波等对J县产业扶贫资金在群众满意、资金效益、资金管理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并给出对策建议:多措并举实现产业扶贫全覆盖、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产业扶贫项目资金科学管理制度。^[84]

韩梦娟认为,河北省扶贫政策的历史演进总体上经历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过程。精准扶贫政策的未来走向是将精准扶贫内化于乡村振兴,做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提前谋划;继续加大产业减贫升级和农村改革;以村级集体组织为切入点,壮大乡村社会的自身力量。^[85]刘秀清等认为,村集体在扶贫资产的监督、管理、收益各环节责任重大,扶贫资产资本为村集体及村集体内部成员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各类低收入、边缘户群体提供了收益来源,今后将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资源。^[86]魏韬等认为,河北省医保扶贫政策在深度贫困地区实施还存在交通问题、慢性病认证标准、乡镇卫生院的诊疗水平、公立医院院前急诊费用高及床位不足等瓶颈,^[87]为此可以运用三圈理论,着力提升医疗保障扶贫的价值实现空间、工作能力空间、群众支持能力空间。^[88]

五、行政领导与政府人才政策研究

(一) 领导干部能力素质和管理研究

张颖认为,必须要从政治高度去审视规范党内一切行为,让政治警钟长鸣,让领导干部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政治定力,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89]吴杰华认为,任期制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存在追责事项的范围和性质界定不清晰、追责主体过于单一片面、追责对象交叉模糊、追责程序不够具体、追责形式不明确等构建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协调统一的立法机制、完善衔接有效的程序机制、健全纠错救济机制以及建立制度化的决策机制进行化解。^[90]张红国认为,要从领导者的心

智思维角度切入,形成批判式思维,培育平衡式思维,激发集体智慧和强化学习能力,以增进韧性领导力。^[91]刘兵认为,领导者要在领导宽容感召中把握尺度,要确立宽容原则,让宽容拥有底线;营造宽容氛围,让宽容深入人心;建立奖励机制,让宽容得到反馈;说出内心症结,让宽容止于表面。^[92]张家琪认为,影响年轻干部职务晋升的性格因素包括思想偏激、情绪不稳、优柔寡断、自私自利、性格孤僻等。为此,年轻干部要以优秀书籍陶冶自身情操,学习他人的为人处世之道,树立以人为本的公益之心,以独立创新提升工作素养,不断锤炼自身健全性格,为自己实现职务晋升积累更多砝码。^[93]于阔城认为,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包括:加强思想淬炼,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政治历练,涵养政治品格;加强实践锻炼,增长政治才干;加强专业训练,拓宽政治视野。^[94]

商植桐认为,领导干部在具备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预判决策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应急处理能力、依法防控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的核心素养的同时,还应通过构建预案预警机制、打造风险研判机制、形成应急保障机制、构筑法律保障机制、建立民众参与机制来提升自身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治理能力。^[95]马鑫认为,应通过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知识学习、开展应急培训演练、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应急治理平台、完善政绩考核、改进专业领域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等途径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本领。^[96]翟玉等认为,可以从着力完善领导干部执行力的体制机制和提升其自身素质入手,提升统一战线领导干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执行力。^[97]

(二) 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研究

商植桐认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启示包括: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教育;整顿党的作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加大腐败严惩力度,提高腐败综合成本;加强反腐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98]新时代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必须发挥党内政治文化支撑作用,把政治文化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把培养风险防控意识纳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把青年干部入职廉政考核作为必备选项,

以制度体系建设构建敢担当敢作为的政治生态等作为落脚点,打造廉政建设新气象,营造朗朗乾坤的廉政生态。^[99]王国绪认为,“微腐败”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滥用,治理“微腐败”不能在不改变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去强调官员的道德自觉,而应该从制度上压缩腐败的滋生空间,包括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减少腐败的激励因素,大力宣传法治、人权、民主理念,压缩“微腐败”生存的社会空间。^[100]

(三)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和人才政策研究

苗俊玲等认为,公共组织员工隐性结盟现象根据表现形式可以归纳为友谊型非正式群体、目标型非正式群体和利益型非正式群体三类。前两类可采取的管理策略有:调动积极因素,实现公共组织目标;完善沟通机制,避免信息失真;严守规章制度,培育组织文化;推进民主决策,减轻变革阻力;实施人性化管理,增加员工归属感。后一类可采取的管理策略有:制裁、瓦解利益型非正式群体;完善晋升激励机制;引导公共组织员工树立正确价值观念。^[101]陈星宇认为,由于行政人员伦理价值的主观性因素较强,所以时刻面临着伦理价值扭曲的风险,由此出现了诸多伦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官本位思想下忠诚度缺失、责任伦理价值萎缩,公正理念扭曲、行政人格偏离正轨,趋于病态方面。为此,需利用外部的“他律”控制和内部的“自律”调节,使行政人员塑造成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利他型“道德经济人”人格,实现行政人员自身个性与公共伦理的和谐之治,使政府真正建立成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机构。^[102]李新元等认为,公务员履行行政责任面临权力、角色和利益等多方面的伦理困境,为此需提升公务员行政责任意识,构建公务员责任伦理体系,完善公务员责任监督机制。^[103]

周德胜等以京津冀三地近五年联合发布的人才一体化政策文本内容为研究对象,从顶层制度设计、公共服务、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四种政策工具分析京津冀人才政策协同进展,继而提出三地人才一体化发展政策协同的路径:继续深化改革,建立统一完善的京津冀人才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加快推进产业协同和项目对接,促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强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定向培养高质

量人才。^[104]闫翊鲲等认为,在生态理论视角下,应以河北省科技人才政策本身作为内生态、以政策的社会环境和科技人才作为外生态,建构河北省科技人才政策生态系统,通过内生态系统、外生态系统的优化及其内、外生态的高度契合,来应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挑战。^[105]李婷等通过对河北省人才政策调查研究得出:创新氛围、人才培养培养、人才激励评价、创新创业支持、人才服务和薪资待遇等方面契合度高,政策效果较佳;工作场所仪器设备条件、配偶子女安置和住房补贴的契合关系为政策不足,应加大政策制定;人才载体和医疗社会保障的契合关系为政策冗余,需加强政策实施。^[106]熊兴国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需要在创新创业人才方面进行政策创新,包括企业人才吸引方面的政策以及稳定人才、避免人才流失方面的政策,还要鼓励本地居民依托本地优势创新创业。^[107]

六、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研究

(一) 电子政务和政府数据管理研究

陈兰杰等认为,政府数据是大数据的构成主体,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政府数据供给情况、企业数据吸收能力、政府数据交易规则、政府数据交易安全和数据供给监督反馈机制均对政府数据事前价值和事中价值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政府数据供给情况对事前价值的实现影响最大,而政府数据交易安全对事中价值的实现影响最大。^[108]白献阳等认为,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存在不准确、不及时、不一致、不完整、不规范、时效性差、可用性不高等主要问题,为此需构建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控制机制,包括战略支持机制、组织保障机制、流程控制机制、监督反馈机制。^[109]他们还认为,加强我国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保障政策体系建设的路径有:制定明确的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政策法规、建立具体的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标准、明确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管理职责、设计可操作的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管理规范、建立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监管制度等。^[110]彭剑君等认为,加强河北省电子政务发展的对策建议有:注重顶层设计,转变观念认识,从根本上理顺和完善促进电子政务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政府网站管理,完善河

北省电子政务建设相关机制；坚持以应用和需求为导向建设电子政务，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加强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平台的建设和联动；持续探索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机制；引进专业人才，加强培训，积极解决河北省在电子政务建设中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加大并拓宽政府投资，不断深化河北省电子政务建设的持续性和效益。^[111]

（二）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安全研究

陈兰杰基于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提出开放政府数据公共价值的六种实现机制：价值目标分析机制、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法律政策保障机制、数据监督管理机制、价值创造创新机制和数据利用反馈机制；^[112]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部门政府信息共享模型，并从业务流程角度阐述了其运行机理；^[113]结合区块链基础架构模型和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基于区块链的开放政府数据个人隐私保护模型，并从开放政府数据全流程角度对其实现机理进行了阐述；^[114]从感知价值角度，结合接受理论模型（VAM）和期望确认模型（ECM）构建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用户使用意愿结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用户的感知价值不仅对使用意愿有着直接影响，还通过用户体验满意度间接作用于用户的使用意愿。^[115]

刘邦凡认为，近年来我国数据安全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包括数据安全现状、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构建、数据安全防护技术、数据安全治理实践应用。未来中国的数据安全治理将致力于跨学科与多视角研究，国内学界应遵循科学研究的逻辑与本土情景。^[116]盖宏伟等认为，智慧政务存在技术安全风险、监管安全风险和法律安全风险，为此需针对性地采取防御策略，应对边缘节点攻击、网络通信安全攻击和边缘计算攻击；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强化信息安全管理；完善智能设备安全标准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提升信息安全监管能力，健全信息安全监管体系；关注政务信息安全最新动向，开展智慧政务信息安全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117]

（三）政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

田海舰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经验，从“主体—制度—传播—技术”四个维度系统建构

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系统有方、高效科学、多元立体的网络治理体系，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与侵蚀，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地位。^[118]张鑫等在梳理国内网络舆情识别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认为未来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丰富：借鉴多学科理论基础，开展面向网络舆情识别的领域融合研究；借助数据科学发展，为网络舆情识别提供海量数据支持及挖掘技术驱动；拓展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和可视化方法，建立立体的舆情认知视图示。^[119]杜宇飞等对我国2004—2018年涉政网络舆情领域研究情况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表明，我国涉政网络舆情研究大体可分为初始萌芽期、快速发展期、成熟稳定期；研究热点主题可归纳为涉政网络舆情传播演化机理研究、高校涉政网络舆情导控研究、涉政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涉政网络谣言治理研究。^[120]赵晨阳等构建了网络舆情多元主体引导共生模型，认为未来网络舆情多元主体引导模型的修正应进一步考虑共生主体间的耦合与互换（如政府与媒体转换角色）和主体内部的差异性（如政府中不同部门、新闻媒体类型）等复杂因素，增强模型的适用性，研究特定类别网络舆情中的引导主体。^[121]周峰等构建了基于网络舆情信息综合研判的社会安全事件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提出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共享、完善舆情监测基础建设、加强舆情信息关联分析等建议。^[122]

瞿英等构建刻画网民正负情绪交互的动态演化改进SIR模型，研究表明，社会公信力和网民信息风险感知力的提升可以提高正面情绪净化率，从而使网络舆情的演化朝着积极的态势发展，对政府部门防控疫情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123]杜彬等认为，“两微一端”时代网络舆情传播具有虚拟性和匿名性、网络传播去中心化、信息覆盖面广、传播快捷及时等特点，并探讨了网络舆情传播中受众变化等内容，引入“沉默的螺旋”和“反沉默螺旋”的相关概念和理念，为下一步更好地把握“两微一端”时代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奠定基础。^[124]苏妍嫒等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网络舆情涌现扩散受到事件、主体、环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在时效性、

根植性、不均衡性、异化效应影响下呈现阶段演化、空间集聚、等级扩散、话题衍生等跨时空群体集聚演化态势。应充分发挥政府、媒体、智库以及公众多主体功能优势,实现网络舆情“棱锥型”治理,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125]

(四) 政务新媒体研究

刘邦凡等对国内政务 App 发展现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表明,国内关于政务 App 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波动趋势,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不断丰富该领域的理论架构和应用体系;国内关于政务 App 的研究主题聚焦于电子政务、移动政务、政务 App、政务服务等方向;政务 App 最新研究课题倾向于政务新媒体、5G、云计算等,并呈明显上升趋势。未来政务 App 的研究领域仍需要开拓和创新,在丰富已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有效提升政务 App 的实用性,为政务水平优化和公民利益保障提供助力。^[126]王金雪等认为,智能时代技术与协同共治理念交相辉映,政务媒体智能化,其传播过程和传播、服务模式转变,由此智能时代政务媒体的角色由政府宣传、传播和服务渠道、工具转变为政府的数字化身、数字社会建设的引领者和多元共治的协调者,其核心价值相应地由政务信息的生产和输出转变为感知、激活和联结。^[127]白树亮等从对话公关的视角审视政务微博的对话缺陷与可行性,提出政务微博应从革新理念、深谙功能、主动发声三方面进行创新转向,促进政府和公众构建和维护良好关系。^[128]

(郭远远: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
刘灵芝: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 [1] 张艳茹,郭跃军.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J].学理论,2021(01):32-34.
- [2] 李新.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15-20.
- [3] 梁瑞英.试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党内法规执行力的提升机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12):14-17.
- [4] 商植桐,肖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必须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力的作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8):21-24.
- [5] 韩兆柱,杜佳昌.从引介到创新: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化治

- 理研究[J].学习论坛,2021(07):58-65.
- [6] 彭东立.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行动逻辑、优化契机、形成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21(05):118-127.
- [7] 王立业.信息化时代公共管理模式研究——评《公共管理学:新范式的探索》[J].人民长江,2021(07):235.
- [8] 韩兆柱.社会转型中的政府模式及其行政精神——王锋教授《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精神》评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1):封3.
- [9] 左守秋,牛庆坤.新时代国家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7):1-4.
- [10] 侯清华,郑亚男,宝娟.环境协同治理生态网络理论解析与体系构建——基于生态位理论视角[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63-70.
- [11] 张凡.“无人机夜间巡航”的隐喻:论刚性环境治理及其价值向度[J].法治研究,2021(01):139-148.
- [12] 苗俊玲,王文华.合作治理视域下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实施路径探索[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69-73.
- [13] 司林波,林珊珊.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特点及启示——基于 SSCI 来源文献(2004—2019年)的知识图谱分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85-96.
- [14] 张春玲,范默苒.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影响因素及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101-110.
- [15] 侯清华,郑亚男.基于 CAS 的京津冀生态—社会系统绿色协同治理网络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150-156.
- [16] 王韶华,杨志葳,刘晔,张伟.R&D 投入、盈利能力和政府调控对京津冀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J].管理现代化,2021(05):33-38.
- [17] 李清章,朱家奇,李梓茗.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62-65.
- [18] 王华东,侯路沙,李晓东.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京津冀水资源协同治理模式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01):70-75.
- [19] 刘叶,王军,张尚洁,梁金虎,史艺萌.白洋淀流域农村水环境治理农户参与意愿研究——以安新县 PPP 项目为例[J].天津农业科学,2021(11):58-65.
- [20] 刘洁.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J].人民论坛,2021(09中):90-92.
- [21] 孙云霞,张静.我国城市治理体系的创新之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9):83-85.
- [22] 杨凡.复杂风险环境下基层网格治理韧性的强化路径探析[J].领导科学,2021(02下):36-38.
- [23] 白翠芳.有效沟通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J].中国国情

- 国力,2021(02):43-45.
- [24]盖宏伟,牛朝文.从“刚性”到“韧性”——社区风险治理的范式嬗变及制度因应[J].青海社会科学,2021(06):119-126.
- [25]郭钰,韩占东.基层治理“疲态”与治理效能提升策略[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64-67.
- [26]崔亚杰,杨月巧.论转型期基层政府冲突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换:从“干预者”到“当事方”——基于B市一个物业纠纷事件的单案例分析[J].中国应急管理科学,2021(06):47-57.
- [27]吴景双.河北省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09):32-36.
- [28]曹雪彦.在大战大考中锤炼基层治理能力[N].石家庄日报,2021-01-31.
- [29]曹雪彦,郑保清.提升治理水平 注入“智慧”内涵[N].石家庄日报,2021-05-09.
- [30]罗杰,温小勇.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J].延边党校学报,2021(03):34-38.
- [31]向平萍,贾宝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研究[J].中国产经,2021(12):39-41.
- [32]冯立刚,苏庆国.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三晋基层治理,2021(01):32-35.
- [33]项贤国,蒙海兰,李凤志.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治理维度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5):52-56.
- [34]刘月霞,刘曼琪.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扬[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1(01):59-67.
- [35]盖宏伟,牛朝文.现代乡村系统风险治理策略:提升组织抗逆力[J].学术交流,2021(06):110-122.
- [36]李砚忠,张文礼.“统合”“互嵌”与“共强”:乡村治安治理范式研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53-60.
- [37]王卫东.雄安新区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现状、问题及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7-12.
- [38]胡梦珠,时玥.建党百年中国村治问题研究的进路与转向[J].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2):6-11.
- [39]赵宇.驻村第一书记嵌入式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分析[J].领导科学,2021(10下):99-102.
- [40]周瑾,邢玉莹,张聪.新乡贤研究综述——以新乡贤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视角[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23):217-221.
- [41]郝晓雅,陈胜开,张茜.新乡贤一定会受欢迎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参与的困境破解与路径优化[J].领导科学,2021(09下):21-24.
- [42]崔航航,房建恩.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对策[J].河北农业科学,2021(04):9-11.
- [43]王善哲,王卫东.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2021(06):9-11.
- [44]佟林杰,张文雅.乡村数字治理能力及其提升策略[J].学术交流,2021(12):118-125.
- [45]张春玲,范默苒,姜学永.乡村数据治理的问题探索及体系构建[J].经济论坛,2021(04):117-125.
- [46]张春玲,范默苒.基于SOA的乡村治理有效手段探索[J].经济论坛,2021(09):115-120.
- [47]薛亮.公共卫生安全视域下的大国战“疫”:效果、价值观与反思[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1(01):1-6.
- [48]丁荣嵘,鲁敏,韩彩欣.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政府应急信息管理机制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147-152.
- [49]古淑青,赵晓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民众社会心态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02):81-84.
- [50]赵辰玮,赵婧怡,刘韬.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任构建与专家参与——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中新闻发布会的观察[J].新闻研究导刊,2021(03):20-21.
- [51]白树亮,巩建宇.新冠疫情语境下政府公关角色定位与价值取向[J].海河传媒,2021(02):20-22.
- [52]白树亮,李元.平等、互动与理解:对话视角下政府公共关系的优化路径[J].采写编,2021(05):104-105.
- [53]曹雪彦.“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1(05):53-56.
- [54]赵永刚,徐立敏.以城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21(04):111-113.
- [55]徐立敏,杨英法,赵永刚.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探索[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1):101-104.
- [56]刘邦凡,王闻珑.数字技术对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力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40-48.
- [57]杨胜利,姚健.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再测度与思考——以京津冀为例[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03):123-133.
- [58]马斌,姚东来,夏梓莹,韩冰.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优化路径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01):59-69.
- [59]田芳,张政,杨紫琼.基于多源数据的河北省涉县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03):23-29.
- [60]刘华,张晓娜.新常态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J].中国产经,2021(09):40-41.
- [61]刘彩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耦合关系评价与协调发展策略[J].新乡学院学报,2021(02):25-30.
- [62]杨英法.以文化助配城市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21(01):80-86.
- [63]项琳.公共数字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成就、贡献与展望[J].图书馆论坛,2021(10):1-7.

- [64] 陈则谦,郑娜静,李亚灿,张晓.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现状、主要问题与优化建议[J].图书情报工作,2021(04):78-89.
- [65] 李妍,刘颖,李吉栋,柴渊哲.地方治理视角下 PPP 项目风险因素评价研究[J].工程经济,2021(11):22-26.
- [66] 潘鹏程,李莹,金璐.考虑双重需求的 PPP 项目政企匹配模型研究[J].工程经济,2021(11):33-36.
- [67] 陈玲玲,刘东,高新阳.特许经营公共基础设施 PPP 项目融资模式分析[J].建筑经济,2021(06):83-85.
- [68] 崔武文,王洪梅.高速公路 PPP 项目绩效评价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21(06):81-88.
- [69] 杨慧敏,鞠一格.多元化融资背景下 PPP 项目可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吗?——基于 CPPPC 数据库河北省 2016—2018 年 11 市的面板数据[J].营销界,2021(02):166-169.
- [70] 高鹏飞,吴琼.科学与决策的协同:新型政府循证决策模式构建与逻辑延伸[J].领导科学,2021(03下):97-100.
- [71] 靳史青,位任杰.新媒体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影响探究[J].公关世界,2021(02):185-187.
- [72] 陈宝玲,国万忠,罗敏.新中国成立以来乡镇政策执行的演进逻辑——基于“自主权”与“自主性”的分析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05):155-162.
- [73] 邢明军,王一帆,杜新军.互联网背景下政民互动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基于五个城市的数据分析[J].全球城市研究(中英文),2021(03):52-58.
- [74] 李飞,王致民.社会许可视角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制度的完善[J].理论导刊,2021(12):54-62.
- [75] 范海玉,张思茵.生态环境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与法律机制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02):82-88.
- [76] 范海玉.地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01):47-53.
- [77] 祝晓光,杜倩,李小娜,校飞.网络传播方式创新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构建——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为例[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1(03):127-132.
- [78] 沙占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减贫的政策演进、基本经验及世界意义[J].创新,2021(03):11-22.
- [79] 沙占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衔接问题探讨[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18-23.
- [80] 刘建民,柴子瞳.我国贫困治理制度优势探究[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1(03):13-17.
- [81] 王春城,王焕.乡村振兴考核评估的体系、流程与机制:基于脱贫攻坚经验的接续创新[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2-9.
- [82] 王春城,王帅.“十四五”财政政策供给的继承与创新——着眼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J].地方财政研究,2021(01):27-32.
- [83] 王春城.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J].政治学研究,2021(02):110-124.
- [84] 段洪波,刘金辉.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 J 县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66-78.
- [85] 韩梦娟.河北省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与评估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1(01):11-16.
- [86] 刘秀清,许月明,温彩璇.河北省扶贫资产管理实践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11):107-109.
- [87] 魏韬,琚理.河北省医保扶贫政策在深度贫困地区实施瓶颈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1(15):104-106.
- [88] 魏韬,琚理.运用三圈理论评价河北省贫困地区医保扶贫政策[J].经济研究导刊,2021(18):27-29.
- [89] 张颖.以纪律为引领 提升领导干部政治素养[J].党史博采(下),2021(07):29-31.
- [90] 吴杰华.任期制下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困境及其化解机制[J].领导科学,2021(03上):29-31.
- [91] 张红国.领导者韧性领导力的增进思路[J].领导科学,2021(01下):88-90.
- [92] 刘兵,冯雪,李娜.领导宽容感召中温度与硬度的尺度把握[J].领导科学,2021(06下):92-95.
- [93] 张家琪.年轻干部职务晋升中的不良性格因素及其消除之策[J].领导科学,2021(01上):113-115.
- [94] 于阔城.新时代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J].党史博采(下),2021(04):13-15.
- [95] 商植桐.领导干部突发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核心素养及提升路径[J].领导科学论坛,2021(01):136-140.
- [96] 马鑫.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路径分析[J].沈阳干部学刊,2021(04):48-52.
- [97] 翟玉,李聚光.重大突发事件视域下提升统一战线领导干部的执行力问题研究[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3):46-51.
- [98] 商植桐,张明宽.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经验与未来展望[J].济宁学院学报,2021(06):1-6.
- [99] 商植桐,肖萌.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视域下廉政建设的落脚点[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21(06):103-108.
- [100] 王国绪.“微腐败”的生成机理和治理之道[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03):26-36.
- [101] 苗俊玲,刘钰.公共组织员工隐性结盟的表现形式、影响与管理策略[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57-60.
- [102] 陈星宇.服务型政府中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构建——基于“利他主义”理论[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1(01):27-31.
- [103] 李新元,张磊.公务员履行行政责任的伦理困境与路径;人力资源开发[J].2021(03):36-38.
- [104] 周德胜,陆相林.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政策协同路径

- 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09):27-31.
- [105] 闫翹颀,孙英伟.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科技人才政策生态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04):27-31.
- [106] 李婷,郭鸿湧.人才吸引力因素与政策工具契合关系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科技促进发展,2021(04):729-739.
- [107] 熊兴国.雄安新区创新创业人才政策研究[J].经济论坛,2021(03):138-142.
- [108] 陈兰杰,李邀.政府数据生产要素价值实现影响因素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77-82.
- [109] 白献阳,邝苗苗.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控制机制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07):71-78.
- [110] 白献阳,邝苗苗.我国政府数字信息资源质量保障政策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21(15):40-47.
- [111] 彭剑君,白海琦,曹鸿飞.促进河北省电子政务发展完善政府数字基础设施[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02):50-54.
- [112] 陈兰杰,李婷.基于战略三角模型的开放政府数据公共价值实现机制研究[J].情报探索,2021(09):1-7.
- [113] 陈兰杰,王静涵.基于区块链的跨部门政府信息共享模型及实现机理研究[J].信息系统工程,2021(10):84-89.
- [114] 陈兰杰,闻航.基于区块链的开放政府数据个人隐私保护模型及实现机理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01):67-72.
- [115] 陈兰杰,韩涵,侯鹏娟.感知价值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用户使用意愿影响研究[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1(04):88-97.
- [116] 刘邦凡,臧梓健.我国数据安全治理研究(2015—2020):主题与演进趋势[J].通信技术,2021(09):2190-2195.
- [117] 盖宏伟,牛朝文.智慧政务的信息安全风险及防控策略[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1(07):50-54.
- [118] 田海舰,冯艳彬.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四维向度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9):1-6.
- [119] 张鑫,刘鑫雅,张雅文.我国网络舆情识别的研究脉络、核心主题与发展趋势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21(03):90-96.
- [120] 杜宇飞,李顺纳.我国涉政网络舆情研究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2004—2018)[J].武警学院学报,2021(02):66-72.
- [121] 赵晨阳,张鹏,夏一雪,张立红,窦云莲.共生视角下网络舆情多元主体引导模型研究[J].现代情报,2021(12):107-120.
- [122] 周峰,周正.基于网络舆情综合研判的社会安全事件预警研究[J].情报探索,2021(06):24-29.
- [123] 瞿英,田红梅,种子鹏.基于改进 SIR 模型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情感演化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80-85.
- [124] 杜彬,刘彦超,李蕾,兰月新.“两微一端”时代网络舆情传播主体及受众变化规律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21(06):75-79.
- [125] 苏妍嫒,张亚明,刘海鸥.非传统安全威胁下网络群体集聚舆情传播治理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06):138-145.
- [126] 刘邦凡,范丹丹.基于 CiteSpace 政务 APP 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海峡科技与产业,2021(07):11-14.
- [127] 王金雪,姚鹏.智能时代政务媒体的角色定位与传播价值重构[J].新闻世界,2021(10):15-18.
- [128] 白树亮,李元.理念、功能与话语:对话公关视野下政务微博的创新转向[J].青年记者,2021(02上):70-7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

金胜勇

2021年的河北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下文简称“图情档”)研究呈现出由点及面、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利用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2021年度的学术论著论文进行主题检索,可检索出河北省学者的专著7部、学术论文440余篇,其中包括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学术论文52篇。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图情档理论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图情档事业建设”“图情档工作实践”“图情档技

术应用”五个领域,反映了图情档学科的综合性和多层次特点,也映射出新时代河北省图情档学术研究的守正创新。

一、图情档理论研究

任何学科的理论基础都是其学术体系的立足之基,深刻影响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长远发展,故而理论研究的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2021年河北省图情档学科理论研究包括理论创新、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以及其他理论研究三方面。

（一）理论创新

2021年正值“十四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图情档研究者结合文化强国愿景，依托于数智赋能驱动力，积极进行理论创新。王欣等对孟连生先生数字图书馆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思考，以期当前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1]刘海鸥等在情景融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用户画像的思想对移动图书馆的读者和图书资源构建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既而从维度、层次和路径三个方面对用户画像和资源画像的融合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画像情境化融合在移动图书馆推荐系统中的应用，为移动图书馆推荐系统实现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服务提供参考。^[2]李媛等以第三空间理论为指导，分析相关研究现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择京津冀地区高校图书馆为研究对象，设计可行性问卷进行调查，发现绝大部分高校图书馆正通过创新服务向第三空间转型，高校图书馆第三空间建设存在地域性差异，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第三空间建设相对更加完善。^[3]刘蕾等根据学术界基于“场所—公共场所—第三空间—知识情境—公共知识空间”的逻辑脉络，研究确定了图书馆空间的理论基础，指出需要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分类理论、建构主义知识观和知识螺旋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建构理论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集合，来理解图书馆空间服务。^[4]石佳鑫、屈健通过研究我国情报工作面临的大数据环境，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成果，对大数据时代下的情报进行新的定义。^[5]崔学柳基于自身工作实践阐述了档案工作与史志编修的关系，提出档案工作是史志编修的基础，为史志编修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与相关便利条件；同时史志编修促进档案工作，有利于激励档案工作、丰富档案室藏、规范档案管理、加快档案信息化。^[6]

（二）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图情档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反映了图情档学科的研究热点和未来走向，对图情档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图情档学科的发展脉络。金胜勇、张琪使用 CiteSpace 工具，以近五年国内图书馆学关于数据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分析出图书馆学发展数据化的三个热点研究领域，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探讨图书馆学发展数据化的趋势、成因和策略。^[7]张鑫等梳

理有关国内网络舆情识别研究成果，结合发展脉络、核心主题以及研究力量等，在对现有研究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借鉴多学科理论基础，开展面向网络舆情识别的领域融合研究；借助数据科学发展，为网络舆情识别提供海量数据支持及挖掘技术驱动；拓展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和可视化方法，建立立体的舆情认知视图示。^[8]路青使用文献题录统计分析工具（SATI3.2），通过文献计量以及社会化网络分析软件图谱绘制，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研究现状和热点进行分析。^[9]唐中楠等提出 SCS 模型研究领域发文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 2 个方面，一是 SCS 模型与其他模型的耦合应用研究，可为洪水灾害预警响应提供理论支撑；二是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小流域 CN 值率定研究，以建立适合中国各地区的 CN 值数据库，为中、大尺度流域径流量模拟奠定基础。^[10]梁杰认为，档案管理工作从过去的传统手工式管理，进入到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引入档案管理中，是档案管理未来的必然趋势。^[11]

（三）其他

申学文采用文献调研法，建立研究框架，通过研究发现有关专利竞争情报和竞争情报作用研究众多，而技术、人际、产业竞争情报相关研究很少；竞争情报教育亟须推陈出新，改革现有模式，解决课程等实证研究程度不均衡的问题。^[12]殷阿娜、朱宏涛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 1990 年代以来“绿色经济”研究主题的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中文文献总量及结构、学科领域分布、研究方法分类、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对策四个方面，对中国“绿色经济”研究文献进行综述。^[13]郭志安研究发现，宋代为防止出现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泄密的问题，宋廷采取多种举措以加强保密制度建设，并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突破了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局限，对当今保密制度建设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借鉴和启迪意义。^[14]孟月、马爱芝认为档案制度建设与档案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三者共同组成了良好的档案治理生态，形成了共生、协同、互构的联动关系，档案制度推动档案治理的优化，档案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倒逼制度不断更新完善。^[15]刘志国等通过对图书馆空间服务相关的概念和原理进行辨析，指出

图书馆空间服务是由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和情境服务构成的用户服务体系。^[16]

二、信息资源管理

2021年,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在河北省图情档案专业研究中占重要地位,其主要研究内容围绕信息组织、信息传播和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三方面展开。

(一) 信息组织

赵琨对比分析分别应用RDA标准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制音像电子资源的异同,研究使用内容类型、媒介类型、载体类型替代一般资料标识(GMD)的可行性,指明了CNMARC数据格式配合RDA标准需作出的一系列调整,并列出了按不同规则制作的音像电子资源数据样例。^[17]杨青针对新时期图书馆文献编目的对象、方式以及环境都发生了相应转变,编目工作存在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细则不够规范、编目数据缺失、编目工作外包缺乏监管等问题,从提升员工工作素质、建立统一编目工作标准、各图书馆加强联机联合编目、重视用户反馈、加强编目资源的维护等方面提出优化措施,以期提升图书馆文献编目工作的质量和用户体验。^[18]刘坤照结合多年工作实践,对《中图法》从第4版到第5版的类目设置重叠进行了反复比较研究,提出了《中图法》类目修订改进的方法。^[19]

(二) 信息传播

信息传播受各种新媒体技术革新的影响,其传播主体、传播途径及传播内容也随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在参与信息传播时因时而变。李思越认为档案微信公众号应该以提供档案信息利用为基本点,把握档案信息区别于其他信息资源的本质属性,客观还原档案本质,关注档案信息用户的需求,以此来吸引更多受众。^[20]谢巍弘、李颖通过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传播的关联性分析,从档案工作者被赋予数字人文主义者的角色、智能检索技术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可视化技术丰富档案信息传播方式三个方面探讨了数字人文对档案信息传播的影响,并提出优化档案信息传播者的专业知识结构、利用量化数据库加强传播内容的组织、把握媒介的多元化趋势、适时实时调整分众传播策略等档案信息传播效果提升

对策。^[21]魏霞认为,全面发挥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公众的价值,档案信息传播主体应该创新档案信息传播形式,以当前深受信息用户喜爱的短视频形式进行传播,同时在档案信息视频化传播中,传播者要保证视频质量的优质性,加强宣传,吸引受众注意,增加受众黏度,促进档案信息价值的发挥。^[22]费建梅、陈军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对2010—2020年间公开发表的档案信息传播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近十年档案信息传播相关文献忽视了对于传播内容的研究;多为传统理论研究,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少;多为学术探讨,应用层面的研究较少。为此提出理论研究要注重在实践中的应用,避免学术研究与现实工作脱离,加强传播技术的研究,注重对各传播要素研究同步进行,健全档案信息传播体系,使大众更便于享受档案信息的传播成果。^[23]

(三)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谢巍弘探讨了老字号声像档案信息资源助力“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开发策略,提出以档案记忆观为指导原则,以相关法规标准为工作依据,注重学科支撑与技术支持并重,来拓宽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空间,用新媒体宣传开发成果。^[24]申灿、李瑶在深入解析红色档案价值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证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基于当前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合特色资源、完善技术手段、提高专业能力、合作联动机制的建议。^[25]公文纸本古籍因本身较好地保留了原始公文内容,因此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公文纸本古籍散藏于各类典籍和世界各地,加之各地对典藏古籍的著录不够完善,使公文纸本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步履维艰。耿洪利认为,在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中将其发掘出来进行必要的整理与研究是学界的一大课题,同时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种新视角。^[26]张晓霞分析了多源异构信息环境下,研究融合多源信息的情报分析方法是企业竞争情报研究和应用的关键。通过分析不同情报源的特点,结合企业竞争情报服务分析范式框架,提出了基于市场与行业视角的多元多源信息环境下企业竞争情报服务的模式。^[27]徐晓静、杨更亮等采用问卷方式对某三级甲等医院各医疗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调查,以此了解医护人员对医学图书馆数字库资源的使用、服务满意度等情况,并

根据调查结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宣传、提高数据库文献检索知晓率,加强图书馆与医护人员的互动,加强图书馆与医护人员的互动的针对性策略,以期为医学图书馆提升数据库服务水平提供参考。^[28]

崔学柳、黄洁芳以河北省第一个地下水监测站的档案为例,呈现档案员回归手工检索方式,通过已有线索最终获得精准信息的艰辛过程,依此提出档案工作者应该尊重历史,对历史盲点做好标注,做好前端控制,规范归档,不忘初心,多措并举保护档案。^[29]赵宇辰等针对河北省档案馆历年利用数据,从查阅用途、查阅主体、查阅途径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河北省档案馆应该继续做好查档常识普及、继续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探索档案鉴定的更高效渠道、探索省市县跨馆查询的可行性建议。^[30]

赵帅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影响档案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指出档案利用应以坚持档案开放为主抓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方案层各要素,根据具体实际调整方案布局。^[31]马玉杰等认为,档案馆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应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主旋律的前提下,采用馆企合作、组建专业设计团队或艺术授权的方式,深度挖掘馆藏档案文化内涵,开发特色和实用产品,并利用数字媒体和知名品牌的优势,打造多种营销模式。^[32]白艳辉、陈丽娟为应对医院档案资源集约化管理程度不足、档案信息价值挖掘有限等问题,提出后疫情时代的医院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需要全面推广数字化档案管理模式,优化移动端管理平台,采取实物档案集中化管理,适时调整入馆机制,同时构建联动机制,深化档案信息资源再开发。^[33]

刘丽华等对美国高校图书馆灰色文献资源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美国高校图书馆灰色文献收藏和服务特色,认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灰色文献收藏制度建设,结合地区发展与学科建设,开展灰色文献特藏建设,专设灰色文献服务岗位,提升灰色文献建设人员素质,深挖灰色文献价值,提供灵活多样的灰色文献服务。^[34]耿志明、徐红昌设计了新生态环境下图书信息资源智能整合系统,使用 K-Means 均值算法对系统中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并使用牛顿法作为图书资源搜索的主要方法,实现系统的基本搜索

功能。^[35]

三、图情档事业建设

图书馆事业、情报事业、档案事业的建设进程既体现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关系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2021年,图书馆事业、情报事业、档案事业的建设仍然是河北省图情档学科研究的热点,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发展战略研究、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以及其他等五方面。

(一) 发展战略研究

公共文化发展战略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公共文化机构的实际工作奠定基础。公胜勇、彭妍基于河北省公共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跨学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河北省公共文化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外,通过分析京津冀现有的公共文化建设的的基础、目标,结合政策因素、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来构建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机制提出“凝练精神、践行核心、协同交融、提升品质、深化改革”的公共文化发展战略,并通过探讨战略实施途径和策略丰富区域公共文化一体化理论,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建议。^[36]数字经济时代逐渐改变了图书馆、档案馆的传统运营模式,图书馆、档案馆等如何在变革的环境中寻求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学者的关注点。柳贝贝等围绕实现数字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下提高服务创新行为有效性,提出高校图书馆提高服务创新有效性措施。^[37]杨红霞等基于高校图书馆的信息、人力、平台资源优势,面向小微企业在市场反应和应对能力差、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管理方式粗放手段匮乏等问题,以及创新发展的困境和需求,提出高校图书馆利用强大的信息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大量的高端人才资源、丰富的专业技术成果储备等突出优势,为广大的小微企业提供基于创客空间模式的技术创新支持、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个性化情报信息服务、基于专业人才和资源的管理提升支持,为小微企业的创新提供支撑。^[38]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吴颖认为图书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分别充当了政府决策的情报支撑、专业突破的科研支

撑、公众认知的权威支撑、大众文化的推广支撑等角色,并根据我国各类图书馆应对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应急信息服务现状提出了我国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机制建议。^[39]曹瑞等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医院档案信息化特点,以及信息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大数据时代医院应构建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统一管理渠道、优化档案信息组织机构、明确管理职责、健全档案信息安全体系、强化档案信息宣传教育、提升综合素能的策略。^[40]于成杰等从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两方面对《俄罗斯图书馆发展构想(2018—2025)》进行全面的解读,阐述该构想在研究制定过程和文本内容方面呈现的战略性、自主性、开放性和责任性。通过对这两方面的分析,并且结合我国图书馆现状,得出其对我国制定和实施图书馆发展规划的启示。^[41]

(二) 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

高校图书馆服务的本质是高校图书馆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社会的变革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方式。张晓霞、王一威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探讨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内涵、必要性和现状,指出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进行探讨,以期为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42]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冠肺炎档案的价值,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利用及提高社会档案意识,康盼红提出了建设档案数据共享平台的方案,有利于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经验;有利于社会公众参与,充分发挥档案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疫情防控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有利于满足管理需要,便于档案集中管理。^[43]主雪梅等结合高校图书馆跨领域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认为高校图书馆走出去寻求跨领域合作既能有效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又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期望。^[44]

(三)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依托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利用红色资源、发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责任。陈则谦等从用户角度,采用网络调查法,构建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中用户多元角色参与的分析框架,揭示其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现状,选择服务平台并制定用户参与任

务,采用用户测试和半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记录和分析用户完成参与任务的过程,并对此提出优化建议。^[45]刘丽华等运用网络调查法,对河北省级公共图书馆红色数字资源建设情况和红色文化服务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省级公共图书馆存在自建红色文化数据库较少、红色文化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红色文化宣传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要从提升服务意识、深挖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文化精准服务、成立红色文化服务联盟等改进策略,提升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服务水平。^[46]任确实、张伟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阐述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背景及意义,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进行研究,并对文旅融合服务发展作了实证分析。^[47]李依轩、李梅通过对构建大庆地区公共图书馆城乡一体化服务模式进行研究,对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格局的形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缩小城乡文化差异,形成城乡文化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有重要意义。^[48]

(四) 专业教育与队伍建设

在课程教育改革方面,本科生是档案学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也是未来档案事业的主力军。锅艳玲等立足数字人文视角,聚焦档案学本科生数据素养,探究优化培育路径,提出以课程建设为“抓手”,构建“档案+信息+数据”为一体的课程体系;以实践为“抓手”,打造“技术+平台+实训”为一体的实践体系;以竞赛项目为“抓手”,建设“竞赛项目+师资+学生”为一体的项目体系。^[49]郭晓伟等将OBE教学理念引入到“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以学生学习成果为驱动设计教学活动和评价标准,对文献检索课程实践部分进行重新设计,创新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通过课程实践目标和内容的改革和创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信息素养。^[50]赵素彦、李曼研究了“专业(类)+学校”的平行志愿填报和录取模式,凸显专业优先的理念,增加了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权,同时指出在新工科背景下,信息管理专业需考虑市场需求,构建提升大学生能力的专业建设模式,以更好地解决大学生的应用能力与当前市场人才需求不能适配的问题。^[51]杜占江通过对“信息管理学”课程内容特点的分析,针对该课程教学任务,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想政治元素,将课程相关信息管理

领域热点人物、著名信息服务机构和信息管理热点事件作为教学案例,与课程内容深度融合,发挥案例教学的优势,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实现课程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专业自信、培养积极进取精神等课程思政内容的有机结合。^[52]

在图情档人才队伍建设上,丁玉东等从信息环境、高校图书馆、馆员、读者和新媒体设计五个方面,论述馆员新媒体服务建设的必要性,要求馆员既要具备图书情报领域的专业能力,又需要新媒体意识和一定的艺术、技术功底,提出图书馆应重视新媒体岗位,并通过岗位培训、交流合作、参与实践、政策支持等方式,提高馆员的新媒体服务能力。^[53]随着智慧图书馆的发展,高校图书馆面临高层次专业化人才短缺的难题,同时基于高校图书馆的工作性质,图书馆内部也一直存在人才流失现象。柳贝贝等阐述了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及人才共享现状,对高校图书馆人才共享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建立高校图书馆人才共享机制的对策,以应对数字化时代高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短缺以及人才流失的情况。^[54]

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谢宝义等分析了当前高校图书馆发挥教育职能的现状,以及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隐性特征,在当前大思政背景下,阐述了图书馆开展思政教育的独特优势,也指出开展思政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55]路青、周媛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对乡村振兴视域下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进行探究,分析图书馆服务乡村振兴发展现状,从职能定位、体系建设及机制建设展开探讨,进而推动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快速发展。^[56]为解决高校图书馆人才流失问题,柳贝贝等用SEM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图书馆人才流失影响因素的路径指数,以此为据提出有效留住人才、按需培养人才,认为高校图书馆应着重从人才发展理念、发展环境以及心理契约建设三个层面着手优化人才队伍。^[57]李媛以高校图书馆馆员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统计分析法分析数据,对自我设限这一在行业变革和职场转型中比较常见的消极应付和自我保护的策略进行研究。^[58]

(五) 其他

数字出版物的发展,加剧了文献信息资源的可共享性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间的矛盾。金胜勇、章亭采用比较研究和文本分析法对英国的电子书公共借阅权相关法案进行分析,总结英国电子书公共借阅权以及补偿金的特点,为我国实行数字出版物公共借阅权补偿金制度提供借鉴。^[59]在“双一流”建设动态调整、不搞终身制背景下,姚秀敏等选取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唯一一所师范类“双一流”高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为对标馆,构建由5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对标研究指标体系来收集数据,回顾对标研究在国内外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情况,尝试将对标研究法应用于改进师范类普通高校图书馆支撑学科建设的实践,并从资源、服务、空间、技术、人员五大核心要素进行差距分析,拟定图书馆支撑学科建设的提升策略。^[60]徐晓静对医院图书馆服务环境的要求进行分析,从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图书管理人员专业化、构建医院机构知识库、开展个性化服务、提供即时信息服务、完善现有制度等六个方面提出医院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构建对策。^[61]

常颖聪等通过文献调研、实例分析与网络调研等对国内外图书馆品牌理论研究、国内外高校当前主要品牌建设类型及IFLA国际营销奖获奖品牌进行分析,梳理出高校图书馆品牌发展进程及高校图书馆品牌理论、实践及营销模型,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入品牌理论研究、加强理论创新、吸引读者共创品牌、拓展品牌营销策略、深化服务模式改革等建议,为促进图书馆品牌建设、图书馆营销及图书馆服务发展提供参考。^[62]

马晓英、孙多青针对图书馆和谐度评价的模糊不确定性,以及构建和谐图书馆与熵理论所具有的耦合性,给出了高校图书馆和谐度评价方法,通过文献分析,从服务层面构建了图书馆和谐度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拟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服务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和谐度模糊综合评价模型。^[63]

四、图情档工作实践

开展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档案工作是实现图书馆价值、情报价值、档案价值的主要途

径。2021年,河北省学者在图情档学科工作实践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图书馆与档案管理工作、图情档资源建设、图情档信息服务三个方面。

(一) 图书馆与档案管理工作

图书馆、情报研究机构及档案馆是将各种信息资源整合并提供给民众的重要场所与途径。图书馆与档案管理工作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空间建设、图书馆档案馆人力资源管理、图书馆建设与评估,以及档案提供、信息资源获取等方面。

张艳欣在对我国档案馆档案安全保护现状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将生态安全概念引入档案安全保护研究中,从生态脆弱性控制与档案生态风险防范及应急管理两个方面探讨档案生态安全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系统当前面临的内忧外患,档案生态系统主体、客体的安全现状与影响因素,提出档案生态安全的实现需要以常态安全保护与非常态安全保护为基础,通过脆弱性管理与风险管理确保常态安全的实现,通过应急管理确保非常态安全的实现。^[64]陈兰杰认为,近些年世界范围内的突发事件频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应急信息管理的方式,为应急管理提供了新的决策模式,系统阐述了应急信息管理的相关理论,包括应急信息管理概述、应急信息政策与法规、应急信息采集、应急信息分析、应急信息传播、应急信息管理技术、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应急信息共享以及应急文化与应急管理等。同时,对应急信息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包括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应急信息传播的信任因素研究、长生百白破疫苗事件期间社交媒体信息扩散行为研究以及该事件中公众应急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等。^[65]吕霞等阐述高校图书馆空间概念和意义,通过对国内外高校空间布局经典范例的介绍获得灵感和思路,提出高校图书馆空间布局改进及切实可行的空间拓展措施。^[66]

在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孙红亮等在“区块链”技术的背景下,对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做了研究,对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展开论述,指明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区块链”技术给出解决方案,旨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稳步开展。^[67]贺磊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对

退役军人档案管理模式进行创新,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加强档案管理安全保障设施,改善退伍军人档案管理社会环境,建立高质量档案管理队伍,促进退役军人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使其适应时代需求,更好地作用于退役军人档案管理,呈现退役军人档案最大价值。^[68]

在图书馆建设与评估中,丁若虹等对国内现行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指标、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县级图书馆标准、部分省县级总分馆制建设考核指标进行共性、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为设立总分馆制建设考评标准化和机制提供借鉴。^[69]丁若虹、赵学平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以河北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为例,总结其实践经验,提出理顺各方关系、制定长远规划、发挥总馆作用、完善评价体系的工作思路。^[70]姚文彬通过个案研究阐述了当前高校图书馆档案管理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规范和完善档案管理体系、建立信息化档案存储系统、提升档案管理人员信息素养、丰富档案内容结构的策略。^[71]谢广林等通过网络调查法,重点围绕图书馆的办馆设施条件、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教学与科研支持,发现河北省民办高校图书馆办馆水平和服务水平随着学校的发展不断得到提升,但同时也存在馆藏资源匮乏、资金投入不足、服务水平不高、服务深度欠缺等问题,从增加经费投入、文献资源共享、创新服务内容、优化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72]

长期以来,机关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与服务存在工作理念与传统档案管理模式不能充分适应新形势下单位需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属性,对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苏志红着重分析上述问题,提出改变服务理念,提升工作价值,做好人才培养,强化技术保障的解决措施。^[73]张艳娟等提出档案工作部门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整合优化各类民生档案资源,提升档案管理规范化、系统化、信息化水平,推动档案利用更加便民、更加高效、更加充分,使档案工作成效真正体现在服务民生、改善民生方面。^[74]张博宇认为,推进新时代高校档案管理工作发展要强化依法治档重视度,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度,强化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推进档案管理理念更新,加强存

量档案数字化, 助推增量档案电子化, 强化区域合作互联互通, 促进档案管理智能化发展。^[75] 档案公众参与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更是促进档案工作发展的关键路径。王雨晴对国外档案公众参与的实践内容、特色进行研究, 从完善公众参与档案工作管理体制、丰富公众参与档案项目实践类型、重视社交媒体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等方面, 为提高我国档案公众参与度提出参考性策略。^[76]

(二) 图情档资源建设

资源建设是图情档业务实践的基础, 图情档资源建设包括在“双一流”“互联网+”等新形势下, 高校图书馆资源的选择与采集、馆藏资源的建设以及特色信息资源保护等方面。

在馆藏资源建设方面, 孟银涛、赵蕾霞运用文献调查和网络调研对英国 17 所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与服务进行研究, 对其特藏资源建设方法、文献范围类型、标准化建设、宣传推广、相关制度、服务项目 6 个方面进行分析, 并结合国内“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 提出强化外部合作, 推行特藏标准化建设, 多途径创新宣传, 完善特藏资源政策体系, 创建需求驱动的特藏服务, 重视对教学科研的支持等 6 项建议。^[77]

在“互联网+”时代,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存在新的机遇和挑战。张俊立等分析我国高校图书馆书籍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加强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数字资源安全建设等策略。^[78] 马杰等针对高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量下降的情况, 指出高校图书馆需要重新思考纸质图书的功能与定位, 拓展阅读推广服务, 构建纸质图书复本量动态模型以及加强纸质书与电子书统一管理, 为读者提供更加多元、便捷的信息获取途径, 提升纸质图书的利用效果。^[79] 李媛等就我国高校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存在价值进行思考, 对大量国内外关于第三空间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和综合分析, 提出今后第三空间高校图书馆建设研究需要依靠实证作研究、用客观数据说话。^[80]

档案是历史沿革的有力见证, 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与宣传教育价值。在名人档案资源建设工作中引入口述史方法可有效弥补现存档案史料不足的问题。祝金梦通过考察高校档案馆开展名人

建档工作现状, 采取 SWOT 态势分析法, 剖析高校名人口述档案资源建设工作中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 提出前端控制, 重视访谈设计, 内外联动, 规范采集流程等措施。^[81] 马丽娟对公共图书馆家谱收藏利用现状进行介绍, 发现众多公共图书馆在家谱收藏时存在着重收藏而轻利用等情况, 提出了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家谱的收藏利用工作, 增强特色馆藏建设的思路。^[82] 王慧总结分析高校建筑工程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可鉴经验, 探究信息化建设和规范管理模式, 从加大信息化投入、以资料控业务、资源协同共享和信息安全标准等方面给本行业提供可参考途径。^[83]

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 有价值信息的存档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正在演化成为归档的一个新门类。平彩鹏等对河北省地震局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中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信息资源, 开展收集、筛选、分类、编目、归档和存储等方法研究, 在此基础上, 构建完成了冀震社交媒体信息档案。^[84] 刘坤峰、刘欣慧提出各机构协同合作建设、利用新技术建设、与周边产品相结合建设, 建立大运河沧州段档案展示中心的观点, 旨在帮助大运河文化、精神、历史能够更完整更悠久地保存传承下去, 促进沧州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更好地发展。^[85] 魏歌、吴志杰基于对数字人文产生、演变及基本特征的分析, 从时机、需求和价值三个角度诠释了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合理性。认为, 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档案馆建设在目标层应构建以知识生产和知识利用为导向的数字资源共享平台; 在资源层应同时兼顾资源收集的广度拓展以及资源开发的深度提升; 在模式层应选择符合实际的建设模式; 在实施层应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建设机制。^[86] 张彤论述群体智慧的内涵, 分析基于群体智慧的图书馆文献征集发展趋势, 并设计了健全文献征集制度、加强资源共享意识和增强文献征集工作专业性的图书馆文献征集模式。^[87] 孙玲玲等介绍承德城市记忆资源发展概况, 阐述收集承德记忆资源及构建资源体系的意义, 重点分析承德记忆资源现状与内容, 提出其呈现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88]

(三) 图情档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是当前图情档界理论研究和工

践关注的热点之一。2021年,河北省图情档信息服务研究主要包括知识服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个性化信息服务、企业信息服务以及其他信息服务五方面。

在知识服务方面,郭海玲等认为,新媒体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技术,呈现出各种媒体形态,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信息服务在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与发展,面对新媒体环境,开展信息服务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思维和条件,要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前瞻性。^[89]李颖指出,新媒体以传播媒介的改变和进步,引发了个人行为方式、组织管理活动的改变,也引发了国家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整个社会的变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档案公共服务,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基于我国档案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新媒体环境下档案公共服务实现的机理和策略,使档案公共服务在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中有所可依、有理可遵、有道可循,从根本上指导档案公共服务的实现,并为新媒体环境下档案公共服务的实现,构建完整的框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以及具有适用性的方法。^[90]张媛等以科研项目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为导向,分析嵌入科研项目的知识服务现状与个性化、交互性、虚拟与现实空间融合、跨学科等特点,探讨进行嵌入科研项目的知识服务的实施方法,对嵌入科研项目的知识服务实施提出建议。^[91]孙会清、王秀丽采用网络调查法,选取地处京津地区5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调查对象,对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面向校内师生开展应急性知识服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归纳其服务要点,从保障学术文献资源的有效供给、线上学科服务不停、线上文化推广活动助力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一是高校图书馆应制定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知识服务预案,二是要明确应急知识服务的重点,三是创新灵活高效的知識服务模式,四是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升级知识服务。^[92]

在阅读推广服务方面,赵俊玲等采用历史分析法对我国阅读推广课程百年变迁进行分析,划分了起步期、上升期、波动期、复苏期四个时期。起步期注重读物类课程和推广类课程;上升

期服务类课程日益丰富,开始出现读者研究相关内容;波动期阅读推广教育整体放缓,读者研究有所发展,但读物和服务相关内容弱化;复苏期继续教育蓬勃发展,学校教育中的阅读推广课程开始恢复,但整体规模较小。因此,提出应该建立培养识书能力、读者研究能力和阅读服务能力的阅读推广课程体系。^[93]康思本等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把握阅读推广的时代价值,分析其阅读推广的模式与特点,发现文旅融合背景下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提出图书馆文旅阅读推广路径。^[94]在数字化时代下,公共图书馆应担负起帮助读者培养数字阅读习惯的职责,提升阅读的综合素质。潘伟通过阐述数字化阅读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特征,从数字化阅读视角下对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改进提出具体的建议,以期可以切实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建设能力,形成优良的全民阅读氛围,促进文化事业发展。^[95]在数字阅读的背景下,殷婷婷等通过研究传递信息、引导用户、落实服务、完成推广等一系列内容,满足用户选择性获取资源、完成阅读操作、享受推广服务、提出服务建议的相关性需求,提升图书馆的图书质量和用户满意度,保障对用户的隐私安全负责。^[96]解娜运用5W1H法,通过案例研究对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共读地点、时间、图书内容、分享信息点、原因等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获取读者的资源阅读偏好、需求与期望,以便给予定向精准的阅读推送服务。^[97]刘君君等就新型阅读推广模式的效果、适用性及存在问题进行阐释,认为高校阅读推广活动有其特殊性,应根据高校服务教育教学及读书育人的需求构建一定模式,并对唐山学院图书馆展开分析,指出其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出了定制式阅读推广模式、嵌入式阅读推广模式以及社团分享模式。^[98]王学贤、魏祥丽在介绍“暑期阅读俱乐部”的评估目的、评估主体、评估内容、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以及评估结果等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其特点,并对我国阅读推广活动评估工作提出建议。^[99]张行、谷娜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柳诒徵的阅读推广思想进行探究,描述了柳先生以传播文化、开启民众为阅读推广理念,包括以藏书建设作为阅读推广基础,完善规章制度作为阅读推广的保障,编制书目作为阅读推广的工具,开展参考咨询举办展览等学术交流活动作为阅读推广的手段等,极大

地促进了省立国学图书馆的阅读成效,为现今的阅读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民国时期还没有阅读推广这样的概念,但是柳先生在国学图书馆进行的实践活动,对当下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100]殷婷婷等在全媒体环境下,主要针对全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进行详细分析,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士有所帮助。^[101]李杏丽、王景文基于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实践过程进展缓慢、受众面小等现状,提出以阅读社群为平台推广阅读疗法,发挥社群核心成员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吸引关注阅读疗法的大学师生聚众,通过稳定的阅读疗法模式引导社群成员的阅读行为,明确社群目标,构建高校阅读疗法服务品牌。^[102]张楠立足于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以及公共图书馆在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中的地位和优势,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阐述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具体实践,并针对当前的阅读推广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文献资源建设、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创新活动模式、利用新媒体开展微阅读等措施。^[103]肖静等在了解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师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和专业文献资源需求特点的基础上,分析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发展困境及图书馆资源服务对于特殊教育专业发展的意义,提出高校图书馆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文献采购形式,构建特殊教育学科特色馆藏,利用数字技术自建特殊教育专业特色数据库,开展多样化的信息技术活动,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信息素养。^[104]殷婷婷等以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工作为研究对象,阐释了跨领域合作的含义及意义,分析了跨领域合作在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指出跨领域合作在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工作中,应该加强与校内其他部门合作交流,创新服务模式,引进培养人才,拓宽合作领域,完善保障制度。^[105]

电子资源服务是图书馆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校园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张钦恒分析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及其服务内涵,对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移动服务技术在图书馆电子资源服务中的应用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构建融合式多种资源发现服务

大系统,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个性化服务,丰富移动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等优化策略。^[106]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校园等在各个行业中不断探索和实施,智慧图书馆也成为图书馆建设发展的方向,赵兴华就高校图书馆日益智慧化环境下的读者服务中的智慧化服务进行探讨,指出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107]

在企业信息服务方面,支凤稳、郑淳元揭示我国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竞争情报需求的特征及内在关联,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对 20 项 CI 的需求程度不尽相同,既有共性需求,也有个性化需求,同行业竞争对手情报和创新策略情报是所有企业最迫切、最稳定的 CI 需求,相关 CI 服务机构可以根据 CI 需求特征及关联,制定更有针对性的 CI 服务策略。^[108]古奕乐通过梳理知识图谱行业发展脉络,得出知识图谱技术概况、分布特征以及目前知识图谱行业的市场需求和研究方向。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运用 HimmPat 数据库对知识图谱技术专利文献从专利申请趋势、专利技术构成、专利申请地域分布、专利受理地域分布和专利申请人 5 个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比较分析和因果分析,发现知识图谱技术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成长期,其前沿核心技术尚未成熟,专利申请和受理以及全球重要申请人的分布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激烈的竞争的结果。^[109]刘平等介绍了技术竞争情报(CTI)的内涵及发展现状,以及预警服务模型的构建,指出通过技术竞争情报的风险识别与预警服务,可以使企业技术创新时获悉相关的信息知识情报,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各环节潜在风险等,及时作出决策,提前做好风险应对方案,取得技术创新的成功。^[110]曹国忠等对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基于“主体—行为—客体(SAO)”三元结构的专利分析工具展开研究,包括 SAO 结构研究主要内容和基于 SAO 结构的专利分析流程及其应用。^[111]为了构建专利与创新方法相衔接的桥梁性信息结构模型,将专利法律性文献信息转变成面向不同技术路径识别的权利地图,加强专利情报信息的有效利用,贺伟、李辉提出专利信息分析“五流”模型,面向关键专利或专利组合的制度约束,助力创新型企业充分利用关键专利文献信息,实现专利规避设计、提高创新性方案战略机会的有效识别。^[112]

在其他信息服务方面,马兰、姜波以河北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利用网络调查法和文献调查法,对河北省“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双一流”支撑服务进行调研,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113]魏小贞、刘丽华以哔哩哔哩平台为例,对高校图书馆视频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得出视频平台入驻率低、运营不规范、缺乏特色品牌、没有深入挖掘平台等问题,基于调研结果,提出高校图书馆视频服务的开展建议,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114]在云时代,云思维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推动着各行业领域创新。冯玉娥等基于云时代特征、背景,围绕医院数字图书馆学科信息服务的建设现状,探寻优化信息服务模式,致力于提高医院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水平。^[115]栾小红阐述了医院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现状,对数字化时代医院图书馆读者服务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其自身的工作经验,提出着重搭建数字图书馆、构建交互式平台、优化调整馆藏结构、开发多样的服务模式等一系列数字化时代医院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创新策略。^[116]刘海燕、张剑认为,“耳朵经济”发展迅速,比如说喜马拉雅FM、懒人听书等有声阅读平台的发展,其通过分析有声阅读的发展现状和积极作用,指出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服务的新路径,旨在为公共图书馆构建有声阅读平台提供参考。^[117]王景文以湖北省高校图书馆作为研究样本,从缘起与主题、书目编制与推荐、活动内容三方面对其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开展的“阅读战‘疫’”活动进行调查,考察“疫情大考”中阅读疗法服务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突发事件下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对策,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应急服务体系提供建设提供参考。^[118]张丽舸、单伟基于图书馆门户网站和文献资料,对60所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信息中心的高校图书馆进行专利导航服务情况调查,指出高校专利导航服务网站建设需要加快及改进、人才队伍需要充实及扩展、信息资源需要整合及优化、工作机制需要建立及完善、项目/成果发布的位置及内容需要确定,提出建设一站式服务专栏、设置专利导航专员岗位、加强信息资源建设、规范专利导航工作程序、构建高校专利导航备案与成果共享系统的相关建议。^[119]

五、图情档技术应用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2021年,河北省学者重视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研究,着眼于分析各种技术对图书、档案等开发利用的影响,探讨在图书馆、档案馆工作中的合理使用以及对图情档相关系统的开发与利用。

(一)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数据海啸时代移动图书馆用户画像数据面临着严峻的服务困境与应用困境,并极大地制约了移动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覆盖面与纵深度,发挥区块链技术在去中心化登记、透明化交易、自治性存储与私密性防护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可有效化解移动图书馆用户画像数据获取、处理、存储与安全问题。周莉分析移动图书馆用户画像数据管理的问题,借助区块链技术在移动图书馆用户画像数据管理中的应用可行性,提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移动图书馆用户画像数据管理的实践策略。^[120]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应用,图书馆面临严峻的考验,张连分通过对图书馆大数据种类和效用分析,把握数据驱动图书馆服务的基本特征,探讨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创新服务种类,指出通过构建数据驱动型图书馆服务新模式,可以有效增强图书馆在知识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全面提高图书馆服务效率和知识增值能力。^[121]宋辉宇根据环境因素分析,构建SWOT矩阵,分析区块链技术在社保档案管理中应用的可行性,为保证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系统和系统数据的信息安全,构建了联盟链凭证保证应用模式。^[122]支凤稳等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手数据,采用形式概念分析(FCA)的方法构建需求概念格,提取相应的关联规则,揭示不同需求之间的关联调查与挖掘数据使用者视角下的科学数据共享需求,为数据提供者、数据管理平台及相关机构挖掘并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提供依据,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借鉴与参考。^[123]尹彦等围绕威胁情报在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上的应用,从态势察觉、态势理解、态势投射进行了讨论。认为,威胁情报主要是利用大数据、分布式系统等收集方法获取,具有很强的自主更新能力,能够提供最全、最新的安全事件数据,极大提高网络安全

态势感知工作中,对新型和高级别危险的察觉能力。^[124]张红斌等将外源威胁情报与系统内部安全事件之间的相似度进行比较,对目标系统进行威胁察觉,根据系统内部的威胁信息生成内源威胁情报。在此过程中,利用博弈论的思想量化当前的网络安全态势,评估网络的安全状况,以实现网络安全态势的预测。^[125]员建厦、陈路路针对情报大数据的特点,分析大数据治理对于情报数据发挥作用的重要性,针对情报大数据在数据治理方面面临的问题,分析了情报大数据治理的需求,在情报大数据治理框架方面,构建了由人员组织机构、治理机制、形成的能力、治理策略等方面组成的情报大数据治理模型,同时也分析描述了情报大数据管理生命周期内的治理内容,对情报大数据治理的前景进行了展望。^[126]

(二) 图情档相关系统的开发与利用

在图情档相关系统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赵鑫强、李颖在厘清知识管理与档案资源对智库发展的作用基础上,总结已有相关研究,具体叙述该系统所包含的档案资源采集系统、档案资源筛选系统、档案知识存储系统和档案知识服务系统四个子系统,并对系统的支持条件作了简要分析,提出构建智库建设视角下的政府档案知识管理系统的设想。^[127]庞楠、薛卫双采用SWOT分析法,在国内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数据生态系统进行了剖析,旨在改善图书馆生态系统中信息数据的应用效率,进一步探讨数据治理的路径,以期图书馆数据治理系统的理论研究及数据管理的创新提供一定的现实价值。^[128]贾丽坤等对高校图书馆知识问答模式现状进行分析,分别从读者和图书馆角度出发,指出知识问答模式应用于高校图书馆平台的优势和必要性,探索其应用于高校图书馆的新服务和新发展,提出将其融入高校图书馆平台的构想。^[129]

(三) 其他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图书馆领域的广泛应用,在带给图书馆各种应用需求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问题。徐杰、郭海玲介绍了各种数据分析的相关方法,包括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回归模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方差分析、判别分析、层次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与典型相关分析、聚类分析、数据模拟方法、应用神经网络进行模式识别和预测等方法。^[130]李

雪丽等针对已有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各实证研究之间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对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梳理和再分析,发现纳入元分析的8个影响因素中,习惯与隐私披露意愿强相关,感知收益、信任与隐私披露意愿中度相关,感知控制、匿名性、隐私关注、感知风险与隐私披露意愿弱相关。^[131]赵想飞等从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特点出发,分析存在的数据安全问题,并针对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访问与利用、数据共享与更新及数据安全评估各阶段分别提出相应的数据安全措施,以便更好地提升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水平。^[132]如今,智能运营已然成为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发展的新方向。石丽红从用户运营、活动运营和内容运营三个方面对构建图书馆智能运营体系进行研究,并提出搭建数据平台、强化馆员运营素养和注重闭环思维等运营实践要点。^[133]王丽、武瑞原以CNKI中图书情报学领域的81位作者的论文数据为实证分析对象,从指标相关、分类研究、辨识度、排名情况等维度探讨了X指数的效用。研究发现X指数与引用次数的平方根显著相关,作者区分度远高于H指数,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估指标,可以实现比H指数更为精准的结果。^[134]

(金胜勇: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欣,李宏,宛玲.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孟连生在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探索[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15):44-50.
- [2]刘海鸥,李凯,姜波.移动图书馆推荐系统中的用户画像与资源画像情境化融合研究[J].图书馆,2021(06):66-71+93.
- [3]李媛,付敏君,王莱瑶.第三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体系模型构建[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39(01):5-12+57.
- [4]刘蕾,陈威莉,刘志国.图书馆空间服务的理论基础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41(02):43-48+60.
- [5]石佳鑫,屈健.大数据时代对于情报定义的思考[J].社会科学论坛,2021(02):175-180.
- [6]崔学柳.案例视域下档案工作与史志编修关系探讨[J].城建档案,2021(12):145-146.
- [7]金胜勇,张琪.论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数据化趋势[J].情报资料工作,2021,42(01):42-49.
- [8]张鑫,刘鑫雅,张雅文.我国网络舆情识别的研究脉络、核心主题与发展趋势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

- (03):90-96+89.
- [9]路青.创新驱动下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研究进展与趋势分析[J].甘肃科技,2021,37(05):89-92.
- [10]唐中楠,杨国丽,李军,蓝芙宁,王春雁.基于文献计量学的中国流域SCS模型研究现状分析[J].人民长江,2021,52(10):95-100+106.
- [11]梁杰.赋能时代看档案信息化未来走向[J].档案天地,2021(07):61-63.
- [12]申学文.我国竞争情报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竞争情报,2021,17(05):19-28.
- [13]殷阿娜,朱宏涛.中国“绿色经济”研究综述——基于文献计量学[J].金融理论与教学,2021(06):75-79+82.
- [14]郭志安.论宋代的保密与泄密[J].河北学刊,2021,41(04):97-102.
- [15]孟月,马爱芝.档案制度建设与档案治理现代化关系辨析[J].兰台世界,2021(06):107-111.
- [16]刘志国,赵莹,陈威莉,刘蕾.图书馆空间服务的认知定位与作用机理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21(05):62-68+99.
- [17]赵琨.基于RDA的图书馆音像电子资源编目工作创新研究[J].图书馆杂志,2021,40(11):72-83.
- [18]杨青.图书馆文献编目工作优化措施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12):101-104.
- [19]刘坤照.《中图法》类目设置的重叠缺憾分析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06):152-153.
- [20]李思越.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档案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研究——以“金山记忆”为例[J].档案天地,2021(09):46-49.
- [21]谢巍弘,李颖.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信息传播效果优化策略研究[J].山西档案,2021(06):113-119+89.
- [22]魏霞.基于受众选择“3S”理论档案信息视频化传播研究[J].档案天地,2021(07):46-49.
- [23]费建梅,陈军.2010—2020年国内档案信息传播研究综述[J].档案天地,2021(08):20-24.
- [24]谢巍弘.城市记忆建构视域下我国老字号声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档案天地,2021(08):25-28+13.
- [25]申灿,李瑶.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J].档案管理,2021(04):17-18.
- [26]耿洪利.公文纸本古籍文献发掘的探索与实践[J].图书馆,2021(07):104-111.
- [27]张晓霞.基于市场与行业视角的多源信息环境下企业竞争情报服务模式探析[J].图书情报导刊,2021,6(04):43-48.
- [28]徐晓静,杨更亮,王磊,陈景景.医学图书馆数据库资源使用状况和满意度调查分析[J].传播与版权,2021(08):79-81.
- [29]崔学柳,黄洁芳.浅谈档案的查阅利用——以河北省第一个地下水监测站档案为例[J].档案天地,2021(12):48-49+54.
- [30]赵宇辰,张雅兰,高雪娜.河北省档案馆2020年档案利用数据分析[J].档案天地,2021(04):49-50+53.
- [31]赵帅.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档案利用策略研究[J].档案天地,2021(08):34-38+57.
- [32]马玉杰,毕云平,王朔.我国档案馆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的目标与策略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2):117-121.
- [33]白艳辉,陈丽娟.后疫情视角下医院档案资源的管理与开发利用[J].黑龙江档案,2021(01):162-163.
- [34]刘丽华,魏小贞,朱丹.美国高校图书馆灰色文献资源建设现状调查分析与启示[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2):30-35.
- [35]耿志明,徐红昌.新生态环境下图书信息资源智能整合系统设计[J].现代电子技术,2021,44(22):66-70.
- [36]金胜勇,彭妍.京津冀协同发展环境下河北省公共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12.
- [37]柳贝贝,申晓静,王帅,孔哲.数字经济时代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有效性战略分析[J].图书情报导刊,2021,6(09):1-7.
- [38]杨红霞,孙秀茹,刘华卿.高校图书馆服务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模式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1,36(01):178-181+186.
- [39]吴颖.各类图书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开展应急信息服务的思考[J].甘肃科技,2021,37(11):86-89.
- [40]曹瑞,罗慧,段毅.大数据时代医院档案信息化构建研究[J].兰台内外,2021(06):26-27.
- [41]于成杰,张军亮,郭楠.《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发展构想(2018—2025)》解读与启示[J].图书馆,2021(07):24-30.
- [42]张晓霞,王一威.“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02):52-54.
- [43]康盼红.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档案数据共享平台建设[J].档案天地,2021(06):36-40.
- [44]主雪梅,宋晓晨,许雅涵,王寺凡,张源.高校图书馆跨领域合作探析[J].科技资讯,2021,19(05):181-183.
- [45]陈则谦,郑娜静,李亚灿,张晓.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现状、主要问题与优化建议[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07):78-89.
- [46]刘丽华,朱丹,魏小贞.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2021(10):96-102.
- [47]任确实,张伟.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公共图书馆发展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14):147-148.
- [48]李依轩,李梅.构建大庆地区公共图书馆城乡一体化服务模式研究[J].兰台内外,2021(20):57-59.
- [49]锅艳玲,饶圆,王小云,唐长乐,高文静,陈雍.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本科生数据素养培育研究[J].档案学通讯,2021(01):100-102.

- [50]郭晓伟,李强,张孟圆,任云芳,靳少聪.基于 OBE 的《医学文献检索》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J].信息系统工程,2021(05):148-150.
- [51]赵素彦,李曼.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管理专业人才需求和建设模式探索[J].就业与保障,2021(22):125-127.
- [52]杜占江.基于案例教学的信息管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23):149-150.
- [53]丁玉东,张春峰,石伟铂.高校图书馆馆员新媒体服务能力建设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9):38-43+52.
- [54]柳贝贝,李润斌,张志勇.智慧图书馆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人才共享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导刊,2021,6(02):1-7.
- [55]谢宝义,周小平,张哲,王晓华.“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01):53-57.
- [56]路青,周媛.乡村振兴视域下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与思考——以河北省地区图书馆为例[J].黑龙江科学,2021,12(13):38-40+43.
- [57]柳贝贝,李润斌,刘静,马志华.智慧图书馆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人才流失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情报探索,2021(07):114-121.
- [58]李媛.自我认知视域下现代高校图书馆员职业自我设限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1,39(05):17-24.
- [59]金胜勇,章亨.英国电子书公共借阅权补偿金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05):136-143.
- [60]姚秀敏,赵雪云,樊会霞,闫芬.“双一流”动态调整背景下师范类普通高校图书馆支撑学科建设的对标分析及其提升策略——以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1,33(09):72-82.
- [61]徐晓静.医院图书馆新型服务体系的构建途径[J].兰台内外,2021(34):52-54.
- [62]常颖聪,黄思慧,满萌,王巍.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品牌研究与建设进展[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5):8-15.
- [63]马晓英,孙多青.基于服务视角的高校图书馆和谐度评价——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为例[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1,35(04):47-52.
- [64]张艳欣.我国档案生态安全应急管理机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04.
- [65]陈兰杰.应急信息管理与应急信息行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09.
- [66]吕霞,郗爱萍,林静,康璇.高校图书馆空间布局与拓展方向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05):131-134.
- [67]孙红亮,潘莹,邵彦坤,马岩.“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21(09):191-193.
- [68]贺磊.探索大数据背景下的退役军人档案管理[J].黑龙江档案,2021(01):60-61.
- [69]丁若虹,王丽,杨文静.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考评研究[J].科技智囊,2021(05):49-54.
- [70]丁若虹,赵学平.河北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2):19-23.
- [71]姚文彬.信息时代下高校图书馆档案管理工作探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1,31(03):60-62.
- [72]谢广林,李世新,韩月异,白莉.河北省民办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6):19-23.
- [73]苏志红.机关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档案天地,2021(11):56-57+20.
- [74]张艳娟,王赛春,刘水英.新时代县级民生档案管理及利用研究[J].档案天地,2021(06):48-49+59.
- [75]张博宇.新时代高校档案法治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J].中国档案,2021(11):46-47.
- [76]王雨晴.公众参与档案工作研究:国外实践、特点与启示[J].浙江档案,2021(02):44-46.
- [77]孟银涛,赵蕾霞.英国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与服务研究——以 17 所英国高校图书馆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09):127-137.
- [78]张俊立,桂秀梅,刘钟.“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浅析[J].文化产业,2021(36):82-84.
- [79]马杰,满萌,刘绍荣.高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利用提升策略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2):40-43+48.
- [80]李媛,江涛,赵兴华.第三空间视阈下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转型研究综述[J].图书馆界,2021(01):17-22+29.
- [81]祝金梦.口述史视角下高校名人档案资源建设的态势分析及优化策略[J].兰台世界,2021(11):49-53.
- [82]马丽娟.家谱收藏利用与公共图书馆特色文献馆藏建设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15):129-130.
- [83]王慧.高校建筑工程档案信息化建设和规范管理途径[J].兰台世界,2021(03):100-102.
- [84]平彩鹏,杨柳,吴二波,冯振玮,鲍玉静.冀震社交媒体信息档案的构建[J].兰台世界,2021(10):98-101.
- [85]刘坤峰,刘欣慧.大运河沧州段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建设[J].兰台世界,2021(S2):28-29.
- [86]魏歌,吴志杰.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数字档案馆建设:合理性诠释与策略探讨[J].北京档案,2021(02):15-18.
- [87]张彤.基于群体智慧的图书馆文献征集模式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01):70-72.
- [88]孙玲玲,王建楠,裴莹权.承德城市记忆资源现状分析[J].兰台内外,2021(05):55-57.
- [89]郭海玲,史海燕,徐杰编.高等学校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列教材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服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03.
- [90]李颖.新媒体环境下档案公共服务机理与策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
- [91]张媛,王智琦,廖文颐,孙卫忠.嵌入科研项目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实践与探索[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6):112-119.

- [92] 孙会清,王秀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调查[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4):53-57.
- [93] 赵俊玲,王超,郑雅丹.我国阅读推广课程的百年变迁[J].图书馆杂志,2021,40(12):12-21.
- [94] 康思本,徐红昌,夏旭.文旅融合背景下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与路径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05):97-104.
- [95] 潘伟.数字化时代下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大众文艺,2021(24):154-155.
- [96] 殷婷婷,主雪梅,张娟.基于数字阅读背景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J].科技资讯,2021,19(15):201-203.
- [97] 解娜.5W1H分析法在高校图书馆共读时代中的实践与思考——以燕山大学图书馆共读育人阅读推广为例[J].图书馆学刊,2021,43(06):70-74.
- [98] 刘君君,孙婧,张雪莲,王莹莹.高校图书馆新型阅读推广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唐山学院图书馆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2):61-64.
- [99] 王学贤,魏祥丽.加拿大“暑期阅读俱乐部”评估实践与启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5):71-76.
- [100] 张行,谷娜.民国图书馆学家柳诒徵的阅读推广思想研究[J].图书馆,2021(03):16-20+44.
- [101] 殷婷婷,主雪梅,张娟,许雅涵,李继存.全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兰台内外,2021(31):61-63.
- [102] 李杏丽,王景文.阅读社群在高校阅读疗法推广中的作用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08):45-46+49.
- [103] 张楠.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实践与创新——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4):80-84.
- [104] 肖静,牛静丽,肖欢.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发展困境及图书馆服务保障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31(04):109-112.
- [105] 殷婷婷,主雪梅,张娟.基于跨领域合作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研究[J].兰台内外,2021(28):53-55.
- [106] 张钦恒.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服务优化策略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4):59-62+96.
- [107] 赵兴华.高校图书馆读者智慧化服务探究[J].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21,33(16):26-28.
- [108] 支凤稳,郑淳元,赵梦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竞争情报需求关联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45(02):111-120.
- [109] 古奕乐.基于专利信息计量的知识图谱技术专利分析[J].图书情报导刊,2021,6(07):45-52+61.
- [110] 刘平,罗立琴,刘晓男.面向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技术竞争情报(CTI)预警服务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24):149-150.
- [111] 曹国忠,杨雯丹,刘新星.基于主体—行为—客体(SAO)三元结构的专利分析方法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04):158-167.
- [112] 贺伟,李辉.基于专利信息分析“五流”模型的战略机会识别研究[J].情报杂志,2022,41(01):81-87+148.
- [113] 马兰,姜波.省域高校图书馆“双一流”支撑服务现状与提升策略——以河北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8):102-110.
- [114] 魏小贞,刘丽华.高校图书馆视频服务现状与思考——以哔哩哔哩平台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7):58-65.
- [115] 冯玉娥,顾沿泊,张佳佳.云时代医院数字图书馆对馆员的优化信息服务模式探究[J].科技资讯,2021,19(02):169-171.
- [116] 栾小红.数字化时代医院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创新与研究[J].兰台内外,2021(04):55-57.
- [117] 刘海燕,张剑.“耳朵经济”下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服务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07):12-14.
- [118] 王景文.突发事件下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实证研究——基于对湖北省高校图书馆“世界读书日”期间“阅读战役”活动的调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2):5-14.
- [119] 张丽舫,单伟.我国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导航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21,34(03):44-52.
- [120] 周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移动图书馆用户画像数据管理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7):49-57.
- [121] 张连分.数据驱动的图书馆服务创新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1):104-108+123.
- [122] 宋辉宇.区块链技术在社保档案信息安全的应用[J].兰台内外,2021(07):1-3.
- [123] 支凤稳,赵梦凡,张萌,彭兆祺.科学数据共享需求调查与关联挖掘[J].情报科学,2021,39(12):9-16.
- [124] 尹彦,张红斌,刘滨,赵冬梅.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中的威胁情报技术[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21,42(02):195-204.
- [125] 张红斌,尹彦,赵冬梅,刘滨.基于威胁情报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模型[J].通信学报,2021,42(06):182-194.
- [126] 员建厦,陈路路.情报大数据治理框架研究[J].国防科技,2021,42(05):47-51.
- [127] 赵鑫强,李颖.智库建设视角下的政府档案知识管理系统研究[J].山西档案,2021(06):54-60.
- [128] 庞楠,薛卫双.基于数据生态系统模型的图书馆数据治理路径分析[J].图书馆,2021(01):92-98.
- [129] 贾丽坤,王金娜,康丽峰,王喜明,李燕燕.知识问答模式在高校图书馆平台的应用[J].四川图书馆学报,2021(01):63-65.
- [130] 徐杰,郭海玲.数据分析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12.
- [131] 李雪丽,黄令贺,陈佳星.基于元分析的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OL].数据分析与知识

发现:1-12[2022-05-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478.G2.20211012.1411.002.html>.

[132]赵想飞,常颖聪,黄闽,崔增辉.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中的数据安全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1(08):39-44.

[133]石丽红.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智能运营体系建设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21(04):56-59.

[134]王丽,武瑞原.基于引文分布特征的科研人员影响力评估实证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01):29-34.

河北专题研究

河北经济建设研究

高智 梁世雷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极不平凡的一年。河北省社科界紧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全省重大战略部署,围绕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众多有价值、有深度、有创新的理论观点和对策措施。总体上看,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领域全面,既聚焦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与行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又涉及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科技与经济发展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等交叉领域。第二,研究层次完整,既包括经济发展宏观战略层面研究,也包含经济发展微观专业层面研究。第三,研究方法多元,既有定性的理论的分析方法,也有定量的实证的分析方法。综合来看,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思路新颖,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成果对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新时代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必然要求。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从高质量发展动力和路径、经济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两个方面,对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

(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和路径

高智等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又要根据条件和可能,抓住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在把握时与势、变与不变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1]

刘景芝指出,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在经济新常态下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应切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把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作为发力重点;二是加强创新要素整合,把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作为主攻方向;三是打通转移转化通道,把成果转化作为协同创新突出任务;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根本动力。^[2]

王亭亭认为,推动河北省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快速融入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在宏观政策六大层面综合发力,一是夯实产业基础,全方位推进制造业高级化、数字化与现代化;二是加快推进投资结构政策调整,努力扩大有效需求,不断提升投资效率;三是重点破解“融资贵”“融资难”顽疾,帮助微观主体解决难题;四是着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五是加快人才制度创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六是畅通“双循环”引擎作用,重塑国内外竞争

新优势。^[3]

王建强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关键时期,河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更加需要人才,必须以更大力度加强人才工作,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因此,要充分发挥党管人才优势,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将各类优秀人才吸引到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事业中来。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遵循人才发展规律,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体制,坚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4]

高智等认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既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其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六个现代化河北”,“六个现代化河北”相辅相成、互促互进,构成了具有内在逻辑、有机统一的整体。要准确把握河北所处历史方位、未来发展定位,持续举全省之力办好“三件大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和各项事业新局面。^[5]

张旭等认为,县域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其以河北省石家庄市14个县(市)的数据为例,就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各县(市)科技创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态势;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以科技滞后的拮抗型和磨合型为主,表现为“金字塔”模式,呈现“山地形”分布。^[6]

高自旺等认为,军民融合发展是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路径。河北省构建军民融合创新生态系统,要强化军民融合多主体合作发展、军民融合多条链融合共生、军民融合创新生态培育建设和军民融合关键核心技术目标锁定等方面;同时,要研究制定军民融合创新相关规划,加强创新资源要素支撑,加快示范性区域载体改革。^[7]

(二) 经济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

王春蕊认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对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河北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根据实体经济行业特点、市场主体特征,创新融合发展路径,增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布局,持续优化和完善新基建体系;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以数字经济规范化、健康化发展赋能实体经济。^[8]

杜欣认为,河北要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大力推动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一是在发展方向上,要围绕“精”“深”做文章,一方面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上做到精准精细,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二是在融合方式上,要基于行业特点采取差异化策略,生活服务业应侧重提升效率,生产服务业应侧重提升灵活度,公共服务业应侧重提升契合度。三是要培育壮大数据产业,为服务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提供支撑。^[9]

郭瑞东指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以消费为导向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实现现代服务业同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要结围绕“农业+”创新发展模式,一是推进纵向一体,对资本、技术、资源等要素进行集约化配置,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完善农业市场体系;二是强化特色引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拓展产业新功能,丰富产业新形态,促进农业和服务业交叉融合;三是突出高端渗透,以金融、信息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渗透为契机,开拓融合新模式。^[10]

颜廷标认为,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行稳致远,一是要切实把握平台经济特点与规律,构建完善的平台产业体系;二是要瞄准需求与供给对接中的堵点、槽点,积极推进平台经济领域创新创业;三是着眼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推动平台经济融合创新;四是要充分发挥平台的资源配置优势,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要处理好平台经济发展与规范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处理好政府

监管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关系。^[11]

从佳琦认为,夜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既能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也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河北省更好激发夜幕下的消费潜能,释放出更多消费新活力,应立足实际,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加强宣传引导,推广夜间文旅消费休闲理念;二是做好统筹规划,强化文旅夜经济发展政策保障;三是提升文化内涵,打造夜间旅游特色主题与文化IP;四是促进业态融合,满足夜间多元化休闲消费需求;五是完善公共服务,优化夜间消费环境。^[12]

赵宏伟研究指出,河北省经济发展仍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生产性服务行业重视程度不足,缺少对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投入和热情,致使河北产业发展整体水平滞后,建设重复率较高。促进河北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借京津冀协同发展东风,承担自身相应功能;二是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三是多元化方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13]

二、产业和行业发展研究

提升产业和行业发展水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关键。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围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对产业和行业发展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一) 现代农业

王会欣认为,做大做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集群,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河北省要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从科学规划发展布局、健全完善发展机制、加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氛围等方面入手,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集群,使农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14]

王秀芳等基于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的调查,对河北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河北省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远低于全国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创新

能力;从区域上看,辛集和邯郸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较强,唐山、石家庄、邢台、承德、定州、廊坊次之,秦皇岛、衡水、保定、沧州、张家口较弱。为此,建议河北省通过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优化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环境、健全人才激励机制等提升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15]

王会欣指出,促进河北省农业向高产、高质、高效转型发展,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大力发展品牌农业,着力提升农产品知名度和竞争力,为此建议:一是提高认识站位,明确思路重点;二是科学制定规划,强化顶层设计;三是培育壮大主体,打造发展平台;四是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五是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品牌质量;六是加强宣传推介,扩大品牌影响力;七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长效机制。^[16]

韩梦娟指出,近年来河北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和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经营主体单一、发展模式固化、缺乏龙头企业、农业特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推动现代农业园区转型升级,一是要在理念上提高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认知;二是要强化高新技术和特色农业产业的引领作用;三是要做好园区内外融合,打造园区转型升级可持续动力机制;四是要增强风险意识,构建园区转型升级监测和评估体系。^[17]

赵卓等认为,河北因地制宜发展创意农业,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推动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促进科技、文化、服务与农业有效融合;二是积极探索推广现代农业文化产业园模式、多元创意组合式模式、特色农产品文化节模式、产业融合创意发展模式、区域品牌开发模式、乡村旅游文化模式、主题农业公园发展模式等创意农业发展新模式。^[18]

李俊强等指出,信贷融资障碍是影响河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建议从三个方面来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度。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要不断完善,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其次,农村金融机构要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创新抵押担保物种类,改善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第三,政府要加大财政补贴,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19]

袁菲等指出了当前阻碍河北省农产品标准体系构建的因素,主要是:农产品流通体系运行机制不完善,未形成战略联盟;农业实用信息少,时效性差;农业生产环节信息化监管制度不健全;农业相关服务信息化发展不全面。为此,建议河北省立足农产品全产业链,以信息化建设为主线,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全产业链农产品流通运行机制;二是加强农业信息化实用技术研究;三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信息化监管制度;四是增强农业服务的信息化水平。^[20]

卢德娴等认为,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产品流通效率对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有重要影响。根据全省农产品流通规律,提升流通体系效率,对确保“菜篮子”和“米袋子”安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建议河北省按照技术投入与规模相匹配的思路,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健全食品检测系统、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加强人才培养等措施,提升河北省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21]

关于畜牧业发展。张艳新等认为,促进河北省中小规模奶牛养殖场建设发展,应推进牧场智能化改造,提高行业从业人员水平,多种方式降低养殖成本,完善乳品企业与奶牛养殖场间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发展自营鲜奶模式。^[22]梁帆等认为,非洲猪瘟影响下推进河北省生猪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应强化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提高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推动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强人才吸收与培养,合理调节生猪产业链条利润分配。^[23]

关于种植业发展。宗义湘等认为,河北省推进蔬菜产业发展,应促进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强良种繁育推广,应用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加强产业化建设,做好“冀”字号品牌建设。^[24]吴雅琪等认为,应从提升机械化水平、重视品牌培育、推动特色优势区建设和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等方面推动河北省茄子产业发展。^[25]张娟娟等认为,推动河北省辣椒产业发展,应加强培育辣椒良种,完善辣椒绿色防控方案,更新机械化设备,完善辣椒产业链条。^[26]李滢等认为,河北省食用菌生产布局变迁受京津距离、地区虚拟变量、前期生产集中度及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正向影

响显著,受林业产值影响不显著。^[27]

贾悦等认为,促进河北省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应以农业物联网平台为基础,整合中药材产业链相关资源,协调推进中药材经营主体、生产加工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突破影响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技术与市场瓶颈,实现中药材种植智能可视化、产销信息公开化、质量可追溯。^[28]

(二) 先进制造业

李海飞等认为,积极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抢占数字技术高地和产业高地,已成为全球迎接数字经济挑战的普遍共识。制造业是河北的优势产业,河北省应切实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线图;二是夯实基础支撑,大力推进适配制造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强化智力保障,构建制造业数字人才教育培训与引进体系;四是实施双轮驱动,有效发挥市场和政府的推动作用。^[29]

刘鹏研究指出,“十四五”时期河北省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一是要促进传统优势产业与智能制造相结合,扩大先进制造业占比;二是要构建服务型制造发展良好生态,加快培育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三是要发挥省内大企业技术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四是要建立全省优质企业培育计划,对大中小型企业实施梯度培育、差异扶持。^[30]

白玉芹指出,先进制造业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时期河北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一是要聚焦重点领域,按照产业类别实施针对性政策;二是要深化融合发展,积极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三是要强化平台优化提升,完善创新生态体系;四是要发挥集聚效应,构建完善的产业载体和园区。^[31]

关于推动制造业创新。范红辉等研究认为,河北省制造业创新发展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很大,但金融支持力度不足,金融结构欠合理。因此,应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支持效率作为破解金融支持短板的有效途径。^[32]彭晓静认为,应从调整研发投入结构、完善激励企业创新政策、加快创新要素引进与培养、制定研发投入效率动态监测机制等方面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33]

关于制造业行业发展。王捷认为,河北省推进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建设,应加强高端人才储备,增强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提升市场营销水平,建立生物科技产业联盟,提高环保政策精准度。^[34]李哲认为,中俄“冰上丝绸之路”战略合作背景下推动河北省冰雪装备器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以下路径:一是借势国家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三是紧抓冬奥机遇,推进产业标准化建设;四是突出创新发展,培育产业增长新动能;五是着眼强链补链,多渠道开展招商引资活动。^[35]

(三) 现代服务业

1. 关于冰雪产业发展。

穆瑞丽等认为,河北省应立足省内冰雪资源,瞄准国内市场需求,顺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全方位多路径做大做强冰雪产业。具体可采取以下路径:在资源路径上,突出“运动、健康”特色,实现品牌差异化发展;在产业路径上,打造“冰雪+”产业链,实现产业融合化发展;在区域路径上,积极谋求区域联盟,实现冰雪产业协同化发展;在市场路径上,借鉴国际经验,实现冰雪产业市场化发展。^[36]

穆瑞丽认为,河北应通过构建“冰雪旅游+”大产业链条,促进冰雪旅游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一是积极打造“冰雪旅游+冰雪运动”,促进冰雪旅游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大力发展“冰雪旅游+生态休闲”,促进冰雪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三是广泛开展“冰雪旅游+民俗活动”,促进冰雪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四是积极谋求区域联盟,促进冰雪产业区域间协同发展。^[37]

从佳琦基于全产业链视角下,提出了河北省冰雪旅游发展的对策,一是着力提升品质,加快释放冰雪旅游市场;二是增强产业支撑,积极推进冰雪场馆建设和冰雪装备研发制造;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开展冰雪赛事、冰雪活动和冰雪运动培训;四是加快产品创新,促进实现冰雪旅游四季运营;五是加快引才培智,全面构建冰雪旅游产业人才体系。^[38]

张晗等研究提出了冬奥会背景下河北冰雪产业国际化发展策略,一是引入外资,提高冰雪旅游软硬件国际化程度;二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提高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三是培养和引进外语人才,提升旅游服务国际化水平;四是完善冰雪产业链,提升产业国际化竞争能力。^[39]

李磊等认为,提升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核心竞争力应利用“互联网+”构建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和商业模式。^[40]李青华等认为,推动河北省大众冰雪体育运动发展应加大宣传力度,增加普及性、趣味性和可参与性,制定合理的规划,依托学校传播冰雪运动。^[41]熊晓轶等认为,推动河北省冰雪产业发展应挖掘开发冰雪文化创意发展模式,实现冰雪、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42]

2. 关于旅游业发展

张晓阳认为,在全域旅游视角下,河北省应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以及注重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入手促进旅游产业融合创新发展。^[43]李晓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推动河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应拓展旅游新业态和消费模式,激发京津冀区域旅游消费活力。^[44]王丽丽等认为,推动河北省旅游发展,一是要加大旅游资源挖掘和环境保护,打好旅游业发展基础;二是要创新协同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旅游+”和“+旅游”产业;三是要因城施策,制定旅游产业发展规划。^[45]

关于文化旅游发展。陆艳颖认为,河北省应立足文化推进旅游文创产业发展,一是建立相应的文化素材库;二是强化文化创新、视觉元素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要素设计;三是打造品牌鲜明的旅游产品,以创意为核心打造文化精品,以公众需求为核心推出文创产品。^[46]祁刚利等认为,河北太行山地区应从制度体系构建、区域间整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47]

关于体育旅游发展。李会霞认为,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应强化顶层设计,提升京张体育文化旅游规划引领力;推动产业创新,增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竞争力;创意传播营销,扩大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完善保障机制,夯实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支撑力。^[48]许朋展等认为,推进河北海洋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应加大海洋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群开发建设,构建体育与旅游品牌共享的

“体育+旅游”产业链。^[49]

关于研学旅游发展。吴振华指出,在河北省5A级景区开展研学旅行,利于高品质研学开展,利于高品质旅游打造,利于高品质文旅融合。研学旅行视角下河北省5A级旅游景区发展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二是帮扶景区正解研学,引导景区精准定位;三是探明研学设施诉求,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四是准确研判研学资源,高效转化景区资源。^[50]

关于乡村旅游发展。张葳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河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区域差异化,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旅游创新发展;二是发展绿色化,合力推动美丽乡村生态宜居;三是产业链条化,着力构建现代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四是管理现代化,提升乡村综合治理能力;五是融入乡土文化,树立乡村本土文化自信;六是发展新集体经济,带动农民生活富裕。^[51]

3.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

邹玲芳认为,推进河北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创新发展理念,加快文化产业升级提质;二是借力京津优势资源,加快打造“北京研发+河北制造”模式;三是加快生成文化新业态,丰富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四是搭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聚集承载优质资源;五是要加大专业化人才引进力度,夯实产业发展人才基础;六是精准实策,形成部门联动支持机制。^[52]李少虹等指出,河北文化产业发展要强化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要做好政府引导和政策落实,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招商,加强品牌宣传和营销,培养产业急需人才。^[53]

4. 关于康养产业发展

王海英认为,河北康养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康养综合体建设;必须以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标准化为驱动力,以发展环境优化为保障,推进产业集聚、融合、规范发展。^[54]隗建华认为,河北省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可采取以下途径,一是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二是加强产业机制创新;三是促进产业聚集融合;四是培养相关人才,打造专业队伍。^[55]

5. 关于养老产业发展

王文录指出,河北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协同发展,应完善居家、社区、机构服务网络,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紧扣老年人多元化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聚焦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创新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模式。^[56]李娟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推动河北省养老服务发展,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规范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医”“养”深度融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满足老龄群体多样化养老需求。^[57]

6. 关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刘妮雅认为,河北省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应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建立国际物流园区;二是建立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三是加强与高校产学研合作;四是强化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58]李伟认为,加快河北农村移动电子商务发展,应创建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建设机制,建设大型农村物流集群,创建电子商务培训教育模式,健全移动电子商务发展政策支持体系。^[59]

7. 关于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

姜兴指出,河北应加快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充分激发人力资源市场活力,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为此,建议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源开发配置的需求,稳步培育人力资源市场,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发展,推进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业协同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服务业人才支撑。^[60]

三、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既是河北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也是加快自身发展的战略支撑,因此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和重点。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关于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协同和创新协同方面。

(一) 产业协同

刘海云等认为,协同联动推动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以河北自贸试验区设立为契机,推动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高水平开放。具体来看,一是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打破协同发展障碍;二是利用优势错位发展,打造制造业产业链;三是加强协同联动,打造经济新增长

极；四是发挥服务贸易优势，探索新业态新模式。^[61]

李磊研究指出，京津冀冰雪资源丰富且互补，冰雪旅游客源市场庞大，冰雪运动产业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推动京津冀区域冰雪运动产业协同发展，打造国际化冰雪运动目的地，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以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合作为主线，建立“体育旅游政策矩阵”；二是以地方社会文化发展为基础，对冬季体育旅游特色进行引导；三是建立产业链上下合作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和释放产业集聚效应。^[62]

李健等认为，文化产业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应在发展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机制体制建设、文化品牌培育、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才联动机制等方面集中发力，有效引导文化产业要素在三地之间自由流动、协同发展。^[63]

张慈等认为，打造京津冀农产品流通业发展协同圈，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工作，首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系统谋划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可率先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三个城市为中心打造农产品流通业发展协同圈，等条件成熟后，进一步扩展至京津冀整个区域。其次，坚持因地制宜，推动各地加快培育农产品流通业。第三，进一步强化农业扶持政策，为农产品流通业发展提供更强保障。^[64]

陈镜宇等认为，推动京津冀区域金融协同创新发展，合作理念是前提，政策制度是保障，正确定位认知是关键，不断推陈出新是原动力。为此，建议京津冀各地政府及金融机构转变本位主义思想，找准自身金融发展定位，完善区域金融市场体系，创新金融产品。^[65]任爱华等认为，京津冀区域以金融集聚促进产业升级，应从三方面入手，首先，政府部门要进一步缩小三地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其次，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第三，金融机构要合理调整信贷政策，改善企业融资渠道。^[66]

（二）创新协同

刘宾指出，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受制于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效应，区域协同创新还面临诸多困境。为完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建设，快速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协同创新生态环境；二是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机制建设；三是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产业支持。^[67]

王金波等认为，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技术创新效率，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增强城市群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有针对性地推进城市群创新发展战略，发挥大城市辐射效应，带动整个城市群创新发展；三是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大力推进区域创新要素良好互动，形成互补优势；四是要合理把握创新方向，选取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加大投入、加强攻关。^[68]

陈玉玲认为，京津冀科技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面临市场分割，导致区域统一的科技要素共同市场难以形成，经济边界弱化了科技要素的区域共享，创新资源空间分布失衡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体制机制障碍影响了市场开放共享等困境。建议，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强化科技与经济对接、促进创新资源空间布局优化、加大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加快科技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创新平台。^[69]

陈玉玲等研究指出，京津冀地区创新要素各子系统协同水平差异较大，而且整体协同度较低，应发挥各自优势，平衡创新投入，使创新产生效益最大化，实现均衡发展。具体建议如下：一是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优化京津冀协同创新环境；二是加快科技创新一体化建设和创新产出成果共享；三是协调好京津冀协同创新分工与合作；四是完善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平台。^[70]

周德胜等认为，促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一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建立统一完善的京津冀人才政策体系；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三是要加快推进产业协同和项目对接；四是要加强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定向培养高质量人才。^[71]

杨胜利等认为，推动京津冀科创人才集聚发展，应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增强京津冀科创人才集聚能力；改善宜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助推科创人才协同发展；打造京津冀科创人才协同集聚新平台，增强科创人才承载能力。^[72]

李志博等认为，基于 PDCA 循环理论，京津冀地区应按照“策划—实施—检查—改进”工

作流程构建人才培养发展体系,并从创新人才培养规划、创新人才培养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四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73]

王华彪等认为,京津冀高校协同培养人才,要以开放的思维、宽广的视角,整合各类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努力形成创新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并举、基础教育与继续教育衔接、院校培养与用人单位培养互补、校内培养与校外人才兼备的人才培养格局。^[74]

严文杰等认为,提高北京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成效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使河北产业资源与北京科技成果有效对接;二是巩固现有承接北京技术合同优势,推动数字经济“两化”,提升北京信息技术领域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效率;三是加快自身应用场景建设,承接北京应用场景项目,塑造新时期河北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竞争力;四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中“三侧”改革,补齐科技成果转化短板,完善北京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生态系统。^[75]

四、科技与经济发展研究

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驱动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从提升科技研发能力、强化创新人才保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型企业发展等多维度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 提升科技研发能力

李子彪等认为,河北要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构建充满活力的多链融合区域创新体系。一是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统筹政策举措,打造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创新体系;二是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调整产业链布局,打造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区域创新体系;三是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趋势,优化创新链部署,打造服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区域创新体系;四是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功能区整合,打造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区域创新体系;五是基于融通创新发展趋势,加速多链融合,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创新系统。^[76]

陈爱祖指出,科技创新平台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加速器,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平台,对建设创新型河北、提升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河北要着力建设一批高端研发平台,建设一批高效双创平台,建设一批优质科技服务平台,建设一批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构建完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77]

颜廷标认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适应国际竞争新格局的必然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科技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各部门、广大科技工作者、企业、每一个人肩负责任、共同努力。因此,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体系,要统筹谋划,明确战略目标;要突出科技自立自强重点,力求实现重大突破;要聚焦重点难点堵点发力,强化政策支撑。^[78]

祁红梅认为,围绕产业链核心需求部署创新链,以创新链为支撑助推产业链升级,实现技术与应用、科技与产业的融合互动,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建议,一是以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为重点,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科技含量;二是加快创新要素布局,打造高科技创新闭环,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三是强化市场需求导向,建立研用沟通机制,疏通创新成果转化链条;四是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消除障碍堵点,形成双链融合政策合力。^[79]

(二) 强化创新人才保障

王建强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河北省要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必须以更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一是在创新实践中培养造就大批创新人才;二是利用高端平台载体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三是完善人才评价制度、人才管理制度等基础改革;四是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80]

张艳丽等认为,创新型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和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优化河北省创新型科技人才引进环境与培育能力,一是要明确人才市场需求,实现创新

引领产业发展；二是要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激活人才柔性共享机制；三是要发挥政府推手作用，优化创新人才引进环境；四是要完善人才培育制度，增强人才持续创新动力。^[81]

聂学臣认为，河北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一是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二是加大高技能人才选拔培养力度；三是做好高技能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四是发挥职业院校的教育培养作用。^[82]李庆达认为，要着力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营造促进人才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加快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83]

（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杨莉虹指出，河北省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仍然存在科研信息错位、研用单位脱节、专业人才匮乏、转化效率低等问题，应从本省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充分释放高校科研人才潜力，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一是加强政策支持，降低成果转移转化成本；二是强化“源头供给”，夯实成果转移转化基础；三是完善激励机制，激发成果转移转化动力；四是畅通供需渠道，促进研用高效衔接；五是完善转移转化服务，提高成果转移转化效率。^[84]

边继云认为，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是引导科学技术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一是建立健全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科技成果标准评判机制；二是建立健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科技成果多元评价机构参与机制；三是建立健全短期评价与长期评价相结合的科技成果长效评价机制；四是建立健全以促进转化应用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服务机制。^[85]

李巧莎等基于聚类分析视角，对河北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效果相对处于比较落后地位，与先进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建议，一是积极借鉴先进省市经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二是强化政策引导，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经费投入；三是建立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既要引进人才，

又要留住人才。^[86]

（四）推动创新型企业发展

阎东彬认为，发挥大企业创新资源富集、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充沛的优势，强化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多主体、全链条、开放式融通创新新格局，对河北省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建议河北省通过打造“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链融通创新新模式、“创新平台+共享”开放式融通孵化系统、“政策体系+创新”多层次服务支撑系统，全力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87]

李大赛等认为，科技人才是促进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河北省应着眼本省实际，面对新形势，提升科技人才共享理念，重视科技人才招聘用工管理，完善科技人才共享政策法规，搭建科技人才共享平台，积极做好河北省科技中小企业人才共享工作，促进科技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88]

宋伟等认为，河北省应持续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力度，调整政策实施方向，瞄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痛点、资金需求特点，推动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耦合协调发展。一是提高政策执行力，减少科技金融政策执行偏误；二是集中科技金融政策，精准投向科技型中小企业；三是消除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政策盲区。^[89]

刘霞等认为，提高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效率，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稳步提高政府部门与金融体系投入金融支持资源的规模，拓宽金融支持渠道，注重金融支持资源在地区间与行业间的结构优化；二是优化金融支持环境，强化金融体系提供金融支持服务的能力，完善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管控机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形成有效激励。^[90]

五、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

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河北省未来经济发展亟须突破的领域。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重点围绕河北自贸区建设和对外经贸合作等方面，对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实践。

冷宣荣认为，河北省推动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引导企业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通

过选择新合作伙伴或寻求国内替代供应商等方式,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确保企业供应链运行稳健。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和引导外贸企业挖掘传统市场潜力,实施多元化市场策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要提供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提供海外市场信息和法律援助,扎实推进开放新平台建设,促进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91]

宋东升指出,在数字化应用全领域、全场景的大背景下,对外开放诸领域的运行模式也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数字化时代的转型升级。因此,河北省要加快外贸外资等对外开放重点领域的数字化应用,以数字化赋能推动对外开放水平和对外开放安全的“双提升”。一方面,要以数字化赋能对外贸易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以数字化赋能外资招商的模式创新。^[92]

洪帅等认为,河北自贸试验区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加强统筹谋划和改革创新,既要面向未来产业和未来企业,又要立足现有产业主体,顺势而为、加力整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以制度创新为更多高能级市场主体进驻、成长提供环境支撑。为此建议,一是强化功能错位发展,打造片区特色优势;二是整合市场主体需求,消除痛点难点堵点;三是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四是促进体制机制联通,深化省际部门协同;五是借力知识溢出效应,厚植人力资本优势。^[93]

高自旺研究指出,河北自贸区曹妃甸片区存在外向型企业主体少、出口贸易规模小、优势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建议一是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自贸片区制度创新;二是要加快煤混配业务相关规划及政策制定,打造国际矿石交易中心;三是要积极推进大宗商品跨境电商产业规划建设;四是要推进融资租赁业培育,弥补港口建设短板;五是要加强招商引资政策创新,加大招商宣传力度。^[94]

赵培红等认为,“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位、多层次、多主体的相互配合与通力合作。因此,河北省应利用各港口城市临海优势,构建港产城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成果共享的协调发展机制。一方面,要提高港口发展水平,推动沿海港口在传统功能基础上与国际化接轨,由仓储运

输功能向物流、商贸和金融综合功能转变;另一方面,要加强沿海城市与内地和毗邻港口城市联系,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扩大对外开放合作。^[95]

2021年,河北经济建设研究取得了一批高质量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突出表现在“三少”,一是主要集中在对当前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判断和预测的研究较少。二是主要集中在对传统领域的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的研究较少。三是主要集中在理论性、方向性、思路性层面的研究,应用性、政策性、可操作性层面的研究较少,总体上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前沿性研究和实践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和突破。

(高智: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梁世雷: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高智,罗静.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21-09-08.
- [2]刘景芝.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N].河北党校报,2021-11-22.
- [3]王亭亭.“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河北省面临的经济形势、挑战及其应对措施[J].经济论坛,2021(7).
- [4]王建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人才支撑[N].河北日报,2021-11-05.
- [5]高智,梁世雷.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N].河北日报,2021-12-10.
- [6]张旭,魏福丽,袁旭梅.县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评价[J].统计与决策,2021(20).
- [7]高自旺,常帅男,陈璐.以军民融合创新生态系统培育河北经济新动能的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12).
- [8]王春蕊.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N].河北日报,2021-11-10.
- [9]杜欣.推动服务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N].河北日报,2021-12-03.
- [10]郭瑞东.推动现代服务业同现代农业深度融合[N].河北日报,2021-01-13.
- [11]颜廷标.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N].河北日报,2021-05-07.
- [12]从佳琦.点亮文旅夜经济 释放消费新活力[N].河北日报,2021-09-29.
- [13]赵宏伟.河北产业升级及新兴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J].中国外资,2021(6).

- [14] 王会欣. 做大做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集群[N]. 河北日报, 2021-09-01.
- [15] 王秀芳, 靳晓彤, 马青凯. 河北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21(8).
- [16] 王会欣. 发展品牌农业 助推乡村振兴[N]. 河北日报, 2021-03-17.
- [17] 韩梦娟. 河北现代农业园区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J]. 中国国情国力, 2021(11).
- [18] 赵卓, 郭立宏, 李志新, 陆义丽. 河北创意农业发展现状及模式选择[J]. 农村·农业·农民, 2021(10).
- [19] 李俊强, 刘笑彬, 程京京. 河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融资的障碍与对策[J]. 保定学院学报, 2021(4).
- [20] 袁菲, 王飞, 江振兴, 王燕. 浅析全产业链信息化视域下河北省农产品标准体系构建阻碍因素[J]. 智慧中国, 2021(8).
- [21] 卢德娴, 吕雅辉, 张润清. 河北省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J]. 北方园艺, 2021(9).
- [22] 张艳新, 张云博, 赵君彦, 李彤, 庄艳玲. 河北省中小规模奶牛养殖场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21(2).
- [23] 梁帆, 路剑. 非洲猪瘟影响下河北省生猪产业结构变化分析[J].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21(14).
- [24] 宗义湘, 高一丹, 吴雅琪, 倪俊伟, 郭丽华. 河北省蔬菜产业形势及“十四五”发展对策[J]. 中国蔬菜, 2021(11).
- [25] 吴雅琪, 宋奕颖, 夏琪, 宗义湘. 河北省茄子产业现状及发展建议[J]. 中国蔬菜, 2021(7).
- [26] 张娟娟, 乔立娟, 赵帮宏. 河北省辣椒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J]. 中国蔬菜, 2021(9).
- [27] 李滢, 朱戈亮, 梁雨菽. 河北省食用菌生产布局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北方园艺, 2021(8).
- [28] 贾悦, 杨钰泽, 王建忠. 河北省新型中药材产业模式研究[J]. 北方园艺, 2021(4).
- [29] 李海飞, 李建英. 积极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N]. 河北日报, 2021-12-01.
- [30] 刘鹏. 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对策研究[J]. 大视野, 2021(6).
- [31] 白玉芹. 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发展、问题与建议[J]. 经济论坛, 2021(3).
- [32] 范红辉, 韩瑞侠, 赵萌, 韩苗苗. 河北省制造业创新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J]. 唐山学院学报, 2021(3).
- [33] 彭晓静. 河北省制造业创新效率评价[J]. 时代经贸, 2021(6).
- [34] 王捷. 河北省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建设问题研究[J]. 河北企业, 2021(3).
- [35] 李哲. 中俄“冰上丝绸之路”战略合作背景下河北省冰雪装备器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21(5).
- [36] 穆瑞丽, 杨玉冰, 关丽薇. 全方位多路径做大做强河北冰雪产业[N]. 河北经济日报, 2021-10-16.
- [37] 穆瑞丽. 以“冰雪旅游+”促进冰雪旅游产业融合与可持续发展[N]. 河北党校报, 2021-11-05.
- [38] 从佳琦, 刘斌. 全产业链视角下河北省冰雪旅游发展研究[J]. 经济论坛, 2021(9).
- [39] 张晗, 丁龙飞. 冬奥会背景下河北冰雪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J]. 产业经济, 2021(12).
- [40] 李磊, 郑弘溶. 河北省冰雪运动产业新生态系统的构建[J]. 冰雪体育创新研究, 2021(21).
- [41] 李青华, 刘旺财, 王麟. 河北省大众冰雪体育运动发展建设研究[J]. 社会体育学, 2021(17).
- [42] 熊晓轶, 姚洋, 商雅轩. 河北省融入文旅元素的冰雪产业发展模式及对策[J]. 投资与合作, 2021(6).
- [43] 张晓阳. 全域旅游视角下河北省旅游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研究[J]. 旅游与摄影, 2021(1).
- [44] 李晓.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促进旅游消费若干问题探究[J]. 旅游经济, 2021(2).
- [45] 王丽丽, 杨斐羽, 李瑞晶. 河北省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1(3).
- [46] 陆艳颖. 河北省旅游文创产品创新设计的策略研究[J]. 艺界交流, 2021(5).
- [47] 祁刚利, 李鹏, 曹海霞. 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治理整合与旅游开发研究[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1(3).
- [48] 李会霞. 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N]. 河北日报, 2021-09-08.
- [49] 许朋展, 武琳娜, 尚宁宁. 河北海洋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现状及对策研究[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21(14).
- [50] 吴振华. 研学旅行视角下河北省5A级旅游景区发展战略研究[J].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2021(3).
- [51] 张葳, 施俊庄.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J]. 经济论坛, 2021(9).
- [52] 邹玲芳. 河北文化产业区域比较与协调发展研究[J]. 经济论坛, 2021(9).
- [53] 李少虹, 齐晓威, 王佳琦. 河北文化产业创新性发展研究[J]. 河北企业, 2021(1).
- [54] 王海英. 河北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与路径[J]. 北方经贸, 2021(3).
- [55] 隗建华. 河北省健康产业发展条件、制约因素与加快崛起研究[J]. 现代商业, 2021(6).
- [56] 王文录.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N]. 河北日报, 2021-09-24.
- [57] 李娟, 孙启.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养老服务的现状、困境及对策[J]. 许昌学院学报, 2021(1).
- [58] 刘妮雅. 河北省跨境电商发展瓶颈问题及对策研究[J]. 商业观察, 2021(8).
- [59] 李伟. 河北省农村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21(19).
- [60] 姜兴. 加快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N]. 河北日报, 2021-07-21.
- [61] 刘海云, 李清. 协同联动促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发展[N].

- 经济日报,2021-01-02.
- [62]李磊.京津冀冰雪运动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1(4).
- [63]李健,刘彤彤,黄庆节.京津冀特色区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21(3).
- [64]张慈,荣岩,鲁雪.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区域农产品流通质量评价—基于生态位理论[J].商业经济研究,2021(7).
- [65]陈镜宇,李宇峰,陈小荣.京津冀区域金融创新发展问题研究[J].商界,2021(4).
- [66]任爱华,杨馨露,肖福阳.京津冀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1(19).
- [67]刘宾.协同发展中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路径探讨[J].理论探讨,2021(4).
- [68]王金波,郑红玲,佟继英,闫立寒.京津冀城市群技术创新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1).
- [69]陈玉玲.京津冀科技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21(3).
- [70]陈玉玲,路丽,赵建玲.区域创新要素协同发展水平测度及协同机制构建[J].工业技术经济,2021(4).
- [71]周德胜,陆相林.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政策协同路径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9).
- [72]杨胜利,段世江.京津冀科创人才集聚模式与机制创新研究[J].科技创业,2021(7).
- [73]李志博,杨倩,李瑞琳.基于PDCA循环的京津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1(28).
- [74]王华彪,张静.京津冀高校协同培养人才的路径探索[J].人民论坛,2021(4).
- [75]严文杰,徐颖.“十四五”大幅提高北京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成效面临的难点问题与对策建议[J].经济论坛,2021(8).
- [76]李子彪,李晗.构建多链融合的区域创新体系[N].河北日报,2021-08-13.
- [77]陈爱祖.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平台[N].河北日报,2021-04-28.
- [78]颜廷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N].河北日报,2021-10-08.
- [79]祁红梅.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N].河北日报,2021-08-18.
- [80]王建强.加快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N].河北日报,2021-08-18.
- [81]张艳丽,王建华,许龙.京津冀协同下河北省创新型科技人才引进环境与培育能力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1(9).
- [82]聂学臣.大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N].河北日报,2021-02-10.
- [83]李庆达.加快建设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N].河北日报,2021-09-29.
- [84]杨莉虹.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N].河北日报,2021-06-23.
- [85]边继云.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N].河北日报,2021-08-04.
- [86]李巧莎,刘兢轶.河北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效果分析[J].中国科技产业,2021(9).
- [87]阎东彬.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N].河北日报,2021-04-14.
- [88]李大赛,高亚飞,吴继琛.科技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1(13).
- [89]宋伟,杨海芬.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金融支持政策演化及效果评价[J].金融理论探索,2021(4).
- [90]刘霞,刘畅,范爽.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河北企业,2021(11).
- [91]冷宣荣.积极推动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21-04-21.
- [92]宋东升.以数字化赋能推动我省对外开放“双提升”[N].河北日报,2021-04-17.
- [93]洪帅,田学斌.面向主体需求 深化制度创新自贸区[N].河北日报,2021-05-19.
- [94]高自旺.河北自贸区曹妃甸片区的发展定位、困境及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4).
- [95]赵培红,李庆雯.沿海城市“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1(9).

河北政治建设研究

吴耀明 程瑞山

2021年,河北政治建设研究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河北实际,抓住河北政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党的建设、法治河北建设、政府自身建设和职能转变、公共财政、乡村治理、河北政治史等主题予以深入研

究。总体来看,2021年河北政治建设研究取得了进展,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研究成果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多,吸收到本专题的研究成果就达75篇,比去年增加12篇;第二,公共财政、河北政治史等研究有所拓展和突破,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很多文章提出了非常有学术价

值的观点；第三，一些新人、河北省外的专家学者开始涉足河北政治建设研究。下面分不同主题予以总结评析。

一、河北党的建设研究

2021年，省内外党建专家学者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高校党建、弘扬塞罕坝精神等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王东峰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9次考察河北，特别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来到承德考察调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激励，进一步增添了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信心和力量。河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承德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重要贺信和对河北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全省领导干部会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会议和举办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成员培训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进行传达学习贯彻，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梳理30项具体任务，逐一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省级领导分工牵头抓好落实，引导全省上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以实际成效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1]

廉毅敏撰文认为，河北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坚持从系统观念出发，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深入开展“三基”建设年活动，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夯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层组织基础。建强组织单元，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如磐石的战斗堡垒；激发组织活力，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提升组织功能，把党员群众凝聚起来

迎战斗争考验；畅通组织运行，把基层政策资源力量高效组合起来。^[2]

张素钊等撰文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关键要看组织力强不强。近年来，石家庄市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实招硬招，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和政治功能得到了普遍加强，但仍存在着诸如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凸显、思想引领不够强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合力形成不够等问题。要以久久为功、坚持不懈的姿态，系统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应从其影响要素出发，注重从政治功能、组织体系、组织生活、基本保障四个方面系统提升。^[3]

李建侠认为，承德市创新思路扎实推进乡镇和街道改革，初步构建起基层党建引领新格局、职能体系新定位、审批执法新机制、机构设置新框架、编制资源新结构的“五新”基层治理体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全面形成，乡级职能体系建设新定位更加明确，基层审批服务执法新机制基本建立，乡级工作机构设置新框架整体优化，基层编制资源配置新结构更加强化。^[4]

王华彪等撰文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造组织振兴的样板，一要以“党建+乡村科学治理”为归宿，着力强产业强融合，让党政合力功能“强”起来；二要以“党建+三治融合”为推力，着力突出绿色融合治理提升农村治理效能，让“三治”效能“加”起来；三要以“党建+支部换届”为保障，着力锻造党支部的凝聚力创造力，让党的造血功能“续”起来。全面推行好“党建+”理念，健全党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党建引领，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鲜明树立大抓基层的导向，确保党组织在农村工作中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以组织振兴为乡村振兴“筑基、注能、助力、铸魂”。^[5]

刘会娟以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阐释了“一流党建”工作对高校二级学院的重要作用。紧紧围绕“一流党建”，一要坚持筑同心抓同步，探寻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二要坚持育人模式创新、构建项目化管理新模式；三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着力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凝

聚力；四要着力创建一流品牌，打造一流队伍，开创一流业绩，进一步提升高校二级学院的高质量发展。^[6]

叶校璜等以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河北高职院校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提升进行了研究，指出高职院校开展党的组织生活时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影响了组织生活的质量。应将提升组织生活质量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破解部分党支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问题，促进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整体提升。提升高职院校党的组织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一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在“三会一课”中，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二是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参加基层组织生活；三是深入推进“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建设；四是考核、激励、惩处三项制度同向发力。^[7]

周健华撰文指出，在“互联网+”背景下，微党课的开设为高校学生党建提供了新的教育载体。但微党课也逐渐暴露出形式化、内容脱节、欠专业、欠连贯等问题。通过在河北医科大学的实践探索，对传统微党课进行了概念上的重新定义，形式上的进一步丰富，内容上的统筹设计，教育主体的扩大，从而使改造后的党建载体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实现了党员教育的与时俱进，丰富了思政课程的思路和专业教育的人文元素。将党课内容与专业课程进行结合，与学生的阶段性任务相结合，与学生的阶段性特点相结合，增强了专业课程的趣味性，党课也变得更加接地气。^[8]

褚尚军撰文指出，做好成人教育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是要创新方法。河北经贸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针对成人教育学生特点，对其党建、思政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创新性地总结出“1+2+N”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1”是指始终坚持以学院党总支和班子建设为党建工作的核心；“2”即两支党员队伍建设，以教工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学生党员队伍建设为重点；“N”是指以“党建+”和“思政+”为抓手的创新工作模式和路径。通过对成人教育“一流党建”品牌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提升成人教育学生的政治意识，带动学风、考风

和教风建设，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9]

徐凡撰文认为，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牢记使命是塞罕坝精神的核心，艰苦创业是塞罕坝精神的支撑，绿色发展是塞罕坝精神的特质。塞罕坝精神如同一面旗帜，引领共产党人继续坚守初心和使命，拼搏进取，永不懈怠；如同一座灯塔，指引奋进者前行的方向，干事创业，百折不挠；如同一把火炬，照亮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10]

二、河北法治建设研究

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对法治建设的研究紧扣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两件大事，主要就雄安新区建设的立法权问题、白洋淀环保立法、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立法、京津冀区域环境立法、京津冀社区矫正立法协同、司法行政智能化等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观点。

（一）地方立法

范海玉以河北省为例，探讨了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中保障公众参与权的问题，认为，《河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在实践中的具体实施以及省内各设区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制定都要坚持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广泛吸纳公众参与立法过程，做好立法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做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京津冀协同和城乡一体。河北省生活垃圾分类立法的精细化完善和充实应当进一步明确湿垃圾计量收费的具体规定，建立引导性强的可回收物投放机制和点面结合的大型生活垃圾投放制度，并加强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日常监督、巡查。^[11]

陆洲、王文韬认为，雄安新区立法权限的配置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发展因素以及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应在我国立法体制的总体框架内，以发展眼光结合雄安新区实际情况进行探究，以更为准确定位并加以配备。配置途径主要包括三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授权在雄安新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授权雄安新区立法以及河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雄安新区

立法。应厘清三种立法权限配置相关事项,保障立法权的良好运行,发挥立法对雄安新区改革引领和推动作用。^[12]

范海玉、张思茵以河北省为例,对生态环境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法律机制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强化生态环境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法律机制建设,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促进环境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公众行使政治权利和环境权的重要体现。提升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地方立法的水平,需要从制约因素入手,着力完善以下五个方面的法律机制:一是通过完善全过程、常态化的公众参与机制,二是健全公众参与的沟通反馈机制,三是推动公众参与的激励补偿机制,四是严格考核监督与责任机制,五是建立大数据应用法律机制。^[13]

祝晓光、杜倩以河北省为例,对借助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全方位人大立法宣传进行研究。指出,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提升立法宣传效果、推进普法宣传方面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有待进一步挖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加强立法中的法律宣传,提升立法质量;二是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加强立法后的解读,推进普法宣传;三是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加强日常对基层群众法律问题的答疑解惑,促进公众守法。借助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全方位法治宣传,促进基层立法联系点从参与立法向监督执法、促进守法和宣传普法延伸,促进在地方立法中能够收集更多高质量的意见建议,推动地方立法质量的提升,法律的普及宣传,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提升,有力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4]作者还以河北省人大为例,研究了地方人大立法的舆情周期问题。认为,近年来河北省人大聚焦河北百姓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法治建设薄弱环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着力做好立法工作,努力体现地方立法特色、时代立法特色,审议通过了多项地方性法规。研究发现,此类地方人大立法的舆情周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并影响着立法工作中全过程民主实施,法规实施成效。^[15]

祝晓光等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为例,对网络传播方式创新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构建进行研究。认为,近年来,河北省人大积极扩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不

断拓展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确保了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科学化、常态化、高效化运行。通过构建网络传播方式创新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进一步激发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愿望,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和效果,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和立法效果,更有效实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16]

罗冠男认为,京津冀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具备初步的法律基础,协同效果初显。但也存在着如下问题:一是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立法和单项立法滞后,二是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目标认同度低,三是区域发展资金保障力度弱,四是区域内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建设缓慢,五是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制度保障力度弱,六是区域信息化协同程度偏低。建议三地协同立法,专门制定《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条例》,完善区域文化发展法律体系,有助于实现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区域发展目标。^[17]

田亦尧、糜同年对京津冀区域污染治理的立法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痼疾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跨区域治理机制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尽管目前京津冀已经开展了一定程度环境立法协同的实践,然而三地环境立法协同现状仍然面临着关键性概念不统一、重要认定评价指标不协调、环境污染法律责任追究力度不同等方面的问题。建议京津冀三地加强沟通,建立专门的立法协同沟通机构,建立技术性协作的机制和立法后评估协同机制,以信息化为依托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整合信息交流的方式,真正实现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立法协同,共同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18]

宋佳宁、王耀华撰文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域内水污染状况虽有好转,但仍存在治理成效缓慢、无长足进步等问题。区域协同治理是解决京津冀区域水污染问题的良方。然而,区域内相关立法协同机制的缺失严重影响着协同治理的实施效果。京津冀区域应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地方立法协同,逐步建立统一的排污标准,健全区域内水污染协同立法体系,最终构建完善的域内水污染立法协同机制。^[19]

尚颖的硕士毕业论文以河北省各设区的市为例,对河北省设区市地方立法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目前存在着:设区市地方立法权限划分不够明确;立法公开程序不到位,让公众难以参与到地方立法的过程中来;立法监督制约机制乏力,导致不合理的地方性法规未能及时发现;京津冀区域对立法的协同性考量不够周全等四个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一是应通过科学列举厘清设区市权限范围,以避免越权立法和重复立法情况;二是应加快进行设区市立法人才队伍建设,扩充立法机构配置及人员,将立法培训常态化;三是加大设区市立法公开力度,通过制定上位法方式统一立法信息公开,扩大公众参与;四是完善设区市立法监督制约机制,研究起草备案审查工作规范,建立立法监督责任制;五是建立区域协同立法机制,搭建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信息交流平台。^[20]

黄怡的硕士毕业论文对河北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进行研究,认为河北农村环境污染有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法律层面的原因,具体在于环境污染的上位法支撑不足、其他单行法对于农村环境保护不完善、河北省各个地区的立法水平参差不齐、河北省环境立法项目分布不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逐步完善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推行“小切口”立法;二是加强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的立法,健全工农业生产污染防治制度,完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主体的责任;三是健全水源污染治理的立法,加强京津冀水污染的协同防治,各地要细化整治地下水超采情况的法规;四是注意健全相关法律保护机制,如清洁生产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河北农村环境污染问题。^[21]

(二)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法律问题

于文轩认为,明确生态环境协同法制的目标定位,健全基于府际协调机制的体制协同,实现以利益衡平为主旨的制度协同,同时加强法制的协同实施,是进一步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法制发展的必由之路。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法制的目标体系由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法制的内洽与协调、实现利益均衡和利益共享、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构成。为有效解决京津冀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需从体制协同、制度协同和实施协

同三个层面展开制度设计。基于府际协调机制的体制协同,要求建立中央主导的协同治理模式,按照生态要素设立专项协同治理机构,构建顺畅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沟通机制。以利益衡平为主旨的制度协同,要求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划、事前评估、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税收分享等制度和机制。在法制实施方面,应破除行政壁垒、加强信息共享,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可以从推动立法协作、改进绩效考核、加强社会参与等方面入手,推动生态环境协同法制的有效实施。^[22]

王康、于晶晶认为,京津冀跨区域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争议的解决在于明确环评审批权转移的适用条件。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的形成、跨区域环境信息的公开共享及公众参与权的保障落实,为跨区域环评审批权转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面对京津冀地区跨区域环境问题突出、信访纠纷频发、环评联动失调的现状,跨区域环评审批权转移应注重明确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参与主体,规范建设项目环评各个阶段审批权转移的适用条件,严格落实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监督责任。^[23]

宋佳宁、陆旭对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法律模式进行研究,指出,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已久,但仍存在着三地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仍占主导、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性带来的矛盾、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非常态运行、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自上而下”特性、大气污染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一是由属地治理模式向自愿协同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完善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领导机制;三是加大中央政府对污染治理投入的力度;四是统一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规范性文件及标准;五是加强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多元监管体系建设。^[24]

曹学珍、韩京助认为,多元化的法律规制是旨在解决京津冀生态环境矛盾的区域性手段,也是阶段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在京津冀一体化语境下,通过完善协同立法、优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建立用能权交易机制来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降低区域内市场行为的环境成本,利用区域性规则与制度的优越性将区域环境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广适用,对新时代的环境困境做出有效的回应。^[25]

（三）司法与行政执法问题

崔岩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军工企业的域内迁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现阶段,三地军工企业的迁移规模和力度均已达到历史高值,但存在着三地间资质认定机制不畅、迁出地土地腾退机制不完善、迁入地军民融合业态配套机制缺失等法律问题。应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共同发力,通过构建区域性协同立法机制、建立区域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区域性军民融合产业法规体系来消除三地间的各类法制阻碍和行政壁垒,为军工企业的迁移提供具有创新性、可持续性与可操作性的法律保障。^[26]

吴云朋、田景超撰文认为,如何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体制,是区域生态协同保护的核心任务。京津冀环境资源司法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区位价值、生态价值和司法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失衡、区域司法差异及协同审判体制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为了充分发挥区域司法协作的治理效能,使其成为区域生态协同治理的关键一招。有必要创新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而对于环境司法协同机制的创新有必要从综合审判法院体系的构建、协同审判模式的构造、专业审判团队的打造及审判信息共享模式的探索等方面具体开展。^[27]

张凯认为,社区矫正协同发展是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大局,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创新社区矫正实践模式的现实需要。京津冀社区矫正协同发展面临着协作意识不到位、工作制度不统一、信息沟通不顺畅、平等对待不充分等问题。三地司法行政机关及相关部门应提升协作意识,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互,开展联合督查,向协作互动常态化、协助管理制度化、教育矫正协作化、协商议平等化方向发展,推动京津冀社区矫正工作协同发展。^[28]

刘浏、闻凯以河北省数据调研情况为例,对网络版权产业发展的挑战及其法律应对问题进行研究。指出,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挑战的法律应对,应当综合运用地方立法、执法协调以及版权产业生态优化等多维度措施:一是通过版权地方立法提供应对依据,围绕新修订《著作权法》研究制定地方法规,完善地方性法规服务网络版权产业发展;二是加强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双

轨制衔接,加强司法审判机制改革和行政执法力度,探索有效机制推进双轨制衔接;三是通过营造版权服务新生态提高应对效果,创新版权运营规制制度,健全版权服务体系,加强版权市场要素建设。^[29]

周文莉、李娟撰文认为,河北省司法行政系统全力推进司法行政智能化建设,呈现良好发展态势。通过业务的全覆盖、网络的全贯通、数据的大汇聚,加强行政执法的精准化,发挥监督约束作用,具体举措有:建设“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提升全面依法治国司法行政能力;拓展合作领域,加快与京津司法行政协同发展等。河北司法行政系统正适应信息化、智能化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大现代科技与司法行政工作的深度融合。^[30]

三、政府职能转变与电子政务研究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电子政务建设关系到政府管理实践的及时性、有效性,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和未来方向。河北学术界2021年对营商环境建设、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放管服”改革、编制和机构改革、效能改革、智慧旅游、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网络问政、微信微博政务新媒体等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于晴晴、张德淼指出,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但由于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机制涉及区域利益的复杂性,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协调机制成果。建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机制,应厘清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机制中的区域、经济、主体等构成要素的作用机理,结合京津冀三地已有基础,把握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机制中的难点和痛点,进而通过完善京津冀营商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开展京津冀营商环境评价活动,规划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机制建构的路径。^[31]

河北省委编办撰文认为,2021年7月15日,河北省颁布实施《河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把带有规制性质的政策规定上升为法律文件,标志着河北省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步入法治化轨道,对构建权责一致的基层综

合行政执法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条例》聚焦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行为，从执法机构、执法范围、执法规范、执法机制、执法监督 and 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规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从清单管理、清单外下放、清单外委托、执法权力、执法责任和边界等方面，对乡镇和街道承接的执法范围进行明确；建立健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执法协调衔接机制，着力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加强对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监督，建立健全政务公开、行政复议、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以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制度，确保权力不被滥用。^[32]

李哲、王鹤霏撰文认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优化“双创”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关键环节。河北省深入推进“放管服”工作，必须瞄准“双创”最迫切、最核心的诉求，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选准方向和路径，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应继续加大放权力度，切实提高放权的“含金量”，最大限度地精简优化；及时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清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编制省、市、县行政许可通用目录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与京津探索建立审批服务改革协同机制；进一步拓展清单管理的领域和范围，凡涉及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事项都以清单形式确定和公开；扩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探索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33]

骆涌、郭暉撰文认为，河北省县级应急管理局向有关部门移交和下放部分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权和行政处罚权的过程中出现了部门间沟通不畅、职责边界不清等问题。一是行政许可权移交可能引发潜在监管风险，如应急管理局与行政审批局技术沟通不畅、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管职责分配不明确、基层政府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等；二是行政处罚权下放后缺乏统筹协调，如下放部分行政处罚事项可能增加县乡工作衔接负担，未明确省、市两级部门行政处罚权，乡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不足，基层消防执法存在制度困境，乡镇和街道缺少“打非治违”执法权等。提出了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模式，合理分配

行政权限，统一监管标准，共同构建安全生产监管新机制的建议：一是统筹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管，审慎实施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二是创新监管模式，合理下放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权；三是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增强职业荣誉感。^[34]

周淑芬等撰文认为，在雄安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离不开高效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保障，因此与时俱进地对现有管理机制体制进行改革创新，是促进雄安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对雄安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路径提出了长远发展坚持法治引领、与时俱进改革管理模式、精简高效转变政府职能、以人为本创新服务模式等建议。通过服务模式的改变和提升，提高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助力服务型政府、服务型社会建设，为实现雄安新区绿色发展、承担新区功能使命助力。^[35]

纪志明撰文认为，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的设立对检察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雄安检察机关应当立足雄安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作用意义、发展基础等方面特点，借鉴先进经验，明确保障者、守护者、参与者三个基本定位。同时，应结合近期雄安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需要，从维护基础建设阶段社会稳定、助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参与基础制度机制建设、为适应未来发展储蓄人才等方面做好工作，为未来检察工作开展奠定坚实基础。^[36]

刘一江、李崇姿对石家庄市“三创四建”活动进行研究，指出，一年来，石家庄市“三创四建”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创新创业规模和质量得到提升，“三城同创”基本完成，城乡融合和一流营商环境得到改善，省会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全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进展。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开展“三创四建”活动，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破解创新驱动发展瓶颈制约；二是开展“三创四建”活动，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按照城乡融合发展思路统筹推进，持续用力；三是开展“三创四建”活动，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优化包括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在内的营商环境。^[37]

阴雪颖认为，唐山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在去产能方面压力大、包袱重，主要产业呈现优

势传统产业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接续替代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两个特征。根据不同产业,唐山市产业转型升级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可以分为如下四种:政府引导规划角色、政府高压管制角色、政府培育引导角色和政府服务角色。对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逐步走向衰退期的产业,政府要发挥政府引导规划角色,进行适度的干预,加强对战略性企业的控制能力,增强其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进入生命周期衰退期的落后产业,如钢铁、水泥、陶瓷等产业需要发挥政府高压管制角色,统筹规划,强度干预,严格管控增量,坚决暂停在建项目、遏制行业盲目扩张;对处于起步、成长初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战略新兴产业,要发挥政府培育引导角色,通过政策倾斜、政策保护的方式培育其发展壮大;对已进入成熟期的纺织、轻工等传统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发挥政府服务角色,适度地偏弱干预,侧重于维护市场环境,政府从管理走向服务,着眼于完善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秩序,为产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空间和开放、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38]

杨紫微撰文认为,“放管服”改革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政府管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提高行政便利性的重要措施。构建科学完善的政务服务大厅对于降低企业、群众的办事成本,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放管服”改革需要给政务服务大厅带来服务体系完善、服务流程再造、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线上大厅建设等方面的新挑战。针对所面对的挑战,提出4条建议:一是进一步明确政务服务大厅的定位;二是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三是优化大厅服务体验;四是推进实体大厅与在线服务平台融合发展。^[39]

(二) 电子政务研究

李艳茹、杜彩芹对唐山市政府在智慧旅游发展中的职能进行研究,认为,智慧旅游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旅游服务的重要措施,有助于旅游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能够增加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路径。对唐山市发展智慧旅游提出了加大政府专项扶持力度,加强规范监管,拓宽营销渠道,推动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化,推动旅游宣传信息化、推动监管信息化

等建议。^[40]

彭剑君等撰文指出,近年来河北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一些成绩,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仍有很大改进空间,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注重顶层设计,转变观念认识,从根本上理顺和完善促进电子政务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强化政府网站管理,完善河北电子政务建设相关机制;三是坚持以应用和需求为导向建设电子政务,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四是加强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平台的建设和联动;五是持续探索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机制;六是引进专业人才,加强培训,积极解决河北在电子政务建设中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七是加大并拓宽政府投资,不断深化河北电子政务建设的持续性和效益。^[41]

张伟伟等撰文认为,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使城市更加聪明、更加便利,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缓解城市难题、提高城市质量、改善市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对冀东南地区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政府主导,探索社会参与的建设模式;二是鼓励创新,建设特色智慧城市;三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安全系统;四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整体规划。^[42]

成志霞、杨轲以河北新闻网《阳光理政》为例,对网络问政平台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研究,指出,全媒体时代,《阳光理政》平台畅通全媒体传播渠道,打通政民沟通“最后一公里”;发挥网络问政平台优势,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将服务意识融入平台,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健全办理机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获取民意,增强社会风险分析、舆情预判能力,丰富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构建智能化的社会治理平台,既帮助群众解决忧心事、操心事,又协助党政部门问计问策,通过挖掘数据价值,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媒体力量。^[43]

贺冰蕊等以微博微信为例,对河北气象政务新媒体运营特点进行研究。认为,河北气象“双微”平台均以发布天气提示及预警信息为主,内容高度相关,微博发布内容较为简短,时效性很强,微信文章内容翔实。整体上看,河北气象官微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逐渐成长。为

“双微”更好地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契合公众阅读时段,优化发布时段;二是重视有效互动,提高信息到达率;三是制定管理办法,规范官微发布机制。^[44]

四、地方财政问题研究

2021年,河北省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财政治理现代化问题、地方财政透明度、河北财政运行中面临的问题、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雄安新区税收政策创新、财政支农支出问题等展开研究。

李克桥等出版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区域财政治理现代化问题的专著,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从财政治理现代化的基点出发,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与区域财政治理现代化紧密结合,围绕构建京津冀财力均衡体制、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健全的财政风险防控体系、体现法定原则的地方财税管理体制等问题展开探讨,通过阐释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发展,找出制约体系优化和体制健全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研究对策。^[45]

李克桥等撰文认为,2012年—2020年,河北省地级市财政透明度总体提升幅度较大,但11个地级市财政透明度升降差异较大,绝大部分的财政信息公开质量有待提高,全省财政透明度评价得分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各市之间“极差值”相差较大,各市财政透明度评价得分缺乏稳定性。影响河北省地级市得分差异化的因素主要有法治建设的推进程度、政府的主动性、地方对外公开信息的自由裁量度等几个方面。为提升各市财政透明度,提出了完善地方配套的法治建设、强化地方主政者绩效激励机制、加强区域内外部监督机制现代化、信息化建设以及重视媒体及网络建设、推进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等建议。^[46]

祝永革、朱云飞撰文认为,预计“十四五”时期,河北财政运行将面临收入增长趋缓、支出压力趋紧、部分县域存在运行风险等问题。对完善河北财政运行,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既要推动传统财源壮大,也要培育新兴财源,促进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二是既要体现财政保基本职能,也要运用市场化方式,放大财政支持效果;三是既要优化支出结构方式,也要注重绩效统领,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益;四是既要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也要防范潜在风险,确保财政运行稳定安全。^[47]

赵新海撰文认为,河北省财政部门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认真落实“政治引领、守正创新、科学高效、竞进有为”总体要求,开拓进取,扎实苦干,奋力开创全省财政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做到“六个必须”:必须更加注重财政资源配置的优化、必须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完善、必须更加注重民生保障的可持续性、必须更加注重财政体制机制的完善、必须更加注重财政风险的防控、必须更加注重法治财政的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勤俭办一切事业,建立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认真开展政策评估和绩效评价;着力保障基本民生,严格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备案制度;积极推进各项税制改革落地,进一步健全地方税和直接税体系,保障和规范地方财政收入;正确处理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关系,正确处理财政风险与其他风险的关系;规范财政权力运行,不断发挥法治在提升财政管理效能中的重要作用。^[48]

孙颖鹿的硕士毕业论文对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扶贫的过程中,财政支出是最主要的扶贫手段,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对财政扶贫效果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在微观层面,人力资本要素对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储蓄能力、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以及财政分权度对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对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财政扶贫支出效率的负向效应不显著。提出了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优化方案:从财政扶贫支出规模看,一是进一步提高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规模,有重点地强化规模效率偏低县区的财政扶贫支出力度;二是拓展政府购买、PPP等多元化财政扶贫资金筹措渠道为扶贫提供财力保障;三是创新财政扶贫投资方式,以新型合作社为媒介,以财政扶贫资金和政策带动农村合作社发展,在提升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提升财政扶贫支出的使用效率。从财政扶贫支出结构看,一是优化财政产业扶贫支出结构;二是强化片区人力资本财政投资,重点提高教育扶贫支出;三是推动片区城镇

化,强化基础设施扶贫支出;四是实施差别化财政扶贫支出策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从财政扶贫支出决策管理看,一是提高县域财政分权度,设计更加科学的财政扶贫支出府际动态决策管理机制;二是加强片区财政扶贫支出绩效审计,保证财政扶贫支出效率。从财政扶贫长效机制看,一是构建过渡期财政扶贫退出长效机制,巩固脱贫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保证财政扶贫支出效果可持续;二是完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使用长效机制;三是构建财政扶贫动态监测及预警机制,以保持财政扶贫支出整体效果,促进财政扶贫支出决策的可持续。^[49]

侯胜东撰文认为,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公共服务供给短板突出、弱项较多、质量不高的现实问题。满足京津冀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化三地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建立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需求为中心的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协同机制尤为必要。提出了强化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改革,促进三地制度政策衔接;二是优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统筹整合社会多元需求;三是加强多元化供给功能,放大政府社会融合效应;四是构建公共服务监督平台,优化公共服务评价机制。^[50]

王晓洁等对雄安新区税收政策创新进行研究,认为雄安新区特殊功能定位对税收政策创新提出了需求,包括高端高新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创新需求、吸引人才的税收政策创新需求和新型住房供给体系的税收政策创新需求。当前,雄安新区税收政策创新主要存在缺乏鼓励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和转移的税收政策、缺乏吸引高端人才落户雄安新区的税收政策、缺乏和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相配套的税收政策等三方面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尽快制定鼓励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和转移的税收政策、吸引高端人才落户雄安的税收政策和促进新型住房供给体系构建的税收政策。^[51]

高梦以河北省为例,对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河北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确实存在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能够使财政支农支出在最适规模和最优结构配置条件下最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快速高质量增长。这条最优路径中充满了地域特色,非常贴合河北省农业农村发展的需求。提

出了政府适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使财政支农资金得到最优结构配置,减少财政支农资金的无谓损耗等建议。^[52]

五、乡村治理研究

2021年,学术界对河北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水资源、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乡贤作用发挥、乡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乡镇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等方面展开研究。

王华东等从乡村振兴视角对京津冀水资源协同治理模式进行研究,认为,京津冀三地水资源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水资源量匮乏;二是水资源结构不合理;三是耕地化肥施用量、新兴污染物分布等导致地表水污染严重,水生态受损问题凸显,成为乡村振兴的严重瓶颈。指出,协同治理模式是京津冀水资源治理的最佳选择,建议从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文化、治理过程、治理模式协同五方面构建京津冀水资源协同治理模式体系。^[53]

王卫东撰文指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建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雄安新区三县目前存在着建立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所存在的村民主体性缺失、法治建设根基薄弱和文化轻视等问题突出。提出了,从“三治”各方面入手,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大法治宣传,完善法律规范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实现“三治”有效融合,从而推进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54]

王静等撰文认为,新乡贤对传播乡贤文化、创新乡村发展模式,助推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新乡贤在发挥作用过程中面临着政策缺失、制度不完善、政府与民众认同感低等困境。政府需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要培育和探索“新乡贤+”的治理模式,使新乡贤有更多的模式和途径参与乡村治理,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55]

王泽萍等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正明山村为例,对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村民们对基层领导干部定位和基层治理参与的认识上

存在误区；二是农村后备人才力量不足且老龄化问题严重；三是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结构不够完善；四是村民对乡村基层治理的制度意识淡薄。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建构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理念，打破封建传统观念；二是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打破传统治理体制的束缚，妥善处理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四是完善相关制度规范。^[56]

苏宝宝撰文认为，河北乡镇党委书记在脱贫攻坚中主要面临以下几种困境：一是产业扶贫项目面临运营难和分红难两难境地；二是群众“等靠要”的思想根深蒂固；三是贫困户文化素质和知识文化水平低；四是剩余贫困户家庭多数缺乏主要劳动力；五是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发展不平衡。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解决产业扶贫项目分红难问题，加快农村金融创新；二是解决农村产业不强、带动能力弱不利于贫困群众持续稳定脱贫的问题；三是创新“以奖代补”产业帮扶模式，激发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四是加大政策落实力度；五是针对贫困人口知识文化素质层缺乏开展培训提高技能。^[57]

李诗禹以河北石家庄市某村为例，对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及治理进行研究，认为影响人口空心化发展的因素有城市优越生活对农村产生的拉力和农村条件匮乏对农村产生的推力。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治理上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提高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并以此为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治理本质上是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达到和城市居民在资源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从而有效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迁移，从而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的农村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解决农村人口空心化重要措施；二是落实农村产业政策，将农村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依靠农村自身力量走自我“造血”的发展道路，对村集体资产进行合理规划利用，促进村民本地就业进而缓解农村空心化现象，实现乡村的重建和升级；三是对接帮扶精准脱贫，把扶贫与解决人口空心化的问题相结合，最终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58]

六、河北政治史研究

2021年，河北政治史研究从东汉直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覆盖时间长，高水平研究成果多，一共包括了7篇CSSCI期刊文章，占本年度所有“河北政治建设研究”CSSCI期刊文章数量的近一半，包括了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治理、官员在政治经济变迁中的作用、近代省议会作用、行政官员选拔考试、河北抗日战场局势、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近代警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省政府政权建设等多个维度，其中关于清代直隶总督相关研究就有4篇CSSCI期刊（含3篇《光明日报》），可谓成果层次高、数量多，极大地拓展了清代河北政治史研究的空间。

张盼盼撰文认为，东汉光武帝鉴于赵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根据天下形势及河北局势的变化，使以赵国为核心的河北之地真正成为实施统一大业的后方基地、对卢芳和匈奴作战的重要基地，决定分封宗室至亲刘良于河北，重建赵国并遣刘良坐镇邯郸。赵国的重建、同时任用得力臣将负责河北军政，迅速稳定了河北局势，加强了对河北的控制，河北真正成为光武帝一统天下的稳固战略大后方。建武十三年至十九年（37—43），赵国封爵等级经历了王国到公国再到王国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光武帝调整宗室分封，建立以至亲宗室为核心的东汉王朝宗室分封秩序的政治意图。^[59]

殷荣辉对北宋河北路建制镇进行研究，认为，北宋时期河北路建制镇从宋初10个左右增加到元丰年间的上百个，镇的数量稳步上升。镇的不断增多既有一般的社会经济原因，也有河北路特殊的基层政区变动原因。社会经济原因有水利的兴修与农业的稳步发展、手工业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基层政区调整的原因在于：降县为镇，北宋时期，河北路县降为镇次数达到45次，镇的数量因此增加。河北路镇的分布也呈现出自身特点，一般而言，多分布于大城市周围、沿河津渡口处和自然村中间地带。同时，一些镇因为黄河水灾进行了小地理空间的迁移。^[60]

衣长春、李想撰文认为，清代督抚是衔接中央与地方治理的权力枢纽，其职能变化是中央地方治理策略变化的一种反映。直隶总督作为“八督之首，疆臣领袖”，除具备一般性职能外，还负有其他总督无可比拟的职能。因此，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更具特殊性与代表性。有清一代，直隶总督的职能经历了复杂的调整，从顺治时期

中央在直隶省设多位行政长官到晚清时期直隶总督成为权势显赫的封疆重臣，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涵，体现了中央治理地方能力的变化。^[61]

杜家骥撰文指出，由于直隶地区的特殊性，直隶总督又被赋予多方面特殊职掌，而且均非常重要，如屏卫京师、守护陵寝；整肃京畿统治秩序；直隶与漠南蒙古、东北交接地区民族杂居地之管理；皇帝出京时的沿途事务；河务与漕运；配合中央行政事务等。咸同以后，直隶总督比一般督抚增加的最重要的特殊职掌，就是同治九年以后例兼的北洋大臣，所办职事也超出其直隶辖区，负责办理洋务、外交，同时编练军队，成为清廷执掌重要国务的重臣，以直隶一省之总督所发展的“北洋”军事，影响晚清乃至民国至巨至深。^[62]

衣长春撰文指出，直隶总督在清代诸多总督中政治地位最高，主要因为其辖区的特殊。皇帝通过直隶总督，将中央意志转换为具体政令，由直隶总督贯彻推行至基层社会。同时，直隶总督根据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相应的举措和建议提交中央，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力运行轨道，达到中央增强地方控制力的目的。清廷为凸显直隶省首善之区的地位，不仅充分放权于直隶总督，更给予大量政策性扶持，以期将直隶省打造成全国区域内的治理标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直隶北部地区为游牧和农耕文化交界带，满蒙等少数民族集中，实行内地府厅州县制与盟旗制并存的二元管理模式；直隶中部地区包含京师所在地——顺天府，遍布八旗贵族和诸多王公大臣，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因而实行京府制，由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兼尹共管；直隶南部为汉人集中区域，实行府厅州县制。经过不断实践，直隶总督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具体内容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五大方面。纵观整个清代，直隶总督对辖区的治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全国其他省份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就整体治理成效而言，雍乾时期直隶总督治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63]

董丛林撰文指出，天津开埠之后，直隶经济变迁开始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等方面，而传统经济形态转型也日益明显。其中，直隶总督特别是“能员”的主观能动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晚清时期传统农

业“趋新”走势愈发明显，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农村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这与当政者顺势开发市场的作用分不开。在农业技术层面的科学倡导，更加依赖人为作用。晚清直隶经济变迁所体现的“转型”趋向，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这种“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由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过渡发展的时代进步性；二是受制于列强而不能完全自主、难以健康发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现相当程度的“畸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也就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状况。^[64]

马丁、赵颖霞撰文认为，甲午战争后，王文韶临危受命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力整顿战后直隶政局，本着保全“洋务”人才的原则，建立稳定官僚团队；疏陈统筹北洋防务，积极谋划整顿陆军、添建炮台和筹建北洋海军；力主官督商办修筑卢汉铁路，并筹办铁路学堂；积极筹办近代学堂、发展教育以及支持直隶维新活动。这一系列举措，对战后直隶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65]

赵艳玲撰文指出，顺直省议会成立于1913年3月10日，是民初直隶地方立法、监督和民意代表机关，1927年随北洋政府的覆灭而消失。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直隶是全国重灾区之一。顺直省议会存在期间，关心省计民生，广泛参与社会赈灾活动。与北洋政府及直隶官方消极赈灾态度不同，议会在募集赈灾物资、调查灾情、监督赈灾款的使用等方面表现积极，其活动对缓解直隶灾后危机，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直隶赈灾史上留下了足迹。^[66]

项浩男撰文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县长考试，以选拔合适的县政人才。河北长期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后，亟须树立新形象，与军阀政治划清界限，通过考试选任县长是改善吏治的良法，也是社会的共识。河北省政府制定了有关县长考试的法规，但首先采取了荐举的方式，在舆论和国民政府的压力下，第一次县长考试得以举行。从制度设计和实际施行看，此次县长考试非常规范，确实遴选出了一批人才。但训练时间过长、分发委任困难、任期短暂等因素限制了考试合格者施展才能的空间，也消弭了这次考试的积极意义。河北省举行的县长考试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改良县

长选任方式的一次有益尝试，但并未产生根本性影响，考试始终没能成为国民政府选拔官吏的主流途径。^[67]

李娟亮硕士毕业论文对于学忠主政河北进行研究，1928年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后，河北省军政先后由晋系和奉系军阀把持，中原大战晋系战败，奉系势力得以重新控制平津及整个河北重地。东三省沦陷后，日军将侵略目标转向华北，河北政局日益动荡和严峻，张学良改任于学忠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面对日军侵略步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政治形势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苦力支撑河北政局，并试图努力发展河北省的各项事业。他抵住各项压力，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积极组织军事力量，打击日军，惩治汉奸，努力控制、维持河北省局势；对内执行中央政令，致力于河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对河北省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68]

陈静等撰文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按“由北向南”的既定攻击战略，开始从河北省北部出发沿平汉线、津浦线向南进攻，数日攻占平津，短时期内攻占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在战术上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但同时，日军却没能实现“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虽然节节失利，但却保存了有生力量，实现了弱国抵御强国的持久抗战的战略目的。因此，1937年河北抗日战场战局的总体特点为“日军胜而不赢（赢得战争），中国军队败而不输（输掉战争）”，这种开局特点对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这场战争的走向乃至最终结局均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69]

廖军、苏志宏对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进行研究，认为，晋察冀边区从自身实际出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创建了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创造性开展“三三制”民主建政，实施边区民众各得其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善政，不断改善和提高边区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激发和调动边区各阶层抗战积极性，巩固了根据地和边区政权，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发挥了示范性和先导性作用。晋察冀边区政权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

建设的重要发端和实践典型，具有自身特色，在阶级合作、实事求是、价值导向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给我们留下了三点启示：一是强调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理论；二是服从经济发展规律的实事求是路线；三是遵循“各得其所”的基本价值取向。^[70]

李春峰撰文认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制定商贸政策、建立组织载体、培养商贸人才的同时，颁发多种经营凭证，提供充足的资金，开展各类物资的收购、贩卖、运销工作，要求商铺、行贩提供具备商业信誉的保人，掌握商贸情报、把握市场行情与规律，进一步加强了对商业贸易活动的规制，对于畅通边区物资渠道、繁荣边区市场、稳定边区经济秩序，乃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71]

王明前撰文指出，晋察冀边区的基层政权改造，是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边区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贯彻群众路线，落实区村政权的民主选举，把基层政权尽可能掌握在贫雇农、中农基本群众手中；另一方面落实“三三制”民主原则，争取扩大和巩固农村统一战线。村财政的整理，也是基层政权改造和财政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岳区积极贯彻“三三制”民主原则，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改善党对村政权的领导。冀中区基层政权改造更重视政权内容的实际效能，实现保证党对村政权的领导与贯彻“三三制”原则的有机统一。冀热察区更加强通过统一战线争取社会中上层人士参与政权，以适应游击区的特点。村财政的整理，既是基层政权改造的主要内容，也是边区财政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岳区作为基本巩固区，村财政整理工作首先注重制度建设。冀中区也较早就开始注意村财政工作。冀热察区则结合基层政权改造推进村财政整理，重点规范村干部的财权，进而加强制度建设。^[72]

李珍梅、周乾撰文指出，1937年8月至1945年9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张家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联军在张家口开辟了南山、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行了一系列建设活动。党在领导群众的斗争中建立了多个联合县，抵抗了敌人的扫荡，巩固了根据地。在根据地进行了党的建设、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建立群众

抗日团体等运动,维护了群众利益,提高了群众抗日积极性,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张家口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建设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73]

张永刚撰文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启了重建警察系统的历程,这一实践开启了全面建立基层公安队伍。作为模范根据地巩固区的阜平县,其基层公安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为全面考察抗日根据地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样本。由阜平县观之,公安队伍建设成就的取得,仰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组织领导其建设实践较为系统地体现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初建基层公安队伍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框架,所产生的历史经验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74]

杨豪撰文指出,果实分配是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关键性环节之一,其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关联着解放区政权的革命理念与民众动员的实践效果。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与否意义甚大,不仅关乎土地改革整体性目标的彻底实现,而且深度影响着乡村治理权威性的生成及新型干群关系的革命化构建。然而,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实践中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尤其是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于粮款、家具和衣物等浮财的多分多占更是严重破坏了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原则。这一问题的凸显跟分配激励政策、基层薪酬机制和农村财政制度诸要素均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并不能一概以所谓的“不公”而论之。从理论意义而言,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模式追求结果公平,彰显出解放区政权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乡村社会新秩序的有益探索和不懈追求。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的分配实践即是在强调公平性原则优先的前提下,注意到了情势、差异和竞争等要素的重要性,而机会公平和效率优先的准则更构成了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公平与否的另一种参照逻辑与叙事空间。^[75]

王雪丽的硕士论文对1949—1956年河北省政府进行研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建设是基于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及社会需要进行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围绕自身实际情况对省内各级行政机关进行政权建设,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社会需要的统一,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权系统。这一时

期,河北省人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其对政权建设的实践为今后政治体制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也存在着组织机构建设不完善、机构精简与膨胀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76]

2021年,河北政治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与其他先进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第一,研究成果总体偏少,根据CNKI检索可知,以“河北政治”为主题的文章有216篇,其中期刊文章仅有141篇;第二,高端精品成果有待进一步突破,在发表的文章中,CSSCI刊物上刊登的有12篇,占有文章数量的16%,虽然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但与先进省市有较大差距,且未见我省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历史研究》等顶级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第三,相关研究队伍尚需进一步壮大。青年作者发文量少,尤其是高质量名篇少,表明关注河北政治建设的研究队伍规模和结构尚需进一步壮大和提质。

(吴耀明: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
程瑞山: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东峰.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新局面[N].学习时报,2021-11-03.
- [2]廉毅敏.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N].中国组织人事报,2021-04-02.
- [3]张素钊,李建陶,赵健.把握好四项要素支撑提升组织力——以石家庄市为例[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6).
- [4]李建侠.承德探索构建“五新”基层治理体系[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21(7).
- [5]王华彪,酒正纲,张金金.以“党建+”治理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J].中国发展观察,2021(14).
- [6]刘会娟.“一流党建”视域下高校二级学院的创新与发展——以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1(2).
- [7]叶校瑛,焦颖,付佳静,高雪.河北高职院校党支部组织生活调查及质量提升研究——以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21(2).
- [8]周健华.以微党课为载体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创新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4).
- [9]褚尚军.新时代成人教育“一流党建”品牌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河北经贸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1(2).

- [10]徐凡.塞罕坝精神:牢记使命创造绿色天地[J].党史文汇,2021(8).
- [11]范海玉.地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1).
- [12]陆洲,王文韬.雄安新区立法权限配置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13]范海玉,张思茵.生态环境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与法律机制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2).
- [14]祝晓光,杜倩.借助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全方位人大立法宣传——基于河北省的实践[J].人大研究,2021(8).
- [15]祝晓光,杜倩.地方人大立法的舆情周期研究——以河北省人大立法为例[J].人大研究,2021(11).
- [16]祝晓光,杜倩,李小娜,校飞.网络传播方式创新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构建——以《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为例[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1(3).
- [17]罗冠男.论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区域发展协同立法保障[J].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21(5).
- [18]田亦尧,糜同年.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协同问题研究[J].天津法学,2021(1).
- [19]宋佳宁,王耀华.京津冀区域水污染立法协同治理机制探析[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 [20]尚颖.河北省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现实图景与问题破解[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21.
- [21]黄怡.河北省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21.
- [22]于文轩.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法制的实现路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3).
- [23]王康,于晶晶.京津冀跨区域环评审批权转移法律问题研究[J].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2021(4).
- [24]宋佳宁,陆旭.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法律模式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5).
- [25]曹学珍,韩京助.京津冀区域环境问题的多元化法律规制[J].河北企业,2021(8).
- [26]崔岩.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军工企业迁移的法律问题与解决[J].法学杂志,2021(7).
- [27]吴云朋,田景超.绿色发展理念下京津冀环境资源司法协同机制创新研究——以审判权构建为视角[J].南海法学,2021(2).
- [28]张凯.京津冀一体化视野下社区矫正协同发展的价值、实践与保障[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5).
- [29]刘浏,闻凯.论网络版权产业发展的挑战及其法律应对——基于河北省网络版权产业情况调研[J].河北法学,2021(8).
- [30]周文莉,李娟.河北省司法行政系统“智慧司法”建设现状的探析[J].法制博览,2021(23).
- [31]于晴晴,张德森.京津冀营商环境协调机制的建构[J].河北学刊,2021(4).
- [32]河北省委编办.河北出台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推动实现改革实践与立法保障相统一[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21(9).
- [33]李哲,王鹤霏.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河北“双创”环境——基于俄罗斯政府职能转换视角[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21(5).
- [34]骆涌,郭晖.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急管理部门权限移交的困惑与制度保障——以对河北省县级应急管理局调研为视角[J].行政科学论坛,2021(9).
- [35]周淑芬,刘婷婷,王康,关佳音.雄安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17).
- [36]纪志明.雄安检察机关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定位与路径[J].中国检察官,2021(21).
- [37]刘一江,李崇姿.以“三创四建”活动为契机 推动省会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关于石家庄市“三创四建”活动的调查[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4).
- [38]阴雪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唐山市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1).
- [39]杨紫微.“放管服”背景下政务服务大厅优化研究[J].区域治理,2021(8).
- [40]李艳茹,杜彩芹.唐山市政府在智慧旅游发展中的职能研究[J].河北企业,2021(8).
- [41]彭剑君,白海琦,曹鸿飞.促进河北省电子政务发展完善政府数字基础设施[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2).
- [42]张伟伟,秦亚芹,杨术访.冀东南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现状与对策[J].现代农村科技,2021(2).
- [43]成志霞,杨轲.发挥网络问政平台优势 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河北新闻网《阳光理政》为例[J].采写编,2021(8).
- [44]贺冰蕊,李海青,王晨.河北气象政务新媒体运营特点探析——以微博微信为例[J].科技传播,2021(4).
- [45]李克桥,杨云腾,康世宇.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区域财政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21.
- [46]李克桥,杨云腾,康世宇.河北省地级市财政透明度比较及提升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2021(12).
- [47]祝永革,朱云飞.“十四五”时期河北财政运行应注意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财政,2021(21).
- [48]赵新海.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河北财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J].中国财政,2021(5).
- [49]孙颖鹿.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21.
- [50]侯胜东.新时期京津冀公共服务多元化协同供给机制建设[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1(3).
- [51]王晓洁,王丽,李金荣.雄安新区税收政策创新研究[J].税务研究,2021(3).
- [52]高梦.河北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1(1).

- [53]王华东,侯路沙,李晓东.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京津冀水资源协同治理模式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1).
- [54]王卫东.雄安新区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现状、问题及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55]王静,王宏,王虹.保定市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J].乡村科技,2021(2).
- [56]王泽萍,赵佳辰,刘晗,李国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发展问题探究[J].南方农业,2021(6).
- [57]苏宝宝.河北省乡镇党委书记在脱贫攻坚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6).
- [58]李诗禹.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及治理研究——以河北石家庄市某村为例[A].第十六届(2021)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集[C],2021.
- [59]张盼盼.东汉初年赵国的重建及其意义[J].邯郸学院学报,2021(1).
- [60]殷荣辉.北宋河北路建制镇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
- [61]衣长春,李想.论清代直隶总督职能的嬗变[J].河北学刊,2021(1).
- [62]杜家骥.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掌及其作用[N].光明日报,2021-03-15.
- [63]衣长春.清代直隶总督与辖区治理[N].光明日报,2021-03-15.
- [64]董丛林.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N].光明日报,2021-03-15.
- [65]马丁,赵颖霞.直隶总督王文韶与甲午战后督直举措述论[J].保定学院学报,2021(2).
- [66]赵艳玲.顺直省议会与北洋政府时期直隶的赈灾[J].档案,2021(12).
- [67]项浩男.南京国民政府改良县长选任方式的尝试:河北省县长考试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21(4).
- [68]李娟亮.于学忠主政河北研究(1932—1935)[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 [69]陈静,孟令择,张金鑫.1937年河北抗日战场战局研究[J].黑龙江史志,2021(5).
- [70]廖军,苏志宏.善政革命: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71]李春峰.革命与经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对商业贸易活动的规制[J].军事历史研究,2021(2).
- [72]王明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改造与村财政整理[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3).
- [73]李珍梅,周乾.张家口沦陷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建设[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4).
- [74]张永刚.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基层公安队伍建设论析——以阜平县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学刊,2021(6).
- [75]杨豪.华北解放区土改果实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新探(1946—1948)[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
- [76]王雪丽.1949—1956年河北省政府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河北省文化建设研究

梁晓晓 向回

2021年,河北文化建设在成果分布上与上年大体一致,同时冰雪文化、数字技术和文化的教育功能等新热点、新方向也引发了学界较多关注,整体研究情况如下。

一、文化理论研究

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燕赵文化和西柏坡精神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精神文化如何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以及当下如何继承、发扬这两种精神文化。

(一) 燕赵文化研究

本年度,学界主要探讨了燕赵文化的概念、载体、对文坛的影响及燕赵文化分支等内容。其中,河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燕赵文化研究》杂志继续表现出对燕赵文化的重视,并逐步打破

地域限制,将其他区域文化、海外文化同燕赵文化的互动纳入其中,进一步开阔了对燕赵文化的讨论。

张京华《满天星斗还是众星拱斗:再论燕赵文化》从地域文化概念的成立标准,即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特征且文化特征保持连续不断,重新探讨了燕赵文化概念的合理性。而且燕赵地域文化特征被概括为“慷慨悲歌”,在历史上有三次高潮,前后呼应,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认同。通过将“湖湘文化”与“燕赵文化”相比较,提出地域文化虽然居于一方,但应向往全体,地域文化虽然保存个性,但应祈向大道的观点。^[1]田苗等从文化与文化载体的角度指出,燕赵区域地形地貌险峻复杂,造就了燕赵“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文化特征,具有和乐精神、

革新精神、包容精神、求是精神、忧患精神和创新精神，表现在燕赵文化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载体上。通过梳理燕赵精神的文化表现，以促进燕赵精神的传承和发展，积累燕赵文化对外传播素材。^[2]李朝杰从燕赵思想在文坛的传播角度，指出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文化，先后以“建安风骨”、北齐文学传统、初唐诗文革新等面貌出现，顽强地保持着其刚健质朴的基本特质，显示着地域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燕赵文化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赵文化对唐诗风骨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唐初的诗文革新运动，也与由北齐入周、隋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

乔楠着重从燕赵地区现存的傩文化探析了其存续至今的原因。研究认为，影响燕赵傩文化传承的因素不仅有燕赵傩文化自身特质、传承主体与文化研究人员的参与，还包括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为更好地传承傩文化，在注重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基础上，还需再吸收借鉴其他可发展途径。^[4]

（二）西柏坡精神研究

西柏坡精神是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指南，如何继续发挥其精神动力和当代价值，是2021年学界研究的重点，具体分为两个方面，即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西柏坡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

关于西柏坡精神当代价值的研究，李雪峰分析了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基础和科学内涵，指出其蕴含的“赶考”精神、“两个务必”精神和“两个敢于”精神，对推进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5]戴建兵重新阐释了西柏坡精神，即彻底革命的精神、人民至上精神、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不懈赶考精神。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西柏坡精神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强大武器和实现中国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保障。^[6]邵艳梅、周海娣认为，西柏坡精神内涵丰富，与大学生文化自信有内在关联。因此，以西柏坡精神为载体，通过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加强高校教育系统性、树立良好红色

家风、积极开展丰富实践活动等途径，可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使其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7]

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中国精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段晓亮、吴佩育指出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包括开拓进取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民主协商精神。铁道兵精神本质特征为牺牲精神、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和创造精神。两种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凝练和升华，而西柏坡精神是孕育铁道兵精神最重要的精神源泉。^[8]张玲、孙艳美通过探析红船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的历史生成与基本内涵，指出两者的相同点在于都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分析差异得出，两者着力于不同的阶段目标，体现了不同的思想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架构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地位。新时代继承与弘扬红船精神与西柏坡精神，要依托物质载体培育直观的情感认同；要融入党建实践，确保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有效链接；要紧跟时代潮流，以新媒体技术实现广泛传播。^[9]

二、文化史研究

2021年对河北文化沿革的探究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区域文化史，侧重从空间或时间角度讨论河北省的文化发展格局。二是艺术文化史，在继续挖掘不同文化形式的精神内涵及影响的同时，也从历史与文化、宗教与文化融合发展的角度深化了对艺术文化的考察。

（一）区域文化史

2021年，区域文化研究将内部细致考察同外部互动关联紧密结合，既融汇了政治、军事、历史等多维视角，客观全面地突出了地方特色和地域差异，也侧重分析区域同外部的联系。该方面研究分城市文化史、文化起源、文化融合三部分。

对城市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傅金才、陈淑荣的《石家庄文化通史（明清卷）》以区域史和区域文化为切入点，主要研究明清时期即自1368年明朝建立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石家庄地区的主要文化事项及其发展，对明清时期石家庄所在区域的建置沿革、思想教育、文化艺术、社会风尚与习

俗进行了系统介绍。^[10]张莉萍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保定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万多年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条线索,把有史以来保定市行政区范围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人物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扩大保定的城市知名度、提升城市形象起到重要作用。^[11]郑恩兵梳理了自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10 月,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晋察冀文艺工作者汇聚张家口,开启解放区文艺发展繁荣新局面的历史盛况。各大文艺家和文艺组织纷纷创办报刊,建设广播电台,使张家口的报刊业、出版业、广播业空前繁荣,奠定了张家口红色文艺之城的历史基础。^[12]王鑫从中外文献入手探讨了张库大道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即张库大道并不是一条因设市需要而建的商路,而是由历史不断演变发展而来的驿道、兵道、商路;在空间上对张库大道上的贸易商人进行地域性划分,进而归纳了张库大道对辐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影响。^[13]

对文化起源的研究主要表现为辨析诸说,并从新角度提出新观点。任乃宏以考古学确定的“磁山文化”年代与《山海经》所载“精卫填海”传说为中心,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夏代纪年,推测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当开始于距今 7400 年以后。^[14]藏明、顿一鸣根据史料,从姓氏学、谱牒学、方志学等多角度对我国第三大姓氏张姓的起源诸说进行辨析,综合考证得出清河是张姓起源地,并归纳分析了张氏的郡望、堂号以及家风世训。^[15]

对不同文化交融发展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何艳杰《多元交汇:先秦白狄文化变迁特征》以先秦白狄文化为研究对象,指出本属北方山地民族文化系统的白狄,在向河北动迁的过程中文化因地而变,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由“贵货易土”到“仰机利而食”,装饰工艺“多美物”“作巧奸冶”,歌谣悲壮慷慨、戏乐倡优盛行,民风则由尚武到崇儒发展,这一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对中华民族之源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6]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是年代相近、地域分布不同的两种考古学文化。李彦英结合近年来的一些新的发现,从陶器、动植物遗存、祭祀类遗存等方面探讨了两种文化的关

系。^[17]马明、梁中合对河北境内龙山时代的考古遗存进行了分期研究,讨论了各遗存的文化属性及其源流,并阐发了龙山文化的格局。研究认为,河北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五段,包括五种不同文化性质的遗存,每种遗存的源流不尽相同,每种遗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但不同遗存对外来文化因素表现出或接受或排斥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18]

(二) 艺术文化史

河北艺术文化的源流与发展研究,在努力发掘民间音乐、戏剧、陶瓷、佛教造像、建筑等艺术形式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及地域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了河北民族精神,展示了河北深厚的艺术文化底蕴。

关于民间音乐的研究,金红莲在对河北民歌进行文化溯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其蕴含的河北民族精神、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等文化记忆。通过探究河北民歌的文化场域、文化行为及其发挥的文化认知与筑牢核心价值观的功能,指出新时期河北民歌发展应加强文化认同和文化意义建构,开发河北文化的认同资源,正确引导河北文化发展方向。^[19]

河北丰富的剧种和演戏历史越来越受到关注。张培燕、孙燕对河北秧歌小戏加以文学阐释,认为秧歌小戏产生、传唱于民间,以自由灵活、不拘一格的形式和谐趣轻松的喜剧风格吸引着众多百姓。目前,其剧目内容、角色结构、语言趣味及经久不衰的顽强生命力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文学价值正在被重估。^[20]李扬、崔文君通过史料挖掘,按照现代戏剧发展历程,分发现社会问题、走向广场戏剧、黄金时代等阶段,对田汉《获虎之夜》、洪深《农村三部曲》、曹禺《蜕变》等代表性剧作的时代背景、创作过程、演出情形等历史细节进行回顾,真实地展现了中国革命戏剧的发生现场及革命文化精神艰难且坚定的发展历程。^[21]

在陶瓷窑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张文松、张琳琳就太行山脉的河北陶瓷窑口历史文化源流与谱系进行研究,认为依托河北太行山地区的资源优势,以磁州窑和定窑为代表的陶瓷历史文化形成。同时太行山各窑口的陶瓷历史文化并非独立存在,它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源流与谱系关系,

这种关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山地区陶瓷窑口带状文化体系。^[22]

佛教造像演变与历史文化演变存在紧密联系。刘洪彩、崔雨萌通过梳理河北定州与邺城地区北朝伎乐天边饰背屏式佛教造像的时代风格,考证数件时代不明的佛教造像,揭示了北魏后期至北齐定州与邺城地区背屏式造像的复杂关系。研究指出河北北朝伎乐天边饰背屏式造像风格的演变,既与南朝文化的影响、定州与邺城传统地域特色有关,又同当时汉化与胡化的思潮此消彼长关联密切。另外,通过对比伎乐天在佛教文本中的表现,可知背屏边饰伎乐天像是为法音供养,表现闻法成佛的信仰主旨,这也为其艺术特色的形成提供了创造表现空间。^[23]

河北传统建筑的营建受文化与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解丹等综合地理环境因素将河北传统建筑文化划分为燕山山脉建筑文化区、塞北建筑文化区、太行山山脉建筑文化区、河北平原建筑文化区、运河建筑文化区及沿海建筑文化区,并解析了不同文化区域下的传统建筑环境、空间及材料等特征,以探求不同类型传统文化对建筑营建的影响,为当代建筑的创作提供借鉴。^[24]

三、文化产业研究

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既有基于当前整体形势、致力于破除关键障碍的成果,也涵容了对文化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等传统问题向深度、广度推进的研究。同时,部分学者聚焦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提前探究了河北省体育文化产业尤其是冰雪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体现出未雨绸缪、关切现实的意识。

(一) 文化产业发展

2021年,文化产业政策演变、文化业态发展、产业融合、产业人才培养等主题引发了学界关注。

赵学琳、李政错通过采集政策文本中关键词、高频词并加以量化分析与定性阐释,梳理了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政策史,认为我国产业政策的总体态势呈现出综合拓展、协同联动、包容发展的特征。根据“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文化产业政策应该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文化产业的“双循环”、培

育新兴文化业态形态及发挥政策体系合力上着重发力。这一高屋建瓴的研究对河北文化政策的制定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25]

关于文化业态的研究,邹玲芳着眼于河北文化产业的区域布局,指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制约因素表现在领军企业数量、文化创意资源、新业态培养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并为推进河北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提出对策。^[26]张涛、武金爽利用偏离—份额法对环渤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是否合意进行判定。结果显示,以全国为基准河北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低,文化产业结构表现为非合意性趋同。河北省可立足燕赵文化特色展开艺术创作,同时政府要创新机制,提供政策保障。^[27]

在产业融合上,张亚宁分析了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促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以此构建了区域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从人才队伍建设、政策支持、地区平衡发展三方面提出了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路径。^[28]佟萌指出,产业融合为承德民间音乐产业化发展带来契机,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即在旅游区引入大型的实景音乐演出、在旅游景点打造代表性的音乐文化品牌、依托旅游产业推广和普及民间音乐文化,这一新模式拓展了民间音乐保护的新路径。^[29]

关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研究,马骏通过分析河北省艺术人才培养与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认为艺术人才培养应在目标对接、专业设置、内容定位上与产业市场需求对接,以实现两者的协同推进、协调发展。^[30]

(二) 冰雪等体育文化产业

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为张家口、河北省带来发展契机,如何在顺势而为、借势而进中持续释放冬奥红利,促进河北冰雪等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成为焦点。相关研究集中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冰雪产业发展等方面。

在河北省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岳志荣等认为,尽管河北省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资源因缺乏整合限制了高质量传承发展,为此应在构建政府主导的传承发展机制、大力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教育传承路径及开发旅游产业路径上精心计划与设计,以实现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31]

冬奥会背景下河北及张家口如何实现冰雪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乎河北省建设产业支撑点的长远利益。张晗、李平从自然条件、冬奥会承办、冰雪产业规模扩大、政府支持等角度综合分析了河北省冰雪经济发展基础, 并指出河北冰雪经济在基础设施、产业链完善程度和文化影响力上仍存在不足。结合滑雪运动胜地瑞士在冰雪经济发展上的成熟经验, 为河北冰雪经济发展提出对策。^[32]武义青等通过分析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可行路径, 指出京张应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 协调推进。各要素、主体在各层次空间单元上关联耦合, 形成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系统。通过场馆综合利用, 培育市场化主体, 构建跨区域协同管理机制, 实现京张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合作、联动、互惠。^[33]

(三) 旅游文化产业

2021年, 河北省旅游文化产业研究方向和上一年大体相同, 主要集中于文旅融合、品牌和景观建设、城市旅游文化、乡村旅游文化和少数民族旅游文化五方面。

关于文旅融合的研究, 田学斌着眼当前发展情况, 提出实现理念融合、资源整合, 营造制度生态, 并以科技为牵引, 构建全域旅游智慧化支撑体系的对策, 以加快形成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优势。^[34]红色文化旅游如何高质发展, 是河北省旅游产业增速提效的关键。邸明慧等宏观分析了河北省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赋存, 论述了其整体发展状况, 并提出完善红色旅游体制机制, 实施分类指导, 培育全省红色文化品牌体系等针对性建议。^[35]祁刚利等从微观视角指出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产业吸引力低的原因, 提出构建“四位一体”治理体系, 坚持区域性与整体性相结合, 统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措施。^[36]

优秀的品牌和景观可助益地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雒志达指出, 缺乏较强的品牌创新意识和推广力度是河北省旅游文化品牌培育及推广的两大问题。根据市场需求, 升级品牌定位、构建完善的品牌体系以培育优质品牌, 并构建创新型合作推广模式, 采用网络化推广渠道和多元化促销模式进行推广, 才能助推河北省旅游产业的良好发展。^[37]张鑫、刘飞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景观设计入手, 指出河北非遗文旅在稳中求

升中, 尚存景观开发“偏科”和设计好感度低的问题。在举办冬奥会和短视频网络平台、直播带货如火如荼的机遇推动下, 河北非遗文旅景观应在设计思路实现突破。^[38]

在城市旅游文化方面, 张海燕等以太行山高速公路沿线区域为研究对象, 着重探究“一路三带”协同发展路径。研究指出, 河北太行山区既具有资源禀赋, 旅游业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 又在交通等政策规划上面临发展机遇, 因此可通过制定“一路三带”协同发展政策体系, 围绕特色旅游吸引物及各主干线交通轴来布局“斑块—廊道”发展格局, 同时以“旅游+”“+旅游”拓展产业内涵, 以“公司+合作社+居民+人才”方式鼓舞全员参与, 在科技助力下推进“数字太行”建设、推广, 推动太行山全域旅游向市场化、规模化、智慧化和高端化发展。^[39]林沙欧、李洋分析了秦皇岛市文化主题分散、特色不鲜明、海洋文化旅游开发不足的问题。认为, 秦皇岛市应以“海洋”“海港”为抓手, 并从梳理海洋文化史角度突出品牌优势, 加强“港城互动”, 达到巩固资源优势, 提高竞争优势, 深化发展优势的目的。^[40]

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乡村旅游文化的发展。谷金明根据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提出针对性发展策略, 包括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 根据实际情况开发利用旅游资源, 创新乡村旅游文化的运营管理模式, 及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加强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的宣传等, 在提高乡村服务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的经济发展。^[41]邢慧斌、赵梓臣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农村文旅合作社及其与乡村振兴的正效应互动关系, 从完善合作社组织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合作、深入挖掘特色文化打造特色产业、提高相关新技术的应用程度等方面, 为促进农村文旅合作社发展和推进乡村振兴提出建议。^[42]

少数民族旅游文化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陈纪、董玲君以河北蒙古族为例, 在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诠释了蒙古族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间习惯是其生态文化的关键要素, 指出加强河北蒙古族生态文化旅游建设, 对重构京津冀区域生态文化、保护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区域民族关系等具有现实意义。并从旅游开发对象、生

态协调发展、旅游资源优势、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的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的可行性。^[43]

整体而言,2021年在文化产业研究方面,从河北省全域的宏观视角和从区域或民族的中观角度加以探讨的成果较为丰富与深入。从微观切入、可直接实现效益转化的学术成果,如品牌打造、景观设计等则较为薄弱。而针对某一问题,在动态发展中持续关注并深入探究,形成破除现实障碍、落地性强的成果链条,仍是现实所需。

四、文化建设研究

河北文化建设的研究在本年度聚焦于公共文化、城市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雄安新区文化建设以及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五部分内容,而且各方面研究都继续向纵深发展。其中,关于乡村文化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紧跟时代前沿,体现出新颖深入的特点。

(一) 公共文化建设

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既有对建设成就和经验加以梳理、总结的成果,也包括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对策的研究。项琳总结了我国文化惠民工程的主要成就,即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公共文化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发展壮大。国家文化惠民工程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缩小城乡差距、整合条块资源、助推精准扶贫上作出突出贡献。国家文化惠民工程的创新经验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自上而下协同推进,中央小投入撬动地方和社会资本大投入,统一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44]李宝将70多年来河北全省革命题材纪念馆、博物馆的建设、发展进行分期梳理,通过介绍各个阶段的国情和省情,描绘了纪念馆、博物馆建设发展的大环境,分析了这些文化场馆发展的因素及成就。^[45]

(二) 城市文化建设

2021年,城市文化建设仍然是学界关注的话题,相关研究包括长城文化带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城市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传播传承四方面。

关于长城文化建设研究,李宏宇针对河北境内长城资源建设与开发现状分析了农旅融合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托浙江农旅融合的成功经验,

提出精细化开发,科学合理规划,增强文化引领及试点示范的融合路径。^[46]李开霖等以河北省的山海关、金山岭等长城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1—2019年9家长城景区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动态、静态分析和综合效率评价,并从增强景区管理效率与优化景区建设规模两个角度提出改进建议。^[47]

2021年,关于大运河文化带的研究主要围绕运河文化史、文化带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旅品牌建设四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梳理运河变迁历史与文化兴衰。康金莉介绍了自东汉以来运河河北段的历史文化变迁,包括:(1)运河开凿与管理变迁,运河河道流经区域的演变;(2)近代以来雄安区域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商业、手工业与农业的发展;(3)运河漕运地位、兴衰的变迁,尤其是近代以来运河漕运地位的下降。21世纪以来,运河区域经修复古建筑遗址和修复运河景观带,成为河北经济文化新名片。^[48]二是对文化带建设的综合性探讨。艾蓉认为,大运河文化带大名段拥有丰富的运河历史文化遗存。目前,大名县并未形成完善的运河保护和开发体系,可从大运河文化品牌创建、文化遗产保护、河道生态环境修复和文化旅游发展等角度进行综合性统筹建设。^[49]三是对运河文化带非遗保护和利用的关注。肖潇等针对河北省运河文化带在通航条件、资源分布、统筹规划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河北省运河文化带“旅游+非遗”对策应在开放中确立“旅游+非遗”融合路径,并着力推进品牌创新,培育一体化模式,通过资源整合达到区域协调发展。^[50]吴秋丽、曹舒婷认为当下河北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主要依托政府部门,是自上而下单中心主导的传统保护模式,面临财力不支、效率低下等困难。受多中心治理理论启示,大运河文化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应加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多元化保护与传承模式,共同促进大运河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51]四是从文旅品牌建设角度为大运河经济价值提升提出对策。郭安、张立飞从融通高职院校与地域文化职责方面分析了河北省大运河文旅品牌建设路径。研究指出要挖掘地方运河文旅品牌建设潜力,可探索高职院校的点对点合作方式。^[52]

城市文化资源开发是树立城市名片的重要措施。张文光对保定各类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归纳整理,针对保定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面临的困境,提出整合多种文化资源、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打造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红色旅游新业态、强化红色文化资源宣传力度等对策。^[53]鉴于衡水是董仲舒的故乡,是全国董子文化资源的最大富集之地,杨英法、郭广伟在引导利用智能化技术的意识和能力、借鉴外国经验、破解融资难题、制定数字化经营规划等方面,探索了董子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路径。^[54]

关于城市文化传播传承的研究,宋玉坤以保定碑刻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其地域分布、碑刻种类和丰富的价值。由于受保存地点环境、人们重视程度、基础设施等条件影响,各地碑刻保存状况差异较大,因此应通过政府、专技人员、现代技术等途径加大对碑刻的保护及对碑刻内容的研究。^[55]陈旺从传统饮食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张家口丰富多彩的饮食,主张借助举办冬奥会的契机,深层次挖掘张家口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特色饮食文化旅游,以弘扬张家口饮食文化,促进餐饮业和旅游业发展。^[56]韩婧等强调中英双语模式对邯郸城市文化推广的重要性,指出邯郸网络双语推广仍缺乏整体规划,应通过在主要政府网站设置双语,与多语翻译服务中心合作等方式来拓展邯郸文化的双语推广。^[57]

(三) 乡村文化建设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河北省陆续展开乡村文化建设,学界对河北省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和实施成效及时跟进并持续关注。2021年,该项研究表现在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研究、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景观三个方面。

在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研究上,孟祥林《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发展的向度、瓶颈与对策》指出物理空间是乡村文化记忆的基本支撑,体化空间、惯习空间、制度空间和刻写空间能够进一步强化物理空间的张力。目前,在乡村文化记忆空间拓展过程中,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多元虚拟空间正在被挤压,在探索乡村文化记忆的多种举措中,需要在保存社会网络、守住空间线索、形成文化意象、实现平等对话和壮大文化主体等方面做文章,构建起乡村文化记忆的多向度表达方式。^[58]庞琳、张亦佳在梳理河北历史文化村镇概

况的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河北省 11 个市进行“原乡”发展模式分析,从而制定了“三生融合”的整体规划,即将“生活、生产、生态”融入产业发展,从根本上建立以人为本的乡村建设思路。^[59]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革命老区的发展备受关注。刘艳冬认为红色文化传承对乡村尤其是革命老区的振兴意义重大。然而,河北革命老区由于地理制约、认识不足和规划欠缺,导致红色文化在助推革命老区振兴上发力受限,因此应在推进文旅融合、提高群众素养、推动整体规划上采取措施。^[60]

关于乡村文化景观的研究,解丹、王雯探究了关隘型古村镇的特征和物象、精神景观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关隘型古村镇“景观”与“文化”的作用机制,是以生产生活行为、军事防御行为、空间实践行为作为媒介促使“景观”与“文化”相互影响,而关隘型古村镇文化景观的独特性表现为防御性景观与军事性文化,并可通过空间层级与行为媒介进行表达。^[61]

(四) 雄安新区文化建设

河北雄安新区自 2017 年 4 月 1 日宣布成立便成为研究热点。2021 年,对雄安新区文化建设的研究既保持了从区域整体着眼的研究惯性,尤其是突出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也在着重研究部分县域的文化发展现状,以促进区域内部协调并进上取得突破。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方面,文化传承保护、文化产业变革重构和形象传播。

雄安新区传统建筑见证了城市历史发展与文化兴衰。任丽芬通过实地调研、文献研究等方法探究了雄安传统建筑与本土地域文化的关系,结合雄安本土文化对不同类型传统建筑进行文化特色分析及价值评估,从中引申出雄安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核心精神。^[62]闫晓从等以雄安新区红色文化为研究对象,结合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的文化诉求,提炼出新区建设中红色文化传承转化的载体形式与内容,并从公共设施、文化创意产品和宣传媒介三方面展开设计实践,体现出红色文化保护和弘扬的新思路。^[63]

关于雄安新区的文化产业布局,黄志鹏等依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通过对白洋淀民俗文化形成与现状的研判,从民居、民艺、民乐

方面阐释了白洋淀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及其对雄安新区全域旅游发展的意义；依托白洋淀传统的特色文化和历史记忆，主张将乡土文化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塑造出具有地域特色、可持续发展的雄安全域旅游产业和旅游文明。^[64]

关于雄安新区形象传播研究，侯贺英等以雄安新区全球形象传播为例，运用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探析了当前雄安新区全球形象传播话语大格局、高站位和突出新区发展前景和规划的特点，却也忽略了新区的本土特色和历史传承。为更好地宣传新区形象，传播话语应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重视历史传承和文化创新。^[65]

（五）京津冀文化建设

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理念构建、产业布局和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保护四个方面。

京津冀文化理念的构建，对促进区域内部文化认同而言意义重大。张芳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京津冀”不仅是一种地域概念、经济概念或政治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京津冀红色文化圈”理念的提出，以“文化圈”理论为依据，抓住并延伸了革命战争年代铸就的京津冀“红色情缘”，尝试总结出能涵盖“京津冀”的红色文化特征和红色文化想象，建立起京津冀红色文化传承互动的“红色网络”，从而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层互动。^[66]

在京津冀产业布局和发展的研究方面，肖晔等基于2007—2017年文化艺术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了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即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河北与京津的断崖式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两核一轴带”格局逐渐形成。同时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对其影响因素效应、空间分异性进行探索，讨论了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机制。^[67]

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仍存在较大的内部差距。章圆、孙钰依据整体性治理的学理逻辑，分析了目前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在人才队伍、财政投入、基础设施、产品供给上的非均等供给现状，针对形成困境的原因，从体系建构与完善、主体协调与整合、机制创新与应用三方面，探索了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路径。^[68]陈静、焦鹏航就京津冀博物馆的协同发展现状和不利因

素展开讨论，为打破疆界、业界局限，实现多馆交叉、多元互补，从陈列展览、社会教育、文创研发、学术共建等方面探索了京津冀博物馆合作的新模式。^[69]

关于非遗保护的研究，韩京助、曹学珍指出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存在秩序杂乱无章、区域发展力量悬殊、社会保护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些都掣肘京津冀非遗协同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而协同保护的制度构建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围绕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在制定整体规划，推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提出对策。^[70]

五、文化与教育研究

2021年，文化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育人体系构建、文化与课程建设、罪犯文化教育等方面。

在构建文化育人体系问题上，王小丽等论述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的必要性，指出河北高校已从学科建设、课程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及学术研究等方面探索出一套红色文化育人体系，包括创新思政课、加强顶层设计、营造特色品牌和推进协同育人等，这些措施对进一步加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71]肖婷通过走访三所航天特色高校，对航天特色高校航天文化资源的发展脉络、存在形式、育人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同时针对访谈记录提炼出航天特色高校航天文化育人过程的核心环节，构建了育人模式的理论模型和价值意义，为其他高校文化育人实践提供借鉴。^[72]田海舰、王贺通过调研总结了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在制度、师资、家庭、环境上的制约因素，从教学体系制定、师资培养以及课外文化活动方面提出针对性措施。^[73]

高校文化课程建设兼具重要性和必要性。杨月君、李妙然指出，目前地方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存在课程学分较少、类型单一和地方文化内容欠缺等问题，应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打造精湛师资队伍，构建多样化体验渠道和平台，并完善评价和督导机制，以多方合力推动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74]刘克利通过追溯和探讨河北红色文化的源头、底色、表征，指出河北红色文化具有培育新时代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兼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局稳定发展、实现文化强国与

文化自信的功能,从实践路径、讲述路径、媒体路径三方面指出提升红色文化教育功能的途径。^[75]李丽丽认为,河北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学生、教师、校园均具深远影响。因此应从整合资源、编撰教材、丰富学生社会实践形式、利用网络多媒体平台方面加以建设。^[76]

关于罪犯文化教育的研究,翟中东通过分析国外罪犯文化教育的现状和新进展,指出罪犯文化教育的价值有帮助罪犯净化灵魂、提高文化水平、提高就业能力、降低重新犯罪的可能程度等。目前,组织罪犯文化学习的模式分为教育行政机构主导模式、司法部主导模式、矫正机构主导模式,而且在监狱中推动高等教育成为新走向。借鉴国外经验,中国应将罪犯文化教育纳入国家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以促进罪犯人群的文化教育水平的进步。^[77]

六、文化保护与传播

河北省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何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推动河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是当务之急。针对这一问题,2021年学界在文化继承与保护、文化译介和传播、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作出回应。

(一) 文化继承与保护

2021年,文化继承与保护的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探索发扬文化精神、传承民间技艺、保护文化遗址、发展文化活动、建设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等方面。

关于文化精神传承的研究,张晓艳、韩子璇以燕赵文化为焦点,通过梳理自1949—1966年十七年间燕赵文化在电影中的叙事传承,指出该时期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既传承着燕赵慷慨悲壮的精神风貌,又融入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这一现代性转化为河北电影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推动了燕赵文化的传承和发展。^[78]康振海以吴桥杂技薪火相传、革故鼎新的发展精神为例,指出传统优秀文化应该在提高文化服务力、永葆文化生命力、增强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影响力上不断与时俱进,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作用。^[79]

对传承河北各类民间技艺的研究是学界一大

热点,如评剧、武安平调落子、传统武术、磁州窑陶瓷、易县清宫传统刺绣等均受到学者关注。谭陶等从题材选择、色彩应用和创作方法角度,分析了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辛集农民画的文化价值,针对其保护现状,在传承人培养、衍生品开发、市场拓展方面提出继承发展辛集农民画的对策。^[80]邹惠云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挖掘了龙舞丰富的形式和复杂的演变历史,基于传承人与龙舞的发展现状及面临困境,从传统与创新两方面提出保护策略。^[81]何边将民族民间器乐按类型分为“音乐会”“吹歌”和“吹打班”,针对三类民族民间器乐发展不景气的局面,指出应在师徒传承、学校传承、政府扶持传承、创新改造等方面优化传承方式,促进民间文化艺术发展。^[82]

关于河北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解丹、毛伟娟在分析明长城遗产空间结构层次和资源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内三关长城遗产资源现状与特点,对内三关长城及周边其他资源进行资源潜力评估,同时对内三关长城遗产资源进行具体的整合规划设计。^[83]宣化传统葡萄园文化景观是典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姜海涛等以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从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宣化传统葡萄园的遗产价值、景观内涵、生态智慧以及动态保护方式和发展潜力,为宣化传统葡萄园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84]

传统民间文化活动蕴藏丰富的文化功能,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保护、抢救民间文化活动愈发迫切。齐易着眼于河北民间乐社与花会,介绍了乐社、花会的形式种类及表演方式,通过探析其祈祥消灾、庆祝节日、婚丧嫁娶、商业庆典及舞台演出的应用场合,展示出乐社、花会多元的文化功能。针对乐社、花会的经济供养方式及其与当代社会的互动,作者对河北民间乐社与花会的非遗保护工作提出建议。^[85]

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机制,体现出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性”要求的重视。苏艳英《燕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研究》以完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为主线,自基础理论分析、国家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其他省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发展经验入手,在对照中发现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为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提出有力可行的措施。^[86]

(二) 文化译介和传播

加强文化的译介和传播是加强河北文化传播能力,向全国和世界推介河北文化精神和智慧,构建具有河北文化特色的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2021年,相关成果侧重于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地域民间文化、民族文化、中医药文化五方面。

在河北历史文化传播方面,田苗等以燕赵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拉斯韦尔“5W线性传播模式”理论,探索了燕赵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路径。论文从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和运作、孔子学院及留学生的教学和推广、沿线国家传播客体的差异和需求,分析了传播现状,探究了新的传播路径。^[87]河北博物院收藏的畿辅先哲文物极具地域特色,王文丽、张妍冰以《静藏群壑——畿辅先哲祠名人遗物入藏河北博物院65周年纪念展》为例,指出河北博物院藏畿辅先哲文物还可以探索更加多元而有效的途径,如策划云展览、出版电子书、设立文化主题园区等,通过多种介质,依托科技力量,借势文旅融合,把文物与受众之间的触点由一元拓展至多元,使传播空间从固定区域发展到云端和广阔天地。^[88]

关于河北红色文化传播的研究,田海舰、李慧娟认为,加快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有助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夯实文化自信根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人。为构建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须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路径、传播载体、传播方式五个维度入手,形成受众广泛、立体化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格局。^[89]张楠楠立足于跨文化传播视角和理论,在梳理河北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特征、生成机制和历史演进、价值等基础上,对河北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现状、偏差与不足、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从而深入探索了全媒体传播、组织活动传播等渠道的形式、创新与改进措施。^[90]

地域民间文化是河北历史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张少娟、王瑞通过调查当前邢襄文化外宣翻译的现状,指出邢襄文化在外宣翻译中存在重要性认识不足、翻译人员缺乏、宣传机制落后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91]李亚宏、李燕凌以河北方言文化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其保护和传

播过程中不受重视、传播度低的问题,为此应通过建立保护与传播协调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型传播机制、多元文化消费格局以及科学的研究体系和教学体系等方式,突破现实困境,树立文化自信。^[92]

民族文化传播与民族关系处理有密切关系。金强、熊艳指出,少数民族间文化显著的区分度、适应性及自我革新的成长性,都影响到网民对其文化理解的意愿、态度与方法。同时,少数民族对其族群网络文化的自持能力和传播建构,也对少数民族媒介形象树立和文化演进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内外因素交互感应,不确定因素增多,少数民族文化媒介呈现更多生动议题,民族研究学界应给予少数民族新媒体形象传播以更高的关注和更专业、及时的分析研判,促使其在在意会、默许与赋能之间实现合理切换和动力生发。^[93]

关于河北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容蕾蕾认为在河北中医药“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对与其相关的文化和服务进行外宣翻译和国际传播研究,有助于宣传具有地域特色的河北中医文化,推动河北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海外发展及市场开拓,也是打造“冀药”品牌的有效方式。^[94]祁鹏程以“千年药都”安国为研究主体,在模因论的视角下,分析安国中药文化模因的内涵、传播路径和现状,指出安国中药文化模因在中西医并存的传播环境中,存在传播力不强和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传承好安国中药文化模因需要在制度、宣传、传播等方面采取措施。^[95]

(三) 数字技术应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新兴科技与文化保护的“跨界联姻”也成为学者探究文化保护的新渠道,相关研究包括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地方文化与数字技术、乡土文化的数字传播等。

周燕双等认为数字媒体具有传输效率高、促进互动、可利用碎片时间的传播特征,根据数字媒体的应用路径及优势,可通过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换、构建多元化平台、探索新型表达路径等方式,促进数字媒体与文化融合。^[96]在数字技术应用于地方文化传承和传播方面,甄晨燕通过考察和调研,分析了西柏坡红色文化新媒体传播的现状及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官网资金投入不足、新媒体传播队伍严重缺失、传播内容单一化同质化、新媒体传播途径较少、传播人员的思

想意识不充分、传播模式单调、大众接受西柏坡红色文化的主动性不足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和解决的对策与方法。^[97]殷敬淇通过梳理承德市利用数字化手段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阶段性成果和数字化过程中尚存问题,指出,未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作还应在数字化建档、开发“文化IP”、打造立体化传播格局、创作数字化作品上寻求突破。^[98]以纪录片和短视频技术助力乡村文化传播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田瑾深度挖掘了当下传播媒介的创新特色和全媒体传播再生乡村文化的创新内涵,基于此预测了品牌视觉信息全媒互联的趋势和创新途径,为乡村地域特色文化搭建有效对外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提供借鉴。^[99]

2021年,河北省文化建设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其一,在数量上与去年相比有小幅增长,同时继续面临向质优厚重、指导现实的方向转变的迫切需求。其二,从成果形式和内容上看,论文仍然占比较大。其中,随着文化研究视域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另辟蹊径的新成果较引人注目,如在冬奥会的带动下密切关注河北冰雪文化发展,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大力探索数字技术的应用等。以问题为导向、分析问题提出对策仍是论文式成果的主要模式,其一方面突出了应用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也易于陷入窠臼,部分内容趋于同质化,“经世致用”的价值被削弱。此外,也有不少著作付梓,以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和观照现实的责任感,成为文化传播与保护、文化史梳理等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既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也为其他区域的文化建设研究提供借鉴。其三,对热点问题持续关注,如对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表现出持久而深入的特点。尤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研究上创新了研究形式,通过京津冀学者积极合作、共同交流会谈的方式,打破地理疆界,梳理发展痛点,互借发展经验,达到了理论研究的新高度,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梁晓晓: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向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张京华.满天星斗还是众星拱斗:再论燕赵文化[J].燕赵文化研究,2021(01).

- [2] 田苗,宋土顺,王燕敏,黄晓丽,田壮.燕赵精神在文化载体中的体现[J].新闻研究导刊,2021(14).
- [3] 李朝杰.论燕赵文化特质与诗之风骨传延[J].燕赵文化研究,2021(01).
- [4] 乔楠.燕赵文化的存续与发展探究[J].燕赵文化研究,2021(02).
- [5] 李雪峰.西柏坡精神当代价值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06).
- [6] 戴建兵.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J].人民教育,2021(10).
- [7] 邵艳梅,周海娣.以西柏坡精神培育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研究[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21(03).
- [8] 段晓亮,吴佩育.西柏坡精神与铁道兵精神的内在关联及其时代价值[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21(03).
- [9] 张玲,孙艳美.红船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的比较分析及弘扬路径[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03).
- [10] 傅金才,陈淑荣.石家庄文化通史(明清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11] 张莉萍.保定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
- [12] 郑恩兵.红色文艺之城——张家口[N].光明日报,2021-05-28.
- [13] 王鑫.明清时期张库大道商贸发展及其影响探究[D].河北师范大学,2021.
- [14] 任乃宏.由“精卫填海”说到“五帝时代”——以“磁山文化”与炎帝传说为中心[J].邯郸学院学报,2021(04).
- [15] 藏明,顿一鸣.清河张氏的起源与家风文化[J].邢台学院学报,2021(01).
- [16] 何艳杰.多元交汇:先秦白狄文化变迁特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17.
- [17] 李彦英.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关系研究[J].南方文物,2021(02).
- [18] 马明,梁中合.河北龙山文化研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05).
- [19] 金红莲.河北民歌的文化认同[J].艺术评鉴,2021(05).
- [20] 张培燕,孙燕.河北秧歌小戏的文学阐释[J].保定学院学报,2021(02).
- [21] 李扬,崔文君.激扬文字:中国现代戏剧与革命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
- [22] 张文松,张琳琳.基于太行山脉的河北陶瓷窑口历史文化源流与谱系研究[J].喜剧世界(下半月),2021(08).
- [23] 刘洪彩,崔雨萌.地域传统与文化融合:北朝伎乐天边饰背屏式佛教造像之考察——以河北定州和邺城地区为中心[J].河北学刊,2021(03).
- [24] 解丹,王连昌,李璇.区域文化视角下河北传统建筑特征解析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21(03).
- [25] 学琳,李政错.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与前瞻——基于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学术交流,2021(12).
- [26] 邹玲芳.河北文化产业区域比较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

- 济论坛,2021(09).
- [27]张涛,武金爽.环渤海地区文化产业结构趋同合意性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01)
- [28]张亚宁.产业融合视域下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有效路径研究[J].经济论坛,2021(09).
- [29]佟萌.文化创意视域下文旅对承德民间音乐的产业化促进研究[J].今古文创,2021(03).
- [30]马骏.艺术人才培养与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对接探究[J].文化产业,2021(35).
- [31]岳志荣,梁颖杰,王海军,赵晓红.论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J].当代体育科技,2021(30)
- [32]张晗,李平.冬奥会背景下河北冰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选择[J].商业经济,2021(03).
- [33]武义青,李国平,张强,孙振杰,吴士锋,姚丽芬.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笔谈)[J].经济与管理,2021(05).
- [34]田学斌.大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N].河北日报,2021-10-08.
- [35]邸明慧,张丽云,施俊庄.河北省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01).
- [36]祁刚利,李鹏,曹海霞.河北太行山红色文化资源治理整合与旅游开发研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03).
- [37]雒志达.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品牌培育和推广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0).
- [38]张鑫,刘飞宇.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景观设计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1(08).
- [39]张海燕,王傲冰,刘琳.全域旅游推进太行山“一路三带”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1(04).
- [40]林沙欧,李洋.以秦皇岛港为核心发展海洋文化旅游的调查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1(04).
- [41]谷金明.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旅游文化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21(01).
- [42]邢慧斌,赵梓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文化和旅游合作社发展[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21(05).
- [43]陈纪,董玲君.地方性知识视角下河北蒙古族生态文化与旅游开发探析[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1(02).
- [44]项琳.国家文化惠民工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成就、贡献与经验[J].图书馆论坛,2021(12).
- [45]李宝才.传承红色基因 强化使命担当——河北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建设及其发展历程[J].文物春秋,2021(03).
- [46]李宏宇.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20).
- [47]李开霁,白翠玲,张启,王红宝,杨丽花,牟丽君.河北长城文化旅游景区绩效评价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1(06).
- [48]康金莉.大运河河北段历史文化记忆[N].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49]艾蓉.大运河文化带大名段建设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04).
- [50]肖潇,窦兴斌,孙洪杰,李维锦.河北省运河文化带发展“旅游+非遗”的制约因素和对策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 [51]吴秋丽,曹舒婷.多中心治理视域下河北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分析[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02).
- [52]郭安,张立飞.河北高职院校为大运河文旅品牌建设服务路径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04).
- [53]张文光.保定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新探索[J].保定学院学报,2021(03).
- [54]杨英法,郭广伟.“文化衡水”建设中董子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经营[J].衡水学院学报,2021(01).
- [55]宋玉坤.保定古代碑刻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21(04).
- [56]陈旺.张家口传统饮食文化传播的发展研究[J].食品研究与开发,2021(05).
- [57]韩婧,李春辉.邯郸文化网络双语推广策略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21(01).
- [58]孟祥林.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发展的向度、瓶颈与对策[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21(02).
- [59]庞琳,张亦佳.基于美丽乡村背景的历史文化村镇“原乡”发展模式探讨——以河北省地区为例[J].农业经济,2021(03).
- [60]刘艳冬.红色文化助推河北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措施[J].乡村科技,2021(02).
- [61]解丹,王雯.关隘型古村镇文化景观的作用机制及特征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1(04).
- [62]任丽芬.雄安新区传统建筑的文化价值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1(12).
- [63]闫晓从,赵丹琳,周焕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设计与实践[J].工业设计,2021(10).
- [64]黄志鹏,贾慧献,赵甜歌,徐常博.基于白洋淀民俗文化打造雄安旅游品牌[J].旅游与摄影,2021(21).
- [65]侯贺英,马瑞贤,田秀峰.雄安新区全球形象传播的文化话语研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01).
- [66]张芳.试论京津冀红色文化圈理念[J].燕赵文化研究,2021(01).
- [67]肖晔,赵林,乔路明,吴殿廷.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21(06).
- [68]章圆,孙钰.整体性治理视域下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路径研究[J].城市,2021(11).
- [69]陈静,焦鹏航.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博物馆合作模式探索及展望[J].文物春秋,2021(05).
- [70]韩京助,曹学珍.协同保护视角下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保障研究[J].河北企业,2021(12).
- [71]王小丽,李瑞杰,勾正刚.河北省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及经验探讨[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21(05).
- [72]肖婷.航天特色高校航天文化育人案例研究[N].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73]田海舰,王贺.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调研——以河北省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2021(01).
- [74]杨月君,李妙然.河北省地方高校传统文化类课程建设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1(36).
- [75]刘克利.论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以河北红色文化为例[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44).
- [76]李丽丽.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探析——以河北省相关实践为例[J].新生代,2021(04).
- [77]翟中东.国外罪犯文化教育及新进展[J].中国监狱学刊,2021(03).
- [78]张晓艳,韩子璇.燕赵文化在十七年电影中的传承与现代性转化[J].电影评介,2021(02).
- [79]康振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N].光明日报,2021-04-06.
- [80]谭陶,刘思,张亚军,权琰.对河北辛集农民画的探究与思考[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21(05).
- [81]邹惠云.口述史视域下河北“非遗”龙舞研究[D].河北大学,2021.
- [82]何边.河北民族民间器乐研究[J].大众文艺,2021(24).
- [83]解丹,毛伟娟.明内三关长城遗产资源整合策略研究[J].中国文化遗产,2021(03).
- [84]姜海涛,赵杰,陈文朝.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果园的保护与利用——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J].中国果树,2021(04).
- [85]齐易.现代化背景下的传统文化固守——河北民间的乐社、花会[J].中国曲学研究,2021(01).
- [86]苏艳英.燕赵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
- [87]田苗,宋士顺,王燕敏,边一鸣,田壮.燕赵文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21(04).
- [88]王文丽,张妍冰.河北博物院藏畿辅先哲文物利用与传播路径研究[J].文物春秋,2021(06).
- [89]田海舰,李慧娟.河北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构建[J].河北大学学报,2021(04).
- [90]张楠楠.跨文化视野下河北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
- [91]张少娟,王瑞.邢襄文化外宣翻译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1(02).
- [92]李亚宏,李燕凌.文化自信视域下河北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播[J].河北大学学报,2021(02).
- [93]金强,熊艳.新媒体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的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1(03).
- [94]容蕾蕾,祝捷,靳昭华.河北中医药文化外宣英译研究[J].时代报告(奔流),2021(12).
- [95]祁鹏程.模因论视角下安国中药文化传播研究[D].河北大学,2021.
- [96]周燕双,王玉珏,张晓娟.基于数字媒体的传统文化传播研究[J].西部广播电视,2021(23).
- [97]甄晨燕.新媒体视域下西柏坡红色文化传播研究[D].河北大学,2021.
- [98]殷敬洪.文化与科技融合背景下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现状及传承策略[J].新媒体研究,2021(21).
- [99]田瑾.构建乡村文化品牌信息全媒体传播模式研究[J].大众文艺,2021(11).

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

张丽

一、2021年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总体状况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河北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全省社会建设持续推进,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成果也主要围绕社会现实问题展开研究。从成果数量上看,较往年略高,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人口与人才领域的研究有所增加。从研究领域看,主要涉及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城乡发展、人口与人才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学者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重点依然是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养老服务、

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优军保障等领域,人才发展和素养提升的研究深度增加。从研究成果的质量看,整体水平有了一定提升,公开出版的著作增多,如《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张岭泉)、《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张云、赵一强、柴艳萍)、《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以河北省为例》(田翠琴、赵乃诗)、《排污权制度探索与实践:以河北省为例》(李利军、李艳丽)、《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研究》(陈亮、石晓飞),发表在《河北学刊》《城市发展研究》《生态经济》等核心期刊的文章也多于往年。总体而言,2021

年关于河北省社会建设的研究成果保持对民生领域的研究热度,研究广度有所扩展。

二、河北省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公共服务依旧是河北省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公共服务领域主要包括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优军保障等领域。2021年,学者主要围绕公共服务的几大领域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运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分析,提出了很多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一) 总体评价

王文录等指出,“十三五”期间,河北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基层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农村公共服务“三缺一旧”、城镇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拥挤排队”、服务人员流失严重、信息化支撑不足、社会组织匮乏等短板,需要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文化体育、住房保障等多个方面提高基层公共服务质量。^[1]

(二) 教育

河北省民办幼儿园迎来了普惠化转型的大趋势,但营利性幼儿园不会退出学前教育生态系统。刘梅基于生态位理论,通过阐释营利性幼儿园的现实生态位,分析制约营利性幼儿园的现实生态位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提出营利性幼儿园发展的生态位分离策略、生态位扩充策略、生态位协调策略和生态位优化策略。^[2]

王剑锋等对河北省中职学校师资供需情况进行研究,调查了河北省中职学校教师的专业、数量、学历、素质和结构等需求情况,结合教育部网站公布的相关数据的分析,指出河北省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未来将呈现专业结构持续调整、总体规模稳定增长、学历层次逐步提升、综合素质逐步提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等趋势。提出需要从扩大培养规模、调整专业结构、优化层次结构、调节专兼结构、提升职业能力等5个方面,调整中职学校师资供给体系。^[3]

省级普通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工作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监测服务是支撑省域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胡保利通过梳理中国高等教

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发展过程,分析中国省级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服务体系建构现状,进而结合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剖析省级普通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监测服务体系的框架设计、实施路径、建设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反思。^[4]

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年阶段的“人”发展的重要途径,要提高老年教育质量,必须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发现并解决教育中的现存问题。李彦等对河北省老年教育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河北省老年教育存在参与率不高、地域发展不平衡、公平性不足、总体教育教学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并从加大宣传、增加供给、加强整体规划和协调管理、关注弱势群体等多方面提出提高河北省老年教育整体水平的建议。^[5]

胡国华认为探讨老年人学习对赋权增能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实现老年教育的赋权增能价值提供参考。以河北省老年大学501名60岁以上的老年学员为研究对象,对其学习满意度、学习效果、社会支持和赋权增能进行问卷调查,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四个研究变量的结构关系。研究发现,老年人学习满意度的提升,对其学习效果、社会支持和赋权增能产生正向影响;学习效果的提升,有助于充分发挥老年人学习带来的赋权增能价值;社会支持经学习效果发挥中介效应,其支持越多,获得赋权增能的水平越高。^[6]

河北干部网络教育经过四年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开辟了河北省“互联网+干部教育”的新局面。新时代党中央对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新媒体和新知识不断更新,干部学习积极性的迅速高涨,干部网络教育培训资源体系建设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王芸等从课程学习模式、课程体系、课程来源三个方面对干部网络课程资源建设现状进行了分析,采用2016—2019年32万学员学习大数据,对比分析平台试运行阶段与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学员对课程的参与度、完成度、关注度变化。结果发现,当前干部网络教育培训资源建设存在着课程体系需要合理补充、课程资源供给机制有待健全、课程模式欠缺灵活性和互动性、课程资源使用率和学习效果尚需提高、课程资源需要一体化设计等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7]

（三）劳动就业

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北省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影响，冯赵建等对 2020 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在此基础上结合 2021 年的就业趋势分析河北省的应急管理实况，从史密斯模型分析入手，对理想政策、群体目标、环境因素和执行主体进行详细阐述，指出河北省就业政策执行存在理想政策内容细化有待完善、执行主体衔接运行力度较低、目标群体就业择业能力较弱、政策环境干扰因素复杂多样等问题，提出将史密斯模型引入河北省就业政策的优化机制，建构可持续运行的应急管理机制，全方位打造河北省就业政策长效供给结构，多维度改善河北省可持续就业防御体系。^[8]

郭爱华将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放在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环境中来进行阐述和分析，从河北省高校就业结构出发分析其就业结构偏离度。根据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性不高、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灵活就业居多、就业稳定性差等就业现状，从市场需求出发，着眼于高校教育供给、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和畅通就业市场人才流动三个方面，分析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培养类型、学历层次、学科专业、通用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方面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基于此，从三个方面提出破解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的思路，一是对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培养方向进行调整，二是加强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三是加快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进程。^[9]

韩伟等通过对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结构性矛盾仍是制约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指出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就业行业结构、就业部门结构、就业地域结构和就业能力结构不平衡。提出优化大学生就业结构，应多措并举、多策并施，政府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企业要更新用人观念，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学生自身要努力提高就业竞争力。^[10]

完善的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有利于提高返乡创业率及返乡创业成功率，如何优化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是政府与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王亦明等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内涵进行文献回顾，对河北省返乡创业环境现状进行调查，并指出河北省返乡创

业环境存在返乡创业融资难、创业人员管理及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对创业相关信息和创业支持政策了解不够、硬件设施有待完善、公共服务环境及文化氛围尚待提高等问题，提出河北省创业生态系统的优化路径，一是强化资金支持，拓宽融资渠道；二是增强培训力度，推动返乡创业人才发展；三是多渠道政策宣传，引导正确选择创业项目；四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专业服务组织；五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农村创业氛围。^[11]

激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是实现乡村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贾冀南等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个人特征、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创业融资环境以及创业教育培训六个维度，深入挖掘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大政府财税政策扶持力度、优化返乡创业融资环境、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体系、加大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宣传力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风险承受能力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政策路径。^[12]

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引发了就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催生了新业态就业和传统就业的升级跃迁。张双伶探析了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理论逻辑和内在影响机理，构建了河北省数字经济和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质量状况，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河北省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就业促进效应和制造业的就业替代效应显现，河北省就业结构升级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和产业数字融合应用均显著改善了河北省就业质量状况，政务新媒体建设和政府网上服务效率提升也有助于提高河北省就业质量水平。^[13]

（四）社会保险

马慧肖等对河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现状进行分析，结合统计数据资料，多角度多方面分析河北省城乡居民医保的实施情况，重点调研了农村医疗保险情况，指出河北省城乡医保实施过程中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基层医疗卫生设施配置较差，二是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人才

匮乏，三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面临新的问题，并提出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重视人才培养和激励、推动城乡医疗资源共享等建议。^[14]

（五）养老服务

伴随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张岭泉重点从考察农村老年人对互助幸福院建设的期望入手，对邯郸市肥乡区农村互助幸福院发展及模式推广进行阐述，在对农村空巢老人进行互助幸福院认知度、满意度和期望值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意识、完善农村互助幸福院运行机制、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服务水平等角度提出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对策。^[15]

张丽认为，已有省市实践表明，建设城市养老服务综合体是解决养老服务问题的创新路径。对城市养老服务综合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在借鉴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体的先进经验以及总结河北省已有建设基础后，指出建设城市养老服务综合体面临的不足：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缺少核心要素连接，三者协调度不高；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单一供给模式难以满足需求；养老服务资源综合协调制约因素多，一体化整合难度大。对此，提出了建设城市养老服务综合体的对策建议：科学打造多层次城市养老服务综合体、建立多资源跨界协同合作机制、探索创新养老服务综合体发展模式、提供多功能融合的“一站式”服务。^[16]

严晓萍在分析河北省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指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存在六大短板：一是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入住率低，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少，农村服务设施不足；二是政府补贴侧重机构，老年人专项补贴亟须发展；三是社区养老服务形式化严重；四是社区医疗服务亟待提质；五是社区精神文化生活、文体娱乐设施不够丰富；六是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发展缓慢。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一是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普及老年友好型社区；二是扩大对社区养老服务产业投入，提供人性化服务项目；三是加快社区智能化服务产业发展，提供品牌化、规模化服务；四是大力发展医养结合服务，提供适合老龄

化需求的就医服务。^[17]

张齐超指出，当前河北省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取得一定进展，出台多项推进适老化改造政策，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各地适老化改造工程启动，同时编制国内首个适老化改造地方标准《既有住宅建筑综合改造技术规程》。指出，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仍面临不少问题，主要是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项目数量偏少、普遍适用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和施工服务体系尚未形成、适老化改造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为加快推进适老化改造进程，提出建议，全面启动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专项计划，政府积极引导群众构建适老化改造利益协调机制，形成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的政策支撑体系，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适老化改造中，培育适老化改造产业和市场。^[18]

徐静等对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推动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的开展提供依据。以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河北省石家庄、保定、承德市 537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产性养老调查表、自我感知老化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中，家庭照料参与得分最高，其次为体力活动、终身学习、志愿者服务，有偿工作参与得分最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曾从事职业类型、自理能力、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自我感知老化是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活动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其生产性养老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提出应提升老年人对生产性养老的认识，对不同职业、自理能力及自我感知老化水平的老年人进行针对性干预，促进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的参与，助力积极老龄化。^[19]

（六）医疗卫生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弹和外部输入的挑战，整合应急医疗资源、提升应急医疗资源保障能力至关重要。张朝玉等通过韧性视角从医疗环境、医务人员、医疗资源状态、医疗资源动员能力构建等方面研究应急医疗资源保障韧性指标体系，以熵权-AHP-TOPSIS 方法计算各城市韧性，进行聚类分析，以识别医疗资源保障的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城市间的应急联动、合理布局医疗资源空间、构建多主体参与的

合作治理体系、运用数字技术建设大数据平台等提升河北省重大疫情城市应急医疗资源保障韧性的路径。^[20]

许云清等基于集聚度的概念对河北省 11 市乡村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进行分析,为政府部门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等工作中制定卫生资源配置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利用“河北省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的数据,计算卫生资源集聚度(HRAD)和卫生资源集聚度与人口集聚度之比(HRAD/PAD),分析河北省 11 市乡村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结果表明,2019 年河北省各市、乡村卫生资源集聚度差异较大(HRAD 范围:0.2025~2.8671),承德和张家口各项指标的聚居度基本 <0.5 ,而邯郸、石家庄、唐山、邢台、廊坊的集聚度绝大多数 ≥ 1.2 。按人口配置的乡村卫生资源也存在差别(HRAD/PAD 范围:0.4638~2.1528),承德 HRAD/PAD 均 >1.4 ;村卫生室数量的 HRAD/PAD 石家庄仅为 0.4638,衡水为 1.5398;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注册护士的 HRAD/PAD 廊坊约为 0.7,秦皇岛村卫生室和唐山乡镇卫生院注册护士的 HRAD/PAD 则在 1.4 左右。得出结论:河北省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存在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现象,按人口资源配置公平性优于按地理面积配置。在今后的乡村卫生资源配置中要考虑区域人口密集程度,兼顾卫生资源空间布局。^[21]

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21 年,华北局部农村地区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突显了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极端重要性。高自旺总结了农村地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从“核心建设、基础支撑、关键保障”三个层次构建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思路,以及促进应急管理机制加快构建的对策建议,一是高度重视“哨兵机制”顶层设计,加快制定并出台相关规划、实施意见及政策制度;二是创新建设要素筹集方式,强化资金、人才、技术支撑作用;三是开展试点示范评定,引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加快健全。^[22]

(七) 文化体育

总分馆建设从兴起至今,因出资建设主体、运行机制不同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的经验,界形成

了多种模式。丁若虹、赵学平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河北省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迁安、石家庄、廊坊、沧州、馆陶等为代表的总分馆建设模式,并以河北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为例,从完善顶层设计、健全运行机制、因地制宜等方面梳理了河北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经验与特点,提出理顺各方关系、制定长远规划、发挥总馆作用、完善评价体系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思考与建议。^[23]

民办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受到社会和行业的更多关注。谢广林等重点围绕图书馆的办馆设施条件、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教学与科研支持,调查了河北省 9 所民办高校图书馆。结果表明,河北省民办高校图书馆办馆水平和服务水平随着学校的发展不断得到提升,但同时也存在馆藏资源匮乏、资金投入不足、服务水平不高、服务深度欠缺等问题,并从增加经费投入、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创新服务内容、优化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河北省民办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对策。^[24]

冬奥会推动河北省冰雪运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大众冰雪体育运动成为更多居民体育运动的一个新选择。李青华等对河北省冰雪运动发展的现状以及冰雪运动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进行了阐述,分别从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冰雪运动意识、冰雪产业及专业人才的角度来分析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与途径、增加普及性和可参与性、合理的规划、依托学校传播冰雪运动等相应对策,从宏观方面来指引冰雪运动的发展。^[25]

(八) 优军保障

军民融合是我国新时期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建设提出的重要发展举措,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路文杰等剖析了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以色列所推行的四种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并结合河北省军民融合的发展现状,提出河北省在军民融合式发展过程中存在军民融合思想意识薄弱、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军民融合人才匮乏等问题,在综合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军民融合思想认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和加强军民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等推进河北省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对策建议。^[26]

三、河北省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2021年,河北省积极部署碳达峰与碳中和工作,继续深入推进“三大污染”治理,积极出台环境治理新政策,加快生态文明标准体系建设,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学者加强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从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坝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排污权制度探索与实践,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张云、赵一强、柴艳萍撰写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一书,首次以河北省为对象,该书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论、河北省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决策部署与行动路径、河北省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创新、河北省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经验与启示、进一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考等五个部分,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落地情况,选取典型案例指出其制度创新意义,对其他省份提供经验。^[27]

田翠琴、赵乃诗撰写的《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以河北省为例》一书,遵循经济结构变迁、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一历史主线和发展逻辑,对由此带来的环境治理转型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互动影响,系统探讨经济变迁、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与机制,探究河北省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互动影响。该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概括分析了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互动机制,为深化经济转型理论与社会互动理论提供了范例,为探索中国近四十年社会变迁、经济转轨和环境治理转型提供地方性经验,并将环境治理纳入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之中;二是系统研究河北省近四十年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历史演变与进程,填补了地方(省域)经济发展史和环境治理史研究的空白;三是对探索和完善河北省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有较大的借鉴价值,有助于推进河北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与协调发

展。该书有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学术思想创新,作者综合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从经济变迁的视角分析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互动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的融合。将经济变迁史与环境治理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探寻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的相互影响,扩大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将经济变迁理论运用于河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社会实践之中,探寻河北省经济变迁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及历史分期,是经济变迁理论实证化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综合运用整体论、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将经济变迁的主要内容与环境治理转型结合起来,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与互相影响,既扩大了环境社会学研究视野,又创新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28]

河北坝上地区作为首都“两区”建设的重点区域,其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与优化对当地和京津冀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彦芳等以2018年土地利用状况为基础,采用InVEST模型计算坝上地区生境质量指数并提取生态源地,选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最小累积阻力表面,划分不同等级的生态安全区,提取生态廊道,并构建河北坝上地区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坝上地区生境质量总体偏低,50%以上为低等生境质量区,中高等生境质量区约占46%,呈现出生境质量两极分化,类型和分布不均衡等特点。生态源地占坝上总面积的17.50%,其中40%以上分布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生态廊道总长度为640.86千米,生态节点53个,高等质量生态安全区占25.92%,低等级质量的生态安全区主要分布在张北县、康保县。坝上地区生态安全质量不是很高、生态系统多样性较低,生态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县区之间生态质量差异明显。未来应进一步提升低等级生态区域生态质量,构建更加稳固的生态安全格局。^[29]

李利军、李艳丽撰写的《排污权制度探索与实践:以河北省为例》一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排污权试点工作的时间顺序为主要线索,对排污权理论及其制度形成,排污权在中国的发展,排污权在河北省开展省级试点的准备和过程,排污权的期限、价格、范围、担保、数量配置,排污权有偿使用标准,排污权的使用监测、

排污权的环境—经济调控效应等进行了探讨和说明。^[30]

水旱灾害是河北省最严重的农业气象灾害因子,为了探明河北省近 20 年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时空转变过程,谢宝妮等根据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理论,基于气温、降雨、土地利用、GDP 和人口密度等多源数据,以干旱和洪涝灾害为风险源,以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6 种景观类型为风险受体,基于 GIS 技术对河北省 1995—2015 年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 年河北省水旱灾害风险概率总体中等,中等风险以下等级占全域总面积的 51.39%~93.30%,较高风险和高风险占全域面积的 6.70%~48.61%。河北省近 20 年水旱灾害生态风险等级的空间异质性非常明显,较低风险以下占全省面积的 57.87%~74.10%,主要位于河北省北部、太行山山地等区域,较高和高风险等级占全省面积的 4.90%~20.08%,主要分布在南部平原地区。从时空变化来看,河北省近 20 年水旱灾害生态风险约 37.70%,面积呈下降趋势,主要分布在冀中南北部、承德市中部及唐山市等地区,以较低风险向低风险转变和中等风险向较低风险转变为主。河北省近 20 年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总体风险较低,且呈现降低趋势,该研究可为灾害风险管理及环境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31]

四、河北省城乡发展研究

2021 年,河北省继续深入中心城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建设,学者研究也重点从城乡发展功能、发展模式等方面展开。

(一) 城市建设

在城市群发展中,围绕核心大城市建设都市圈,既符合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正在逐步具备建设都市圈核心城市的条件,加快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是河北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杨艳军等阐述了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意义,从多角度对比分析指出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是河北省的客观选择,在借鉴长三角等先进地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确定了省会都市圈的基本架构,并从明确各城市产业功能定位、提升核心城市吸纳辐射能级、促进大

中小城市梯度协调发展、构建省会都市圈现代产业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加快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的对策建议。^[32]

郑萍指出,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点,对社区治理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针对城市社区转型中呈现出的诸多新特征,河北在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的探索实践,形成了多样化的社区治理范式,这些典型范式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夯实了基础,但也呈现局部创新、碎片化实践的特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探索形成与河北实际高度契合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面对新时期新特点新要求,提出河北在当下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功能,激发“多元共治”活水效应,以准入清单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率先推进数字社区建设,构建健康社区治理长效机制。^[33]

(二) 城镇建设

冯文斌等认为,近几年河北围绕示范区各项重点建设任务,在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结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壮大城市和县域经济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指出,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政策没有完全落实等问题,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很大差距。提出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城市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建议。^[34]

张超等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视角出发,构建“三生功能指数”对河北省建制镇发展模式进行识别和评价,并从空间维度提出河北省镇域“三生功能”发展逻辑及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河北省“三生功能指数”较高、增长较快的小城镇集中分布在“京石”“津保”“京唐秦”等发展轴线以及环北京、环天津等发展圈层上,而位于张承地区、河北南部的邢台、邯郸地区境内的小城镇“三生功能指数”下降明显。伴随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河北小城镇发展进入“流量经济”时代,区位、交通和地方品质因素已经上升为决定小城镇发展最关键因素。“明星型城镇”和“潜力型城镇”中有一半以上的小城镇毗邻铁路站点,具备优越的交通优势。“明星型城镇”中近四成小城镇是北京、天

津、石家庄、唐山等大城市周边“边缘城镇”。“生产功能主导型”小城镇空间上主要分布于“京石轴线”“石黄轴线”和“京唐轴线”上。“生产功能主导型”小城镇则主要分布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区，“生态功能主导型”小城镇则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北部的张承地区。提出未来河北小城镇发展的核心策略应遵循以城镇品质构筑、服务场景打造和地方营销为手段的地方品质逻辑。^[35]

刘悦美等基于河北省四个村庄对比，分析了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推动下就地城镇化模式的不同特征，反思了就地城镇化的理想机制。研究发现，村庄所具备的区域资源和要素优势是就地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政府力量能够通过政策规划、项目设置、制度投入，增强资金和服务供给；以地方企业代表的市场力量可以促进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优势互补；村委会和村集体起到桥梁纽带作用，均衡并调和政府与市场的不足。提出就地城镇化的推进需要政府、市场、村集体、村民之间有机组合，形成功能互补、结构优化的多中心治理系统。^[36]

（三）乡村建设

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的协同发展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向，探索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耦合关系是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基础，而且研究休闲农业同美丽乡村耦合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晓旭等运用熵值法和综合指数法计算二者综合发展指数，并构建休闲农业-美丽乡村耦合模型，选取2014—2018年河北省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相关数据，分析河北省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河北省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在0.20~0.59之间，说明二者耦合度水平较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增长态势，且耦合关系处于动态有序状态，说明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作用是相互的，二者具有耦合性。^[37]

郝锋等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立足河北省情农情，全面梳理数字乡村建设取得的进展、成效和存在问题，提炼典型做法，探索提出加强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多元建设主体协同模式、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数字乡村大数据综合信息平台、加强要素保障服务等建设模式，以此实

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全面发展。^[38]

五、河北省人口与人才发展研究

准确把握河北省人口发展特征和趋势才能更好地促进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人才发展和素养提升是促进河北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是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重要支撑。2021年，部分学者对不同类型人口尤其是老幼残等特殊群体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主要围绕不同领域人才建设和人口素质提升展开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对恋爱婚姻、家庭建设进行了研究。

（一）人口发展

严晓萍指出，河北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发展不平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缺乏大城市和城市群、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不足等问题，认为农村“三权”价值的吸引、对农村家庭“根”的情感、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限制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为解决“半城镇化、半市民化”状态，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从增强城镇对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素质和城市生活适应能力，解除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后顾之忧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39]

范松丽对河北省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6~24月龄婴幼儿营养状况、特点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PPS抽样和随机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河北省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2786名6~24月龄婴幼儿为调查对象。通过身高体重测量评估婴幼儿营养状况，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婴幼儿基本情况、看护人营养知识掌握情况、24小时喂养情况。结果表明，6~24月龄婴幼儿年龄别体重Z评分(WAZ)、年龄别身高Z评分(HAZ)以及身高别体重Z评分(WHZ)均值分别为(0.54±1.23)、(0.49±1.56)和(0.45±1.38)，均为正值，且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婴幼儿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消瘦率、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5.49%、2.55%、4.27%、21.97%、11.84%，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消瘦率、肥胖率男孩明显高于女孩；生长迟缓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月龄、及时辅食添加、最低膳食频次、最小膳食

种类均为婴幼儿生长迟缓的相关因素；性别、及时辅食添加为低体重的相关因素；性别、最小膳食种类为消瘦和肥胖的相关因素。得出结论，河北省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 6~24 月龄婴幼儿生长发育水平有所提高，但营养不均衡呈突出问题，尤其是营养过剩问题严重，需加大科学喂养知识的健康教育，提高父母或看护人的营养知识的知晓率。^[40]

刘艳丰等分析河北省唐山市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及影响因素。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北省唐山市农村老年人 408 人，进行个人状况、家庭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等调查，采用积极老龄化量表对其进行评测。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得分为（85.61±13.340）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自理能力平均分最高，为（18.75±3.633）分；积极奉献社会平均分最低，为（6.82±2.264）分。分层回归显示家庭状况和社会参与状况能独立解释 4.2% 的积极老龄化。得出结论，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有待提高，应关注家庭状况和社会参与状况，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期提高该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41]

残疾的发生和预防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到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探讨地域及其社会经济相关因素对于残疾发生、致残原因的影响和作用，有针对性地预防及降低残疾发生风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王金营、马志越依据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及 2017 年河北省持证残疾人数据库数据，充分刻画不同残疾类别下残疾发生与地域及其社会经济的关系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残疾发生率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既有地域区位、地理因素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因素差异对残疾发生率的影响。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看，各县持证残疾比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不同类型残疾发生比例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地域自然条件是致残的基础性因素，从而判断地域自然条件对于残疾发生有着基础性影响，而经济因素是致残原因中的外生重要因素，进而推理判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区域人口中残疾发生有着显著影响。预防机制和康复服务相结合是降低残疾发生的重要手段，要通过建立区域联动的

残疾预防机制及加强残疾康复服务，有针对性地降低残疾发生风险。^[42]

（二）人才发展与素养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引进培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李婷等为探求人才政策工具对人才的吸引力情况，在构建人才吸引力因素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对 178 位人才问卷调查获得人才吸引力关键因素，对河北省 163 份人才政策文本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政策工具与人才吸引力因素的契合关系。研究得出，创新氛围、人才培养、人才激励评价、创新创业支持、人才服务和薪资待遇等方面契合度高，政策效果较佳；工作场所仪器设备条件、配偶子女安置和住房补贴的契合关系为政策不足，应加大政策制定；人才载体和医疗社会保障的契合关系为政策冗余，需加强政策实施。^[43]

高等院校教育人才的分类评价改革对高校建立学科特色、履行教育教学使命、发挥各类教师优势具有积极意义。韩利红认为河北省高校实施教师分类评价改革后，导向与分流作用显现、教育教学主旋律回归、考核与评价的科学性增强、学校用人自主权加大、成果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破五唯”不够彻底、部分评价结果陷入“量化陷阱”“官本位”惯性依然残留、人才评价缺少年龄维度的变化、行政人员考核流于形式等，提出建立多维立体评价体系、强化发展性评价、建立多元评价主体、评价要与教师职业生涯变化相契合以及调和教师价值观等对策。^[44]

王颖通过对河北省 744 名乡村初中教师进行关于继续教育模式和发展需求的调查，发现目前教师培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培训时间多集中于教师法定休息日，且总时长达不到国家规定要求；二是培训内容忽视师德养成和综合素养提升；三是教师期待的现场考察或观摩、同行经验介绍、交流讨论和对学员个别指导等培训形式较少涉及；四是缺乏训后回访与跟踪指导；五是乡村教师话语权缺失，处于“被培训”状态；六是从整体上看，教师对培训的实效性评价不高。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转变培训观念、优化培训环境、改革培训模式等方面改进。^[45]

加快建设一支高水平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是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一环。王艳霞认为,河北省在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培训,京津冀医疗卫生人才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人才总量稳步增长。指出,医疗卫生人才分布不合理、人才工作压力大、薪酬满意度低、晋升难度大、人才招聘难和引进难等问题依然严重。提出,加强河北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应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保障;加快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提高医疗卫生人才收入水平;全面实施公立医院编制备案制,激发医疗卫生人才活力;降低招录门槛,改进招聘方式,扩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选拔范围;制定向基层人才倾斜政策,推动医疗卫生人才下沉基层。^[46]

杨克众等从人才投入、人才产出及人才环境三个方面选取 22 个指标,构建河北省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借助 Matlab 软件计算各层级的指标权重,并按重要程度排序;通过突变级数法对河北省 11 个城市的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评价与对比分析,并对各城市的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聚类,最终划分为强、较强、较弱、弱四个等级。基于评价结果,提出提升河北省各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机遇,打破各城市之间的科技人才垄断现象;二是依据各城市地理区位及产业结构特征,开发河北省城市群的产业链发展模式;三是升级各城市的优势产业与核心功能,协调科技人才投入产出及环境间的关系;四是利用雄安新区带动河北省科技人才结构调整,重构科技人才的空间分布格局。^[47]

孙胜显等认为,“新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凸显,但指出“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机制不健全、宣传挖掘不够、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提出河北省促进“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一是健全政策,强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机制;二是培树典型,营造“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氛围;三是搭建平台,提高“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组织程度。^[48]

城镇劳动者作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在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科学素质与技能水平也应全面提升。赵砚文在分析河北省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概括了近年来加强继续教育

和职业培训的主要实践,针对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与技能提升形式相对单一、监测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丰富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提升内容、加强动态跟踪监测与构建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对策建议。^[49]

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是推动乡村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薛国凤等在对河北省 11 市乡村留守儿童及乡村教师的调查中发现,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存在着未把网络使用与育人目标充分结合、对留守儿童缺乏科学的网络教育指导方法、教师网络信息技术整体素养普遍偏低等问题。分析深层原因,涉及乡村教师选拔、在职培训、教师自身认知困境和学习意志等方面。提出,可通过更新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理念、重视乡村教师选拔中网络信息技术能力并加强职后培训、提升乡村教师融合网络信息技术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的能力、加大专项投入并持续优化乡村学校网络文化环境、引导乡村教师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并搭建乡村教师为主体的云平台等对策,来提升乡村教师整体网络信息技术素养。^[50]

李伟光对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选取了河北省某高校 561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0.48% 的学生具备健康素养,41.71% 的学生具备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18.72% 的学生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29.41% 的学生具备基本技能素养。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是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指出该校学生健康素养具备率有待提高,提出学校通过强化健康教育课、加强体育与健康相融合、线上教育与线下健康教育相融合等方式将健康素养的培养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提高学生的整体健康素养水平。^[51]

许丽雅等对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知识、态度、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女性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染源知晓率(54.5%)明显高于男性(37.4%),对于紫外线高温方法是否可以灭活病毒,男性知晓率(77.9%)高于女性(68.4%);年级越高,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重视程度越高;30.1% 的大学生能够做到疫情期间戴口罩、洗手、消毒、避免聚集等行为活动。得出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大学生对疫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较高但并不全面。提出,对于疫情基本会以科学方式处理,但仍有必要在大学生群体中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教育,帮助大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疫情、了解疫情,并寻找科学的应对方式。^[52]

(三) 婚姻家庭研究

恋爱成婚是青年的人生大事和普遍需求,青年择偶、婚姻行为受婚恋观直接影响,正确引导青年的恋爱观与婚姻观,不仅直接作用于青年的婚恋价值趋向于身心健康,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李茂等对青年婚恋观念进行调查,认为当代青年普遍持有积极健康的主流婚恋观,基本符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确定的更加文明、健康、理性的青年婚恋观念目标。调查发现,青年的婚恋观念呈现出择偶标准多元化、价值取向包容化等特点,但也存在对婚姻缺乏理性认知、择偶方式传统单一、恋爱动机非理性等问题,并对此提出完善婚恋教育体系、推进政策法规落实与宣传引导、创新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形式、加强青年婚恋法制观念等建议。^[53]

数字反哺对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享受便利生活,以及家风建设、发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任娜认为,应发挥新时代青年在家庭领域宣扬主流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在数字、智能领域,进行数字反哺,以帮助中老年人适应新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推动社会发展。提出,可以从帮助家庭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引导长辈和晚辈相互理解尊重、促进家庭和谐等方式来提升数字反哺效果。^[54]

六、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研究

学者关于雄安新区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历经五年探索,更为深入,这里着重选取了2021年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人才生态环境评价、高等教育科技创新。

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和质量高低是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雄安新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对于建设未来之城、打造全国样板、培育创新发展新的增长极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合作网络的形成有助于公共服务质量的提

升,合作网络治理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赵新峰等基于核心组织管理型网络结构模型,依托合作网络治理理论,分别从雄安新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的内容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主体聚合、区域凝聚、智慧凝结的雄安新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策略。^[55]

人才竞争格局呈现新的变化,对人才生态环境的重视与涵养正成为众多国内外高科技园区的共同选择,雄安新区亦不例外。周爱军通过对雄安新区人才生态环境的指标设计与量化测评,得出结论:雄安新区人才生态环境建设正处于孕育生机的原生态阶段,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才种群和群落,但外来的高端高新产业人才群落尚未形成,与人才成长、成熟和再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产业、公共服务环境对人才的滋养能力不足,急需补齐短板。提出应以“双一流”大学建设为核心构建雄安现代教育网络,以“京雄同质化”为目标夯实雄安的公共服务基础,打造重视人才、服务人才的现代化治理环境。^[56]

宫天然认为,雄安新区高等教育是区域创新的组织者,能够引领科技创新的前沿,推动雄安形成自我更新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提出雄安新区的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应当借鉴国际经验,成为科技创新的实践者与组织者、学科融合发展的促进者和“双创”教育的践行者。^[57]

七、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三地在公共服务、人才交流方面取得一定成效。2021年,学者也重点围绕城市群、生态治理、公共服务、人才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

曾建丽等利用熵权-灰色关联度法评价京津冀城市群14个城市2008—2017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基于评价结果,利用自然断点法分析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以京津两地为核心,向周边城市呈“核心—边缘”递减趋势,城市群内部发展差距逐年扩大;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等级化特征;不同等级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因素不同;除北京以外,所有城市新型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均为创新

发展。^[58]

王月红等指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仍未出台,严重制约着京津冀生态环保协同发展做深做实,创新思维方式、构建非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统一框架,将“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和“受益者付费原则”(BPP)统一在“改变者付费原则”(CPP)分析框架中,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京津冀大气治理CGE模型具体测算了特定大气质量控制目标下河北应获得的生态补偿额。^[59]

杨胜利、姚健通过构建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客观赋权法,分别以各市市辖区范围内和全市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公共资源数量为计算口径,对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在全市范围口径下,各市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程度要大于市辖区范围口径下的均等化程度;2006—2016年全市口径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渐向好,而市辖区口径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未好转。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各市的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增长较慢,而人口增速较快,造成公共服务资源压力增大。全市(包括市辖区和县域)范围内各市公共服务供给增速加快,促进了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提升。指出今后在发展中需要关注具有较大人口吸引力的各市市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升,进而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60]

董玉峰等认为,职业教育具有就业脱贫和提志强技的防返贫功能,可以增强脱贫人口的生计资本和可行能力,是稳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全面脱贫后的精准防返贫中起着关键作用。指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过程中,存在职业教育与产业防返贫融合较低、职业院校专业供给与防返贫需求脱节较重、职业教育防返贫管理与协调长效机制欠缺、职业教育防返贫资源配置效率缺乏等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要加强京津冀区域协同力度,实施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防返贫,整合京津冀职业教育防返贫资源,健全职业教育防返贫管理和协调机制,以信息化促进脱贫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三地统筹协作促进职业教育防返贫质效提升。^[61]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养老服务的三地协同发展仍需突破。李娟、孙启认为,河北省在京津冀三地养老服务中发展较弱,面临资金短缺、医养结合不够深入、供需矛盾突出以及人才短缺等问题,成为三地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的短板。李娟、孙启提出,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规范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医”与“养”深度融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满足老龄群体多样化的养老需求。^[62]陈文静等对京津冀城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天津、河北60岁以上老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目前选择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其他形式养老的老年人分别占76.9%、19.2%、2.1%、1.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居住方式、患慢性病种类、地域等是影响京津冀城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独立因素。得出结论,针对京津冀城市老年人多以家庭养老为主,可以通过健全多种养老方式缓解目前家庭养老的压力。^[63]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流动儿童数量也日益增加。儿童作为社会中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环境的变化更容易导致社会适应问题。马雪玉等使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对石家庄市1090名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现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社会适应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总体上女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略高于男生;不同年级的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有显著差异,年级越低,儿童社会适应能力越好,并从政府政策支持、学校平等尊重、家庭关心爱护和社会共享包容四个层面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提出对策和建议。^[64]

陈亮、石晓飞对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进行研究,以柔性管理和人才柔性流动理论为基础,探索性来提出人才“柔性共享”理论,在诠释人才“柔性共享”理论基础上,综合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当前人才结构特点以及河北省与京津地区的人才需求差异等,剖析了影响人才流动的原因,以“共享经济”理念构建和谐的人才共享关系,并结合京津冀区域特点,构建了适应京津冀区域的人才“柔性共享”机制,并充分考虑到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辅助人才“柔性共享”机制落实的相关政策建议,运用

“柔性共享”的互联网思维,选择传统模式与创新模式共用,建立京津人才服务河北的良好平台和有效的配套措施。^[65]

杨胜利、段世江使用京津冀地区 2000—2019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与创新能力和宜居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分析了京津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总结了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科创人才集聚模式。研究表明,北京地区的人才集聚模式为“经济—宜居主导型”,天津为“经济—社会保障主导型”,河北为“经济—教育—宜居主导型”。人均 GDP、平均工资水平、产业结构和高等教育资源、医疗便捷度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对科创人才集聚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从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环境质量以及搭建人才平台三个维度提出建议。^[66]

通过对 2021 年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可以看出,学界对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的诸多领域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提出了很多可操作性的有效路径,研究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偏重于实证调查研究,对于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仍不多,研究成果质量还有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高端精品学术成果有待进一步突破。虽然公开出版的核心期刊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在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的理论文章总量偏低,仅有《河北学刊》《护理学杂志》《林业资源管理》《水土保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教育理论与实践》《生态经济》《教育与职业》《中国老年学杂志》等核心期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大部分以发表在省级刊物的文章为主,且与往年重复性问题研究较多,创新研究视角和创新观点不多。另外,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优秀成果较少,在研究方法创新上仍存在短板。总之,关于河北省社会建设研究的成果仍需学者们创新思路、拓宽视角、拓展深度,为推动河北省社会建设贡献智库力量。

(张丽: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王文录,郑萍,张丽,王立源,张齐超.2019—2021 年河北省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调研报告[C].河北社会发展

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5 月.

- [2] 刘梅.普惠化趋势下河北省营利性幼儿园发展的生态位策略[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2).
- [3] 王剑锋,周娜,罗雯.“十四五”时期河北省中职学校师资需求与供给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4] 胡保利.普通本科高校教学质量省级监测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基于河北省的实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5] 李彦,庞春超.河北省老年教育调查报告[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3).
- [6] 胡国华,朱勇军.老年人学习满意度对赋权增能的影响:学习效果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12).
- [7] 王芸,李冠熙,商哲.河北干部网络教育课程资源体系建设分析[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21(1).
- [8] 冯赵建,许雪靖,杨许月.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工作研究——基于史密斯模型[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9] 郭爱华.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匹配研究[J].今日科苑,2021(9).
- [10] 韩伟,王栋亮,康丽滢,韩敏.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失衡与优化路径研究——基于 2019 年河北省 20 所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1(02).
- [11] 王亦明,杨楠,马莹.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河北省返乡创业环境优化研究[J].投资与创业,2021(20).
- [12] 贾冀南,梁晓丹,李凯伦.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 [13] 张双伶,季文光,彭杨.数字经济发展与河北省就业质量提升: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经济论坛,2021(11).
- [14] 马慧肖,马征.河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现状及问题分析——以农村基本医疗保险为视角[J].经济论坛,2021(11).
- [15] 张岭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6] 张丽.2019—2021 年城市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的对策研究[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5 月.
- [17] 严晓萍.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趋势分析[J].社会科学论坛,2021(2).
- [18] 张齐超.2019—2021 年城市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研究[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5 月.
- [19] 徐静,白焕利,田建丽,刘雨,王宁航.河北省老年人生产性养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2021(17).
- [20] 张朝玉,赵新宇.河北省城市应急医疗资源保障韧性评

- 价与提升路径[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 [21] 许云清, 杨紫微, 周秀银, 张焯, 袁钰琪, 吕萍, 潘莹, 唐龙珠. 基于集聚度的河北省乡村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河北医药, 2021(19).
- [22] 高自旺. 新冠疫情下地方政府构建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思路与对策[J].经济论坛, 2021(11).
- [23] 丁若虹, 赵学平. 河北省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河北科技图苑, 2021(2).
- [24] 谢广林, 李世新, 韩月异, 白莉. 河北省民办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 2021(6).
- [25] 李青华, 刘旺财, 王麟. 河北省大众冰雪体育运动发展建设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 2021(17).
- [26] 路文杰, 刘鑫, 刘鹏威, 甄然. 国外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及对河北省的启示[J].河北企业, 2021(6).
- [27] 张云, 赵一强, 柴艳萍.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河北省的实践与启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21.
- [28] 田翠琴, 赵乃诗. 经济变迁与环境治理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以河北省为例[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1年.
- [29] 王彦芳, 代庭继, 刘孟竹, 裴宏伟, 郭晓楠. “两区”建设背景下坝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 2021(4).
- [30] 李利军, 李艳丽. 排污权制度探索与实践:以河北省为例[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21.
- [31] 谢宝妮, 秦占飞, 李镇, 杨会彩. 河北省 1995—2015 年水旱灾害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J].水土保持研究, 2021(5).
- [32] 杨艳军, 楼婷, 侯建华. 河北省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路径研究[J].经济论坛, 2021(12).
- [33] 郑萍. 2020 年城市社区治理典型范式路径研究[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5月.
- [34] 冯文斌, 刘静, 李珊珊, 郝蕾. 2020 年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报告[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5月.
- [35] 张超, 张意博, 陈思, 杨丽华. 基于“三生功能”视角的河北小城镇发展模式识别及评价[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 [36] 刘悦美, 田明, 杨颜嘉. 就地城镇化的推动模式及其特征研究——以河北省四个村庄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21(6).
- [37] 周晓旭, 胡博禹, 张润清. 河北省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耦合发展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2021(1).
- [38] 郝锋, 郝雷.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北省数字乡村建设研究[J].经济论坛, 2021(10).
- [39] 严晓萍. 河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约因素分析[J].经济论坛, 2021(2).
- [40] 范松丽, 李进华, 马倩, 张英奎, 闫承生, 陈卫宏, 史亚楠. 河北省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 6—24 月龄婴幼儿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河北医药, 2021(5).
- [41] 刘艳丰, 成杰, 董立焕. 河北省唐山市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1(5).
- [42] 王金营, 马志越. 地域及其相关因素对人口中残疾发生、致残原因的影响研究[J].兰州学刊, 2021(1).
- [43] 李婷, 郭鸿湧. 人才吸引力因素与政策工具契合关系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科技促进发展, 2021(4).
- [44] 韩利红. 河北省高校教育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 [45] 王颖, 胡国华. 新时代河北省乡村初中教师培训模式现状与发展需求调查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2).
- [46] 王艳霞, 刘雪辰. 健康中国视角下省域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人事科学, 2021(6).
- [47] 杨克众, 梁林. 河北省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1(3).
- [48] 孙胜显, 闫文, 王瑶琳. 河北省“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J].山西农经, 2021(10).
- [49] 赵砚文. 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与技能提升对策研究[J].经济论坛, 2021(6).
- [50] 薛国风, 王明, 田二配. 乡村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基于河北省 11 市乡村留守儿童网络使用的调查[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1(3).
- [51] 李伟光, 赵晓红, 李志慷, 曹子敬, 牛家明. 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资讯, 2021(12).
- [52] 许丽雅, 左慧君, 王一诺, 齐丽娜. 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知识、态度、行为调查[J].卫生职业教育, 2021(5).
- [53] 李茂, 刘鹏, 王晨阳. 当代青年婚恋观念的现状特征及其引导策略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 2021(4).
- [54] 任娜. 发挥新时代青年在家庭领域宣扬主流文化的作用[J].中国地市报人, 2021(8).
- [55] 赵新峰, 王鑫. 雄安新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何以实现——合作网络视角的分析构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1(3).
- [56] 周爱军. 雄安新区人才生态环境评价与涵养路径[J].河北学刊, 2021(6).
- [57] 宫天然. 雄安新区高等教育科技创新的发展路径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27).
- [58] 曾建丽, 赵玉帛, 李淑琪.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J].生态经济, 2021(10).
- [59] 王月红, 宣宇.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研究[J].生态经济, 2021(3).
- [60] 杨胜利, 姚健. 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再测度与思

考——以京津冀为例[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3).

[61]董玉峰,李建英,杜崇东.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防返贫:逻辑机理、实践反思与推进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1(21).

[62]李娟,孙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养老服务的现状、困境及对策[J].许昌学院学报,2021(1).

[63]陈文静,王妍,杨佳琪,王颖,安文忠,单伟颖.京津冀城

市老年人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1(15).

[64]马雪玉,孙天姿,王鑫.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1(2).

[65]陈亮,石晓飞.京津冀人才柔性共享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66]杨胜利,段世江.京津冀科创人才集聚模式与机制创新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21(7).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高智 梁世雷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是河北省推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核心任务。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聚焦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绿色低碳发展、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等重点方面,对河北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研究。与往年相比,研究领域更加全面、研究内容更加多元、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同时,研究更加聚焦热点难点问题,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证相结合,无论在研究方式方法和层次维度上,还是在研究质量和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创新,研究成果更具参考和应用价值。

一、生态环境建设研究

河北生态环境建设,事关民生福祉,关系首都生态安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和修复,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既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加快建设美丽河北的核心要义。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生态建设、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生态安全等多维度对生态环境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 生态建设

刘书越指出,塞罕坝精神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的密码,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们的崇高品格。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加快建设美丽河北,必须坚

持把绿色作为发展底色,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加强监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必须像塞罕坝人一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脚踏实地、迎难而上,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在美丽中国长卷上谱写绿意盎然的河北篇章。^[1]

康振海指出,河北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的嘱托,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懈奋斗。要坚持向绿色要发展、向绿色要未来,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做到发展服从生态、生态支撑发展。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以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实绩造福于民。要全力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蕴。^[2]

王哲平等认为,河北省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把燕赵大地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要立足新阶段新要求,创新理念、手段和方式,树立系统思维,强化整体意识,统筹发展与保护,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更大力度推动生

态系统修复和保护,更高水平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更深程度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更加全面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让美丽河北的生态底色更加亮丽。^[3]

甄贞认为,河北肩负着打造更加牢固的首都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践行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河北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建设生态文明的使命意识和思想自觉;二是要艰苦创业,不懈奋斗,深入扎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解决好每一个问题,驰而不息奋力啃下“硬骨头”,不断在开创河北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迈出坚实步伐;三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不断构建建设河北生态文明的“科学谱系”和物质力量,坚定不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

武义青等指出,河北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要弘扬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严守资源消耗上线、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不断提高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推动河北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是尊重自然、保护优先,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二是艰苦创业、拼搏进取,努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建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家园;四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5]

牟永福认为,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从以下四方面着力:一是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着力点,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力源”;二是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突破口,加快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安全网”;三是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主线,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四是以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保障,加快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支撑点”。^[6]

武义青等认为,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

区,河北省承担着京津冀区域特别是首都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重要使命,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一是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和评价机制,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信息基础和产权基础;二是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主动谋划、系统推动生态资源的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交易;三是健全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促进生态功能区发展权和环境权相平衡;四是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和推进机制。^[7]

李书锋指出,目前,首都“两区”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资金紧张、项目推进困难、效益差等问题。因此,要通过精准区分生态服务项目类型、优化政府购买生态服务方案、构建生态项目建设良性循环模式等途径,为进一步推进首都“两区”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具体来看,一是科学设计生态项目构成,实现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二是通过“盈利反哺公益”,构建良性循环模式;三是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注入;四是以自然地理为依据,整体规划生态项目布局。^[8]

季文光等在对河北省土地生态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区域国土空间生态安全的对策措施,一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规划研究,将国土空间生态环境安全评价及治理相关内容纳入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规划;二是针对国土空间生态环境变化制定动态的土地生态保护政策,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及畅通的反馈渠道,强化国土空间生态环境污染及破坏后修复的后期管理;三是统筹安排年度国土空间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注重资源利用和生态多样性保护,正确协调和处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9]

王述芬等研究指出,当前农民生态素养存在生态意识淡薄、生态知识缺乏以及生态能力欠缺等问题,影响农村相关产业绿色发展以及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为此,应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观念、生态知识和生态能力等方面提升农民生态素养,一是加强生态知识宣传和行为引导;二是提升生态素养实践能力;三是完善立法和执法保障工作。^[10]

王建勋等认为,首都“两区”应以可持续

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两山”理论为指导,充分借鉴国内成功的生态富民经验做法,立足当地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充分利用各种类型社会发展力量,大力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全面提高乡村村民社会参与能力,加大乡村生态旅游投资发展力度,实现生态保护与生态富民持续协调统一发展。^[11]

(二) 生态修复

王彦芳等认为,河北坝上地区的生态源地、生态节点、生态廊道以及生态安全区在空间上分布不均,未来应加大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和建设,提升区域整体生态安全水平。一是对坝上地区生态安全划分等级,制定完善政策法规,严格保护生态源地。二是加大对存在生态威胁的生态源地、节点等区域生态恢复和提升力度,强化内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性,发挥关键生态功能。三是着力推进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等高等生境质量区建设,优化生态廊道,推进生物、物种多样性发展。^[12]

于淑会等指出,河北省东部沿海地区盐碱地资源丰富,但盐渍化程度高,实施暗管排水工程是行之有效的盐碱地改良手段。为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角度,对雨季暗管排水工程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雨季暗管控制性排水能有效控制地下水埋深,有效减少涝害发生;暗管排水工程可有效降低土壤含盐量并减缓表层土壤碱化进程,有效维持植物多样性,有效增加农田生态系统的粮食生产价值。^[13]

高建国等研究指出,废弃铜矿山虽然已不再生产,但遗留的重金属污染问题仍然严重,主要污染物为废石和选矿尾矿。另外,矿区表层土壤受到的Cu、As污染,对区域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当地居民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建议采用植物修复技术对废弃铜矿山进行修复,以耐受性较高和富集性较强的本地植物为主,采用合适的植物配置模式,增加植被面积,提高植物修复效率。^[14]

王欣等指出,连锁式生态护坡嵌草砖有三大优点,一是超强连锁,适应多种坡度,尤其是高陡边坡,解决了山体生态修复的瓶颈;二是生态护坡,既可以利用矿山尾矿渣、工业废渣制作,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又能种树植草和补充地下水,保证了生态性;三是施工简捷,对施工技术

人员要求不高,为提高施工效率奠定了基础。因此,应在裸露边坡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中大力推广应用。^[15]

刘晓东等指出,河北省推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应重点强化农业节水技术、节水管理和结构调整。一是推广喷灌、管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进水肥一体化建设,推动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措施、农艺措施、科学灌溉管理措施有机地结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二是提高农田建设管理水平,规范和加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建立全省农田建设进度定期调度机制;三是优化各地区种植结构,发展高效节水作物,持续推进“一季休耕,一季雨养”的种植模式,提高水资源禀赋与作物耗水量匹配度,减轻水资源短缺压力。^[16]

二、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是回应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呼声、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的迫切需要。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两个方面。

(一) 环境保护

范海玉等认为,公众参与在提高生态环境地方立法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强化生态环境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促进环境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公众行使政治权利和环境权的重要体现。要确保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地方立法,应以现行中央和地方立法法律规范、环境法律规范为依据,结合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现状,完善全过程、常态化的公众参与机制,健全公众参与的沟通反馈机制,建立公众参与的激励补偿机制,严格考核监督与责任机制,建立大数据应用法律机制。^[17]

夏妍指出,环境法与生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在管理目的、管理对象上存在着一致性,都是为解决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发展矛盾、提升环境管理有效性与科学性。因此,应针对生态园林绿化管理中存在的管理制度滞后、管理形式混乱、人员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结合环境法的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用系统和整体的方法将生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体系化,强化生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

制度体系建设,运用环境法明确生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操作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实现生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良往发展。^[18]

侯清华等认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进行调节、约束、纠正、修复与防治,应建立囊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环保社会组织、媒体以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内的,更符合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环境协同治理生态网络体系。同时,要完善治理资源与利益保障机制,加大环境协同治理生态网络系统“分解者”扶持力度,加快环境协同治理生态网络系统发展进化。^[19]

李清章等指出,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一个战略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因此,必须在考虑有关各方的利益下,通过建立权威性的环渤海经济区立法协商机构,作出权威性的区域环境治理的科学安排,搭建共享性的区域环境信息平台,健全生态环境治理救助机制,以法治手段实现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20]

谷慧玲等指出,钢铁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保护环境及合理利用资源有重要作用。因此,推进钢铁企业生态文明建设,实行环境责任成本管理是大势所趋,是钢铁企业长期保持生命力的主要支撑。强化钢铁企业环境责任成本管理,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培育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树立环境责任成本理念;二是健全钢铁企业环境责任成本管理衡量指标和体系;三是对企业环境信息数据实行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四是加强社会各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21]

(二) 污染防治

温利华等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建立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机制对促进京津冀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建议:一是优化河北产业结构,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二是加强公共交通建设,降低汽车尾气排放量;三是提倡绿色出行方式,鼓励消费者购买各种新能源商用汽车;四是推动农村和城镇进行煤改气,大力推广利用洁净可再生能源;五是严格禁止农业秸秆燃烧,实行“准点、定时、定人、定责”管制。^[22]

申琳等认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高

农民主观幸福感,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人居环境整治决策与评价体系,一方面,强调民生本位,践行人本理念,以农民满意为导向,输出更能满足农民需要的决策;另一方面,拓宽评价反馈途径,畅通农民诉求表达渠道,将农民满意作为效果评估与整改的重要依据。第二,因情施策,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意见较多的突出问题,强化亟待完善的薄弱环节。第三,完善以认同为前提、以村规民约为约束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23]

范海玉认为,《河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在实践中的具体实施,以及省内各设区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制定都要坚持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广泛吸纳公众参与立法过程。保障生活垃圾分类立法的公众参与权,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进一步明确垃圾计量收费的具体规定;二是建立引导性强的可回收物投放机制;三是构建点面结合的大型生活垃圾投放制度;四是加强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日常监督和巡查。^[24]

张春玲等指出,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从源头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根本方式,是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是建设生态宜居环境的迫切需要。现阶段,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个人层面的文化及观念因素,组织层面的制度、参与及资金因素,实施层面的创新及人才因素。因此,提升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能力,必须建立多元共治模式,个人层面要高度重视乡村女性主导地位,组织层面要建立具有乡村特色的垃圾分类体系,实施层面要以数据治理为手段建设垃圾分类“监管系统”。^[25]

宋焕等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制定不同种类生活垃圾污染违规排放的惩罚标准规范,加大惩罚力度;二是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责制度,提高地方政府污染监管意识;三是加强监管人员业务能力培训,提高地方政府污染监管能力;四是引入第三方力量监管,提升地方政府治理生活垃圾污染的努力程度。^[26]

董志芸等基于邢台市环保税开征实践的测算,对新型城镇化下环保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视域下提升环保

税治污效果,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执行最优税额标准,弥补环境治理成本;二是实行税负递加制,引导绿色生产和消费;三是扩大征税范围,增强环境保护执行力度;四是完善征管模式,激励企业节能减排。^[27]

三、绿色低碳发展研究

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绿色低碳实现永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河北省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基于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两个视角,从绿色动能培育、稳妥有序推进“双碳”以及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 绿色发展

牟永福指出,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共进的现实路径。绿色转型是实现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深刻变革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全过程地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层面,形成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要转变观念,以绿色理念推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变革;二是要转变方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三是要转变思路,以全民共治助推形成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合力。^[28]

王春蕊认为,推进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创新摆在重要位置,走出一条区域特色创新发展之路。重点应从以下五方面着力:一是以产业增绿,做强绿色产业体量,抢抓区域竞争制高点;二是以科技增速,壮大市场主体规模,增强经济发展支撑;三是以资源增值,加快制度创新,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四是以服务增效,优化创新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五是以机制增力,强化多领域协同,形成可持续发展合力。^[29]

王重润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发展绿色经济需要绿色金融提供强力支撑。当前,河北省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任务依然繁重,需要把绿色金融打造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建议:一是加快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二是从需求和供

给端健全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三是加快推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四是完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五是构建绿色金融激励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30]

郭禹辰指出,绿色金融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金融体系,以绿色金融赋能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构建绿色金融政策保障体系,发挥金融产品资金载体与金融服务资金“润滑剂”功能。具体来看,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顶层设计,健全政府绿色金融引导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坚持市场导向,加快开展绿色金融创新,拓宽融资渠道;三是强化绿色理念培养,建立金融机构绿色培训体系,打造绿色金融人才集聚高地和思想前沿阵地。^[31]

张文儒等认为,在去产能、调结构、打响蓝天保卫战的时代背景下,钢铁行业必须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河北省推进钢铁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瞄准市场需求开发高端产品,研发钢铁行业迫切需要的先进生产技术;二是将钢铁行业绿色生产技术贯穿于焦化、烧结、冶炼、轧制、热处理等生产全部流程;三是加大科技投入,推进校企合作模式,发展研发机构和研发平台,提高科研人员能力和水平。^[32]

李丽等针对煤炭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沉陷问题,提出了河北省煤炭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即在矿井设计、环评阶段将矿井传统开采设计与充填开采设计理论贯穿融合,在矿井生产阶段推动充填开采产能与环境承载能力协调匹配,在矿井开采后期技术改造中依据开采现状更新充填开采技术与装备,减少煤炭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证整个区域生态的平衡性和健康性。^[33]

任亮等基于机会成本视角,提出了农牧交错带生态优先兼顾农业产业发展的策略。一方面,要构建生态优先发展的农业产业综合体系,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延长产业链条、拓宽产业边界,构建农牧林产业复合,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多动能体系,实现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经济效益、扩大社会效益的多重目的。另一方面,要建立生态优先发展的激励机制,消除生态建设的正外部性,实现生态优先建设。^[34]

王建勋等认为,张家口市位于首都北京的上风上水区域,在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和水源涵养功能保障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推动张家口市绿色发展,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第一,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推动森林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第二,全方位推进旅游全产业链绿色发展;第三,大力推动乡村绿色发展,提高农牧业综合效益和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第四,构建政府主导的绿色发展政策支持机制、企业绿色管理创新机制以及公众绿色行为导向机制。^[35]

(二) 低碳发展

武义青等指出,“十四五”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河北省必须确立更为积极的节能降碳目标,以更大的决心与魄力,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行动,克服传统发展方式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以系统观念指导推动温室气体和污染物协同治理,切实让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朝着设定的绿色减碳目标迈进。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措施,积极推动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逐步转向源头预防模式;二是要从产业规划和空间布局上做好顶层设计,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三是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省、市级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对减污降碳和协同增效统一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考核。^[36]

刘晓辉认为,张家口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生态资源和可再生能源丰富,有条件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因此,应努力探索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现实路径。一是变“能源优势”为“产业优势”,依托“金字招牌”,打造“新型能源产业生态系统”;二是变“生态优势”为“碳汇优势”,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三是“绿色金融”助“低碳发展”,全方位拓展绿色融资渠道,构建首都“两区”绿色金融体系;四是以“低碳激励”促“低碳自觉”,以碳普惠制引领形成社会低碳链,促进首都“两区”生活方式绿色转型。^[37]

徐双军等指出,建筑领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领域,“双碳”背景下河北推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路径:一是发挥“政府+企业”合力,加强顶层设计;二是立足“技术+建筑”思维,提升建筑整体质量;三是着眼“企业+居民”群体,多举

措实施推广;四是树立“健康+建筑”理念,以人为本创新发展;五是融合“文化+建筑”元素,书写城市符号;六是创新“项目+旅游+乡村”模式,进一步扩大影响。^[38]

董博等指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交通一体化的推行,构建低碳交通评价管理体系,推进河北交通低碳化已成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建议河北树立低碳经济思维,优先发展公交系统,科学规划交通路线,加大新能源汽车应用和推广,强化交通监测与执法系统建设,不断提高居民对低碳交通的认识,为交通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39]

四、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研究

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2021年,河北省社科界关于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安全格局协同构建、生态系统协同建设、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生态环保产业协同发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

(一) 生态协同建设

姚梦雨等认为,构建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二是建立区域性生态协调体系和协调发展机制,共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举措;三是建立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在政府主导的同时,积极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提升生态安全格局稳定性。^[40]

胡悦等认为,提升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水平,降低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针对京津两市人口密集、环境容量有限的现状,采取双向调控政策,设定人口、产业进京津的标准,将人口疏散至周边地区,降低京津人口密度,减轻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二是针对河北省第二产业比重高的现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绿色产业体系,引导高耗能产业向生态化产业转化,大力大展生态经济;三是健全京津冀生态治理机制,完善区域生态保护体系,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41]

侯清华等指出,构建京津冀绿色协同治理网

络系统,形成政府、公众、企业等绿色治理利益相关者都积极参与的绿色治理机制,是提高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效果的关键,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构建京津冀绿色协同治理网络系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搭建京津冀绿色财政金融支持网络;二是构建京津冀绿色治理利益共享机制;三是建立多元共治的监督与评价问责机制。^[42]

牟永福认为,创新首都“两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京津冀区域生态协同建设,应在以下四方面着力:一是以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为基础,量化首都“两区”青山绿水生态价值,变资源为资产、资产为资金;二是以市场化运作为抓手,助推形成京津冀一体化生态产品市场体系,打造首都“两区”整体绿色品牌;三是以多元化生态补偿为着力点,推动京津冀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打造生态共同体“新高地”;四是以融资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激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两区”建设,打造首都“两区”生态补偿“资金池”。^[43]

王平乐等认为,做好京津冀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工作,有利于京津摆脱水资源“孤岛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河北生态强省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应尽快建立完善京津冀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融资机制;三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四是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开发式补偿机制。^[44]

刘建杰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以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健全生态补偿法律法规,确保生态补偿和扶贫政策的连续性;二是构建生态补偿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的推进合力;三是完善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管体制,实现补偿资金有效运转;四是加大“造血型”生态保护补偿力度,提供可持续的生计能力。^[45]

郑亚男等认为,推动京津冀种植业生态产业链稳定发展,应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推进种植业由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向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高效率、高效益和集约化生产方式转变;二是提高种植业生产效率和环境效益,整合优化种植业生态产业链系统布局和结

构,形成绿色低碳的健康循环体系;三是完善种植业生态产业链系统的监测、评价、反馈与协调纠偏机制,对种植业生态产业链健康发展进行及时有效调整。^[46]

(二) 环境协同治理

李国柱等研究提出了京津冀能源—经济—环境—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的策略,一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因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能源消耗和工业污染,提高经济体系协调发展水平;二是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提升传统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三是强化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四是用环境政策引导技术创新,用绿色消费需求促进技术创新,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减少污染排放。^[47]

陈红娟等认为,提升京津冀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将绿色发展与城市建设、产业布局、工业发展等各领域深度融合,扩大城市绿化面积,提高城市自净能力,科学构建京津冀城市发展生态格局。第二,推进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技术全覆盖,增强科技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第三,控制冀北地区开发强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效益提升。第四,推进冀东和冀中南区域加强现有产业绿色化改造,实现有效节能减排。^[48]

刘雅凡等结合协同治理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出发点,研究提出了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对策措施:一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二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三是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协同治理能力^[49]。马斌等认为,推进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必须优化升级区域产业结构,建立区域间利益平衡机制,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强联防联控,实现“多元共治”。^[50]

王岚等认为,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同治理需从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完善区域联防联控利益补偿机制、打造京津冀区域风道等多个维度推进。^[51]王月红等认为,推进京津冀大气治理应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提高认识,加快推动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落地;二是科学测算,

合理确定河北应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并动态调整标准；三是多方联动，积极构建京津冀大气治理补偿协调推进机制。^[52]

王小平等指出，推进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发展，要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作用，建立环保产业协同推进机制；要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完善环保产业政策体系；要发挥环保产业协会促进作用，提升京津冀环保产业博览会品牌地位，开展京津冀环保产业大数据建设；要发挥环保龙头企业对产业链带动作用，以环保工业互联网为主导构建京津冀环保产业链；要发挥环保产业园区支撑作用，打造高质量环保产业集聚区。^[53]

韩楠等从供给侧角度提出了进一步降低京津冀工业污染的建议，一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推动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二是加强京津冀创新协作，加大对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支持，构建绿色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三是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财政、行政等手段，建立节能减排长效机制，构建京津冀跨区域环保合作机制。^[54]

王韶华等认为，推进京津冀协同降耗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工作，一是京津两市要增强高端产业转移自觉性，促进与河北产业分工合作，发挥经济辐射作用，带动河北转型发展；二是河北省要转换观念，提升融入性，合理布局产业，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有针对性地建立产业承接平台，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推动京津冀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因地制宜降低能源消耗强度。^[55]

综合来看，2021年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弱项。从研究领域看，关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和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等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关于生态安全、生态文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环境高效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从研究区域看，关于京津冀和河北省整体研究得比较多，对沿海、冀中南、环首都等地区进行专项研究明显不足，专门针对城市和农村的研究也比较欠缺。而且，多数研究更侧重于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的应用和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拓展，在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上仍待进一步强化。

(高智：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梁世雷：河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刘书越. 弘扬塞罕坝精神 加快建设美丽河北[N]. 河北日报, 2021-06-09.
- [2] 康振海. 弘扬塞罕坝精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N]. 河北日报, 2021-09-01.
- [3] 王哲平, 张金杰.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N]. 河北日报, 2021-12-29.
- [4] 甄贞. 弘扬塞罕坝精神 推进河北生态文明建设[J]. 共产党员, 2021(12).
- [5] 武义青, 张云. 弘扬塞罕坝精神 加快推进绿色发展[N]. 河北日报, 2021-11-03.
- [6] 牟永福.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 河北日报, 2021-05-21.
- [7] 武义青, 张云. 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N]. 河北日报, 2021-08-25.
- [8] 李书锋. 优化政府购买生态服务 促进首都“两区”生态建设[N]. 河北党校报, 2021-11-05.
- [9] 季文光, 张坤.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河北省国土空间生态风险评价探讨[J]. 南方农业, 2021(31).
- [10] 王述芬, 韩东, 王妹娟. 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升农民生态素养对策研究[J]. 山西农经, 2021(21).
- [11] 王建勋, 任亮, 贾巨才, 郭慧敏, 刘岩. 首都“两区”的生态富民现状、挑战及路径研究[J]. 生态经济, 2021(23).
- [12] 王彦芳, 代庭继, 刘孟竹, 裴宏伟, 郭晓楠. “两区”建设背景下坝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研究[J]. 林业资源管理, 2021(4).
- [13] 于淑会, 高会, 尚国珩, 齐志国, 韩立朴. 暗管排水对高水位盐碱地的治理效果及服务价值影响分析[J]. 河北地质大学学报, 2021(4).
- [14] 高建国, 王旭东, 唐平宇, 杨灵芝. 河北某废弃铜矿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及生态修复建议[J]. 环境与发展, 2021(2).
- [15] 王欣, 安尚豪, 周文浩, 席圣武. 联锁式生态护坡嵌草砖的块型设计[J]. 科学技术创新, 2021(15).
- [16] 刘晓东, 彭晓彤, 白丽, 高春雨. 水足迹视阈下河北省农业用水驱动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11).
- [17] 范海玉, 张思茵. 生态环境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法律机制研究[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1(2).
- [18] 夏妍. 环境法在生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中的应用[J]. 环境工程, 2021(6).
- [19] 侯清华, 郑亚男, 史宝娟. 环境协同治理生态网络理论解析与体系构建[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 [20] 李清章, 朱家奇, 李梓茗. 环渤海经济区生态环境协同治

- 理的法治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21]谷慧玲,张思艺,刘园,王雪薇,张昊男.生态文明建设下钢铁企业环境责任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财税金融,2021(1).
- [22]温利华,刘红耀.河北省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机制研究[J].现代农村科技,2021(4).
- [23]申琳,刘文超,刘爱秋,张维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高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机制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1(10).
- [24]范海玉.地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中的公众参与[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1).
- [25]张春玲,范默苒.乡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影响因素及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26]宋焕,王瑞梅.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博弈研究[J].生态经济,2021(6).
- [27]董志芸,付悦,张丁月.新型城镇化下环保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1(1).
- [28]牟永福.加快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N].河北日报,2021-01-06.
- [29]王春蕊.以创新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N].河北日报,2021-05-21.
- [30]王重润.加大对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N].河北日报,2021-02-03.
- [31]郭禹辰.绿色金融赋能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1(2).
- [32]张文儒,乔建生.钢铁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发展策略研究[J].热加工工艺,2021(24).
- [33]李丽,何团,李新旺.充填开采视阈下的河北省煤炭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7).
- [34]任亮,孙芳,丁玎.机会成本视角下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优先兼顾农业产业发展策略[J].草地学报,2021(6).
- [35]王建勋,刘岩,任亮.张家口市绿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J].草地学报,2021(9).
- [36]武义青,张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N].河北日报,2021-04-14.
- [37]刘晓辉.努力探索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现实路径[N].河北党校报,2021-11-05.
- [38]徐双军,朱天志,张雅静,车建军,时国华.双碳背景下河北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创新发展路径的思考[J].建筑经济,2021(12).
- [39]董博,曹会云,董康成.河北低碳交通评价管理体系研究[J].物流科技,2021(7).
- [40]姚梦雨,张博晗,傅甜甜.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研究[J].山西农经,2021(10).
- [41]胡悦,马静,李雪燕,陈国鹰.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环境污染与防治,2021(2).
- [42]侯清华,郑亚男.基于CAS的京津冀生态—社会系统绿色协同治理网络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1(2).
- [43]牟永福.创新首都“两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N].河北党校报,2021-11-05.
- [44]王平乐,白志杰.建立和完善河北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1(5).
- [45]刘建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的思考[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2).
- [46]郑亚男,封同新,杨杰.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京津冀种植业生态产业链健康发展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1(19).
- [47]李国柱,黄琪骏.京津冀能源—经济—环境—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1(14).
- [48]陈红娟,冯文钊,焦新颖.京津冀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及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J].生态经济,2021(4).
- [49]刘雅凡,孙雅坤,韩冰,申伟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对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启示[J].全球城市研究,2021(3).
- [50]马斌,姚东来,夏梓莹,苏爽,申伟宁.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策略[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1).
- [51]王岚,刘颖辉,温利华.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的经济学分析略[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21(1).
- [52]王月红,宣宇.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研究[J].生态经济,2021(3).
- [53]王小平,李素喜,于小溪,刘宇航.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2).
- [54]韩楠,范博一,罗新宇.京津冀工业污染的空间特征及供给侧减排效果[J].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2021(5).
- [55]王韶华,何美璇,张伟,刘熙宁.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京津冀工业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1(5).